

目 录

本卷前言 2-1

四月危机期间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1917年4月)

专题说明 2-1

No02681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4月19日) 2-2

No02682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4月20日) 2-15

No02683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记录
(1917年4月20日) 2-18

No02684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4月21日) 2-24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1917年4月至6月)

专题说明 2-29

No07597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特别会议关于
组织工作会议的通报 (1917年4月9日) 2-31

- №07598**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特别会议的组成人员
(1917年4月10日) 2-33
- №07599** 交通部关于为普列汉诺夫委员会提供情报的通知
(1917年4月15日) 2-35
- №07600** 西南铁路电报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致
普列汉诺夫的贺电(1917年4月15日) 2-36
- №07601** 铁路职工卡明斯基致普列汉诺夫的信
(1917年4月15日) 2-37
- №07602** 叶卡捷林娜铁路洛莫瓦特卡车站铁路职工
扎尔热茨基致普列汉诺夫的信
(1917年4月18日) 2-38
- №07603** 亚历山大铁路管理局总会计处地方职员委员会
提供的4口之家最低生活费标准的材料
(不早于1917年4月22日) 2-39
- №07605**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会议
(1917年4月24日) 2-42
- №07604** 尼古拉铁路电报职工代表大会提供的3口之家
最低生活费标准的材料
(不早于1917年4月) 2-48
- №07606** 交通部长和普列汉诺夫委员会主席的联合通报
(1917年5月8日) 2-53
- №07607**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5月12日) 2-56
- №07608** 交通部和普列汉诺夫委员会的联合通报
(1917年5月15日) 2-60
- №07809** 交通部关于附加工资的确定和发放程序的通报
(1917年5月27日) 2-64
- №07610**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6月2日) 2-66

关于十月革命的几个文件

(1917年8月至11月)

专题说明		2-70
No07284 临时政府关于授予军事部长和内务部长非常权力的决议摘要 (1917年8月2日)		2-71
No07285 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1917年8月20日)		2-72
No07287 俄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11月1日)		2-77
No07288 波格丹诺夫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件摘录 (1917年11月19日)		2-79

有关国内战争的几个文件

(1918年1月至1919年11月)

专题说明		2-81
No07297 俄共(布)中央关于《肃反委员会通报》停刊的决定 (1918年10月25日)		2-82
No07296 最高宗教署要求军人支持高尔察克的呼吁书摘录 (1918年11月)		2-83
No04071 迈斯基就加入萨马拉政府一事致孟什维克中央的信 (1918年11月7日)		2-85
No07301 格里戈里耶夫部队的暴行 (1919年7月)		2-103

- №07302 迈科夫斯基将军关于镇压反高尔察克农民
起义的命令 (1919年9月30日) 2-104
- №06226 维尔纳茨基的日记 (1919年10~11月) 2-105

农村的十月革命和贫农委员会

(1919年3月)

- 专题说明 2-129
- №07292 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库尔班戈乡农民给
列宁的信 (1919年3月) 2-131
- №07293 克鲁普斯卡娅就农村问题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不晚于1919年3月22日) 2-133
- №07294 列宁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便函
(不晚于1919年3月22日) 2-135
- №11617 列宁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便函
(1919年3月22日至27日之间) 2-136
- №07295 彼得罗夫斯基给韦托什金的批示
(1919年3月27日) 2-137

列宁与罗日科夫关于粮食政策问题的通信

(1919年1月)

- 专题说明 2-138
- №07290 罗日科夫致列宁的信
(1919年1月11日) 2-140
- №07291 列宁致罗日科夫的信
(1919年1月29日) 2-142

俄共（布）中央对哥萨克的处理意见

(1919年1月至4月)

- 专题说明** 2-144
- №07298**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对哥萨克态度的通知
(1919年1月24日) 2-146
- №07299**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暂缓采取对哥萨克的
措施的決定摘录(1919年3月16日) 2-148
- №07300**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关于顿河地区形势的
讨论记录(1919年4月22日) 2-149

高尔基谈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一）

(1919年10月至1933年2月)

- 专题说明** 2-151
- №06561** 高尔基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19年10月6日) 2-152
- №06559** 高尔基就知识分子问题致列宁的信
(不早于1919年10月6日) 2-154
- №06562** 高尔基就文化工作等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年7月12~24日之间) 2-159
- №06563** 高尔基致李可夫的信(1924年12月9日) 2-164
- №06564** 高尔基就报刊、宣传、出版等致斯大林的信
(1929年11月27日) 2-166
- №06565** 高尔基就他遭到的批评和攻击致斯大林的信
(1930年1月8日) 2-174

- №03458** 高尔基就编写出版《国内战争史》一事致
斯大林的信（1930年6月5日） 2-177
- №04505** 高尔基就《国内战争史》交稿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33年1月16日） 2-182
- №11616** 斯大林关于《国内战争史》一书给高尔基的信
（1933年2月3日） 2-185

关于驱逐知识分子

（1922年7月至12月）

- 专题说明** 2-187
- №07315** 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1922年7月） ... 2-189
- №1161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
（1922年8月10日） 2-205
- №11613** 关于驱逐别尔嘉耶夫的有关材料
（1922年8月18日） 2-207
- №11614** 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驱逐尼·亚·别尔嘉耶夫
的结论意见（1922年8月19日） 2-210
- №07316** 列宁就罗日科夫问题致中央全会的信
（1922年12月13日） 2-214

列宁与蔡特金谈国际共运问题

（1921年8月至1922年11月）

- 专题说明** 2-216
- №06529** 列宁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和解致蔡特金的信
（1921年8月15日） 2-217

- №06530** 列宁关于召开三个国际会议致蔡特金的信
(不晚于 1922 年 2 月 23 日) 2-218
- №06531** 蔡特金关于要求谈话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2 月 20 日) 2-219
- №06532** 列宁关于自己的病情致蔡特金的信
(1922 年 2 月 21 日) 2-220
- №06533** 列宁关于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致蔡特金的信
(1922 年 11 月 12 日) 2-221

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 (一)

(1921 年 11 月至 1926 年 7 月)

- 专题说明** 2-223
- №06496** 斯大林就中央鼓动宣传部的组成和职权致
列宁的信 (1921 年 11 月 26 日) 2-224
- №06536** 列宁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作息时间问题致
莫洛托夫的信 (1922 年 3 月 6 日) 2-227
- №06537** 列宁就自己病中的政治活动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2 年 7 月 7 日) 2-229
- №06538** 列宁就任命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为人民委员会
副主席致斯大林的信 (1922 年 9 月 11 日) 2-230
- №06540**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民族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
交换的便条 (1922 年 9 月 28 日) 2-231
- №06468** 俄共 (布) 中央全会关于列宁病中政治活动的决定
(1922 年 12 月 18 日) 2-232

- №06469** 加米涅夫就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意见
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22年12月22日) 2-233
- №06470** 斯大林就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一事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12月22日) 2-235
- №0648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就列宁《我们
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给省委和州委的信
(1923年1月27日) 2-236
- №06482** 托洛茨基关于党内分歧致俄共(布)中央委员
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摘录)
(1923年10月23日) 2-239
- №06483**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托洛茨基10月
24日信的答复(摘录)
(1923年12月31日) 2-242
- №06484** 萨普龙诺夫关于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一文处理经过的说明
(1924年1月10日) 2-244
- №06472**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核实列宁活动致
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的信
(1924年1月22日) 2-250
- №06485** 哈莫夫尼基区核查委员会关于核实列宁文章发表
情况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询问
(1924年2月11日) 2-252
- №06486** 古比雪夫答复询问致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会议
核查委员会的信(1924年2月23日) 2-253
- №06487** 斯大林关于答复询问致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
会议核查委员会(1924年3月4日) 2-257

- №06527**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他最后一次会见列宁的回忆
(1924年12月24日) 2-260
- №06528** 雅罗斯拉夫斯基再谈与列宁最后一次会见的情况
(1924年12月27日) 2-264
- №06473** 乌里扬诺娃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1926年7月26日) 2-267
- №06474** 乌里扬诺娃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的记事
(不早于1926年7月26日) 2-270

值班医生记录的列宁病情和活动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

- 专题说明** 2-278
- №06534** 科热夫尼科夫的值班日志
(1922年10~12月) 2-279
- №06535** 科热夫尼科夫的值班日志
(1923年1月) 2-292

列宁病休期间的党内斗争

(1923年7月至12月)

- 专题说明** 2-301
- №06498** 斯大林关于莫斯科情况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5日) 2-302
- №06499** 斯大林关于莫斯科情况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7日) 2-305

- №06500**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关于通报对改组书记处
意见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1923年7月29日) 2-307
- №06501** 布哈林关于领导人撤换程序问题致加米涅夫的信
(不早于1923年7月30日) 2-309
- №06502** 季诺维也夫关于反对斯大林的做法致
加米涅夫的信(1923年7月30日) 2-310
- №06503** 季诺维也夫关于海峡公约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7月31日) 2-315
- №06504**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与斯大林见面致
伏罗希洛夫的信(1923年8月3日) 2-318
- №06505** 斯大林关于指责分裂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3日) 2-320
- №06506**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关于不同意政治局决定致
斯大林的信(1923年8月6日) 2-322
- №06507** 斯大林关于政治局工作程序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7日) 2-324
- №06508** 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关于政治局工作程序等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8月10日) 2-327
- №06509** 布哈林关于组织工作意见致加米涅夫的信
(约于1923年8月) 2-331
- №06541**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1923年10月26日) 2-332
- №06542**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
分子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速记记录摘录
(1923年12月2日) 2-343
- №06543**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23年12月8日) 2-346

给斯大林信件中反映的苏联政治生活

(1922年10月至1950年11月)

专题说明		2 - 348
№04493	柯伦泰关于在挪威工作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10月27日)	2 - 349
№04494	柯伦泰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工作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12月16日)	2 - 351
№04495	拉苏尔-扎杰关于对俄国印象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月1日)	2 - 352
№04496	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支持斯大林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4月1日)	2 - 355
№04497	李可夫关于对专政的不同理解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2月6日)	2 - 357
№04498	契切林关于和平政策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11月2日)	2 - 359
№04499	奥里明斯基关于反对派致斯大林的信 (1927年11月10日)	2 - 360
№04500	莫洛托夫关于乌克兰粮食收购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月1日)	2 - 361
№04501	奥新斯基关于被流放人员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月1日)	2 - 363
№04502	奥新斯基关于保留个人意见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月4日)	2 - 366
№04503	伏罗希洛夫关于红军政治部主任人选致 斯大林的电报 (1929年9月16日)	2 - 368

- No04504** 伊万诺夫关于个人困难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30年7月24日) 2-370
- No04506** 邦奇-布鲁耶维奇就有人诽谤高尔基致
斯大林的信(1933年5月22日) 2-374
- No04507** 拉狄克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33年6月14日) 2-375
- No04508** 拉柯夫斯基关于重新入党致斯大林的信
(1935年11月28日) 2-378
- No04509** 斯塔索娃关于拯救拉科西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3月23日) 2-379
- No04510** 斯塔索娃关于受到指控致斯大林的信
(1938年5月17日) 2-381
- No04511**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托洛茨基是间谍致
斯大林的信(1938年9月25日) 2-383
- No04512** 斯塔索娃关于纪念老布尔什维克致斯大林的信
(1949年11月8日) 2-385
- No03928** 奥库洛娃-泰奥多罗维奇为女儿事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50年11月) 2-387

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

(1918年4月至1928年1月)

- 专题说明** 2-389
- No05086** 司法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会议关于贯彻政教
分离法令而建立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1918年4月13日) 2-391

- No05087** 司法人民委员部特别局致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关于特别局的建立及其任务的通知（1918年5月29日）…………… 2-392
- No05088** 奥洛涅茨教区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修道院关于修士被捕、财产被没收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文书（1918年11月18日）…………… 2-393
- No05089** 兹韦尼哥罗德司法管理处清理科向兹韦尼哥罗德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管理局报告关于贯彻政教分离法令的摘要（1919年2月22日）…………… 2-398
- No05090**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关于挂肖像问题致列宁的信（1919年10月3日）…………… 2-400
- No01503** 托洛茨基就没收教会珍宝问题致列宁函（1922年1月30日）…………… 2-403
- No05064** 吉洪大牧首关于东正教处境致加里宁函（1922年2月25日）…………… 2-405
- No01512** 托洛茨基就没收教会珍宝工作致列宁等人的信（1922年3月11日）…………… 2-408
- No05065**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省委书记科罗特科夫关于舒亚城事件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密电（1922年3月17日）…………… 2-410
- No06557** 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1922年3月19日）…………… 2-411
- No07318** 俄共（布）中央关于暂停没收教会贵重财物的密电（1922年3月19日）…………… 2-421
- No05066** 温什利赫特《关于宗教界由于没收教会珍品而进行活动》的报告（1922年3月20日）…………… 2-422

- №050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5次会议
纪要的附件——根据《关于宗教界由于没收教会
珍贵物品而进行活动》中第12条做出的决定
（1922年3月22日）…………… 2-424
- №05068** 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关于舒亚城事件给
托洛茨基的报告（1922年3月22日）…………… 2-425
- №07319** 俄共（布）中央关于成立领导没收教会贵重财物的秘密
委员会的密电（1922年3月23日）…………… 2-428
- №05069** 国家政治保卫局致大牧首吉洪的正式书面警告
（1922年3月28日）…………… 2-430
- №05070** 大牧首吉洪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声明
（1922年4月5日）…………… 2-432
- №05071** 大牧首吉洪致主教管辖区高级僧侣们的呼吁书
草稿（1922年4月8日）…………… 2-433
- №05091** 科斯特罗马省执委会司法局致司法人民委员部
第8局关于没收科斯特罗马市各教堂珍贵物品
的汇报（1922年4月11日）…………… 2-434
- №0509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关于在贯彻中央
执委会没收珍贵物品决议中和宗教界领导人加强
斗争的通知（1922年4月25日）…………… 2-439
- №0507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5次会议记录
摘要（1922年5月4日）…………… 2-440
- №05093** 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司第6特别处关于没收教会
珍贵物品的汇报（1922年5月6日）…………… 2-441
- №04700** 彼得格勒等地“进步神职人员”团体致俄罗斯
东正教徒的呼吁书（1922年5月10日）…………… 2-451

- №04701** 彼得格勒等地“进步神职人员”代表呈全俄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请求书（1922年5月10日）…… 2-453
- №04702** 托洛茨基关于部分“进步神职人员”的呼吁书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快邮代电
（1922年5月14日）…… 2-455
- №04703** 列宁关于托洛茨基第357号快邮代电给俄共
（布）中央委政治局的便函
（1922年5月15日~16日前后）…… 2-458
- №04704** 斯大林关于批准将托洛茨基第357号快邮代电
作为“中央委员会对报纸的指示”给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函
（1922年5月16日）…… 2-459
- №05073** 托洛茨基关于教会改组给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委员的信（1922年5月24日）…… 2-460
- №01525** 托洛茨基就英国神父的抗议致斯大林等人的信
（1922年6月2日）…… 2-462
- №05094** 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司第6特别处关于没收教会
珍贵物品的作战汇报
（不早于1922年7月22日）…… 2-465
- №04705**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关于全俄“新生
教会”神职人员代表大会的汇报（第1号）
（1922年8月9日）…… 2-468
- №04706**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关于全俄“新生
教会”神职人员代表大会的汇报（第2号）
（1922年8月12日）…… 2-471
- №04707**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关于巡视布良斯克
省的收获给布勃诺夫的便函
（1922年8月25日）…… 2-473

- №05095** 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教堂的银制圣骨匣从格尔莫根的木制棺材中取出的委员会记录 (1922年9月1日) 2-475
- №04708**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的决议(1922年10月13日) 2-477
- №04709** 没收珍贵物品委员会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组成和职能的会议记录(第18号) (1922年10月17日) 2-478
- №04710** 托洛茨基关于批准关于反宗教委员会组成和职能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快邮代电 (1922年10月17日) 2-480
- №04711** 莫洛托夫关于审批反宗教委员会组成和职能给托洛茨基的便函(1922年10月17日) 2-481
- №04712** 加米涅夫关于加里宁进入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电话电报 (1922年10月17日) 2-482
- №04713**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组织工作会议记录(第1号)(1922年10月17日) 2-483
- №04714** 俄共(布)中央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议(1922年10月19日) 2-484
- №04715**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号) (1922年10月23日) 2-485
- №04716** 斯克沃尔佐夫起草的反宗教宣传任务提纲 (1922年10月23~31日之间) 2-486
- №04717** 杜契科夫关于吉洪派给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的报告 (1922年10月30日) 2-489
- №04719**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2年11月4日) 2-491

目 录

- №05395**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关于其所做工作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22年11月4日）…… 2-493
- №04720**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2年11月28日）…… 2-501
- №05396**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1922年11月28日）…… 2-505
- №04721** 布勃诺夫给政治局的便函和政治局关于增补人员的决定草案（1922年11月29日）…… 2-509
- №04722**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2年12月12日）…… 2-510
- №04723**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3年1月1日）…… 2-514
- №04724**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3年1月17日）…… 2-519
- №04725** 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成员补充的决议（1923年1月18日）…… 2-522
- №047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成员补充的决议（1923年1月25日）…… 2-523
- №05074**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11次会议纪要的摘要（1923年1月30日）…… 2-524
- №04727**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3年2月16日）…… 2-525
- №04728**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函（1923年2月28日）…… 2-528
- №0472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延期讨论革新派宗教会议问题的决议（1923年3月1日）…… 2-529

- №04730** 杜契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宣传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备忘录（1923年3月1日） 2-530
- №04731** 关于保留最高教会管理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和给革新派宗教会议的指示（1923年3月8日） 2-532
- №04732**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1923年3月22日） 2-533
- №05075** 大牧首吉洪致俄联邦最高法院的信（1923年3月29日） 2-538
- №05076** 贯彻政教分离委员会第18次会议纪要的摘要（1923年4月3日） 2-539
- №05077**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俄共（布）政治局委员们的报告（1923年4月） 2-540
- №0473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增补成员的决议（1923年5月2日） 2-542
- №05078** 贝科夫给大牧首吉洪案件主席加尔金的报告（1923年5月8日） 2-543
- №047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增补委员的决议（1923年5月10日） 2-546
- №0473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成员更换的决议（1923年6月4日） 2-547
- №04736**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增补成员的决议（1923年6月8日） 2-548

目 录

- №05079**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6 月 12 日) 2 - 549
- №05080** 大牧首吉洪致俄联邦最高法庭的声明
(1923 年 6 月 16 日) 2 - 550
- №04737** 罗斯拉夫斯基在向政治局转送吉洪大牧首的
声明书时附带的便函 (1923 年 6 月 19 日) 2 - 551
- №04738**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最高法院的指示 (草案)
(1923 年 6 月 19 日) 2 - 552
- №05081**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6 月 19 日) 2 - 553
- №05082**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6 月 26 日) 2 - 554
- №04739**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
斯基的便函 (1923 年 7 月 2 日) 2 - 555
- №04740**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换俄共 (布) 中央
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3 年 7 月 3 日) 2 - 556
- №04741**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 (布) 中央
反宗教委员会增补成员的决议
(1923 年 7 月 3 日) 2 - 557
- №04742** 俄共 (布) 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反宗教宣传的决
议 (1923 年 7 月 4 日) 2 - 558
- №04743** 舒莫夫关于皮察尔多歪曲俄宗教政策给外交
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 (1923 年 7 月 9 日) 2 - 560
- №04744** 克雷连科关于皮察尔多歪曲俄宗教政策致外交
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 (1923 年 7 月 9 日) 2 - 566
- №04745** 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关于起草“反宗教宣传
通令”的决议 (1923 年 7 月 12 日) 2 - 572

- №05083**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30次会议纪要的摘要
(1923年7月17日) 2-573
- №04746** 莫斯科、明斯克、哈尔科夫的代表和教民给
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
(不晚于1923年7月20日) 2-574
- №04747** 加米涅夫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宣传
通令(草案)致莫洛托夫的便函
(1923年7月20日) 2-583
- №04748**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俄共(布)中央反
宗教委员会)会议记录第31号
(1923年7月21日) 2-584
- №047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反宗教
宣传鼓动问题决议的决定
(1923年7月27日) 2-586
- №04750**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反宗教活动中的
偏激行为的通令函(草稿)
(不晚于1923年7月30日) 2-587
- №04751** 斯米多维奇给斯大林的便函(草稿)
(1923年7月30日) 2-591
- №05084**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34次会议纪要的摘要
(1923年8月5日) 2-592
- №0475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罗斯共产党(布)
中央委员通令函的决议
(1923年8月16日) 2-593
- №04753**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待宗教团体态
度”的通令函(第30号)
(1923年8月16日) 2-594

- №04754**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列别德致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公务便笺
（1923年9月11日） 2-597
- №0475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关于已完成
工作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1923年9月15~25日） 2-598
- №05085** 杜契科夫关于释放吉洪后情况的报告
（1923年9月） 2-610
- №04756**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关于拟定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的请示
（不晚于1923年11月1日） 2-613
- №0475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宗教委员会
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1日） 2-614
- №0475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拟定宗教团体登记
工作细则和关于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决议
（1923年11月10日） 2-615
- №04759**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副主席
波波夫给斯大林的便函
（1923年11月16~22日） 2-616
- №0476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宗教团体登记工作
细则草案”的决议（1923年11月22日） 2-617
- №05060** 沃伊采霍夫斯基关于阿格万·多尔日耶夫在左西诺
奥泽尔喇嘛寺世俗人和喇嘛会议上讲话的报告
（1923年11月27日） 2-618
- №0476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宗教团体
登记工作细则草案”的决议
（1923年11月29日） 2-619

- №04762** 东正教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
（不晚于1924年2月26日）…………… 2-620
- №0476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东正教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的决议
（1924年2月26日）…………… 2-623
- №04764** 沃罗涅日省乌斯曼市共产党员小组给全俄中央执
行委员会的一封信（1924年6月25日）…………… 2-624
- №04765** 杜契科夫关于查封教堂引发冲突的汇报
（1924年7月4日）…………… 2-627
- №04766** 加里宁关于查封教堂致斯大林的信
（1924年7月8日）…………… 2-630
- №05062** 阿格万·多尔日耶夫关于不宜在信仰佛教的居民区
里进行反宗教宣传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
（1924年7月19日）…………… 2-631
- №04767**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任命副主席给加
米涅夫的便函（不晚于1924年10月9日）…………… 2-632
- №04768**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委任俄共（布）中央
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副主席的决议
（1924年10月9日）…………… 2-633
- №04769**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补充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0月17日）…………… 2-634
- №047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补充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0月23日）…………… 2-635
- №0477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格鲁吉亚地方
政府在执行宗教政策中的偏激行为的决议
（1924年10月27日）…………… 2-637

- №05063** 阿格万·多尔日耶夫关于建议重新审议佛教条例
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
(1924年11月19日) 2-638
- №04772**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补充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1月28日) 2-641
- №0477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补充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2月4日) 2-642
- №04774** 供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俄共(布)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组成人员备查表
(不晚于1924年12月4日) 2-644
- №04775** 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契切林关于通过苏联天主
教条例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请示信
(1924年12月6日) 2-646
- №04776** 《苏联天主教条例》(草案)
(不晚于1924年12月9日) 2-648
- №0477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苏联天主教基本条例草案”
(不晚于1924年12月9日) 2-650
- №04778**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反宗教
委员会的信(1924年12月9日) 2-652
- №0477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天主教条例》
(草案)的决议(1924年12月11日) 2-654
- №05096** 都主教谢尔盖致莫斯科宗主教管辖区东正教
大司祭、神甫和教民的信件草稿
(1926年6月10日) 2-655

- №05097** 谢尔盖（斯特拉戈罗茨基）都主教的声明
（1926年7月10日）…………… 2-659
- №05098** 下哥罗德都主教谢尔盖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申请书（1927年5月18日）…………… 2-662
- №05099** 克洛科京致斯特拉戈罗茨基公民的复函
（1927年5月20日）…………… 2-664
- №05100** 谢尔盖都主教致神甫和教民的信
（1927年8月19日）…………… 2-665
- №05104** 费多托夫致都主教叶甫洛基的信
（1927年8月29日）…………… 2-670
- №05105** 麦列日科夫斯基和基皮乌斯致叶甫洛基都
主教的信（1927年8月29日）…………… 2-672
- №05106** 《俄罗斯》署名文章：“东正教的失败和胜利”
（1927年9月3日）…………… 2-673
- №05107** 格鲁鲍科夫斯基关于谢尔盖都主教信件的谈话
（1927年9月3日）…………… 2-676
- №05108** 国外俄罗斯东正教第四次高级僧侣会议记录摘要
（1927年9月5日）…………… 2-678
- №05103** 索洛韦茨基的高级僧侣关于谢尔盖宣言的公开信
（1927年9月27日）…………… 2-681
- №05101** 费奥凡对宗主教及其至圣的东正教最高会议临时
总主教谢尔盖都主教信件所作的解释
（1927年10月22日）…………… 2-684
- №05109** 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15号通令 74/C
（1927年11月17日）…………… 2-686
- №05102** 谢尔盖都主教对彼得格勒教会代表团的答复
（1927年12月14日）…………… 2-687
- №05110** 克洛科京关于宗教管理机关登记问题致远东边区
行政厅函（1928年1月6日）…………… 2-689

【专题说明】

四月危机期间的彼得格勒 工兵代表苏维埃

(1917年4月)

1917年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与临时政府之间既通过3月10日成立的联络委员会协调政策，也因为政治斗争局势的发展和群众情绪的激进而不断发生冲突。3月27日，临时政府在苏维埃的压力下发表告公民书对战争问题表态，宣布放弃战争的帝国主义目的、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工人和士兵进一步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敦促临时政府将此宣言正式提交各盟国。外交部长米留可夫表示拒绝。苏维埃遂以不支持发行战时“自由公债”向临时政府施压。作为妥协方案，临时政府在4月18日（俄历）向盟国发出宣言的同时还发出了一份照会，其中仍然表示俄国将与盟国一起把战争进行到底。次日，俄国外交部出版局将照会文本提供各报刊发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4月20日早晨，卫戍部队士兵读到照会后自发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临时政府的外交政策。群众的抗议浪潮迅速发展，导致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危机。

这里收录了这一期间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苏维埃全体会议的记录。这些文件反映了四月危机发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苏维埃内部的分歧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看法。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马逸若翻译)

№02681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4月19日)

军事部长^①的[报告]。前线的形势是严重的。纪律松懈。开小差的现象仍在继续(仅在两个方面军中就有7000人)。前线的局势不妙。黑海舰队的情况。关于宣传渗透的情况。军队的涣散和工作能力的低下。马克西莫夫将军的评论。赫尔幸福斯^②不可遏制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在对防御的看法方面表现出和平主义的情绪(在战略方面是消极被动的),放弃对军事行动的准备,拒绝调动,拒绝服从。对委员会持不信任态度。鼓吹失败主义就是一种证明,它既来自后方,也来自敌方……有两份传单。也就是要去支援,[以便制造混乱]……,要[夺取]政权。应该造成一种心理上无所顾忌的状态并加以利用——这是古契科夫的意思。

交换意见。执行委员会主席^③指出,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① 时任临时政府军事部长的是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科夫(1862~1936)。古契科夫是十月党领袖,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0年任杜马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出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军事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② 即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③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齐赫泽(1864~1926)。齐赫泽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索议会主席、格鲁吉亚议会主席。1921年流亡国外。

进行 [惩处]，观点如何……^①。处于失败主义印刷品的影响下。阿列克谢耶夫^② 将军指的是和平主义。和平主义通常会造成一种掩盖自卫本能的心理情绪。总的来说，他把这种情绪视为完全的罪恶。

策列铁里^③。指挥人员接受了我们的口号。政府继续向前走，并用这种思想影响指挥人员。委员会的答复。既然赞成对政府的答复，我们就要转向处理例行事务。^④ 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你们能否做些什么呢？我们在全俄会议^⑤ 上做出了自己的答复。由于政府讨论了自己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而这一态度表明了它的 [……]。过半小时之后我们将得到他们的答复，因此必须把讨论进行到我们得到 [答复] 的时候。

关于列宁。策列铁里同志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表述了对列宁的态度问题。[他] 与列宁意见不一致，他认为同威胁作斗争的方式是不能允许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采取的行动都是不能允许的……^⑥

关于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国际] 执行局新的“Vorwärts”邀请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代表参加会议。主席格里姆^⑦ 被邀请前往斯德哥尔摩。加入……所有工人组织成员中社

① 原文如此。

②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57—1918），俄国步兵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西南战线参谋长、西北战线司令、大本营参谋长，1917年3—5月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曾领导白卫志愿军。

③ 伊拉克里·格奥尔基耶维奇·策列铁里（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

④ 这里指的是对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4月18日照会的反应。

⑤ 指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会议。

⑥ 此处仍然是有关对米留可夫照会的态度问题。

⑦ 格里姆·罗伯特（1881—1958），瑞士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代表会议主席、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

会主义的多数派^①。社会主义者应该同他们保持接触，或是同所有为和平而斗争的 [力量] 团结一致，它们是不怕断绝与各自的政府或政府的走狗们的关系的。这是一种联系形式。另一种形式是 [……]。特列尔德在《交易所公报》上说，他已经跟谢德曼见过面了。或者同那些伪装起来的走狗们一起开会，或者同那些社会主义的政党一起开会……。接着，他转向确定的反……部分^②。应该成立一个执行局，它应该只向确定的 [……]。

5月的代表大会是多数派的会议。怎样答复他们的邀请？我们应该同我们的战友们交往。如果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 [代表] 表示只打算会见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成立一个组织局，由5~6~7名代表，再加上那些加入苏维埃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同所有的 [社会主义政党] 进行交往。多数派对大会的态度问题将取决于他们对少数派的态度。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这样的大会有可能向所有人发出呼吁和邀请……。应该向各国政府提出，要求它们准许各代表团前往俄罗斯。派遣一些专门的代表团前往欧洲，并应采取措，使格里姆能够得到放行。有一项声明称：格里姆不会被放行，因为他同 [……] 有联系。要是我们不为自己争得抗议的权利……。所有声明的出发点应该是 [……]。

唐恩^③。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原因还在于我们自己的队伍里 [也有] 护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以苏维埃为代表，战争，俄国的革命。什么样的立场呢？他们是否认为有可能像我们的革命已经做到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③ 费多尔·伊里奇·唐恩（又姓古尔维奇，1871~1947），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

的那样，改变自己的立场呢？我们不用设法使政府彻底觉醒，我们只要召开一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就行了。有一条原则，这就是要吸引所有的〔党派〕。要采取措施，使孟什维克中也有代表参加。要使所有那些由于前线的运动而成长起来的……。应该由执行委员会自己来首先发起。让党的代表们来参加只会把事情拖延下去。主动精神〔应该来自〕工人苏维埃。而且整个过程要在……立场上^①。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保证提供通过的正式条件。会议应在中立国家召开。

关于5月2日的代表会议。他是否只给一些正式的政党发出了邀请？少数派会去吗？如果弄清楚，这将仅仅是多数派的代表会议……。恢复国际的两种办法。一个办法，往旧国际打入一个楔子，随后在其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第二个办法是，如果从分析各种客观条件出发，那么旧国际崩溃的原因在于客观的……。它将重新恢复生机。信是经过M转寄的……。

关于出席会议的有发言权的执行局成员的权利问题。为数不多的多数派接受了与苏维埃的立场吻合的行动纲领。代表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不会开成。没有任何全权代表会去那里。

会议的各项任务。重建国际。尽快实现和平是一种手段。到那时，苏维埃的倡议甚至参与都将毫无意义。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它将导致广泛的国际性，〔其目的〕是结束战争。是否可能……。直到如今我们并不认为劳动团分子〔在政治方面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政党。既然有这样的目的，我们……。这两个目的并不互相排斥。重建工人国际，这是目的之一。召开另一次会议以使人民早日得到和平。应该召集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们都

^① 原文如此。

来参加这次会议。要中止……^①。要明确自己对那份从临时政府那里得到的文件的态度。

策列铁里。文件能否满足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里提出的那些要求呢？文件是否是在放弃割地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呢？据说，〔3月〕27日的文件是不可能生效的，因为该文件并没有向盟国提出。现在提出是合乎参战的美国想法的。俄罗斯同意美国的立场，它同意的不是联盟的立场，而是……。

拉林^②。强烈否定〔苏维埃的〕呼吁。全俄会议认为，我国政府必须对各盟国施加压力。作为答复，我们收到了〔决议〕。会议的决议得到了支持。

2.^③。这一照会宣称，政府的意志是要把战争一直进行到胜利为止，而不是……。这一照会在〔内阁〕所有其他代表的发言中得到了完全赞同……（打败奥地利和康斯坦丁诺波利^④）。1. 政府没有实现要求。2. 政府通过了一个纲领——将战争进行到胜利。应该共同发表一个有关对外政策的告全俄罗斯人民书。一方面，古契科夫了解战斗力的状况，另一方面，他要〔把战争进行到〕彻底战胜敌人为止。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人们是在有意识地走向军事毁灭……。

加米涅夫。发给美国。政府是如此迅速地在推动事态的发展……，我们也建议你们要求对此进行公开的正式的谴责。我们将逐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文件中甚至没有隐约的暗示……〔走上了继

① 原文如此。

② Ю. 拉林，原名米哈伊尔·扎尔曼诺维奇·卢里叶（1882～1932），190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8年加入取消派，1914年成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③ 在此处的编号2之前没有编号1。

④ 即伊斯坦布尔。

续……的道路]①。英国政府称，俄国政府完全不是对世界的威胁，而此种威胁……。无产阶级和军队将做出何种反映。临时政府走上了那条我们不能允许它走的道路。② 根据多数派的行为举止来看，可以认为，他们有理由抱有某种希望。要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的话……。……利用革命的意志争取和平。这种意志将会被利用。

关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应该做出何种反映呢？同意发行公债的大多数人，现在不可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关于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决议是以对政府的信任为前提的。我们应该声明，政府还没有收回使其失去了我们的信任的声明，我们拒绝在胜利之后实行兼并。代表团没有要求提交这份文件。非常有必要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在这些国家内部没有一场运动的情况下对自己的代表施加压力。如果我们不能在那些国家激起反对其政府的运动的话，那末已经提出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不够的。我国的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工具而已。这不是后退一步。在国际关系〔政策方面〕它不是向后退，而是向前进。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和平〔问题上〕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成了英、法政府的俘虏。或是我们给政府以支持，或是我们因此而抛弃它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在法国，也无论是在英国，我们都没有为自己打下基础。这方面的活动，我们开展得很差。我们在组织向政府施加自己的压力方面做得不够。

这样的决定不是由我国〔政府〕颁布的。政府甚至不打算废除这些秘密的条约。我们为什么而战？这个决定并不是出乎意外

① 原文如此。

② 加米涅夫在这里实际上间接地提出了苏维埃应该制止临时政府、自己掌握政权的问题。

的。是否会减弱进行……的时刻^①，但在什么意义上——是在与旧的（帝国主义者）政府进行比较的新的基础上。发给美国（但威尔逊现在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样的负责的活动家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这件事的呢？做这件事是在……情况下^②。（我们关于公债的声明）。占契科夫的呼吁和声明之间的明确关系。这一步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俄罗斯相当大的一部人不知道4月18日的情况。临时政府没有通报27日的决议。今天就应通过联络委员会〔要求〕米留可夫立即辞职。在沙皇制度和我国的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点，这就是对外政策。在执行委员会通过自己关于战争的决议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就已经是致命的，而且组织策略正导致分裂^③。和平游行正推动召开立宪会议，推动召开国际会议。明天下午四点钟应该在“海军大楼”开会，在六点钟。建议推迟。

II. 鲍里索夫。革命的民主派与反革命的反常联盟。我们应该召开全俄代表大会。关于普拉廷。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与民主派断绝关系。以往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无论面临什么都是不会停步不前的。少数派会承担罪责吗？请回忆一下，多数派的各项决议是怎样通过的。我们并不拒绝与你们共同合作。应该坚决地回击政府。政府使我们面临既成事实，尽管我们容忍了这些事实，可是仍然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忽然间政府会一走了之。支持政府的是资产阶级的势力——国际资产阶级的势力。国际革命渴望联合资产阶级的所有力量。在米留可夫去职的情况下，政府是不会退出的，因为它还可以在这个资产阶级的身上得到充分的支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持。

1) 要求撤换米留可夫、古契科夫、伊兹沃尔斯基^①。2) 应该做……^② [尽可能] 果断,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宣传鼓动。文件并不是对外政策方面的, 而是 [国内] 政策方面的。否则就不能把它视为挑衅。在外交压力下, 他们将对自己过去的决定做出解释。结论和力量的对比关系。在革命具有这种性质的情况下, 他们决意向我们挑衅。工人代表苏维埃保留号召……的权利。文件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郭茨^③ 看到了矛盾 (拒绝侵占和割地), 但另一方面则要将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有两条出路: 一条是对政府施加压力, 另一条是进行斗争。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 [意义]。政治 [含义] 大家都考虑到了。惟一要做的就是弄清楚现在的情况。首先应该说的是, 希望……无论如何要跳出……。……帝国主义的^④。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年代, 任何别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发生了上层的变更, 但战争依旧……^⑤ 是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我们应该对民主国家说: 我们不会承担对外政策方面的任何责任。你们是革命的民主国家, [因此] 你们不能强迫米留可夫说那些不是他该说的话。至今为止你们还不能迫使自己的政府说……, 你们无权提出……^⑥。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民主派呼吁。我们应该让人民在难以避

①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伊兹沃尔斯基 (1856~1919), 俄国外交官, 1906~1910年任俄国外交大臣, 1910~1917年5月是俄国驻法国大使。

② 原件此处文字无法辨认。

③ 阿布拉姆·拉法伊洛维奇·郭茨 (1882~1940), 社会革命党人, 1906年开始是其“战斗组织”成员, 1907~1917年间服苦役和被流放, 1917年在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与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 反对苏维埃政权。1922年被判刑, 释放后从事经济工作。

④ 原件这两句中一些字迹无法辨认。

⑤ 原件此处字迹无法辨认。

⑥ 原件此处一个词无法辨认。

免的情况下在两个政权之间做出选择。我要求你们说出……。面对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理应……。我们以自己摇摆不定的政策〔誓言等等〕对政府表示赞同。在……时^①要使米留可夫确信，你们也在争取统一，在争取人民的〔胜利〕，何况人民理应取得胜利。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并且明确无疑的政策，以便使人民有所准备。你们正在准备将政权转到自己的手中。

斯科别列夫^②。既不是陷于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气氛之中，也不是处于对革命的亢奋热情之中。有这样一个决定，为了它甚至制定了一整套策略。试图在这方面跨出一步，而我们是推动这一步的。俄国革命的悲剧因素在这……^③。如果说我曾经确信在这个文件中存在着反映了政府或俄国资产阶级的无能的全部悲剧因素，那么悲剧因素实际要多得多——这是俄国革命和世界局势中的悲剧。“不幸的人们”所考虑的是，他们要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你们把抨击政策与俄国的政策对立起来。不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伟大，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伟大。问题在于世界的资产阶级而不在于俄国的资产阶级。让我们在国际资产阶级的火力之下来制定我们的策略吧。应该使人民对掌握政权有所准备。我们不愿意现在去借债。我们想等一等。现在我们应该表示……。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决心……。

切尔诺夫^④。你们不知道《应该研究些什么……》这篇报道。

① 原文如此。

②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克别列夫（1885～1939），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孟什维克。1906年侨居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5～8月间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十月革命后脱离孟什维克，在经济部门中工作。

③ 原文如此。

④ 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1873～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十月革命后曾组织反苏维埃活动，1920年移居国外。

俄国革命面临的抉择。我们是主人，但是有……那种作用^①。我们不会去保卫罗曼诺夫王朝，但是公民……^②。我们应该避免的是：我们被迫保卫……^③。……^④。3月27日米留可夫的失败。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人能够做些什么？应该怎样看这件事。从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角度看，这是挑衅。从另一部分人的角度看，这是错误。为什么这是挑衅，又为什么它对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人有利呢？我们看到，有组织的劳动大军的力量现在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彼得格勒和外省之间原先的不相称性正在逐渐消除。农民阶级的发展，是对这类力量的补充……^⑤。对这种非常极端的口号趋之若鹜^⑥。他们在立宪会议中〔面对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面临的是什么呢？他们注定要承担怎样的……作用。在对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成了一个幌子，在这个幌子之下进行着无产阶级强大而有组织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虚幻的政权有利……。〔政府中的立宪民主党人〕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他们在想，他们是否应该离开，而在以后形势停止动荡的时候再回来。这是什么样的形势……。政权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但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政权，而我们直到现在仍然认为，由我们来组织政权是不合适的。我们的立场每天都在得到加强。什么时候我们会走向全部政权，这一时机的选择也许不取决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平静的。我们的策略是听其自然。我们无疑知道，我们在为取得政权而斗争，但是不应强行加快。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文如此。

④ 原件此处一些词无法辨认。

⑤ 句子没有结束。

⑥ 原文如此。

当〔彼得格勒和各省〕革命发展的程度之间不再存在重大差别的时候，这一时刻就将到来。我们应该确认，是我们迫使政府提出〔各种主张〕……，表明我们绝没有张皇失措。当我们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我们将与政权斗争。建议临时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拒绝割地的总的问题并进行讨论，但不是〔神经过敏地〕。临时政府这种挑战的力量从何而来。各民主组织或临时政府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至于说到推翻，那随时都可以，但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吗？显然，临时政府依靠某些力量。临时政府正在实现某种意志，而这种意志表明了是谁在调遣他们。临时^①。我们减弱了对政府的打击。我们曾相互争吵。派遣代表团。组织示威游行。对政府进行〔监督〕。什么才是对临时政府的答复呢？临时政府压下了英国做出的所有声明。至今为止兴登堡未能组织进攻……政治抵抗^②。你们知道前线的一些传闻。俄国的革命〔重复了我们的角色〕。结果，兴登堡未能实现自己的意志……。但现在人民的心灵将又一次掌握在容克贵族手中。现在兴登堡正在调动自己的部队向我们推进。这将是这场斗争的初步成果。在作其他考虑时不应忘记……。照会是走向单独媾和的途径，这种单独媾和将窒息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心灵。第二个看法是，如果我们容忍这种瓦解，这将打击……^③。

这里谈的是必须对英国和法国施加压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撇开古契科夫，那就会真的构成^④。多数派没有对……施加压力。将开始一场全民战争，对盟国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要求排除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为了履行自己的宣言，这是人民不允许的。现在推翻政府是否可能？或是继续保留？不能只谈俄国的条件，应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③ 句子没有结束。

④ 原文如此。

该放在国际范围内来考虑。

我们应该派遣一个真正的代表团，作为……^①，但只是在我们指定了自己的代表团之后。害怕〔转到〕劳动团分子手中，对我们来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正处于日益发展的革命的浪峰之上。革命的爱国主义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不回应米留可夫的挑战。革命已经形成如此的规模，以致已经不能停步不前了。在资产阶级范围里有许多人与世界资本主义没有联系。以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人来接替是可行的，不会有困难。“打倒米留可夫”这一口号能够把所有力量都团结起来。应该把俄国的革命和英法的革命结合起来。要是在一个月前，这个口号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通过有组织地影响资产阶级的办法，我们将取得和平。不要任何影响，只要推翻，此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积极的行动。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自己的〔3月〕27日声明，并没有要求盟国同样“进行到胜利为止”。它是试图侵占的，如果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话，它会达到这一目的。把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并不意味着侵占。俄国政府软弱的结果是，它不可能提出最后通牒。我们建立了秘密外交途径进行联络。不是我们对政府施加压力，而是相反。时机已经到了。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够夺取政权，人民会跟我们走。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夺取政权？

科兹洛夫斯基^②。只有革命的民主主义才是这一革命的动力。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存在的只是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我国的政府也完全是反革命的。任何革命的命运都是这样：

① 句子没有结束。

② 梅契斯拉夫·尤利耶维奇·科兹洛夫斯基（1876～1927），波兰和俄国革命家，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曾任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维堡区杜马主席。

[无论何时] 一个阶级单枪匹马是无法完成革命的。所有人都分属各个阶级。在炽烈和高潮的时候，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的，但只能持续一会儿，往后又怎样呢？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我看来，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应该对自己说——坚决地说——我国的政府是反革命的。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政府在看我们怎样走妥协的道路。这正是多数派长久期待攻进的一个球。当前局势要求有直接的行动。单就自己的立场发表声明是不够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进行战斗。应该一个一个团、一个一个工厂地去开展争取不割地的和平的运动。把政权让给 [民主] 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02682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4月20日)

齐赫泽同志通报关于〔临时政府〕面临辞职这一新的事实。最好能与临时政府见见面。各组选出一名代表以便〔与政府〕交换〔意见〕。考虑到全体会议在此之前召开，〔建议会议〕延期。

维尔博。认为这是件危险的事，因此建议召开全体会议。

索科洛夫。政府^①。

祖拉波夫和斯卡洛夫。反对。

(发言者的名字没有写明)。对政府的态度问题要确定下来。

大多数人反对，6人决定前往政府。

建议预先讨论自己〔对政府〕的态度问题。我们在持否定态度这一点上应该意见一致。不存在任何与执行委员会有关的预付款问题(关于辞职问题)，不存在任何支持临时政府的义务问题。中心的〔一点〕是对〔政府辞职〕可能性的态度问题。尽管你们离开了，但我们并不害怕这个政权，我们希望在政权之外找到足够的民主派的和无产阶级的力量。

波格丹诺夫。不只是光明〔正大地〕去参加会议。由于在政权问题上的冲突，我们对它能有什么要求呢？由于^②。关于支持的条件，如果这种支持是可能的话。问题不在于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今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天我们面临的是离开临时政府一边这个事实。请召集苏维埃^①。[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我们将召集[苏维埃]。由于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的冲突，辞职可以看做是向舆论的呼吁。要求用另一个照会来替代那个照会。建议更换所有的代表并任命政委。未经[苏维埃同意]任何决定不得[公布]。与政府一起开的会议可作为情况通报会。现在这种情报是如此重要，它应向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提供。既然这种通报为我们提出了……^②。

斯坦凯维奇。我们要彻底地取消政权是不可能的。部分地更换一些部长，这才是出路。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它应归结到一点，即在日前局势下，民主派不能拒绝政权。毫无疑问，政府会将种种不能接受的要求强加给民主派。通报应该是相互的。关于政权的问题不应由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要加快。我们应该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一个界限[在那样的意义上]，那就是既然问题涉及的是政权，那么我们的会议只应该纯粹是通报性的。部长会议下属的政治委员会以及清理各部。这不是联络委员会。应该往那个方向走。我们对照会的态度以及各项要求。

关于6名[代表团成员]的建议。从执行委员会各派别中推选一人或两人，授权其完全自由地[向政府]通报情况，并且声明，交换的所有意见并不反映共同的意愿，共同的意愿将由我们随后通报。进行投票表决。弄清这些派别。联络委员会(10人)。

拉林。1. 齐赫泽，2. 斯科别列夫，3. 策列铁里，4. 切尔诺夫，5. 斯坦凯维奇；1. 苏汉诺夫，2. 文格洛夫，3. 克拉西科夫或祖拉博夫，4. 加米涅夫，5. 贝尔。

就问题进行辩论，是否应该召开会议。应就历史的部分作说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明，尽快，立即。

在弄清情况后，我们将召开全体会议。

波格丹诺夫的建议——今天应召开会议，弄清问题的实质并确定会议的如下性质，即执行委员会〔开始〕与苏维埃进行真正的联系。今天应通过决议。派5个人。波格丹诺夫。各党团应确定准备发言的同志。

贝尔的建议。是否有另一个策列铁甲？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联络委员会。

齐赫泽发言。今天实质上不能做出任何决定。他认为，可以立即开展辩论。主席发言后，由各党团132名代表发言。主席做报告。就报告进行讨论。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令人不安的传闻，与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发生分裂的消息有关。粮食问题上的困难。请罗扎诺夫随时告知莫斯科的情况。通过了一项建议：指定由一些同志组成一个不大的小组，以便保持联系。利别尔、埃尔利赫、斯卡洛夫、加米涅夫、马图兹科夫。

№02683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记录

(1917年4月20日)

齐赫泽同志的声明。关于公债问题，已由上一次苏维埃全体会议决定，在弄清楚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措施之前，从议事日程中取消。昨天我们收到了一份照会，它被提交执行委员会讨论，但是执行委员会没有通过最后决定，只是决定推迟到今天，连同准备好的决议提交全体会议。

执行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政府完全拒绝承担其在3月27日声明中所表达的义务。另一部分人则从中看到了肯定的一面，他们所看到的是，4月18日照会向盟国呼吁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把所讨论的问题引向了国际舞台。但是在〔评价〕提出经过掩饰的许诺的危险性方面是没有分歧的，这些关于争取对敌人的决定性胜利的许诺是与拒绝割地的声明背道而驰的^①。原则上决定由执行委员会向法国和英国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发出呼吁，请求他们迫使自己的政府就割地问题明确表示意见。今天我们准备要结束讨论，但是就在今天我们获悉，政府打算躲开。鉴于特别严重的形

^① 这里指的是米留可夫照会中的以下内容：“充满了被解放的民主主义新精神的临时政府声明，显然不会给那种认为已经完成的转折将导致削弱俄国在与协约国共同斗争中的作用的想提供哪怕是最小的依据。正好相反，全体人民要求把世界战争进行到取得决定性胜利为止的渴望只会继续加强，因为他们意识到所有人和每个人的共同责任。”（《临时政府通报》，1917年4月20日，第35期，81页；《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四月危机·文件和材料》莫斯科，1958，第725~726页。）

势，我们认为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今天必须〔与临时政府〕举行会晤，以便全面了解情况。我们的意愿已经通知了政府，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在各组织的代表发表声明之后，执行委员会决定推迟讨论，并决定于明天最终解决这一问题^①。

斯坦凯维奇同志代表劳动团指出，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统一遭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个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上，即有关割地的问题上，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割地问题是和国防利益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照会中可以看出老帝国主义的遗迹。我们不能允许政府……^②。从目前已形成的局势中究竟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可能有一个极其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推翻政府，或是甚至逮捕政府。但是在我们的决议中有一些更为恰当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在我们弄清政府的凶恶面目之后，将向你们提出信任问题，并要求政府辞职。但这个问题是严肃的，极其重要的。我们将面临是否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请不要只是感情用事。也可能提出联合内阁的问题。也许，这

① 4月20日上午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其成员回到各自的区，安定群众情绪。当时已有关于群众已开始自发地举行反对临时政府照会示威游行的消息，其倡议人是近卫芬兰团后备营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Ф.林德。他在20日上午带着一份登有米留可夫照会的报纸回到团里，说服团委员会做出举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决定。为联络力量，向第180后备步兵团和第2波罗的海海军支队派出了宣传员。很快，由士兵和水兵组成的纵队打着“打倒米留可夫！”、“米留可夫辞职！”的标语，经过尼古拉耶夫斯基桥前往临时政府所在地玛利亚宫。沿途有一些近卫凯克斯戈尔斯基团后备营的士兵和近卫海军支队的水兵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约3万人聚集在玛利亚宫前面，举行抗议集会。抗议者情绪激昂，有人号召冲进宫去、逮捕临时政府成员。但在得知临时政府部长都不在这里之后，人们的劲头有所低落。经过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几个小时的劝说，士兵和水兵逐渐散去。随后，立宪民主党中央打算组织支持临时政府的游行。布尔什维克也在工厂呼吁工人采取行动。傍晚，工人游行队伍出现在市中心主要街道上，他们的口号是“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打倒临时政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当天晚上召开了会议。

② 原文如此。

种必要性已经成熟的时刻到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你们。但与此同时，我们呼吁你们不要仓促做出决定。只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在与政府会晤后的报告才会给你们提供讨论这一问题的足够的判断依据。

费多罗夫同志代表布尔什维克指出，战争问题把整个社会主义思想分成两个阵营，即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美尔瓦尔德派。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对外政策不可能不是掠夺性的、沉重打击民主派的政策。由于目前力量对比有利于民主派，这一政策在民主派的压力下已陷于瘫痪。民主派的立场——它在苏维埃的政策中已经表明——就是完全排除任何掠夺、割地等等的革命护国主义。我们正在推动政府走上这条道路。我们以履行这一义务作为支持政府的条件，作为它存在的条件。现在临时政府的草率决定完全背离了民主派。另一个社会主义派别的观点是：从来不指望、从来不相信资产阶级政府会放弃自己本质的东西而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国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决定中看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明。

切尔诺夫代表社会革命党指出了时局的严重性以及这一时局对安定——绝对的、无条件的安定——负有的责任。必须坚定果断，但也要小心谨慎。现在问题要比在二月的那些日子复杂，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胜利者之间的斗争。我们应该意识到迎面而来的种种困难。不要做出任何仓促的决定。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国内政策方面抛弃了沙皇制度的遗产，他们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将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让全俄国都知道：劳动俄国拒绝兼并，必须让俄国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重新审查有关战争目的的问题。苏维埃没有把全部政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它知道，它的力量每天都在壮大，并且在准备着那个时刻的到来：那时将不仅仅是毫

无困难地得到政权……^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已经显示出，通过农民代表把农村组织起来是一项极其巨大工作。那是个巨大的工作。你们表现出了耐心，但正是有耐心的人将创造出新生活。因此，在你们耐心地、然而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路线的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所有动摇犹豫并不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执行委员会和它所联合的组织经常说：首先要非常沉着，当要求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候，你们都应在自己的位置上。政府面临选择：或是屈服并收回 [照会]，或是辞职。如果出现政府辞职、[我们] 必须建立新政府的情况，那么我们对此将是有准备的。我们应该考虑形成一个统一的革命意志。明天你们将会听到，临时政府准备做什么，它会提出什么建议。你们将会得到具体的素材。执行委员会 [坚持] 这个决定，请你们在听它说了之后再表示 [自己同意]。

勃罗伊多^② 同志。如果战争问题引起了意见分歧，那么在执行委员会内部对待战争的态度是充分一致的，即竭力以民主派的力量来制止战争。政府的照会表明，它不仅完全不了解民主派的这种情绪，而且对真实的情况也一无所知。政府那份关于将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的声明，不仅撕毁了自己的 3 月 27 日声明，同时也证明自己完全无视民主的利益——这些利益在盟国凡尔赛会议上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表达。我们应该以最坚决的方式抗议这种对整个民主派的挑衅，并把我们的抗议引向国外。我们应该设法使我们的抗议尽快地传达到我们在国外的同志那里，他们是赞成我们的观点的。你们要警惕那种在目前就去夺权的诱惑。在这样严酷的时刻，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事情不仅在于难以应付一系列复杂

^① 原文如此。切尔诺夫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苏维埃不仅要夺取政权（这在 4 月 20 日是可能的），还要保住政权，而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② 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勃罗伊多（1885—1956），曾是孟什维克，1918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的问题——它们因为战争而更加复杂化了，而且还存在着民主派队伍可能分裂的危险性。发言人没有涉及内阁的问题，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党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他正是这个党团的代表人物。

无政府主义者的发言者指出：存在着“吉伦特党人”和“雅各宾党人”。我们就是雅各宾党人少数派。

曼杰利巴乌姆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宣称：如果为了解放波兰还须要流血——哪怕是一滴血，那么我们就不要这种自由。波兰的解放只有依靠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努力。

阿宁。政府昨天的声明表明它屈从于帝国主义，同时迫使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接受提出最后通牒的要求。执行委员会在弄清情况之前不应允许撤出补充的连队。应该成立一个隶属于外交部的政治中心。执行委员会应发起召集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应能奠定稳定和平的基础。执行委员会应该宣布：这个决定如果不取消，它就应该被看做是反革命性质的。

另一位发言者^①批评了执行委员会在其对待政府态度问题上的立场。他认为，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把政权转交给临时政府还有一些可以辩解的理由的话，那么现在，当民主派在苏维埃中已经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便是错误的了。白天提出的口号是——政权归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实现这一口号的话，那么我们会丧失时机。

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党团代表。我们的革命发展成为国际的革命，这种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照会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说出的决定，国际无产阶级必将对这一照会给予答复。现在问题就是如此。我们看到，政府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已被破坏。我

^① 这里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加米涅夫。

很难说，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种处境。但有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只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有组织的人民的意志才能引导我们摆脱这种处境。

执行委员会委员沃伊京斯基^①。革命护国主义的大多数拥护者谈到了苏维埃移交政权的那些原则。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我们并不是十分坚强有力的。今天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执行权应该服从于人民的权力。危险的是内阁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破坏了国防事业。必须让每一个俄国士兵都知道，他流血只是为了争取自由，而不是为了夺取康斯坦丁诺波利。而米留可夫的照会正在妨碍这种觉悟。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之所以谴责这份照会，是因为它妨碍我们实现对和平的向往。不容许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请你们珍惜这种统一。有人说我们因这份照会而对苏维埃的错误策略负有责任。不要相信那些人。^② 这一策略始终在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社会革命党的士兵委员会主席^③也表示反对夺取政权。

齐赫泽同志宣读他所收到的关于终止辩论的声明。

辩论终止。

① 弗拉基米尔·萨维利耶维奇·沃伊京斯基（1885～1960），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对彼得格勒的进攻，被苏维埃政权逮捕，获释后去格鲁吉亚，后来移居国外。

② 这里，沃伊京斯基显然是在批评布尔什维克。

③ 当时社会革命党的士兵委员会主席是B.H.卡普兰。

№02684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4月21日)

会议记录

布尔什维克组织。拉林同志。电话通知^①。各区委员会会议，有权代表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执行局也参加。建议用电报召来所有部队的代表并和他们共同做出决定，那就是没有〔执行委员会的〕直接决定，〔他们都不能上街〕^②。

克拉西科夫同志反对会议由执行局的代表参加，因为……^③。克拉西科夫同志要求把唐恩所作的歪曲性表述写入记录。组织问题是和执行局的组成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拉林提议，苏维埃方面由持反对派立场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各出一名代表，多数派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各出一名代表。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关于改选执行局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委托埃尔利赫、斯捷克洛夫和斯大林起草电话通知……^④ 从昨天会议得出的印象是极其

① 这一页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如下文字：“召开了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紧急会议，苏维埃主席齐赫泽同志发表讲话，他指出……”

② 4月20夜里到次日凌晨，在玛利亚宫周围举行了资产阶级组织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游行，而与此同时在玛利亚宫里，临时政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议。苏维埃代表多次要求取消照会，但均因临时政府成员以辞职相威胁而未能成功。凌晨4点决定散会，并由临时政府在21日白天对照会做出解释。

③ 原件此处文字无法辨认。

④ 原件没有标明发言者的名字。

压抑的，无论是就形式主义的 [观点]，还是就提供的情况的实质而言，都是这样。但这种情况被很多发言提出建议的同志所打破。就实质而言，民主派的时机和任务的图景已经展现，而临时政府对此并不理解——他们已经明白不可能再继续进行战争，但是仍在奉行犯罪的政策。应该拒绝给予他们任何信任。不可能有任何出路，因此责任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应该向人民和政府发出呼吁。

关于支持政府的军队和支持苏维埃的游行示威者之间的流血冲突的紧急声明。

现在应该立即发排苏维埃告人民书。苏维埃的士兵执行委员会应该把自己的人派往各处，以便让所有的部队都回到自己的营房去，并希望如果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和决议，无论哪一个部队都不能离开军营。^① 应该强调指出，示威游行必须是和平的。

派遣两个小组作为代表，每组各三个同志。执行委员会向涅夫斯基派去下列人员：斯捷克洛夫、齐赫泽、维尔博、卡列加耶夫、斯科别列夫、文格洛夫、斯捷克洛夫^②。授权他们尽可能多到一些 [地方]。根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少数派应该服从于多数派。应该发表由两部分组成的号召书：一是政治文献性质的，二是指示和措施的提纲。

[切列瓦宁] 宣布，示威游行已经散开。

① 在此之前，执行委员会已于4月20日晚上发出专门电报，禁止士兵在21日白天离开军营，除非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直接指示。因此，卫戍部队的士兵大多数没有参加21日的事件。另一方面，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这一天在市中心区继续举行了工人的示威游行。工人游行队伍与支持临时政府的游行示威者发生了冲突。这里的发言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

② 此处有重复。原文如此。

关于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动〔部队到宫廷广场去〕一事^①的声明。没有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不能提供任何部队。游行示威不能携带武器，无论是士兵还是工人都是这样。部队必须留在兵营里，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不准外出，外出必须〕凭执行委员会的书面命令，并由主席签字以及^②。除齐赫泽和斯科别列夫之外^③。

授权齐赫泽与科尔尼洛夫将军进行联络。成立一个约由七位同志组成的司令部，赋予他们签署有关部队离开兵营的命令的权力。部队的调动，除了作战部队必须在执行委员会的下列成员签署命令的情况下才能被调离兵营外，还应该不……^④。把齐赫泽、斯科别列夫、斯坦凯维奇的签名真迹发送到各部队。

1. 波格丹诺夫 (34)，2. 菲利波夫斯基 (32)，3. 斯卡洛夫^⑤ (27) …… (16)，4. 利别尔 (36) (戈利德曼)，5. 比纳西克 (26)。文件中应列出电话号码，分送到彼得格勒〔以及各郊区〕。授权齐赫泽同志向科尔尼洛夫将军声明，要他立即撤回部队，否则^⑥。授权〔齐赫泽〕转告科尔尼洛夫将军，不管〔事态的〕结果如何，都应到被召集的士兵那里去，把他们召回兵营。1. 波格丹诺夫、斯科别列夫，2. 菲利波夫斯基。

策列铁里。临时政府明天将公布的说明^⑦。应对这一说明进行

① 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命令米哈伊洛夫炮兵学校校长将一个炮兵教导连调往宫廷广场保卫军区司令部，炮兵学校校长向学校士兵委员会请求批准，而士兵委员会将此事通知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派出代表团到军区司令部，迫使科尔尼洛夫通过电话取消了这一命令。

② 原文如此。

③ 原件此处句子不完整。

④ 原文如此。

⑤ 下面删去“斯捷克洛夫”。

⑥ 原文如此。句子不完整。

⑦ 指的是临时政府对4月18日照会的说明。该说明认为，照会中的文字只应从3月27日声明的意义上理解。

讨论。把它交给司令部。委托加米涅夫、沃伊京斯基、斯坦克维奇和斯捷克洛夫等同志起草〔呼吁书〕。

发往奥拉宁鲍姆^①和喀琅施塔得等地的电文以及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文稿已通过。提供给斯捷克洛夫和斯大林的委员会。通过第三份电报文稿。

决定着手讨论策列铁里同志的声明。

祖拉博夫。文件没有解决政府和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在今天的文件中他们证明了3月27日会议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拒绝侵占的政策，但没有回答怎样走出破坏状态的问题。现在冲突已经转到了是结束战争还是继续战争的问题上，而不管是否已给自己提出将〔战争〕进行到胜利为止的口号。

拉林。政府的回答是：出路在于制止革命。

尤列涅夫指出，不应脱离总的问题而只是局限于讨论政府的照会^②。应推出两位发言人。

策列铁里同志证明，政府现在的声明完全拒绝承认4月18日的照会。站在全俄会议的立场上，甚至……^③。

斯捷克洛夫。〔问题〕没有在国际范围内提出来。它是需要的，以便使政府宣布准备采取某些措施，以便在国际范围内提出关于割地问题。不能对发行公债投赞成票。

阿夫克森齐耶夫。现在政府抓住自己的照会……下一个建议。

一些同志建议承认有关18日照会的问题已经结束。34票。反

① 俄罗斯城市罗蒙诺索夫旧称。

② “照会”一词上面写着“新的声明”。

③ 这句话没有结束。

对的19票。^①不应把此事与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态度分隔开来，同时不能不向社会提出关于组织的总的问题。承认政府的说明，以使政府发出照会——这是最必要的，苏维埃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在国际范围内提出有关拒绝的问题。在示威游行的压力下，政府站到了3月27日的立场上。4月18日的照会表明，必须有一些条件。在政府的声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证明。另一方面，我们确认，要使政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苏维埃和代表们的同意，政府的任何重大决定都不可能被采纳。今天不提出公债问题。

喀琅施塔得的声明。考虑到执行委员会的动摇不定，要让它负起责任。执行委员会应就追捕布尔什维克一事向居民发出呼吁。

① 在这一行上面写着：“由于政府的新声明而发生的事情”。这一投票结果表明，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与临时政府妥协的立场占了上风，关于临时政府照会一事就这样不再是问题了。随后，在4月21日晚间的会议上，苏维埃多数代表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四月政治危机中最主要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策列铁里在4月22日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事件是以我们的胜利、民主派的胜利而告结束的。我们或者是须要由这一胜利而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并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保持原来的立场，或者是推迟这一问题的解决并陷于不稳定状态。无政府主义嚣张的局面是极有害的，它将危及革命。如果我们今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明天就不得不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既然我们已经声明，政府昨天采取的步骤在目前情况下满足了我们的要求，那么关于战时公债问题也应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这将立即使动荡的局势稳定下来。”

【专题说明】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 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1917年4月至6月)

1917年3月31日，普列汉诺夫在侨居国外37年之后回到了革命的俄国。在彼得格勒芬兰车站，他受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人齐赫泽、策列铁里、斯科别列夫等人的欢迎。他在答词中说：“我是幸福的，因为我回到了俄国。我将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争取革命胜利的工作。我希望还能做点工作，还能再活几年，我愿为革命的胜利而死。”通常认为，普列汉诺夫回国后脱离了社会政治活动，但实际上他在国内沸腾的生活面前没有袖手旁观。当时，俄国铁路运输遭受到比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更为严重的破坏，时任交通部长的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承认，铁路职工的物质生活状况“已经使他们不可能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为此召集了旨在制定改善铁路职工生活的措施的特别会议。4月初该特别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一致决定，邀请普列汉诺夫担任主席。普列汉诺夫接受了邀请，因为他认为在铁路这样的生产部门中的劳动问题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特别会议很快改名为委员会，一直活动到当年6月2日。普列汉诺夫的活动增强了该委员会的权威性，也使普列汉诺夫在多年侨居国外之后重新

在劳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本专题收入的材料反映了普列汉诺夫参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工作的情况，其中包括特别会议邀请普列汉诺夫任主席的决定、铁路职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和他的批示、来自铁路单位的报告、普列汉诺夫主持的委员会会议记录等。这些材料为研究普列汉诺夫回国后的活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有助于认识当时的俄国社会状况。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孟韵怡翻译)

№07597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特别会议

关于组织工作会议的通报^①

(1917年4月9日)

彼得格勒

发文号第3号

今天，在交通部部长^②主持下召开了交通部组织的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特别会议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参加特别会议成员的有5名指定的成员和5名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铁路委员会的成员。

部长在宣布会议开幕后，便要求会议立即对改善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的问题进行研究，从最贫困的职工开始，要把制定出来的措施很快付诸实施。首先，部长认为必须研究并马上确定一个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最低工资水平。最后，部长建议会议选出自己的主席以便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根据社会代表的要求，会议一致决定请普列汉诺夫承担主席的职责，并请工兵代表苏维埃铁路委员会的几位委员今天就去格奥尔

① 在这一文件的反面有如下文字：“根据部长的命令，请立即将此情况通知地方报纸，并在铁路职员和工人中间传播相应的电报。”

② H. B. 涅克拉索夫 (1879—1940)，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曾是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6月加入激进民主党。1917年3月至6月任临时政府交通部长，6月出任临时政府副总理、财政部长，9月被任命为芬兰总督。苏维埃政权时代曾在合作社机关中工作。后来遭到镇压，1990年恢复名誉。

基·瓦连季诺维奇·普列汉诺夫的住地，请他担当这一职责。

将以电报方式定期向铁路职员和工人报道特别会议的工作进展情况。

И. 舒别尔斯基^①

^① И. 舒别尔斯基，1917年4月至10月任交通部副部长。

№07598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特别会议的组成人员

(1917年4月10日)

彼得格勒，城外大街，皇村车站^①，皇室大厅

主席：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 弗拉日内胡同
4号，H.И. 约尔丹斯基^②的住宅

来自交通部的成员：

阿尔诺利德，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维诺格拉多夫，格里戈利·扎哈罗维奇

希普钦科，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来自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别利亚科夫，阿列克谢·阿列克山得罗维奇

沃兹尼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杰缅切夫，瓦西里·巴夫洛维奇

卢图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马拉采维奇，维克多·达维多维奇

来自俄罗斯技术协会第八分会的成员：

谢波切夫，谢尔盖·阿列克山得罗维奇

来自私人铁路协会的成员：

① 现在的圣彼得堡维捷布斯克车站。

② 约尔丹斯基(1876—1928)，别名涅戈列夫，1899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孟什维克，第一次俄国革命中曾任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4年间任苏联驻意大利大使。

纳格罗茨基，弗拉基米尔·阿多利福维奇

道路交通工程学院教授

来自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劳动部的成员：

格沃兹杰夫，库兹马·安东诺维奇

劳动部主席

发言人（有会议发言权）：

切尔内舍夫，瓦列里安·拉法伊洛维奇

№07599

交通部关于为普列汉诺夫委员会
提供情报的通知

(1917年4月15日)

彼得格勒
第2677号

所有铁路部门

请向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特别会议发送下列报表：
关于中、低等职员实际平均工资额的报表（根据第1号统计表，不包括差旅费，收入不超过2100卢布）。

关于不同工种或小组的技师和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报表。

报表应根据1916年的总结数据编制。

铁路管理局

1917年4月15日，彼得格勒

No07600

西南铁路电报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

致普列汉诺夫的贺电^①

(1917年4月15日)

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西南铁路的电报工作人员通过您向改善铁路职工生活委员会表示祝贺。我们深信，在研究电报工作人员的劳动和报酬时，正在忍饥挨饿、承担着持续而又完全没有定额的劳动的电报工作人员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

西南铁路电报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

1917年4月15日于基辅

^① 在这一文件上有如下批语：“转 Н.И. 卢图金。Г.В. 普列汉诺夫已阅，并要求不要忘记此事。根据委托，В. 切尔内舍夫。”

№07601

铁路职工卡明斯基致普列汉诺夫的信^①

(1917年4月15日)

尊敬的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

我和所有铁路职工同志们一起，对您接受为公正解决铁路职工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而设立的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感到非常高兴，在向您——导师、斗士和保卫者——表示祝贺的同时，恳请您注意改善同志们经济状况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按一定比例从收入中扣除一部分，用于职工和铁路管理机构的成员。

卡明斯基

1917年4月15日于彼得格勒

^① 在这一文件上有如下批语：“转 Н. И. 卢图金。Г. В. 普列汉诺夫要求作为资料保存。根据委托，В. 切尔内舍夫。”

№07602

叶卡捷林娜铁路洛莫瓦特卡车站铁路职工

扎尔热茨基致普列汉诺夫的信

(1917年4月18日)

尊敬的公民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为了公正，我们恳请您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老年铁路职工。展望不久的将来，我们感到不寒而栗——年老体衰将使我们沦落街头，贫困又会夺去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有希望安享晚年而不必为明天担心害怕，我们将会感到无比幸福。改善生活境遇已经不是为我们这些老人，而是为年轻职工所做的，他们年轻力壮，将来会有较好的保障。

而我们已在专横跋扈的旧制度下走过了艰难的工作道路，难道就不能在衣食无忧的条件下咽下最后一口气吗？您无比尊贵的名字，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给了我们希望。在伟大和公正的事业中，上帝会帮助您。

很多普通人中的一个 Г.А. 扎尔热茨基

1917年4月18日于叶卡捷林娜铁路洛莫瓦特卡车站

№07603

亚历山大铁路管理局总会计处地方职员委员会
提供的 4 口之家最低生活费标准的材料

(不早于 1917 年 4 月 22 日)

您写信给季阿诺夫询问，在莫斯科一个工薪职员的四口之家需要多少生活费用，对此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计算和争论，最后得出结论，在莫斯科，一个四口之家每月最低生活费用是 300 卢布，具体核算如下：

1. 住宅 30 卢布
2. 水 (4 桶, 每桶 1 卢布) 4 卢布
3. 取暖 $\frac{(6 \times 30)}{12} = 15$ 卢布
4. 煤 (不到一大袋, 每袋 10 卢布) 7 卢布 50 戈比
5. 照明 (煤油 10 戈比 1 俄磅) 4 卢布
6. 伙食 (最低限度, 从早饭开始, 喝茶时每人一个小白面包)
7. 白糖 (20 俄磅 \times 28 戈比) 5 卢布 60 戈比
8. 茶叶 ($1/2$ 俄磅 \times 2.80 戈比^①) 1 卢布 40 戈比
9. 鞋 $\frac{2 \text{ 双} \times 36 \text{ 卢布}}{2 \text{ 双} \times 18 \text{ 卢布}} = \frac{36}{73} = 108$ 卢布
+ 2 副鞋掌
每副 10 卢布 = 20
3 副鞋掌 = 4.4 卢布

^① 此处原文有误，应为“卢布”。

每副 8 卢布 = 24

108 卢布 + 44 卢布 = 152 卢布

靴子：2 双 × 8 卢布 = 16 卢布

2 双 × 6 卢布 = 12 卢布

28 卢布

180 卢布 12 = 15 卢布 00 戈比

10. 打鞋油、修鞋 1 卢布 50 戈比

11. 衣服：冬季大衣（5 年换一件）

$(2 \times 150) \frac{420}{2 \times 60} = 7$ 卢布
5.12

夹大衣：

$2 \times 120 = \frac{240}{12.3} = 6$ 卢布

西装（一人）

$2 \times 100 = \frac{300}{2 \times 5012} = 25$ 卢布

38 卢布 00 戈比

12. 内衣 20 卢布

13. 洗衣每人 10 卢布

14. 洗澡和肥皂 $\frac{(4 \times 1)}{2} = 2$ 卢布

15. 财产折旧（一年 10%）5 卢布

16. 厨房器皿折旧 4 卢布

17. 电车费 3 卢布

300 卢布

以上计算是最低限度的，其中也包括雇女佣和子女教育费，因为所谓 4 口人我们指的是丈夫、妻子和两个学龄前儿童。电报中所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会计员——225~250 卢布

助理营业主任（高级会计）——275~300 卢布

营业主任——350~400 卢布

亚历山大铁路管理局总会计处地方职员委员会

№07605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会议

(1917年4月24日)

彼得格勒

主持人：普列汉诺夫

出席第一次会议、有表决权的委员会成员：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铁路委员会成员 卢图金、马拉采维奇、别利亚科夫、沃兹尼岑

交通部代表：

交通管理局统计部主任 希普钦科

铁路管理局经济部主任助理 索科洛夫

铁路管理局动员部主任 阿尔诺利德

铁路管理局技术作业工程师 瓦西里科夫斯基

会议一开始，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希普钦科向大会报告，为了给委员会准备必要的材料，专门成立了办公室。虽然它尚未从委员会得到有关活动方向的指示，因为委员会本身还处在组建阶段，但它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具体的是：

1) 编制关于国家和私人铁路支付低级和中级铁路职工最低和最高工资额的经营预算摘录。

2) 建议国家和私人铁路管理局提供关于低级和中级职员按不同职务的平均工资额的报表，以及关于铁路不同工种技师和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报表。

3) 对某些铁路、某些职工团体或某些个人送交上来的材料进行分类整理，以便于委员会开展工作，这类材料将首先报送委员会。

决定：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报告备案。关于提交会议的材料，首先听取了涉及委员会自身的组织及其组成人员的材料，还听取了下列材料：

1. 私营铁路联合会主席、工程师巴伊达克关于吸收私营铁路联合会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申请。

决定：在讨论这一申请后，考虑到委员会正在制定的改善铁路职工生活状况的措施应该同样地适用于国营铁路和私营铁路，因此势必触及私营铁路企业家的利益，为了全面阐明有关职工物质生活状况问题以及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方向问题，决定吸收私营铁路联合会的代表参加委员会，其名额为：有发言权的代表不超过两名。

2. 委员会成员卢图金针对全俄铁路代表会议^①的决议发表口头声明，该决议提出必须从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中产生一位代表参加委员会，以便了解委员会工作的进程。

决定：吸收全俄铁路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参加委员会。

3. 摩尔曼斯克铁路职工联盟关于派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委员会，以便了解与建筑职工生活有关的问题。

决定：根据委员会成员卢图金所作的解释，在已召开的全俄铁路代表大会的组成中，已经有正在修筑的铁路的代表参加，而且，根据委员会已做出的决定，全俄铁路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也能代表建筑中的铁路的利益，因

^① 全俄铁路代表会议于1917年3-4月间在彼得格勒举行。在这次会议上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筹备召开全俄铁路职工代表大会。

此，不接受摩尔曼斯克铁路职工联盟的申请。

4. 莫斯科—文达瓦—雷宾斯克铁路彼得格勒线路网第一区职工大会做出决议，必须从全俄铁路代表会议成员中选举产生参加委员会工作的铁路职工代表。

决定：通知莫斯科—文达瓦—雷宾斯克铁路彼得格勒线路网第一区的职工，根据全俄铁路代表会议的决定，吸收代表会议的一名代表参加委员会。

5. 俄罗斯技术协会第8铁路分会关于派分会代表谢波季耶夫参加委员会的申请。

决定：为了全面了解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问题，吸收俄罗斯技术协会第8铁路分会的一位代表谢波季耶夫先生为委员会成员，只有发言权。

6. 委员会成员别利亚科夫就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劳动部主席格沃兹杰夫希望能进入委员会一事所作的口头声明。

决定：吸收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格沃兹杰夫参加委员会，具有表决权。

7. 普列汉诺夫关于吸收弗拉迪高加索铁路管理局职员切尔尼雪夫参加委员会的建议，其目的是使普列汉诺夫可以随时了解委员会的工作进程，因为他不可能出席所有会议；另一目的是为普列汉诺夫做一些有关会议进程的必要的札记。

决定：吸收切尔尼雪夫为委员会成员，具有发言权。

8. 工程师瓦西里科夫斯基给交通部长的报告，内容是必须把交通部的一个代表吸收到工程师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中去，该代表同时也是本委员会的成员（因交通部长已有决定，此报告被听取）。

决定：将此报告备案。

9. 由于委员会成员马拉采维奇作了关于必须确定实施委员会所制定的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的措施的确切日期、必须将此日期向各铁路宣布的口头声明，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在交换意见之后，委员会决定：

承认非常有必要确定实施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待遇措施的确切日期，并将此向全体铁路职工宣布。

认为把 1917 年 3 月 1 日——也就是俄国生活新纪元诞生的那一天——作为开始实施委员会制定的改善职工物质生活待遇的措施的时间是最为理想的。在特殊情况下这一日期可以推迟，但最迟不应晚于 1917 年 4 月 1 日。

10. 由于委员会成员阿尔诺利德提出必须准确弄清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和委员会所作决定的强制性程度问题，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对这一问题作了解释：如果委员会所做的决定应该不作更改地付诸实施，他们本人便可以在委员会中履行职责。

随后就委员会的工作方向问题交换意见。

委员会成员卢图金认为有必要规定出最低生活费标准作为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工作的基础，铁路职工的薪金不应低于这个标准，但制定这样的措施需要较长的时间（几个月），而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所以，为满足铁路职工目前的急需，为了改善现存的情况，就有必要发一部分临时附加工资，在实施改善职工状况的总纲要时，要考虑到这些附加工资。卢图金已经听取了全俄铁路代表会议制定的附加工资纲要的内容，纲要的实质是加强战时补贴：每月收入不到 50 卢布者，在月工薪基础上增加 25%^① 到 190%；而每

^① 原文如此。联系下文关于西伯利亚铁路增加比例，此处似应为 250%。

月收入在 50 卢布以上者，每月增发 95 卢布。对西伯利亚铁路，增加的百分比分别降低为 200% 至 140%、每月发 70 卢布以下。

委员会成员希普钦科汇报了雷宾斯克地区的职工制定的劳动报酬纲要，其要点为：在取消计件工资制和战时补贴的情况下，工人每天应得 3—5 卢布，技师每天应得 8—10 卢布。在职员的劳动报酬方面，根据他们的工作对铁路经营的重要程度，规定了 5 组职业，每一组都规定了最低和最高的工资定额。机车车组被定为特别的组，对他们应该取消按俄里计算报酬的办法，而根据在火车上呆的时间长短确定计时工资。

委员会成员马拉采维奇建议，首先要满足最低工种职工的需求，办法是定出最低工资额，把目前低于这一限额的劳动报酬都提到这个标准。马拉采维奇建议，这个最低标准是：西伯利亚铁路为 75 卢布，欧洲俄罗斯为 90 卢布，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奥德萨、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叶卡捷琳堡等城市为 120 卢布。在这个数目以外还要补充一项：提供住房或发给 1/3 的房租费，即 25 卢布、30 卢布及 40 卢布。至于较高种类劳动者工薪的修改，则只有在这之后才能着手进行。而马拉采维奇认为，大幅度增加货币薪金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因为增加工薪额必然会使得大量纸币投放市场，以致在增薪的同时或以后，卢布的购买力降低。

基于这种想法，必须在满足低级职工的急需之后，立即着手紧急制定一个向铁路职工提供食品援助的计划。制定一个食品的实物供应体系的方案，应该纳入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中。

委员会成员别利亚科夫支持马拉采维奇关于以食品实物供应铁路职工的建议，强调了在这一方向上开展工作的必要性。他还指出一个由塞兹兰—维亚泽姆斯基铁路管理局实行的以实物供应的成功例子。与此同时，别利亚科夫还强调必须在铁路居民中最广泛地普及实物供应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意这个方案，认为将最低生活费标准与组织食品实物援助结合起来，将会真正地处理好关于整顿铁路职工工薪额的问题。

进一步的问题，留待下次会议讨论。

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

委员会成员：卢图金、马拉采维奇、别利亚科夫、

瓦西里科夫斯基、阿尔诺利德

办公室主任：希普钦科

1917年4月24日于彼得格勒

№07604

尼古拉铁路电报职工代表大会提供的

三口之家最低生活费标准的材料

(不早于1917年4月)

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一个三口之家每月平均食品需求:

黑面包 3 俄磅 每磅 10 戈比 = 30 戈比

白面包 3 俄磅 每磅 15 戈比 = 45 戈比

两道菜的午餐:

第 1 道菜

肉 1 1/2 俄磅 每人 1/2 俄磅, 每俄磅规定价格为 68 戈比 = 1 卢布 2 戈比。

土豆 1/16 俄斗 = 21 戈比

块根菜 = 10 戈比

第二道菜:

2 俄磅鱼 每俄磅 1 卢布 2 卢布

土豆 1/16 俄斗 21 戈比

烹调用油 1/2 俄磅 (应为 1/4 俄磅) 每俄磅定价 2 卢布 20 戈比共 55 戈比

早餐和晚餐用黄油 1/4 俄磅 55 戈比

茶叶和白糖 (根据每人每月 3 俄磅糖和全家每月 1/2 俄磅茶的定量) 16 戈比

2 瓶牛奶每瓶 25 戈比 50 戈比

全家一天所需的伙食费总共为 6 卢布 5 戈比

一个月共计 181 卢布 50 戈比

每月日常需求：

每月洗澡不少于 4 次 5 卢布

每月用于洗澡和日常需要的肥皂

2 俄磅 每俄磅 65 戈比 1 卢布 30 戈比

洗衣服 5 卢布

火柴 5 盒 每盒 6 戈比 30 戈比

每月共需要 11 卢布 60 戈比

每人每年 3 件内衣，三口之家一年的需要按每件 12 卢布，家中有两个大人，小孩的内衣可以对付过去，三件男式内衣和三件女式内衣共计 72 卢布

6 双袜子 每双 1 卢布 50 戈比 9 卢布

6 双女长袜 每双 3 卢布 18 卢布

12 双小孩长袜 每双 1 卢布 30 戈比 共 15 卢布 60 戈比

全年内衣费用共计 114 卢布 60 戈比

每月 9 卢布 55 戈比

全年的鞋费：

两双男鞋 按定价每双 28 卢布 56 卢布

两双女鞋 按定价每双 25 卢布 50 卢布

两双小孩鞋 按定价每双 14 卢布 28 卢布

两双雨靴 5 卢布

全年的鞋钱总计 139 卢布

每月 11 卢布 51 戈比

不算成人的雨靴和修鞋费，这两项费用也应算作经济支出：

每天的报纸 12 戈比 3 卢布 60 戈比

一个月去两次剧院 6 卢布

其他费用——电车、邮费、鞋油等 7 卢布 30 戈比

全月共什 16 卢布 46 戈比

必要时的什物更新，如：

茶杯、匙子、灯泡、茶碗、碟子等 2 卢布

外衣

假定一件冬大衣可穿 3 年，秋大衣 2 年，西服一年，冬帽 3 年，夏天凉帽 2 年

冬季男大衣 200 卢布

冬季女大衣 200 卢布

冬季小孩大衣 60 卢布

3 年共计 460 卢布

每月 12 卢布

男大衣 150 卢布

女大衣 150 卢布

小孩大衣 40 卢布

2 年共计 340 卢布

每月 14 卢布 16 戈比

每年一套男西装 150 卢布

每年一套女套装（连衣裙） 150 卢布

每月 25 卢布

每三年一顶男式冬帽 50 卢布

每月 1 卢布 39 戈比

两年一顶夏季帽 20 卢布

每月的计划外消费，如：理发、孩子的学习费、外面衬衫、衬衣的活领子、领带、袖口、厨房用具、床罩、餐巾等 36 卢布 70 戈比

每月的全部费用总计为 350 卢布

以上是在上述物价条件下的必需的最低工薪额，而在物价上涨

的情况下，工薪额也应相应增加。

按照当地条件，房钱在以后家庭人数增加时需要给以补助，规格是：给第 4 个人——一半定额，给以后的孩子们——每人 1/3 定额。因管理道岔和信号系统，应该给信号员特别的报酬。电报员和信号员之间的工薪等级差别应该是 10%

电报员和外派人员之间的工薪等级差别应该是 30%

电报员和护路员之间的工薪等级差别应该是 40%

电报员应当得到与信号员和外派人员同样的制服，即每两年发一次冬大衣和秋季大衣，每年发制服上衣、裤子和帽子，每两年发一件直领制服代替短衫。如果不能保证 1912~1913 年的那种制服质量，就按现行市场零售价发给现金。工作不少于半年的职工才能领取制服。从下列表格可知，最低应得数目为：

黑呢裤 60 卢布

制服上衣 80 卢布

制帽 10 卢布 一年

直领制服 25 卢布

冬季大衣 150 卢布

秋季大衣 100 卢布 两年

这样，一年内应一次性领取 287 卢布 50 戈比制服费。

抄写员和在 75 门以上交换台工作的电话接线员与电报员待遇等同。定期增加额：工作满三年、拿最小工资等级的职员，每月可领取 10% 的附加工资，以后每隔 5 年便可领取新的同样百分比的附加工资。在确定定期附加工资时，旧职务的任职时间也计算在内。

每昼夜机上工作量超过 300 个 10 字单元的莫尔斯电报机报务员应得到奖金。

学习其他系统的补贴。

对于学习在其他系统的机器上工作应该给予特殊的奖励。在保留附加工资的情况下，如果莫尔斯电报机报务员学会了博多电报机，可以在基本薪金额基础上每月领取10卢布的附加工资；会用乌伊特斯頓式电报机的增加10卢布，会用休斯式电报机的增加20卢布，同时保留附加工资，如果莫尔斯电报机报务员学会了博多电报机、乌伊特斯頓电报机和休斯电报机，并且用它们工作了不少于半年的话。学会了任意两种机器的报务员，可得到最高附加工资。

由于这些机器数量有限，规定了按职位学习这些系统的顺序。博多式电报机报务员不会用莫尔斯电报机，应该领取莫尔斯式电报机报务员的等级工资，而不得超过它。

报务员分类和为学习其他系统而领取附加工资的制度，只适用于一些较大的电报站（彼得格勒、莫斯科、博洛戈耶），因此，根据同志们的愿望，工作人员应按职位和质量来招聘，这样可以提高这些重要电报站的工作效率。

男女雇员在劳动的物质条件上的差别表现为：妇女不领制服，而是领取制服费。在假期方面的特殊差别，应该根据有关妇女劳动的特殊规定来考虑。在其他方面，妇女享有和男人同样的权利，不应该有更多优待。

关于职位较高和机上工作年资较高人员、候补人员、后备信号员的待遇要求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将在工段委员会弄清之后再寄出。

尼古拉铁路电报职工代表大会

№07606

交通部长和普列汉诺夫委员会主席的 联合通报

(1917年5月8日)

第 1549 号

各国营和私营铁路管理局局长
抄送铁路职工总委员会、大本营

普列汉诺夫委员会讨论了铁路职工困难的物质生活状况，因为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工种职工的公平劳动报酬问题——而他们对此有着充分权利，委员会决定立即首先帮助最贫困的那一部分铁路职工。为此目的，在制定出新的铁路劳动工种和根据国内生活经济条件定出新的劳动报酬标准之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规定以下临时措施：根据 1915 年 4 月 28 日、12 月 25 日以及 1916 年 10 月 30 日的法律的规定所得的战时附加工资，其总额在物价最昂贵的地区应不低于 100 卢布，在物价最便宜的地区应不低于 40 卢布。委员会在同时下发的清单中规定了每条铁路附加工资数额的最低限度。各地方铁路管理局应在征得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进一步将各铁路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以便给各区域制定出附加工资等级差额，其条件是：第一，确定每个区域的附加工资级差为每月 5 卢布；第二，确定不同区域时要考虑到，用于支付附加工资的总额不应超过委员会为每条铁路规定的人均附加工资的总额。此外，委员会认为必须使每个枢纽站的所有职工都得到相同数目的最低附加工

资，因此委员会规定了枢纽站的一般最低附加工资额，它们将在上述清单中列出。这些枢纽站最低附加工资额具有临时性，应由各枢纽站铁路委员会的代表在专门的会议上加以重审，但在这之前，这些最低附加工资额则具有强制性。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将发放给所有那些根据前面所述法律有权享受战时附加工资的职工。对于已获得实物住房的人员，规定的附加工资要减少15%。同丈夫同住在一起的道口女看守员，以及行李搬运工、所有享受铁路供应的免费伙食的职工、铁路学校的学生、在铁路工作的教学、医务人员和神职人员，都应按照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①的指示，得到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的25%到50%。领取由委员会规定的25%或50%附加工资的上述职务限制，可以由各总铁路职工总委员会加以修改和补充。由于战时局势需要而在其他铁路或在野战管理局出差的职工，以及疏散的职工，都和本地职工一样，领取委员会规定的全额附加工资，而不受以前法律规定的75%的限制。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按发给职员的不同原则——每月正常工作时间为25天——发给技师和工人。因工人自己的过错而旷工，不发给规定的附加工资，在此种情况下还应从全月附加工资中扣除旷工日的附加工资部分。对按工作日计酬的女工，其附加工资要比成年工人的附加工资低15%。在今年3月以后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增加额度完全抵得过附加工资时，就不再发给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但在相反情况下，根据铁路职工总委员会规定的原则，发给附加工资和所增加的计日或计件工资额之间的差额。那些无权享受战时附加工资的按日计酬的工人，也就无权享受普列汉诺夫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但只要他们不能按市场价格得到补偿，就应得到不低于相应的编制内职工低级工种报酬的工资，以及按照

^① 铁路职工总委员会自1917年3月起相继成立，是铁路职工的职业组织。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铁路职工总委员会的指示发给的附加工资。在职工所领取的战时附加工资数额已大于目前委员会规定的数额时，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不变，但保留其较高的附加工资。附加工资的发放原则，完全适用于所有私营铁路的职工。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于今年4月1日付诸实施。在通知此事时，我们抱有充分信心，相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改善铁路职工生活状况的临时措施将使他们能够安静地等待委员会为铁路职工制定正常补偿办法的工作的进一步结果。建议你们立刻根据上述情况与铁路职工总委员会一起协商，研究将该铁路划分为级差区段，以便尽快地、毫不拖延地发出上述附加工资。在必须紧急改善那些最贫困职工生活状况的情况下，委员会可能会在划定附加工资界限时出现差错，而修改这些界限的问题将可能交给预定今年召开的铁路职工代表大会来讨论。为实现上述措施所必需的款项，将立即拨给各国营铁路。请你们将此通报在铁路职工中广泛散发。有关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所做的所有涉及这些规定的指示，以及修改这些规定的愿望，由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通知普列汉诺夫委员会和全俄铁路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

交通部长 涅克拉索夫
委员会主席 普列汉诺夫

№07607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5月12日)

主持人：普列汉诺夫

1. 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委员会成员：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铁路委员会成员：卢图金、马拉采维奇、别利亚科夫、沃兹尼岑、福克耶夫

交通部代表：

交通管理局统计处主任 希普钦科

铁路管理局技术作业工程师 瓦西里科夫斯基

被疏散的德文斯基铁路工厂主任 维诺格拉多夫

2. 有发言权的委员会成员：切尔尼雪夫、拜达克、纳格拉德斯基

瓦西里科夫斯基报告了莫斯科铁路枢纽站政委于今年4月28日发来的第162号公函，内附亚历山大铁路管理局局长于今年4月15日发出的第1859号函，内容是关于将整个亚历山大铁路划入适合于1915年4月28日临时办法^①的第一类地区的问题。

决定：鉴于根据普列汉诺夫委员会为中、低级职工制定的草案，其附加工资的数额大体上接近于1915年4月28日办法规定的^①第一类地区的发放的附加工资标准，甚至还超过了后者，因此目前没有必要将整个亚历山大铁路划为1915年4月28日

^① 这一临时办法规定了战时不同类别工作人员附加工资的额度。

办法中的第一类地区。

听取了尼古拉铁路彼得格勒客运站乘务员关于允许乘务专家别洛索夫出席普列汉诺夫委员会会议、并使其在研究有关乘务员的问题时享有表决权的申请。

决定：鉴于委员会中已经有了全俄铁路代表会议的几名代表，而全俄铁路代表会议包括了铁路劳动的所有领域，其中也含有乘务部门，这些代表能够充分捍卫所有铁路职工的利益，因此，乘务员的申请不予满足。然而为了充分阐述乘务员劳动报酬的特殊性，建议尼古拉铁路彼得格勒客运站的乘务员通过尼古拉铁路铁路职工总委员会提供所有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并附上该委员会的结论。

听取了西北铁路线路部门高级代表的要求：

1) 必须在各铁路线广泛宣布，1917年3月1日或4月1日是所有改善铁路职工物质条件的措施的开始日期。

2) 必须邀请彼得格勒枢纽站所有铁路业务部门的代表参加普列汉诺夫委员会，以便广泛阐述铁路所有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

决定：第一个问题，关于委员会所实行的战时附加工资发放问题，在发出的电报中已经宣布，定于1917年4月1日开始执行。至于宣布改善物质生活的所有措施，在实施附加工资之前就预先提出是不可能的，因为执行日期必须得到临时政府的同意。

第二个问题，考虑到委员会成员中已经有几名铁路代表会议的代表，而吸收彼得格勒枢纽站所有铁路业务部门的代表加入委员会，则将使委员会本身过分庞大，因此，西北铁路线路部门高级代表的请求不予接受。此外，委员会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将随时邀请内行人士就具体问题探讨。

听取了叶卡捷琳娜铁路的铁路委员会主席给部长的电报，

请求取消 1915 年 12 月 25 日办法的第 6 款，该条文取消了享受 14 天以上休假期的铁路工人在休假期间领取战时附加工资的权利。

决定：作为关于普列汉诺夫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的 1549 号电报的补充，须作如下解释：在所有经过批准的假期内附加工资一律照发。但是对职工来说必须明确，在 1549 号电文中已有规定，工人无故旷工时，其旷工日内一律不发给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每月工作日按 25 天计。

随后委员会讨论了下面的问题：在实行普列汉诺夫委员会确定的附加工资之后，原来按每个工作小时发给技师和工人各 3 戈比和 2 戈比的附加工资是否仍然有效。

委员会随即规定，普列汉诺夫委员会的附加工资应发给所有那些在战争时期由军事部门和其他部门管理的职员和工人。

关于从普列汉诺夫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中作各种扣除的问题，委员会决定，除工薪中额外领取之数外，不应该从这些附加工资中做任何扣除。

在结束讨论所实行措施的具体细节之后，委员会审查并最后确定了国营和私营铁路最高和最低的附加工资标准，以及供国营和私营铁路计算拨款额度的人均附加工资额。与此同时，委员会规定，这些标准应当被视为是大致的，可以由各铁路总委员会根据各地的经济条件加以更改，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 1) 在枢纽站，附加工资对于所有铁路的枢纽站的全体职工都应当相同。

- 2) 各铁路的现金开支应遵照委员会规定的人均附加工资标准执行。

在这之后委员会确定了私营铁路人均附加工资标准。

接着委员会审议了各铁路枢纽站战时附加工资的临时标准。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将本记录抄送各铁路管理局以便其做出相应安排。

委员会主席： 普列汉诺夫

委员会成员： 卢图金、马拉采维奇、别里亚科夫、
瓦西里科夫斯基、福克耶夫、
切尔尼雪夫、沃兹尼岑

办公厅主任： 希普钦科

1917年5月12日于彼得格勒

№07608

交通部和普列汉诺夫委员会的联合通报

(1917年5月15日)

文件号：386 /18932

各国营和私营铁路管理局局长

抄送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

彼得格勒，铁路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

大本营，基斯里亚科夫将军

作为我们于今年5月8日发出的第1549号电报的补充，通知如下：

1. 委员会根据下列表格规定出各铁路附加工资的标准：

铁路名称	每人每月 铁路附加工资标准		连同以前已有的附加 工资人均拨款	
	最高	最低	卢布	卢布
1. 国营铁路				
亚历山大铁路	100	65	80	
巴斯昆恰克铁路	50	40	45	
华沙-维也纳铁路	100	100	100	
叶卡捷林娜铁路	80	55	70	
外贝加尔铁路	60	40	50	
外高加索各铁路	85	70	77	
利巴瓦-罗姆斯克铁路	100	55	80	
莫斯科-库尔斯克, 下新城和 穆罗姆斯克铁路	100	56	75	
尼古拉铁路	100	70	90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续表

铁路名称	每人每月 铁路附加工资标准		连同以前已有的附加 工资人均拨款	
	最高	最低	卢布	卢布
鄂木斯克铁路	60	40	45	
彼尔姆铁路	70	45	50	
波列斯克各铁路	100	70	85	
普里维斯林斯克各铁路	100	100	100	
里加-奥廖尔铁路	100	55	80	
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铁路	65	40	50	
中亚铁路	70	45	55	
北方各铁路	100	45	80	
塞兹兰-维亚泽姆斯克铁路	85	40	65	
西北各铁路	100	80	90	
塔什干铁路	70	45	55	
西南各铁路	100	55	78	
南方各铁路	80	55	65	
2. 私营铁路				
阿尔泰铁路	55	40	45	
阿尔马维尔-图阿普谢铁路	75	50	60	
弗拉迪高加索铁路	80	50	65	
叶伊斯克铁路	75	50	60	
黑海-库班铁路	70	45	55	
阿钦斯克-米努辛斯克铁路	50	40	45	
比萨拉比亚各铁路	90	75	85	
博戈斯洛夫斯克各铁路	70	45	50	
布哈拉铁路	70	55	60	
别尔戈罗得-苏梅铁路	80	55	65	
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	60	40	50	
沃尔马尔专用铁路	75	65	70	
莫斯科-文达瓦-雷宾斯克铁路	100	55	80	
莫斯科-喀山铁路	100	40	75	
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	100	55	75	
新济布科夫铁路	75	65	70	
第一股份公司:				
1) 佩尔诺沃-列维利铁路	95	80	90	

续表

铁路名称	每人每月 铁路附加工资标准		连同以前已有的附加 工资人均拨款	
	最高	最低	卢布	卢布
2)南方各铁路	90	70	80	
波多尔斯克铁路	100	75	85	
滨海铁路	100	100	100	
梁赞-弗拉基米尔斯克铁路	75	55	60	
图拉-利赫文斯克铁路	75	55	65	
梁赞-乌拉尔铁路	100	40	65	
斯克维拉专用铁路	80	60	70	
斯塔罗杜布专用铁路	75	70	72	
北顿涅茨克铁路	80	55	65	
东北乌拉尔铁路	70	45	50	
托克马克铁路	65	55	60	
特罗伊茨克铁路	65	40	50	
费尔干纳铁路	70	55	60	
东南各铁路	80	40	60	

2. 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极限数额只是大致的数额, 可以根据当地经济条件由铁路总委员会自行变动, 但一定要遵守下列条件:

1) 在各中心枢纽站中, 每个枢纽站所有铁路职工的附加工资标准要完全相同;

2) 要保持由委员会确定的人均附加工资定额标准。

3. 付给中心枢纽站职工的附加工资, 由私营铁路管理委员会和国营铁路管理局的代表组成的会议与每个中心枢纽站的铁路总委员会一起, 确定完全相同的数额标准。

如果以后各中心枢纽站会议定出各自的不同标准, 那么各地方管理局可以对各中心枢纽站实发的附加工资进行调整, 其方法是从4月1日起给铁路职工补发不足的附加工资部分, 或扣除多发的部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分。

4. 私营公司管理委员会的职员，在不同的中心枢纽站或区段中，按照由私营铁路管理委员会或国营铁路管理局确定并经铁路总委员会同意的该枢纽站或区段的标准领取附加工资。

5. 普列汉诺夫委员会规定的附加工资，在职工经批准的休假期间内照发，但职工无故旷工时，则旷工的工作日不计发附加工资。每月按 25 个劳动日计。

6. 由于以前发布的法律所规定的每个工时发给工人 2 戈比和 3 戈比的款项实际上就是战时附加工资，因此，这些附加工资连同其他一些战时附加工资，都不再发给所有那些将要领取普列汉诺夫委员会这次规定的附加工资的工人。

7. 委员会确定的附加工资完全适合于所有在战时被调到军事部门或其他部门工作的职工（例如军事—卫生列车的钳工）。

8. 不得从委员会所规定的附加工资中做任何扣除，但扣除额外多领取的工资不在此列。

在向领导层通报此事的同时，请将这份邮政电报在职工中广泛传播。

委员会主席 普列汉诺夫（签字）

交通部部长 （由副部长利维罗夫斯基代签）

1917 年 5 月 15 日彼得格勒

№07809

交通部关于附加工资的确定和发放程序的通报

(1917年5月27日)

文件号：20431 / 4299

各国营和私营铁路负责人

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

全俄铁路职工联盟执行委员会

大本营

作为 1549 号电报和 3861 号邮政电报的补充，特说明如下：在各铁路和中心枢纽站范围内，普列汉诺夫附加工资数额的最后决定权完全属于铁路职工总委员会。在决定时必须采用下列方式：

第一，确定各铁路总的预算款额；

第二，与该枢纽站的各铁路职工总委员会协商发给中心枢纽站各站段的附加工资数额；

第三，在协商一致的中心枢纽站附加工资标准的基础上，确定中心枢纽站职工的预算款额总数；

第四，从各铁路附加工资预算款额中扣除各中心枢纽站应得的总数；

第五，将剩余的附加工资款额分配给各区段，各委员会如认为有必要，可以把该铁路的所有其余部分视为一个区段，对所有职工规定统一的最低附加工资。

在给职工规定物价上涨补贴时，必须遵守一个条件：即必须给

普列汉诺夫与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

每个具体区段的所有职工规定出统一的数额，这些职工根据以前的关于战时附加工资法律领取过少于铁路委员会规定的最低数额的战时附加工资，因此在规定这些补贴时不允许对每个职工的工资采取任何打折扣的办法或遵循其他原则。

已申明的关于保持平均标准的必要性，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在实际发放附加工资时不得超过拨出资金的限度，因为国家财政资金十分困难，即便完全承认发给铁路职工的劳动报酬是不足的，也根本不可能在目前情况下找到能够完全满足铁路职工合理要求的资金。

普列汉诺夫委员会一致确信，对劳动的货币报酬数额的提高——这一措施立即会造成市场上物价的提高——不能减轻铁路职工物质状况的困难，因此委员会已着手制定另一方面的措施，即按照接近军需采购的价格组织对铁路工人供应食品实物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任何关于普列汉诺夫委员会制定的作为临时执行的附加工资标准不足的申诉，都不可能受到审理。

请立即将这份电报通告各铁路委员会以及全体职工。

交通部长 涅克拉索夫（签字）

1917年5月27日于彼得格勒

№07610

改善铁路职工物质生活状况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6月2日)

主持人：卢图金

委员会成员：

1. 有表决权者：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铁路委员会成员：

马拉采维奇

别利亚科夫

交通部成员：

铁路管理局动员处处长 阿尔诺利德

被疏散的德文斯基工厂厂长 维诺格拉多夫

铁路管理局技术作业工程师 瓦西里科夫斯基

业务部营业主任 利谢维奇

2. 有发言权者：

私营铁路委员会主席 巴伊达克

1. 会议开始后，向委员会报告了彼尔姆铁路管理局局长5月26日拍发的第1815号电报。

对上述电报，交通部副部长马拉采维奇于5月27日发出第4312号回电。

对彼尔姆铁路管理局长的报告进行研究后，委员会决定对报告表示意见，在原则上拒绝部分满足个别班组铁路职工要求的同时，委员会认为未经官方许可就对铁路现行的工资报酬制度进行修改是

不允许的；尤其要指出的是，这些修改将使资金极度短缺的国库增加开支；所有这类问题只能由各主管的中央机关来解决。

2. 听取了今年5月26日华沙—维也纳铁路职工的波兰联盟彼得格勒小组的第58号声明和6月2日被疏散铁路职工中央执行局第31号声明，内容都是请求准许他们的组织的代表参加委员会并要求在解决有关偿付被派遣和被疏散职工工资的办法时有表决权。

委员会依据以前对类似问题的讨论，决定否决上述申请。

3. 听取了华沙专用铁路公司管理委员会的请求信（今年5月17（30）日第333号信函），希望被告知，根据生活中物价上涨的情况，该管理委员会可以归到哪一个区段，因为在交通部1917年5月15日发出的第3861/18932通告中未提及此事。

考虑到华沙专用线公司管理委员会在疏散后已转归切尔尼戈夫市，委员会决定，对该管理委员会职工的附加工资应该按照委员会今年4月1日规定的附加工资标准中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管理局的切尔尼戈夫所属区段的标准计算。

4. 马拉采维奇将下列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

由于目前机车和列车车组按俄里计算的工资有所降低，交通部认为，作为临时措施，可对按俄里计算的工资实行经常性的固定补贴，其数额为：火车司机——25卢布，司机助手——20卢布，司炉——15卢布，列车长——20卢布，初级列车员——15卢布。

在这个问题上，马尔采维奇解释说，临时政府已经决定，不经劳动部同意，任何关于增加工资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同时，为了调整铁路职工的工资，打算成立一个由劳动部、交通部、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铁路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和各私营铁路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至于现在提交委员会审议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只能筹划一个临时的补充，以后在统一调整工资时才能被考虑。

卢图金表示，关于机车和列车车组的工资问题，委员会已在今年5月24日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委员会已委托委员维诺格拉多夫对问题进行具体审查，维诺格拉多夫负责将审查结果提交委员会。

维诺格拉多夫就此问题通报说，有关这一问题的初步工作即将结束，下星期他将召开会议。

卢图金接着谈到，就他所知，火车司机们通过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代表大会，强硬地坚持要求完全满足他们关于转为按小时付酬的要求，不同意领取任何临时补助，认为这些补助只是治标的办法。因此，对待他们只能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维诺格拉多夫补充说，在提高车组薪金的方式问题上，在一些铁路上还存在着许多不按小时付酬的其他办法。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完全一致的办法。

委员会根据以前的结论，认为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在适当的机关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审理之前，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决定。

5. 听取了铁路建筑管理局长1917年5月25(27)日发给普列汉诺夫的第3322号信函。

关于发给铁路建筑职工战时附加工资的问题，委员会在1917年5月5(6)日的会议上曾做出决定：考虑到对这些职工发放附加工资的问题讨论得很少，应将这一问题划出来进行专门审理。

鉴于以上情况，根据卢图金的请求，从铁路建筑管理局调取了必要的材料，以便能够详细讨论每条正在修建的铁路的问题。

由于目前调来的材料中只有职工的名单而没有任何职业技能，这样的材料不能提供任何必要的解决问题的指导性依据，所以，应该提请铁路建筑管理局进行系统的材料准备工作。

马拉采维奇发言说，他的意见是，在规定铁路建筑职工的战时附加工资时应当注意，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工资额定得比那些运营

铁路职工要高，因为那时曾考虑到运营铁路职工领取了战时附加工资；因此，现在若按照与运营铁路职工相同的标准给他们规定附加工资，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铁路建筑职工好像将拿到双倍的战时附加工资。因此，在给铁路建筑职工规定附加工资数额时应当注意上述情况，并且把他们的收入总额与运营铁路职工持平。

6. 阿尔诺利德宣读了他制订的为战争情况下被遣散的铁路职工发放给养的办法。

受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之托，卢图金向委员会声明，在通过所有上述决议之后，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考虑到进一步研究有关调整铁路职工在和平时期工薪的问题应该由为此专门设置的机关去处理这一情况，在向委员会所有成员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示感谢之后，他辞去主席职务。有关这一情况将以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的名义通告全体铁路职工。

与会者委托卢图金为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对这一事业的关注和帮助表示感谢。同时向作为普列汉诺夫副手的委员会会议主持人卢图金表示感谢。

卢图金宣布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结束了会议。

会议主席 卢图金

【专题说明】

关于十月革命的几个文件

(1917年8月至11月)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之后，俄国的前途取决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吸引人民——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跟自己走。在1917年，人民是俄国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角。而在自发的人民运动中，不仅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包含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掌握了政权的自由主义政党成为偏右的力量，把冻结革命、巩固资产阶级政府作为首要目标。临时政府坚持继续战争的政策，因而事实上延缓了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民主派政党认为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奉行妥协路线。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领导人曾对临时政府持“有条件支持”的立场，但列宁的回国和他的四月提纲使布尔什维克党实现了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本专题收录的文件反映了政党和政治家对1917年革命的看法、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实现自己目标的策略思想，从若干侧面揭示了从二月走向十月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07284

临时政府关于授予军事部长和 内务部长非常权力的决议摘要

(1917年8月2日)

……政府的职责：在犯罪意图开始实施之前就预先防止其成熟，因为在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定即使遭到短暂的破坏，也会酿成极大的危险。

因此，政府为了捍卫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为了维护各政治党派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权利，将彻底制止某些人进行上述危害国家的活动。为此，在目前的非常时刻，授予军事部长和内务部长非常权力……

1. 授权军事部长和内务部长在共同协商后 (1) 做出逮捕那些其活动危及国防、国内安全和作为革命成果的自由的人员的决定；(2) 命令第 (1) 项所涉及的人员在规定期限内离开俄罗斯，若上述人员不离境或擅自返回，则按本决定第 (1) 项予以逮捕。

2. 授权军事部长和内务部长制定执行第 1 条措施的办法。

№07285

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1917年8月20日)

出席人：B.И. 维尔纳茨基、Г.В. 维尔纳茨基、С.В. 沃斯特罗金、Д.Д. 格里姆、Н.Н. 格里博夫、А.А. 考夫曼、А.В. 卡尔塔舍夫、Ф.Ф. 科科什金、Ю.М. 列别杰夫、А.И. 马库申、В.Д. 纳波科夫、С.Ф. 奥尔登堡、П.Н. 米留可夫、公民С.В. 帕宁娜、А.В. 特尔科娃、季莫费耶夫、З.Г. 弗伦克尔、А.И. 盛加略夫、П.П. 尤列涅夫

А.В. 卡尔塔舍夫（宗教部长）：……至今为止政权只采用内科疗法来医治国家的所有病症，当这种办法不足以应付时，它又不去寻找新的途径。看来，这就是国家开始……崩溃的原因，因为国家的问题和要求没有得到政权的回答。军队在崩溃，表现出奴隶的造反的本能。到处如此……政权这种历史性犯罪性的无所作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即使有人愿意助政权一臂之力，也已经来不及了。用不了多久，任何人都将无能为力。那些不怕做出残酷粗暴之举的人将夺取政权……发言者本人开始感觉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我们知识分子的那种对权力的无能。而那些老的战将具有这种意识，也许，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应付濒临瓦解的局面。现在，政府应当不顾发生哗变的可能，在前线重新恢复最起码的纪律；在后方，则应维护和执行自己的革命纲领。只有这样它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否则，我们只能坐等专制的到来。左派暂时还在喧嚣鼓噪，不过，他们也会奴隶般地屈服，也会遭到镇压……

A. A. 考夫曼说，他在农业部听维赫利亚耶夫先生讲，为了从农民那里得到粮食，政府已在考虑派遣武装的征粮队，……

A. H. 盛加略夫：在你同市民接触时，你会看到什么情况？昨天在新村，人们简直就不让米留可夫讲话。我盛加略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戈里亚奇波列的交易所大厦搞了个群众集会，到那里去的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以及为数不多的看热闹的人。为了寻求共同的见解，共同的语言，演讲人提到了祖国，一个长相粗鲁的工人气势汹汹地喊道：“工人没有祖国，工人只有拳头！”当讲到在法国相互仇视导致了相互开始砍头时，一个士兵喊道：“也该砍你们的头！”在奇尼泽利马戏院举行的集会上，一个士兵高喊：“钱包必须一样鼓，必须把资产阶级的脑袋拧下来！”愚昧凶狠之徒抛弃了不久前的领袖策列铁里去造反。形势已经到了要开枪的地步，因为语言已经无能为力……专制者已经开始露头。A. B. 卡尔塔舍夫提出一个问题：立宪民主党是否已经被排除于事态之外？这个问题也在折磨我盛加略夫。即使专制权力在血腥屠杀之后想依靠温和阶层，找到立宪民主党并请求它拯救祖国，那么党如果接受这一历史使命的话，它将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即使它拯救了祖国，对它来说执政也是一种长期的政治自杀。

A. B. 特尔科娃：对立宪民主党的敌视日益加剧，也许起作用的是立宪民主党人没有让群众感觉到，对他们来说社会公正的理想和政治自由的实惠是一样宝贵的。我们把这些理想写进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没有写进自己心里，这是可悲的。底层群众中蕴藏着本能而巨大的要求公正的感情，他们的许多社会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我们知道，我们从政治自由的实惠中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可他们还须要领悟这一点。外地爆发社会动乱，这与其说是坏牧师和形形色色坏人煽动的结果，不如说是破坏局面和互不理解造成的。我们将面临肉搏战。无论这是多么痛苦，但是专制者让我们做出的牺牲要

比克伦斯基让我们做出的更多。只有血路一条，别无他途。这与其说是军事失利和溃败的后果，不如说是粮食问题上的混乱所致……参加莫斯科会议^①后，我与一些农民代表和士兵代表坐一个车厢回来，通过谈话我深信，代表们希望在莫斯科看到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他们怀着对资产阶级的蔑视来到这里，又从莫斯科带回了“资产者”（一定程度上把知识分子从他们之中区分出来）更可怕的仇恨。到处都能感觉爆炸马上就会发生……

3.Г. 弗伦克尔：大家在这里惶恐不安地谈武装征粮队，可是在靠近前线的省，每支受到缺粮威胁的部队历来就是这么干的。现在，后方的部队比前方还多。

做事要有理智，譬如德国人从不征用怀犊的母牛。用恐怖来吓唬人，但为此也必须有合适的人选，而这样的人还没看到……

Н.Н. 格里博夫：如果使用武力征粮，就会发生抢劫，然后就将普加乔夫式的暴动……

П.Н. 米留可夫认为，不能把国内正在酝酿的事件视为某种客观的生理过程；心理能起巨大的作用，它能提前或者推迟以外科手术进行干预的时机。时机的选择不取决于立宪民主党人；如果有那么多事情取决于立宪民主党人，那么他们就不用通过外科手术来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了。事态的进程无论如何并不取决于现政府，而取决于某种别的什么东西。看来，政府的主要代表者掌权太久了，他威胁过什么人：让他交出权力没那么便宜，等等。

在他的周围已经开始聚集起一些通常围着权力转而且有自己利益的人。

……不管饥饿暴动或者布尔什维克发难是否会成为借口，但是

^① 指由临时政府召集、1917年8月12—15日（公历25—28日）举行的莫斯科国务会议。

生活会使社会和居民产生一个想法：外科手术在所难免。

这一过程将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但我们不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待这一过程：我们会承认它，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它……。假若……能够摆脱掉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政府会变得比较有生命力。实际上，对党来说更为有利的是：让现政府的寿命再延长一些，让社会主义者政府自己来倡议和决定实行不可避免的镇压。现在，一个新的重要因素是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既然它们投靠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也就预先决定了它们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的中间派已经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即将退场，取代它的是布尔什维克，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外科手术的幽灵。政府对这一场新戏是怎么盘算的？克伦斯基没有选择的余地，依靠策列铁里和齐赫泽的可能性已经排除，萨文科夫正在达到自己的目标，整个事态正自然地朝着我们所预料的方向变化。军队中的阴谋在加速事态的发展。大本营的军官联合会被指控搞反政府蛊惑宣传；圣彼得堡通讯社向哥萨克散布流言，说政府打算取消哥萨克特权；而哥萨克扬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把沙皇从托博尔斯克接来。当人们在莫斯科比较近地观察了克伦斯基以后，他个人在国内的声望似乎有些黯然失色了……

В.Д. 纳波科夫：……现在，资产阶级政府要在国内找到依靠力量是非常困难的。

А.И. 盛加略夫认为，对党对国家来说，现政府继续存在比发生政治突变更为有利。

П.Н. 米留可夫表示反对，他说，如果说现政府继续存在对党可能有利，那么政权优柔寡断左右摇摆的政策对国家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Ф.Ф. 科科什金在与克伦斯基多次会见和争论之后得出一个印象，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他的情绪和表现非常优柔寡断，变化无

常。他的心理状态像尼古拉二世：满腹狐疑，举棋不定，似乎没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但与此同时他对政府决定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因为他在政府内部没有遇到过对抗，苏维埃也很乐意追随他。萨文科夫也许可以弥补克伦斯基意志的不足，但看来克伦斯基害怕受到任何影响。在评价政权总的状况时，须要考虑这些心理因素。

M. IO. 列别杰夫在说明政权对自己的亲密合作者的不信任态度时，引用农民代表的话说，为了防备科尔尼洛夫将军等人搞“反革命”的情况出现，政府在莫斯科部署了装备机枪的部队，甚至吸收那些满兵营乱窜的布尔什维克参加。

在就目前的政治形势交换意见后，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和决定。

No 07287

俄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记录

（1917年11月1日）

……列宁：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开始鼓动反对起义，他们被视为内奸。我甚至给中央委员会写信，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我本来不想……对他们如此严厉。

我善意地看待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的关于联合的谈判，因为对此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

但是，当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权时，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克伦斯基表示反对后才这样做的。与莫斯科……的事情耽误了。我们的……陷入了悲观情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那里冒出联合问题……

布尔什维克……常常过分善良。倘若资产阶级成为胜利者，它会像1948年和1871年那样行动。谁以为我们不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制？显然，只有幼稚的孩子才会这样认为……我们应当使用武力：逮捕银行的行长等等。即使短时间的逮捕也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结果……

但就在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刻，出现了分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称，我们还没有（在全国）夺取政权。我无法心平气和地倾听这种话。我看这是背叛。他们想干什么？想让（自发的）白刃格斗开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拯救国家……而联合呢？我甚至没法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还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与妥

协分子谈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捣乱……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想“引进”社会主义，这是奇谈怪论……有人对我们说，必须“停止”。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分裂，那就分裂吧。如果他们是多数，那就夺取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并采取行动好了，而我们就到水兵中去……

现在我们的口号是：不要联合，就是说，争取单一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托洛茨基：……有人对我们说：我们没有印花布，没有煤油，因此需要妥协。可是我要第一千零一次地问：同郭茨和唐恩妥协怎么会给我们煤油？切尔诺夫之流为什么反对我们？……他们之所以反对我们……是因为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对资产阶级。其实，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迫采取什么样的残酷措施。切尔诺夫之流能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所有东西，就是动摇。但是，在对敌斗争中动摇，就会断送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

诺根：……流血的时候在一起，可是掌权了就分道扬镳，能这么干吗？能拒绝士兵参加政权吗？内战将会持续好多年。用刺刀对付农民是长久不了的……如果我们排斥了所有其他政党，那会怎么样？革命以后，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苏维埃，孟什维克也离开了。这意味着苏维埃将分崩离析。在国家全面崩溃的情况下，这种局面将以我们在经过一个短时间之后垮台而告终……饥荒会为现在反对我们的卡列金创造基础。我们打算取消铁路职工的面包配给证，我们给他们的电报会为声势浩大的抗议创造基础……

No07288

波格丹诺夫^① 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件摘录

(1917年11月19日)

……在你们那里正在做的那些经常是荒谬的、但几乎总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中，我看不见任何逗人开心的东西。关于我国局势的悲剧，我不仅看到了，而且认为您倒是远远没有完全看到，我甚至试图说明它，当然是按自己的方式来说明。

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战争。战争造成了两个基本的事实：

1. 经济和文化衰落，2. 战时共产主义大发展。

战时共产主义从前线发展到后方，暂时改造了社会：上百万人的军队公社，对士兵家属实行定量配给口粮，根据定量供应来调节消费，规定销售和生产定额。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无非是资本主义和战时消费共产主义的大杂烩，现在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懂组织分析方法。战时共产主义的环境造成了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在俄罗斯比在欧洲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我国的资本主义比较薄弱，而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组织形式的影响又相对强大。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穷兵黩武式的革命赋予布尔什维克党严重歪曲其本质的任务。它不得不去组织冒牌社会主义的士

^①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又姓马林诺夫斯基（1873—1928），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按所受教育为医生。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190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后来曾领导召回派。1909年6月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兵群众（脱离生产、生活在兵营公社、靠国家供养的农民）。为什么恰恰是由它来组织？看来，仅仅是因为当时它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党、代表士兵群众理想的党。党成了工人和士兵的党。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有这么一条组织形态学法则：如果一个系统是由高低两部分组织构成的，那么它与环境的关系由低层次组织决定。例如，一条锁链的坚固程度是由最弱的环节决定的。一支舰队的航行速度是由航速最慢的舰船决定的，等等。由不同的阶级队伍组成的一个党所持的立场，是由它最落后的一翼决定的。工人和士兵的党客观上就是士兵的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主义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吸收了兵营的全部逻辑、兵营的全部方法、兵营特有的全部文化和兵营的理想。

兵营的逻辑与工厂的逻辑相反，其特点是它把任何任务都理解为打击力量的问题，而不是组织经验和劳动的问题。打倒了资产阶级就是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就能够做任何事情。协商？干嘛要这东西？分配获得物？好像不该这么办。什么？否则不行？那好吧，我们就分……不过，且慢！我们还是比你们强大！不应当……等等……

现在欧洲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欧洲的工人阶级还没有那样的文化水平和组织性，它的成熟程度已为战争历史明显证明。那里会有一系列清算性的革命，它们将消除战争的后遗症、权威性（寡头政治、专制政权）、债务（即地租过重）、民族压迫残余、战争新造成的和由国家资本主义产生的民族隔阂，等等，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俄罗斯，士兵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别的什么，它与其说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近，不如说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反的东西……

【专题说明】

有关国内战争的几个文件

(1918年1月至1919年11月)

十月武装起义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国家政权，但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才刚刚开始。1918年初解散立宪会议标志着苏维埃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在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采取了各种恐怖手段，而布尔什维克也坚决地实行了“革命恐怖”。从1918年夏到1920年末，苏维埃政权同反对这个政权的势力之间进行了惨烈的斗争。但国内战争不仅是红与白的战争，列宁认为还有一场战争，它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威胁甚至比邓尼金、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加在一起的威胁还要大，这就是俄国农民对苏维埃政权以暴力和强制为特征的军事共产主义措施的反抗。在三年内战中，苏维埃政权最终彻底消灭了新制度的任何政治反对派，一党制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原则被贯彻于各个方面，军事共产主义的精神和方式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关于国内战争的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本专题收录的文件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这一特定时期。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赵静男、吕允连、杨世招、李传勋翻译)

№07297

俄共（布）中央关于《肃反委员会通报》 停刊的决定

（1918年10月25日）

……《肃反委员会通报》第3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诺林斯克执委会和党委的赞扬刑讯的文章，而且编辑部在按语中没有说明它对诺林斯克这些人的否定态度。

兹决定：谴责诺林斯克这些人撰写这篇文章，谴责编辑部刊登这篇文章。《肃反委员会通报》应当停刊。决定由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库尔斯基组成中央委员会审查组，对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政治审查。责成审查组在不削弱各地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情况下，对各地肃反委员会的活动进行调查。

No07296

最高宗教署要求军人 支持高尔察克的呼吁书^① 摘录

(1918年11月)

热爱基督的军人们！神圣宗教和亲爱祖国的英勇保卫者们！由主教、司祭和教民组成的最高宗教署向你们致以问候和基督的爱……

你们看到，亲爱的军人们，曾经强盛的大国俄罗斯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国家简直是在死亡。我们的两个首都正在饥饿和疾病中死去。大火映红了神圣俄罗斯的整个天空。杀戮、抢劫和暴力已经司空见惯。

没有人相信明天，没有人能保证他能活下去。上帝神圣的教堂被亵渎，上帝的仆人——神甫和高级神职人员——遭受暴力甚至被杀害。科学和艺术的名胜古迹被毁灭，学者受迫害。黑暗将笼罩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大地。国家工业停滞不前，工厂倒闭，成千上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失业工人被抛上街头。我们都开始挨饿受冻，身上无衣，脚上没鞋。人民手中纸币不少，但又有何用？既无货可买，也无处可买。痛苦和贫困叩响了每一家的大门。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因此而在全世界面前蒙受的耻辱还没有完结。现在，我们的盟国

^① 1918年9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召集各地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代表在乌法举行“国务会议”，成立了由阿夫克森齐耶夫为首的执政内阁，称为“全俄临时政府”。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秋季进攻，执政内阁被迫于10月迁往鄂木斯克。11月，主张用更有力的手段恢复秩序的强硬分子发动政变，解散了执政内阁。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领导了鄂木斯克政府。在取得白卫运动各主要力量首领同意后，高尔察克成为俄国最高执政，并在协约国支持下组织军事力量，准备向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

以及中立国……正派代表赴法国首都巴黎参加和会。那里将讨论普遍和平的条件，确定国界、战争损失额度、各国的国际地位等等。盟国声称，俄国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在这次各民族的和平盛会中据有相应的地位：如果俄国能够应付自己的经济崩溃、应付自己的无政府状态——哪怕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的话，如果俄国能够重新拥有一支能够恢复国家秩序的强大军队的话。

亲爱的军人们，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你们，向你们求助：从死亡和耻辱中拯救祖国！恢复它昔日的光荣和强盛！让灾难深重的祖国获得俄罗斯人民期望的和平和幸福！请你们帮助打开神圣的教堂，让人们重新在那里向上帝祈祷赐予全世界和平，赐予你们健康，赐予苦难的祖国幸福。

更紧密地站到自己的最高领袖^①身旁，把你们的队伍更牢固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保卫祖国免遭暴徒和叛徒之害。

神圣的教会向你们——受难者——祝福，祈祷上帝加强你们与敌人斗争的力量。请记住，可爱的人们，苦难越多，享受就越甜，奖赏就越高：上帝将赐予你们仁慈，感恩的同胞将奉献给你们永垂不朽的荣誉和尊敬。“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3节），“上帝和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23）

你们虔诚的祈祷者：

鄂木斯克和巴甫洛达尔大主教 西尔韦斯特

西伯利亚和塞兹兰大主教 韦尼阿明

大司祭 弗拉基米尔·萨多夫斯基

教授 Л. 皮萨列夫

^① 即亚·瓦·高尔察克。

No04071

迈斯基就加入萨马拉政府一事

致孟什维克中央的信^①

(1918年11月7日)

尊敬的同志们：

我从刊登在今年9月10日那期《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尤·斯捷克洛夫^②同志的《卖身投靠者》一文中附带发现了下述内容：“孟什维克报纸《莫斯科晨报》（第13期）上出现了一则半官方的报道，说是‘据官方报纸报道，社会民主工党前中央委员伊·米·迈斯基在萨马拉政府中担任了要职。鉴于他在既没有通知党中

①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里亚霍维茨基，1884～1975），苏联外交家和历史学家，1929～1946年间先后任苏联驻芬兰、英国大使和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即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12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非常代表大会上作为“革命护国主义者”当选为中央委员。1918年8月至10月在立宪会议成员萨马拉委员会劳动部门担任负责人，是国内战争中惟一加入反苏维埃政府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他的这一举动未得到孟什维克领导机关的同意，也违背了其关于不得支持反苏维埃起义的决议，因而在1918年9月被开除出孟什维克中央。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全党代表会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1920年10月，迈斯基就自己的历史问题写了悔过信，此信在《真理报》上发表，并直接寄给了列宁，得到了俄共（布）领导层和列宁的肯定评价。1921年，迈斯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在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收入本专题的这份文件是迈斯基1918年11月写给孟什维克中央的申诉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18年下半年孟什维克内部的矛盾，迈斯基当时的观点代表了孟什维克右翼的立场，而矛盾的关键仍是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评价问题。

②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捷克洛夫，别名纳哈姆基斯（1873～1941），革命活动家，政论家，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25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

央又没有取得党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担任该职务，从今以后他不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①”。

这就是说，根据此处摘引的半官方消息的意思，我被你们排除出了中央委员会（我希望这不是开除，因为党章没有赋予你们这样的权利），并且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而仅仅是因为我参加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的政府当了一名劳动部长。当然你们也很清楚，我不会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相反，我认为，明白无误地说出我对你们决议的态度是我的责任。因为这对于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观点十分有益。这将帮助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搞清使我们分道扬镳的争吵，并对它做出自己公正的评价。

首先谈谈事情的表面方面。我认为你们将我排除出中央委员会不具有法律效力，其理由如次：

1. 中央在做出排除我的决定时，既没预先听取我的申诉，甚至也没与我发生联系，连要我做出书面解释的要求也没提出过。一个在做出决定时忽视保障其正确性的最基本东西的“法庭”，预先就使自己的判决声名扫地了。

2. 我对中央做出自己的决定时是否有足够的法定人数表示强烈怀疑。据我粗略计算，在通过此决议时，总数 18 个中央委员中，充其量不过只有 6~7 个在莫斯科（其余的要么在监狱，要么缺席），也就是说，会议不够法定人数。如果这次会议甚至以某些加聘的候补委员（因为从 5 月会议时起，中央实际上就一直通过加聘来补充）来充数，那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组成的委员会有没有权力排除一个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合法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

3. 根据中央决议，目前条件下，在那些与莫斯科隔绝的地区，党的工作的最高领导权转到该地区党组织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州或

^① 指孟什维克中央。

边区中心，除此之外，处于该地区的中央委员也自动成为这些州或边区中心的成员。这样，在那些中央实际上无法施加自己影响的俄罗斯地区，中央就将自己的权力转交给了州或边区委员会。8月初在萨马拉举行了立宪会议委员会控制区域的党组织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党的州委员会。稍晚一些时候，两名现在本地的中央委员——我与基布里克同志^①——进入了该州委会。那次代表大会原则上承认了我们党参加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政府是可行的、是容许的。所以，当我被建议在该政府任劳动部长职务时，州委会允许我接受了建议，并为此通过了下述决议：

“注意到：

(1) 目前，革命民主党人面临的任务是拯救祖国和重建统一的民主俄罗斯，这些任务迫切要求把俄罗斯所有力量在全俄立宪会议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

(2) 只有在重建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基础上，这一目的方能最容易最充分地达到；

(3) 重建工作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调节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在保障生产力自由发展的情况下，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施的广泛社会改革的方法全面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

(4) 迄今为止，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的政策总体上符合上述拯救革命和重建统一的民主俄罗斯的任务，并且，根据其负责的代表的宣言判断，今后该委员会的政策也仍将如此；

(5) 在此种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和义务，就是在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面临的巨大的创造性的国家工作中，对其给予全面

^① B.C. 基布里克 (1884~?)，排字工人，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逮捕和流放，191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8年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伏尔加州委会代表团成员参加乌法国事会议，因此于1919年被开除出中央。

支持；

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控制区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州委会决定：

批准迈斯基同志接受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向他提出的担任劳动部门负责人建议。”^①（1918年8月16日第124期《晚霞报》^②）。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看出，我进入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的政府，是不折不扣地遵守了中央自己确定的所有党规党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有什么权利把我排除在外呢？

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州党委在得悉尤·斯捷克洛夫上述文章的内容之后，于9月28日的会议上又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报纸上登载的关于伊·迈斯基同志因担任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政府劳动部门负责人一职而被排除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组成之外的消息，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区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州委员会决定：

建议中央重新研究自己的决议，因为伊·米·迈斯基同志是在征得州委会同意后才担任上述职务的，而根据中央自己的决议，本州委会是全俄立宪会议区域——与中央隔绝区域——的党的领导机关。”

刚引用的这份决议已托人顺便捎给你们，但不知你们收到没有。

① 1918年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孟什维克）委派Б.И.尼古拉耶夫斯基调查伏尔加河地区和萨马拉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据他报告，州委会是在迈斯基违背他在来萨马拉之前做出的关于在任何地方均不以中央委员身份作政治表态的承诺、以中央委员身份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马拉州委施压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决议的。见Б.尼古拉耶夫斯基：《1917年12月到1918年7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载于《十月革命后的孟什维克》，第39、41页。

② 《晚霞报》是1917年开始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马拉州委员会机关报，1918年10月停刊。

现在，在谈了表面的法律性质的考虑之后，请允许我转到实质性陈述。

把我排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事实，最鲜明地表现出我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分歧，这些分歧不是昨天才开始的。我一刻也没怀疑过，这些分歧具有非常严肃的原则性质。它们的实质如下：

自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公开采取了社会革命的方针之时起，社会民主工党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怎么办？显然，有三种可供考虑的立场：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斗争；或者中立。在经历了初期某些动摇之后，我们党抛弃了第一和第三种立场，正式表示要为反对“共产主义”独裁而斗争，因为这种独裁正将我国引向国内战争，将政治自由引向死亡，将国内经济引向崩溃。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民主思想与“共产主义”独裁相抗衡，而全俄立宪会议是这种民主思想最鲜明的体现。

但是，我们党在实行它公开宣布的这一总的政治路线时是否始终如一呢？

我确信，不是。它的不彻底性在去年整个冬天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现出来，但是，从今年春天开始暴露得更加鲜明。事实上，在5、6月份之前，总的情况概括起来就是这样。

布尔什维主义正劲头十足地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实行自己的破坏路线，它想都没想过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力量达成某种协议，相反，它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踏上了公开迫害它们的道路，在报刊上、会议上、苏维埃中、联合会中等等，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合法可能性”一个接一个被暴力消灭了，公民自由已化为乌有，政治恐怖时期正在到来，国内战争越来越残酷。为进行这场国内战争，布尔什维主义越来越经常、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寻求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助。

在此种形势下，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应该采取

越来越尖锐的形式。言论的时代已过去，行动的时代已经到来。到处都在爆发罢工、起义、军官的阴谋、工人农民的暴动，部分是自发的，部分是有组织的。5月底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军事行动，紧接着在萨马拉成立了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解放西伯利亚的战斗在同时进行，社会气氛一小时一小时地变得更趋白热化，所以党必须向自己的拥护者做出一个清晰的毫不含糊的回答：怎么办？参加还是不参加方兴未艾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如果参加，那么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条件下、提出什么样的口号？做出这种回答是中央的直接职责，而中央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呢？

没有，没有履行。我回忆了一下今年5—7月中央召开的接二连三的讨论“当前时局”的无数次会议，我只产生了一种感觉——一种深深的不满和抗议的感觉。这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辞的决议的大泛滥而已。向党员直接说“你们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干吧”，这是大多数中央委员认为不可行的，因为他们意识到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彻底的毁灭性；向党员说“你们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去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去寻找同盟者吧”，大多数中央委员也不敢，因为反苏维埃阵营中存在的明显的反动分子使他们难为情，他们害怕党的积极性最终对复辟有利。所以中央既不敢肯定地说行，也不敢说不行，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央违背了正式宣布的党的路线：“与共产主义独裁作斗争”，而开始奉行一种“中立”的政策。

我完全没有夸大。任何一个在此期间与中央打过交道的人都清楚记得，中央委员的整个……^①、他们的所有想法、他们的言行，都贯串着这一主要的、基本的“中立”情绪。中央领导层的大多数现在想方设法对现实生活提出的可怕问题采取旁观态度的努力究竟

^① 此处原文缺字。

达到了何等英雄主义的高度，下面这件极具特色的事情就是明证。

有一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6月中旬的事，一个省城的铁路工人代表团来到中央，他们想向中央请示一个问题：在捷克部队或布尔什维克部队到来时，铁路工人党员采取什么态度？党员同志在此种情况下要不要运送部队？如果可以运送，那么运送谁的部队？接见代表团的是中央领导 X^① 同志，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经典的回答：“保持中立”。当代表们请求对这个太过一般的公式作具体解释时，X 同志解释道：“比方说吧，对布尔什维克可以保持敌视的中立，而对社会革命党和捷克人则采取友好的中立”。原来，即使是 X 同志的姿态，也不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不偏不倚，而是偏向于（尽管不那么坚决）——恕我使用布尔什维克的行话——“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一边的。可怜的铁路工人！他们应以什么样的实际方式来贯彻党的领袖的这一指示呢？在发送军列的实践中，对布尔什维克保持“敌视的中立”、对社会革命党和捷克人采取“友好的中立”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铁路工人在运送前者时应该阴沉着脸，而在运送后者时则满面高兴的微笑？是不是这样呢？我最终也没能得知，这些铁路工人是如何贯彻这一妙不可言的“中央指示”的。但我知道得很清楚，在国内战争处于如此白热化的时候下达这类指示，就意味着使地方组织实际上等于没有任何领导，是让他们在极端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自行其是，自担风险^②。所以，如果地方工作者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犯了错误——毫

① 指 JI. 马尔托夫，即尤利·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1873—192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5 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会员。1903 年起为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1917 年起是孟什维克左翼领袖。1920 年移居国外。

② 据马尔托夫后来说，迈斯基歪曲了这一情节。代表团是沃洛格达铁路工人派出的，与他们的谈话涉及的是对德国人和协约国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而无论如何不是对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见 JI. 马尔托夫《变节者的回忆》，载于《社会主义通报》1922 年 12 月 9 日第 23—24 期，第 15—16 页。

无疑问，他们已犯过不少错误，那么，正是中央应对这些错误承担最大最重的责任，因为正是由于中央害怕在为民主而斗争时不可避免的血污弄脏了自己高度原则性的雪白袈裟，而宁愿躲在“云杉树下的修道院”里，从6月起就已实际上中止了对党的活动的领导。

像对待铁路工人这样的情况远不是惟一的。还有一次，中央开会讨论我们那些派往东方、去萨马拉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同志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还是那个X同志，在中央其他一些委员支持下，反复证明说，我们党在该地区的任务，是在对当地诞生的政权保持善意的中立情况下，致力于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

我当即直截了当地向X同志提问：“请问，难道参加建设民主国家不是我党的任务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投入一定的力量和资金吗？”

“不，”X同志回答，“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建设无产阶级的组织。”

我还想起了另一次党中央会议，会上讨论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计划，即在有一定数量代表的情况下，准备在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放出来的区域内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我热烈地为这些计划辩护，并建议往萨马拉派出一个拥有全权的中央代表团。由于处于苏维埃俄罗斯范围之外，这个代表团有可能对社会革命党人施加某种影响。与我的态度相反，大多数与会的中央委员对社会革命党的计划嗤之以鼻，竞相说些无聊的俏皮话拿他们取笑，轻蔑地称这个计划为“社会革命党人通常的冒险”。在这方面，中央另一位领导人Y同志^①表现尤其恶劣。最后我忍不住问道：劳驾，您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大家

^① 指费多尔·伊里奇·唐恩（1871—1947）。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境。

如此轻率地讥笑复活立宪会议的任何尝试并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我们党也是坚持立宪会议的纲领的，并且为立宪会议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党强调指出，国家要摆脱目前的困境，除了立宪会议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党号召工人为召开立宪会议举行罢工。总之，我们党为召开立宪会议表现出最大的兴趣和最大的积极性，这是为什么？当有人尝试在实实在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并为此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却除了轻蔑地耸耸肩并且傲慢地说一句：“荒唐的冒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更好的东西了。这里的逻辑何在？

对此 Y 同志回答：

“我们党当然是坚持立宪会议的纲领的，它始终坚持这一点，如果您稍微回忆一下，在它的纲领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这个要求太一般化了。有谁会把它作为当前的具体要求，真正严肃地考虑复活这个立宪会议或者召开立宪会议呢？”

“请问，”我当即叫起来，“不论在书面宣传材料中还是口头宣传时，我们不正是把它作为目前的具体要求而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政治上的两面派？”

Y 同志强烈抗议我“政治上的两面派”的说法，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话是没有根据的。至少，他的所有论据给我的印象是这样。还能不是这样吗？要知道，关于社会民主党在被解放区域工作的问题以及立宪会议的问题上，事情的本质是：中央的多数——很可能甚至不是完全有意识地——想要采取这种极力使自己免除行动的必要性的立场，因为任何实际行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偏离“严格的原则性”路线。所以，在这里，作为所有判断和宣言的心理基础的，仍然是那种“中立”情绪。

6 月底举行的中央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会议^① 对我具有决定性

^① 1918 年 6 月 25 日。

意义，它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向我表明，我与大多数中央委员没有共同语言，不能这样长久拖下去。实际上，我对当前党的任务的想法，只得到少数中央委员同情，而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在许多老的著名的党务工作者中间得到的同情要大得多。我的观点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对于一个大的政党来说，不论在何种条件下，“中立”的立场都是十分可疑的立场。而它正变得完全不可思议，因为在国内战争正打得紧张激烈的情况下，中立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所以党应该在当前的斗争中采取完全清晰确定的立场。那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立场呢？

我觉得选择并不那么特别困难。从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我国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我国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乎一切客观前提条件，而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包括把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和保护无产阶级的广泛社会改革计划）。它不可避免地应该是这样性质的革命，即便在西欧某些国家爆发类似社会革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在每个具体的国家，革命的性质最终取决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说，在德国和英国可以想象的可能的事情，在我国毫无疑问将是难以想象的不可能的事情。正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拥护民主纲领，而不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好的民主政治是俄罗斯在它历史发展的当代水平上可以期望的最高的东西。当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政治之间、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的位置是在民主和立宪会议这一边，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我以为这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的确，无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群众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感召下曾支持苏维埃政权而反对立宪会议，但是，用倍倍尔^①的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话说，“领袖不应该奴隶般地追随群众的愿望和任性的要求，而要仔细研究实际情况……然后才决定应该或不应该采取某些步骤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明确的和长远的利益^①，因此完全可以预料，当广大工人群众被今天的直接利益所吸引而离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时，党与这些群众会暂时分开。那时，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被接受程度来冒险，来捍卫工人阶级的明天而反对它的今天，但以后党会为此得到加倍补偿的。现在我们的处境正是如此，就让工人群众在苏维埃政权的祭坛前以令人吃惊的盲目顶礼膜拜好了，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有反潮流的勇气，并在决定事关自己政策的问题时，绝对只是遵循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总的、长远的利益。

当前无产阶级的总的长远的利益在哪里呢？

这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俄罗斯。只有这样一个俄罗斯才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无产阶级权利的最低限度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俄罗斯才有可能开展健康的、强大的、欧洲式的发达的工人运动。不可能是别的什么。

既然是这样，党在当前的行动路线就很清楚了：**党应该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能量使民主政治获得优势，它应该确定不移地站到反苏维埃运动一边，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做出一切合乎逻辑的结论。**的确，处在这个运动行列中的成分千差万别，其中确有纯粹的反动势力，但是，在政治中不可能像搞科学研究一样审慎挑剔。米拉波就曾说过^②，干革命不能借助熏衣草油。不管反苏维埃阵营里存在可疑的政治派别怎样令我们不快，我们不能因此就拒绝与“共产主

^① 此处和以下的黑体字是原有的。

^② O. 米拉波（1749—1791），伯爵，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政论家。他以第三等级代表身份入选 1789 年三级会议，因揭露专制制度而获得声誉。

义独裁”作斗争，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斗争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和必需的。我们只应采取一切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措施，以尽可能消弭右边来的危险。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容易方式不是党的“中立”，不是党实际上脱离战场，而是相反，只须党最积极地参加斗争。党在反苏维埃阵营所起的作用越大，由民主政治而不是黑帮分子取代“共产主义独裁”的机会就越多。当然，这种算计也有可能出错，在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时，反动势力有可能变得比民主力量还强大，它们会迈过民主力量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这种危险无疑是存在的。但怎么办呢？谁不冒险谁就没有赢的机会。历史把我们置于此种境地，我们只能冒险，没有别的出路。就算是在结局远未确定的斗争中冒险，也要比在怯懦的无所作为中慢慢腐烂发臭好些。

由此产生的实际结论是清楚的：坚决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准备和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民起义，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和立宪会议委员会，参加民主国家的建设，与协约国保持紧密接触，继续对德战争，以重建统一独立的俄罗斯——中央给地方组织的指示本来应该是这样的。无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被布尔什维主义拉拢的那部分无产者是多么艰难，但是为了工人阶级的未来，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坚决果断地这么做。

这样，我的观点是完全与中央大多数委员的观点相对立的。我们之间要实现和解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还是做出了最后一次尝试，试图推动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离开他们的死点。你们大概还记得，在我离开莫斯科前不久，我曾经提出建议，将中央的驻地——至少是中央的相当大部分——迁到萨马拉。我认为，被解放区域将要展开的事件，从大的方面说对于俄罗斯，从小的方面说对于社会民主工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认为，深孚众望的党中央委员会站在战线的那一边将是极为有益的。与此同时我还希望，如果中央到了萨马拉，按照事情的自然逻辑，它将被迫

放弃“中立”的政策，并往中央委员们的血管多输进一点民主主义的新鲜血液。但是，我的建议被否决了。中央的否定决议最大地简化了局面。我明白了，我必须独自行动。本丢·彼拉多^①的形象始终令我深深反感，而我现在对自己说：“在这流淌鲜血的民主主义进行最后的英勇尝试、集中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的革命决心的时刻，我不能洗手不干。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的位置应该在革命的行列里”。

过了两周我就到了萨马拉。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呢？我来到这里时，这块从苏维埃政权手中解放出来的土地上的政治形势有以下特点。

在萨马拉掌权的是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中间派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无条件受它领导的有乌法、辛比尔斯克、喀山，程度稍差一些的有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这就是立宪会议委员会政府管辖的所谓“立宪会议区域”的地理范围。委员会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与德国斗争，重建统一和独立的俄罗斯，与协约国紧密接触——但必须保证它们完全不干涉我国的内部事务。在国内政策方面，则实行彻底巩固民主制度的路线。有财产资格的人起初对委员会十分同情，后来对它的行为十分失望（因为对他们来说委员会太左了），所以在我到来之前已形成了由立宪民主党的《伏尔加日报》所领导的势不两立的反对派。资产阶级拒绝与委员会一起工作，拒绝帮助他们，拒绝向他们提供自己的财力和人力，相反还千方百计对委员会设置障碍。“人民军”^②的大多数军官也不满委员会的政策，其中许多人不是履行自己的直接职责，而是系统地

① 本丢·彼拉多，公元26—36年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以残忍著称。根据史家记载和新约的传统说法，他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② 立宪会议委员会通过征集志愿兵和招募人员组成的武装力量。

大捞反对委员会的资本。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的哥萨克政权对接受委员会的统治极不情愿，正等待适当的机会，以便从自己身上解脱早已使他们厌倦的“民主枷锁”。在西伯利亚，羽翼渐丰的军人—资产阶级政权^①对“立宪会议区域”内的有钱人和军官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竭力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委员会。委员会不得不面对的财政经济困难非常巨大。由于敌军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比立宪会议的军队占很大优势，所以前线的形势吃紧，几乎是危急的。即便是在委员会军事上最成功的时期（8月中旬），离萨马拉最近的战线也只有100俄里，仅此一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委员会的主要军事支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而社会支柱则是部分工人、广大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农民群众。

这就是说，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实质上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正是纯而又纯的民主专政形式，它正与巨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困难作斗争以捍卫自己的统治。就其政党成分而言，这个政权比去年引起政治争议的“一致内阁”要左得多，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参加“同类内阁”却没有在我党队伍中引起任何怀疑。这个政权的客观工作条件要比1917年夏“同类内阁”所处的条件更加悲惨。支持这样的政权，帮助它站稳脚跟、壮大起来，是每个民主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生活在立宪会议区域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在我来萨马拉前一天结束的、有11个地方组织参加的州党代表会议一致决定，无条件支持该委员会（而不是“只有怎样，才能支持”），包括党员可以参加该委员会建立的政府。

在此种条件下，当立宪会议委员会建议我担任劳动部门负责人一职时，我一分钟也没犹豫过。我知道，该委员会是多么急需管理

^① 指的是设在鄂木斯克的以П.В. 沃洛戈茨基为首的“临时西伯利亚政府”。

国家事务的人才。我意识到，与无产阶级建立良好关系对它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更明白，萨马拉——这是革命的最后一个前哨阵地，如果它陷落了，那么反革命的胜利就会加快脚步到来。所以我在与同志们商量之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担任劳动部长一职。但是在最终决定自己进入政府的问题之前，我与委员会主席 B.K. 沃尔斯基^①进行了一番长谈。在谈话中，我尽量仔细地了解委员会总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当我确认这些基本路线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之后，我又从自己方面提出了要我担任劳动部长所需的特殊条件。这些条件归结起来就是：

我觉得，民主政府必须通过实行某种社会改革计划，来保障无产阶级能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认为委员会必须保证我能够发布以下一系列法律：

- (1) 关于 8 小时工作日；
- (2) 关于最低工资；
- (3) 关于结社自由；
- (4) 关于失业保险；
- (5) 关于医疗保险改革；
- (6) 关于不幸事故保险改革；
- (7) 关于行业仲裁；
- (8) 关于劳动检查；
- (9) 关于劳动合同；
- (10) 关于仲裁法院。

只有实现上述社会立法纲领，委员会才算履行了自己作为民主

^① B.K. 沃尔斯基 (1877—1937)，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903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8 年夏被社会革命党中央派往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组织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从 1918 年 8 月起任立宪会议委员会主席。

国家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然后才能获得要求无产阶级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好好工作——的权利。只要获得委员会赋予的进行上述社会改革所需的全权，我就准备担当起这一艰难的吃力不讨好的、但又十分需要的工作，以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

这就是我作为担任劳动部门负责人必需条件而提出的具体纲领。沃尔斯基答道：

“我们完全接受您的纲领。您认为什么是有益的和必需的，您就去干吧。”

我认为有义务在这里指出，在我领导劳动部期间，不论是沃尔斯基方面，还是整个委员会方面，都对我的所有创举给予了充分同情和支持。

在我与沃尔斯基谈话之后，我不再有任何怀疑，立宪会议区域的州党委也没有这种怀疑，他们就我加入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政府通过了本信开头所引用的决议。我觉得我跨出担任劳动部门负责人这一步是问心无愧、充满信心的。直到去年10月中旬，我一共当了近两个月的劳动部长。我不可能在这里面面俱到地谈我担任部长期间的工作——也许下一次还有机会谈——但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不论是我自己还是我们的党，今后都不会为我的这一行动而感到脸红的。因为在我领导期间，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劳动部工作精神的最突出体现，就是颁布了关于8小时工作日制第273号命令。我赋予这一命令非常重大的原则意义。因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民主政权（是民主政权，而不是共产主义政权或社会主义政权）以立法形式首次规定了整个工业、交通、商业中无产阶级的8小时工作日制。我要指出，即使1917年的革命临时政府也未能跨出这一步，而总是把颁布8小时工作日制的法律推到更有利的将来。如果在今后的事件发展过程中第273号法令被反动派的飓风刮走，我敢肯定它仍然不会变得无影无踪，它会给俄罗斯无产阶级在改善自己处境的斗

争中提供一些支撑点，它还会缓解和平时期固定的 8 小时工作日制法律难产的痛苦。从今往后，第 273 号令将永远把立宪会议的名字与革命时代工人阶级获得的最重大社会成果的名称连在一起，而这毫无疑问会有助于在广大群众意识中强化对民主思想的忠诚。还须要特别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8 小时工作日的法律是立宪会议委员会根据我的报告一致通过的，这个事实能够成为关于萨马拉政权总的性质的足够鲜明的证明。

当我谈到第 273 号命令时，我头脑中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比较：第 273 号令是立宪会议委员会 9 月 4 日通过、9 月 7 日颁布的。我被你们从中央委员会排除的决议，根据见报的时间推算，大概也是在那些日子。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莫斯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竟然从自己队伍中排除了一个当时正在萨马拉实行 8 小时工作日制法律的中央委员，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呢？你们想一想吧，你们排除我是因为我参加了“萨马拉政府”，也就是说，因为我在那里当了劳动部长，包括因为我主要实行 8 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因为——我再重复一遍——这一法律是我整个部长活动的重心。也许你们并不希望发生类似情况，也没设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可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事实的相互依存关系铁定就是这样。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充满矛盾吗？工人政党的中央从自己的队伍中赶走了一个委员，他一心一意谋求实现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工人的一个最大要求，而这个要求又是工人政党本身全力支持的！你们必须同意，这种情况太荒谬了！但是，你们是否想到，这种状况的荒谬性证明了你们通过的决议的虚伪性？你们是否还想到，你们决议的虚伪性是从你们在有争议问题上的总的立场的虚伪性产生出来的？

如果你们不这么想，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认为把我排除出中央是正确而英明的——那么……情况对你们来说会更糟，因为，如果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高机关把一个委员赶出了自己的队伍，因为他实行了8小时工作日的法律，那么，这只能意味着“丹麦王国里腐臭冲天”，党的最高机关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那时候，排除我的事实本身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判决书就成了荣誉证书，那么被排斥的人就能满怀自豪地带着被排斥的烙印，把它作为世界大战和革命时代即使最聪明的头脑也会产生灾难性的思想混乱的鲜明见证。

写到这里我可以停笔了。但是在提出结论性观点之前，请允许我再提出最后一个意见，作为对上述所有内容的综合。

在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萨马拉篇章”可以说已接近尾声。萨马拉已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已不复存在，我自己已不再是部长，而只是一个前部长。我必须谈谈过去并进行总结。当我对离开莫斯科以来的一切往事投以回顾性的一瞥时，我对自己3个月前做出的前往东方的决定一分钟也没感到过遗憾。的确，我当时的希望落了空：萨马拉没能成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盟主，它在两条战线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对反动派——同时进行的斗争中失败了。但是我觉得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我尽我所能，参加了民主主义拯救革命的最后一次英勇卓绝的尝试，这是我的巨大光荣。我相信，在伟大的历史风暴刮过之后，在我们大家都能更加平静更加客观地思索的时候，无产阶级不会把我的这种参与算成负数，而是算入正数之中。

致以同志的敬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伊·迈斯基

1918年11月7日于鄂木斯克市

No 07301

格里戈里耶夫^① 部队的暴行

(1919年7月)

……我随我们追击格里戈里耶夫的部队来到切尔卡瑟后，目睹了这座小城的悲惨景象。尸体还没收拾，大部分住户遭到洗劫。犹太居民受害尤甚。我在一座白房子附近停留了片刻。房子的窗户已经全被砸掉，房前小花园的鲜花遭摧残，篱笆也倒塌了。房门口横卧着一具中年男人的尸体，眼睛被挖了出来，几络胡须被揪落在地，旁边有一具女尸，上衣被扯碎，两个乳房被割掉，肚子被剖开。最后，就在这里，还看到一个已经咽气的小姑娘，全身裸露，有明显遭强奸的迹象……

在追击格里戈里耶夫匪帮的路上，我们发现了几十具被埋的尸体，尸体都是头朝下，土埋到腰部。已经查明，这些人是被扔到坑里活埋的。

①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1878～1919），上尉，1917～1918年曾先后在中央拉达的部队和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的部队服役。1918年12月投靠彼得留拉武装，1919年2月转向红军。1919年5月7日发动叛乱，失败后投靠马赫诺。7月27日被马赫诺处死。

№07302

迈科夫斯基将军关于镇压 反高尔察克农民起义的命令

(1919年9月30日)

1. 仔细搜查暴动地区的每一个村庄，携带武器者作为敌人就地枪决。

2. 逮捕当地居民告发的宣传鼓动者、苏维埃代表、帮助暴动者、逃兵、同谋者、窝藏者，并将其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

3. 将不可靠分子和坏分子遣送别廖佐沃和涅尔琴斯克边区，交警察监管。

4. 未对匪帮到来进行应有反抗、执行匪帮命令、未利用自己的装备采取一切措施消灭红军的地方官员，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从重惩治，直至判处死刑。

5. 再次发生暴动的村庄，从重从严清剿，直至摧毁整个村庄。

№06226

维尔纳茨基^① 的日记

(1919年10~11月)

旧历1919年10月1日晨

在长时间搁笔之后——只是在罗斯托夫^② 和塔甘罗格时记过——又重新写起了日记。尽管意识到把生活中飞速而过的事实记录下来——就像把转瞬即逝的东西固定下来一样——的意义，但我仍找不到实现我的愿望的意志力。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是我始终不

①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1863~1945)，俄国自然科学家，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和放射地质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1911年间任莫斯科大学教授，为抗议当局对大学生的迫害而辞职。1912年开始是彼得堡科学院院士。1915年参与组建科学院自然生产力研究常设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曾多年担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之后，维尔纳茨基在面临可能被捕的情况下于旧历1917年11月18日逃离彼得格勒，在乌克兰度过了国内战争时期，1921年回到彼得堡。在奔波漂泊于波尔塔瓦、基辅、罗斯托夫、辛菲罗波尔等地的数年间，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并担任乌克兰科学院首任院长。同时仍然关注着国内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1918年5月至1919年11月，维尔纳茨基大部分时间是在基辅。他在1919年9月给自己的朋友、历史学家A.A.科尔尼洛夫的信中说：“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东西。……在基辅我经历了德国—盖特曼时期、文尼琴科的执政内阁以及布尔什维克时期，而现在，我希望是更为巩固的时期——正在恢复俄罗斯的志愿军的时期……。”但是，此后的一系列事情和形势的发展改变了维尔纳茨基的看法并彻底打碎了他的希望。维尔纳茨基1919年10月至11月之间的部分日记反映了作者对乌克兰内战进程以及全俄事态的观察和感受。

② 罗斯托夫当时是邓尼金的南俄武装力量指挥部所在地。维尔纳茨基于1919年9月去此地的目的是争取对乌克兰科学院的支持，因为乌克兰科学院的活动在邓尼金的志愿军占领基辅后被迫停止。维尔纳茨基与邓尼金见了面，但事情没有结果。11月20日，他第二次去罗斯托夫并争得了对乌克兰科学院的活动给予财政支持的许诺。

满足于记录这种形式，不满意于我不能够以自己满意的形式、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经历到的和感受到的。似乎只有少许不甚明了的、以逻辑形式表现的印象，当你着手叙述一天内的经历时，你才认识到有这么多——无尽无休的——经历和感受经过了我的“自我”。

表现我们个性的无限性的逻辑工具非常不完善。无数先辈代代相继锻造出来的语言是很不完善的工具。还处在成长阶段吗？然而成长几乎觉察不出，甚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都觉察不出。柏拉图和他的同时代人？然而如果我们更深入一步呢？在那里成长是明显的吗？

清晨5点左右就被炮击声惊醒了，多布罗沃尔斯基^①一家6点左右上街去了，谁也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屋子里很冷，还没有生火，窗子被爆炸震碎了，风从外面吹进来。我们讨论如何安排过冬。主人（杰姆琴科教授）想改用石油给房子取暖。多布罗沃尔斯基一家则想用书柜和画框上的玻璃装在窗子上。喝茶的时候我们决定卖掉我的燕尾服，有人出1000卢布——也许更多的价钱——买它。显然，最近几乎是用不着燕尾服的。

早晨7点钟就有了《基辅人报》^②，但居民从报上看不到炮击原因的报道。8点左右和娜达莎^③上了街，她去了市场。在区警察局旁边的路灯柱上贴着一张用打字机打的基辅州行政长官发布的通告，上面说城市没有危险，志愿军已转入攻势，正在追击敌人，呼吁居民保持平静。我相信，但我想基辅人不会相信。当局的欺骗太过分了，而广大居民也不相信志愿军政权的稳固性。这些天来我同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例如昨天晚上同右倾的B.A.卡拉瓦耶夫

① 基辅大学卫生学教授康斯坦丁·艾拉斯托维奇·多布罗沃尔斯基。

② 乌克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办的报纸，创刊于1864年，后来曾停刊，1919年8月由民族主义者B.B.舒尔金重新出版。

③ 维尔纳茨基的妻子娜塔莉娅·叶戈罗夫娜。

——交谈过，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

《联合报》今天开始刊登我的政治文章。汉夫曼把文章的题目换成《西方来信》（原来是《论俄国政治的国际环境》），把我的笔名也改成了“罗斯托夫”（原来是“沃洛达里”）。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令人恐惧^①。我似乎很清楚，如果我能活下来的话，我将去的地方是彼得格勒，而不是克里米亚——但在那里我会有什么遭遇呢？

我在研究有机物，研究越是深入，发现的缺陷越多。

1919年10月6日白天，星期日

几天没有动笔了，这些天在基辅经历了许多事。去了一趟达尔尼察又回来了。

记完这些没多久——几个小时后——我就不在基辅了，而当我到达达尔尼察时，我们的塔拉索夫大街^②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了。这一切是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的。从政权组织的角度来看，德拉戈米罗夫^③放弃基辅是可耻的。

1919年10月14日，星期一

基辅一片慌乱，能逃的人都逃了。在德拉戈米罗夫发布通告说居民可以安心（9月）以及不会放弃基辅以后，人们不再相信这个政权。从犹太人，乌克兰人和教授们那里传来最令人不安的消息。

① 大概是指8月28~29日逮捕“民族中心”的领导人一事，该中心联合了各反苏维埃政党和社会组织。被逮捕者中有不少是维尔纳茨基的熟人，如H.H.谢普金、C.H.梅尔古诺夫、阿斯特罗夫兄弟等。

② 维尔纳茨基在基辅的住处所在的大街。

③ 阿尔巴姆·米哈伊洛维奇·德拉戈米罗夫（1868~1956），白卫将军，1918年出任直属于邓尼金的特别会议主席，1919年9月起指挥基辅军区部队。

圣弗拉基米尔大学的演讲厅是传播这些消息的中心之一。

也许这是对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紧张的居民的情绪对整个生活都有影响。凡是能逃出去的人都逃走了。今天早晨在路上遇到 B. A. 卡拉瓦耶夫，他说，听说布尔什维克正从法斯托夫和伊尔贝尼开过来，志愿军没有进行抵抗，科学院的一个女管事告诉他，好像是一些熟悉的铁路员工来找她，求她给藏一些东西，因为过一两天布尔什维克就到这里。A. B. 福明说的更厉害。他说的也是那些事，都是坏消息。他的神经已承受不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到来。往哪儿逃呢？

从四面八方听到的都是这些消息。整个基辅到处都在传说：准备最近几天就放弃基辅，已经开始疏散。然而这些传说好像并没有真凭实据。难道还是9月份那种情况？

今天收到德拉戈米罗夫的一个邀请，请我明天中午12时30分到他那里去谈科学院的事——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

早晨，因工作需要读了马克斯韦尔的《科学论文集》第2卷中的文章。他对于生命的见解由于提出有机元素的小值及原子和分子的较大值而不同寻常，很值得重视。要知道马克斯韦尔当时尚不知晓肉眼看不到的有机体和新的大分子。

我在研究有机物，因此看了《哲学问题》杂志上刊登的卡尔波夫关于活力论的文章。我非常清晰地回想起青年时代——德里施^①和他的同伴沃尔夫和赫伯特……历史的车轮转得多快啊。B. M. 克洛波托夫^②来了。同他谈了他所开始的工作——对泥炭沼泽和泥炭植物的研究。还谈到钱的问题，谈到支持这项工作的必要性。

① 汉斯·德里施，德国生物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维尔纳茨基曾于1888年同他一起周游德国。

②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克洛波托夫（1882～1942），生物学家，乌克兰研究自然财富常设委员会工作人员。

陪着斯佩克托尔斯基的代表、工程师伦克维奇和卡利斯托夫(?)以及列瓦绍夫寄宿学校的代表(一个头脑机灵但不令人信任的、教师路易普模样的人物——不知是犹太人,还是像他说的那样是爱沙尼亚人)对科学院的楼房作了一次枯燥无味令人厌烦的视察。

委员会与科学院的出版机构召开了联席会议。已经做完的科研工作是很清楚的。乌克兰科学院第一分部将发表一些有意思的著作。看得很清楚,时间没有白过。在与会者用乌克兰语讲话的时候,我用俄语主持会议,回答他们的问题也用俄语。将来,当乌克兰—俄罗斯问题失去其尖锐性时,在基辅这里会怎么样呢?

不知为什么我不能现实地考虑基辅被放弃。莫非真会像高尔察克那样,志愿军撤退?满脑子想的都是正在经历的事情。我想到了为《联合报》写的文章(《西方来信》)。汉夫曼要求继续供稿——既想要关于斯拉夫问题的文章,也想要关于法国的文章。

1919年10月14日晚上

大家都在谈论惊慌失措。谁也不知道它的原因何在。但整个基辅都由于布尔什维克可能迅速到来而处于惊慌的情绪中。在瓦西连科^①那里看到了他的兄弟康斯坦丁·普罗科菲耶维奇(不是《基辅生活》的编辑),他认为这种惊慌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号召义务劳动去砍树被说成是去挖战壕。

在瓦西连科那里谈论了乌克兰—俄罗斯问题。决定星期五召集大家到瓦西连科家,讨论出版K.П.瓦西连科、津科夫斯基、B.基斯佳科夫斯基、B.利奇科夫、弗兰克福尔特、沃勃雷的系列批

^① 尼古拉·普罗科菲耶维奇·瓦西连科(1866~1935),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曾任乌克兰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

评文章或文集专刊的问题。以后还将扩大收录范围。我的这个思想是在达尔尼察与津科夫斯基交谈时产生的，尽管以前我也考虑过这件事。日前在俄国社会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观点：或者是乌克兰独立，或者是司徒卢威—舒尔金的主张。应当在俄罗斯社会形成与此相对立的观点。K. П. 瓦西连科建议出一本文集《罗斯—乌克兰》，起初他并不认为这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好像是作为对舒尔金的《小罗斯》的回应而提出来的。我和 Б. Л. 利奇科夫关于高等学校委员会活动的著作是最初的一部使津科夫斯基和瓦西连科产生同样意愿的著作。

苏希茨基^①率乌克兰大学代表团从罗斯托夫回来了，他对此行大体上是满意的。然而在这里，斯佩克托尔斯基曾认为代表团可能不会受到接待，甚至想过如果代表团还没走，最好就别去了！

没有尼诺奇卡^②在身边不好受。

1919年10月15日

昨天获悉叶戈罗夫^③的助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戈尔戈夫斯基的死讯……他死于痲病。这是个可爱的、有才能的人，他知道自己病情是没有希望的，慢慢地死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然试图工作。

1919年10月16日晨

他知道他将要死去，但仍然想工作。以前他对锰在有机体中的

① 费奥克季斯特·彼得罗维奇·苏希茨基（1883—1920），文学史家，时任基辅国立乌克兰大学校长。

② 尼娜·弗拉基米罗芙娜·维尔纳茨卡娅（1896—1986），维尔纳茨基的女儿，精神病医生。1922年移居布拉格，后到美国。

③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叶戈罗夫（1869—1931），化学家，教授。

作用感兴趣，后来又对地球化学产生了兴趣并听过我的课。他刚刚开始对香菇的化学成分的研究，但实验室的恶劣条件使他未能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昨天对有机物的研究进行得很好。读了博戈柳博夫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是津科夫斯基推荐的；聪明的护教论——有科学根据），还读完了克鲁泡特金论团结的著作（这是一本活跃的、激发人思想的书，尽管还没有最后加工和完成，但对思想作了难得的自由发挥）。

早晨利奇科夫和金兹堡来过，他们迟到了。我们谈了地质学委员会的事。乌克兰通报第一期出版了。妥协办法会找到的。

白天有第一分部的工作会议。苏希茨基关于古文献学委员会的报告，很有意思。大量的科学工作很有说服力——别的人能否把这件事做得这样好呢？人们不相信也瞧不起，不想知道乌克兰人在这个领域做的工作。我有时觉得，现在许多事情都取决于人的意志，如果乌克兰人意志坚强——我相信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在原地止步不前。

满脑子都是彼得格勒。我想到那里去，太想找那些朋友和亲近的人了。

汉夫曼说，《联合报》被人们称为乌克兰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今天《基辅人报》刊登了一篇严重损害格列韦尼茨^①名誉的短文，谈到他与市长里亚布佐夫^②的冲突^③。这是什么？是黑色百人团分子内部的不和，还是舒尔金完全不理解社会情绪？

① H. A. 格列韦尼茨，伯爵，基辅军区司令的民事助手。

② E. П. 里亚布佐夫，社会革命党人，基辅市长。

③ 基辅市政当局与邓尼金军事当局的冲突是由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关于解除拉德任斯基市政管理职务的命令引起的。10月18（31）日一批社会活动家集体辞职，表示对军事当局干预民政的抗议。

早晨同斯佩克托尔斯基就列瓦绍夫寄宿学校和科学院的房子问题进行了长谈。斯佩克托尔斯基这个人很怪——他很聪明，但却搜罗全城的流言蜚语并根据它们行动。他的思想缺乏清晰性，尽管他不久以前在同我谈到维舍斯拉夫采夫论费希特的著作时说过，他不喜欢这个学派（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夫戈罗采夫^①），因为他最看重思维的清晰性，而这部著作却有很多不清晰、模糊的东西。同列瓦绍夫寄宿学校的矛盾有走进死胡同的危险。斯佩克托尔斯基忘了事情是按照他的建议去做的，他指责我好像在挑唆他去要房子，然而我恰恰是按照他的建议通过委员会去办这件事的！

与德拉戈米罗夫谈了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平常的将军，感觉不到他的思想有任何活跃的搏动。他指出，当他离开罗斯托夫时，还没有任何人谈过要继续科学院的科学工作。事情很清楚，而他也是这样同邓尼金谈的：在各大学表示要设立俄罗斯科学院基辅分院以开展必须在当地进行的研究之前，只是保护财产的问题，（也许）将其移交给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他没有得到有关新的变化以及特别会议决定的任何正式通知，因此向我提出只给支持委员会工作的资金。我拒绝了。最后我们商定：我提交一份粗略的预算，他立刻给这个预算拨付15万~20万卢布。我请求他们在得到来自罗斯托夫的指示之前不要对这个预算乱加改动，看来这一点后来是照办了。显然一切都很不可靠。德拉戈米罗夫（看来部里也是这样）想大大限制委员会的权利和活动，限制科学工作。关于用乌克兰“小俄罗斯”语出版的事我对他讲了（当时在场的斯佩克托尔斯基同时说了用俄语出版的问题）。德拉戈米罗夫——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

^①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夫戈罗采夫（1866~1924），法学家、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曾参加邓尼金的特别会议的工作。1921年流亡国外。

识地——只是笼统地表示反对出版活动，认为现在不合时宜。

我觉得，我现在捍卫科学院工作的一切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我将不得不以某种形式中断努力。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我从与德拉戈米罗夫的交谈中感到，我在罗斯托夫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邓尼金与德拉戈米罗夫做出了另一个决定，而 П. И. 诺夫戈罗采夫对德拉戈米罗夫的意思作了不同的理解。

今天对有机物的研究进行得很好，总是不断地发现新的缺陷：对第二章及关于铜的章节作了润色。还研究了地球化学（改写了关于化学的部分）。

写了一篇纪念 A. A. 戈尔戈夫斯基的短文。工作中成就不多，却总是写悼词。早些时候是纳乌莫维奇死了。

生产力委员会的理事会开了会。埃斯曼斯基^① 关于派出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人去罗斯托夫的建议得到发挥。找各种各样的主管部门去要求支持。

临时委员会就视察大楼的情况开了会。列瓦绍夫寄宿学校的代表态度缓和多了，什么原因呢？

城里许多人还是不相信情况真的好转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考虑到总的局势。许多人不相信彼得格勒已被占领。

昨天，谢昆达^② 的妻子与科学院的女职员列夫·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一起来了。她对尼诺奇卡很好。她的丈夫谢昆达——一个典型的奥地利加里西亚人——被逮捕了。我想设法营救他。

① 帕维尔·马特维耶维奇·埃斯曼斯基，工程师，乌克兰自然财富研究常设委员会研究人员。

② 法捷伊·弗拉季斯拉沃维奇·谢昆达（1892—？），乌克兰科学院正字法和术语委员会技术词汇分委员会主任。

薇拉·伊万诺夫娜·波扎罗娃在吃饭。她重病在身，十分不幸，没有手也没有脚，还作了颅骨环锯手术。她曾经企图自杀。纽塔^①帮过她很大的忙，这是纽托奇卡这样的人关注的事情之一。这里需要积极的、人道的、个人的帮助。她怎么办？靠什么生活？一切都毁掉了——既没有疗养院也没有医院。过去的有钱人没有钱了，新富们对此一毛不拔。难道像她说的那样，再一次自杀？我觉得，在这件事上还是要采取积极帮助的办法。

最近几天我在读许多基辅报纸，我看到，社会好像重新摆脱了麻木不仁的状态，关于我们与外边发生的事情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地传到这里。莫非我们很快就会再次与世界联系起来？通过彼得格勒和华沙？

在一家报纸上刊登了司徒卢威在罗斯托夫的讲话。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论题——国家制定规则的做法结束了，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个人的主动精神。谁也预见不到事件的复杂进程。不久以前，当司徒卢威公布关于西方经济生活的消息时，他曾经认为，战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规范将会强化。而现在，固定的价格和布尔什维克教训了我们。

像波扎罗娃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也许每周由7个家庭轮流养活她？

1919年10月22日

屋子里很冷，大家都穿着皮袄。几乎家家都没有生火取暖。我们这里的温度只有列氏5~6度。我大部分时间待在科学院里，那

^① 纽塔和下面的纽托奇卡都是维尔纳茨基的外甥女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爱称。安娜毕业于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竖琴演奏家，在父母去世后一直住在维尔纳茨基家，1917年3月逝世。

里也不大暖和，但还能受得住，可以工作。这一切都影响到人的情绪。与此同时基辅人的情绪也很沉重，那里聚集着黑帮分子，当局试图实行自己的政策，就好像现在可以做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做的事情一样。谁也不想信德拉戈米罗夫，到处都有舒尔金、萨文科夫之类的人爬出来。

今天马伊博罗达说，征兵进行得不好，许多人逃避应征；在基辅下列这些人对志愿军的态度比其他城市差：（1）乌克兰人，（2）犹太人，（3）民主派人上。如果实行更合理的政策，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现在大家都不满意，不期望有什么好结果。

同时，人们现在的情绪更糟。冬天来临，人们离开莫斯科，许多人都想着高尔察克卷土重来，不管怎样都在谈论第二次冬季战役。今天在乌克兰报纸《言论报》（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报纸）上有一篇社论，指出了现在实行的政策所反映的小国家观念。这不是统一，而是对立。

今天召开了立宪民主党人地方委员会会议，我没有出席。会上提议布坚科^①出任市长。以前向右翼分子提议过，他们拒绝了。委员会决定他将只作为主席的副手之一，副手中有6个右翼分子，两个立宪民主党人及两个波兰人。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从另一方面看，布坚科星期日在委员会会议上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有关里亚布佐夫的事都是当局编造的。恰雷金直截了当地说，德拉戈米罗夫作了准备，但格列韦尼茨是个愚蠢的执行者。他从受到警告的省长与他的谈话中发现了这一点。

据说，波尔塔瓦不平静。那里发生了乌克兰起义——“匪帮”。政府人士在基辅等待着。斯佩克托尔斯基说，这里正准备起义，到处散发传单，等等。我认为，对基辅而言这有些夸大，但对乌克兰

^① П. А. 布坚科，取代里亚布佐夫担任基辅市长的立宪民主党人。

而言倒有许多是确实的。

我在读钱宁的梭洛^①传记。昨天读过他的长诗，枯燥无味。我想更多地了解大自然的诗人、宗教诗人和哲学诗人。现在刚刚进入我们意识的新思想很多吗？

对有机物的研究进行得很好。

我每天晚上读书。除了梭洛的传记外昨天晚上还读了拉斯维茨写的有趣的费希纳传记。也许可以把费希纳阐述的那种世界结构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这一结构和一些类似结构的糟糕之处在于，这是可能的观点，但不能够解释现实。如同两点之间有无穷无尽的线，但只有一条线是真正的、最短的。这里不是这样吗？我早就感到，可以把任何一种宗教的和哲学的观点归结为现今的每一个成就，例如可以把希腊多神教归结为现代科学。

早晨研究 M.И. 别斯梅尔特娜娅、索菲娅·约瑟福夫娜·亚尔采娃和 M.И. 乌萨诺维奇的著作——讨论分析的过程。首次在苔藓植物中找到钴。

白天开图书馆委员会会议——第三分部。很奇怪——人们走在前边是为了减少工作。B. 基斯佳科夫斯基说，走在前面是为了拯救。我想，多半是由于应力不强。沃布雷说，就合作的研究而言，“乌克兰”这一称呼是不讨人喜欢的。让他们去禁止吧，但为什么要向前走呢？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迈博罗达来过。这个可怜的人在市政府当法律顾问，生活把他紧紧地限制在条条框框里。他为失业的、挨饿的熟人寻找工作，可怕的贫困快要临头了。克雷姆斯基^② 神经不安。我想他会叛变。这是个非常不诚实的人，不

① 亨利·戴维·梭洛 (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先验主义的代表。

② 阿加凡格尔·叶菲莫维奇·克雷姆斯基 (1871~1942)，东方学家，乌克兰科学院的组织者之一，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常任秘书。

能依靠和相信他。

1919年10月23日

昨天晚上 B.И. 卢奇茨基^① 来了。他从罗斯托夫来，从那儿带来了蓬勃旺盛的情绪。他从马利亚文之流那里得到了地质委员会含糊的承认。终于有了设在基辅的地质委员会基辅小组。还将得到资金。从罗斯托夫得到的还是那个印象：谁想获得什么，谁就要在那里献出一切。不想出版乌克兰地质图——将单独出版。有什么好处？这也是一种无远见的政策。

晚上阅读莫里论科学院的著作。

早晨研究有机物。后来召开科学院委员会与生产力委员会理事会的联席会议。B.A. 基斯佳科夫斯基是个奇怪的人——小事上头脑不清而又不切实际地讲求实际。像基斯佳科夫斯基家所有的人一样，他有一个方面令人讨厌——这就是对钱财收入的关心。B.A. 基斯佳科夫斯基^② 这方面表现得比他家的其他人要少，但仍比我们圈子里一般人要多。

基辅的消息不大好。到处都是关于起义的消息。在诺索夫卡（那儿前几天发生起义了？）农民们把军官当“敌人”看待，什么也不卖给他们。在波尔塔瓦省总是出现装备很好的“匪帮”。据说洛赫维察已被斗争派^③ 拿下。昨天传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被占领——不知道是否真实。一切东西都涨价，运输线被切断。我们的房

①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卢奇茨基（1877—1949），地理学家，基辅大学教授，1945年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

② 波格丹·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基斯佳科夫斯基（1868—1920），哲学家、法学家，1919年起是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路标转换》文集作者之一。

③ 1917—1920年间的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从民主主义立场转向承认苏维埃政权，加入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后来自行解散，其大部分成员加入乌克兰共产党（布）。

间里只有列氏5度左右！

1919年10月25日

天气很冷。积了几天的雪在融化。房子里的温度是列氏3~5度。开会把我救了，会场有暖气，但也还是有点冷。基辅人处于淡漠和失望之中。寒冷，经济崩溃，涨价，又不能离开。情况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志愿军失去了一切信任。一些阶层开始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切尔尼戈夫被占领，奥廖尔和沃罗涅日近郊的失利给越来越多的基辅人提出了志愿军是否牢靠的问题。以德拉戈米罗夫为首的政权不断溃退，已经不起作用。应当迅速撤换德拉戈米罗夫……

乌克兰报界现在把正在发生的事看做暂时现象，而不是看做转折。邓尼金、彼得留拉像两个雇佣军首领站在一起，他们的理想不是创造性的……

看到周围发生的事——令人心灰意冷。漠不关心的反应——不是政府恣意妄为，而是无政府主义肆虐：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呢？

据说铁路上的混乱已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城市被匪帮洗劫……对志愿军的信任消失了，它不能把人们集合在自己周围。

我还在研究有机物。

还在读钱宁写的梭洛的传记。昨天读完了莫里论科学院的著作。今天科学院事务委员会开会。有关列瓦绍夫寄宿学校房舍和斯佩克托尔斯基行不通的村妇政策的冗长乏味的经过。有关钱的事拖了几个星期，做出了许诺，但又进行不必要的拖延。可以说一点，现在正进行管理的（机构）是如此不胜任管理，就如同在拉达时期、盖特曼时期、布尔什维克时期一样，可能也不会长久。

早晨在大学图书馆。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希洛夫采娃和卡拉瓦耶夫也在那里，后者被艰苦的生活条件折磨得痛苦不堪，想离

开这里。

听到基泽韦捷尔的死讯——是被打死的^①，血腥而可耻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我的脑际时常闪现往事，在莫斯科的感受和想法，好像是一些美好而遥远的东西。然而那时想要的东西，现在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和怪诞。

想起尼诺奇卡感到很难过。人们都想离开，去克里米亚。而杰姆琴科昨天说，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开始不断地抢劫，人们从那里纷纷外逃。

在志愿军垮台后基辅会发生什么事？应当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去彼得格勒生活？在这里，在南方工作？在……^②里也有镍。而钴与镍在苔藓植物中非常明显。

1919年10月27日，星期日

今天一整天都忙着，几乎没有人来打扰，我哪儿也不想去。

还是研究有机物。有时我觉得整个这项工作成效甚小，我也应付不了我在这项工作中所达到的规模。我不断地发现新的遗漏并确信对我的前人的成果作了错误的评价。我寻找自己想法的根源并常常能够找到——有时完全出人意料。我的想法有多少真是我的？有多少想法是从事实中或从读过的东西中产生的？其中有多少是对那些读过的或听到的东西——它们曾在我的内心引起了与别人不同的反响——的回忆？

现在，对有关生活的数量稳定性的思想而言，我一直在发现越

① 这一消息不实。基泽韦捷尔当时只是被逮捕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基泽韦捷尔（1866～1933），俄国历史学家，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22年侨居国外，任布拉格大学教授。

② 原件这里一个词无法辨认。

来越多的先行者。可以有条有理地描述具有这一思想的人物。不久以前我还觉得，这一思想在过去几乎没有痕迹，而这一看法对我而言曾是一个尺度，表明我还远未掌握我的前人的成果。这个思想没有历史吗？谁也没有始终一贯地实行这个思想吗？它对人的思维产生过我从中看到的那种影响吗？而现在有布丰、冯·贝尔、弗洛朗斯、阿加西斯、冯·哈特曼、普赖耶尔，大概还有许多其他人。以前我好像读过普赖耶尔的著作。你会在自己的认识和表述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不足。

这些日子我阅读稍多一些。但房间里很冷，只有列氏3~4度，我只是在家里吃饭和睡觉，此外就去科学院躲避挨冻。但今天这里也很冷。昨天读了苏利·普吕多姆的著作——绝妙的诗歌形式。一种深刻思想的展示尝试。也可能是—种完整世界观的学说。昨天还读了拉斯维茨关于费希纳的著作。今天读了钱宁关于梭洛的著作和哈特曼^①的无意识与遗传理论。很早以前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彼得伦凯维奇^②就说服我读哈特曼的著作。彼得伦凯维奇是一个聪明人，他有一段时间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哲学，后来放弃了，过自己的日子去了。作为智者，哈特曼是确信自己力量不足，还是认为除感情以外一切皆空？我将在这里，从他的著作中寻找他的思想。

1919年11月2日，科学院，弗拉基米尔大街56号

天气很冷，暴风雪。因为冷（塔拉索夫斯基大街上的房子温度只有摄氏2~3度），我来到科学院我的房间，这里很暖和，可以工作。

① 爱·哈特曼，德国学者。他的著作多次在俄国出版。

②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彼得伦凯维奇是立宪民主党主席伊·伊·彼得伦凯维奇的儿子，他为C.B.帕宁伯爵管理在加斯普拉的领地。

周围人们的情绪沉重而惊慌。生活变得越来越坏。凡是有可能的人都纷纷离开或把家迁出基辅。既不相信局势的可靠性，也不相信志愿军……

然而我觉得，庸人倾向开始抬头了？也许这仅仅是感觉而已。今天《基辅思想》上的一篇文章说，明年可能发生饥荒，这与安齐费罗夫在哈尔科夫的演讲是有联系的。这是在很长时间里不同城市共同工作的第一次表现。生活完全分散化了。

还在研究有机物。读马克斯韦尔的著作——更确切地说是重读他那些论述原子、分子、引力的深刻文章。异常清楚思想和出色的论证。即便是在承认创始者上帝本身这个意义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论证。马克斯韦尔的一个论据这几十年已不成立：物质是由“虚无”造成的。现在，物质的产生（和分解）对于我们来说是可能的，无须承认上帝的存在。原子的质量和数量守恒这个基本论点也发生了动摇。

早晨委员会开会。分配了总委员会理事会拨给的25万卢布。在《基辅人报》上刊登了取消乌克兰科学院的消息。斯佩克托尔斯基发了一个充满不信任的模棱两可的文件。而在口头上他对B.基斯佳科夫斯基说的是另一套。可以相信他吗？我很怀疑。

白天出席了乌克兰历史—哲学学会纪念斯科沃罗达^①的会议。很多人在一个寒冷的没有生火的讲堂里都注意地听。所有的人都穿着皮袄、靴鞋，戴着手套。斯科沃罗达的形象表现得很鲜明。津科夫斯基特别着力地推出了这个形象。确实，这个产生于农奴制正在形成、哥萨克进行反抗的形势下的宗教哲学思想成果是非常有趣的。这位哲学家是个流浪的乡村教师，是个像哲人一样生活的人。

^① 格里戈里·萨维奇·斯科沃罗达（1722—1794），乌克兰宗教哲学家，诗人，教育家。

我认为，尽管有许多言过其实的地方，但津科夫斯基的说明是很有意思的。津科夫斯基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俄国社会的一部哲学巨著。隐蔽的和未知的东西在这里开始变得清楚了。新的东西被发现，如同在艺术中一样。一个伟大民族开始觉醒。

瓦西连科来了。他带来了钱（我逐渐地欠债——在物价腾贵的情况下无以为生）。我同他谈了组织社会小组的必要性。他强烈主张倾向德国，认为尽力建立与工商界紧密联系的组织是不可避免的。他把工商界看做救星并认为他们是生活的组织者。我认为，毫无疑问现在组织社会小组才是出路。谈到了格沃兹杰夫和合作社工作者。他不想马上邀请格沃兹杰夫。他谈到，在右翼分子中开始出现反对保留德拉戈米罗夫和戈列韦尼茨的运动。我们还谈了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报告。

哈尔科夫，1919年11月17/30日，星期日

我们去罗斯托夫，路上已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基辅一片慌乱，哈尔科夫也是一片慌乱。好不容易到了哈尔科夫。今天又传来苏梅被占领以及志愿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我们乘坐的是取暖车厢。本来应当星期四动身，推迟到星期六，正赶上撤离。偶然搭上了兵站的军列，就这样到了哈尔科夫。往下怎么走？

车厢是那种有24个铺位的式样的。同行的有B.A. 基斯佳科夫斯基（一个天真的个人主义者和有点胆小的人）、B.A. 卡拉瓦耶夫、Э.К. 哈尔夫、H.M. 亚尼茨基和夫人、律师B.C. 佐托夫、帕什凯维奇教授和夫人、格里戈里耶娃姊妹（K.B. 及其生病的妻子、助教沙波什尼科夫的姐妹）、B.И. 卢奇茨基、C.П. 季莫申科及父母、Ф.П. 苏希茨基、H.П. 瓦西连科、多布罗沃尔斯基、П.М. 杰夫曼斯基、B.И. 科斯特科、Г.Г. 德梅茨及夫人。娜塔

沙与普拉斯科维娅·基里洛夫娜一起被送到波尔塔瓦，季莫申科的老人在克列缅丘格下了车，帕什凯维奇夫妇、科先科、卡拉瓦耶夫夫妇在哈尔科夫下了车。我们一路同行，友好相处。车厢内不能工作，因为人声嘈杂，光线不足，话声不断。但我同 H. II. 瓦西连科和 C. II. 季莫申科常常就共同感兴趣的题目进行有趣的谈话。我在读华莱士关于热带大自然的考察记的德文译本，戈顿的书《自然科学家在拉普拉塔》我已经读完了。

昨天与 H. II. 瓦西连科就动物博物馆的任务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想搞一个大的动物博物馆，不是地方性的，而是类似于彼得格勒动物博物馆那样的，但属于其他专业性质，不是古代北极动物群，而是别的什么动物。将出现在俄罗斯领土上的科学院各动物博物馆应当相互补充，应当搞成这样：无须出俄罗斯就可进行动物学方面的科学研究。瓦西连科强烈反对，为其关于基辅的作用的一贯思想辩护。关于未来的基辅博物馆的性质是专门展示当地动物群和热带动物群的博物馆这一点，我早就说过，例如与卡拉瓦耶夫交谈时就说过。这个博物馆不应是彼得格勒博物馆的翻版。

难道会发生崩溃，像高尔察克的崩溃那样？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有时觉得，如果布尔什维克声明他们停止恐怖手段和非常措施，那么广泛的居民阶层都会同他们站在一起，起码知识分子阶层会这样。

昨天讨论了在罗斯托夫召开有乌克兰自然财富和俄国生产力委员会与工业家、工程师等等参加的重建俄国的会议的问题。我们把煤和燃料问题放在首位。

哈尔科夫，1919年11月18日

昨天晚上，多亏 C. II. 季莫申科联系，得知可以乘第一班兵站

列车去罗斯托夫。星期三早晨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帕利延科^①那里，生病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夫戈罗采夫也在那里。我在他们那里过了夜。帕利延科非常可爱的妻子（伊丽莎白·帕夫洛夫娜）盛情相邀，所以我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在逃亡，哈尔科夫也是一片慌乱。哈尔科夫有可能放弃，因为兵力不足，尽管有部队开来，但不知道谁的援军先到。人们认为放弃哈尔科夫会危及煤矿地区，对志愿军而言几乎是灾难性的。从11月15日起志愿军的进攻本应开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夫戈罗采夫〕指出，迄今为止邓尼金得以实施全部这种战术步骤。看来，由于铁路员工在后方破坏桥梁，在谢夫斯克近郊已经遭到失利。无所作为、沉湎于酒色的马伊-马耶夫斯基没有在自己的岗位上，被撤了职。现在哈尔科夫的前途取决于大战的结局。晚上波戈金带来了志愿军攻占苏梅和奥斯诺夫车站的乐观传闻，但传闻是不足信的。

从哈尔科夫逃出来的克柳恰廖夫一家也想进我们的车厢，帕利延科要留他们，不留是不行的。

很清楚，在地方上组织政权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不能再〔信任〕那些老的省长和总督。某种类似顿河和库班地区的东西是必需的。立即组织地方政权。与哈尔科夫、奥德萨、基辅的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作斗争的最好形式。

塔拉诺夫斯基^②和帕利延科谈了关于科学院被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接受的情况。终于被接受了。并且用乌克兰文印出来了。我认为会组织起来。只是要保留已经开始的科学工作。学者们的独立性是必要的。我与季莫申科关于在罗斯托夫召开基辅和彼得格勒的

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帕利延科（1869—1937），法学家，哈尔科夫大学教授。

②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塔拉诺夫斯基（1875—1936），法律史专家，华沙大学和捷尔普特大学教授。

科学院生产力委员会成员会议的计划变得清楚了。季莫申科关于出版南俄生产力问题的文集的想法是正确的。我想通过奥斯瓦格进行。

与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夫戈罗采夫]和其他教授谈论过基辅政权不可能存在的问题，谈论过诸如委任比利莫维奇^①这样的错误。П.И. [诺夫戈罗采夫]为后者辩护。他指出，比利莫维奇在奥德萨的时候，面对大地主的贪欲曾对他说过，自己拥护地主所有制，但考虑到政治局势以及俄罗斯地主土地占有制代表人物的作为，自己的观点就开始剧烈动摇了。

П.И. [诺夫戈罗采夫]仍然认为，恢复强有力的君主政权是不可避免的。

谈到了波兰。在这个问题上，如德梅茨这样的人，认为可以答应波兰许多条件（甚至领土）以便在目前时期得到它的帮助，有些人期待靠波兰的帮助而获救。但另一些人，如 П.И.（诺夫戈罗采夫），则清楚地认识到波兰在俄国和德国之间所奉行的政策是极不理智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将再次变得强大起来。波兰人在利用俄国的虚弱和分裂。难道在哈尔科夫城下果真会遭受失利，布尔什维克将在这里获得支持，而志愿军会以灾难告终？

又想起了纽托奇卡。一切都这样清晰。E.Д. 列武茨卡娅^②怎么样了？最近几天总想起她。П.И. [诺夫戈罗采夫]告诉了我们关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奥尔登堡]^③被捕的消息。难道灾难

①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比利莫维奇（1869～1963），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1919年9月出任邓尼金特别会议农业和土地规划局局长。1920年流亡国外。

② 维尔纳茨基的学生，矿物学家。

③ 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奥尔登堡（1863～1934），维尔纳茨基大学时代的朋友，俄罗斯科学院的常任秘书，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9年9月因“民族中心”案而被苏维埃政权逮捕。

也到这里了？

11月19日

我在帕利延科那里过了夜。雅罗斯拉夫尔的老朋友沙霍夫斯科伊^①夫妇在那里。大家谈起舒拉、娜塔沙、伊柳沙、阿娜（沙霍夫斯科伊家的），谈起那个很久以前经历的旧时代。

恰普雷金^②躲起来了。很幸运。然而现在莫斯科的人们经受着什么呢？

在哈尔科夫，慌乱日益加剧，好像一团东西压在心头。有利的传说也没有产生反应。肯定将有部队开到。在工艺学院、商学院和其他地方都在为士兵腾房子。仅工艺学院一处就要安置2000人。昨天进城的是车臣人（捷列克河的哥萨克？）。毫无疑问，邓尼金不想放弃哈尔科夫——他一周半以前还在这里。放弃哈尔科夫就意味着某种灾难。所有教授都想逃离，流传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关于黑名单的流言。

帕利延科的女儿同我们一起走。帕利延科与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诺夫戈罗采夫]坐邓尼金的车去罗斯托夫。买去罗斯托夫和辛菲罗波尔的车票需要很多钱。由于恐慌情况的加剧，票价也在上涨。

昨天见到K.A. 克拉苏斯基、Д.И. 巴加列依、A.B. 马克列佐夫。马克列佐夫和巴加列依同我们一起走。

同许多人士谈了自治和组织政权的问题。П.И. [诺夫戈罗采

①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沙霍夫斯科伊（1862～1939），维尔纳茨基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

②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恰普雷金（1869～1942），机械专家，1929年起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维尔纳茨基这里提到他是与莫斯科正在逮捕人的消息有关系的。

夫]的构想还不清楚。瓦西连科非常明确地主张以基辅为中心的乌克兰。我清楚地感到这个方案全是人为的。支持这个方案的“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能够独立思考的阶层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有一次，在基辅的一个会议上，他在小范围内谈过加拿大类型的自治。他后来在同我谈话时承认，这是他一时激动才说的。我觉得在哈尔科夫、基辅和奥德萨之间没有联系。克拉苏斯基在谈话中也确认这一点。

哈尔科夫的乌克兰运动，用巴加列依的话来说，是“温室中培育出来的”。报纸自行关闭了。昨天我与一位有趣的铁路职员同行。在我说了自己从基辅来以后，他同我谈了起来，路上还详细打听了彼得留拉等人。最后他像我一样，指出彼得留拉分子和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只是乌克兰人中的一些小团体，但现在盛行对自己人的爱，他指的是把谢甫琴科的肖像从省自治机关搬出来（他把自治机关主席阿基莫夫的去职与此事联系起来）。他谈到了乌克兰中学的成就（募集了150万政府资助，而以前只有30万），还谈到职员中间发生的纠纷，等等。这是来自社会底层寻求和解的人们。在实行正确的乌克兰政策时可以而且应当依靠他们。

同И.П. [诺夫戈罗采夫]就自治和政权的组织进行了长谈。他认为实行严厉的君主制度是不可避免的。我很担心他主张的自治最终会变成将军-总督制。

帕利延科谈到了辛科·别列尼基和П.戈卢霍维奇等几个加利奇人。他们是坚决的亲俄派，但拥护联邦或加利奇自治。他们同邓尼金进行了会谈并指出在加利奇人中亲俄倾向日益增强。看来，不是斯维亚托戈尔^①式的人？他们预言加利奇人为150万卢布政府资助会转向志愿军。他们谈到，驻意大利的4万人的加里西亚军团

^① 俄罗斯壮士歌中的英雄，力大无穷的勇士。

将转归邓尼金指挥。邓尼金在与他们的会谈中指出，他站在所有俄罗斯土地统一的立场上，也不会把加里西亚交给波兰人。看来问题涉及的是联邦或广泛自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不是斯维亚托戈尔式的人，而是务实的政治家？

现在混乱更加严重，已带有狂热的性质。莫非这是军队中情绪的反映？出路何在？

知识分子阶层准备去做一切：与波兰人达成任何协议；亲德情绪迅速增长——准备牺牲整个高加索、克里米亚，只要能摆脱布尔什维克就行。

像瓦西连科这样的亲德派，一切都在所不计，并认为没有外部力量我们就不能得救。今天，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谈论与德国结盟、与波兰人签订协定。你一提这将丧失领土，人们就说过4~5年，只要俄国强大起来，全都能收回来。人们已经疲倦了，所以抓住最后的东西不放。今天布勃利克也同我谈起了与德国签订协定的问题，我是在“比斯开斯基”餐厅遇见他的。他说，以前他一直是个敌视德国的人，但现在面临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得与随便什么人联合起来，只要能赶走布尔什维克就行。

已开始“疏散”哈尔科夫的居民。正在离去的人们绝望地看待这次疏散，心里想的是他们不会回来了。现在同这些人无法认真地谈任何确定的东西和任何事情。

我去过大学。那里的人现在更加不安，因为撤离已开始了。

【专题说明】

农村的十月革命和贫农委员会

(1919年3月)

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始于1918年春天。由于粮食供应极端紧张，苏维埃政权于5月9日颁布了粮食专卖法令，规定农民必须把全部余粮在一周内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否则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紧接着，又派遣武装的征粮队开赴农村，组织贫农委员会领导农村的革命。农村局势日趋紧张。连许多布尔什维克也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贫农委员会的行动是充满暴力的，他们对富裕农民，包括中农，实行剥夺，并把剥夺来的东西据为己有。武装的征粮队派到农村，更使政权直接同农民处于对立状态。1918年秋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政府不得不于1918年年底解散了贫农委员会，同时调动精锐的武装力量如军校学员、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部队、内务部队、特种部队等来对付农民的反抗。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著名红军将领都曾被派去指挥镇压行动。这是无产阶级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战争。仅在1918年内，就有约5000名肃反人员和4500名征粮队员丧生，而农民的死亡人数更要多得多。沃洛格达省农民的告状信反映了贫农委员会的作为以及农村状况。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对这封信十分重视，提出了纠正措施并表达了对送信人命运的关注。本专题收录了沃洛格达省农民的告状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2卷

克鲁普斯卡娅致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的信、列宁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便函以及彼得罗夫斯基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信等文件。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No 07292

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库尔班戈乡

农民给列宁的信

(1919年3月)

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列宁委员

我们是农民劳动者——中农和贫农，我们从来就不是资产者、投机者、酒鬼、小偷、懒汉寄生虫，无论他们属于上层阶级或是底层阶级，但是您现在庇护他们并把生死攸关的国家改造重任委托给他们。我们一辈子两手不停、不知疲倦地干活。我们，只有我们，用双肩担负了国家和社会的重担和需求。富人耍心眼，花钱逃避国家和社会的捐税；而懒汉又交不出什么，他们因为懒惰而抛弃了土地和农活，一点不学好，游手好闲，偷盗赌博，全靠我们干活养活。您正是把信任和政权给了这些人。他们在地方当权，从来都不尽力提高和改善人民的劳动水平，而只管掠夺和没收靠艰苦不懈的劳动和节俭积攒起来的财富。要知道这些大喊大叫的懒汉也欺负贫农劳动者。他们的懒散和专横做法使我们都怨恨您。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您。您为什么庇护懒汉和坏蛋，并且通过他们进攻我们劳动者呢？我们贫农劳动者和中农劳动者给您写信，请您不要剥夺我们的劳动，而要迫使那些投机的懒汉干活，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富于体力和青春。

我们请您迫使他们干活，是因为道德说教对他们不管用（像寓言中厨师教育猫不吃腥一样）。本性勤快的人用不着逼，他们自己就想干活。拿涅克拉索夫村的4户为例：第一户是库利欣家，他家

有三块份地，7个能干活的壮劳力，但扔了土地和房子到处跑，当叫花子要饭吃；另一户是科斯丘年科家，他家2口人（51岁），没地没房子，租了第一家扔下的地种，施上肥料，种上了庄稼；第三户（索洛维约夫家）有3块份地，7个壮劳力，呆在家里，赌博，睡懒觉，既没有牲口也没有粮食；第四户（奥布拉兹佐娃），一个女人拖着一帮年幼的孩子以及老人，自己种地，自己干所有其他的活。为什么库利欣家和索洛维约夫家认为自己是贫农，而把科斯丘年科家和奥勃拉兹佐娃看做是资产阶级？来了人，没收了他们两家的粮食和牲口——牛和马，后来又向他们征税，要他们缴纳各种捐税（国税）。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如果认真查看，详细调查大家的生活，那么，这些懒汉穷人比我们富一千倍。其实，农民的财富是靠节俭积攒的。哪里还有公正啊。没有公正。

涅克拉索夫村中农和贫农劳动者代表：

尼古拉·莫尔恰诺夫，

瓦西里·索洛维约夫因不认字由 A. 奥勃拉兹佐夫代签，

佩拉盖娅·奥布拉兹佐娃，

亚历山大·卡恰诺夫

谢科托夫村中农和贫农劳动者代表（签名）

博利沙亚村中农和贫农劳动者代表（签名）

涅利托夫村（签名）

苏克马尼察村（签名）

科贝洛瓦亚村（签名）

等等。

№07293

克鲁普斯卡娅^① 就农村问题

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信

(不晚于 1919 年 3 月 22 日)

亲爱的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②：

前几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 V. II. 莫斯塔科娃送来的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一些农民的告状信转给了您。我让莫斯塔科娃去找您。

她回来时非常伤心，说您以同志式的态度和她谈话，可其他人都说这些农民是富农，说莫斯塔科娃本人也支持富农，因为她在别斯图热夫培训班呆过。

我早就认识莫斯塔科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为了上中学，她 11 岁就离开父亲去了卡德尼科夫城，她一直在那里生活，得不到父亲的一点帮助。挨过饿，生过病，课余打工挣点钱，老师们也多少给点帮助。在培训班上，上司老是把她当乡下女人，欺负她；她和上司一直不睦。不过，奇怪的是她至今还是个有农民思想、为农民操心的农村妇女。那里的贫农委员会欺负他们。说这话的人可能是富农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贫农委员会的横行不法、为非作歹也毕竟是事实。就其组成看，他们不是最贫苦的农民，而是当地一些

①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1898 年加入俄社会民主工党，弗·伊·列宁的夫人。十月革命后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委会委员。

②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1878～1958），1898 年加入俄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9 年任内务人民委员。

不干农活的人。那里有躲藏在农村的莫斯科暗探，过去的门卫、家丁，还有反革命知识分子，他们都蜂拥到农村，进了贫农委员会。天天都有外省来的工人、农民以及我们共产党员讲这些事，而他们同“贫农委员会”与中农之间的斗争没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我也深信，很大一部分所谓“富农”暴动发生的原因就是这些任用负责人员的“委员会”自行其是，不受监督。他们打着“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旗号，处处树敌，把希望撤换“委员会”任用的人与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混为一谈。

我觉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足够多的论据，要求改变我们对中农的态度，要求党的负责干部向选民汇报工作。莫斯塔科娃现在担心，不是给他们那里派去监察组以便公正地揭露真相，而是派遣讨伐队去镇压决定向列宁求助的农民，或者通知地方当局去迫害他们。

对敢于向列宁告发地方上无法无天的人进行迫害的事例，在各地屡见不鲜。因此，我恳请您务必谨慎处理此事。

请原谅我打扰您，但是这些“贫农委员会”现在经常让人感到痛苦，因为你看到农村不是在组织新生活，而是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分裂。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乌里扬诺娃

№07294

列宁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便函

(不晚于 1919 年 3 月 22 日)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

请您发出这份电报^① 或类似的电报，或指示通过省执行委员会进行审查。^②

列 宁

① 这里指的是由克鲁普斯卡娅所拟的如下电文：“致沃洛格达州卡德尼科夫县卡拉班戈乡苏维埃。请在所有村庄立即编制苏维埃选举的选民名单，应将中农列入，只有众所周知的富农才排除在外。在编制名单之后，应重新组织苏维埃选举。对此将进行检查。不能正确编制选民名单者将承担责任。”

② 列宁的这段文字是写在克鲁普斯卡娅草拟的电报稿上的。——这段文字已收入《列宁全集》俄文版，莫斯科，1965，第 50 卷，第 270 页。

№11617

列宁致彼得罗夫斯基的便函

(1919年3月22日至27日之间)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如果普拉夫金^①责骂她^②支持富农、是富农的朋友这一情况属实，必须狠狠地训斥他。您别放过他，要严加管教，他有愚蠢地“发号施令”的嗜好。必须杜绝这类现象。

列 宁

① 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

② 指递送沃洛格达农民告状信的У.П.莫斯塔科娃。

№ 07295

彼得罗夫斯基给韦托什金的批示^①

(1919年3月27日)

亲爱的同志！现将此信转给您。我认为，情况要比我转给您那些农民的呈文副本时我们所认为的更复杂些。不过，莫斯塔科娃没有造成那种从对她的鉴定中应该得出的印象。

因下面有列宁同志的附言——我在附言下面划了线，请您专门指定人员调查此事，派一名精明能干的同志向列宁同志汇报。也许这里有我们对中农的方针。总之，应当研究事实。

致以同志的敬意。

彼得罗夫斯基

^① 这一批示是写在克鲁普斯卡娅的来信上的。

【专题说明】

列宁与罗日科夫 关于粮食政策问题的通信

(1919年1月)

1918年春夏之交，城市粮食供应几乎断绝，争取粮食的斗争成了拯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10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实行粮食专卖，绝对禁止私人粮食贸易，要求每个粮食所有者都必须把除去种子和规定标准的口粮之外的所有余粮在一周内交给国家，否则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武装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是执行这一粮食政策的主要手段。1918年11月，开始对更多的日用品如食糖、糖果、茶叶、食盐、火柴、布匹、靴鞋、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禁止私人买卖。为了保证对军队和城市的供应。根据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初颁布的法令，国家需要的粮食和谷物饲料都摊派给各省，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数量和价格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摊派粮按阶级原则落实到户，主要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在实际执行中，从农民手中拿走的不仅是全部余粮，也包括一部分他们生活和生产必需的粮食，而且大部分是无偿的。对不愿交出粮食的农民采取了各种强制措施，包括没收财产，逮捕判刑。严厉的粮食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正是在这一

列宁与罗日科夫关于粮食政策问题的通信

背景之下，罗日科夫给列宁写信谈了他对粮食政策的看法。而列宁在回信中则解释了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依据。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07290

罗日科夫^① 致列宁的信

(1919年1月11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给您写这封信并非因为希望您倾听并且理解我的意见，而是因为看到我感到绝望的形势而无法沉默，应当尽一切可能，作一番甚至无望的尝试。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粮食状况，已经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在日益恶化。可怕的末日大灾难正在迫近。现在我不从一般经济方面谈大灾难的原因，倘若您希望听的话，我可以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暂时只谈粮食问题。粮食状况非常严峻，例如，彼得格勒半数居民注定要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任何武装干涉和白卫军不直接威胁您，您的政权也保不住。您对拦截部队的威胁无济于事：全国一片无政府状态，人们不畏惧您，也不听您摆布。即使听您摆布，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的粮食政策是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的。倘若政府能向居民供应足够数量的粮食的话，谁还会反对国家对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实行垄断？但是，这显然不可能。这一点您现在办不到，而且以后也办不到。不要拿自己的生死存亡冒险，不要让自己对明显无望的事情承担责任。

保留您的供应机构，继续使用它们，但是不要对任何一种食品的贸易——即使是粮食贸易——都实行垄断。尽您的能力供应，但

^①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1868～1929），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临时政府邮电部副部长（1917年5～7月）。20年代初曾两度被捕。

是允许完全自由的贸易，强制性地要求各地苏维埃取消一切对输入输出的禁令，撤消所有的拦截部队，必要的话甚至用武力撤消。没有私人贸易主动性的协助，无论是您还是任何人别的人都无法应付不可避免的灾难。如果您不做这件事，那么您的敌人会做。在二十世纪，没法把一个国家变成由封闭的地方市场组成的混合体。这在我们的中世纪——那时在目前的苏维埃俄国范围内的居民不到现在的二十分之一——是自然的。但现在这样做极其荒唐。我与您的分歧太大了。也许，甚至很可能无法相互理解。不过，我认为局面到了只有您的个人专制才能力挽狂澜、从反革命专制者手中夺回政权的地步，但是反革命专制者不会像仍在荒唐地没收农民土地的沙皇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那般愚蠢。暂时还没有这样聪明的专制者。不过会有的：乱世出枭雄。必须把专制权力从他手中夺过来。这一点现在只有您能够做得到，您有这样的威望和能量。必须刻不容缓地去做这件事，首先从最尖锐的粮食问题入手。否则，死路一条。但是，当然不能仅限于此。必须本着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制定整个经济政策。而为此又需要专制。让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您非常权力吧。正是为“此”，首先需要经济方面的非常权力，然后是与此相关的所有其他政策方面的非常权力。如果您愿意，这个问题我下次再写。是否必要，由您定夺。我觉得我这封堂吉诃德式的信似乎是可笑的。致以敬意。

倘若如此，就让它成为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吧。

№07291

列宁致罗日科夫的信

(1919年1月29日)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很高兴收到您的信，并非因为内容，而是由于为苏维埃工作的共同的实际基础，我希望建立密切的关系。

形势不是绝望，而只是困难。由于在南部和东部战胜了反革命分子，改善粮食状况现在大有希望。应当考虑的不是贸易自由，经济工作者应当明白，在必需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无异于疯狂野蛮的投机，无异于富人战胜穷人。不应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转折是困难的，但绝望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明智的。如果党外知识分子和接近党的知识分子不是讨论自由贸易，而是组成各种紧急小组或者联合会，在粮食问题上提供全面帮助，他们就会非常有助于事业，他们就会缓解饥荒。关于“个人专制”，请原谅我的表述，完全是废话。国家机器已经非常强大，有些方面已经（过分）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专制”（根本）不能实现，试图搞“个人专制”只会造成危害。

知识分子中的转折开始了。德国的国内战争以及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德国的这场斗争给了而且还会给甚至最顽固的知识分子以深刻印象。旁观者看得更清。Nul n'est prophete en son paye（预言家在自己的国家不灵验）。

而在我们俄国，人们曾经认为，这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野蛮而已”。而现在，历史〔表明〕，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知识分子将不得不转到帮助工人的立场上来，即站到苏维埃的立场上来。我想，到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各种团体、组织、委员会、自由联合会和大大小小的小组就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要求在最困难的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分娩的痛苦就会减少几个月，就会减轻。尽管分娩非常痛苦，但它是一件大快人心而且富有生命力的事情。顺致问候！

【专题说明】

俄共（布）中央 对哥萨克的处理意见

（1919年1月至4月）

哥萨克是在俄国农奴制建立过程中、在边疆地区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18世纪，沙皇政权使哥萨克归顺并使之成为军人特权阶层，利用其戍边征战。20世纪初，俄国共有11支哥萨克军（顿河、库班、奥伦堡、外贝加尔、捷列克、西伯利亚、乌拉尔、阿斯特拉罕、谢米列奇耶、阿穆尔、乌苏里）。1916年，哥萨克居民共有440多万人，土地6300万俄亩。约有30万哥萨克军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方面给予哥萨克自治，允许他们选举产生苏维埃政权，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发布关于优待哥萨克的法令等；另一方面，在与哥萨克白军的斗争中，也经常连带地把劳动哥萨克作为打击对象。1919年初，由于红军在与哥萨克白军的军事行动中占据了优势，中央决定开始实行“非哥萨克化”政策，大规模地从肉体上消灭哥萨克。这一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引发了从维申斯克开始的顿河哥萨克暴动。参加暴动的约有3万人，基本上都是哥萨克中农。一些红军官兵也转向暴动者一边。南方战线派出了正规步兵和骑兵部队镇压暴动。4月下旬，中央决定在对哥萨克人

俄共（布）中央对哥萨克的处理意见

采取镇压措施的同时，组织从俄罗斯中部向哥萨克地区移民，并武装邻近地区的农民同哥萨克斗争。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1919年5月，红军在与哥萨克作战中连遭失败，先后放弃了顿河地区、顿巴斯、哈尔科夫、别尔戈罗德、巴拉绍夫和察里津。本组文件收录了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对哥萨克实行大规模恐怖的通知及其后中央全会关于暂缓采取对哥萨克的措施的决定摘要、中央组织局讨论顿河地区局势的会议记录以及做出的相应决定等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俄共中央消灭哥萨克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这一政策的后果以及稍后的政策调整和补充措施。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翻译）

№07298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对哥萨克态度的通知

（1919年1月24日）

秘密

通 知

哥萨克地区各战线最近的局势——我们正在向哥萨克居民区纵深推进，而哥萨克部队正在瓦解——使我们必须向党的工作人员发出指示，说明他们在上述地区恢复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时的工作性质。必须借鉴国内战争期间对付哥萨克的经验，承认以逐个消灭的方式毫不留情地同整个哥萨克上层作斗争是惟一正确的做法。不容许有任何妥协和任何犹豫。因此，必须：

1. 对富裕哥萨克实行群众性恐怖，将其悉数消灭；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实行毫不留情的群众性恐怖。对中层哥萨克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其不再有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企图。

2. 没收粮食，把所有多余物资——既包括粮食，也包括所有其他农产品——强制送往指定地点。

3. 采取一切措施帮助迁居此地的外来贫农，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移民。

4. 使外来的非哥萨克移民在土地和其他方面与哥萨克平等。

俄共（布）中央对哥萨克的处理意见

5. 彻底收缴武器，凡逾期不缴者，一经发现，一律枪毙。
6. 只向可靠的非哥萨克人发放武器。
7. 武装工作队留驻哥萨克村镇，直至完全建立秩序。
8. 任命到各哥萨克居住区的所有政治委员要表现出最大的坚定性，毫不动摇地执行本指示。

中央决定，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通过相应的苏维埃机构迅速制定实际措施，组织贫农大规模迁居哥萨克地区。

俄共中央委员会

№07299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暂缓采取 对哥萨克的措施的决定摘录

（1919年3月16日）

听取发言：

……索柯里尼科夫同志提出了中央关于哥萨克的决定的问题，他指出，这一决定对顿河哥萨克无法执行，在顿河州，南北部情况截然不同，这使得我们没有必要干预。奥伦堡哥萨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同样的形势。

提出了关于没有任命顿河地区五人小组的问题^①。

决定：鉴于顿河地区南北部哥萨克明显分裂，由于北部哥萨克可能协助我们，我们暂缓对哥萨克采取措施，以免妨碍他们的分化。本决定同样适用于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但南北对抗的内容除外，因为乌拉尔斯克不存在这种情况。

关于顿河地区五人小组问题，提交中央局……

^① 进入俄共（布）顿河局五人小组的顿河局成员没有确定。

№07300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 关于顿河地区形势的讨论记录

（1919年4月22日）

1. 瑟尔佐夫^①同志通报了顿河地区的形势以及维尔申斯克^②等地哥萨克暴动的情况。部分哥萨克和农民没有参加暴动。暴动者的政治纲领是：“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反对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目前暴动者已经被包围。梅德维季察和霍彼尔斯克地区的哥萨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不好，但不积极反对共产党人。米罗诺夫哥萨克师的表现显得可疑。

瑟尔佐夫同志建议：对南部反革命哥萨克实行恐怖；从俄罗斯中部移民到哥萨克村庄；在米列罗沃区进行动员，武装农民。

解脱顿河局代表所承担的苏维埃工作。在米列罗沃成立罗斯托夫省民政管理中心，然后再在卡缅省成立这样的机构。

充实顿河局。

备案

通过瑟尔佐夫同志的建议和顿河局关于对哥萨克态度的决议。对顿河局的决议作如下补充：进行动员，武装移居到哥萨克地区的农民。

①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尔佐夫（1893—1937），1913年加入俄社会民主工党。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民政局局长，俄共（布）顿河局成员（1919）。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30）。1930年企图罢免约·维·斯大林的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职务。后被镇压。

② 原文如此。应为维申斯克。

责成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与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谈成立民政局问题。

沙布利耶夫斯基同志进入顿河局。

【专题说明】

高尔基谈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一）

（1919年10月至1933年2月）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作为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利用自己的声望以及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特殊关系，对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建设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专题收录的高尔基给高层领导人的8封信的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呼吁，要求纠正政权机关所犯的错误；二是对宣传、报刊、出版等方面的工作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建议。这些文件不仅反映了相关时期内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气氛，也为深入研究高尔基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王丽华、项国兰、刘明翻译）

№06561

高尔基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 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19年10月6日)

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约·捷尔任斯基^①

请您接见军医学院院长弗·尼·通科夫教授^②，并听听他的意见。

他想就逮捕科研人员问题和您谈谈。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给弗·伊·列宁写了一封信，我想，他会把这封信的内容^③告诉您的。

如果他没告诉您，那么现在由我来告诉您，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我在信的结尾声明，苏维埃政权正

① 弗·埃·捷尔任斯基也叫“约·捷尔任斯基”，约瑟夫是捷尔任斯基的党内化名。

② 通科夫，弗·尼·(1872~1954)，苏联解剖学家。1917~1925年任军医学院院长。曾多次受到列宁接见，商讨改善学者生活问题。

③ 列宁于1919年9月11日以前收到了高尔基的信，他在9月15日的复信中写道：“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已接见了通科夫，早在接见他和接到您的来信之前，我们中央委员会就已决定委派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去审查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捕案并释放可以释放的人。因为我们清楚，这方面也发生过一些错误。

同样很明显：总的说来，逮捕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87页）接着列宁强调指出：“……我们知道，亲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往往给阴谋分子提供援助。这是事实。”（同上，第88~89页）

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①。

马·高尔基

1919年10月6日

① 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列宁本人在1919年不止一次地审查过高尔基为被捕者提出的申请，释放了一些被捕者。例如：1919年10月2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释放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H.A. 什克洛夫斯卡娅-德沃列茨卡娅；1919年4月，小阿尔汉格尔斯克肃反委员会释放了作家伊·沃尔内。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06559

高尔基就知识分子问题致列宁的信

(不早于1919年10月6日)

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俄国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人，我了解得不比您差，而且，如果您记得的话，我是俄国文学家中最先对知识分子持强烈否定态度的人之一，我至今也是如此，并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以后要改变这种态度。

但是，我的先生，总该弄清楚当政客的知识分子与国内有学识的科学家之间的区别，总该划一条线，分清帕维尔·米留可夫^①的……和杰普^②教授的头脑，总该知道唐恩^③是一种价值，布什^④又是一种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小人物——那些爱面子、爱嫉妒，为了自己的虚荣、安宁和舒适，什么罪恶勾当都干得出来的家伙，与图尔金^⑤教授毫无共同之处，图尔金用自己的发明完成了书籍和彩色印刷业的彻底变革。他完全废弃了铅字以及

① 米留可夫，帕·尼·(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言论报》编辑。1917年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② 杰普，Г.Ф. (1854~1921)，俄国热力工程学家，1899年起为彼得堡热力工程学院教授，俄国制造内燃机的创始人。俄国技术协会第二(机械)分会主席。

③ 唐恩，费·伊·(古尔维奇)(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1922年被驱逐出俄国。

④ 布什，尼·阿·(1869~1941)，苏联植物学家，1920年起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⑤ 图尔金，H.B. (1861~1933)，印刷技术方面的发明家，记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曾在列·尼·托尔斯泰家当过家庭教师。1892~1912年任《自然与狩猎》杂志编辑，曾在油墨制造工艺部门工作，1919年发明多彩色一次印成的方法。

使成千上万工人中毒致死的当代印刷术，——这样的人的价值绝不低于政治领域的任何一个改革者。

真见鬼！要知道克罗吉乌斯^①从来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内心里是个布尔什维克，如果说他不愿向上爬，不谋取一官半职，那是出于一种嫌恶，这是因为在政权周围麇集了一批黑帮教授、冒险家和骗子。

谢尔盖·奥尔登堡^②曾经是立宪民主党瓦西里半岛区的书记，甚至还当过临时政府的部长，由此不能得出他现在还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结论；这是位大学者，卓越的工作者，是一个善于以历史学家的客观眼光观察事态的人，我了解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我敢肯定他不是敌人，而是一个好帮手。

要知道，在白方那一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没有一个学术界的巨匠，他们都还在我们这一边，而且不是为搞阴谋，而是真诚希望新制度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而且是在凭良知工作！

请吩咐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给您开列一个苏维埃政权时期做出的发现和发明的扼要清单，那您就会确信我是对的，对的！这个清单一旦公布，不仅在我们这儿，而且在国外，在协约国中都会产生巨大的宣传效应。

是的，我缺乏自持力，但我并不失明，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政治家却往往显得愚蠢。我知道您习惯于“诉诸

① 克罗吉乌斯，A. A. (1871--1933)，俄国心理学家，从1905年起任教。十分重视百人心理学研究。著有心理学、教育学及精神疗法方面的著作。

② 奥尔登堡，谢·费·(1863--1934)，苏联东方学家，1900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俄国印度学学派奠基人之一。1917年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起为东方学研究所所长。

群众”，而个人在您看来是小事一桩。在我看来，梅契尼科夫^①、巴甫洛夫^②、费奥多罗夫^③——是世界上最有天才的科学家，是世界的智者，你们这些政治家们是形而上学者，而我则是缺乏自持力的艺术家，但和你们相比，我更是一个唯理论者。

俄国缺少智者，我们这里有才华的人很少，骗子、恶棍、冒险家却太多，太多！我们的这场革命要进行几十年；能充分理智而有力地领导革命的力量在哪里呢？工人阶级在逐步消失——农民呢？至今他们还没有干社会主义革命——您认为他们会干成吗？“信者得福，在世上感到温暖”——而我不相信庄稼汉，认为他们是工人和文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现在有学问的人对我们来说应该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新的智能使国家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在人类理性与僵死物质斗争的所有领域里为我们培育出必需的技术人员大军。

我说——您把苏维埃政权时期科学界人士的一切成就统计出来，就会在一览表中发现鱼网的密织、西班牙病杆菌、彩印领域的革命、食品化学方面极有意思的……^④ 如此等等。您一定会对那些吃不饱肚子、被强行搬出住宅、受到百般侮辱、被送进监狱的人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感到惊讶。

① 梅契尼科夫，伊·伊·（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病理学家，比较病理学、进化胚胎学、免疫学奠基人之一。1886年与H.Φ.加马列亚共同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细菌学派。是多细胞生物起源理论的创始人。

② 巴甫洛夫，伊·彼·（1849—1936），杰出的生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学术著作在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③ 费奥多罗夫，谢·彼·（1869—1936），苏联外科学家，学派创始人，俄国泌尿学的奠基者，是俄国最先采用内窥镜检查法的人之一。

④ 原件此处有几个词无法辨认。

对人文科学家持不信任的甚至怀疑的态度，这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对掌握有用知识的人的这种态度是野蛮人、蠢人的态度，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害的。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因此要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算是吧，这我懂！但是，我的先生，——有用知识的价值对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您应当懂得，应当明白，恰恰是有用的知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最革命的力量；只有用于这方面的才智才能把人们的愿望和需求组织起来，不断加以扩大，从而有力地推动人们前进。

这才是事业。然而把吃不饱肚子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湎于自己的权势而发呆的白痴们的拳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不叫事业，而是野蛮行为。

再说一句：维克托里延·切尔诺夫^①是一回事，而别洛戈洛维医生^②或马努辛^③则是另一回事。不一样，对国家优秀的智者必须作另外的评价，更高的评价。所以不能把政客知识分子与智力—科学—能量的创造者混为一谈。

杰普已被释放，我很高兴并表示感谢。请释放捷廖申^④、奥西

① 切尔诺夫，维·米·（1876～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17年5～8月为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曾任立宪会议主席。立宪会议解散后，移居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

② 别洛戈洛维，尼·安·（1834～1895），俄国社会活动家，医生。C.M. 波特金的朋友及其传记的作者。1883～1891年是《共同事业报》的编辑和发行人。

③ 马努辛，C.C.（1856～1921），1905年前为司法大臣、枢密官、国务会议成员。十月革命后，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顾问，科学院腐泥委员会成员。1921年被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逮捕并判处两年强制劳动。1921年11月27日由于健康状况被特赦并解除管制。

④ 捷廖申——身份不明。

波夫^①（最优秀的外科医师之一）、布什、奥尔登堡、谢尔巴^②和全部科学家。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会常常不能自持，紧握您的手，您也是一位缺乏自持力的先生。

虽然我早就同奥尼德·安德列耶夫分道扬镳，断绝关系，可是我还是替他惋惜！他过早地去世了。他是个天才，惊人的天才。

阿·别什科夫

① 奥西波夫，维·彼·（1871～1947），苏联精神病学家，在精神病学中发展了病理生理学流派，193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44年起为医学科学院院士，中将军医。

② 谢尔巴，列·弗·（1880～1944），苏联语言学家，列宁格勒音位学派领导，1943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No06562

高尔基就文化工作等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年7月12—24日之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不要只注意那些琐碎小事”^①，这是个非常好的准则，特别是对那些像您一样不得不而且已习惯于处理群众、国家和民族事务的人。我不属于那些认为这种行为是“危险中的鸵鸟”的行为的人，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讨厌的琐碎小事正在非常可怕地和令人憎恶地妨碍着我们平静地生活，妨碍我们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

我没忘记结核杆菌、霍乱杆菌和梅毒杆菌都是小东西，但是也没忘记而且看到那些极其宝贵而复杂的机体是如何死于这些小东西的。因此，我不能忽视小事在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决定写信给您谈谈这些“琐碎小事”。

在社会机体中，坏蛋和骗子像病菌一样起着极有害的作用。您知道，在任何一件事中都有骗子，在我国巨大的革命事业中这些骗子尤其多，这是“旧世界”十分自然的遗产，就实质而言，旧世界到处都是诈骗行为。

某一时期以来，我确信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巧妙而狡猾地进行诈骗活动。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某种重要的、尽管是很小的事情开始顺利发展，就能感觉到它的活动。对这只黑手

^① 高尔基在这里引用的是列宁的话，可能出自他同列宁的谈话或列宁所写的不为人所知的信件。

的行为我在专家委员会^①的工作中已经观察了两年多。

人民委员会做出决定^②：加快该委员会的工作，将委员会工作人员增至200人，配给他们较高的粮食定量标准。决定是在1920年10月做出的，尽管我为此事四处奔走，但是至今这个决定并未被执行，前几天劳动力供应委员会断然拒绝发放配给口粮。该委员会的工作被拖了下来，职员们也各奔东西，而骗子们得意洋洋，继续不断地敲诈勒索。

谈谈其他方面的问题。从未对苏维埃政府进行过诽谤和污蔑的正直作家亚·亚·勃洛克因坏血病和气喘病快要死了，必须让他到芬兰的疗养院去。可是不放他出去^③，而在同时却放走三位作家^④出国，这三个作家将会进行诽谤和污蔑，肯定会的。我知道苏维埃政权不会因此而蒙受损害，我希望把所有渴望出国的人都放出去，但是我不理解这种奇怪的政策，我觉得它令人怀疑，存心不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什皮茨别尔格^⑤这个“共产党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宗教界案件侦查员

-
- ① 根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提议，1919年2月建立了一个有高尔基参加的专家委员会，其目的是对彼得格勒收归国有的仓库、无主住宅、当铺、古董店里那些有艺术价值的东西进行挑选和鉴定。这是准备供建立古董出口基金用的。
- ② 1920年10月26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尽快地并且用最好的价钱把彼得格勒专家委员会精选出来的古董拍卖出去的决定。
- ③ 高尔基曾多次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写信，请他向俄共（布）中央申请允许亚·亚·勃洛克出国。可能是在高尔基给列宁写了这封信后，政治局于1921年7月12日通过了提高亚·亚·勃洛克粮食供应标准的决定。当月勃洛克被允许出国治疗，但由于病情恶化没能成行。
- ④ 指的是康·德·巴尔蒙特、费·库·索洛古布等人。
- ⑤ И. А. 什皮茨别尔格（1881～1933），革命前是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1918年领导彼得格勒利季约区户籍登记处，1918～1922年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第八（清理）处工作人员，该处主要职责是落实国家与教会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的措施。他参加了反宗教宣传活动，作为侦查员办理了1918～1920年的教会诉讼案。1919～1924年参加出版《革命与教会》杂志，1922～1931年领导“无神论者”协会和同一名称的出版社。

来。这个什皮茨别尔格在沙皇统治 [时期]^① 是个极其鄙劣的离婚案小律师。他居心不良，甚至在宗教事务所里也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十月革命后，他自称是“反抗上帝的人”，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② 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同克拉西科夫^③ 编辑《宗教与革命》杂志，最后终于钻入全俄肃反委员会，在那里当侦查员，干下了无数极有损于苏维埃政府威信的卑鄙龌龊的勾当。我听说他最终被赶出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并且被开除了党籍。这很好，但是党内是不是还有像什皮茨别尔格这样的人呢？

“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④ 用苏维埃货币在立陶宛以非常便宜的价钱买到了3万听罐头。5个月以前，我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提出申请：允许一个叫阿多利·罗代^⑤ 的去立陶宛检查和验收订购的罐头。他们答应我让罗代去，于是我同意向卖方交定金。但是，前几天得到通知，说不能让罗代去立陶宛。为什么？说是“政治上不可靠”。请原谅我，这是胡说八道。十月革命期间，当罗代同其他一些资产者一起被捕后，乌里茨基^⑥ 曾亲自去监狱把他接出来。了解罗代的还有巴达耶夫^⑦、巴卡耶夫^⑧ 和帕希耶夫^⑨。他过去是个小饭馆的老板，而现在是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中一名卓越的、大公

① 信件中这个词被删去了。

② 卢那察尔斯基，阿·瓦·（1875—1933），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③ 克拉西科夫，彼·阿·（1870—1939），时任副司法人民委员。

④ 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是根据列宁和列·波·克拉辛的倡议，于1919年底在彼得格勒建立的，其目的是保证脑力劳动者的粮食供应和维护他们的社会权益。高尔基从1920年到1921年10月出国前一直领导该委员会。

⑤ 阿·罗代（死于1930年），1920—1921年任彼得格勒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总务主任，是1921年建立的隶属于该委员会的“学者之家”主任。

⑥ 莫·索·乌里茨基（1873—1918），1918年3月起任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1918年8月30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⑦ 巴达耶夫，阿·叶·（1883—1951），曾任彼得格勒和北方区域的粮食委员，1920—1921年领导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消费合作社协会。

⑧ 巴卡耶夫，И. П.（1869—1936），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

⑨ 克里米亚疗养院院长。

无私的工作者，他非常满意的一件事就是他从饭馆老板迈进了学者的圈子，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他是立陶宛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选择立陶宛国籍，也可以回到那里。但是，一旦他选择了立陶宛国籍，就不会再让他返回俄国了，他会失去较好的社会地位，委员会也会失去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何必要这样做？要知道这个禁令很容易激怒那些什么都没有、在如此艰难的时刻还能卓越地进行工作的人。

下面谈谈格尔热宾案件^①，该案件正渐渐地具有贝利斯这一案件^②的性质。格尔热宾像狗一样，或者更惨，像犹太人一样，正在被人毒死。您知道，格尔热宾出版社是经您的许可由我组织成立

① 格尔热宾，季·伊·（1869～1929），艺术家，出版商。1919年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私营的“季·伊·格尔热宾出版社”，出版文艺、科学和科普图书，在莫斯科和柏林设有办事处。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格尔热宾经营在国外出版俄国需要的俄文版书籍的业务，这一做法得到了高尔基的支持。1920年1月10日，国家出版社同格尔热宾签订了在国外出版国内需要的俄文图书的合同，国家出版社对严格规定的订货给予资助，同时对出版商的工作进行监督。但格尔热宾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国家出版社领导人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代表的支持和信任。他们指责格尔热宾出版的不是合同中所规定的图书，又故意抬高价格出售这些书，其动机具有投机性。就此问题他们不止一次找过人民委员会和俄共（布）中央。1921年5月30日，列宁在答复对格尔热宾的出版工作的批评意见时写道：“关于格尔热宾，我们中央委员会里有过分歧。有些人说：干脆就不用他，因为他作为一个出版商，可能敲我们的竹杠。另一些人说：他这个出版商出版东西价钱可以便宜一些……”

于是成立了一个小组，持两种意见的人各占一半。我没有参加小组，原因是我‘偏向’高尔基（某些人这样认为），而高尔基是为格尔热宾辩护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386页。）

1921年10月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关和企业只能在俄国出版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只有当出版物在技术要求上特别复杂时，方可根据俄罗斯联邦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专门决定在国外印刷。

② “贝利斯案件”，指的是1913年9～10月在基辅进行的对犹太人门·贝利斯的审判。沙皇政府指控他为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一名俄罗斯男孩A.尤辛斯基。由于以高尔基和柯罗连科为首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举行广泛抗议，门·贝利斯被宣布无罪。后来该案件成了企图对无辜受害者进行不公正迫害的同义词。

的。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来组建这个出版社，为我们的大学者订购了几十本自然科学方面的新的畅销书，取得了少有的成绩。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使俄国科学图书市场摆脱了德国出版社和出版物的影响。可是国家出版社坚决拒绝我推荐的我国最优秀学者的书稿，而自己出版那些过时的、已失去科学意义的译著，比如，罗斯科的《化学》^①、盖克的物理学^②。这些书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出过俄文版本。国家出版社没有承担兹拉托戈罗夫的《什么是霍乱》^③一书的出版，也没有承担《护理人员 and 消毒者教令》一书和一系列极需要的教科书的出版工作。

尽管4月26日俄共中央小组批准了格尔热宾同国家出版社的合同，并责成国家出版社在一周内确定书目、印数和价格，可是国家出版社却拖延数月不办，现在还拒绝执行中央全会的决定。这个决定没有给我，而给国家出版社的一份被弄丢了，中央的那一份也找不到了。

这一切真叫人奇怪，您有同感吧！国家出版社成了众人议论的话题，人们大声疾呼，这个机构必须改组，必须撤掉魏斯^④，撤换那些对出版工作一窍不通、被魏斯牵着鼻子走的人。然而，尽管遭到普遍抗议，国家出版社仍旧我行我素。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笨拙，而且恶劣和有害。说是没有纸张？随信附上的《真理报》^⑤剪报说明了纸张都到哪里去了。这样的佐证有几十个。

① 可能是指Г.С. 罗斯科（1833—1915）的《矿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简明教程》，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德·伊·门得列耶夫为其作序。

② 可能是指国家出版社挑选的А. 盖克（1835—1925）那些从英文译过来的地质学通俗读物。1922年用俄文出版了他的教科书《物理地理学》和《地质学》。

③ 谢·伊·兹拉托戈罗夫（1873—1931），苏联微生物学家、流行病专家、传染病专家。著有微生物学和菌苗疗法方面的著作。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

④ 魏斯，В.Л.（1877—1940），1920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

⑤ 这个词被删去。

№06563

高尔基致李可夫的信

(1924年12月9日)

亲爱的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①：

衷心感谢您送的礼物和您一向对我友善的、同志式的关心。我们这里已奇迹般地开始出书，伊里亚·约诺夫^②真是特别能干！非常欣赏您视察伏尔加河流域^③的照片，遗憾的只是，拍照时您总是皱着眉，照片上的您看起来像是在患牙疼。然而这是多么棒的一张男子汉的脸啊！

有关您视察的情况我是从准时收到的《消息报》上看到的。最好再给我寄一份《真理报》来，《真理报》更有意思、更完美得多。劳驾，请让人给我寄一份来！托洛茨基那本书都瞎扯了些什么？他的书我没看过，流亡者刊物对这本书^④感到兴高采烈，就像为给父母安灵得到商人一大份施舍一样。

我的生活和往常一样，每天工作很长时间。非常想写一些愉快的事情。

前不久我大病了一场，得了结肠炎，非常难受！前几天颈肌神

① 李可夫，从1924年2月2日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② 约瑟夫·伊·约·(1887~1942)，1918~1926年领导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苏维埃出版社。

③ 指李可夫1924年8月对伏尔加河流域的视察，当时他任歉收救助委员会主席，此行是为了了解当地的情况。

④ 大概是指托洛茨基1924年5月出版的《论列宁》一书。

经痛，有5、6天不能回头。睡觉也得坐着。老啦。没关系，到时候了。

见到加米涅夫时请转告他，说我谢谢他给我的第2卷《列宁文集》；我正在找那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给我的但我没有收到的信件^①，一找到就寄去。研究这里的法西斯主义是如何瓦解的，工人群众又是如何变得更加清醒的，是件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尽管我只能谈一谈卡斯捷拉马尔的、造船厂的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的情况。

总之，生活越来越有意思，如果自然条件允许的话，我还想再活上50年。

衷心地祝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代我问候捷尔任斯基和布哈林。

祝一切顺利！

1924年12月9日

于索里托别墅

索伦托—开普

^① 《列宁文集》第2卷收入了列宁在1909年给高尔基的两封信，它们是对收入《列宁文集》第1卷中的信的补充。《列宁文集》第2卷由加米涅夫编辑，1924—1925年共出了三版。

№06564

高尔基就报刊、宣传、出版等

致斯大林的信

(1929年11月27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没来得及将我考察的情况告诉您，即使抽出时间，我恐怕也不能十分清楚而有条理地把这些情况讲给您听；我口头表达能力差，写出来大概会好些。

流亡者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在阐述苏维埃的实际情况时，根据的几乎全是我国报刊为了进行教育和鼓动、为了进行自我批评而刊登的那些反面事实。资产阶级报刊“特派记者”文章中的事实和结论没有我们自我揭露出的那么多，态度也没有那么敌视。

我们在充分强调反面事实的同时，也会向我们的敌人提供相当数量的材料，他们会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些材料来反对我们，从而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心目中败坏党和国家管理制度，败坏工人阶级专政的原则，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无产者主要是靠资产阶级报纸提供消息的，他们从这些报纸上不可能看到我国文化革命的发展、工业化的成就、工人群众的热情和他们对贫苦农民的影响。

当然，我不认为，资产阶级对苏联的态度能够变好，我清楚，欧洲的现实非常注重对欧洲无产者的革命教育。

但是我也清楚，我们对待由我们一手造成的现实的片面性对我国青年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一些青少年在给我的来信和与我的交谈中，都流露出一种极为

悲观的情绪。产生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向中部地区特别是偏远省份的青年直接介绍现实情况的工作做得很差，几乎没做。青年是通过报纸了解生活进程的。如果随便找一天读上两三份报纸，那么这些报纸报道的玩忽职守和尔虞我诈等方面的大量事实，足以使那些立场不坚定、政治觉悟不高的人产生悲观主义和恐慌情绪。我经常读到和听到这样的话：“生活令人厌倦”，“无所作为”，“让一切都见鬼去吧”，如此等等。

遗憾的是，经常陷入悲观情绪和抱怀疑态度的是那些最善于深思的青年，他们从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谈中学习。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老师一个接一个地脱离了党，声明自己是异端分子，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困惑。青年不可能像社会主义者—产业化工人一样对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理解和感受得那样深刻、那样痛切。强迫那些以缺乏工艺的（因而是野蛮的）劳动使土地变得贫瘠的庄稼汉进行集体的、高效的、爱护土地的劳动，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青年对这种必然性却理解得不够。

随信附上从米留可夫^①的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东西。这是从《共青团真理报》上转载的。这样的《信》有几十封，几百封。当然，写信的人只是少数，而更多的人是在思考。

总之，社会主义青年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正相反，个人主义在他们当中还极其严重。这一点可以从生活中和书报上找到几百个例子来证实。

对青年的教育，党并没有起到它所能起到的那样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党内存在矛盾的缘故。过去这些矛盾造就出“一批优秀人才”，造就了布尔什维克，而现在这些矛盾却产生出相

^① 米留可夫流亡国外后，于1920年开始在巴黎出版《最近新闻报》。

当数量的两条腿的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伊斯基分子”^①。这些人正在十分成功地进行着一场反对党的老知识分子、反对文化工作人员的运动，而党还没有足够的文化工作人员，以致经常把那些显然没有才华的人放到重要的文化阵地上。那些精力充沛、自私自利和“贪求权力”的青年看到当官的平庸无能就竭力往前钻，去抢占重要职位。他们惟一的武器就是革命的词句和随机应变。您当然很清楚，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不可能给自己培养出与他们具有相同能力和目标的接班人。而我认为，学生应该胜过老师，要比老师更聪明，知识更渊博，思想更深刻，因为时代愈发展，就愈是要向新世界的建设者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又能提出什么建议呢？建议也就那几条，没什么新鲜内容。

必须更加重视青年政治文化上的成长。首先必须比较客观地说明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报刊上刊登的反面事实必须用正面事实来相抵。在我国，尽管到处是旧生活破坏后的废墟，尽管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重重障碍，但是工人阶级创造新型生活的志向却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烈。

对实现这一志向、使这一志向深入生活的事实，必须要用严谨的、条理清楚的评述，而不是像我们的报刊那样用简短的电报来说明。必须强调群众的首创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只是表现在一些日常小事上。

对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必须每周每月进行报道。不能允许报道玩忽职守、懒惰、酗酒、盗窃和流氓行为等事实超过具有革命教育意义和文明教育意义的事实，即超过修建住宅、工厂、面包房和

^① 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派别，鼓吹敌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其领袖是波兰社会党人伊·康·马哈伊斯基。

文化宫、食堂和学校；超过保护妇女和教育儿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工人的发明创造、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科学的发现、使国家富裕的宝贵矿产，报刊和图书需求的增长、集体农庄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等事实。

必须使报刊即使不是天天、也要经常提醒自己和读者注意，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是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和流氓无赖，也不是失去理智的傻瓜，而是真正强大的和新的历史力量——工人阶级。这一点必须写得通俗易懂、文理通顺、内容充实。

我提出具体建议如下：在各中央机关报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叫做《国家建设运动（或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或文化建设运动）》。该栏目同时向读者报道正面事实和自我批评的事实，使这种两种事实的报道达到均衡，从而减弱悲观主义情绪。

其次，为了更加正确地教育青年，增加我们广大读者的社会知识，必须出版《在国外》^①这一杂志，有关此事我曾跟您谈过。

在这个杂志上，我们应该并且可以把我们现实中的各种反面事实与欧洲和美国日常生活中的同类事实加以对比。

这种对比的好处，我看无需证明。

我们有可能打败小市民，正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因为他们的文化正在飞速瓦解。在这方面外国文艺作品对我们非常有利。但是这个杂志应该办成一个知识性强、机智敏锐、适合广大群众阅读的杂志。正如我已向您说过的那样，除卡尔·拉狄克^②外，我还没发

① 《在国外》是由高尔基发起、1930~193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月刊，主要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事件进行评论。

② 拉狄克，卡·伯·（1885~1939），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写有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1925~1927年任莫斯科东方民族大学校长。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于1927年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出党。1929年夏，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声明与托洛茨基主义断绝关系。1930年恢复党籍，从事新闻工作。

现有谁能办好这种杂志。拉狄克的“倾向”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因为这里的范围非常有限，杂志的任务极其简单明了。

我当然同意沃龙斯基^① 出版《战争》杂志的计划，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特别证明了出版这一杂志在客观上的必要性。我不清楚您同沃龙斯基谈话的结果，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认为“倾向”的问题并不是可以否定出版《战争》杂志的问题。正如我所认为的，我们的实际工作正在有力地纠正着那些“倾向”。

此外，必须更加庄重地提出对无神论的宣传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运用马克思和唯物主义的武器取得的成效不大。唯物主义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同时并存。如果一个傻瓜谈论上天，而一个聪明人谈论工厂，他们彼此是无法理解的。必须让聪明人用他的棍棒即他的武器打败傻瓜。

为此必须在共产主义科学院^② 设置宗教史研究，而且主要是基督教史研究的课程，也就是把宗教史作为政治来研究。

必须了解“基督教教义的解释者”、基督教的辩护士，特别是必须研究天主教这个最强大、最有头脑的宗教组织（其政治意义特别明确）的历史。必须了解宗教分裂运动史、异教史、宗教法庭史和“宗教”战争等。对教徒的每个引语能轻而易举地提出一二十个反驳它的神学引语。

必须出版带有蒂宾根学派^③ 的批判性注释的《圣经》和批判圣经内容的图书，这会在教徒中引起非常有益的“思想慌乱”。

① 沃龙斯基，亚·康·（1884—1943），1924年起任《探照灯》杂志和“圆周”出版社编辑。1928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编辑。

② 1918—1936年设于莫斯科的教学和科研机关。1919年前称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24年前称社会主义科学院。后来并入苏联科学院。

③ 德国新教神学的一派，是在蒂宾根大学发展起来的。

在这方面那本关于塔博派和胡斯运动^① 史的通俗读物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此外还应该再加上齐默尔曼那本《德国农民战争史》^②。如果对该书精心编辑一下，它会对有头脑的人非常有益。

必须出一本关于宗教的反科学史的书。

我们的青年对这方面的问题了解甚少。他们之中宗教情绪“倾向”相当明显，这是个人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青年总是太急于寻求“最后结论”。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一些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中，竟不加注释地写有这样一些话：能使天地震动的“上帝的指头”、“宇宙是创造者头脑中的一种想法”这种观点是可能的，等等。

当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1929年第一期上读到《有益的能源》^③一文中的“自然界或上帝，这两个术语中您选定哪一个”这句话时，他都有些发愣了。

对这类青年人，我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回答，这篇文章即将发表^④，我恳请您也读一读。

其次，必须为农民出版《国内战争史》一书，这一点我已坚持

① 胡斯运动是15世纪上半叶捷克人民反对天主教会、封建压迫和德国强权的革命运动和斗争。塔博派是胡斯运动中革命的反封建的派别。

② 指德国历史学家B. 齐默尔曼（1807—1878）的《德国农民战争史》一书，该书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了两卷集俄译本（第2版）。

③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是哲学和社会经济学杂志。1922—1924年在莫斯科出版，月刊。《有效能源》是美国物理学家罗·安·米利肯（1868—1953）的文章，刊登在该杂志1929年1月第1期上。

④ 指高尔基的《答复》一文，刊登在1929年12月12日和13日的《消息报》上。

两年了^①。

农民不理解这段历史，因为他们不完全了解这段历史。必须让他们知道工人阶级是根据什么理由开始这场战争的，必须让他们知道是工人把国家从外国资本的侵占和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必须让他们知道邓尼金分子、高尔察克分子、弗兰格尔分子和尤登尼奇分子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流血牺牲，使经济遭受了多大的破坏（配上数字和插图），在他们的统治下，[自称]热爱人民的社会革命党人柴可夫斯基^②分子和其他“神人”起了怎样的作用。

这本书一定要编得通俗易懂。我认为此事应该这样做：吸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③参加，让这两个机构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收集所有材料，并将材料按年代编排好。这些原始材料应由小说家从文字上进行加工。我特别推荐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来做此项工作，他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其次推荐《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还有尤·李别进斯基^④。当然，

① 根据高尔基的倡议，1931年7月30日联共（布）中央决定出版《国内战争史》。为此成立了三个编辑部：总编辑部、历史编辑部和美术编辑部。参加总编辑部的除高尔基外，还有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谢·米·基洛夫、安·谢·布勃诺夫、扬·博·加马尔尼克和约·维·斯大林。根据中央的指示，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地区的党的、苏维埃的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被吸收参加为《国内战争史》收集材料。各地还成立了专门的协助工作委员会来收集文献和回忆录、编写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的生平。总编辑部为《国内战争史》的工作规定了具体期限，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该书的准备和出版时间要比预定的长得多。高尔基编辑的第一卷在他逝世一年后于1937年出版。高尔基在世时已写成的第二卷于1942年出版。第三卷于1957年问世，第四卷和第五卷（最后一卷）分别于1959年和1960年出版。

② 柴可夫斯基，尼·瓦·（1850—1926），革命民粹派分子，1874年开始侨居国外，1906年回到俄国。1904—1910年间是社会革命党人，后积极从事合作社运动。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统一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曾领导和参与多个地方性反苏维埃政权。1919年流亡国外。

③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1919年设立，领导红军的党政工作。

④ 李别进斯基，尤·尼·（1898—1959），苏联作家。

由他们加工的材料，还须要进行编辑。该书须要大量印发，以便每个村子都能得到，并像小说一样广为传阅。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这就是我暂时想对您说的一切。

最后，再告诉您一些与在科学院找到的那些材料一事有直接关系的情况。

彼得堡保安处是在1917年2月24日或25日被破坏的。这两天当中有一天从我的住宅——克龙韦尔克大街24号——派出一个青年小分队，为首的一个叫波特戈尔内，另一个是工厂工人巴尔维艾年~阿克雷里，他们的目的是占领保安处，查抄所有档案材料。当小分队来到梅季先斯基沿岸街时，看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已先于他们赶到，保安处处长已被杀害，办公室已被洗劫，案卷和文件被扔出窗外，部分已被烧毁。这伙人为数不多，他们及他们的行为令人生疑。青年们赶跑了这伙暴徒，扑灭了火堆，把扔到街上的案卷和文件收捡起来，装上大车送到了科学院，斯列兹涅夫斯基院士^①收下了这些材料。这些“案卷”中有一卷非常厚的是对拉斯普廷^②的“侦查材料”，另一卷是对帕·尼·米留可夫的“侦查材料”。后来我在警察司看到过这两个“案卷”，警察司的档案好像是晋季诺夫^③整理的。

衷心地祝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万事如意。

阿·彼什科夫

1929年11月27日

-
- ① B.И. 斯列兹涅夫斯基（1867~1936），文学史学家，是科学院图书馆一位知识丰富的手稿保管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 ② 格·叶·拉斯普廷（诺维赫）（1864/65~1916），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现秋明州内）农民，宗教狂和冒险主义者，对沙皇家族有很大影响。
- ③ 弗·米·晋季诺夫（1880~1953），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1917年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流亡法国。

№06565

高尔基就他遭到的批评和攻击

致斯大林的信

(1930年1月8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舵轮报》^①报道说，赤塔的某个杂志对我进行讥讽，因此受到处罚^②。算上中央对新西伯利亚人的警告^③，这是第二次了。我完全相信还会发生第三次、第十次以至更多次。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并不希望一定要令人不快地或敌对地惩罚那些写我的人。

我也和您、和我们大家——这些“老头子们”一样，收到了很

① 1920~1932年俄国侨民在柏林出版的报纸。

② 1930年1月5日，《舵轮报》发表了一条简讯，说根据政治局决定，苏联的《我们的文学》杂志自1月1日起在赤塔停刊，因为该杂志反对高尔基和杰米扬·别德内依。

③ 指在新西伯利亚出版的《现代》杂志（1929年第5~6~7期和8~9期）和《苏维埃西伯利亚报》（1929年9月22日）上发表反对高尔基的文章，指责他越来越经常地充当苏联所有反动文学的传播者和保护伞。高尔基曾撰文谴责《苏维埃西伯利亚报》的编辑A.Л.库尔斯（他同时担任《现代》杂志的编辑）“组织迫害文艺作品”，认为《现代》杂志的行为是“随机应变的、伪装起来的敌人的行为”。联共（布）中央1929年12月25日“关于部分西伯利亚作家及作家组织反对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决定中，认为上述攻击是“错误的，近似流氓行为”（《苏联共产党关于文化、教育和科学的文件汇编》，1963年版第201页）。A.Л.库尔斯被解除《苏维埃西伯利亚报》编辑的职务。

多敌视性信件^①。这些写信人的反常态度和粗暴攻击使我确信，在党十分坚决地把农村转入集体化轨道后，社会革命具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几乎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比党以前所做的一切要多得多，深刻得多。我们正在消灭存在了几千年的制度，这种制度造就了一种极其畸形的人，他们那种本能的保守性和私有者的天性，令人吃惊。这样的人有 2000 万。在极短暂的期限内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任务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这一任务实际上正在完成。

非常自然，这两千万人当中有很多人的确已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甚至不理解正在进行的变革的全部深刻性，但他们下意识地、深深地感到，他们千百年来生活的最最深厚的基础开始遭到破坏。被破坏的教堂可以重新修建起来，上帝可以随便再请一个，但是一旦土地从脚下消失，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于是，那些机械地掌握了革命词句的人便破口大骂，经常假借这些词句来掩盖“走向灭亡”的古代人的复仇感。请注意：西伯利亚人和远东人骂得最凶，因为那里的农夫更富有。

但是，“骂不沾人，不必较真”，这骂并不妨碍我生活，反而激励我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也就是说：所有针对我的这一切均与党及其领导人无关。让他们去骂吧。何况某些人乃至很多人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文化水平低而骂的，一旦向他们解释清事情的实质，他们就不会再骂了。很多人急于宣布自己是正统的，指望借此捞点什么好处，也确实会捞到一些。

总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因此请不要

^① 见高尔基的《致苏联呆板的公民。答记者问》（1928年）、《再论呆板的公民》（1928年）（《高尔基全集》（30卷本），1953年莫斯科版第24卷，第431、447页）。

惩罚那些好骂人的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恳求您了。至于他们中那些不可救药的人，不值得去关心他们，而那些容易生病的人，定会被治好。我们的生活就是最天才的医生。

值此，再一次^①祝贺您 50 年来的奉献。杰出的奉献。祝您身体健康！

阿·彼什科夫

1930 年 1 月 8 日

您能否给《文学学习》杂志^②写点东西？应当写。这对那些刚学习写作的人很有益，非常有益。请您一定要写！

阿·彼·

① 为了祝贺斯大林 50 周年诞辰，高尔基已于 1929 年 12 月 21 日给斯大林发去一份贺电。

② 1930 年由高尔基创办的文学评论杂志。

№03458

高尔基就编写出版《国内战争史》一事 致斯大林的信

（1930年6月5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从1928年起我就坚持必须研究和出版一套《国内战争史》，依我看，该书对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尤其必要。

关于出版该书的必要性，我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由于一系列日常生活条件，对青年农民的政治教育与青年工人的政治成长相比要落后得多。

2. 青年农民在加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同时，也会把自己的个人主义带到工厂，造成一种能够腐蚀并且正在腐蚀青年工人的气氛。

3. 那些直接参加国内战争的农民正在衰老、死亡，我们正渐渐地失去以他们为代表的活的往事见证人，失去亲身感受过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积极参加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人。再说，即便他们这些见证人，这些用革命精神对青年进行教育的人，过去不能、现在也不可能对他们的下一代产生足够深远的影响。他们大多数人理论知识贫乏，而实际知识又受到他们个人经历范围的限制，一些人只了解阿尔汉格尔斯克过去的情况，一些人只是在阿斯特拉罕战斗过，另一些人只是在敖德萨战斗过，还有一些人只是在乌拉尔、在远东、在自己的县里、村里战斗过。不仅这些见证人，就连很多党

员对国内战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看法。而青年农民对国内战争史不是了解得很差，就是根本不了解。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理论是事实的外衣，如果没有实际事实这个坚实的基础，单靠理论是造就不出坚强的革命者——共产党员的。必须给青年提供事实。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差。

4. 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应该清楚地和工厂主的目的是企图用农民的手夺走工人夺得的政权；应该清楚君主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农民反对农民自己时所利用的那些谎言、欺骗、暴力和其他一切手段；应该清楚富农和神职人员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应该清楚俄国资产阶级用欧洲资本家的资金组建的军队给国家经济造成破坏的程度。这应当用数字表示出来；此外，青年还应该尽可能确切地了解党这个“胜利组织者”的作用。

当然，以上说的只是必须清楚、简明和生动地加以论述的粗略提纲。《国内战争史》应该写得极为通俗易懂。

原始的事实材料即各种文件应由党史委员会^①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从自己的档案中提供。此外，在这些事实材料中还应补充进那些积极参加过国内战争并将对材料进行文字加工的人的回忆录。

应该成立一个编辑核心，其组成人员必须有：克·叶·伏罗希洛夫、安·谢·布勃诺夫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②。该核心的责任是：对文件材料进行挑选和审查并在文字加工后阅读。除了所提到的伏罗希洛夫、布勃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三位同志外，还应选两三名军

① 指十月革命史和联共（布）党史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从事党史和十月革命史资料的收集、研究和出版工作。1928年与列宁研究院合并。

② 克·叶·伏罗希洛夫（1881～1969），1925～1934年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安·谢·布勃诺夫（1884～1940），1929～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18～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国家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委员。

事专家和一名精明强干的经济学家参加编辑核心。

文字编辑工作我请求交给我，其技术组织工作由 П.П. 克留契柯夫来做。这一点我绝对坚持。

出版该书大概至少需要 150 个印张，按 25 个印张一卷分为 6 卷。这样的篇幅不应该吓住我们，我国现在销售的那些荒唐无稽的书有千百万册。还应该把这 6 卷书浓缩成一本供学校教学用。对于这项出版经费不该吝惜，出版这套书比建任何一个“文化宫”都要有益得多，建这些文化宫（有点为时尚早）要耗费几百万。《国内战争史》一书应该图文并茂，配上“红军之家”的“国内战争博物馆”的材料和一些画家的作品。《国内战争史》一书的文字加工工作应该由我们那些最有才华的作家、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直接见证人和清楚地了解事发地点的人来做。

应该吸收以下人员参加该项工作：

伏尔加河中游地区 康·费定

北高加索和古利亚伊—波列 阿·托尔斯泰

西伯利亚

扎祖勃林、法捷耶夫、弗·伊万诺夫、希什科夫

乌克兰 彼得罗·潘奇和 А. 达维多维奇

克里木 亚·马雷什金

彼得堡 尤·特尼扬诺夫

弗洛特 李别进斯基、拉夫列尼约夫

顿巴斯 奥列沙（肖洛霍夫—哥萨克）

敖德萨和格里戈里耶夫希诺 索柯洛夫—米基托夫

北方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

列昂尼得·列昂诺夫

土库曼斯坦 尼·吉洪诺夫

巴斯马奇和阿富汗 列夫·尼库林

乌拉尔各工厂

阿尔乔姆·韦肖雷

扎戈沃雷

奥丽珈·福尔什

我认为，上述作家参加历史材料的文字加工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他们应该使这本书通俗易懂，明快生动，把该书编成充满感情的文艺作品。^①

这项工作还可得到一个附带收获：它将使我们的作家接近工人阶级的事业，令他们获得新的题材。我们那种含糊不清的、轻率的、偏袒的和过于自我欣赏的批评并没有使作家受到教育。这种批评比它试图教训的人更远离生活，它并不十分清楚应该教训什么。

我恳切地请求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对这一宏大而重要的事情，即出版《国内战争史》一事给予决定性的推动。我相信这件事的重要性能得到您的深刻理解，也合乎您的心意。

应该把这本书献给红军战士，并宣布该书为所有红军图书馆的必藏书。我备感伤心的是，今年我不能回莫斯科^②给同志们作有关这件事的详细报告。但是我想，前面谈到的情况已足够清楚地说明了尽快着手实现此事的必要性。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想还应专为农民出一个出版物，请您对此做出决定。这个出版物应是报纸，它应向农村介绍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活，使我们的农民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相互关系，了解它们在非洲、亚洲的殖民主义政策，了解这些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巩固自己对庄稼汉的控制而采用的一切手段，总之，这个出版物要广泛而鲜明地介绍西欧各国的现代政治生活情况。

^① 高尔基在这里说明了组织编写《国内战争史》的初步计划。该计划在下述两份材料中得到进一步的反映：《国内战争史·总编部批准的出版计划》1932年莫斯科版；《十月革命史和国内战争史的图书目录材料和档案专题卡片分类提纲》1933年莫斯科版。

^② 由于健康原因，1930年高尔基没有回苏联。

我们的中央机关报和地区机关报都是以电报和社论的形式报道这些消息的，无论是电报还是社论都是用“深奥的”语言写的，根本没有考虑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能否读懂。

应当给农村办一份类似《农民报》^①的政治报纸，它应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资产阶级政策的各种花招，当然也包括对苏联的态度方面的花招。现在应该建议《农民报》每月出版两次或四次特别“附刊”，为此该报可以利用《在国外》^②杂志上的部分材料。

然后再把这个附刊扩展成一份通俗报纸，这个报纸也应对政治“事件”即各种事端、讹诈、欺骗等进行评述。应该把这份报纸办得趣味盎然，读起来轻松愉快，但又不损害其严肃的和十分重要的基本目标：向农民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瓦解过程。

祝一切顺利！紧握您的手！

阿·彼什科夫
1930年6月5日

^① 联共（布）中央报纸，1923～1939年在莫斯科出版，每月15期。

^② 该杂志第一期于1930年6月25日出版。

No04505

高尔基就《国内战争史》交稿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1933年1月16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国内战争史》秘书处已经结束了前四卷的材料收集工作^①。现在，主编委员会必须确定加工这些材料的作者，而这也正是我想恳求您的。作者们应该在3月31日前交出手稿。请您务必推动一下这件事！我有一种感觉，主编委员会在拖延这项工作。

我以深深的欣慰和赞赏之情读了您在全会上所作的有力和睿智的讲话^②。我完全相信，它将激起全世界所有劳动者同样有力的反响。在它平静而又严谨的形式下蕴含着如此响亮的惊雷，仿佛您将过去建设岁月的隆隆响声注入了讲话中。我知道，您是不需要赞扬的，但是我认为，我是有权利对您讲真话的。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维埃联盟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个伊里奇的人。紧握您的手，亲爱的、尊敬的同志。

阿·彼什科夫

① 出版多卷本《苏联国内战争史》的想法是在1928年由高尔基提出的，并于1931年7月获得中央政治局赞同。主编委员会由高尔基领导。

② 这里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在1933年1月7~12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这个报告于1月10日刊登在《真理报》上。

背面

为什么“全苏人学研究所”的建设拖延了五年？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打击了被您唤起的学者兄弟们的激情。您在会议上曾亲口说过，他们没有理由考虑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三年之中建成。设计总局甚至建议在二年之中完成。我这样着急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文化机构的建设总是落后于工业部门的建设。就研究院目标的广泛和新颖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与其说我们将要建成它，还不如说我们将引起欧洲和美国学者的关注和兴趣，这笔“精神外汇”是能够转变为现实外汇的。也许您已听说了一个美国工程师为建设研究院无偿提供服务的事情？我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宣布研究院建设工程为突击项目，那么，我们就会获得更多的这样的帮助。

多保重，亲爱的约·维·！

阿·彼什科夫

33年1月16日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①想举办全苏喜剧竞赛，我将竞赛的建议方案附上。

在文学工作者的圈子里经常能感觉到强烈的生机和严肃工作的愿望，因此，竞赛是会产生好的结果的。但是，对于全苏竞赛来说，七个奖项太少了，应该增加到15个，而一等奖的奖金应提高到二万五千卢布——不管它了，并给奖金冠以斯大林的名字，因为，要知道，这个主意还是您想出来的呢。

^① 托尔斯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882/1883—1945），俄苏作家，其主要作品有反映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所走道路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历史长篇小说《彼得大帝》1—3卷（未完成），长篇科幻小说《艾里达》、《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剧本《伊凡雷帝》等。

除此之外，为什么只有喜剧呢？应该也包括话剧。

因而，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让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文学工作者都参加竞赛。我们中央的剧院应该开始重视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鞑靼等等各民族的剧作艺术。这对于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在苏维埃联盟中，血缘融合过程和新的种族产生的过程正在广泛发展，因此不能忘记文化融合的所有可能性。

您是否委派一名同志来谈谈组织这个竞赛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不应该把托尔斯泰排除在外，他是一个“性急”的人，但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

可能让你厌烦了，请原谅。

阿·彼·

№ 11616

斯大林关于《国内战争史》一书 给高尔基的信

（1933年2月3日）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

1933年1月16日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的热情话语和“赞扬”。无论人们怎样神气十足，他们对于“赞扬”还是不能做到无动于衷的。很清楚，作为一个人，我也不例外。

1. 关于《国内战争史》一事，看来，目前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要糟些。给您寄去一份《国内战争史》秘书处关于出版前四卷的准备工作状况的报告，以便您了解情况。从报告中您将看到，甚至不能保证在1933年6—7月份这个期限内出版前二卷。在秘书处成员和主编委员会会议上（我和莫洛托夫出席了会议，[其他人不在莫斯科]），通过了关于前二卷的决定。克留奇科夫同志^①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正在列宁格勒。附上会议记录。

2. 关于“全苏人学研究所”事宜，只要一接到列宁格勒学者提出的具体方案，我们就立即推进这项工作。

3. 近期我们就进行喜剧（悲剧）竞赛，不让托尔斯泰走掉。保证一切都按您的要求去做。关于“奖金冠以斯大林的名字”，我坚决（坚决！）反对。

^① П.П. 克留奇科夫（1889—1938），高尔基的秘书。

敬礼！握您的手！
又及：请保重身体。

约·斯大林

【专题说明】

关于驱逐知识分子

(1922年7月至12月)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各种思潮比较活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要求政府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较为宽松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人公开表示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蜕变。在1922年上半年召开的各种知识分子职业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纷纷反对官员们外行的行政干预、要求允许思想的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主要思想的实现。《真理报》就此评论说，他们是“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和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压力加强了。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有近30次会议是研究查封有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取缔反苏维埃党派、驱逐其代表人物等问题的。

列宁在1月31日给契卡副主席温什利赫特的信中要求“加强（并尽快）对孟什维克镇压”。5月，他同捷尔任斯基谈了“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7月，他给斯大林写信谈了驱逐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家的问题，并直接点了一批应该“坚决除掉”和“统统赶出俄国”的人的姓名。7月20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最后决定了驱逐问题。8月上旬召开的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认为，采取极端措施是必要的。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据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有权不经审判把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驱逐出境或流放到国内的指定地区。

随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等地采取了驱逐行动。月底，公布了关于逮捕和驱逐一批科学家、文学家、医生、农艺师出境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说：“正在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而托洛茨基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认为，在和平时期把他们驱逐出境是人道主义的。9月初，列宁在同捷尔任斯基谈话时明确指示，要继续坚持驱逐猖狂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孟什维克）。1922年被驱逐知识分子的总数无据可查，根据这一年公布的有关资料，从8月到12月有300~400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

本专题收入的文件内容包括拟驱逐的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列入名单人员的情况介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别尔嘉耶夫案件的有关情况以及列宁就罗日科夫的处理问题致中央全会的电报等。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吕允连、杨世招翻译）

No 07315

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①

(1922年7月)

彼得格勒市反苏维埃知识分子名单

1. 索罗金，皮季里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已逮捕，拟驱逐。
2. 伊兹戈耶夫（兰德），亚历山大·所罗门诺维奇——已逮捕，拟驱逐，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3. 祖巴舍夫，E.Л.——已逮捕，拟驱逐，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4. 布鲁茨库斯，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已逮捕，拟驱逐，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5. 卡甘，A.C.——已逮捕，拟驱逐，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6. 卢托欣，Д.А.——已逮捕，拟驱逐，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7. 布姆皮扬斯基，Л.М.——已逮捕，拟驱逐，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8. 弗罗梅特——未抓到。
9. 扎米亚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

^① 这份拟驱逐的各方面专家的名单是1922年夏秋拟定的。破折号以后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对所列人员处理意见所做的附注。

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

10. 彼得里谢夫, A. B.——已逮捕, 拟驱逐。

11. 布尔加柯夫,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未抓到。

12. 沃尔科维斯基, H. M.——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13. 哈里顿, 鲍里斯——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14. 恰达耶夫——未抓到。

15. 卡尔萨文, 列夫·普拉托诺维奇——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16. 洛斯基, 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已逮捕, 拟驱逐。

17. 古特金, A. Я.——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出狱清理个人事务。

18. 坎采尔, 叶菲姆·谢苗诺维奇——暂缓驱逐, 待收到齐佩罗维奇同志的担保和担保理由后再定——委员会1922年8月31日决定。

19. 兹巴爾斯基, 达维德·所罗门诺维奇——未抓到。

20. 萨德科娃, Ю. H.——已逮捕, 应驱逐, 释放。

21. 布龙施泰因, 伊赛·叶夫谢耶维奇——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

22. 帕夫洛夫, 帕维尔·帕夫罗维奇——未抓到。

23. 卡尔根斯,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

24. 索罗韦伊奇克, 埃马努伊尔·鲍里索维奇——未抓到。

彼得格勒市教授联合会成员名单

25. 波列季卡——未抓到。

26. 奥金佐夫,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已逮捕, 拟驱逐,

释放。

27. 拉普申，伊凡·伊万诺维奇——已逮捕，拟驱逐，释放。

28. 波利涅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已逮捕，拟驱逐，释放。

29. 安东诺夫斯卡娅，娜杰日达·格里戈里耶夫娜——未抓到。

30. 谢列瓦诺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已逮捕，拟驱逐，释放。

31. 弗伦克尔，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未抓到。

32. 奥斯特洛夫斯基，安德烈——已逮捕，拟驱逐，释放。

33. 布托夫，帕维尔·伊里奇——未抓到。

34. 维斯洛乌赫，斯坦尼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逮捕，拟驱逐，释放。

35. 韦策尔，格尔曼·鲁道福维奇——未抓到。

36. 科尔什——未抓到。

37. 纳罗伊科——同上。

38. 施泰因，维克托·马里佐维奇——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主持的委员会决定，取消驱逐，留在彼得格勒。见专门注销名单。

39. 萨维奇——因参加反苏维埃组织交付法庭审判，不驱逐出境，监禁。

40. 博戈列波夫，A.A.——未抓到。

41. 奥索金，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拟驱逐，释放。

42. 博利沙科夫，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未抓到。

43. 古萨罗夫，伊格纳季·叶夫多基莫维奇

44. 叶尔莫拉耶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45. 叶列梅耶夫，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46. 捷利捷夫斯基，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

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主持的委员会的决定，因被指控参加反苏

维埃组织，另案处理，不驱逐出境，全部交付法庭审判。不予释放。

47. 叶夫多基莫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已逮捕，应驱逐，释放。

48. 罗日科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未抓到。

49. 格列茨基，维克托·雅科夫列维奇——未抓到。

50. 克列门斯——未抓到。

51. 克罗赫马尔，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因其亲自致函捷尔任斯基同志，保证忠于苏维埃政权，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主持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取消驱逐。

Л. 加米涅夫、И. 库尔斯基、И. 温什利赫特

注：根据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捷尔任斯基同志主持的委员会审议了对那些被认为在本部门无人可以取代、且有关机构要求将其留原地工作的人员取消驱逐的申请。

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

Г. 亚戈达

积极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知识分子名单

1922年7月31日

第一—莫斯科大学教授

1. 斯特拉托诺夫，弗谢沃洛德·维克托罗维奇——拟驱逐，释放。

2. 福明，瓦西里·叶梅利亚诺维奇——根据雅科夫列娃和波格

丹诺夫同志请求，委员会 1922 年 8 月 31 日决定取消驱逐。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授

4. ① 亚辛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5. 布里林格，尼古拉·罗曼诺维奇——不驱逐，移交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处，追究反革命活动罪。

6. 库科列夫斯基，伊万·伊万诺维奇——暂缓驱逐，待波格丹诺夫同志提出不予驱逐的理由。

7. 兹沃雷金，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拟驱逐，释放。

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斯基农学院教授

8. 阿尔托博列夫斯基，伊万·阿尔谢尼耶维奇——已移交革命法庭，被指控鼓动反对没收教会财产。

9. 乌沙科夫——拟驱逐，释放。

交通工程学院教授

10. 佳普金，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已将案件移交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处，追究反革命活动罪，关押。

自由经济学会案

11. 乌格里莫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其他各学校教授

12. 奥夫钦尼科夫（喀山）——未逮捕，下落不明。

13. 韦利霍夫，帕维尔·安克洛诺维奇——已将案件移交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处，追究反革命活动罪，关押。

14. 洛斯库托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未抓到。

15. 特罗申，П.В.（喀山）——未抓到。

16. 诺维科夫，M.M.——拟驱逐，释放。

17. 伊利英，H.A.——拟驱逐，释放。

① 原文序号如此。

考古研究所反苏维埃教授名单

18. 乌斯宾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因鼓动反对没收教会财产，被斯摩梭斯克革命法庭判处10年监禁。

19. 茨韦特科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拟驱逐，释放。

20. 博尔德金，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拟驱逐，释放。

21. 科罗布科夫，尼古拉·米哈伊洛奇——因病重，经委员会1922年8月31日研究，取消驱逐，肺结核晚期。

“岸”出版社案件中的反苏维埃积极分子总名单

22. 特鲁别茨科伊，谢尔盖·叶夫根耶维奇——拟驱逐，释放。

23. 费尔德施泰因，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第813号案件涉案人员名单（阿布里科索夫集团）

24. 阿布里科索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拟驱逐，释放。

25. 库兹明-卡拉瓦耶夫，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拟驱逐，释放。

26. 巴伊科夫，阿列克谢·利沃维奇——拟驱逐，释放。

27. 阿尔布佐夫，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拟驱逐，释放。

苏维埃农艺师和合作社工作人员名单

28. 雷尼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根据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请求，取消驱逐。

29. 柳比莫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30. 马特维耶夫，伊万·彼得罗维奇——拟驱逐，释放。

31. 罗莫达诺夫斯基，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拟驱逐，释放。

32. 康德拉季耶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因协助社会

革命党人案已被起诉，暂缓驱逐，关押。

33. 基利切夫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加福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34. 布拉托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夫哥罗德）——拟驱逐，释放。

35. 西吉尔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36. 希什金，马特维·德米特里耶维奇（沃洛格达）——拟驱逐，释放。

37. 巴卡尔，И.Ю.（左派社会革命人）——拟驱逐，释放。

38. 马洛列特尼科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拟驱逐，释放。

39. 克列泽茨基（特维尔）——未抓到。

医生名单

40. 伊兹拉伊尔松（奥廖尔）——流放吉尔吉斯边区2年，从事医生专业工作。

41. 法林（沃洛格达）——流放沃洛格达2年，从事医生专业工作。

42. 罗扎诺夫（萨拉托夫）——流放突厥斯坦，从事医生专业工作。

反苏工程师名单（莫斯科）

43. 巴利钦斯基，彼得·亚基莫维奇——拟驱逐，关押。

44. 巴尔申，尼古拉·叶夫格拉福维奇——取消驱逐，待查清与斯捷克洛夫和波格丹诺夫同志有关的问题后再定。

45. 尤什金，伊万·伊万诺维奇——拟驱逐，释放。

46. 瓦伊斯贝格——未抓到。

47. 萨哈罗夫，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意图，予以释放并结案。

作家名单

48. 弗兰克, 谢苗·路德维戈维奇——拟驱逐, 释放。
49. 罗森贝格——拟驱逐, 释放。
50. 基泽韦捷尔,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拟驱逐, 释放。
51. 奥泽列茨科夫斯基, 维尼阿明·谢尔盖耶维奇——拟驱逐, 释放。
52. 尤罗夫斯基, 亚历山大·纳乌莫维奇——不驱逐, 1922年8月31日委员会根据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的请求决定。
53. 奥加诺夫斯基,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未抓到。
54. 艾亨瓦尔德, 尤里·伊萨耶维奇——拟驱逐, 释放。
55. 别尔嘉耶夫,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拟驱逐, 释放。
56. 奥泽罗夫, 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暂缓驱逐, 待下达调查马雷舍夫同志问题的专门指示后再定。
57. 奥索尔金,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拟驱逐, 释放。
58. 马图谢维奇,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拟驱逐, 释放。
59. 叶菲莫夫(教授)——未抓到。

莫斯科反苏维埃知识分子(教授)补充名单

1922年7月31日

1. 克拉韦茨, 托里昌·帕夫洛维奇——已将案件移交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处, 追究反革命活动罪, 关押。
2. 伊兹加雷舍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取消驱逐, 就其留在俄罗斯联邦一事进行正式调查。

作家名单

3. 库德里亚采夫,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拟驱逐, 释放。

4. 米雅柯金，韦涅季克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拟驱逐，释放。
5. 佩舍霍诺夫，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拟驱逐，释放。
6. 斯杰普恩，费奥多尔·奥古斯托维奇——未抓到。
7. 切尔诺鲁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未抓到。
8. 伊久莫夫，亚历山大·菲拉列托维奇——驱逐，释放。

Л. 加米涅夫、Л. 库尔斯基、温什里赫特

列入《反苏知识分子名单》的人员简介

艾亨瓦尔德，尤里·伊萨耶维奇（1872～1928）——文学评论家。1922年出版文集《男女诗人》，文集因为君主制辩护遭《真理报》激烈批判。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著作：《俄罗斯作家剪影》，莫斯科，1906～1910年，1～3册；《普希金》，莫斯科，1908年；《评西方作家》，莫斯科，1910年。翻译了《阿·叔本华全集》（1～4卷，莫斯科，1901～1910年）。

巴卡尔，И.Ю.（1893～？）——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主席（1917年10月～1918年7月）。1920年起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合法）中央局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74～1948）——著名宗教哲学家。自由精神文化学院的组织者和院长（莫斯科，1918～1922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研究所（柏林）历史部主任，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柏林）创建者。学术著作：《自由的哲学》，莫斯科，1911年；《创造的涵义·人的辩证经验》，莫斯科，1916年；《历史的涵义·人类意识哲学的经验》，柏

林，1923年；《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历史与涵义》，巴黎，1937年。

博戈列波夫，A.A.——法学家，彼得堡大学副校长。

布鲁茨库斯，鲍里斯·达维多维奇（1874—1938）——经济学家，彼得堡农学院教授（1907—1922），农业问题最高委员会委员（1917年），农业规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曾在合法刊物《经济学家》（彼得格勒，1922年，第1—3期）上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问题》。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柏林俄罗斯研究所教授。被纳粹分子驱逐。后为耶路撒冷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学术著作：《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彼得格勒，1922年；《农业经济》，列宁格勒，1924年；《苏维埃俄罗斯的经济规划》，耶路撒冷，1934年，等等。

布拉托夫，A.A.（1877—？）——立宪民主党人，诺夫哥罗德信贷基金理事会主席（1916年）。临时政府诺夫哥罗德省政治委员（1917年），诺夫哥罗德劳动组合联合会主席（1919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布尔加柯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71—1944）——宗教哲学家，经济学家。先后在基辅（1901—1906）和莫斯科（1906—1918）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23年起流亡国外。俄罗斯神学院教义学教授、系主任（巴黎，1925—1944年）。学术著作：《两个都市》，莫斯科，1911年；《经济哲学》，莫斯科，1912年；《烧不毁的灌木》，巴黎，1927年；《论人间圣灵·三部曲》，巴黎，1933—1945年，等等。

韦利霍夫，帕维尔·安克洛诺维奇——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8—1920）。

沃尔科维斯基，H.M.——记者。诗人H.C.古米廖夫的朋友。曾与诗人的其他学生和崇拜者向肃反委员会提出请求，保释被捕的H.C.古米廖夫（1921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伊兹戈耶夫（兰德）·亚历山大·所罗门诺维奇（1872～1935）——立宪民主党思想家之一。1922年曾在合法杂志《晨寒》上发表文章。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主要著作：《我国的政党》，彼得格勒，1917年；《广泛的权力》，彼得格勒，1917年；《俄国社会与革命》，彼得格勒，1917年；《彼·阿·斯托雷平》，彼得格勒，1917年；《第二次俄国革命中的社会主义者》，彼得格勒，1917年。

伊久莫夫，亚历山大·菲拉列托维奇（1885～1950）——历史学家。1914～1918年服现役。1918～1922年任档案总局主任视察员、科斯特罗马大学和莫斯科工人培训班大学部教师。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1922～1925年在俄罗斯研究所（柏林）任教。1925年起任俄罗斯国外历史档案馆（布拉格）文献部主任。

卡甘，A.C.——《经济学家》杂志编辑。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

卡尔萨文，列夫·普拉托诺维奇（1882～1952）——宗教哲学家，中世纪史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1912年起）、考纳斯大学教授（1928年起）、维尔纽斯大学教授（1940～1946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著作：《十二至十三世纪意大利宗教生活概况》，圣彼得堡，1912年；《东方、西方与俄罗斯思想》，彼得格勒，1922；《历史哲学》，柏林，1923年；等等。

基泽韦捷尔，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866～1933）——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06年起），第二届国家杜马成员。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917～1922），布拉格大学教授。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学术著作：《十八世纪俄罗斯的城郊村社》，莫斯科，190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市政自治条例》，莫斯科，1909年；《历史概论》，莫斯科，1912年；《历史剪影——人物与事件》，柏林，1931年；等等。

康德拉季耶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92～1938）——经济学家。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1917年10月），亚·费·克伦斯基的农业事务私人秘书（1919年）。是得到俄国最高执政亚·瓦·高尔察克承认的地下组织“俄罗斯复兴联盟”的成员（1918年）。被判处在集中营囚禁“至内战结束”（1920）年。一个月后被特赦。莫斯科农学院教授。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1920～1928）。后被镇压。

克罗赫马尔，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1873～1933）——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代理人（1901～190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孟什维克委员（1904）。十月革命后任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主任，后因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发现对抗执政党经济政策的反苏维埃集团被撤职（1920年）。

拉普申，伊万·伊万诺维奇（1870～1952）——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1906年起），俄罗斯法学系教授（布拉格）。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学术著作：《思想规律和认知形式》，圣彼得堡，1906年；《最新哲学中“另一个我”的问题》，圣彼得堡，1901年；《发明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发明》，布拉格，1924年，1～2卷；等等。

洛斯基，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1870～1965）——宗教哲学家。彼得格勒大学教授（1916年起），俄罗斯神学院教授（纽约，1947～1950）。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学术著作：《世界是个有机整体》，莫斯科，1917年；《直觉主义的论据》，柏林，1924年；《绝对善的条件（美学原理）》，巴黎，1931年；《感性直觉、理性知觉和神秘知觉》，巴黎，19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基督教世界观》，纽约，1953年。

卢托欣，达尔马特·亚历山德罗维奇（1885～1942）——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经济学家》刊物编辑。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

斯联邦。1927年返回苏联。

米雅柯金，韦涅季克特·亚历山德罗维奇（1867～1937）——人民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历史学家，政论家。地下组织“俄罗斯复兴会”创建人（1918～1919）。被判死刑，后改为5年监禁（1920年）。1921年获特赦。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国外历史档案馆馆员（布拉格，1923年），索菲亚大学教授（1930年起）。学术著作：《波兰被瓜分时代的农民问题》，圣彼得堡，1889；《亚当·密茨凯维奇》，圣彼得堡，1891年；《大司祭阿瓦库姆》，第4版，彼得格勒，1917年；《十七至十八世纪乌克兰社会历史概论》，布拉格，1924～1926年，第1卷，第1～3册；等等。

诺维科夫，M.M.（1876～？）——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至1918年底）。生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校长（1919～1920）。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布拉格卡尔洛夫大学教授。

奥加诺夫斯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农业经济学家。莫斯科商学院教师。

奥泽罗夫，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1869～1942）——经济学家。先后任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阶级合作政策的拥护者。代表科学院和大学的国务会议成员（1909～1917）。自三十年代起住在老龄学者之家（列宁格勒）。

奥金佐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土壤学家。彼得堡大学副校长。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

奥索尔金（伊利英），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878～1942）——作家，记者。社会革命党人（1905～1906年）。参加过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记者协会主席和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副主席。全俄救助饥饿者委员会积极分子（1921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遭纳粹分子迫害。著作：《暗探局及其秘密》，莫斯科，1917年；《幽灵》，莫斯科，1917年；

《西夫采夫·弗拉若克》，巴黎，1928年；《人的作品》，巴黎，1929年；《时代》，巴黎，1955年；等等。

巴利钦斯基，彼得·亚基莫维奇（1875～1929）——矿山工程师。共济会会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1917年），冬宫卫队队长（1917年10月25日）。1918年6月至1919年2月作为人质被关押。中央专家顾问委员会经济和技术问题局成员。彼得格勒矿山学院教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委员会成员。后被镇压。

佩舍霍诺夫，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1867～1933）——人民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1906年始）。统计学家，政论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成员，临时政府粮食部长（1917年）。俄罗斯最高执政亚·瓦·高尔察克承认的“俄罗斯复兴联盟”成员。1921年作为乌克兰中央统计局工作人员被指控在报告中压低乌克兰粮食储备数据。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波利涅尔，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数学教师。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布姆皮扬斯基，Л.М.——《经济学家》刊物编辑，多次撰文维护私有制。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罗日科夫，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68～1927）——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905年加入俄社会民主工党，在不同年代分别当选为布尔什维克或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临时政府邮电部副部长（1917年5～7月）。20年代初两度被捕。流放普斯科夫（1922～1924）。1922年与孟什维克决裂。1924～1927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科研部门和高校工作。

索罗金，皮季里姆·亚历山德罗维奇（1889～1968）——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17年），亚·费·克伦斯基的秘书（1917年）。拟议中的北方州反苏维埃临时政府部长候选人（1918年），1918年

底退出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大学教授（1919—1922），哈佛大学教授（1930—1964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社会学家。社会层次论、社会变动性和趋同性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学术著作：《社会学体系》，彼得格勒，1920年，第1~2卷；《革命社会学》，伦敦，1925年；《社会的变动性》，纽约，伦敦，1927年；《社会和文化进程》，纽约，1962年，第1~4卷；《我们时代的基本趋势》，纽黑文，1964年；等等。

斯捷普恩，费奥多尔·奥古斯托维奇（1884—1965）——宗教哲学家，趋同性理论的拥护者。国家示范剧院艺术指导（莫斯科，1919—1920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1926~1937年任德累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后被法西斯分子撤职。自1946年起在慕尼黑大学讲授俄罗斯宗教思想史。主要哲学著作收入《生活与创造》（柏林，1923年）一书。

斯特拉托诺夫，弗谢沃洛德·维克托罗维奇——第一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主席团主席。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特罗申，П.В.——精神病专家，喀山大学医学系主任。

特鲁别茨科伊，谢尔盖·叶夫根尼耶维奇——公爵，军官。同情十月革命党人。俄罗斯最高执政亚·瓦·高尔察克承认的地下组织“民族中心”成员（1919年）。后被判处10年监禁（1920年）。1921年获特赦，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乌格里莫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莫斯科农业协会主席，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积极分子（1921年）。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费尔德施泰因，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历史学家，律师，教授。俄罗斯最高执政亚·瓦·高尔察克承认的地下组织“民族中心”成员（1919年）。后来认为必须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弗兰克，谢苗·路德维戈维奇（1877～1950）——宗教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萨拉托夫大学教授（1917～1921年），莫斯科大学教授（1921～1922年）。激烈反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精神和社会唯理论”的极端形式。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学术著作：《认知的客体》，彼得格勒，1915年；《社会科学方法概述》，莫斯科，1922年；《积极的认知》，柏林，1923年；《偶像的崩溃》，柏林，1924年；《社会的精神基础》，巴黎，1930年；《不可认识的事物》，巴黎，1939年；《黑暗中的光明——基督教伦理学经验》，巴黎，1949年；《现实和人·人存在的形而上学》，巴黎，1965年；等等。

切尔诺鲁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人民社会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亚辛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维奇——铁路运输工程师，学者之家（莫斯科）理事会主席。1922年被驱逐出俄罗斯联邦。

№1161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

(1922年8月10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 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

2. 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审议具体人员的驱逐问题。

3. 对每一人员的驱逐决定必须附有驱逐原因的详细说明。

4. 驱逐决定中心须写明驱逐地区和驱逐时间。

5. 驱逐地区名单由特别委员会呈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

6. 行政驱逐期限不超过3年。

7. 被行政驱逐的人员在驱逐期间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8. 被驱逐到某一地区的人员由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机构监督，并由其决定被驱逐人员在流放地区的居住地。

9. 从流放地或在流放途中逃跑，由法庭按刑法第95条惩处。

内务人民委员部依据本决定向地方机关颁发指示细则。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A. 叶努基泽

No 11613

关于驱逐别尔嘉耶夫^①的有关材料

(1922年8月18日)

对尼·亚·别尔嘉耶夫的审讯记录

保密处

……我是下面署名的人，作为被告受审，我供述如下：

1. 姓——别尔嘉耶夫。2. 名和父称——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3. 年龄——48岁。4. 出身——基辅前贵族。5. 居住地——莫斯科市，大弗拉西耶夫斯基大街14号3单元。6. 职业——作家兼学者。7. 家庭状况——已婚。8. 财产状况——没有财产。9. 属何党团——无党派。10. 政治信仰——信奉基督教社会，它是建立在任何政党都没实现过的基督教自由和基督教平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既不拥护资产阶级社会，也不拥护共产主义。11. 文化程度——大学，专业——哲学。12. 在何处任何职——（1）1914年战争之前，没在任何地方供职，从事文学写作；（2）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也没在任何地方供职，而从事文学科研活动；（3）1917年十月革命前——同样没在任何地方供职；（4）自十月革命至被捕前，在档案总局工作，1920年被选为国立莫斯科大学教师，在国立语言学院授课，是俄罗斯美术科学院院士。13. 有否犯罪前科——1915年曾因写反对正教院的文章被按文学政治罪案起诉，

^① 别尔嘉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74—1948），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1922年被驱逐出境。

被判渎神罪。1920年曾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审讯，但没交法院判刑。另外补充一点：从1900年至1903年，曾因政治案被流放沃洛格达。

实质供述：

问：别尔嘉耶夫公民，请您谈谈对苏维埃政权结构和无产阶级国家体制的看法。

答：根据自己的信念，我不能赞成阶级观点，并一视同仁地认为，不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局限而自私的。我赞成人和人类的观点，所有阶级和政党的眼界都应提高到这个高度。至于我个人的意识形态，我认为是贵族阶级的，这不是指字面意义而言，而是指建立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干、最有教养、最高尚的人的统治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民主政治是错误的，因为它主张多数人的统治……其实，社会见解和自然知识可以在人类和民族精神振兴的基础上形成。我不相信当局的愿望和物质的复兴道路。我认为，俄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国家，因为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

问：请谈谈您对知识分子的任务以及所谓“社会”的任务有什么看法。

答：我认为，知识分子在各个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任务，就是捍卫充满崇高精神的原则，使物质的动因从属于精神文化思想，知识分子应成为科学、道德、美学意识的代表。我认为，社会人士和国家当权人士应相互促进和合作……

问：谈谈您对诸如教授罢教这种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方式是什么态度。

答：我对这件事知之甚少，所以无法最终评论它。如果教授们是为了科学和知识的利益而斗争，我认为他们的斗争是正当的。如

果他们是从纯经济的角度出发，那我认为是错误的。

问：谈谈您对路标转换派、萨文科夫和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诉讼案^①的态度。

答：我对路标转换派更多地是持否定态度。我只读过一本文集，发现书中空话连篇，对俄国生活太缺乏了解。

我赞成对侨民和国外试图强行改变俄罗斯生活进程的做法所持的批评态度。我对萨文科夫的企图持否定态度^②。我没有注意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诉讼案。我认为对社会革命党人的严厉判决是错误的，所以对该判决不表赞同。

问：谈谈您对苏维埃政权在高等学校所采取的政策有什么看法以及您对高校改革的态度^③。

答：我不赞同苏维埃政权对高等学校采取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压制了先前的哲学自由。

问：请谈谈您对国外俄罗斯侨民前景的看法。

答：我认为，侨民中多数人处境艰难，据我所知，侨民的观点是由于对俄国生活进程不了解和不理解造成的。我对政党持否定态度，我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党，今后也将不属于任何政党。在现有的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同情。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审讯人 巴赫瓦洛夫

① 1922年7月8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恐怖活动案进行了审理。

② 1921年，萨文科夫在国外建立了“保卫祖国和自由的人民同盟”，该同盟的目的是在俄罗斯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全面起义。

③ 1921-1922年进行的改革取消了高等学校的自治。

№ 11614

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驱逐 尼·亚·别尔嘉耶夫的结论意见

(1922年8月19日)

……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密处四科工作人员巴赫瓦洛夫。现将对第15564号关于别尔嘉耶夫案的审理结果报告如下：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48岁，出身于基辅市一个前贵族家庭（临时居住莫斯科市）。

从十月革命起到目前为止的5年时间里，他不仅一直对俄罗斯工农现政权不满，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反苏维埃活动，而且利用目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外交困难，加紧了反革命活动……鉴于上述情况，根据今年2月6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条例》“e”条第2款，为防范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今后继续进行反苏维埃活动，我认为应将其无限期驱逐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鉴于别尔嘉耶夫公民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会递交的请求允许他自费出国的申请，特将其释放7天，以安排其私人事务和交待工作，并责成其在该期限届满时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到，随后立即前往国外……

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密处四科
科长助理 巴赫瓦洛夫

同意。

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密处
四科科长 11. 列舍托夫

同意。

萨姆索诺夫 [国家政治
保卫局保密处处长]
温什利赫特 [国家政治
保卫局副局长]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会 1922 年 8 月 21 日庭审记录摘要

听取：

第 15564 号案。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嘉耶夫因进行反苏维埃活动被起诉。8 月 17 日被捕。关押在内务部监狱。

由巴赫瓦洛夫同志报告

温什利赫特同志批准

决定：

根据 2 月 6 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条例》“e”条第 2 款驱逐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释放 7 天，责成其期满到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到。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会书记员

叶泽尔斯卡娅

附件

别尔嘉耶夫反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言论
(摘自 1919~1920 年在莫斯科讲课的讲义)

……在人类的历史命运中，实际上一切都没有成功，可以有根

据地认为，永远不会成功……

我们时代所寄托的那种基本的思想和任务也不会成功，人们企图实现的在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一历史时期大概要起很大作用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成功。社会主义在其进行的尝试中根本不会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东西。它会引发人类生活中新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会使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那些任务无法实现。它永远不会实现马克思通过束缚劳动来达到的那种人类劳动的解放，永远不会将人类引向富裕，不会实现平等，而只会造成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敌视，新的分化，新的前所未闻的压迫形式……

自由之路艰难而又悲壮，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比自由之路更为重要、更为英勇而又痛苦的道路。任何必然之路和强制之路都是比较轻松、较少悲壮、较少英雄气概之路。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其历史的进程中往往受到诱惑，以强制之路偷换自由之路而走上歧途……这种诱惑在过去产生了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而现在则产生社会主义宗教，它不是别的，正是大宗教裁判官的宗教，其基础就是偷换自由之路，给人卸去悲剧性的自由的重负。历史的悲剧就是这样上演的，自由因素与强制因素经常发生斗争，一种因素经常转换为另一种因素……

历史不能解决人的个人命运问题，即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创作灵感的题材，与整个历史玄学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命运的问题。个人命运这一问题在历史范围内无法解决，在历史范围内，个人命运与世界命运、与整个人类命运的悲剧冲突无法解决。因此，历史应当结束。世界应当进入一个这样高级的现实，进入一个这样完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个人命运问题能够解决，人的个人命运与世界命运的悲剧冲突能够找到出路。历史首先是命运，作为命运，作为悲剧命运，它应当能被认识。悲剧命运同一切悲剧一样，应当有最后的大结局的一幕。悲剧中精神的解脱必不可免。历史之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会无止境的发展，没有自然现象所具有的规律性，是因为历史就是命运。历史玄学的最后结论和最后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通过历史的各个时期仔细研究的人的命运，无法在历史范围内解决。历史的玄学教导我们，在历史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可以在历史之外解决。这就是证明历史并非不可认识、历史有高深涵义的最大论据。假若历史只有内在的世俗涵义，那样的话，历史就不可思议，因为这样一来，与时代特性交织在一起的一切主要困难就无法解决，或者说一切解决办法都是虚假的，看来是不真实的。这种相对悲观的历史玄学与那种同神化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幻想毫不相干，它否定进步思想，但是会增强在永恒的未来、在永恒的现实的未来解决所有历史痛苦的希望和期待。从最终的深层意义上说，比起那种没有欢乐的、对一切生灵都致命的乐观主义的进步学说，这种悲观的历史玄学更为乐观。某种内部的进步会发生，其后，全世界的历史将不会像从精神深处抛出的那样，以杀戮性时间长河的未来出现，而是以永恒的未来，美好历史的未来出现。它将如同举行永恒的秘密宗教仪式的时刻，回到精神的深处。

№07316

列宁就罗日科夫问题致中央全会的信

(1922年12月13日)

斯大林同志：

为正确评价我们在罗日科夫问题上的分歧，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已提交政治局好几次了。第一次，托洛茨基主张延期驱逐罗日科夫。第二次，当罗日科夫在梅森的压力下重新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后，托洛茨基又主张驱逐他，认为他的这一表态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明显暴露出罗日科夫观点的虚伪性。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的看法，即罗日科夫是个思想顽固且毫不掩饰的人，只不过与梅森作了交易，向我们让步，随便发表一个反对孟什维克的声明，其动机完全与我们当时进入国家杜马时签字效忠沙皇一样。因此，如果让斯捷克洛夫或别的什么人利用罗日科夫的声明（比如，用来向孟什维克“挑战”），第一，达不到目的，第二，会使我们自取其辱，因为孟什维克会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一直和我们一样，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同意签署任何效忠誓言的，这样与孟什维克“决斗”，我们将全军覆没。

我建议：第一，将罗日科夫驱逐出境；第二，如果不行（比如，因罗日科夫年事已高应予从宽处理），那就不应该将罗日科夫被迫作的声明交给任何报刊进行公开讨论。那样的话，就应该等待，那怕是再等几年，等罗日科夫做出对我们有利的真诚的声明。而在此之前，我建议将他派到比如普斯科夫市，预先为他准备好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并在物质和工作方面给予保障。但必须对他严加监

视，因为这个人现在是、大概最终也将是我们的敌人。

列 宁

电话记录 莉季娅·福季耶娃^①

^① 莉·亚·福季耶娃（1881—1975），1904年入党，1918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担任列宁的秘书。

【专题说明】

列宁与蔡特金谈国际共运问题

(1921年8月至1922年11月)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蔡特金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就获得列宁的高度评价。1920年,蔡特金被选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于当年9月第一次来到苏维埃俄国。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蔡特金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也是共产国际的国际妇女书记处的领导人。蔡特金一直保持着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友好关系。本专题收入了列宁用德文写给克·蔡特金的4封信和蔡特金给列宁的1封信,以及列宁给秘书福季耶娃的便条,其内容涉及克服德国统一共产党党内危机的问题、定于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举行的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问题、准备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等问题。这些文件反映了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和列宁与蔡特金之间的革命情谊。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项国兰翻译)

No 06529

列宁关于德国统一共产党和解 致蔡特金的信

(1921年8月15日)

致克拉拉·蔡特金同志

亲爱的尊敬的蔡特金同志：附上一封信的副本^①，这封信今天我还委托同一信使送交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②，供8月22日党代表大会用^③。遗憾的是我一点时间也没有，不能把这封信译成德文。

希望德国统一共产党最终能实现“和解”。

致最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您的 列宁

①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1921年7月9日，列宁主持召开了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7—59页）。这次会议通过了题为《三月事件和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决议，要求德国统一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停止一切派别活动。8月14日列宁写了《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95—106页）。此处所说附上的就是这一封信的副本。

② 德国统一共产党是在1920年12月4—7日于柏林举行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联合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其背景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10月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当时大多数代表要求尽快加入共产国际并完全承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

③ 1921年8月22—26日，在耶拿举行了德国统一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赞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并认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对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1921年三月行动时所犯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代表大会为党的活动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并决定删去党的名称中的“统一”一词。蔡特金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06530

列宁关于召开三个国际会议 致蔡特金的信

(不晚于1922年2月23日)

亲爱的蔡特金同志：

我十分感谢您，我的妻子也是这样。

我也认为王德威尔得和谢德曼^①之流将设法阻挠代表会议的召开^②。依我看，我们的任务就是不顾这一切障碍召开代表会议并且就在这次会议上完全彻底揭穿这些资本家的走狗。

致最崇高的敬礼！

您的 列宁

① 王德威尔得、埃米尔（1866～1938），比利时政治活动家，比利时社会党领袖，1894年起为议会议员。1900年开始是第二国际社会党事务局主席。谢德曼，菲力普（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活动家。当过印刷工人，1903～1918年和1920～1933年间为德国国会议员。1919年2～6月，担任魏玛共和国第一届政府首脑。

② 指拟议中的三个国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代表会议。

№06531

蔡特金关于要求谈话致列宁的信

(1922年2月20日)

尊敬的亲爱的朋友：

两天来我一直没打通给您的电话。总打不通。我很想同您谈一下。请告诉我是否可以、什么时候谈。^①

向您和克鲁普斯卡娅同志致衷心的敬意！

克拉拉·蔡特金

于莫斯科

① 在蔡特金来信的下方，列宁给人民委员会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写了如下的话：
致福季耶娃。我对您提出警告。您不应睡大觉，而应设法做到使所有有事找我的人随时都能容易地找到您。列宁，2月21日。

№06532

列宁关于自己的病情致蔡特金的信

(1922年2月21日)

尊敬的亲爱的蔡特金同志^①：

非常遗憾，我病得厉害。神经受不了了。我不在莫斯科^②。可与您或通信或通电话5~10分钟。您通过我的秘书福季耶娃，或通过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就能找到我。

致最衷心最崇高的敬意！

您的 列宁

① 列宁在信封上注明：“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收（列宁寄）”。

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1年12月31日做出决定，让列宁从1922年1月1日起休息6个星期，后来延长到3月底，即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从1922年1月17日至3月1日，列宁住在莫斯科省莫斯科县科斯基诺村附近的国营农场里。

№06533

列宁关于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 致蔡特金的信

(1922年11月12日)

亲爱的尊敬的蔡特金同志^①：

在我《报告》的开头我已经声明：我作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报告。^②我长期重病，什么也读不了，所以现在只能作简短的发言。昨天我还同列文^③一起检查了一下我是否把德文忘光了。

我打算这样做：不谈世界革命的前途，只对“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一个扼要的概述。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已经有了改善。整个报告不超过45分钟，不列举统计数字，不谈细节。

我没读过任何东西，不管是罗莎·卢森堡的书，还是莱维的前

-
- ① 列宁在信封上注明：“蔡特金同志收（列宁寄）”。在此之前，蔡特金就她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一事给列宁写信：“亲爱的朋友列宁，如果您能告诉我，哪怕是写上简单几句话，您想要我着重谈的是哪些方面和哪些问题，我将不胜感谢。我不愿以糟糕的形式来重复您已经谈得比我好的内容。”列宁这封信是对蔡特金的答复。
- ②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举行）上用德语作了题为《俄国革命的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3～288页）。
- ③ 列文，M. JI.（生于1885年），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编辑兼翻译。

言^①都没读过。昨天才收到您的书的校样^②。我只能翻阅一部分，不能全读完。

因此，您看，我根本不能作一个真正的报告。您是有准备的（您的书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您会作得好得多（因为您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一个俄国人）。我给托洛茨基打过电话，可他不在家。我听说他收集了不少资料。因此我相信，我们三个人分别讲不同的题目：我作扼要的发言；您作总的评价（资料是那本批判莱维的书？）^③；假如我没搞错的话，托洛茨基作一个材料充实、引证统计数字的评述或某种类似的东西^④。

代表我们大家致最崇高最衷心的敬意！

您的 列宁

① 莱维（哈特施坦）、保尔（1883～1930），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战时是“斯巴达克联盟”成员，参与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0年12月当选为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之一。因在1921年三月起义时持反对武装斗争的立场而被指责违反党纪和右倾并被开除出党。1922年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1922年，莱维出版了由他作序的罗莎·卢森堡的手稿，书名为《俄国革命·述评·罗莎·卢森堡遗著》。

② 克拉拉·蔡特金的书《论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于1922年出版，是对保·莱维出版罗莎·卢森堡的手稿的答复。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图书馆中藏有一册蔡特金的书，书中有蔡特金的题词：“怀着衷心的敬意和友情赠给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克拉拉·蔡特金。1922年12月9日于莫斯科”。

③ 1922年11月13日，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后，克·蔡特金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发言。

④ 1922年11月13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

【专题说明】

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一）

（1921年11月至1926年7月）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以及列宁晚年政治活动的文献，并且已收入《列宁全集》的正文或注释部分。本专题收集了近年发表的部分新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等人的通信和谈话，俄共（布）其他领导人相互之间的便函信件，中央全会的有关决定和信件，有关人员的发言、回忆、声明等，其内容涉及党的领导人的相互关系、列宁卧病期间的党内斗争情况、他对于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意见以及领导层对此所作的处理等。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门三姗、王向梅、李京州、孙凌齐、王丽华、翟民刚翻译）

№06496

斯大林就中央鼓动宣传部的 组成和职权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26日)

列宁同志^①：

我们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或许是由于误会，或许是由于轻率。

(1) “党要组建一个由 185 人组成的鼓动部”这一说法不确切。根据我的核实和组织局应予批准的编制，不应是 185 人，而是 106 人，其中 58 人为少数民族；

(2) 关于除少数民族外的 87 人“将起破坏作用”等等的说法没有根据。另外，按照上面提到的编制，剩下的也不应是 87 人，而是 48 人，将分别从事鼓动、宣传和出版工作。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看过索洛维约夫^② 同志的草案（这个草案我还没有看过，也没有得到组织局的批准）后便决定“组建新的委员部”。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操之过急了。

(3) 48 人中，将有 6 人在鼓动宣传部中央机关工作，分别担任部长、副部长和技术性工作，6 人在宣传局工作，从事技术性工

① 据列宁年谱记载，1921年11月“不早于24日”，列宁审阅了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娜·康·克鲁普斯卡娅1921年11月24日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的副本。信中提出了分清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与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职责的建议，并附了关于鼓动宣传部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之间关系的条例草案。（《列宁年谱》1980年莫斯科版第11卷第676页。）随后，列宁把自己的意见寄给政治局并斯大林，时间不晚于11月26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了这封回信。

② 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

作和领导工作的人员比例同上，11人在省出版局及《鼓动者通报》和《中央委员会通报》^①编辑部、图书馆工作，负责分发专供省委阅读的书刊。其余的58人将分别在8个少数民族局工作，负责管理的党员不下3万人，其中包括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鞑靼人等，这些人已不在本共和国内，且俄语极差或根本不会讲俄语。这就是那个连“见多识广的”卢那察尔斯基都感到畏惧的“新委员会”（应当说，我已将少数民族人数缩减了整整一半，因此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的总数不是增加了，而是比过去减少了）。

（4）根据我近日读过的、组织局应予批准的鼓动宣传部“条例”，鼓动宣传部将负责1）领导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鼓动工作，搜集并总结其工作经验，2）监督各苏维埃机构和工会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挤垮”政治教育总委员会^②之说纯属无稽之谈。问题的实质在于，不能把鼓动宣传部的工作仅限于向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派遣中央委员会委员。因为总结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和领导其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将会因此而被忽略。这是极其有害的。

产生误会的根源在于，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和卢那察尔斯基）看到了经组织局有关委员会原则通过的“条例”（草案），而我没有看到，组织局也没有批准，星期一才能批准。克鲁普斯卡娅又操之过急了。

（5）按我的理解。您今天往政治局给我写信，是要我退出鼓动宣传部。您应当清楚，鼓动宣传部的工作并不是我主动要求干的，而是安排我干的。因此我是不会反对离开鼓动宣传部的。但如果您

^① 《鼓动者通报》是1920年由俄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出版的不定期出版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报》也由鼓动宣传部出版，创刊于1919年4月，开始为不定期出版物，后改为周报。

^② 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11月12日，行政上受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任该委员会主席。

恰恰在目前这个时候，由于存在上述误会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就会使您本人和我都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则会认为您这样做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您希望有人“做出牺牲”，我同意“做出牺牲”，但这样做不合适。

我以为，如果组织局把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和我，或许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吸收进委员会，那么一切误会都会在委员会中得到澄清并被消除，也许还会达成某种共识。在没有实施这一方案之前，不应向组织局提出这个问题。

约·斯大林

№06536

列宁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 作息时间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2年3月6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您将下述建议提交政治局通过：

（1）责成加米涅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在每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四次会议上处理政治局的工作，从星期四晚上至下星期一早晨外出休假。

（2）责成格尔松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秘书）安排休息处所，要么安排在列宁同志迁入现在的休息处之前住过的地方（有一次斯大林同志也在那里住过），要么安排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休息处，如果他已经结束休假的话。

莫洛托夫同志，请您就此建议事先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妥，也要同加里宁同志谈妥，如果他现在参加政治局表决的话，并且马上提交政治局通过。这是因为我不敢说，如果不采取或者说不马上采取这类措施的话，我们就无法使斯大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到党代表大会^①召开时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

① 指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举行。

盼用电话回答我，电话可打给格利亚谢尔或勒柏辛斯卡娅或福季耶娃。

列 宁

电话口授

No 06537

列宁就自己病中的政治活动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7月7日）

斯大林同志：

医生们看来是在臆断，不驳斥不行。他们被星期五的剧烈发作弄得张皇失措，干出了很荒唐的事情：他们试图禁止“政治性的”探视（他们一点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①我非常生气，把他们撵走了。星期四加米涅夫到我这里来过。进行了一次热烈的政治性交谈。我睡得很香，自我感觉非常好。星期五出现了瘫痪症状。我要您赶快来一趟，想及时跟您谈一谈，以防病情恶化。我只需15分钟就可以全部说完。这样，星期天我又可以睡个好觉。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的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希望您能理解这一点并且把德国教授这个傻瓜及其同伙撵走。关于中央全会^②的情况务请前来告诉我，要不派一位参加会议的人来也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① 1922年5月底，列宁因脑血管硬化第一次中风，右臂和右腿活动受限，语言略有障碍。发病时列宁在哥尔克村，他在这里住了4个月，接受治疗。

② 指1922年7月6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06538

列宁就任命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 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9月11日)

鉴于李可夫同志已获准自瞿鲁巴^① 抵达之日（预定在9月20日到达）起休假；医生又答应我（当然只能是在病情不再恶化的情况下）在10月1日以前回去工作（起初只能是很有节制地工作），我认为，不能把全部日常工作都推到瞿鲁巴同志一人身上，我建议再任命两位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即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他们之间的分工可以在我的参与下，当然还要在作为最高机关的政治局的参与下决定。^②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9月11日

① 瞿鲁巴，亚·德·（1870～1928），职业革命家，1891年开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任副粮食人民委员、粮食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20年代上半期还曾担任过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国家计委主席、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等职。

② 文件上记有就此问题进行表决（通过电话）的结果：

- | | |
|-------------|---------------|
| “（1）赞成（斯大林） | （2）坚决反对（托洛茨基） |
| （3）赞成（李可夫） | （4）弃权（托姆斯基） |
| （5）不反对（加里宁） | （6）弃权（加米涅夫）”。 |

列宁的建议在1922年9月1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决议还说：“（b）中央政治局遗憾地赞同托洛茨基同志所持坚决反对的意见并建议加米涅夫同志自瞿鲁巴同志抵达之日起开始履行副主席的职责。（c）让加米涅夫同志在瞿鲁巴同志抵达之前休假”。

№06540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就民族问题 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便条

（1922年9月28日）

加米涅夫：伊里奇准备为捍卫独立而战。他建议我会见格鲁吉亚人。他甚至不接受昨天的修正案。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过电话了。

斯大林：我看，必须坚决反对伊里奇。如果两个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就能影响格鲁吉亚共产党员，而后者又影响伊里奇，那么请问，还有什么独立可言？

加米涅夫：我认为，既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反抗^①将会更糟。

斯大林：不知道。随他去吧。

① 黑线是加米涅夫加的。

№06468

俄共（布）中央全会 关于列宁病中政治活动的决定

（1922年12月18日）

如果列宁同志询问全会就对外贸易问题所作的决定，就按斯大林同医生达成的协议向他通报决议的全部条文，并告诉他，决议以及委员会的组成都已被一致通过。

雅罗斯拉夫斯基^①同志的汇报^②决不可现在转交，要保存好，待医生按照同斯大林同志达成的协议同意转交时再转交。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往来。^③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古别尔曼）、叶·米·（1878～1943），1898年入党。1918～1919年间曾任俄共（布）中央特派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剿匪委员会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1921～1923年为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2年任人民委员会所属俄罗斯联邦驻外商务代表处监察委员会主席，1923～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1934～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党的监督委员会委员。

② 12月16日，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之托给福季耶娃打电话，请她秘密打电话给雅罗斯拉夫斯基，要他记下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而可能的话还有其他人在全会上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发言。文中所说的“汇报”就是指这些记录。

③ 文献上有莉·亚·福季耶娃加的附注：“未记全的决定。”

№06469

加米涅夫就列宁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意见
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22年12月22日）

约瑟夫：

昨天夜里托洛茨基给我来过电话。他说收到老头^①的一封短信^②，老头对全会通过的关于对外贸易的决议表示满意，可又要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向代表大会党团^③作报告，为在党代表大会^④上提出这个问题打下基础。看来他的意思是要巩固拿下的阵地。托洛茨基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而要求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我答应转告你，所以才给你写信。

你的电话打不通。

我想在报告中马上宣布中央全会的决定^⑤。

握手。

① 列宁在党内的化名之一。

② 指列宁于1922年12月21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③ 指1922年12月22日在大剧院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俄共（布）党团会议。

④ 指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4月17～25日举行，列宁因病没有出席。

⑤ 指加米涅夫将在党团会议上作的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谈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

列·加米涅夫

我打算明天来，因为报告可以利用的材料太多，我都快给埋起来了，真感到无能为力。

列·加·

№06470

斯大林就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一事
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2年12月22日）

加米涅夫同志：

来函已收到。我认为，你在报告中应当只作一下说明，而不是把老头如何不顾费尔斯特^①的绝对禁令而给托洛茨基写信的事在党团的会议上公开。

约·斯大林

^① 奥·费尔斯特，德国神经科医生。1922年3月起为列宁的保健医生当顾问。

№0648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就列宁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
给省委和州委的信

（1923年1月27日）

绝密

亲爱的同志们：

1月25日《真理报》第16号上刊登了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①文中谈到了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在新经济政策的新情况下，如果工农关系出现麻烦的话，需要采取哪些组织措施来杜绝或至少是阻止中央委员会可能出现的分裂。

一些同志提请政治局注意，地方上的同志很可能会把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解释成这样，即最近中央委员会内部隐藏着某种分裂的倾向，而且正是这一情况促使列宁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那些组织建议。为了避免可能得出这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政治局和组织局认为必须把列宁同志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通告各省委。

列宁同志病后又恢复了异常紧张的工作，这使得他过度疲劳。

① 列宁于1923年1月初开始口授《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1月23日定稿并加了标题。文章送到《真理报》编辑部后没有马上发表。1月24日，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发表这篇文章的问题，会上一致决定在1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此文。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这次会议还一致决定就发表列宁这篇文章的问题向各党组织发出专门信件。此信由托洛茨基于1923年1月23日起草，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当时的所有成员签名后发给各党组织。

医生认为，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让列宁同志保持绝对安静，甚至不要读报（因为对列宁同志来说读报并不是娱乐或休息，而是紧张思考当前所有政治任务的由头）。所以，列宁同志当时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任何会议，并且根据医生的严格规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会议记录也没有送给列宁。但医生考虑到，完全放弃脑力劳动对列宁同志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允许列宁同志做些类似日志的工作，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记下来，而且根据列宁同志本人的指示，部分日志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仅写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这些外部条件就可以证明，文中提出的那些建议并不是暗示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某种麻烦，而是列宁同志对党在当前历史阶段所面临的困难的一般考虑。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员不打算在这封纯通报性的信中讨论列宁同志在文中非常及时地提出的可能出现的各种历史性危险的问题，但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认为有必要一致声明，中央委员会内部工作中根本没有那种可令人担忧的“分裂”的情况。

本通知以绝密信件的形式下达，不在报上发表，为的是不使敌人在列宁的健康状况问题上制造谣言，从而造成混乱和恐慌。中央相信，如果地方上的同志从列宁同志这篇文章中得出此信开头提到的那种令人担忧的结论，各省委应立即对党组织加以正确的引导。

俄共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现有成员：

安德列耶夫

布哈林

捷尔任斯基

加里宁

加米涅夫

古比雪夫

莫洛托夫

李可夫

斯大林

托姆斯基

托洛茨基

莫斯科

1923年1月27日

No 06482

托洛茨基关于党内分歧致俄共（布）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摘录）

（1923年10月23日）

致全会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①

4. 列宁同志提出的改组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成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②的中心议题之一。真是妙极了，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竟然被多次说成是我和列宁同志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也同民族问题一样，政治局内各派对它做出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说得对，我对老工农检察院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列宁同志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那样对工农检察院给予绝对否定的评价：“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③ 如果回忆一下，谁担任工农检察院领导的时间

① 1923年10月，联共（布）党内斗争激化，围绕党内民主和国家状况问题展开了大辩论。10月23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即将举行之际，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写了这封信，其中涉及发表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经过情况。中央委员会收到这封信的日期是10月24日，这一天被视为此信的正式日期。

②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4月17~25日召开。列宁因病未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最长^①，就不难明白，这个评价也同民族问题一文一样，是针对谁的。

然而，政治局是如何对待列宁同志提出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方案的呢？布哈林同志并不想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列宁同志出于个人考虑坚持要马上发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电话里告知我这篇文章，并要求过问一下，以便使文章尽快发表。在根据我的建议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②上，所有到会的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布哈林等同志不仅反对列宁同志的计划，而且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特别尖锐和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鉴于列宁同志一再要求刊登这篇文章，后来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古比雪夫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把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印一份《真理报》专页，目的是安慰他，同时向全党隐瞒这篇文章。我当时说，列宁同志提出的这个激进改革，如果得到正确实施的话，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即使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要想不让全党知道列宁同志的这个建议也是可笑和荒谬的。对我的回答是一些形式主义的官腔：“我们是中央委员会，我们负有责任，我们是决策的机构。”只有加米涅夫支持我，但他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迟到了近一小时。当时倾向刊登这封信^③的主要根据是，全党终究会知道列宁的文章的。后来，这封信在那些不愿意发表它的人的手里似乎成了一面试图反过来……反对我的特殊旗帜。曾任书记处书记的古比雪夫同志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不是公开反对列宁的这个计划，而是采取了使这个计划“失效”的

① 从1919年3月到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

② 没有发现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任何文件。

③ 指列宁的文章。

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否能够成为捍卫和确立党的权利和统一、杜绝党内滥用行政手段的独立的、公正的党的机构呢？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

No06483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托洛茨基

10月24日信的答复（摘录）^①

（1923年12月31日）

绝密

第六章 列宁同志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文章。

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24日的信中试图杜撰一个当代传奇故事：只是在他的努力下，列宁同志的文章才得以发表。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文章^②由于错误或者疏忽写给了当时正好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这一做法使政治局委员感到不理解。当时，古比雪夫同志已经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③上作了说明。托洛茨基同志说古比雪夫想把列宁同志的文章束之高阁，这纯粹是恶意造谣。我们同古比雪夫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当了解到列宁同志的文章不是写给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而是写给党中央委员会的，并且确实想发表时，我们立即决定尽快发表。但是，几周后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提出实际贯彻列宁同志的计划时，正是这个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

① 这封答复信由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于1923年12月31日签署。

② 难以确定这里指的是列宁的哪篇文章。

③ 即1923年10月25~27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在党内建立两个中央（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这一完全反列宁的方案^①。而且正是这个托洛茨基同志一发现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不会维护他的派别活动，就开始攻击这两个机构。

^① 大概是指托洛茨基 1923 年 2 月 22 日在俄共（布）中央全会晚间会议上宣读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声明。

№06484

萨普龙诺夫
关于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一文处理经过的说明^①

(1924年1月10日)

出席会议的有：贝克尔、扎哈罗夫、博尔科夫、诺维科夫和伊瓦什金同志。

主席：贝克尔同志

秘书：扎哈罗夫同志

萨普龙诺夫：我首先谈第一件事，即关于发表列宁的文章的问题。当列宁这篇文章还是手稿时——开始没有印，是后来印的——我是中央委员，而作为中央委员，我知道，这是送给编辑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真理报》主编是布哈林，他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并带着文章去了政治局。玛丽亚·伊里尼奇娜^②表示不满，希望能发表这篇文章，但布哈林还是把文章交给了政治局。在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斯大林和古比雪夫同志反对发表。出现了分歧，于是政治局开会，并叫来托洛茨基同志，而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

加米涅夫同志在政治局开会时迟到了，政治局多数人赞成不发

① 这是由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会议选出的负责核查有关事实真相的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摘要。

② 即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1878～1937），1898年入党。曾任《真理报》责任编辑和编委。

表这篇文章。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列宁每天读报，他要求发表自己的文章，如果不发表，怎么向他解释不发表的原因呢？当时古比雪夫同志说，可以把这篇文章印一份《真理报》专页，把这份专页拿给列宁读，其余的《真理报》不登这篇文章。据我所知，一小时后，加米涅夫同志赶来参加政治局会议。他支持托洛茨基的意见，主张发表这篇文章。所以，经过长时间讨论后，决定不用专页发表这篇文章，而是像通常一样在《真理报》上发表。古比雪夫可以证明以下一点：有一次会上，这是哪次会议我说不上，他说过确有此事，他曾建议印成专页，不过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而是在会前私下议论时谈的。

这就是事实。古比雪夫谈的这些情况到底发生在会上还是在会前，没有决议，但是古比雪夫提建议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政治局最初多数人反对发表，只是经过长时间争论后才决定发表这篇文章。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更详细的情况可以询问托洛茨基和古比雪夫同志、政治局其他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穆拉洛夫、伊·尼·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等同志，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请来很多其他同志。

主席：大家提问题吧！我想问一下，伊里奇把文章送到哪儿了？

萨普龙诺夫：文章送到《真理报》编辑部，大概还送到别的地方，这我就不清楚了。

主席：据我所知，这篇文章没有直接送给编辑部，而是交给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某个成员，由他转给古比雪夫，这之后才发生了所有这些议论和争论。

萨普龙诺夫：我模糊地记得，这篇文章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写的，而且列宁希望能在代表大会期间发表。文章转交给谁了，我现在也不十分清楚，但我可以搞清楚，下次再作充分解释。是由于

伊里奇病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发表这篇文章，耽搁下来了。耽搁的原因我不知道，这大概是1、2月间的事，而代表大会是去年12月召开的，文章在1月份就送给编辑部了，可是编辑部没有刊登。

主席：第二个问题。编辑^①什么时候同斯大林和古比雪夫同志谈的？组织部或中央书记处是否开过会？或者只是同志间的私下议论？

萨普龙诺夫：我已经跟您说了这件事是在会上发生的。当时我是中央委员，我从与其他中央委员的交谈中得知，这是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发生的事。但是讨论发表列宁的文章的问题则是在某次会议上。当时托洛茨基当众宣布有这么件事，并且三次追问古比雪夫同志此事是否属实。古比雪夫沉默了很久之后说，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然后他接着说，当时他建议印一份，但这不是在正式会议上，而是在正式会议前议论如何解决发表问题时提出来的。

主席：这次政治局会议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古比雪夫，可究竟是谁建议不刊登这篇文章的？

萨普龙诺夫：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主张刊登。主张刊登的人我可以指出有托洛茨基，还有支持托洛茨基的加米涅夫，剩下的人好像都不同意刊登。我记不清了，大概政治局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都反对刊登。至于后来这些人为什么又同意刊登了，我就不得而知了。

诺维科夫：古比雪夫什么时候说他不是在正式场合建议把文章印成专页的？他在会上说过这个话没有？他是否正式承认自己说过这番话？

萨普龙诺夫：是的，是在会上正式说的。

^① 这里是指尼·伊·布哈林。

博尔科夫：我压根就没搞清楚，这是会前的议论呢，还是在正式会议上说的？如果是古比雪夫在非正式会议上同人谈起的，这是一回事，如果他是在正式会议上表态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萨普龙诺夫：我没有参加这些会议，所以，不能非常肯定地说这是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来的。即使在我说的这次会议上没有正式提出，我觉得也无关紧要——这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建议，还是会前的议论，我看都一样，因为我认为重要的是事实，而且对委员会来说重要的也是事实，而不是有没有这个建议。

博尔科夫：不对，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须弄清楚，这事有没有根据，因为有时在私下议论时人们说的是一回事，而正式表态时就不一样了，那些坚持自己原来观点的人，有时就会赞成多数人的意见。这是两回事。

萨普龙诺夫：同志们，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文章未加修改就发表了吗？

萨普龙诺夫：是的，未加修改。政治局未作任何修改。

……纳扎列强同志为什么不愿意刊登这篇文章？

萨普龙诺夫：他害怕这篇文章，他虽然害怕，但他知道，这篇文章是应该发表的。这之后就给所有省委发了一个秘密通报信，信中说，列宁同志是在生病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的。他们全都害怕这篇文章。

主席：我想弄清一个事实，这是个别人的意见还是政治局的决定？

……给各省委的这个决定是作为正式文件下发的。

萨普龙诺夫：是的，政治局保密室有这个文件，是正式下发的。

主席：我有一个问题：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和其他人怎么可以证明这件事呢？

萨普龙诺夫：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主席：那么在此之前难道他们就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其他会议吗？

萨普龙诺夫：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清楚这件事，不过他们都参加了会议了（皮达可夫也参加了）。

主席：萨普龙诺夫同志发言的记录中有如下记载，正是在工农检察院问题上萨普龙诺夫宣布了下列事实：“列宁当时写了关于工农检察院的文章，《真理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篇文章，所以只好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政治局讨论了是否刊登这篇文章的问题。政治局多数成员反对刊登。托洛茨基说：‘难道你们想对全党隐瞒列宁的文章吗？如果列宁想要报纸看呢？’于是他^①说：‘印一份，我们把这份给他看。’”

（有人说：“可耻”。）

萨普龙诺夫：我没看过会议记录，对此我不负责。此外，在代表会议上我也没说过这样的话：“于是他说——印一份给他看。”我不可能说这话，因为这不是政治局的答复，只是一个中央委员——古比雪夫同志的建议。

主席：加米涅夫同志发言的记录中有如下记载：“我同萨普龙诺夫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会使你们有任何收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立刻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召请政治局全体成员，召请托洛茨基同志，而且我敢肯定，托洛茨基同志决不会支持萨普龙诺夫说的话。既然你们提出这样的指责，那么就召开委员会会议吧。哈莫夫尼基区有这个权利，既然该区已在会上宣布，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布哈林、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向全党隐瞒或曾想隐瞒某事。”在记录的另一处写道：“萨普龙

^① 指古比雪夫。

诺夫同志，您或者根本不能说，或者应该做出一个政治结论。不能把您讲的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反对发表列宁同志的文章这样的话散布到群众中去。”

主席：委员会认为，必须就这个问题听取政治局全体委员的解释，以及古比雪夫同志、以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真理报》编辑部和萨普龙诺夫同志指出的那些人的说明。

No 06472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核实列宁活动 致福季耶娃和沃洛季切娃的信

(1924年1月22日)

绝密

亲收

致福季耶娃同志并转沃洛季切娃同志^①

尊敬的同志：

您知道，怀念伊里奇、回忆他的每一桩小事对我们大家是多么亲切。我有一件事想请您帮忙，这件事是弗·伊·在1922年中央全会前托我办的，事没有办成并不是由于我的过错。您是知道这件事的。弗·伊·在全会召开前两天把我叫到他那里，约好要我把全会讨论国家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情况写封信悄悄送给他。斯大林对我说，要让您和沃洛季切娃同志了解这个情况，还说沃洛季切娃会通过您把信送去。结果，沃洛季切娃把我的记录交给别人去打字，而这位打字员不知为什么以为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手稿，便去找他问一个写得不清楚的词。只是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恶化信才没有转交给他。

请您告诉我，列宁对写这封信作过哪些吩咐，他没有收到我的信又有什么反应。我至今还在为这件事感到难过，我总觉得是我使

^① 玛·阿·沃洛季切娃（1891～1973），1917年入党。1922～1924年任列宁的值班秘书。

他焦急不安的，尽管我的“过错”只是在于，我虽然一丝不苟地办完了列宁委托的事，但没有亲自去检查沃洛季切娃同志是否把事办妥，因为我相信她也会一丝不苟地完成这项任务的。

致共产主义敬礼！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4年1月22日

No06485

哈莫夫尼基区核查委员会关于核实列宁文章 发表情况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询问

(1924年2月11日)

绝密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加里宁、托姆斯基、古比雪夫等同志，以及中央委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

由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会议选出的负责核查萨普龙诺夫同志讲的有关伊里奇《论工农检察院》一文事实的委员会请求对下列问题做出书面说明：1. 政治局是否曾经不打算发表伊里奇的文章，而打算印成《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2. 如果确有此事，委员会请求详细说明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还是在私下交谈中提到的？3. 如果没有此事，请说明原因，为什么萨普龙诺夫同志在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上会宣布此事。

委员会请求将上述材料用信封好后寄给中央书记处转哈莫夫尼基区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 贝克尔

秘书 扎哈罗夫

1924年2月11日

№06486

古比雪夫答复询问致哈莫夫尼基区 党代表会议核查委员会的信

（1924年2月23日）

致由党代表会议选出的负责核查萨普龙诺夫同志在代表会议上所讲事实的哈莫夫尼基区委员会。

我对你们1924年2月11日来信中关于伊里奇《论工农检察院》一文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1. 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列宁同志的文章的问题，决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立即发表列宁同志的这篇文章。文章于次日刊登出来。因此，对于“政治局是否曾经不打算发表伊里奇的文章”的问题，回答是绝对否定的。一个机构的意愿通常反映在它的决议中。政治局的决议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在政治局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首先读了一遍列宁同志的文章，很多与会者是第一次得知文章的内容。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与会者没有一个人反对发表。只是讨论了何时发表和怎样发表的问题：是作为社论发表还是以普通文章的形式发表，是否对列宁的文章作些说明，对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说法作些解释。^① 如果刊登一篇解释文章，能否来得及放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是否因此也推迟发表列宁同志的文章？怎样通知地方组织不要错误地理解伊里奇关于分裂的说法——大致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① 原文件中下面一句话被删去了：“当时，在没有任何外部理由替党的统一担心的情况下，可能会使党员产生不正确的看法，似乎列宁同志谈的可能出现的分裂指的是党员不了解的政治局内部的具体分歧，而不只是潜在的可能性。”

了讨论，最后政治局决定立即发表这篇文章，并发出一封政治局全体成员签名的专门信件，通知各地方组织，政治局内部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政治局的工作证明，替党的统一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① 我不是政治局委员，而作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参加会议只有发言权。因此我不能参与决定问题，但是我发了言，坚决主张立即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伊里奇的文章。加米涅夫在会议开始时宣读了伊里奇的文章，这时我才知道文章的内容，我完全同意加米涅夫同志在读这篇文章时讲的一段话，他说，全文贯穿着伊里奇通常所具有的健全而严密的逻辑性，会前有些同志（其中包括我）担心伊里奇的病情会在文章中有所反映，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觉得，加米涅夫同志的这番话表达了当时所有政治局委员的一致意见。十分清楚，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完伊里奇的文章后，政治局委员谁也没有提出“印成《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的想法。会上没有人提这样的建议，没有也不可能讨论这样的建议。

2. 开会前，当政治局委员尚未到齐，会议还没开始时，政治局委员一个个依次走进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浏览了布哈林同志拿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文章校样，在通读列宁的文章之前，读了大家注意的个别段落。我个人最初产生了一个印象：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日益加重的病情在这篇文章中有所反映。列宁同志冲动地坚持己见，催促布哈林同志无论如何要在第二天的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并拿给他看，使我更加坚定了这一看法。同时注意到文章的某些提法，这些提法如果孤立地看很令人费解，有些莫名其妙：党的分裂、外交人民委员会最好、详细确定工农检察院人数等。最

^① 原文件中下面一句话被删去了：“现在我应该专门谈谈我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

后，还注意到文章送错了地方。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关于分裂问题，因为这一提法不符合当时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部的具体关系。大家传阅着伊里奇的文章校样并提出一些问题（我记得，比如托洛茨基说——为什么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是最好的？）。人们议论着，推测着。在这种因担心伊里奇的健康而产生的不安气氛中，我再说一遍，在没有认真地通读全文的情况下，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伊里奇有病，病情在文章中有所反映，既然一定要让伊里奇看到刊印的文章，何不印一份《真理报》专页？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再也没有重复这些话，也没有要求讨论这一想法。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如希望尽快通读全文，讨论这篇文章等。当文章读过之后，我不仅不再作这样的推测，而且连这样的想法再也没有了，因为一切疑团都烟消云散了——从文章中看得出，列宁很健康，所以我也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

实际上，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这篇文章，但散会后我已经被伊里奇说服了，虽然对文章的内容还没有全弄明白（伊里奇的文章谁能一下子就全明白呢？），有很多地方一下子还不能理解。但我记得，当天晚上，或者可能是在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我曾同莫洛托夫同志谈过话，我们一致认为，伊里奇的文章通篇都是对的，我们当时所接触的是伊里奇富有创造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往往一开始不易领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将会为全党所接受。

3. “请说明原因，为什么萨普龙诺夫同志在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上会宣布此事”。我没有参加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也不知道萨普龙诺夫同志声明的内容。如果这个声明同第一个问题所说的那样：“……政治局曾经不打算发表伊里奇的文章，而打算印成《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那么萨普龙诺夫同志没有任何“理由”作这个声明。他在撒谎。如果萨普龙诺夫同志声明说我在政治

局会议提过这样的建议，那就是重复托洛茨基同志在10月23日给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信中说过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举行半年之后写的这封信中，托洛茨基同志为了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对，就把大家已经忘却的、偶然说过的、会上再也没有重提过的话翻出来，并且突然冲着我发火。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这样发火多少是出于真心实意的话，那么很清楚，托洛茨基同志应该在代表大会上反对我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选人的资格。然而他没有反对，因为连他在开始攻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前，也并没有重视我的这句话，这是他后来出于斗争的需要才想出来的。在10月25~27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我发言反驳托洛茨基同志10月23日信中的论断。我发言之后，托洛茨基同志也发了言，对我说的有关伊里奇的文章的一些情况，并没有提出反驳。萨普龙诺夫同志参加了这次全会，听到了我的说明，为什么他会后在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上作那种声明，我就不清楚了。

显然，要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中伤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意图中来做出解释。

瓦·古比雪夫

1924年2月23日

№06487

**斯大林关于答复询问致哈莫夫尼基
区党代表会议核查委员会**

（1924年3月4日）

11436 / C 号

致哈莫夫尼基区党代表会议负责核查萨普龙诺夫同志声明的委员会
主席贝克尔同志

对您 1924 年 2 月 11 日的询问答复如下。

首先我对因一个月休假而未能及时回复表示歉意。若在其他情况下，我是不会推迟答复您的询问的。

您的第一个问题：

“政治局是否曾经不打算发表伊里奇的文章，而打算印成《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

我的答复：

政治局一致决定立即发表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在政治局会议上根本没有谈及，更没有建议印《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大概在政治局开会前的私下交谈时有过这样的议论，但是我没有根据确定。

您的第二个问题：

“如果确有此事，委员会请求详细说明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这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还是在私下交谈中提到的？”

我的答复：

政治局会议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文章印成《真理报》专页给伊里奇看的设想，所以，第二个问题自然就没有意义了。在政治局会议上之所以谈到是否发表伊里奇的文章的问题，是因为中央委员对伊里奇文章中关于中央委员会分裂的说法有些担心。政治局委员们正确地认为，伊里奇关于中央委员会分裂的说法会在全党中产生对中央委员会完整性的担心，因此，必须在发表伊里奇文章的同时，专门向各地方组织发一封信，说明伊里奇的文章中关于分裂的说法指的是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指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现状，目前没有理由担心分裂。正因为如此，政治局通过的不是一个决议，而是两个：1. 立即发表伊里奇的文章；2. 给所有地方组织发一封由政治局和组织局所有成员签名的中央委员会的信，说明没有根据担心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分裂。这封中央委员会的信当天就用密码发给各组织。随函寄上此信的复印件^①。

您的第三个问题：

“如果没有此事，请说明原因，为什么萨普龙诺夫同志在哈莫夫尼基区代表会议上会宣布此事。”

我的答复：

我想，原因在于党内激烈斗争造成的派别分歧。我党历史上不乏对党的领导上的可怕的诽谤。这里谈的正是这样的诽谤。托洛茨基同志去年在中央十月全会上发言说，古比雪夫同志千方百计地把列宁同志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搁置起来。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纯属对古比雪夫同志的诬蔑。然而这个诽谤却在到处传播。大概这个诽谤就是您所指的萨普龙诺夫同志在哈莫夫

^① 见本卷本专题No06481文件。

尼基区代表会议上声明的依据吧。^①大家会问，假设对古比雪夫同志的诬蔑符合事实，可古比雪夫同志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与政治局有何干系呢？但是盲目的派别斗争是不喜欢搞清楚这些细微之处的，而喜欢把所有的事都混为一谈，把诽谤说成事实。

至于吉格尔施泰特同志^②谈的关于中央委员的“秘密文件”和中央委员会电报^③这些旨在破坏托洛茨基同志威信的消息，我作为中央书记应该向您声明，吉格尔施泰特同志的这个消息不是捏造就是作者出于派别利益而讲的胡言乱语。我请您，贝克尔同志，不要只相信我的话，而应严格审查我的这个声明。仔细了解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在中央档案馆中的电报和文件原件，询问瓦列伊基斯同志和基辅组织的全体委员，询问吉格尔施泰特同志关于他的消息的来源，彻底弄清楚这件事，以便使有罪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约·斯大林

1924年3月4日

① 手稿中把下面的话删去了：“当然，政治局和古比雪夫同志完全是两回事，二者无论如何不能划等号”。

② 正确的名字是丁格尔施泰特。Ю.Н. 丁格尔施泰特，1910年入党，哈莫夫尼基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代表。他在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说：“现在省里得到一个秘密指令。瓦列伊基斯同志在基辅组织全体会议上宣读了这个文件，文件中说要迫害托洛茨基……”

③ 这个文件没有找到。

№06527

雅罗斯拉夫斯基 关于他最后一次会见列宁的回忆

(1924年12月24日^①)

关于列·达·托洛茨基的作用问题

2月20日Л.阿韦尔巴赫^②来找我。他早就请我抽空和他谈谈那些在去年的争论中^③持反对派路线的前团中央委员们决定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封信^④的看法。这封信的内容，我是在同雷夫金^⑤的谈话中详细得知的。雷夫金也想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尽管他在去年的争论中从没有正式表白过自己对争论的态度。然

① 这里标出的是日记的时间，而会见是在1922年12月14日举行的。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0页。

② 阿韦尔巴赫，Л.Л.（1903～1939），1918年加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

③ 指1923年底的党内争论。由于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的派别文件在各级党组织内广为传播，俄共（布）中央于1923年11月决定在党的报刊上开展大辩论。1923年12月，俄共（布）中央要求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根据中央政治局和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3年12月5日“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广泛讨论关于改进党的工作方法和活跃党内生活的问题。

④ 雅罗斯拉夫斯基这里所说的是刊登在1924年12月21日《真理报》上的“给同志们的信”。

⑤ 雷夫金，О.Л.（1899～1937），1917年入党，1918～1920年任青年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彼得格勒委员会书记，先后当选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主席、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24年起从事党的工作。1927～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而，他们拒绝雷夫金在声明上签字，理由是他去年搞“缓冲”，既不签署左的声明，也不签署右的声明，采取“中立立场”。我同雷夫金同志很熟悉，我个人认为，他的声明中具有积极意义，因为青年们都知道他在去年的争论中是持缓冲立场的。我赞成已由团员们签署并将在明日《真理报》上发表的这封信的内容。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这些小伙子的路线得到了纠正，这一年使他们受到了教育，争论对他们来说没有白白进行，把他们拉到了列宁主义方面。

同时阿韦尔巴赫“秘密”地对我说（我认为他是一个襟怀坦白青年，我曾同他一起在《青年近卫军》杂志工作过，我们俩的关系很密切，他对我无话不谈），去年他曾同列·达·托洛茨基进行过一次长达3小时的谈话。

托洛茨基要他相信，列宁逝世后，惟有他托洛茨基才是彻底推行列宁主义路线、反对反列宁主义中央的。托洛茨基告诉阿韦尔巴赫，1922年底，当列宁还能会见同志们的时候，他说服托洛茨基同他（列宁）一起结成联盟，以改变中央委员的领导成分。这里列宁指的是成立三人小组：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排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作用。最初托洛茨基似乎犹豫不决，但是伊里奇坚持要这样做；最后伊里奇好像告诉托洛茨基，这个问题他已做出最后决定并将提交给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甚至好像谈到第二天就向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但随即列宁的病情加重，问题未能提出。阿韦尔巴赫要我对此事保密并解释说，他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我，是因为他现在就要去乌拉尔，担心会有人利用这一点搞投机，担心托洛茨基可能（甚至肯定）把这件事不止告诉他一个人。他问我如何看待这件事，问我是否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的会采取这种办法、这种态度。

我对阿韦尔巴赫说，我认为托洛茨基说的是特殊情况，因为恰

好就在这段时间，也就是1922年秋列宁的病剧烈发作^①前夕，列宁召见我并和我谈了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保持对外贸易垄断的问题。列宁当时十分担心这个问题不能按照他的意愿审议，即取消前一次全会的决定，他特别担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的立场。因此列宁竭力想保证自己的建议得到支持^②。列宁知道斯大林在给政治局的信中已表示赞同保持垄断^③，他请我同托洛茨基同志商妥并一起在中央全会上维护这一问题，必要时将问题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我觉得托洛茨基同志说的就是这件事。当时列宁不止一次地找一些中央委员谈话，以确保自己的建议得到支持。如果根据列宁同托洛茨基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这种协商就笼统地说列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那是完全不正确的。在我同列宁将近一小时的谈话中，他一次也没有暗示过他同中央政治局在其他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尽管我记得列宁

① 列宁的病情加剧是在1922年底。1922年5月底，列宁发病。6月中旬起逐渐好转。12月13日，他的病情又一次发作。

② 列宁认为必须坚持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布哈林反对保持垄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赞成削弱垄断。俄共（布）中央全会在1922年10月6日的会议上（列宁未出席此次会议）根据索柯里尼柯夫的报告通过一项决定，暂时准许某些商品在某些边境进出口。在列宁的坚决要求下，10月16日征询了所有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的意见。中央委员们在阅读了列宁的信和克拉辛提交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提纲》后，都（季诺维也夫除外）支持列宁关于延至下次全会再对此问题做出决定的建议。斯大林赞同延期，但认为列宁的信没有说服他放弃关于10月6日中央全会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看法。12月14日列宁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驻外商务代表处监察委员会领导人雅罗斯拉夫斯基进行了谈话。1922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决定，撤销了上次全会的决定，重申了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的必要性。

③ 斯大林于1922年12月15日给中央委员们写信说：“鉴于最近两个月积累的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材料说明必须保持对外贸易垄断……我有责任声明，收回我两个月前书面通知中央委员们的反对对外贸易垄断的意见。”（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56页。）

不只是谈到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现在我再次逐一想起同列宁最后一次会见的感受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中央政治局经过辩论通过了列宁的建议，我记得是一致通过的。不管怎样，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发言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同列宁有严重分歧。因此，我给列宁的便条（他在前一天同我约好，要我秘密寄给他有关辩论发言的便条）^①只简单地记下了辩论过程，我想尽办法安慰伊里奇，在便条中指出，他同中央全会之间没有原则分歧。我记得，这张便条是怀着离开列宁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写的。

遗憾的是，这张便条没能转交给伊里奇，因为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禁止交给他任何书面材料和告诉他任何消息。由于沃洛季切娃的疏忽，全会知道了便条之事，但全会还是决定，只要医生一允许，就将便条交给伊里奇。

我想，托洛茨基在此透露的显然是伊里奇就个别问题单独会见他的事。我本人所看到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没有丝毫根据表明列宁会将托洛茨基作为主要依靠力量。相反，列宁不止一次表示过对托洛茨基的极端不满，说他被托洛茨基的歇斯底里弄得“精疲力竭”。

^① 列宁的秘书莉·福季耶娃在1922年12月16日的《列宁值班秘书日记》中作了记载。按照列宁的委托，克鲁普斯卡娅12月16日晚打电话请求福季耶娃“秘密打电话给雅罗斯拉夫斯基，要他记下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可能的话还要有其他人在全会上有关对外贸易问题的发言”。（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2页。）

№06528

雅罗斯拉夫斯基再谈与列宁 最后一次会见的情况

(1924年12月27日)

我不由得想再谈谈同 JI. 阿韦尔巴赫的谈话内容，确切地说，是回忆一下同列宁最后一次会见的情形。

列宁同我约定要我和托洛茨基（还有弗鲁姆金^①）商妥在中央全会上维护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建议，然后他突然问我：

“您同托洛茨基的关系如何？你们之间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发生过激烈冲突？”

我回答说，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尽管曾因军事路线发生过一些冲突。

伊里奇非常感兴趣，他俯身靠近我，要我讲讲事情的经过。我向伊里奇讲述了有一次我如何对托洛茨基提起他的孟什维克历史的情形。那是1919年夏天党的代表大会^②之后的事。在这次代表大会

① 弗鲁姆金，莫·伊·（1878～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副财政人民委员等职。

② 指1919年3月18～23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包括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内的“军事反对派”反对关于建立一支集中的、有纪律的正规红军的路线。“军事反对派”的意见被否决。中央军事机关工作中的缺点也受到批评。

上，索柯里尼柯夫同志^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军事观点辩护，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十分成功的措施引起了会上大部分代表和全党的严厉批评。托洛茨基来时代表大会已经结束，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白宫里召集尚未离去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可以说他是想报复。当时他责备我们原则性不强，硬说我们这些在军事问题上对他们进行批评的人（其中有弗拉·斯米尔诺夫^②、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③以及伊·尼·斯米尔诺夫^④，后者给我提供了许多关于托洛茨基缺乏自制力、甚至歇斯底里的事实，特别是在枪决共产党员的问题上）同他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而只是为了玩弄派别把戏而臆造出一个军事派别。我当时回答托洛茨基说，我除了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加入过任何派别，而他托洛茨基却不能对自己这样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托洛茨基的脸就抽搐了起来，在我简短的发言过程中他的脸黄一阵儿白一阵儿）伊里奇突然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

他说：“再说一遍，叶梅利扬，您是怎么对他说的。”

我又说了一遍，伊里奇再次富有感染力地笑了。

“您提孟什维克了，哈—哈—哈！对这一点他是永远不会原谅您的！永远不会，这种事托洛茨基是忘不了的。”

-
- ① 索柯里尼柯夫，格·雅·（1888～1939），1905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曾任一些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经俄共（布）中央批准的军事问题报告提纲。
- ② 斯米尔诺夫，弗·米·（1887～1937），1907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任第五和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领导了“军事反对派”并代表该派别作了副报告。
- 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86～1937），1903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从事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真理报》编辑之一。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和议程委员会委员。“军事反对派”的拥护者。
- ④ 斯米尔诺夫，伊·尼·（1881～1936），1899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任东方面军和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然后，伊里奇请我给他讲讲另外几件事。我讲道，1919年秋托洛茨基把我叫去，要求我不要在军报^①上刊登由瓦采季斯^②写的或由他口授的、署名为“伊阿科夫”（大概如此）的文章。瓦采季斯的这些文章反对乌克兰部队中的游击习气，间接攻击安东诺夫-奥弗申柯^③，我记得我对托洛茨基的要求非常惊奇，因为瓦采季斯的文章正是按照党的路线的精神写的。我本人也多多少少同情游击习气，甚至在我身上就有这种习气，特别是表现在用莫斯科军区的储备供应前线一事上。但是瓦采季斯推行的路线是党的路线。因此我告诉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没有理由执行他的要求，尽管我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某些行为也很同情。于是托洛茨基生气地向我证明，我应该辞去军队机关报的编辑工作。我说，我并没有特别坚持要做这项工作。

现在回忆起我同列宁最后一次谈话的这段情形，我很难设想，列宁想要同托洛茨基结成什么巩固的“联盟”。我觉得列宁正是把托洛茨基看做是一个前孟什维克，对我讲述在莫斯科苏维埃礼堂发生的情形“开心地”哈哈大笑，他只是要借助托洛茨基的帮助坚持他在保持国家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所确定的路线。

此外，我想，如果列宁想要结成一个比较持久的“联盟”，他就不会仅仅建议我同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因为我当时是中央委员，即使是间接地，列宁也会把正在采取的办法告诉我。如果托洛茨基确实是对阿韦尔巴赫说的，就像阿韦尔巴赫告诉我的那样，那么这纯粹是托洛茨基同志的自慰幻想。

① 指《军事人民委员部通报》，1918年4月起出版。

② 瓦采季斯，约·约·（1873～1938），1918年任东方面军司令员，1918年9月～1919年7月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919年8月起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

③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弗·亚·（1883～1939），1903年入党。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1919年1～6月任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乌克兰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No 06473

乌里扬诺娃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

（1926年7月26日）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①

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反对派近来不断地攻击斯大林同志，竟然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列宁在生前最后几个月同斯大林断绝了关系。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简要地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列宁在患病期间同斯大林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谈他患病前的一段时期，关于那时的情况我这里有許多证明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弗·伊·同斯大林的那种十分感人的关系，对此中央委员们知道得并不比我少。——乌里扬诺娃），当时我一直在他身边并且帮他办了许多事。

弗·伊·非常器重斯大林。例如，弗·伊·1922年春天第一次中

^① 指1926年7月14~23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联合反对派领导人指责中央委员会向党隐瞒了列宁的最后几封信。于是，在全会上宣读了列宁的一些信件，其中包括1922年12月25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1922年12月30日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以及1917年10月18日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武装起义的态度而写的《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在此之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玛·伊·乌里扬诺娃分别发表声明，这些声明附在全会速记记录后面。

风^①和1922年12月第二次中风时，都曾把斯大林叫到身边^②，把一些最隐秘的事委托给他，那是只能委托给自己特别信任的人、自己视其为真正的革命者和亲密同志的人去办的事。而且，伊里奇还一再强调，他就想同斯大林谈，而不是同别人谈。总的来说，在整个患病期间只要他有可能和同志们交谈，最常叫到他这里来的就是斯大林同志^③，而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叫过除斯大林以外的任何一位中央委员。

列宁与斯大林之间曾有过一件不愉快的事，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一次发言^④中提到过。事情发生在伊里奇丧失说话能力前不久（1923年3月），但这纯粹是个人之间的事，与政治毫无关系。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很清楚，所以拿它来做文章是完全徒劳的。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为了不让别人在伊里奇患重病期间向他通报政治方面的消息，以免使他激动、使他的病情恶化，中央全会应医生的要求责成斯大林对此进行监督，所以斯大林曾因伊里奇的家属转达这类消息而申斥了他们^⑤。伊里奇偶然得知这一情况后——这种保护制度本来就一直使他激动不安——也同样地申斥了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道了歉，因而事情也就了结了。如果伊里奇当时不是处

① 1922年5月25~27日列宁第一次突然发病。

② 1922年12月16日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23日凌晨右臂和腿瘫痪。未发现能够证明列宁在这个时候找过斯大林的材料。

③ 斯大林到哥尔克看望列宁的日期是：1922年5月30日，7月11日和30日，8月5日、9日、15日、19日、23日和30日，9月12日、19日和26日。

④ 指季诺维也夫在1926年7月21日晚上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到了列宁在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和1923年1月4日对该信的补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340页）、《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同上，第350页）和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同上，第52卷第555页）等文献中对斯大林的评价。这次全会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⑤ 不清楚在列宁的家属中除克鲁普斯卡娅外还有谁受到过斯大林的斥责。

于我所说的那种非常严重的病状，他就会以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件事了，这是不言自明的。关于这件事有一些证明材料，一旦中央需要，我就会提供这些材料。

所以我能肯定，反对派关于弗·伊·同斯大林的关系的一切闲言碎语都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是，而且一直是最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

玛·乌里扬诺娃^①

1926年7月26日^②

① 即玛·伊·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

② 布哈林曾参与起草玛·伊·乌里扬诺娃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这封信。保存在苏共中央档案馆的由布哈林亲笔写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公文纸上的一些文字与玛·伊·乌里扬诺娃的信的头几段基本一样。布哈林写的文字内容如下：“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反对派不断攻击斯大林同志并大肆散布关于列宁几乎完全同斯大林断绝关系的流言，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谈一谈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因为在弗·伊·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同他在一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器重斯大林，以至弗·伊·在第一次中风和第二次中风时都曾把一些最隐秘的事托付给斯大林，并且一再强调，他就想找斯大林。

弗·伊·在病危期间根本就没有找过一位中央委员，也不想见任何人，只找过斯大林。因此，所谓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如同其他人的关系的无稽之谈与事实恰恰相反。”

No06474

乌里扬诺娃

关于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的记事

(不早于1926年7月26日^①)

我在致中央全会的声明^②中说，弗·伊·器重斯大林，这当然没错。斯大林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人员，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但是，我在这份声明中并未说出弗·伊·同斯大林的关系的全部真相，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声明是应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请求写的，其中谈了伊里奇同斯大林的关系，目的是为斯大林说几句话，免得他受反对派攻击。反对派所利用的是弗·伊·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③，信中曾提出同斯大林断绝关系的问题。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个人问题——弗·伊·因斯大林竟然粗暴地对待娜·康·而生气。我当时觉得，这个纯属个人性质的原因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用来达到政治目的、派别目的。但是后来我反复思考这个事实，同时对照弗·伊·的许多论述及其政治遗嘱^④、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整个表现及其“政治”路线，于是我对伊里奇在生前最后一段时间里同斯大林的真实关系更加清楚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哪怕是简要地讲一讲这方

① 乌里扬诺娃的这份记事是她去世后在其私人文件中发现的。记事的具体日期无法查证。

② 即乌里扬诺娃1926年7月26日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主席团的声明。见本专题No06473文件。

③ 即列宁在1923年3月5日口授的给斯大林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④ 指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342页）。

面的情况。

弗·伊·的自制力非常强。他很善于掩饰对别人的态度，不使其外露，如果他出于某种考虑认为这样做更合适的话。我记得，有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常到我们的住所来，弗·伊·非常讨厌他，一见他就躲进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弗·伊·生怕与此人打照面，怕克制不住自己而彻底暴露了对他的真正态度。

弗·伊·对待与他共事的那些同志尤为克制。事业对他来说是第一位的，他能使个人的事服从于事业的利益，从不把个人的事看得过高过重。

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与托洛茨基发生的一件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称伊里奇是“无赖”，当时弗·伊·气得脸色煞白，但他克制住了。据向我转告这件事的一些同志说，他对托洛茨基出口骂人好像是这样回答的：“看来有的人神经有点毛病，”即使撇开这件事不谈，他对托洛茨基也没有好感——这个人身上的使人极难与之共事的特点太多了。不过托洛茨基是个出色的工作人员，是个能干的人，所以弗·伊·——我再重复一遍，对他来说事业是第一位的——为了事业而尽力保护托洛茨基，尽可能继续与之合作。至于他要花多大代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使托洛茨基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尤其是同斯大林和睦相处真是难上加难。他们俩都是虚荣心极强、度量极小的人。他们总是把个人的事置于事业的利益之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苏维埃政权头几年里关系如何，看看保存下来的他们从前线发给弗·伊·的电报就清楚了。

弗·伊·的威望一直遏制着他们，才使这种对立情绪未达到弗·伊·去世后那样的程度。我认为，由于许多个人原因，弗·伊·同季诺维也夫的关系也不算好。但为了事业的利益他在这方面还是克制着自己。

1922年夏天，即弗·伊·第一次患病时，我有机会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弗·伊·同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同政治局委员们的关系，因为当时我一直同他住在一起，几乎一刻也未离开过^①。

在此之前我就听说过弗·伊·对斯大林有些不满。有人告诉我，弗·伊·在得知马尔托夫^②患病后便请斯大林寄些钱给马尔托夫。斯大林对他说：“要我把钱花在工人事业的敌人身上！请找别的书记来替您办吧。”弗·伊·因此心情很不好，非常生斯大林的气。弗·伊·对他不满还有别的原因吗？显然是有的。什克洛夫斯基曾讲起他在柏林时收到过弗·伊·的信。^③从这封信来看，当时显然有人在暗算弗·伊·。是谁搞的什么鬼？这仍然是个谜。

1920年底至1921年初，1921年底至1922年初，弗·伊·两个

① 1922年5月底至10月初的这段时间，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哥尔克陪伴患病的列宁。

② 马尔托夫（尤·奥·策杰尔包姆）（1873～1923），社会民主党人，19世纪90年代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后任《火星报》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1920年侨居柏林。

③ 格·李·什克洛夫斯基（1875～193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起侨居国外，同列宁关系密切。1918～1925年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着下面这封列宁于1921年6月4日给什克洛夫斯基的信：

“什克洛夫斯基同志：

我给你的便函刚发出，就收到您的长信。

您说得完全对，在这件事上指责我‘任人惟亲’是极其荒唐和卑鄙的。我再再说一遍，这里面有阴谋，情况是复杂的。有人在利用斯维尔德洛夫、扎戈尔斯基等人的死作文章。

您可要‘从头开始’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抱有成见，有人竭力反对，还有人对我极不信任。这使我感到十分痛苦。但这是事实。我不为您给我的信而责备您。我明白，您非常困难。我看到我们党内现在还有这类事例。‘新人’来了，不尊重老人。你推荐人，他们信不过。你再荐一次，人家更信不过，并产生抵触情绪。‘我们不想要’!!!

毫无办法，只有从头开始，用战斗把新的年轻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敬礼！

列宁”

冬天身体都不好。头疼，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卧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对斯大林说，他也许要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毫无温情的人。再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弗·伊·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①。弗·伊·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那里的确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所许的诺言的时候。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告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身边。他告诉弗·伊·，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他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他们分手后，在弗·伊·病情开始好转之前一直未见过面，当时也不允许弗·伊·和同志们会面。

在这段时间里到他这里来得次数最多的是斯大林。他是第一个来看弗·伊·的人。伊里奇对他很亲热，谈笑风生，让我招待他，于是我送上酒和其他吃的东西。斯大林这次和以后几次来时，他们也谈到过托洛茨基，当时我也在场，看来伊里奇和斯大林都反对托洛茨基。有一次还讨论过邀托洛茨基到伊里奇这里来的问题，这是一种策略性做法。建议托洛茨基在人民委员会担任列宁的副手也同样

^①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22年5月30日。

是一种策略性做法。这一时期来看望过弗·伊·的还有加米涅夫、布哈林^①，但季诺维也夫一次也没有露过面^②，而且据我所知，弗·伊·从未表示过想见他。

弗·伊·于1922年秋天重新工作后^③，晚上常在办公室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会面。有时一到晚上我就设法让他们离去，提醒他们医生禁止久坐。可他们总不当回事，还说他们见面不过是聊聊天，并非谈工作。

令弗·伊·对斯大林大为不满的是民族问题即高加索问题^④。大家都知道他就这个问题给托洛茨基写过信。看来弗·伊·对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捷尔任斯基非常生气。^⑤弗·伊·在后来患病期间一

① 加米涅夫到哥尔克来看列宁的日期是1922年7月14日、8月3日和27日、9月13日；布哈林来的日期是1922年7月16日、9月20日、23日和25日。

② 季诺维也夫曾在1922年8月1日和9月2日到哥尔克看过列宁。

③ 列宁是于1922年10月2日开始工作的。

④ 在成立外高加索联邦和加入苏联的问题上，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俄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对以波·克·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采取了高压措施。为表示抗议，姆季瓦尼的支持者集体于1922年10月22日退出格共中央委员会。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前往格鲁吉亚调查冲突情况。12月12日列宁同捷尔任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捷尔任斯基在向列宁汇报时虽然提到了某些事实，但为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作了辩护。列宁对捷尔任斯基报告中的两点情况感到震惊：奥尔忠尼启则竟然动手打人；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认为前格鲁吉亚领导人应该对事件负责。格鲁吉亚事件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使列宁深受刺激，病情加剧，12月22日夜里中风，右侧瘫痪。12月30日，在苏联成立的当天，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并要求处分奥尔忠尼启则。

⑤ 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349—351页。

直为这个问题焦虑万分。^①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次冲突，于是弗·伊·1923年3月5日才写信给斯大林，我在下面要转述这封信。事情是这样的。医生坚决不让向弗·伊·谈任何公事。当时最令人担心的是娜·康·可能会把一些事情讲给弗·伊·听，因为她习惯什么话都对他说，甚至有时会完全不由自主地说漏嘴，尽管她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了不违背医生的禁令，政治局责成斯大林对此进行监督。有一次斯大林显然得知娜·康·同弗·伊·谈过什么事^②，于是给她打电话，态度相当粗暴（看来他以为这事弗·伊·不会知道），不许她同弗·伊·谈公事，否则就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控告她。这次谈话使娜·康·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几天后她对弗·伊·讲了这次受指责的情况，但又说她已经同斯大林和解了。斯大林在此之前确实给她打过电话，想必是要设法消除他的指责和威胁给娜·康·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但是她把斯大林在电话中大喊大叫的事告诉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显然还提到了高加索事件。

一天早上，斯大林把我叫到弗·伊·的办公室。他看上去心情很不好，很难过。他对我说道：“我昨天一夜没睡，伊里奇把我当成了什么人，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叛徒！我可是衷心地爱他的。请您无论如何要把这一点告诉他。”我很可怜斯大林。

① 1923年2月中旬，列宁组织了一个由自己的秘书组成的班子调查格鲁吉亚事件。3月3日，列宁得到了它的报告。3月5日，列宁写信给托洛茨基：“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务必在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这件事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在追究，而我不能相信他们是公正的。”3月6日，列宁口授了给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格鲁吉亚领导人的信：“我全心关注着你们的事。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这封信是列宁留下来的最后政治言论。

② 冲突的原因是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1922年12月21日给托洛茨基的信。

我觉得他真是从心里感到难过。

伊里奇找我有事，我便告诉他，同志们都向他问好。“哦”，弗·伊·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斯大林也请我向你转致热情的问候，并要我告诉你，他很爱你。”伊里奇微微一笑，没有作声。我问道：“也向他转达你的问候，行吗？”“转达吧”，伊里奇很冷淡地答道。“但是，沃洛佳^①，斯大林他毕竟是个有头脑的人”，我又说了一句。“他根本没有头脑”，伊里奇皱了皱眉头，回答得很干脆。

我没有再说下去。过了几天，弗·伊·得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知道了斯大林粗暴对待娜·康·的事，所以一早心情就非常不快，他先问娜·康·是否已去教育人民委员部，回答是肯定的，于是让人去找速记员。沃洛季切娃来了，弗·伊·便向她口授了下面这封给斯大林的信：

“绝密 亲收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顺致敬意 列宁^② 玛·沃·记于1923年3月5日。”

弗·伊·请沃洛季切娃把信送交斯大林，把副本装在信封里封好后交给我并且不要对娜·康·提起信的事。

但是娜·康·回到家后一见弗·伊·那副心情不快的样子便知道情况不妙。于是她请沃洛季切娃不要把信送走。她说，她自己要同斯大林谈并让他道歉。娜·康·现在就是这样讲述的，但我觉得她好像

^① 列宁的爱称。

^②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没有见过这封信，而且信已按弗·伊·的愿望送给了斯大林。斯大林的回信耽搁了几天^①，后来决定（想必是医生和娜·康·决定的）不交给弗·伊·，因为他的病情恶化了。所以弗·伊·也就不知道斯大林复信道歉的事。

然而，无论弗·伊·怎么生斯大林的气，有一点我可以完全肯定：弗·伊·在说斯大林“根本没有头脑”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这是他对斯大林的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他也曾向我讲过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与下述事实并不矛盾，即弗·伊·器重斯大林，视之为实干家，但又认为对斯大林的一些作风和特点要采取某种办法加以遏制，弗·伊·认为，凭斯大林的这些作风和特点就应当撤掉他的总书记职务。关于这一点弗·伊·在其政治遗嘱中，在对许多同志所作的评价中都明确地谈过，他的遗嘱和对同志的评价是在去世前写的，党一直不知道。不过这一点下次再谈。

^① 沃洛季切娃应克鲁普斯卡娅的要求没有马上把列宁的信送交斯大林。信是在3月7日交给斯大林本人的，斯大林当时就写了回信。

【专题说明】

值班医生记录的列宁病情和活动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

列宁于1922年5月25日第一次中风后，他的病情变化、生活起居和政治活动情况由值班医生逐日作了记录。1922年5月29日至1923年5月6日由神经科医生A.M.科热夫尼科夫记录，1923年5月7日至7月4日由神经病理学医生瓦·瓦·克拉梅尔教授记录，1923年7月5日至1924年1月21日由精神病医生维·彼·奥西波夫记录。本专题收入的是从1922年10月3日至1923年1月31日的医生记录。文字经过原记录人科热夫尼科夫校订，并删去了有关治疗的细节。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李桂兰翻译)

№06534

科热夫尼科夫的值班日志

(1922年10~12月)

10月3日。9点半，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教授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后见到他。他看上去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说，他是前一天^①乘汽车从乡下回来的。旅途一点也没有使他感到疲劳。他自我感觉挺好，只是一颗牙有些毛病。这颗牙疼，右腮有点肿，大概是牙龈脓肿。开会并没有使他感到有多累，但他自己说，出了一些小差错，因为他对主持会议已有些生疏，而且也不完全了解情况，对工作不熟悉。他的食欲还可以。有时胃灼热。没有出现麻痹症状。

10月10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教授在会议后再次看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牙龈曾严重化脓，疼痛难忍，疼得几乎三夜未睡。现在这颗牙差不多不疼了，但是由于刚生过病，多少有些神经质，时不时地想哭，眼泪总想往外涌，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一次也没哭过。今天他主持会议觉得轻松些，未出差错。总的来说，工作不使他感到疲劳。有时头有点疼，但很快就过去了。有时胃灼热。牙不疼了，睡得又跟先前一样好。

10月1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上去挺好，精神饱满。他认为他可以多做些工作，而他的亲属则认为他太劳累，因此建议除

^① 列宁从1922年4月4日起在哥尔克休息，5月下旬中风后留在那里治病。在健康状况好转后于1922年10月2日回莫斯科工作。

星期六和星期日之外，再临时安排星期三为休息日。起初，他反对这一安排，后来同意了，但只答应作为临时措施。睡眠还可以。麻痹症状从未出现过。

10月24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在人民委员会会议结束后1小时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看上去很好，精神饱满，没有倦意，不过他自己说，会议刚一结束时他感到有点疲劳。头几乎始终未疼过，从未服过非那西丁，头上也未敷过压布。睡得挺香。心情好多了。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结束时他打算作简短的致词（15分钟左右）并认为这不会使他过于激动和影响他的情绪。

10月31日。12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作了发言^①。他讲话富有感染力，嗓音洪亮，镇静自如，思路连贯，演讲非常成功，一点差错也没有。演讲后，他说，他不感到疲劳和激动，因此他认为医生可不必对他管得那么严，随后他同各方面人士谈话，还参加了常会的委员们的小组学习。晚上，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教授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完人民委员会会议后立刻见到了他。他看上去有些疲惫，他自己也说有点累，但在交谈时他越来越兴奋，很快就毫无倦意了。他说，星期四夜里^②他久久未能入睡。夜里3点钟出去散步，散步回来后很快就睡着了并且睡得挺香。星期天他在艺术专科学校看戏，但很快就觉得累了，在《炉边的蟋蟀》第二幕第一场结束后就走了。有一次，他在家听音乐，他不讨厌听钢琴演奏，但却不愿意听小提琴演奏，因为小提琴演奏太刺激他的神经。总的来说，他自我感觉挺好，但还是容易感到疲倦。他不去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3—248页。

^② 即1922年10月26日深夜。

彼得格勒^①，如果他自我感觉好的话，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作简短的发言。规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星期六和星期天要充分休息，不安排任何会见，如有可能的话离开莫斯科。星期三也要休息，但可以会见朋友。

星期天，29日，医生们去过加米涅夫那里，他们在那儿还见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说，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项法案提出批评，随后竟无意地把那一页翻了过去，就又开始念起来，但已经是另外一项了，他又开始批评这项法案，并未发现，这项法案的内容完全不同了。他们三人都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易感到疲倦，而且大概是过于疲劳了。

11月5日。从一清早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有点恶心，食欲不振。早上出现过阵发性痉挛和麻痹。当时他坐到卧榻式沙发上，坐了一分钟后站了起来，但只能用一只右脚站立。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在5点半见到他。他的心情有点忧郁，并因病情有些恶化而心绪不佳。他的神经系统毫无异常。手脚动作全部到位。很有力，紧张度正常。反射均匀、活跃，没有任何病态现象。感觉灵敏。

11月7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12点半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前一天他感到不大舒服。一整天没做事，总想躺会儿。今天，从一清早起……心绪不佳，就更想躺着了。最近两天头时时作痛。没有食欲，睡得挺好。他自己认为，他今天最好不在共产国际代表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定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为此列宁于1922年11月4日用电报发了贺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2—273页）。

大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全会（在大剧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言。^①

11月1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全会上发言，用德语讲了1小时。^②他讲话流畅，思路连贯。演讲很成功。演讲时他没有激动不安。演讲完后，他对科热夫尼科夫医生说，有一个地方他忘了已经说了些什么以及还需要说些什么，并问是否发现了这个问题。科热夫尼科夫医生非常诚恳地告诉他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对医生说，11月11日他的右腿曾有过非常短暂的麻痹。情绪总的说来还好，他问医生能否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长达两小时的纲领性的发言。科热夫尼科夫医生作了肯定的答复。

11月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教授：11月18日（星期六），他的一条腿出现过麻痹症状。11月19日（星期天），他去打猎。总共走了5~6个小时。当他在森林中行走时出现过麻痹症状。他拖着那条病腿，脚尖着地，开始走向一个树墩，走到树墩后，坐了不长时间，就又继续走了两个小时。

检查结果表明：……反射完全正常。无病态反射。腿部很有力。

11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麻痹症发作，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教授被叫到他那儿。他说……当时他出了厕所，在走廊里，右腿突然出现阵发性痉挛，腿变得无力。他扶住旁边的

^① 11月7日当天，列宁给原米歇尔逊工厂的工人发了贺信，他们曾邀请列宁参加以他的名字命名工厂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周年的群众大会（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67页）。这一天，列宁也给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发了贺信（同上，第268页）。

^②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2~288页）。

一个高高的镜子，但镜子摇晃起来，他怕镜子倒了，就松了手，自己摔倒在地板上。当时手挺灵活。说话一直很清楚……几位妇女（没有一位男人在场）想把他扶起来，但却力不从心。于是他说，他自己会站起来的。他也的确站了起来。他说他躺了1分半钟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地上站起来后，走到自己的房间躺了下来。这一切发生在10点钟。我们（医生）在将近12点钟时见到他。经检查：动作到位，很有力，无病态反射。上个星期一直未犯病。他没有特别累着，头也没有很疼过。睡得也挺好。他看上去相当不错。医生吩咐他：休息一周，不参加任何会议，不安排正式会见。

11月27日。今天上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两次发病，医生们被叫到他那儿。第一次发作是在10点钟，持续了一分半至两分钟，发病的仅仅是一条腿。12点钟第二次发作，一条腿和一只胳膊完全麻痹，言语功能未丧失。他小声说了几句话，想看看吐字是否清楚，这一点他完全做到了。意识一直清醒。发作持续了20分钟。前一天，他自我感觉就不大好，头有些疼。今天从一清早起头就不清醒，昏沉沉的。前额左半部时不时一跳一跳地疼。对神经系统做了物理检查，未发现任何异常。动作到位，很有力。无病态反射。无论是浅表感觉还是深感觉都正常。情绪有些压抑。他显得有些无力，脸呈土灰色。医生在5点半见到他。医嘱：卧床两天，不许出门。

11月29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电话，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一天平安无事。

11月30日。平安无事。

12月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我感觉不太好。他很容易累，头不清醒，常常焦躁不安，几次出现轻微的麻痹症状。物理检查的结果：未发现明显的动作失调现象。反射均匀，未引起病态反

射。他自己也认为，最近他很容易疲倦。看上去他就不很好，脸呈土灰色。

医生建议他去哥尔克休息几天，什么事也不要做。起初，他不想同意，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答应星期四会议结束后去，下星期一或星期二返回。

12月7日。^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科热夫尼科夫医生。问他能否服萨瑶津药片3片以上，因为近来他每天都出现麻痹症状，但科热夫尼科夫医生仍让服3片。

12月12日。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来电话，说他们已从哥尔克回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我感觉不大好。在哥尔克村时，天天发病。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请我们明天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儿。

12月13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和克拉梅尔教授来看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上去不大好，每天都出现麻痹症状。今天早上，在床上有过一次轻微的麻痹症状，而在坐式浴盆洗澡时又发作一次，这一次与第一次不同，持续了几分钟，不光是一条腿麻痹，而且一只胳膊也麻痹。他心情沮丧，为病情恶化而忧虑不安。检查时发现，右胳膊在做细微的动作时显得不灵活。反射有力，右肢比左肢显得更有力些。无病态反射。

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不在任何会议上讲话，暂时完全停止工作。他终于同意这样做并说从今天起就取消所有的公务。医嘱：不要散步，尽可能地卧床。

12月16日。病情恶化。昨天一整天右肢感到沉重。右臂几乎无法做细微的动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试着写点什么，但他费

^① 11点至14点20分，列宁出席由加米涅夫主持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18点15分，列宁去哥尔克。

了九牛二虎之力写的信，女秘书却无法辨认，他只得口授这封信。^①他看上去不怎么好，样子很疲倦。他说，夜里将近1点钟的时候，右肢曾麻痹，持续了35分钟。胳膊和腿一动也不能动。说话正常。后来胳膊和腿开始能动了。物理检查的结果是：两个瞳孔不等，但对光线的反应还可以。脸的右半部神经要比左半部神经差些。舌位正常。右肢软弱无力，有些不协调。所有的动作都能做，但动作迟缓且极不灵活。手指的迅速活动、手腕的迅速内收和外展以及旋前和旋后这些动作都根本无法完成。在做这些动作时一方面是表现出不协调，另一方面是表现出明显的失用症。指尖摸不到鼻尖，并且手指总是向鼻翼左侧偏离。下肢也跟上肢的情况完全一样。踝关节和膝关节也不能迅速弯曲和伸直。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远侧部位要比近侧部位失调得更厉害。他只能以极慢的速度书写，而且写得很小，一个压着一个。右侧的反射比左侧有力得多，但未观察到任何病态反射。无论是浅表感觉还是深感觉看来均未受到损害。未丧失言语功能。计算迅速无误。总的说来，整个心理机能挺好。医嘱：卧床，吃较易消化的食物，每日服6片Jodfortan，注射血清Trunecek，6点半注射第一针，头上敷压布，睡前肚子上也敷一块压布。

12月1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挺香。头昏沉沉的，不清醒。情绪不好。言语完全正常。书写比前一天好些。傍晚开始焦躁不安。

^① 这里指的是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0页）。

12月18日。睡得挺香。头不清醒，有些疼。未丧失言语功能。^①

12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不错。情绪不好。头稍微有些疼。弗·亚·格季耶为他做了检查，未发现任何异常。

12月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非常好，从11点钟睡到9点钟，但头还是不很清醒，好像有点疼，尤其是右前额。情绪不很好。12点半，费尔斯杰尔和克拉梅尔教授来过。他极亲切地接待了费尔斯杰尔，一见面就问费尔斯杰尔：乘什么车来的，累不累。在做物理检查时发现：脸的右下部的情况要比左下部差些。舌位正常，而且舌头的所有动作都完成得很好。右臂肩关节的动作缓慢而且迟疑不定，不能沿直线方向进行，总向左偏离。动作不能完全到位，胳膊不能抬到垂直的位置且伴有二头肌疼痛。肘部只能慢慢地弯曲和伸直。手腕也只能慢慢地弯曲和伸直，而且不完全到位，但这些动作毕竟比侧弯动作完成得好，而侧弯动作又比旋前和旋后这些动作完成得好，在做旋前和旋后动作时，他整个身子转向右边。手指动作缓慢，大拇指只能同食指完全对上，同中指和无名指就差些，而同小指根本就对不上。右下肢的动作要比上肢的动作完成得好一些，但这些动作的完成较之左边更迟缓、更迟疑不定。所有动作都比前一天完成得好。上肢和下肢的所有主动动作总的说来挺有力，主动动作出现的毛病决不是由肌肉的轻瘫造成的，而似乎是由于失用症造成的(?)。

^① 这一天，俄共（布）中央全会开会，列宁未能出席。会议讨论了并通过了列宁关于坚决实行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提议。全会决定：“如果列宁同志询问全会就对外贸易问题所作的决定，就按斯大林同志与医生达成的协议向他通报决议的全部条文，并告诉他，决议以及委员会的组成都已被一致通过。……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往来。”（参阅本卷№06468文件。）

无论是浅表感觉还是深感觉都没有明显受损。右边的反射大大强于左边。^① 右膝和右足阵挛，左足阵挛，但右边同左边相比不太明显。左边奥本海姆氏反射要比前一天弱些。右边未发现这种反射。无其他病态反射。

12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稍微差些。昨天傍晚情绪就不好。头时不时地有些疼。食欲不好。

12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不错。头不疼。傍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焦躁不安，给他用了溴剂后，安静了下来。^②

12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挺好，但夜里有两次觉得腿上有条“小蛇”在爬，之后腿就不能动了。他醒后，胳膊和腿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头不疼。下午3点钟，只有右手的拇指可以外展、食指能够弯曲，其他所有动作根本做不了。腿部只有大腿能够弯曲并能够做小小的内收和外展动作。膝关节、足和脚趾什么动作也做不了。股四头肌和腹部斜肌总是阵挛性抽动，而且非常明显，同时四头肌非常紧张，使得大腿也同样紧张。结果，靠外力也不能使膝关节弯曲和大腿外展。深感觉明显降低，他根本不能确定被动动作的方向。他发现腹部皮肤的感觉右边比左边差些。而其他部位无这种现象。右边的反射明显增强。足部阵挛右边更厉害。左边有4~5次阵挛，两边均无病态反射。8点30分，所有的手指头都能

① 原文如此。

② 列宁的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在其回忆录中引用了莉·亚·福季耶娃在这一天的记录：“12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晚上6点钟把我叫去，口授了下述内容：‘要是麻痹症侵袭到言语器官，别忘了尽一切努力把氰化钾搞到并送来……这种办法是人道的，是效法拉法格夫妇……’”（《苏共中央通报》莫斯科1991年第6期第191页）。玛·伊·乌里扬诺娃写道：“正如我们所提出的那样，12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把福季耶娃叫去作了简短的口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医生不同意他工作和同自己的秘书商谈提出了最后通牒：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时间向女速记员口授，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同上，第191页）。

动了。腿不抽动，脚趾头和脚掌都能动，膝盖也能弯曲了。其他部位无变化。他请求允许他向女速记员口授5分钟，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不安，他怕睡不着觉。他的要求得到允许，随后他明显地安静下来。^①

12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2点30分入睡，睡到10点钟。他睡得挺香，他说这是因为允许他口授自己的想法。总的说来，情绪不坏。头不疼，但有时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感觉，好像眩晕并伴有恶心，这种情况每次持续约有两分钟，同时好像感到呼吸困难。物理检查结果：所有的动作同昨天晚上一样，但右大腿和右腹部又开始抽动。在全身绷紧并进行深呼吸的情况下可以看出：右边肌肉比左边肌肉收缩得差。反射同先前一样。

医生们在看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到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处。他们经过长时间的商量后决定：（1）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具有通信性质。他不要期待对他口授的东西做出答复。禁止会客。（2）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应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诉他，免得给他提供思考的素材并使他焦虑不安。

白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了1小时。头不疼。情绪稍微好些。晚上，他向女速记员口授了10分钟。^②

12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不错。早上头不疼，情绪还好。

晚上，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打电话告诉我^③，弗拉基米尔·伊里

^① 列宁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338页）。

^② 列宁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8~340页）。

^③ 指科热夫尼科夫医生。

奇这一天的情况还可以。情绪总的说来不错，比较稳定。他向女速记员口授了 10 分钟。^①

12 月 26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不好。很晚才入睡。12 点钟，他醒了。头不清醒。食欲不振。夜里曾几次把妹妹叫醒，喝波尔若米矿泉水。

白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了两小时。一天都没胃口。5 点钟吃了些黑李子干。7 点钟才吃午饭。向女速记员口授了 15 分钟。^② 头不疼。情绪不大好。^③

12 月 27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得非常好。11 点钟入睡，4 点钟醒了，但很快又睡着了，睡到 10 点钟。情绪不坏，头不疼。他这一天情况不错。食欲好些。他向女速记员口授的时间略超过 15 分钟。^④

12 月 28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 1 点钟睡到 11 点钟。早上就有些萎靡不振。头不疼。他认为自己嗜睡是由于服了溴梦拉，甚至认为，这种药使脑袋发沉，思维不清楚。昨天，女速记员为他读了口授记录，他听后对所读的内容很不满意。

M.O. 阿韦尔布赫检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发现眼睛无任何变化，眼底和先前也没有差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天的情况不错。向女速记员口授了 20

① 列宁继续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39～340 页）。

② 列宁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三部分（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0～342 页）。

③ 医生 12 点多钟来看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④ 列宁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4～345 页）。

分钟。^① 阅读 20 分钟。^② 白天睡了觉。

12月2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点钟睡到11点钟。情绪不好。

白天，他萎靡不振。阅读两次，每次20分钟。^③ 向女速记员口授两次，每次10分钟。^④

12月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服安眠药睡得挺香。醒后精神饱满，头不疼。今天的情绪比昨天好，心情好像不那么忧郁。今天，他两次阅读，每次20分钟，还两次口授。每次15分钟。^⑤ 他对第一次口授非常满意。第二次口授不很顺利，因而使他心绪不佳。傍晚，情绪变得更坏了。今天食欲还不错。

12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2点15分入睡，一直睡到11点钟，中间没醒过，但醒后却觉得睡了还不到8分钟。医生们1点钟来看他。他睡眠惺松，情绪很不好，这种情况在这次生病期间还从未有过。总的说来，他的情绪常常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在不利的关头（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加盟共和国代表大会）加重的。

午饭后，他睡了1个半小时多点，醒后情绪比早上好多了。两

① 列宁继续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5～346页）。

② 列宁大概开始阅读1922年12月24日收到的尼·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3卷或第4卷（柏林—彼得堡—莫斯科1922年版）。

③ 列宁继续阅读尼·苏汉诺夫的书。

④ 列宁口授完《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7～348页），还口授了《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一信（同上，第342～343页）。这两封信均由玛·阿·沃洛季切娃记录。

⑤ 列宁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351页）。

次向女速记员口授，还阅读口授记录。^① 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牙科医生来过，他发现，现在疼的是另外一颗牙，而不是秋天发病的那颗。

^① 列宁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2～355页）。

№06535

科热夫尼科夫的值班日志

(1923年1月)

1923年1月1日。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不着……直到4点钟才睡着。睡到11点钟，中间没醒过。他醒后情绪挺好，头不疼。我们1点钟来看他。他的情绪挺好，很快活，但感到不满意的是醒得太晚，不能上午工作。他希望能想个办法让他早点醒来。医生吩咐他今天10点钟服两片溴梦拉，白天不要睡觉，认为他只有早睡才能早醒；同时医生坚决不同意他提出的9点钟叫醒他的要求。

白天，他口授并阅读了口授记录。晚上继续阅读。9点钟他就非常想睡觉。他服了溴梦拉后，11点钟睡着了。

1月2日。他睡到9点15分，中间醒过一次。他自己醒的，有些睡眠惺松，头也不很清醒，有点无精打采。

午饭时食欲不错。白天他口授^①并阅读。一天情绪都不大好。9点钟就已非常想睡觉了。10点钟刚过，未服安眠药睡着了。

1月3日。将近3点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醒了，头疼。他服了非那西丁，4点钟刚过又睡着了，9点20分醒了。后来女秘书来了，他向她口授了15分钟。^②牙科医生来过，认为那颗疼痛的牙会好的。此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着了，睡了1个多小时。

^① 列宁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了《日记摘录》一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6~359页）。

^② 上午玛·阿·沃洛季切娃大概把1月2日口授的《日记摘录》一文的打字稿交给了列宁。列宁阅后作了修改并口授了文章的标题。

我们来看他时，他还在睡着，而当我们走到他的跟前时，他仍昏昏欲睡，打了几个哈欠。

1月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到6点钟还没有睡着……他10点半醒了。情绪不很好，头不清醒。医生1点钟来看他。他睡眼惺松，眼睛红红的，不断打哈欠。医生吩咐他先吃午饭，然后再睡一会。他睡了1个半小时。醒后心情比早上好得多。两次口授^①并阅读。一整天食欲都不好。将近11点钟时，未服安眠药睡着了。

1月5日。3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醒了……直到5点半还没睡着。此后他睡着了，睡到10点20分，但他觉得还没有完全睡够。早饭后……将近12点钟时，他又睡着了，1点半醒了。医生来看他，他还没有完全睡醒，不断打哈欠。起初，他情绪不太好，但很快就快活起来，说笑，逗乐。

白天，他感觉不错。他口授^②并阅读。食欲略微好些。临近午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睡不着觉，因而给他服了两片溴梦拉。11点刚过，他很快就睡着了。

1月6日。夜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醒了，但很快又睡着了，睡到7点钟。他早饭吃得挺香。一上午他都非常快活，不停地说笑、逗乐。11点钟过后他又睡着了，睡到1点15分。医生来看他时，他还没有完全睡醒，不断打哈欠。但很快就清醒了，又开起玩笑来。白天，他头疼过，服了非那西丁，头不疼了，晚上阅读^③。

① 这一天列宁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即对《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的补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和《论合作社》一文的初稿（同上，第361~365页）。

② 列宁大概在继续口授《论合作社》一文的初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1~365页）。

③ 看来列宁不仅阅读了，而且还口授了《论合作社》一文的第二稿。该文的一份打字稿上注明日期为1923年1月6日（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5~368页）。

早上食欲挺好，午饭和晚饭都没胃口。11点钟过后，他未服安眠药睡着了。

1月7日。3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醒了，7点钟以前一直在打瞌睡，而到7点钟完全醒了过来。10点钟又睡着了，睡到1点钟。醒后头不疼，情绪挺好。白天他也睡觉了。食欲不好。

1月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到3点钟，从3点钟至7点钟没有睡。7点钟又睡着了，睡到1点钟。1点15分医生来看他时，他完全是一副睡眠惺松的样子，不断打哈欠，有些萎靡不振，白天他没有睡。两次阅读。

1月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1点钟入睡。3点钟，由于嘴发干而醒了，躺了半个小时左右，后来打起瞌睡来，很快又睡着了，睡到11点钟。4点钟，医生来看他。他午饭后似睡非睡，萎靡不振，很少说话，情绪不好。^①

1月1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3点钟。3点钟醒后，右前额和右太阳穴疼痛。服了非那西丁后，疼痛未消失，无法入睡。夜间右腿痉挛。7点半，他吃了早饭，将近9点钟睡着了，睡了1个半小时。将近12点钟，科热夫尼科夫医生接到电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右腿的情况不好，他焦躁不安，要医生来。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大约1点钟来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当……医生走到他跟前时，他因左侧肋部疼痛而呻吟、痉挛。脸上显出忧虑不安的神情，情绪很不好。按照科热夫尼科夫医生的建议。他尽力设法睡着，也真的睡着了，从2点钟睡到4点钟。4点半，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同克拉梅尔一起来看他。他的情绪很不好。肋部几乎

^① 列宁虽然觉得身体不好，但仍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一文，即《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初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32—434页）。

不疼了。医生已经回去了，可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又把科热夫尼科夫医生叫了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请女秘书来一下，医生竭力劝阻他，但他为此很不高兴，非让女秘书来不可，我^①问他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说不能超过两分钟，我答应了他。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一整天都没胃口。11点钟入睡。

1月1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睡到6点钟，中间没有醒过，用了早餐。从11点钟又睡到4点钟。上午，情绪不错。差1刻5点，医生来看他，开始他睡眠惺松，很快就清醒了，说笑、逗乐，但在笑时左侧肋部昨天疼过的那个地方又开始疼痛。今天食欲稍微好些。情绪总的说来还不错。

1月1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近12点钟入睡，睡到7点钟。醒后还想睡，但他下决心在整个白天不睡觉，以便晚上不服安眠药就能睡着并能睡一个通宵。因此，当医生4点半来看他时，他疲惫不堪。医生走后，直到傍晚他都焦躁不安，阅读了一会儿。食欲一天都不大好。

1月1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1点钟入睡，睡到1点钟，此后就睡不着了，服了两片溴梦拉，从4点钟睡到6点钟。用了早餐，洗了脸。10点钟又睡着了，睡到5点钟。当医生看他时，他完全是一副睡眠惺松的样子，情绪很不好。午饭时，他没有食欲。两次口授^②并两次阅读。情绪不好。

1月1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2点钟睡到6点钟。他用了早餐，11点钟又睡着了，睡到4点半。情绪不好，食欲还可以。

1月15日。睡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服了两片溴梦拉，但睡得

^① 即科热夫尼科夫本人。

^② 列宁向莉·亚·福季耶娃口授《我们对工农检察院怎么办？》一文的续和结尾（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33—438页）。

不沉。从12点钟到4点钟，他似睡非睡，后来根本就没有睡。10点钟，他又睡着了，睡到4点钟。4点半，他的情绪挺好，人很安静。晚上情绪也不错。

1月1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2点钟睡到6点半。早饭后又睡了1小时。午饭时食欲不是特好，午饭后睡了两小时。5点钟，他仍睡眼惺松，不断打哈欠。后来稍微精神了点。晚上情绪好些。他口授33分钟^①，然后阅读，这大概使他有些疲惫。

1月17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6点半。早饭吃得还可以。10点钟，他又睡着了，睡到1点半。医生将近两点钟时来看他。他仍睡眼惺松，打了几个哈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嘴、鼻咽部发干，要求仍给他滴鼻剂并请Л.И.斯韦尔热夫斯基来。医生吩咐今天给他滴鼻剂，明天带Л.И.斯韦尔热夫斯基一块来，并建议他用温水加花露水擦身。今天他请求允许他看报，但这个要求暂时被拒绝了。晚上他口授^②并阅读。食欲不大好。

1月18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6点钟，早上他盥洗、擦身并用早餐后，感到疲倦，从11点半又睡到2点半。Л.И.斯韦尔热夫斯基来了，他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耳部没有任何变化，鼻咽、喉均正常，可是鼻腔太干。医生看过病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累了，午饭后又睡着了。晚上阅读，但没有口授。情绪不很好。食欲也不大好。

1月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1点钟多点入睡，4点半就醒了。早上擦了身。擦身疗法大概使他感到疲倦，因此决定只在需要

^① 列宁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标题是《真理报》编辑部加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9～372页）。

^② 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4页。

清洁时才擦身。在医生到来之前，他又睡着了，睡了1小时左右。医生来时，他有些睡眠惺松。白天，将近12点钟的时候，他觉得右腿上好像有条“小蛇”在爬似的，他担心，这会使他的腿的动作更不灵活，但在做物理检查时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午饭后，他又睡了两小时左右，他非常满意没让他睡太长的时间。他醒后情绪非常好。口授1个多小时^①，又阅读1个多小时。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满意，也不觉得很累。早饭时，食欲非常好，而午饭时却没胃口。

1月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3点半，又从5点半睡到9点半。他醒后情绪挺好。头不疼。早饭吃得不错。医生1点半来看过他。他的情绪非常好。睡眠看来明显见好，现在他就要能够更好地做事了，整个情况就会好转，他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早上，他口授。午饭时没有胃口。午饭后睡觉。1个半小时后把他叫醒。情绪比早上要差些。晚上又口授半小时^②并阅读。后来情绪更差，头疼得很厉害。

1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1点钟入睡。3点钟醒了。头疼。6点钟以前，他直打瞌睡，而在6点钟完全醒了过来，再也没有睡，早饭时食欲比近几天差些。医生1点半来看过他。他的情绪不大好。头疼，主要是右太阳穴疼。他说，有时他有一种感觉，好像全身麻木，右侧麻木得更厉害。夏天的时候，麻木后出现痉挛，而现在这种短促的感觉过后没有任何症状。他对睡眠仍未调整好不满意。午饭时，食欲不是特好，午饭后睡了1个半小时，然后把他

① 列宁开始向玛·阿·沃洛季切娃口授《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第二稿（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3~377页）。

② 列宁继续加工《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第二稿。

叫醒。傍晚，他的情绪稍微好些。他两次阅读，但没有口授，因为头有些疼。

1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5点钟，醒后精神状态不好。他为不能再入睡而心情沮丧。他用了溴剂，过了一会儿稍微安静了下来，但已经不能再入睡了。他开始阅读。然后叫来女速记员，向她口授^①。口授顺利，他很满意，因为他终于将这篇写得不顺利的文章完成了。此后他没有睡觉，尽管他曾试着睡过。我们1点半来看他。他虽然睡得很少，但看上去相当精神，不疲倦。他精力充沛、谈笑风生。午饭后他睡了两小时，然后把他叫醒。晚上他情绪挺好，并且再次阅读。

1月2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服了两片镇静药后从11点钟睡到4点钟。醒后又服了两片，马上又睡着了，睡到9点15分。醒后情绪挺好。擦了身。早饭吃得挺香。上午向女速记员口授了45分钟并阅读。医生1点半来看他。情绪挺好，头清醒，不疼。午饭后，他睡了1小时。他自我感觉不错。阅读。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3点钟。3点钟，因头疼服了非那西丁和两片镇静药，但未能再入睡。头昏沉沉的。早饭时食欲不好。11点钟，他又睡着了，睡到2点半。医生来看他时，他还完全是一幅睡眠惺松的样子，不断打哈欠。午饭后，他睡了1小时。傍晚，他的情绪不大好。只阅读，没有口授。头有些疼。

1月25日。11点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服安眠药就睡了，睡到2点半。他醒后立刻服了0.6的巴比妥，服完药后睡着了，睡到6点钟。醒后情绪不很好。擦了身，这使他感到疲倦，然而他上

^① 列宁继续口授《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第二稿。

午没有再睡觉。医生 12 点多钟来看他。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不愿意谈话，不断打哈欠。一整天情绪都非常不好。他从 7 点钟睡到 8 点半。醒后情绪不好。一点食欲都没有，未吃午饭，只喝了一杯茶。^①

1 月 26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1 点钟入睡，睡到 2 点半，5 点半又睡着了，睡到 9 点钟。早饭时食欲挺好，上午他阅读，今天的情绪要好得多。午饭时食欲不错。午饭后睡了大约 1 个半小时，晚上阅读^②。

1 月 27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未服安眠药 11 点钟入睡。睡到 2 点半，然后服了巴比妥，睡到 9 点半。他醒后情绪很好，早饭吃得挺香，上午阅读。医生 12 点多钟来看他。他心情平和，但头有点疼，特别是右眉弓部位。他有点想睡觉，不断打哈欠。午饭时食欲不是特好。午饭后睡了 1 小时。晚上把女秘书叫来并阅读。傍晚，头有些疼。

1 月 28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 11 点半睡到 4 点钟……接着又睡到 9 点 15 分。醒后情绪还可以，虽然因飓风而有些焦躁不安。头不疼。今天，他居然能写出字母“Y”。食欲仍不大好。午饭后睡了 1 个半小时左右。白天和晚上头都疼过。

1 月 29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 11 点半睡到 2 点钟……3 点钟又睡着了，睡到 9 点 15 分。醒后情绪挺好，但头有些疼。医生 1 点半来看他。情绪挺好。午饭时食欲不好。午饭后睡了 2 个半小

① 这一天列宁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问是否收到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

② 1923 年 1 月 26 日，列宁把莉·亚·福季耶娃叫去，让她了解一下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及副人民委员瓦·亚·阿瓦涅索夫和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对《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文章的观点，建议他们在代表大会之前开会讨论，编写教科书的提要和大纲等等。

时。醒后头疼。

1月3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钟睡到5点钟……接着又睡到9点钟。醒后情绪挺好，头不疼。早饭时食欲还可以。上午，他阅读。医生1点15分来看他。他情绪挺好，看上去精神饱满，头不疼。傍晚头疼得厉害，情绪变坏……晚上没有阅读。

1月3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1点半睡到4点半。他服了巴比妥后又接着睡到8点……他又睡着了，睡到10点半。情绪挺好，头不疼。医生1点15分来看他。午饭时食欲还可以。午饭后睡了约3小时。醒后阅读了半个多小时。在阅读后过了没一会儿，头剧烈地疼了起来。

【专题说明】

列宁病休期间的党内斗争

(1923年7月至12月)

本专题收入了1923年7~12月间斯大林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部分往来书信和1923年底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党内会议上的讲话。这些以前鲜为人知的书信和材料揭示了列宁患病期间苏联高层政治领导人相互关系的事实和1923年党内斗争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领导层在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决策过程。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李京州、王丽华翻译)

No 06498

斯大林关于莫斯科情况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5日)

于莫斯科

季诺维也夫同志^①：

这是给您写的第一封信。关于各项决定的情况想必您已从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得知了。我们这里的一件新鲜事是辛克莱的涉及共和国现有全部产油区的“合营公司”方案。要是抓住这条大鱼就好了，但事情没有办成，而且看来也办不成了。这个可恶的家伙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而我们的条件（见政治局会议记录）他又不接受。^② 伏尔加河船队租让一事毫无结果，倒是我们的水运员工由于害怕租让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并同意减员15%（这要感谢盖森先生！）。^③

还有一个新闻。您大概知道，由于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那篇人所共知的反对销售白酒的杂文（登在《真理报》上），政治局建议

① 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正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

② 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建议与苏联政府签订石油租让合同。这个问题在1923年7月12日和16日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研究。政治局决定责成皮达可夫起草致辛克莱的信，将签订合同的条件一一列出，并在信的末尾指出：“只有苏美之间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才能签订合同。”

③ 1923年7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河运船队改行经济核算的问题和同英国企业家盖森就成立“伏尔加河—卡马河劳埃德”航运股份公司进行谈判的情况。

《真理报》不要再就白酒问题进行辩论了。^① 对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给政治局寄来了一份声明，认为这项“由中央委员会中一部分人（即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请求解除他在《真理报》的职务。^② 同时他对索尔茨^③说：“这件事可能会导致分裂。”一些同志看来正在为掀起又一场风波寻找“适当的”借口。我想，只好满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请求，使他从《真理报》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并成立一个“临时编辑小组”。请把此事告诉布哈林，让他高兴高兴（这下他可有帮手了）。这些事……

我们要派卡拉汉去北京。李维诺夫近日就要休假。他依然同契切林不和。契切林威胁要用自杀来了结问题。

党内的情况依然过得去。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只有3人（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和我），其他人分散在外。要是日内李可夫还不从克里木回来，政治局就不足法定人数了。

① 1923年7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伏特加，教堂，电影院》。当天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建议该报编辑部“不要再就售白酒的问题在《真理报》上刊登辩论文章”。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1923年7月15日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函中写道：“任何一项旨在恢复销售白酒的新的决定，如不经过问题的全面而公开的讨论，不获得党内稳定的多数对这一措施的支持，就不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因此，撇开问题的实质不谈（我个人是反对销售白酒的），我认为政治局7月12日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我请求撤销这项决定。”

1923年7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声明，并做出决定：“（1）重申政治局的如下决定，鉴于中央全会已建立专门委员会来研究出租酿酒厂的问题，任何有关该问题的辩论都是不适宜的。

（2）认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信语气放肆，内容出格。

（3）满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请求：解除他在《真理报》的工作，在布哈林同志回来之前先任命一个临时编委会，成员有：拉狄克同志、布勃诺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利亚多夫同志、尼·尼·波波夫同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③ 索尔茨，阿伦·亚历山大罗维奇（1872～1945），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20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年开始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请代我吻布哈什卡^①的鼻子。
就此搁笔

约·斯大林

^① 尼·伊·布哈林的绰号。

No06499

斯大林关于莫斯科情况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7月27日)

于莫斯科

季诺维也夫同志：

我今天得知，德国的同志取消了他们原先要搞游行的决定，只举行一些秘密集会。我认为这是正确的^①决定。这些怪人，想游行穿过柏林去兵营。硬要同白卫军官较劲。无法与七月事变^②相比。七月事变时我们有苏维埃，有整个整个的团队，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士气低落。而这些条件现在德国人都不具备，除了看来已经冲昏他们头脑的五金工会选举的胜利。谢天谢地，事情总算顺利地了结了。

我在第一封信中忘了告诉您，我们决定签署海峡公约。我想，

① 原件此处被删去的文字为：“是不正确的”。

② 指1917年7月俄国的政治危机。

这是惟一可行的决定，已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①

今天已做出调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决定，任命了一个由拉狄克、布勃诺夫、利亚多夫、大概还有索尔茨组成的临时编委会。^②它将一直工作到布哈林回来为止，而以后的事再说。

敬礼！

约·斯大林

① 1922—1923年间举行的洛桑会议讨论了关于签订黑海海峡公约的问题。公约草案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并允许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商船或军舰自由通过。1923年7月19日举行的有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认为签订海峡公约是必要的，理由是，尽管从苏联各民族的和土耳其的民族利益来看我们对条约的内容持否定态度，但是为了参加对海峡的监督，为了实际检验协约国的‘爱好和平的诚意’，我们要签署这个条约；同时，苏联政府保留在实践证明参加该条约不能对维护苏联的利益提供足够保障的情况下中止条约的权利，苏联政府同样也保留在适当时机根据黑海沿岸各民族的利益和世界贸易的利益向有关政府提出修改达达尼尔海峡决定问题的权利。”同一天，契切林将苏联政府同意签署公约一事通知了洛桑会议秘书长。1923年8月14日，苏联代表在罗马签署了这一公约。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批准该公约。

② 斯大林所说的临时编委会成员有误。参见本专题№06498文件。

No 06500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关于通报 对改组书记处意见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1923年7月29日)

1923年7月29日星期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致斯大林和加米涅夫

谢尔戈^①会告诉你们基斯洛沃茨克的两个庸人头脑中出现的一些想法。当然，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我们大家都应好好交换意见。^②

① 奥尔忠尼启则的化名。奥尔忠尼启则，格里哥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86～1937），苏联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1903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特别委员和南俄特别委员、集团军司令员和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1926年间先后任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主席、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同时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1923年7～8月间，正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一些俄共（布）中央委员讨论了撤销组织局和改组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问题。当时组织局的成员有：安德列耶夫、捷尔任斯基、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候补委员有：捷连斯基、加里宁、米哈伊洛夫。除总书记外，中央书记是莫洛托夫和鲁祖塔克。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作，打算让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书记处。只有伏罗希洛夫表示反对。当时让去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了解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表示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1923年8月中斯大林到了斯基斯洛沃茨克后，讨论又继续进行，但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回到莫斯科后，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不撤销组织局，而在该局的成员中加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923年9月25日，中央全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组织局委员，选举布哈林和科罗特科夫为组织局候补委员。伊·伊·科罗特科夫，1905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1923年开始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工作。

敬礼！

你们的 格·季诺维也夫

你们不给我们写信，这太不像话了。

至于“庸人”的说法——这不过是格里戈里^①的谦辞而已。

敬礼！

请尽快对我们的计划做出答复，哪怕草草数笔也行。

尼·布哈林

^① 格·叶·季诺维也夫。

№06501

布哈林关于领导人撤换程序问题 致加米涅夫的信

(不早于1923年7月30日)

于基斯洛沃茨克

亲爱的列·波·：

如此强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真是太不像话了！扬茨^①最会搞这一套，这个人简直使我无法忍受，他甚至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真理报》交给了布别什卡^②。结果玛·伊·^③让我去莫斯科，大家都忿忿不平。C.C.^④竟然不写明为什么要撵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能这样摆布人，即使他们做得不对也不能如此。我们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只能忍耐一时。弗·伊·至今不在。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了。应该好好交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我还寄去了许多问题，不过，看来我非得为这些事儿去莫斯科不可。加米纽卡，有时就一些问题通通气并没坏处，同时也要有点勇气。

忠实于你的 尼·布哈林

① 看来是指斯大林。

② 布勃诺夫的绰号。

③ 玛·伊·乌里扬诺娃。

④ 原文如此。可能是“сукин сын”（狗崽子）的缩写。

№06502

季诺维也夫关于反对斯大林的做法 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3年7月30日)

1923年7月30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亲爱的列·波·：

请允许我告诉你，这次我们实在是太气愤了。的确如此！我们在这里治病不是没有经过你们同意的。你就在莫斯科。你的影响不算小。而你却任凭斯大林公然捉弄人。

要事实吗？要举例吗？

那么好吧！

(1) 民族问题。我们为这个问题取得政治上的一致争吵了多少次啊！就连谢尔戈日前也承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有一个聪明的反动分子在《新时报》^①（索非亚版）上写道：“布尔什维克又做对了，他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比新经济政策具有更大的意义。”

斯大林到底在干些什么？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央特派员（指导

^① 自1868年起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起先具有自由主义倾向，1876年由A.C. 苏沃林发行后成为保守报纸，1905年开始则成为黑帮的喉舌。十月革命后被查封，后来曾在邓尼金占领区和国外出版。

员)，他任命的是……阿洪多夫^①和伊布拉吉莫夫^②这些持对立路线的人。整个外高加索会怎样评价对阿洪多夫的任命啊！大家会说，即使通过了好决议也没有用，因为受命执行决议的是反对这些决议的人。^③

斯大林在确定这些任命时征求过谁的意见吗？当然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恐怕也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结果怎样呢？简直是为所欲为。而弗·伊·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就说过：如果政治路线在组织贯彻过程中被歪曲，那么它就毫无价值。^④

(2) 海峡公约。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为什么不征求我们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当时有的是时间。顺便提一下，我是负责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凭良心说说：伊里奇什么时候不打电报征求政治局委员

① 阿洪多夫，鲁胡拉·阿利（1897—1938），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某部的部长，后任党的巴库委员会书记，1924—1930年间先后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联共（布）南高加索委员会书记。

② 伊布拉吉莫夫，尤·伊·（1895—1961），十月革命期间在北方战线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开始在上土耳其斯坦从事军事和政治工作。1919年任军事人民委员部穆斯林军事委员会委员，20年代初期先后任土耳其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后来从事经济和粮食工作。

③ 指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和1923年6月俄共（布）中央第四次工作会议《关于贯彻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的实际措施》的决议。阿洪多夫作为阿塞拜疆代表团成员、伊布拉吉莫夫作为鞑靼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④ 可能季诺维也夫是指列宁于1921年3月16日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中的一个论点。列宁在谈到开展辩论的必要性时强调说：“但是，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组织‘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之类的建议来干扰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那我们就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前进；这不是我们在近几年内所要执行的政策。”（《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2页）

的意见就做出决定？从来没有！我们这里有8位中央委员，大家都认为签约是错误的。对越飞的事看法也一样。他病了吗？可以派一名副职去嘛。^①伊里奇可曾不征求意见就把人召回过吗？从来没有！别忘了诸如任命罗蒙诺索夫^②这类人的例子。

(3) 共产国际。斯大林屈尊抽出10分钟同阴谋家拉狄克谈了谈便立刻下了定论，说德国的中央委员什么也不懂，说我、布哈林、蔡特金、布兰德勒没有把问题搞清楚，还说应当支持拉狄克这个爱饶舌的家伙，因为他发表了一通有关施拉格特尔的讲话差点“说服了”法西斯分子。斯大林在这件事上动作挺快——他已在起草给托洛茨基等人的电报。

这算怎么一回事？！

弗·伊·曾拿出足足十分之一的时间来处理共产国际的事情，每周都同我们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上几个小时，他对国际运动了如指掌，如果没有反复地征求大家的意见，他是从不断然行事的。可斯大林到这儿一看便做出了裁决！我和布哈林活像两具“僵尸”——用不着征求我们的意见。大概连你的意见都没征求，也没有给你看看我们的电报。^③

我们写道（在电报中），如果政治局打算研究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将放弃休假来参加政治局会议。对我们竟然连个答复也不肯

①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3年7月16日决定从中国召回全权代表越飞，理由是全权代表患病，而且其家属也提出了请求。

② 大概是指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罗蒙诺索夫（生于1876年），教授，1919年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人民委员会负责国外铁路定货的全权代表。1921年率团赴德国和瑞士订购机车和铁路设备，未从国外返回。

③ 看来是指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于1923年7月27日给库西宁、皮达可夫、拉狄克、斯大林、托洛茨基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谈了拉狄克的错误，他在1923年7月15日给德国的布兰德勒寄去一封私人信，批评德共中央1923年7月12日的反法西斯号召书。他们还表示准备去莫斯科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

给。

(4)《真理报》。今天早上(这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布哈林从杜博夫斯基的私人电报中得知,《真理报》编委会已被撤换,任命了7个人(又有拉狄克等人),此事既未通知布哈林,也未征求过他的意见。这不是捉弄人是什么?如果在斯大林休假时,我们既不告知他,也不同他商量便任命新的中央书记处或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话,那么他会说什么呢?!

布哈林为《真理报》出的力要比斯大林或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多。说到底,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斯大林都绝没有理由如此对待像布哈林这样的工作人员,真是岂有此理。

还要再举例吗?看来用不着了。

我们对此再也不会容忍了。

如果党注定要经历一段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时期(也许是非常短暂的时期),那就任其自然吧。但我至少不想把这一切不像话的行为掩盖起来。所有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①,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不重要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而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②。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好啦,对你来说这并不是新闻。你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同样的话。但使我吃惊的是,伏罗希洛夫、伏龙芝和谢尔戈几乎也是这么想的。请来信谈谈你对此有何想法。反正休假是休不成了。大概我们不久就要动身去

① 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② 指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342页),信的第一部分于1922年12月23日由福季耶娃转交给斯大林。现已查明,当时知道列宁这封信的内容,包括列宁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的内容的,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可能还有奥尔忠尼启则和托洛茨基。列宁在信中建议“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

莫斯科。你的沉着冷静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可别麻木不仁。真的。

致热烈的敬礼！

你的 格·季诺维也夫

刚写完这封信就收到了斯大林的两封来信^①。信中说的大多是我们已从报纸上得知的那些“新闻”。我这就给斯大林回信^②，尽量不加责备等等，以免关系恶化。不过给你的信仍然寄上，一吐为快。

我收到了弗尔斯特的来信，这是一封非常令人高兴和乐观的信。大脑的病变正逐渐消失，病情好多了。^③但愿上帝保佑。

你是否时常去哥尔克村看看？^④

德国不久就会出现历史性的事变和决定。^⑤

你同谢尔戈谈过话了吗？^⑥

要是这次你再不回信，那我们就再也不通信了。

① 见本专题第No06498、No06499文件。

② 见本专题第No06503文件。

③ 指列宁的健康状况。1923年7月下半月，列宁开始逐渐恢复言语功能，睡眠和食欲改善，情绪也有所好转。

④ 当时列宁住在哥尔克村。

⑤ 1923年夏天，由于经济状况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德国的局势急剧恶化。一些地区纷纷举行群众性罢工，德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认为，德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⑥ 见本专题第No06500文件。

№06503

季诺维也夫关于海峡公约

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7月31日)

1923年7月31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您的两封来信^①收到了。谢谢。

对海峡公约一事我仍有很大的疑虑。在这样的问题上本该通过直达电报征求托洛茨基及我们的意见。

关于“伏特加”，显然要搞一场运动。不幸的是，就连我们的人（谢尔戈、伏罗希洛夫、布哈林）也非常犹豫。托洛茨基在这里使劲“鼓动”伏罗希洛夫。甚至莫洛托夫都好像疑虑重重。还是看看再说吧。此事要非常慎重。

派卡拉汉去，这很好。不过召回越飞一事要小心一些。^②

至于德国的事情，产生分歧，当然不是由于我们不知道立即进行战斗有危险。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您用不着相信拉狄克这个爱饶舌的家伙。分歧在于拉狄克为了那份出色的和正确的7月12日号召书^③而对中央横加指责。拉狄克只相信那些针对法西斯的“空话”。布兰德勒是一个认真的实干家，他教育工人们去同法西斯战斗。

① 见本专题第№06498、№06499文件。

② 1923年9月，卡拉汉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

③ 指德共中央反法西斯号召书。

德国的危机发展得非常快。德国革命就要谱写出新的篇章。这将很快向我们提出巨大的任务。新经济政策将会有新的进展。目前起码要做的是提出下列问题：（1）为德国共产党人提供大量武器；（2）逐步动员 50 名我国优秀的战斗队员，把他们分批派往德国。德国发生重大事变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我们采取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日前拉柯夫斯基^① 来过这里。他找了托洛茨基，没来找我们。我认为，要再派一些有影响的人去切实加强乌克兰。这是我同伏龙芝谈话之后得出的结论。

弗尔斯特寄来了一封令人非常乐观的信。情况大有好转。脑部的病状正逐渐消失，这就是说大有好转。他满有把握地写道：“我担保……” 乌拉！

致热切的敬意！请来信，哪怕偶尔来一封也好。

在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上，如果事情不急，最好通过直达电报商量一下。过一段时间您务必去休假。我们在这里治疗得很好。

握手，向加米纽卡问候。

您的 格·季诺维也夫

1923 年 7 月 31 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我正急切地等待着您对谢尔戈的谈话的看法。不要把它当成坏事，也不要往坏的方面去想。请冷静地思考一下。

我从会议记录中看到，科罗特科夫被解职了。我恳切地建议试一下让佐林担任书记。他的才能将会发挥出来。

^①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1873～1941），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 年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 年开始在英国和法国从事外交工作。

从会议记录中我还看到，叶梅利亚诺夫（切列波韦茨人）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书记。这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好惹是生非的人，而且肯定是斯米尔诺夫派或萨普龙诺夫派的成员。这样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不合适。

格·季·

附言：再谈谈关于在举办展览会之际召开国际农民会议的事^①。我认为极其必要。拉狄克说，有人对奥新斯基的农民协会计划可能得到恢复抱有怀疑。这一点好办。只要俄国方面的发起人和代表是农民，是以加里宁为首的全俄中央执委会成员和雅科温科就行了。而对于欧洲来说十分重要。

^① 1923年6月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选出了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委员会。7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于全俄农业和手工业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之际召开这一代表大会，并让加里宁、雅科温科（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等参加工作委员会。第一届国际农民代表会议于1923年10月10—16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成立了农民国际。

№06504

奥尔忠尼启则关于与斯大林见面
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3年8月3日)

1923年8月3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克利姆：

柯巴^①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②是要任命一些政治委员，当然他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也同加米涅夫说了，他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夸大其词。柯巴把他们的建议送给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他们坚决加以驳斥，并捧腹大笑。我认为，在全会期间咱们这些人要聚在一起谈一谈。待见面时再细说吧。柯巴8月15日去休假。你务必同他见一面。

明天一早我就飞往柏林。争取尽快回来。我给叶·格·^③打过几次电话，但是人不在家。

热烈地吻你！

你的 谢尔戈

1923年8月3日

① 斯大林。

② 见本专题№06500文件。

③ 可能指伏罗希洛夫的妻子。

附言：我去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那里。老头^①好些了，不过据弗尔斯特讲，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谢尔戈

^① 列宁的化名之一。

№06505

斯大林关于指责分裂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3日)

1923年8月3日于莫斯科

抄送伏罗希洛夫

致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

你们的来信^①收到了。我已同谢尔戈谈过话。我不明白，我究竟应该怎样做才会使你们不骂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认为出于事业的利益需要掩饰看法。要是你们寄来一封便函，把情况写得清楚明确就好了。要是我们一有机会马上谈一谈，那就更好了。这当然都要看你们是否认为今后有可能齐心协力地工作（因为通过同谢尔戈谈话我才明白，你们看来真要准备决裂，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们不认为有可能齐心协力地工作，那就随你们便吧，俄国定会有人来评价这一切，并对有罪者进行审判的。

过10来天我就去休假（我累了，累极了）。祝一切都好！

约·斯大林

1922年^②8月3日

附言：你们毕竟是有福之人：能够在闲着没事干的时候想入非

① 见本专题№06500文件。

② 原文如此，显然是笔误。应为1923年。

非，琢磨种种不切实际的东西，等等，可我却在这里没完没了地工作，像一只被链子拴住的狗，苦闷不堪，而且还成了“有罪的人”。谁都会被这种方法折磨得痛苦至极。你们是吃饱了撑得慌，我的朋友。

约·斯·

No06506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 关于不同意政治局决定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8月6日)

1923年8月6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致斯大林同志（亲收）

我在一份政治局会议记录中看到了一项关于放宽负责工作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条件的决定（大概是根据斯维杰尔斯基^①的建议做出的）。^②

我认为做出这项决定是一个大错误。它只会使负责工作人员的子女处境困难。年轻人会诋毁他们。而主要的是这种特权会使比较有才干的人断送前途和种下等级的因素。这样要不得。

格·季·

注意：您同谢尔戈谈话后的来信收到了。待见面时我们再谈，当然会找到圆满的解决办法的。您谈到了“决裂”——这肯定是由

① 斯维杰尔斯基，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1878～1933），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工农检察院院务委员，1923～1928年间为俄罗斯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

② 1923年7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了斯维杰尔斯基的建议，就这一问题做出了一项决定：“（1）认为放宽负责工作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条件是必要的。（2）责成由鲁祖塔克、布勃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出具体措施。”

于您累了。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您打算去哪里休假？

敬礼！

格·季诺维也夫，尼·布哈林

试图关闭普梯洛夫工厂^①是极大的不幸。这是整个共和国的失败。会被全世界的报刊迅速报道。普梯洛夫工厂闻名遐迩。德国的订货（已知的一些谈判）也同普梯洛夫工厂有关。

彼得格勒又要遭殃了。

看在上帝份上，可别这么做。

格·季·

① 根据金属工业总管理局的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于1923年7月30日做出了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决定，理由是预计该厂1923~1924年度将没有赢利。

1923年8月2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普梯洛夫工厂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决定不采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关闭工厂的提议。

№06507

斯大林关于政治局工作程序 致季诺维也夫的信

(1923年8月7日)

1923年8月7日于莫斯科

并转布哈林

抄送伏罗希洛夫

季诺维也夫同志：

您7月31日的来信收到了。现就一些问题答复如下。

1. 您写道：“请不要把同谢尔戈的谈话当成反面的东西，也不要往反面去想。”^①坦率地说，我正是“往反面”去想的。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是指马上就撤换书记，要么是有人想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你们两人不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却在围着问题绕圈子，竭力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大概以为别人都很蠢。既然小组确实还存在，并且也有起码的一点信任，又何必采取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呢？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也就不怕什么信吗？小组的成员都在想方设法相互恐吓（这还是说得轻的），该如何称呼这样的小组呢？我同意撤换书记，但我反对实行政委制（政委已经不少了：组织局的，政治局的，全会）。

^① 季诺维也夫7月31日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不要把它当成坏事，也不要往坏的方面去想。”见本专题№06503文件。

2. 你们说书记个人决定问题，你们错了，任何一项决定，任何一项指示，无不在中央的档案中留有相应的副本。我非常希望您能在中央的档案中找到哪怕一份未经中央某一个部门核准的电报或命令。

3. 你们硬说政治局的议事日程是个人确定的，你们错了。议事日程是根据书记处加上加米涅夫（主持政治局工作）、加上古比雪夫（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参加的会议上收到的所有问题而确定的。要是全体小组成员或政治局委员都想在确定议事日程时到会，那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束之高阁”，这不仅因为对此有明文规定，而且还因为上述人员能充分保证做到这一点。

4. 海峡问题是一致决定的，当时契切林对签订公约略有异议，李维诺夫则坚决要求签署。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提出过征求未到会者意见的问题。托洛茨基留下了一张便条，请求连政治局会议记录也不要给他寄去。对于我所询问的有关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他未作明确的答复。看来他是想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你们两人临走时丝毫也未表示过必须征求你们的意见。此外，由于文件很多，不可能总是靠打电报来征求意见。从问题的实质来说，我们不能采取其他的做法（我们需要对海峡实行监督，以便一旦我国的粮食及其他产品的出口受阻，可及时做出强烈的反应）。就连契切林现在都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5. 越飞被解职首先是因为他妻子提出了请求。随信寄去几份文件（他病得很厉害）。

6. 普梯洛夫工厂当然不会关闭。但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因为李可夫领导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坚持要提出这个问题。

7. 佐林早已被任命为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

8. 至于德国的事情，问题当然不在拉狄克。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力图（在现阶段）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这样做的地步，——依我看，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当初在俄国夺取政权时有这样一些潜在条件：（a）和平，（b）给农民以土地，（B）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支持，（r）农民的同情。德国共产党人现在毫无这些条件。当然，他们毗邻苏维埃国家，这一点是我们不曾有的，可我们当前又能给予他们什么呢？如果德国的政权马上——比如说——就垮台，而共产党人接管它，那他们将一败涂地。这种情况还是“最好的”。最糟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彻底打垮并被抛到后面去。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肯定会把这种游行演变为一场决战（他们目前还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并把他们打垮。法西斯分子当然并没有睡大觉，不过让法西斯分子先动手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①）。此外，根据所有的资料来看，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力量很弱。我认为，应当阻止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

祝一切都好！

约·斯大林

附言：我于8月15日去休假。

这封信的抄件我要给伏罗希洛夫寄去，因为谢尔戈说过，他熟悉情况并对问题感兴趣。

约·斯·

^① 指1923年6月9日保加利亚的军事政变，其结果是建立了以亚·舍科夫为首的亲法西斯政府。

№06508

季诺维也夫、布哈林
关于政治局工作程序等问题
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8月10日)

1923年8月10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斯大林同志：

我们也逐条答复如下。

一、看得出，您所不满意的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谢尔戈去同伏罗希洛夫谈。(1) 他们既是您的也是我们的亲密朋友。(2) 您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同他们谈过这些话题。(3) 在莫斯科我们曾多次谈起过，但都由于您好动肝火而难以谈下去。我们早就不满意了，但我们在莫斯科时有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先去休假，让神经松弛一下，然后再把问题提出来。

二、伊里奇的信。是的，是有弗·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对您提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您对于同弗·伊·的分歧的认识本来就极为偏执，所以我们不想使您心烦。

三、您写道：“小组还存在。”但它的状况很糟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莫斯科时就对您说过不止一次。

四、“在中央的档案中留有相应的副本。”我们谈的并不是这

个。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

五、加米涅夫和古比雪夫参与确定政治局议事日程一事我们是第一次听说。想必这只是不久前的事。至少加米涅夫曾不止一次地发出过与我们同样的抱怨。

六、海峡问题。又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答复：“你们并没有请求征询意见。”在涉及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小组还存在”的情况下，这种事是用不着请求的。

七、越飞。既然他病成这样，那就必然要召回。不过要知道列文^①的电报是8月6日召回以后才发的。对这件事要慎重些。

八、德国。我坚信，我们不久就要做出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决定（顶多过1~2年）。然而争论的完全不是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打算“夺取政权”。“七月事变”还不会来临。法西斯分子威胁要枪杀十分之一的罢工工人，对这一威胁，德共中央回敬了一份出色的宣言，说那工人们就将枪杀五分之一的法西斯分子。拉狄克认为这是个“错误”。他未同任何人商量就寄去了一封“私人”信，要求人家否定中央的做法。我们表示反对。您站到了拉狄克一边。也不同我们打一下招呼，扣压了我们的电报，给托洛茨基打了电报。即使“小组”不存在，这样做也要不得。还在两周前，我们就告诉您，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去。加米涅夫昨天给我们打来电报，说他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九、《真理报》编委会。您根本没有就此事同布哈林打过招呼。难道可以这样做吗？这等于说，如果您不在时，我们也可以不同您商量就任命书记处的负责人员，哪怕是临时的负责人。

十、中央民族问题指导员的任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棘手的

^① 可能是指医生列·格·列文（1870~1938），1920年起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生，内科主任。

问题。您既未同我们商量，也未同加米涅夫商量。

十一、同圣彼得堡省委的无谓的争吵。^① 对此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都在议论纷纷——请别紧张。圣彼得堡省委常委会（您最亲密的同志）都有怨气。

不过这都是细节。

根本问题是伊里奇不在。因此，从客观上说（抛开您的险恶的意愿不谈）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已开始起着任何一个省委书记处所起的那种作用，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不是形式上）决定着一切。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也不愿意设政委（您甚至把组织局、政治局和全会都算作政委！）。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下，“小组”要真正存在（而不是虚设），要平等合作和担负起责任，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您不得已（您自己不愿这样做）几十次使我们面对既成事实。而情况（既是指托洛茨基，也是指各种各样的“纲领”）变得越来越复杂，党内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不要看表面）。由此可见，要寻找最佳的合作形式。

至于“地位”等问题用不着谈。无论是您还是我们，当然都不需要这些东西。至于“决裂”也用不着谈。党不允许这样做，我们也不想这样做。顶多是我们靠边。没有别的核心。如果您愿意的话，它也完全能干好。我们想像不出这个核心没有您会是什么样子。

您要去哪儿休假？我们不久（月底前）将去梯弗利斯。如果您愿意，我们很高兴去您那里呆一天。

我们一刻也不怀疑：我们一定会取得谅解的。

^① 大概是指斯大林同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和俄共（布）中央西北局书记彼·安·扎卢茨基为把莫斯科温从彼得格勒调任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事而发生的冲突。

好好地休息吧。祝一切都好！

格·季诺维也夫^①

^① 此信由布哈林执笔，季诺维也夫签名。信的抄件上有季诺维也夫亲笔写的附言：“致克·伏罗希洛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寄上给柯巴的复信的抄件。加米纽卡来信说，他完全支持我们的建议，还说柯巴‘大发了一通脾气以后’也同意了。到我们这里呆一两天吧。敬礼！您的格·季诺维也夫”。

№06509

布哈林关于组织工作意见 致加米涅夫的信

(约于1923年8月^①)

于基斯洛沃茨克

亲爱的列夫·波里索维奇：

我们收到的记录^②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印象。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真的，即使绵羊也会举起反抗的旗子。一点儿也不能蒙骗和愚弄公众，要对得起良心。

如果说连伏罗希洛夫都提出了抗议（在全会上），那前景一定光明。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工作方法”。恳请你告诉我们组织的状况：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迹象。我们这个书记处将办理各种各样的工作调动，而主要的问题还是让普希金去考虑吧。说得客气点，这简直是“一时的英雄”^③的做法。

再一次恳请你来信，哪怕极简短地写几句。不然的话，我们想办法把加米纽卡气得连那把浓胡子都翘起来。

敬礼！

尼·布哈林

① 写这封信的大体日期是根据内容确定的。

② 显然是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③ 来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同名诗篇。

No 06541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联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1923年10月26日）

托洛茨基：同志们！这次会上引用了我的一句话，说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但是一部分同志却试图把这说成是党正在被原则〔分歧〕弄得四分五裂。所引用的我的那句话是对古比雪夫同志的答复。古比雪夫当时指责我，说我态度太过分了^①。

但是瓦雷基斯^②涉及到了更广泛的问题，即对外政策问题。最近几封发自波兰的电报说，托洛茨基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给一些资产阶级政府留下了我们主张和平政策的印象^③。我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必须发言；必须回答——战争会不会爆发；我坚信我执行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① 指托洛茨基退出俄共（布）中央全会1923年9月25日会议后，古比雪夫和托洛茨基之间进行的一次谈话。这次会议研究了扩大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编制、给它补充6名中央委员的问题。

② 瓦雷基斯，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1894～1939），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党的州委和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23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③ 1923年10月20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省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德国革命前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战争，而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应该加强、十倍地加强我们当前的日常工作”。（1923年10月21日《真理报》）

对我的信^①有两种态度：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的发言是一声晴天霹雳并把它解释成托洛茨基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不满意；另一些人认为托洛茨基是在重复他已经说了两年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着列宁的面也曾提出过。

同志们，这次会上有人说，曾经开过几次小范围会议。同志们，必须采取一条统一的路线。当然，上述两种态度都不对。有老分歧的余音。但也有新分歧，而新的形势更激化了这些分歧，这是在去年年底发生的。说我在政治局没有提出这些分歧，这绝不是事实。我提了，也有结果。李可夫试图召开一个小范围会议。但没有开成。因为政治局里还有一个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里还有一个中央，所以实际上在讨论该问题时，我被排斥在外。

我没有可能向其他中央委员通报情况，因此我只剩下这一条路。季诺维也夫说我〔固执，但〕这完全是幼稚行为。我已有两年未同谢列布里亚科夫见过面了。他来找我时，我回答说，五人小组算是什么组织？要知道我们有政治局，有中央委员会。如果季诺维也夫想建立正常的相互关系，就应当取消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②。

我为什么没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这次会上很多人谈到“死板的形式主义”。我不想重复这个词，但这个词用在这个会上非常恰当。

中央监察委员知道很多这样的事实，即现在把那些不积极反对托洛茨基的人都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否则，还能有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呢？我从来没有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泄露出去过。从哪个意义上讲他们能够成为托洛茨基分子呢？谁认为不需要彼得罗夫斯

^① 指托洛茨基 1923 年 10 月 8 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

^② 所谓的“三人小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成立于 1922 年年底，当时列宁由于生病不能充分过问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后来“三人小组”增补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五人小组”），再后来又增补了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七人小组”）。

基或伏龙芝说的那种“圈子”，谁就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分子”。我过去对大部分中央监察委员是不信任的，现在也是如此。因此我没去找这个委员会。

古比雪夫是书记处政策的推行者（该政策认为凡是没对托洛茨基表现出极端不信任的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都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一个党员的错误问题^①，在指责他有〔不符合党性的行为〕时，并没有要求他做出解释。这难道不是说明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开过一次会^②。邀请我参加会议了吗？中央监察委员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应该纠正中央监察委员会^③委员的过分行为和缺点。

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中央书记处在这场党内斗争中的工具。你们歪曲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我没去找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指责我这一点。这也就是我所反对的那种死板的形式主义。

下面谈谈波拿巴主义。（加米涅夫：没提过这个词）。我不能像加米涅夫同志建议的那样无视政治局委员的信^④。

① 托洛茨基指的是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1923 年 10 月 15 日的决议，其中审议了他 10 月 8 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的问题。（《苏共中央通报》1990 年第 5 期第 178～179 页。）

② 托洛茨基指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1923 年 10 月 17 日的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有 26 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会议讨论了古比雪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托洛茨基的信的通报，并通过决定如下：“会议没有逐条研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基本上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写信人作的评价和主席团在该问题上采取的路线”。（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 17 全宗，第 2 目录，第 685 卷宗，第 102 页。）

③ 此处显然是笔误，应是指中央委员会。

④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3 年 10 月 19 日对托洛茨基 1923 年 10 月 8 日的信的答复。（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 年第 7 期第 176～189 页。）

信中说，“我想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权力归并到我管辖的军事部门。”军队的所有任命都是通过组织局和政治局进行的。具体负责的是各军区首长……^①

至于谈到军事部门的权力，那只是骗骗乡巴佬。有人说，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军队同党的关系日益密切^②，可现在说的又完全相反。这是没有的事。这个过程仍在发展。我谈了我个人的工作条件。凡是同我一起工作的和能够同我工作的人，现在都因此而被怀疑成托洛茨基分子。（尽管我任何时候甚至同斯克良斯基这位我最亲密的助手都从未谈起过党的问题）。我完全被孤立。这就是所谓军事部门的“无限”“权力”。

我可以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不会比其他很多人差。但是我回答布哈林说，不能把这项工作同军事工作结合起来。

关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谈话（当时我谈了有关任副职等问题）^③。我个人的理由是我有犹太人血统。[1917年]10月25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在斯莫尔尼宫的地板上说：“我们让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您就可以向资产阶级和贵族施加压力了。”我不同意。让我当外交人民委员。我坚决反对。

^① 原文如此。

^②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的报告的结束语中说：“这几年军队和党的相互关系从组织形式上发生了变化。曾有一个时期，党在地方上直接建立骑兵连、步兵团，县委和省委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现在我们的军队是按师和军组建的，拥有自己的中央组织，它同省委和县委的组织是不同的系统。但是如果要从政治方面掌握军队的话，那么党对军队的统治，即对军队的整个情绪、整个精神的控制，无论是通过军队中党的机关，还是通过地方党的委员会，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彻底、这样独占、这样完全、这样绝对”。（《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17页。）

^③ 1922年9月，列宁建议中央政治局批准托洛茨基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但被托洛茨基拒绝。1923年1月，托洛茨基再次被提名担任此职，他又一次拒绝。（见《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98~199页。）

让我任军事人民委员^①，我更是坚决反对。结果怎样？我是对的。这种血统妨碍极大。它对我个人生活并无影响；但作为政治因素则非常重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是个问题。他建议我担任副职（一个）；出于同样的考虑，我拒绝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基本同意了。我为什么不进入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我最怕给人留下托洛茨基在结帮拉派的印象。

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更加警惕。我去拜访了他，我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欺骗他；有关那些可能被理解成是分歧和批评中央的话，我一点也没有向外扩散。当时经济问题上的分歧更加尖锐（国家计划委员会）。

我认为，应该成立一个机构，从经济联系的角度及时对所有问题先进行研究，然后再报上级机关决定。如果在这方面很内行而又富有经验的人不对这些问题事先进行研究的话，我是不会赞同提交政治局的。如果解除我的其他工作，安排我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去，我是不会反对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危机50%、75%，甚至100%是由于办事无计划而加重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如果不对这个委员会进行改组——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不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在人民委员会里怎么办？要么，我负责研究问题，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要么，将问题从政治局转给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我的工作日程已排得够满的了。关于我那本论日常生活问题的书^②（这是我在疗养期间写的）有很多流言。

惟一的出路就是改组机构。

① 托洛茨基自1918年起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俄罗斯联邦（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② 指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日常生活问题》，莫斯科1923年版。

关于党内状况。乌克兰人已把事情了结了。曼采夫^①又旧事重提。他的通报符合形式逻辑；伏龙芝说的不符合；彼得罗夫斯基说的部分符合，即谈到“圈子”的那部分。我从来就不是“民主派分子”。统一的军事学说是军事中的延奇缅主义^②。但我同伏龙芝以最友好的形式就此进行了辩论，然后出版了一个小册子^③。

关于阿尔然诺夫^④。我同他的关系也像同索洛古布^⑤或阿连斯的关系一样密切。但是全部问题在于必须撤换他。他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刚一决定撤换他，我就同意了。德米特里耶夫被任命为副手。工作了三个月，不胜任。柯列加耶夫生病了。奥西金被撤了职，被任命为副手，等他熟悉情况后，我们再任命。人员更迭问题竟被荒谬地弄成了原则性分歧。关于伏罗希洛夫和信中引用的笔录，我的记忆力很强，但关于这一点我毫无印象。

我不要民主主义的专利。但是我到来后所赶上的形势迫使我对

-
- ① 曼采夫，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1888～1939），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开始在莫斯科工作，1919年被派往乌克兰，在契卡部门和西南战线、和南方战线任职。1923年调到工农检察院，后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
- ② 延奇缅主义是一种生物学理论，其表现形式为庸俗机械唯物主义，它试图把伊·彼·巴甫洛夫研究的反射学思想同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创立者Э.С.延奇缅认为，人是具有不受心理作用的生理反应的“有机运动系统”。这些观点在布哈林的《延奇缅学说（论思想退化问题）》一文中受到批判（见《红色处女地》杂志1923年第6期）。
- ③ 看来，托洛茨基指的是他同伏龙芝在1922年4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军队代表会议上的争论以及《军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统一的军事学说的争论（1922年4月1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军队代表会议第二天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22年版。
- ④ 阿尔然诺夫，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73～1941），铁路工程师，无党派人士，1918年开始在交通人民委员部系统担任领导工作，1919～1922年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交通部部长，后在交通人民委员部任职。
- ⑤ 索洛古布，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1883～1937），曾是沙俄军队上校，1918年加入红军，曾任东方战线参谋长、最高军事检察院成员、西方战线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第16集团军司令员。1920年起任南方战线、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武装部队参谋长。1923年开始在军事院校任教。

问题进行研究。我那些关于10月11日政治局会议的笔记^①是事实。两者必择其一，要么转而实行党内民主；要么认为党内现在非常民主。有人说，“我想出这一点是为了建立派别。”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在哪里？在军队里吗？请你们全部说清楚！应当把这称之为波拿巴主义。

当我对自己的印象进行了深思熟虑并通过几十位久经考验的同志进行检验后说：应当少一些警察制度，多一些计划时，你们想谴责我。

我要非常坦诚地说。

在我们政治局里有几位同志想把这件事干到底，即不断加深分歧，一直搞到党员群众中，使今后的工作无法进行。

多数同志不想这样做。我担心你们的片面决定^②将为那些想毁掉今后集体协同工作的基础的人创造条件。

我的处境有时非常困难。我不能反对那些幻想我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传统的人。我曾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我不能解释，也不能应战。在这种情况下怀疑我有个人……^③的人，认为我是卑鄙至极的人，[十足的]疯子。如果你们走上似乎是你们想走的那条道路，那你们将会铸下大错。

① 1923年10月1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笔记，并在1923年10月23日给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中引用了这些笔记。

② 指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1923年）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A.Φ.拉德琴柯提出的草案为基础的。其他那些寻求妥协的决议草案（H.K.冈察洛夫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未被采纳。

③ 原文如此。

斯大林：对一些声明的几点实际意见。

(1) 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①中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不仅在对某些工作人员的迫害方面，而且在事情的原则性方面都存在着分歧。我不明白，因为没有发生过大的分歧。^②

(2) 为什么政治局委员对是否发表列宁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犹豫不决？^③索斯诺夫斯基^④的行为令人费解。事情是这样的，文章^⑤中有三处提到分裂的危险。政治局担心党被引入迷途。而政治局里连一点儿分歧的迹象也没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将全体政治局委员关于根本不存在分歧的通告信连同列宁的文章一起发送给各省委。

(3) 托洛茨基说，根据〔代表大会〕决议，不需要党的经济问题委员会。但决议指的是临时委员会。工资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做临时委员会。一个星期前，任命了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难道可以没有这些委员会吗？

(4) 关于书记干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分配军队指挥人员的问题。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谈到这一点。我们问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回答说不存在分歧。

① 指托洛茨基 1923 年 10 月 23 日的信，其中谈到了民族问题上的分歧。

② 事实上，党的领导人在各苏维埃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一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③ 有关发表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经过可参看本卷“关于列宁卧病期间的政治活动”专题收入的 No06481、No06482、No06483、No06484、No06485、No06486、No06487 各文件。1923 年 1 月 25 日的《真理报》首次发表列宁这篇文章时，删去了下面句子中的划线部分：“……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要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

④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1886～1937），190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4 年期间曾任《贫农报》编辑，在 20 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⑤ 指列宁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

现在谈谈有关托洛茨基和46人的问题。

奥新斯基说：“我们在自发势力的浪潮中颠簸”，托洛茨基说：“我们陷于危机，没有计划，我们没有控制住自发势力”。危机是新经济政策的必然因素。你们不懂新经济政策。刚遇到点困难就哀号起来，以后困难还多着呢。

关于价格的分歧。你们研究这个问题了吗？“剪刀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农业，工业产品少，粮食多。出口我们暂时又做不到。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无济于事。

剪刀差的另一个原因是，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亏损。

第三个原因：托拉斯和辛迪加是垄断者。“我定出价格，你要不买。就没处可买”。这一点必须改正，应该对此加以注意。

难道有谁反对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吗？托洛茨基常常因为对问题没有充分研究而弃权。要是我们也弃权呢？结果会怎样？不能对理论问题采取弃权的办法。制定一个必须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动纲领是可笑的。

索斯诺夫斯基认为，如果我们把农业机器“零售”给农民，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这连沧海一粟的作用都起不到。必须进口大工业品，但这需要钱，而我们又面临着战争。

你们不是帮助讨论这些严重问题，却纠缠不休地要制定行动纲领。在反对派的所有发言中我没有听到一条具体建议。

中央正在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了书记的党龄和上级机关批准任命的问题。^①这是对民主的限制。清党就是党的一半人清除另一半人。这也是对民主的限制。所有这些都是

^① 根据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根据审查党员的经验巩固党的问题》的决议，党的省委书记必须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党员，县委书记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党龄。同时，省和县的党委书记应由上级党的机关批准。

为使党免受新经济政策影响的措施。

民主派们，请告诉代表大会，这种使党免受新经济政策影响的做法是不必要的。让我们看看代表大会会不会答应你们。而我们只是执行代表大会决定、向它汇报工作的机关。

没有争论，雅柯夫列娃这样说。如契诃夫市的一位妇女说的：“请给我造成这种气氛”。常常有这种无暇进行辩论的时候。

从地方上来的同志讲，现在各个省委都面临着成堆的经济问题。党被埋进了解决琐碎问题的大量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中。现在想进行辩论就是犯罪。从未发生过有人向中央建议就某个问题进行争议而遭中央拒绝的情况。46人集团提出问题只是为了掀起一场风波，并不是想认真讨论问题。

中央没有掩盖任何经济问题。关键不在这些问题，而在于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集团没有利用党内可允许的途径解决问题并越过中央致信党员。他们在这里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对主要问题，即我们为之聚集在这里的问题，只字不提。问题在于〔托洛茨基〕没有利用合法途径帮中央改正“错误”，而是越过中央致信党员。

托洛茨基写道，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致信任何一个有足够修养的党员。如果托洛茨基用尽了一切帮中央纠正“错误”的合法机会，那他就是对，他就应该越过中央致信党员。但他并没去做这些尝试。这就是把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问题的实质。现在中央进行争论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都会对我们失去信任，敌人会把这看做是我们的软弱。1921年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争论^①。当时我们遭到巨大损失。

托洛茨基越过中央委员，制造派别斗争的气氛，迈出了非常危

^① 指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争论作了总结。

险的一步。46.人走得就更远了。

解决的办法是：我们不能再次尝试十大前夕的争论。当时是托洛茨基挑起争论，他拒不执行列宁关于在代表大会工会委员会中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种情况又重演了。托洛茨基再次采取行动，造成了使我们面临分裂威胁的气氛。必须这样评价托洛茨基的行为并对他加以谴责。必须保证这样一种制度，使今后所有分歧都在委员会内部解决，不得外传。

No06542

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 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速记记录摘录

(1923年12月2日)

对问题的答复^①

…… [约·维·斯大林] 一张与托洛茨基同志有关的便条写道：“请您谈谈，党员中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某封信的传说有什么根据吗？信的内容是什么？别再保密了。请通报一下。”

同志们！尽管我特别想说，但是我不能通报托洛茨基同志十月全会前写的那封信的内容。还有一封46位同志的信，在这些同志中也包括斯图科夫^②同志。这两封信的内容我无权告诉大家，因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决定^③，有关这两封信的内容和信中提出的要求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的

① 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党的任务》，发表在1923年12月6日的《真理报》上，但“对问题的答复”这部分没有发表。

② 斯图科夫，英诺森·尼古拉耶维奇（1887～1937），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职业革命家，十月革命后曾在莫斯科市委、《莫斯科工人报》、红色处女地出版社任职。在党内斗争中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③ 这里和后面指的都是1923年10月25～27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决定。

决定不向全党通报。

(有人喊道：对很多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很多人都已知道此事，对此我很遗憾，但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决定，无论是这两封信，还是政治局的答复都不能通报。除托洛茨基和46位同志的两封信外，还有政治局委员对这两封信的答复，在上面签名的有李可夫、加里宁、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①。列宁和鲁祖塔克同志缺席，后来鲁祖塔克到会后也赞同这个答复。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以绝对多数赞同政治局的立场：102票赞成，2票反对，10票弃权，全会谴责了托洛茨基同志和46位同志的行为。其余情况我无权通告大家。(鼓掌)……

现在我谈谈罗森贝格同志^②。她说她非常了解中央的情况：比中央自己还了解。瞧，她非常清楚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都做了些什么。据她说，大家都知道。我真不明白，怎么会大家都知道。她说我们的制度不中用，说我们扼杀党的思想，说好像全会反对民主等等，没有她不说的。我真弄不懂她是从哪里知道这一切的。

罗森贝格：是从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中。

斯大林：我不知道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我没看过。但是难道根据一个人的报告就可以指责整个制度吗？十月全会上决定的并不是罗森贝格同志说的那些问题。十月全会面对的问题是，超越一定的辩论界线，就意味着建立派别，意味着分裂政府。而分裂政府就意味着毁灭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当时的问题，罗森贝格同志。辩论

^①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10月19日的答复。斯大林在列举签署该文件的政治局委员时漏掉了托姆斯基。

^② 罗森贝格是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是俄共(布)第一所培养党政干部的高等学校。

是可以的，但不要使辩论发展到组织帮派，使帮派发展到建立派别，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党内的派别将会导致政府的分裂，使内外敌人欢欣鼓舞。有鉴于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谴责了一些同志。这就是这次全会的情况，而不是所谓的全会反对民主。

№06543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1923年12月8日）

致中央政治局

下面在引用我在普列斯尼亚区作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①速记记录摘录时，我认为有必要声明如下：

（1）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声明中从未经我审阅的我的报告的速记记录中摘用引文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未经作者本人审阅的速记记录中常常会有许多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

（2）我承认，我向普列斯尼亚区的会议通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声明这一问题的决定的情况，是违背全会关于对决定保密的决议的。但是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为党内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和破坏分子在党员中间大力散布有损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威信的谣言。党员中传说，有关托洛茨基同志患病的通报与事实不符，托洛茨基同志因在十月全会上要求实行党内民主而被政治局软禁（我在作报告时对一张关于托洛茨基同志患病的条子作答时的声明，遭到了许多与会者的讥笑和质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罗森贝格同志在发言中直截了当地声称，托洛茨基同志和46人的信不是秘密，托洛茨基同志是因为要求民主而遭非难，似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全会反对实行民主。这些荒谬传言是由于下述情况造成

^① 即斯大林1923年12月2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本专题№06542文件。

的：

(1) 尽管中央有禁令，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和 46 人的文件还是在党员中得到广泛扩散，可是政治局委员对这些文件的答复^①和全会的决定，却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严格保密；

(2) 46 人的拥护者没有采取措施来杜绝这些荒谬传言和制止托洛茨基同志和 46 人的文件在党员中扩散，尽管只有他们才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些文件的扩散，因为这种扩散就是 46 人中的入干的；

(3) 辩论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因不想破坏全会关于对那个决定要保密的决议，所以对涉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都不得不报以沉默，这样就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并且造成一种假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害怕说出实情，他们心中有愧。

所有这一切将导致并且不可能不导致破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员心目中的威信，使党内那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得到满足。

我认为，对于谎言和诽谤，除了用真相进行反驳外，没有其他方法。为了保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免遭谎言和诽谤的攻击，惟一的方法就是说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决定的实情，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

约·斯大林

1923 年 12 月 8 日

^① 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3 年 10 月 19 日的答复。

【专题说明】

给斯大林信件中 反映的苏联政治生活

(1922年10月至1950年11月)

在斯大林执政的30年间，他收到过很多人给他写的信。本专题收录的主要是苏联党政活动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给斯大林的信。这些信件展示了苏联最高领导层的相互关系，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苏联政治生活的某些侧面。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王德明翻译)

№04493

柯伦泰关于在挪威工作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10月27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向您通报，我已经到达挪威并且已经在全权代表处开始工作了。我想象的我的工作，正如我们谈论加拿大问题时我同您说过的那样，问题主要不在于全权代表处本身的工作（没有我这里的工作人员也足够了），而是在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报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对俄罗斯情况的了解，以及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情况的了解方面。（《消息报》、《真理报》、《红色处女地》等报刊上的文章。）

我同这里的社会各阶层都有联系，我想，为了巩固他们对俄罗斯的兴趣、展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曾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应该充分地利用他们。

就“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题目写文章、开讲座，进行私人会晤——这将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我想，中央会支持我的这个在挪威全权代表处的工作计划的。工作范围自然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尽可能是全联邦各省（为报刊服务）。

按照这种工作分工，我希望，我来到斯堪的纳维亚能为我们的全权代表处再扩大一个工作范围，因为信息方面始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同时，在获得中央的相应许可后，我将着手为《纽约世界报》写东西（《俄罗斯特写》）。

我认为，作为总书记，您应该了解党员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向您通报一下，我与德边科^①同志的私人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调动工作或者是实施党的其他计划时，您可以注意这一点。

向您及中央的全体同志致以最真挚和最亲切的共产主义敬礼。

亚·柯伦泰^②

1922年10月27日于克里斯蒂安尼亚^③

① 德边科，帕维尔·叶菲莫维奇（1889—1938），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是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海军人民委员，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担任一些部队的指挥职务。1918年，柯伦泰与德边科结婚，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到1923年结束。

②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1872—1952），职业革命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进入人民委员会，任国家救济（社会保障）人民委员。1920年领导俄共（布）中央妇女工作部，1921年起担任共产国际国际妇女秘书处书记，1922年到苏俄驻挪威全权代表处工作，1923年起担任苏联驻挪威全权代表兼商务代表。

③ 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市在1642—1924年间的名称。

No 04494

柯伦泰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工作 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12月16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由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委员会^①关于取消挪威顾问的决定，看来，关于我的问题又要重新提出来。我想请求，目前不要把我调离斯堪的纳维亚，我在这里刚刚得以建立起各种联系，工作上上了轨道，因此，我现在继续留在这里将比调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工作会更有成效。

显然，即使在斯堪的纳维亚成立一个统一的全权代表处，顾问的工作也不会是多余的，正相反，这将有利于加强各种联系。

我担心，梅德韦杰夫同志千方百计想使我返回莫斯科的努力会影响中央，做出把我调到某个地方的决定。我认为，目前，正是在这里，我才能为俄罗斯联邦做得比在一个我还不适应的国家更多些。由于签证被拖延了，海牙之行收获不大，代表大会^②快结束时才到达。但仍然尽力在那里做了一些工作——在会场之外。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亚·柯伦泰

① 此处指的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对驻外代表机构进行考察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党中央委员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

② 1922年12月10~15日，由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发起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和平拥护者国际代表大会。

№04495

拉苏尔—扎杰关于对俄国印象

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月1日)

最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对于我的幸免于难，我的朋友们既高兴又吃惊。他们是对的，要知道，有很多工人遭到了枪杀，原因只是他们是穆萨瓦特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这个党的领袖却能幸免，这真是一个奇迹。如果可以称这为奇迹的话，那么应该公正地指出，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您，正因为你没有忘记从前的友谊，并找到了适当的途径，我才得以从巴库的“刑讯室”被解救出来。

在您这里（在莫斯科）逗留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享受着您的友情；如果说经历过困苦，那么这也是全体公民都承受的那种困苦，而有些时候我还能享受某些特权。为此，我向您表示感激之情。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不能前去同您告别，因为我是秘密离开的。希望您不会认为这是对您的不尊重行为。我没有向您请求允许我出境，因为那样会更糟：要是您万一不允许我离开，那么，照常理，我就应该放弃自己无论如何也要离开俄罗斯的决定。

而放弃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放弃自己本身并使自己永远无所作为。从另一方面来说，这还意味着将成为一个对俄罗斯目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沉默不语的见证人。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就发生过的，即俄罗斯的殖民地正在集

中起来。由于某种巧合，共产主义者的政党掌握了政权，其意识形态全面倒退，正在走向恢复旧的俄罗斯帝国的思想，这个帝国有着自己的利益和追求，它们与其说是受党的口号的指导，还不如说是受管理这个帝国的那些人的大国主义偏见所驱动。这个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不是贵族的沙文主义，而是所谓的工人世界主义，但事情的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归根到底，使落后和不发达的民族丧失民族特征所造成的结果与同化它们产生的结果是相同的。要知道，以下事实已不是秘密了，你们凭借地方无产阶级的意志，以武力废除边疆地区自己的民主化尝试，尤其是在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这是对大多数当地土著居民权力的最粗暴的侵犯，而这种行为只是顺应了少数人，主要是俄罗斯工人的意志，正是他们曾经是旧帝国边疆地区被沙皇政权殖民化的城市的主要核心。难道不是很清楚，塔什干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莫斯科在土耳其斯坦的专政；同样，巴库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突厥族工人的专政，而是莫斯科的专政？难道过去的圣彼得堡的立场是另一种样子的吗？目前制度下边疆地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表面现象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高加索边疆区最初几任总督任内的一些阿塞拜疆汗国独立性并不比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们管辖下的高加索苏维埃埃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少，差别只是在于消灭现有的共和国的进程远比消灭那些汗国的进程要快。

我非常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集权制，我很早就预料到这个党的独特的帝国主义并且预言这个党不可避免的蜕变。我并非愿意地观察到，这已经在我眼前发生了。在莫斯科逗留的这两年的时间里，我最终确信，拯救东方民族，其中包括各突厥民族，首先在于他们自己，在于他们的民族自我认识。因此，我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在你们的制度下，民族对于自身的信念是怎样被消灭，他们脆弱的制度是怎样被摧毁，以及民族自我消亡的思想是怎样取代民族

自我认识的思想的。

这种情况最终将不会发生。东方人民希望按照非“共产主义”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为了这一目的而同一切奴役行为作斗争，并在斗争中寻求可靠的盟友。他们曾一度被威尔逊^①的纲领所吸引，但你们的口号对于他们更有诱惑力。然而，如果说威尔逊的纲领是以签订凡尔赛条约、特里亚农条约以及塞夫勒条约的成就而告完成的话，那么你们的口号是以对乌克兰、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的新的占领结束的。

因此，我的祖国——阿塞拜疆——拥有同你们的占领和奴役作斗争的神圣权利，就像英勇的土耳其同协约国所进行过的和正在进行的斗争那样。

在保持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的忠诚的同时，我仍然是您的朋友，对您怀有由衷的敬意。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请求您接受我最真诚的保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对我的私人友情，并衷心希望能有机会愉快地为您效劳。

此致敬礼！

M.ƏM. 拉苏尔-扎杰^②

1923年1月1日于君士坦丁堡

① 威尔逊，托马斯·伍德罗（1856～1924），1912～1921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1918年提出了“十四点”和平纲领，其中提到，要在同等重视当地居民利益和有关政府要求的原则基础上对殖民地问题进行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

② 拉苏尔-扎杰是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政党“穆萨瓦特”（平等党）的领导人之一。该党1911年成立于巴库，其纲领是争取穆斯林团结，促进穆斯林国家的独立。是1918～1920年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要执政党。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穆萨瓦特党的许多领导人都移居国外。

№04496

卢那察尔斯基关于支持斯大林 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4月1日)

绝密

亲爱的同志：

大概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也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我毕竟算是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成员，然而，党内发生的事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谣言像旋风一样流传^①。但事情并不在于我想请求您给我指明弄清真实情况的途径。我写信是想告诉您，我随时准备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完成党的任何委托，我的能力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出色的。同时，我很久以来就一直认为，您在我们的领袖人物之中是最为敏锐和绝对不犯错误的，并且相信您钢铁般“坚强的灵活性”。

我不是在纠缠着党。党最懂得怎样认识人和使用人。但是，在重大的事情上，党也可能会忘记一点什么。我想提醒一下：您是能

^① 1924年9月托洛茨基发表《十月革命的教训》，批评党的领导在国内和国际上实行的方针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起义期间的错误。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起来对付托洛茨基，通过宣传舆论工具翻历史旧账，谴责托洛茨基企图用自己的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但党内对于最高领导层内部分歧的实质并不十分清楚。卢那察尔斯基在信中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够无条件支配我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阿·卢那察尔斯基^①

^① 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1875～1933），19世纪90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曾参加前进派、区联派。1917～1929年期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

No 04497

李可夫关于对专政的不同理解 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2月6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你的小册子^①我已经读完了。在读的过程中，经常有会见、电话和签署文件的打扰，因此，可能漏掉了很多地方。我觉得，论专政的那一章是最重要的。专政被解释为使用暴力，这种说法当然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小册子中没有足够清楚和准确的措辞来说明专政的形式和暴力的形式是依据不同的情况相互转换的，以及专政并不排除——比如说——“革命法制”和选举权的某种扩大。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专政自然是以与国内战争条件下不一样的方式实行的。随着敌对势力的削弱，不经司法而使用暴力的情况在减少并将继续减少。这也涉及到诸如极刑的使用。苏维埃的活跃、乡和县苏维埃权力的扩大以及吸收大量非党农民参加其工作，这些都绝不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矛盾，并且使专政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把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联合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周围）实行。我觉得，对于这个题目还应该再写点东西，以便于读者能够在小册子中找到对于当前现实中某些最重大问题的答案。

^① 指的是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

我感到，小册子是正确的。格里沙^①也会对它做出答复的。我担心，我们可能不得不经受一场新的文学厮杀，但是不这样又不行。

阿·伊·李可夫^②

① 即季诺维也夫（拉多梅尔斯基），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1917年4月侨居国外，从事党报编辑等工作。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至1926年），1921～1926年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6年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李可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881～1938），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先后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党的八大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列宁逝世后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No 04498

契切林关于和平政策致斯大林的信

(1926年11月2日)

致斯大林同志

尊敬的同志：

不知我昨天写的便函是否已转交给您。我在便函中向您指出，在国外，无论是报刊还是政府都认为您是苏联的领导人，您的每一句话都被看做是政府的宣言；因此，您在谈到别的国家时，一些语言表达方式是极为不妥的，例如：“或者我们打败他们，或者他们打败我们”。难道我们准备打仗吗？我们的和平政策体现在哪里呢？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契切林^①

^① 契切林，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1872～1936），1905年在侨居国外期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回到俄国，参加布列斯特和谈第二阶段的谈判，1918～1930年期间为俄罗斯联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No04499

奥里明斯基关于反对派 致斯大林的信

(1927年11月10日)

致斯大林同志

同志！在11月7日党的报刊中，反对派的行为被称为“愚蠢的”和“可耻的”^①。很抱歉，我不同意这种评价。我认为，这些首领们是在实行背叛党和苏联的计划，他们正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例如，在社会党人——叛徒的队伍中——为自己建立基地。

有人说，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这好比是把狗鱼送回河里。

应该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采取行动，别耽误了。

我再重复一下：不应该认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是愚蠢的。否则我们自己将成为傻瓜。

米·奥里明斯基^②

① 1927年10月，托季联盟受到中央严厉谴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在一边倒的党内讨论中，公开表示支持托季联盟的党员只有4000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组织了示威游行，口号是打倒机会主义、公布列宁遗嘱、更换党的领导人等。游行被驱散。这一行动很快被确定为具有反党反苏的性质。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② 奥里明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1863～1933），19世纪80年代就参加俄国革命运动的职业革命家，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领导俄共（布）中央党史部，担任过《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列宁研究院院务委员，1922～1931年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

No04500

莫洛托夫关于乌克兰粮食收购情况

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月1日)

亲爱的柯巴^①！

我在乌克兰已经是第四天了，人们讲的不无益处。我促使懒惰的霍霍尔^②行动起来着手完成二亿六千五百万普特的计划，也就是超过原计划（在6个月内）大约一亿普特^③，让乌克兰“总局”和“中心”的人物都答应努力工作并分赴各地。现在，我已经坐在梅利托波尔了（这里真是宝地），在这里也组织了带有习惯征粮粗话的大行动。我彻底破坏了这里的朋友们的新年气氛，但这里仍有加倍的坦率和真诚，尽管有时不免表现出“中农”色彩。

我在这里还要呆两天，去一个区看看（已经去过了一个区，是在早晨，顺路去的），还准备到克里沃罗格去1~2天进行督促，那里也能征购大量粮食。在此之后顺便去哈尔科夫呆上几个小时，周末返回莫斯科。恳求您从二亿六千五百万普特中拨出五百万普特留给乌克兰，用于农业机械的补充进口。这是绝对必要的奖励（对于

①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的化名。

② 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③ 1927年末，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收购量比上一年度减少约三分之一，国家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12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认为，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出路在于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但同时也承认，个体小农经济在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整个农业的基础。但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代表大会一结束，中央领导就分赴全国各产粮区。莫洛托夫在信中谈的就是他在乌克兰督办征粮工作的情况。

施加的压力而言)，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合适的。

有许多新的印象，同土地接触一下，令人愉快。等回去后向你讲述这一切。

向大家问好！

莫洛托夫

1928年1月1日

No04501

奥新斯基关于被流放人员情况

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月1日)

副本

亲收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昨天我了解到，斯米尔诺夫^①被流放到乌拉尔的某个地方（大概是切尔登县），期限是3年，而今天，我在街上碰到萨普龙诺夫^②，听说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也是3年。他们应该在星期二动身，而斯米尔诺夫刚刚拔掉了一半牙齿，准备装假牙，但他现在不得不没有牙齿就动身去乌拉尔北部。

① 斯米尔诺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1887～1937），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党，不久恢复党籍，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被开除出党。

② 萨普龙诺夫，季莫费·弗拉基米罗维奇（1887～1938），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莫斯科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哈尔科夫省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乌拉尔局书记、小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等职。因参与反对派活动，在1927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

当年列宁在放逐马尔托夫^①去国外时为其提供了一切便利条件，而在他起程之前还询问他是否有皮大衣和套鞋。这一切都是因为，马尔托夫曾经是一个革命者。现在被放逐的人也曾经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还是革命者，这一点是不应该否认的。他们不仅能够在那个时候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虽然现在有有关于新的党、关于旧的党已经过时的夸张谈论），而且还能够像在十月革命时那样为党服务。

正因如此，请问难道应该把他们赶到北方、实际上对他们实行精神和肉体消灭的路线吗？依我看，是不应该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1)让他们去国外，就像列宁对马尔托夫那样，或者是2)把他们安置在国内气候比较温暖的地方，在那里，斯米尔诺夫可能会写出一本关于信贷方面的好书。

这种流放只会在人们中间造成怨恨，而这些人还不能认为是坏得不能再用了，过去党对待他们时常像后娘，而不是像母亲。这使他们更加起劲地议论，说我们现在的制度与过去的警察制度相似，还说“干革命的人都进监狱，遭流放，而掌权的是另外一些人”。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害的议论，为什么要助长这种议论呢？况且，我们对待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敌的态度到目前为止只限于尽量削弱他们的影响和活动，而不是为了这种影响和活动而报复他们。

我不清楚您是否知道并同意采取这些措施，因此认为有必要向您通报这种情况，并阐明自己的观点。我给您写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并不是他们的请求，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① 马尔托夫，Л. (1873—1923)，即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1895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流亡德国，在柏林出版《社会主义公报》。

致同志的敬礼

奥新斯基^①

1928年1月1日^②

- ① H. 奥新斯基，即奥博连斯基，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1887～1938），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先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驻奔萨省和图拉省的全权代表、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为副农业人民委员，随后担任驻瑞典全权代表，1926年起担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出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 ② 斯大林读了奥新斯基这封信后，将信的原稿退回，并给他回了一封信：“奥新斯基同志！如果您考虑一下，您就应该明白，您没有任何理由——无论是道德方面的，还是其他哪个方面的——来恶意非难党，或者是在党和反对派之间充当最高仲裁人的角色。我将您的信退回给您，它对于党来说是侮辱性的。至于对斯米尔诺夫以及其他反对派分子的关心，您没有理由怀疑，党将在这方面做到可能的和必需的一切。约·斯大林。1928年1月3日。”

№04502

奥新斯基关于保留个人意见

致斯大林的信

(1928年1月4日)

斯大林同志：

我一点儿也不需要考虑我是否能成为党和反对派之间的公断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问题。您对我的观点和我的心情从根本上就理解错了。

关于流放的决定是党的机关做出的，对此我并不了解。出于善意，我想到了别的。在政治局的会议记录里我也没有找到这个决定，也可能是秘密做出的。我写给您的信完全是私人性质的。信是我用军用打字机自己打的（就像这封一样），并亲自将它交给了中央。我把信带到大厦，1924年我试着这样做过，结果被打发到您的秘书处，虽然涉及的是很秘密的事情。在这封信上写着“本人亲启”字样，我想您的秘书们是不会拆开私人信件的。

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认为自己在某些问题上有权持独立见解，并说出这种见解（在最紧要的情况下，经常是只对您本人或者是李可夫讲，就如您可能记得的，在代表大会期间）。

最近，在这方面我得到了两个教训。关于粮食收购问题，李可夫说我应该“用铅把嘴封住”，而您也把信退还给我了。既然不允许这样，我将注意这一点。

要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是让我去国外工作一年，写本书，这样，我就完全不会再有令人讨厌的请求了。

致同志的敬礼

奥新斯基

1928年1月4日

又及：这封信试着寄给您，只能本人亲收，信封上有签名。

№04503

伏罗希洛夫关于红军政治部主任人选

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9年9月16日)

密码

索契，斯大林收

关于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候选人问题，请电告你的意见。我本人推荐的候选人是：亚基尔^① 或者是加马尔尼克^②。还有人提到了波斯特舍夫^③ 和卡尔特韦利什维利^④ 的名字。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因为已造成了不好的印象，以为没有人能够代替布勃

-
- ① 亚基尔，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1896～1937），1917年加入俄共（布），在比萨拉比亚参加了十月革命，曾任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过师和部队集群的指挥职务，1925～1937间先后是几个军区的司令员。
- ② 加马尔尼克，扬·鲍里索维奇（1894～1937），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末参与建立基辅的苏维埃政权，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奥德萨、基辅省委主席，1923年起是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边疆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28年担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9年出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任《红星报》责任编辑。
- ③ 波斯特舍夫，彼得·彼得罗维奇（1887～1939），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工作，1926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3年间是联共（布）中央书记。
- ④ 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拉夫连季·约瑟夫维奇（1890～1938），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出任基辅省委书记，1923～1931年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1931年起先后担任外高加索、西西伯利亚、远东等边疆区的党委书记和克里木州委书记。

诺夫^①。

伏罗希洛夫

1929年9月16日

① 布勃诺夫，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1884～1940），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武装起义期间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党的革命军事总部的成员，内战期间曾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担任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工作，1922～1923年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1924～1929年期间担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星报》主编。自1929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20年代中期到1930年是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04504

伊万诺夫关于个人困难 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30年7月24日)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与一年半以前我给您写的那封信截然不同，这封信涉及的只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受债务（有14000卢布）、家庭以及其他一些不愉快事情的困扰，但我对写作仍然充满了激情，并为写一部反映当代现实的长篇作品积累了大量素材。目前着手这项工作很困难，因为不得不写一些短篇小说以养家糊口、支付财政检查员费用以及安排我们作家生活中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很久以前，阿·马·高尔基就已经邀请我了，他请我去意大利^①，在那里的树木和山石的荫蔽下，写出一些更有分量的作品。我已经请他支持我向苏联政府提出的批准我携家人（妻子和3个孩子）去意大利一年半，并批准拨给我一千美元外汇的请求^②。现在我也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我自己也很清楚，目前对于共和国来说，钱——外汇，是非常短缺的，但是，我的话剧《装甲列车》目前正在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大的有名气的剧院上演，我想，在国外我将很容易地让这些剧院支付给我稿酬，我可以从这些稿酬中拿出一部分归还财政人民委员部拨给我的那笔钱。此外，我还与欧洲最大

① 自1924年4月开始，高尔基长期居住在意大利索连托市，很少回苏联。

② 1930年7月22日，高尔基从索连托发电报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伊万诺夫携家人去他那里，并拨给他一千美元。

的出版社之一“乌尔施坦”签订了一部小说的合同，这部小说我想在意大利完成，卖掉这部书，我也能够归还这笔钱。我认为，我的劳动会有益于共和国的，请相信我。

第二，我向您提出请求的第二个原因是：自从发生了著名的鲍·安·皮利尼亚克事件^①以后，苏联的舆论界对同路人作家产生了某种戒心，经常把我作为颓废主义者、甚至是神秘主义者与叶·伊·扎米亚京^②和其他一些人相提并论。这些言论应由我们的批评家们负责，为此，我写了一本书《秘密的秘密》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主题都产生于纯粹是我个人的对生活的坏情绪，我已放弃了这些作品的体裁。现在，我自己也为抛弃了这些东西而感到满意，但是，白纸黑字，况且还有《致永存者》，一笔是勾不掉的。现在，我已经到过俄罗斯的很多地方，与作家小组走遍了中亚，到了最落后的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我自己感到精神振作了，其他同志也这么说。但是，众所周知的右倾同路人作家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我想，如果我提出办理护照的申请，写明某作家打算同妻子一起离开，不排除下面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一些机关会用讥讽的态度对待此事，他们可能会认为：“他这是要去哪里？他到哪也不会更好的”，等等，至于钱的问题，那可能是没有讥讽，但也不给，这样，即便有了护照，我也没办法动身。

三年前我曾去过欧洲，但只是从外表上看了欧洲，没写任何有关

① 皮利尼亚克，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1894～1941），俄苏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荒年》、《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短篇小说集等。在1926年第5期《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不落的月亮》，书中暗示军事人民委员米·瓦·伏龙芝是被阴谋杀害的。1929年，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红木》由柏林一家出版社出版。皮利尼亚克后来由于这两部小说而被指控犯罪，被判监禁。

② 扎米亚京，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1884～1937）——俄国作家，擅长写怪诞讽刺作品，革命前发表《县城种种》、《远在天边的地方》等中篇小说，1918年出版《岛上居民》。1924年在外国用英文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以怪诞讽刺的手法描述了极权主义社会，因而遭到逮捕。1932年移居国外。

欧洲的东西。这次，我打算，在完成意大利的工作之后，让家人先返回，我自己去鲁尔和德国的其他冶金工业区，看看欧洲工人是怎样生活的。这对于我是必须的，以便明年开春能去顿巴斯的核心地区，在那里完成一部描写苏联矿工——某种典型的采煤工人——的长篇小说，并想在小说中将欧洲的矿工与苏联的矿工进行对比，而如果不了解欧洲工人的生活需要，是很难完成这件事的。

我知道，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很困难很重要的，但是我认为，在我开始从事文学工作时就感受到的来自苏联社会的那种爱和美好感情，使我必须认真地出色地履行我对于苏维埃艺术所负有的社会职责。只有写出能够反映时代和创造这个时代的人们的长篇巨著，才是履行这一职责。我这样写并不是自吹自擂，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信念，并以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进行工作。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车子在危险的道路上行驶，那么我会同意冒险，并在特别快车全速行驶过程中不眨一下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想再一次重申，我去欧洲不是作为游手好闲的旅行者和暗中窥视者——这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是作为一名作家，他有责任把这两个互相对立并且可能很快就会手持武器互相斗争的世界加以比较。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我是它的仆人和武器——这也是我的武器。

祝您在履行赋予您的最重要的世界性作用的过程中一切顺利。

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①

^① 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维亚切斯拉沃维奇（1895—1963），俄苏作家，20年代初期发表了《游击队员们》、《铁甲列车14-69》、《有色的风》等反映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

我的地址：第一麦尚斯卡亚街，6 栋，2 号。

或者是：《红色处女地》杂志，伊里英卡，斯塔罗 - 潘斯基，4 栋。

№04506

邦奇 - 布鲁耶维奇就有人诽谤高尔基 致斯大林的信

(1933年5月22日)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最近，我收到一份通过邮局寄来的诋毁高尔基的诽谤信，原件我已附在给亨·格·亚戈达^①同志的专门信件中。现将给亚戈达同志的信的副本和诽谤信的副本一起寄给您^②。

我认为，应该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下达最坚决的命令：捉拿那些竟敢通过我们的邮局邮寄恶毒诽谤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信件的坏蛋。

致共产主义敬礼

弗·邦奇 - 布鲁耶维奇^③

① 亚戈达，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38)，曾在下诺夫哥罗德和彼得格勒做党的工作，1920年开始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24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1934—1936年间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② 所收集档案中无此副本。

③ 邦奇 - 布鲁耶维奇，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1873—1955)，189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在《火星报》、《前进报》、《真理报》工作，1917—1920年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从事学术活动，自1933年起担任国家文学博物馆馆长。

№04507

拉狄克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情况

致斯大林的信

(1933年6月14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想就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①的处境问题——在此之前我认为没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向您提出请求。

在流放之前我一直同他在一起，他返回以后^②，尽管我们很少见面，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真诚和友好的。我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活着。我也对您——斯大林同志——讲过，叶·阿·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怎样拼命工作，怎样帮助党实现五年计划。他已经明白，过去错误的根子是什么（我们在谈话中已经多次确认了我们以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懂得，我们曾不正确地反对党的基本部分和您。他不仅与托洛茨基分子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没有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任何思想和感情因素。对我来说，他被逮捕、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完全是意想不到的。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1886—1937），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过一些党务和军事政治职务，党的十大后曾任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1927年10月因参与反对派活动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市，1929—1930年期间，在喀山的鞑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2年起先后是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务委员、苏联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的部门负责人，1933年1月因从事反对派活动再次被逮捕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② 这里谈的显然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次流放。

只是在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被指控在1929年没有向党报告有关喀山市存在着一个鞑靼族反对派集团。我一点儿也不清楚他对这一指控是怎样解释的（他没有给我写信，显然是担心我在党内的处境复杂化）。但是，当我了解了他的立场以后，我不能原谅他这种有意识的罪过。

我没有为这一案件向您提出过请求，正如没有为逮捕和流放罗宾逊、布利斯科维茨基、加耶夫斯基、布龙施泰因^①的案件向您提出过请求一样，对这些人我都了解，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工作的人，对党从不要两面派，我认为逮捕他们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在采取必要的、但又是困难的行动的情况下是可以解释和理解的。我没有就这些案件向您提出什么请求，尽管我认为，对党的忠诚不仅要求同党的敌人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在党错误地向自己的同志开火时帮助它改正错误。我要说的是，我没有特殊的权利要求您相信我的这些观点。您应该对一切表示怀疑，并很坚决，因为今后还会有更大的考验：只有在考验中毫不动摇的人，才能被认为是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说我终究还是向您提出请求，那是因为我得知叶·阿·非常疼爱的那个孩子病得很厉害。请允许叶·阿·回家几天看看孩子，并给他一个机会同某位领导同志谈谈。您也知道叶·阿·的过去，很了解他的弱点和长处。我坚信，如果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其他某位领导同志同他谈谈，那么就能确信，帮助他摆脱那种非常糟糕的处境——他赞成党的路线，却为自己的过去的错误而被流放——是值得的。

如果我写的不能使您信服（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有很多情况我不了解），那么，请原谅我无意中犯下错误。我觉得，我写这封信

^① 这里提到的都是莫斯科一些企业的负责人和高等院校的教师。

是做一件好事，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党都是这样。促使我向您提出请求的不仅是我与叶·阿·的多年友谊（当然，如果这种友谊与党的利益相对立，那么也就不能再考虑它了），而且也是对您的依赖和深深的信任，您会理解我的动机。

致以诚挚的敬礼！

卡尔·拉狄克^①

1933年6月14日

又及：叶·阿·孩子的病情严重地恶化了。

^① 拉狄克（索贝尔松），卡尔·伯恩哈多维奇（1885～1939），20世纪初期开始在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后来是《真理报》和《消息报》工作人员。

№04508

拉柯夫斯基关于重新入党 致斯大林的信

(1935年11月28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昨天我得知党重新接纳了我。我已经于昨天领到了自己的党证。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令人高兴的事。

请允许我就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我们伟大党的领袖，老战友——相信，我将竭尽全力地工作，不辜负您和中央对我的信任。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永远忠诚您的 克·拉柯夫斯基^①

1935年11月28日莫斯科

^①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1873—1941），19世纪90年代起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年开始先后在英国和法国担任外交工作，1927年十五大上被作为反对派骨干分子开除出党，1934年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部管理局长，1935年恢复党籍，1938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No 04509

斯塔索娃关于拯救拉科西 致斯大林的信

(1937年3月23日)

绝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斯大林同志

亲爱的同志！

您不认为可以提出交换拉科西·马加什^①的问题吗？目前，整个匈牙利正在募集资金，准备把作为战俘死于西伯利亚的匈牙利著名诗人杰尼·格扎的遗骸从苏联运回匈牙利安葬。他的遗骸已被找到。

也许可以提出用这个格扎的遗骸加上其他东西，即在尼古拉一世镇压匈牙利起义^②时被抓的匈牙利人的名字，来交换拉科西？

拉科西本人也估计，或许有可能用某种经济交易，采购、订货等等，来促进这种交换成为可能。

① 拉科西·马加什（1892～1971），匈牙利政治活动家，1920年开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自1921年起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12月秘密返回匈牙利，次年被捕，在被监禁8年之后，于193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40年10月因苏联政府的干预而获释。1945年起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政府副总理，1948～1956年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第一书记，1952～1953年间是政府总理。1956年7月被解除领导职务，1962年8月被开除出党。

② 指的是1848～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当时，根据奥地利的请求，俄国政府出兵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目前开始就交换问题进行谈判的时机要比以前有利，因为，由于法西斯叛乱未能成功，匈牙利领导集团的情绪完全改变了。

最终，也有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让拉科西申请苏联国籍，因为目前他没有任何国籍。他的故乡现在在南斯拉夫，但那里不承认他的国籍。

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预先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促使法国社会舆论施加压力。我们估计能有一些效果，因为目前匈牙利政府倾向于法国。

拉科西已经蹲了12年的监狱。

叶列娜·斯塔索娃^①

^①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1873～1966），俄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顿河罗斯托夫、巴库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7～1937年间担任国际援助革命战士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04510

斯塔索娃关于受到指控

致斯大林的信

(1938年5月17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您答应在可能接见我的时候打电话通知我。显然，时间不允许您做这件事，而我的处境却变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了，因此，我决定再一次写信打扰您。

施基里亚托夫^①、马林科夫^②以及鲁宾施泰因^③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就我交出的、波格丹诺夫^④同志接手的苏联国际援助革命战士协会的事务对我提出了指控，他们实质上不是指责我犯错误，而是指控我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当我出示为我恢复名誉的证明材料时，他们也不予理睬。

例如，对我最严重的指控是我把钱给了托洛茨基分子。我提供

① 施基里亚托夫，马特维·费多罗维奇（1883～1954），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担任缝纫工会中央委员会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4～1939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

② 马林科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901/02～1988），1934～1939年期间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机关领导干部处的处长。

③ M.M. 鲁宾施泰因——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④ 波格丹诺夫，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1882～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1年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1921～1925年为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随后任北高加索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间领导苏联在美国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1935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地方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了李维诺夫^①同志的证明，证明我把这些钱寄到了什么地方，寄给了谁，但是施基里亚托夫同志对这份文件也同样试图否定。

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是要在精神和肉体上消灭我。

这种情况迫使我请求您关注我的案子，尽管我知道，您工作繁忙。总是期待能与您进行私人会面，解开缠绕在我身上的死结。

叶列娜·斯塔索娃

1938年5月17日

^① 李维诺夫（瓦拉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苏联著名外交家。1898年参加革命运动，1918年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年间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04511

雅罗斯拉夫斯基
关于托洛茨基是间谍致斯大林的信
(1938年9月25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最近一段时间，我越来越经常地得出结论：托洛茨基很早以前就是一名奸细。读了瓦采季斯^①的证词以后，我更加确信这一点。这份文件简直令人震惊，即便是在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及其集团的全部卑鄙勾当之后。我坚信，早在1917年以前，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就已经被德国参谋部招募为间谍了。他的朋友帕尔乌斯^②在战争时期公开以德皇代理人的身份行事。而托洛茨基利用自己的中派立场，即“我们不进行战争，也不签署和约”，成功地掩盖了他为德国参谋部服务效劳的事实。

应该进行调查，以便弄清楚托洛茨基同沙皇暗探局的关系。如果托洛茨基能够对列宁、斯大林、苏维埃共和国进行这样令人震惊

-
- ① 瓦采季斯，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1873～1938），原为俄国旧军官，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中工作，曾任步兵军军长、红军副总司令、东线司令员，1918年9月至1919年7月任总司令。1922年开始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
- ② 帕尔乌斯（格尔方德），亚历山大·拉扎列维奇（1869～1924），德国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得到了使用和发展。

的背叛，那么也就不难推断，在八月联盟^①的组织 and 活动过程中，以及在此之前，托洛茨基的立场都是服从于他的“口号”：“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革命。”

瓦采季斯的证词是对托洛茨基的有力判决。

我把这份材料转给了施基里亚托夫同志，他也认为这些证词是致命的。

致共产主义敬礼！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②

① 1912年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创建的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派别如托洛茨基分子、孟什维克、崩得分子等组成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1914年解散。

②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原名古别尔曼·米涅伊·伊兹拉伊列维奇）（1878～1943），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随后任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委员，1921年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34～1939年间为《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

№04512

斯塔索娃关于纪念老布尔什维克 致斯大林的信

(1949年11月8日)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现在，正值十月革命32周年。对于1917年的那些日子，同您一起并在您的领导下积极工作的人们，总会感觉到有点特别。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①就这样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他是在1948年夏天离开我们的，而广大党员群众却还不知道这件事，这让人感到痛心。

2月27日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②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而1949年5月份有维·鲁·明仁斯基^③的十五周年纪念日。但我们的报刊又是沉默不语。

可以这样认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忘记了那些把自己的全

-
- ① 波德沃伊斯基，尼古拉·伊里奇（1880～1948），190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期间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任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1919～1927年是普及军事训练处和特种部队负责人。
- ② 克鲁普斯卡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869～1939），列宁的妻子。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 ③ 明仁斯基，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驻柏林总领事，1919年开始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23年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1926年开始为局长。

部力量贡献给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人们，也就是不再提起那些值得作为正在成长并在您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的榜样的遗产。

我想向您请教，是否可以允许这种遗忘呢？

您的叶列娜·斯塔索娃

1949年11月8日

№03928

奥库洛娃 - 泰奥多罗维奇为女儿事 致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 1950 年 11 月)

我怀着母亲的痛苦向您求助。13 年以前，我的女儿，尼娜·伊万诺夫娜·卡赞斯卡娅，作为家属被流放到马加丹，期限为 8 年。我坚信我的女儿在政治上是清白可信的，因此在 12 年以前曾为此给您写过信。8 年的期限是有止境的，我们也希望，她在这段时间内将经受审查，最终回到享有充分权利的生活中来。8 年过去了，她从集中营回来了。在那里她在工厂当马达工，回来时有很好的鉴定，我作为母亲收到过营地长官的亲笔信。但是，结果发现，她并不能回到我这里，要等 3 年以后才可以申请取消前科，到那时……3 年的期限是有止境的。她迁居到亚历山德罗夫，在缝纫合作社工作。3 年过去以后，她向特别会议提出取消前科的应用。鉴定仍然是极好的。1 年半时间内没有答复。近日里答复来到了，未予同意。现在就没有任何期限和任何希望了。她去年给您写过信，她因自认为是正直诚实的苏维埃人但却成了苏联社会的贱民而非常痛苦。唉，我也是多么痛苦啊，……不说它了。

我是谁？我的名字也许您一度曾有所耳闻。我曾经担任过《火星报》的代理人。在苏维埃时期曾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我的名字曾不止一次作为几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小组领导人、共产主义大学校长等等，等等，在党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1937年，我因被捕而被撤销工作，开除出党。很快又恢复了党籍，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一直到现在。我曾经没有工作。到60岁时，我从担任照相劳动组合的考勤员开始又逐渐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以后是在儿童书籍博物馆工作。在战争期间，我是有96个莫斯科疏散儿童的寄宿学校校长。为了表彰这项工作，在莫洛托夫州的光荣簿上记载着我的名字。

现在我已经72岁。在苏联革命博物馆工作，被公认为优秀工作者。我的社会乐观主义是不可遏制的，但是它和我的个人痛苦是如此不相协调，以致常常感到心碎欲裂。而女儿又有病，心脏完全坏了，最近一年来常常中断工作，不是住医院，就是病休在家。

就这些，亲爱的约瑟夫·约萨里昂诺维奇。如果有可能，请帮助我在充满喜悦的心情中，而不是在不协调中结束我的人生道路。^①

格拉菲拉·伊万诺夫娜·奥库洛娃—泰奥多罗维奇^②

1899年的联共（布）党员

党证号：1208460

① 奥库洛娃—泰奥多罗维奇于1950年11月被通知去内务部，她在这里被告知，特别会议早在1945年就准许其女儿在莫斯科居住。在此之后，她又为此事奔波了一段时间，终于为女儿办理了莫斯科户口。

② 奥库洛娃—泰奥多罗维奇，格拉菲拉·伊万诺夫娜（1878—1957），俄国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多次被沙皇政府流放。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过一系列领导职务。她的丈夫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杰米扬·费多罗维奇）1895年就开始参加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起任副农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37年死于大清洗。他们的女儿H. H. 卡赞斯卡娅当时是大学生，被作为“人民敌人”的家庭成员关进马加丹集中营。

【专题说明】

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

(1918年4月至1928年1月)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由于国内战争和国内政局的动荡，有关俄国东正教会、政教关系和国家宗教政策等方面所能保存的档案是不多的，尤其是20年代之前。现在这些档案，可说是当时所能保存下来的档案的绝大部分。从当前俄罗斯学者在著作文章中所引用的档案情况看，其中绝大多数的最重要的档案这里都收集了。这些档案文件可以使读者大体了解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末苏联政府对东正教会的基本政策，俄共（布）领导人在宗教方面的主要想法，东正教会的活动情况，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激烈斗争，以及国家对教会的镇压和剥夺。

引发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冲突的主要起因是俄共（布）中央关于没收教会财产的决定和相关措施。

1921~1922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一些地方发生了农民的暴动。1921年8月，东正教大牧首吉洪建立了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呼吁“世界人民和东正教徒”帮助快要饿死的饥民。教会在短时间内募集到大量财物用于救济饥民。苏维埃政府于1922年初做出决定，没收教会财产中的金、银、玉器，教堂只应留下最低限度的供祈祷仪式用的贵重物品。2月6日，经大牧首同意，

向各教区发出了通知，要求将那些并非祈祷仪式所必需的贵重装饰品和器物捐出来帮助饥民。不久，政府决定撤销全俄教会救济饥民委员会，征用已募集的财物。1922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在救援伏尔加河流域饥民的口号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没收行动引发了教徒的反抗，继在舒亚发生的流血事件之后，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骚乱和冲突，有记录的这类事件达1414起。那些反对没收教会财产的神职人员和教徒遭到起诉、审判和镇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舒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斯摩棱斯克、旧鲁萨、辛菲罗波尔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了对抵制没收的神职人员的审判，如在莫斯科，54名被告中有11人被枪决，其中大多是教会上层人士；在彼得格勒，被起诉的有80多人，包括大主教在内的4人被判死刑；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吉洪也在被软禁于修道院一段时间后，被逮捕关押。

（本专题文件由傅树政、雷丽平、姚海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方新哲、康亢、何宏江、
赵洪、胡昊、杨世招等）

№05086

**司法人民委员部负责人会议关于
贯彻政教分离法令而建立
委员会的会议纪要**

(1918年4月13日)

出席者：M.Ю. 科兹洛夫斯基、Д.И. 库尔斯基和 П.А. 克拉西科夫。

听取：议程五，关于贯彻政教分离法令而建立委员会。

决议：建立隶属于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人民委员代表：内务部、教育、救济、财产、军事、海军和外交部，这些部门都由内行的人参加；东正教、古老信徒派、罗马天主教和福音-路德教派、宗教改革派、亚美尼亚-格里哥利教会的代表以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宗教的代表，还有教派运动的鉴定专家——B.Д. 邦契-勃鲁耶维奇。委任列伊斯涅尔同志为司法人民委员部在这个委员会里的代表，其职责是召集和组织这个委员会，目的在于让委员会向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介绍自己工作的结果。

№05087

**司法人民委员部特别局致工人、农民、士兵和
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关于特别局的
建立及其任务的通知**

(1918年5月29日)

各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

附属于人民委员会的司法人民委员部做出决议，为贯彻政教分离法令决定建立特别局。正如这个局的名称本身，及其在一系列其他机关中的地位所表明的，这个局的职责是把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地方和政权机关的活动联合起来，旨在建立由十月变革创建的国家与宗教的新关系，今年1月23日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工农政府报第15期）保障了信教自由的原则。

在作以上叙述的同时，司法人民委员部要求尽可能不加拖延地告知，在你们的苏维埃里是否有某种专门的机关或人处理有关清理国家和宗教组织之间关系的事务，以及这些人或机关的地址。如果苏维埃由于某些原因难以利用自己的组织力量清理上述关系，那么应当报告贯彻关于政教分离法令的部门，而这些部门给予他们相应的协助，发出必要的指示或派内行的人去。所有贯彻关于政教分离法令的人和机关如发生问题，应向下述部门请示，地址是：克里姆林宫，司法机关大厦，18室a。

局 长

№05088

**奥洛涅茨教区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
修道院关于修士被捕、财产被没收
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文书**

(1918年11月18日)

1918年11月5/18日^①，我们，下面签名的奥洛涅茨教区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修道院的教士们写了这一文书，内容如下：

今年，1918年10月10/23日早晨8点钟有一伙达30人的红军战士，其中包括政委，命令所有的修士和见习修士都集中到修士食堂，大家都服从了。在食堂里他们宣布所有的人都被逮捕了，要每个人把标签上标有房间号码的修道小室的钥匙交出来。把修士司祭的工作人员和修士辅祭、两个唱诗班、圣堂工友以及掌蜡烛的人放出去做晚弥撒。

在做晚弥撒、午餐和奥纳格^②之后，也就是白天9至12点，他们跑遍了修道院院长室、司库走廊和修道士楼房里的所有修道小室和工作室、财会室和仓库，抢光了珍贵的东西，取下了圣像银衣饰，把茶叶、糖和食品统统拿走。在修道院院长室里他们把所有贵重的东西、衣服、被单，还有茶饮、茶具全都抢去，值钱的、贵重的东西归自己，不太值钱的则留给地方贫民委员会。

此后，大约有10个全副武装的人，要保管法衣、圣器的修士

^① 俄此处日期标示的是俄历和公历，俄历11月5日即公历11月18日。下同。

^② 原文 ОНАГО，一种祷告的仪式。

司祭帕拉奇亚交出法衣圣器室的钥匙，并同他一起到了法衣圣器室。在法衣圣器室，所有教会珍贵的器具全被抢去了，同时拿走了两只放有息票、数目达12万卢布的国家银行的收据以及现金（现金数目不详）的小保险箱。从法衣圣器室出来就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教堂去，连帽子也不脱，就直接到祭坛，在那里他们自己打开高桌拿走了用在正教祭坛供桌上的十字架、福音书和圣器。他们又走到香烛钱柜处，把里面的钱全部抢走。他们打开香烛小贮藏室，那里藏着蜡烛和从工厂运来要分给各教堂的、修道院的和教区教会的酒。他们把酒拿走，有几个人都喝醉了。在那些抢劫者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前曾在修道院里当杂役和工人，他们甚至知道修道院的宝贝藏在何处。因此他们逼迫特罗伊茨基修道院的法衣圣器室执事，用手枪威胁他，并开始用刑，要他打开所隐藏的宝物，法衣圣器室执事不得不把一切都打开，他们把法衣圣器室的一切及藏起来的東西都抢走装在大车上，第二天早晨6点钟运到洛杰伊诺耶—波列。

10月11/24日，他们又从修道院收藏衣服的房间和贮藏室里抢走衣服、鞋子、皮子和布匹，还从粮仓里把所有上等面粉以及其他面粉也抢走，一共是40普特，都运到乡下的消费合作店里去了。

10月12/25日，他们又在阁楼和磨坊里进行搜查，把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抢走。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他们都是醉醺醺的。晚上10点他们来到修士楼房，喝得酩酊大醉，向法衣圣器室执事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教堂的钥匙，目的是要在第二天来拿装有圣骨的圣骨匣，并随身带走。

10月13/26日，晨祷无法进行，因为大教堂的钥匙在他们那里。早上8时，有15个人来到修道院，直奔大教堂，连帽子也不脱。修士们也到了教堂。一上来就要打开圣骨匣，从里面取出圣骨。他们把装有圣骨的灵柩放在圣骨匣旁边的凳子上，从不同方向

围着灵柩，并嘲弄地从圣骨上扯下裹尸布和覆盖物，一直露到胸口。此后把圣骨匣拖上读经台，并命令把装有圣骨的灵柩放进圣骨匣，他们要运走，但我们不同意。于是他们自己把灵柩放进圣骨匣并把教堂的银制东西，如祭杯、十字架以及其他东西也放进去，然后锁上圣骨匣，打算搬出，以便运走。这时教士们开始哀求让圣骨留下。其中有一个看来是长官的人表示同意写收条留下圣骨，于是打开圣骨匣，取出圣骨，并把收条交到他手里，收条上写道，圣骨完整，将保存在大教堂。然后将所有拿出来东西又重新放进圣骨匣并关上后，从大教堂搬运到洛杰伊诺耶—波列。与此同时，他们砸碎了圣骨匣旁的募款箱，拿走了里面所有的钱。这时没有乡下的农民。

修士们把装有圣骨的灵柩放在高处，并立即开始做晚弥撒。晚弥撒后修士大司祭纳扎里神父留下来和圣骨在一起，他不让任何人到那里去，甚至两个政委也不让进，他因此而被捕。密尔库里和见习修士加甫里尔·奥琴采夫声称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也因此而被抓起来。

晚祷前，装有圣骨的灵柩被从祭坛上抬下，放到平常放的地方，现在还放在那里。那个政委和红军战士在午后3时到洛杰伊诺耶—波列去了。

从修道院拿走了下列东西：

1. 圣骨匣：两只修道院的，一只小的、教会会馆的、银制的，共3只。
2. 修道院的金冠13顶、高级僧侣家的金冠3顶，共16顶。
3. 祭神的器皿及其附属品，12件。
4. 各种大小的有银质圣像衣饰的福音书，10本。
5. 用在供桌上的银质十字架，12个。
6. 佩戴在胸前的十字架，5个。
7. 修士大司祭的十字架，10个。

8. 银质圣餐保藏器，2个。
9. 银质长链手提香炉，4只。
10. 银质圣像衣饰连同圣像一起，15件。
11. 高级僧侣的镶有宝石的圣母小像，3枚。
12. 权杖，3根。
13. 盛圣饼的盘子，4只。
1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教堂祭坛上供桌后面的十字架，1个。
15. 圣像前的银质长明灯，1只。
16. 玳瑁做的小匣，1只。
17. 复活节用的银制三支蜡烛的烛台，2只。
18. 从两所教会会馆供桌上取下的银质衣饰，2件。
19. 法衣室、圣器间里的珍珠、奖章、古银币和铜币，全被拿走，其数目无法确定。

我们签名具结如上所述。

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修道院院长 安东尼

修士大司祭 米特罗方

修士司祭 菲拉列特

法衣、圣器修士司祭 帕拉奇

听取忏悔的神甫、修士司祭 费奥多里特

管经济的修士司祭 多麦季安

修士司祭 达米安

修士司祭 马尔达里

修士司祭 伊奥萨多夫

修士司祭 尤维纳利

修士司祭 格拉西姆

修士司祭 谢尔盖

附注：

“我证实，这一复制件与原本无误，奥洛涅茨教区委员会成员，大司祭 H. 丘科夫。”“复制件以第 140 号文件号寄给彼得格勒公社司法人民委员部。”

№05089

**兹韦尼哥罗德司法管理处清理科向兹韦
尼哥罗德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管理局报
告关于贯彻政教分离法令的摘要**

(1919年2月22日)

兹报告：上述管理处清理科在贯彻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与国家、教会与学校分离的法令中，做了以下工作：教会所有财产，无论是各个乡的，还是沃斯克列先斯克市的和修道院的，都进行登记，并首先移交教区团体，而修道院的财产则转交宗教促进团体。所有最近50年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册由神职人员交给地方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办理户籍登记的民政机构分部。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公民在办理户籍登记后又去找神职人员，再办理同样的户籍登记，而且神职人员在办理户籍登记时还要看文件。现在学校里不教神学课了，尽管最初农民对此持否定态度，但面对现实现在妥协了，也不再去追求这方面的知识。

对一所名叫新耶路撒冷的地方修道院，连同其所有财产和人员，整个进行了登记和查封。当地的社会保障机构在那里建立了养老院和托儿所，把以前主教的住房给养老院和托儿所使用。10月变革以前大约有50名僧侣，现在只剩下约30人，其年龄从77岁到50岁不等。有一段时间僧侣们在农民中散布谣言说，他们非常贫穷和饥饿，要求救济。管理处采取措施安慰他们，他们却溜走了。牲畜棚连同所有的用具由地方农业局拿去。所有财产和贵重物品都清点登记拿走，清单寄到县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些东西都留

着，一直等着中央下达命令。对僧侣们，都让他们工作，和所有的资本家一样，也要进行登记，没有发生撤去本人教职的情况。

科长（签名）

办事员（签名）

№05090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关于 挂肖像问题致列宁的信

(1919年10月3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上个星期天，我到莫斯科省的内地——兹韦尼哥罗德修道院作了一次传统的闲游。对于我在那里所看到的，我不想，甚至也不能保持沉默。无论是修道院，还是修道院的产业（如今是苏维埃的），还有关于当地的共产党员，我都不去说，因为所有这一切我都没有看见。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态度对待宗教，直至“亵渎神明的行为”。但是如果政权的代表们采取了苏维埃制度所不需要的步骤，那么就需要向这种人指出这一点。

我深深地相信，您，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在直接意义上的“上帝”的地方放上您，您本人会拒绝和抗议的。我不允许有这样的想法，即同意将您（您的肖像）作为圣像出现在同一地方。问题就在这里。在修道院的入口处的神龛里曾经挂着圣像，圣像前面是一盏长明灯。一些外来的人和附近的人走过，划着十字保佑自己，然后心中安宁地离开。这一切，也许，与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对那些有旧习惯的人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摆脱宗教很不容易。后来修道院被关掉了，把它派别的用场了。钟楼上飘扬着无产阶级政权的象征——红旗。这里的一切说明，这里进行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生活，而是某种新的生活。这一切是正常的，甚至是合

理的。但是有一点我无法理解，而且觉得反感。尽管我对宗教毫无兴趣，因为从1905年起我就已完全不信教，我想引起您注意的是使您的名字不被亵渎和滥用，因为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导致反革命行动，导致多余的愤怒和不必要的牺牲。

现在，在修道院大门上曾挂着圣像的那个地方，在以前的修道院的入口处，在神龛里摆放圣像的地方，尊敬地，在神龛里蒙上红布后，放进了您的肖像，而它的上面是一面红旗。我不由地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难道这一切是有意识地做的，并得到了我们尊敬的、亲爱的领袖的同意？接着我马上对自己说：不，这是对革命成果的直接嘲弄和对我们领袖的诋贬。要知道那些普通居民——那些中农和贫农，城里人和小市民，女工和农妇，他们走过修道院的大门，看到您的肖像，真的，他们会骂您，骂布尔什维克，骂“同志”，骂人民委员，想骂谁就骂谁。他们会直截了当地说：“瞧，他们取下了圣像，而挂上了自己，为的是要向他们顶礼膜拜。”在我的头脑里怎么也想不到您会作为圣像出现在那里。如果这是想达到宣传目的，那么它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我想，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您本人会轻蔑地对待这一荒谬的做法，并下令尽快和神龛一起扯下我们领袖的“至圣”的照片，并以此让地方上的居民明白，您不想和他们搞得不和睦。

这样的宣传和鼓动是我们所不需要的。

对领袖这样的尊敬是犯罪的、虚伪的和不应该的。

如果人们想挂您的肖像，那么有许多地方可以挂。让您的肖像和与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的肖像挂在工人们的房间里，挂在茶馆的墙上，放在同事们的办公桌上，甚至可以让它们挂在贫农的小农舍里，挂在红角里——这一切将是真挚的友谊和尊敬的证明，尤其是我们将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将不会听到像“打倒共产党员”那样的喊声。

请原谅我随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写了如此冗长的信。

致以同志的敬礼

您的 B.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

1919年10月3日

№01503

托洛茨基就没收教会

珍宝问题致列宁函

(1922年1月30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1月30日，第91号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附上代替我主持珍宝收集工作的巴济列维奇^①同志的关于收集珍宝的实际进展情况及珍宝的大致数量的综合报告。对该报告需要补充如下几点：

(1) 这些数字无论如何不能算作确切的数字，何况有些是推测（如有关基辅伯朝拉修道院的财产：拉柯夫斯基同志称，经过反复疏散之后，那里一切都已荡然无存）。

(2) 报告谈到了现在正在没收肃反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财政机关、博物馆、皇宫别墅和已取缔的即已变成普通藏库的寺院的黄金和白银。换句话说，报告没有提到现存的教堂和一切现存的宗教机构和场所。没收这些机构的珍宝是一项目前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政治准备的特殊任务。这一行动能搞到多少珍宝，任何人都无法推测。

^① 巴济列维奇，格·德·（1889～1938），1918年参加红军，1920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

(3) 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征求我的意见，问明天能否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我明天已不在莫斯科，但从我这方面看我不反对提出这一问题来。如果需要，巴济列维奇同志能提供补充材料。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材料都只能向人民委员会的绝密会议报告，否则外国报刊马上就会披露这些材料。

人民委员会清点和收集珍宝工作全权代表 托洛茨基

№05064

吉洪大牧首关于东正教处境致加里宁函

(1922年2月25日)

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M. H. 加里宁

如果有可能回答在现今的报刊上针对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的谰言中伤，我们也不认为要去回答，因为这样做辱没了自己。

当我们要求通过自己的代表与之联络的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在报刊上报道教会的计划以及当局允许教会实现它帮助饥饿者事业的计划时，我们却被拒绝或者登载歪曲原意的评论（例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第36期上刊登我们的《呼吁书》）。

您是知道的，东正教会从去年7月起就努力要做帮助饥饿者的工作，请求政府允许它去做这一工作。要是能够让教会开展自己的活动，可能我们就不会成为现在经受可怕饥饿的见证人，因为在俄罗斯最多的是东正教居民，这些居民又最相信和最信任自己的宗教领导人，因为在教区团体中组织得最好，教区团体可以用自己的富有生气的活动给饥饿的居民带来切实的好处。但是直到去年12月9日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对我们敲门声的回答。最后，总算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允许我们触及这一工作了。

尽管允许我们参加救助饥饿者的工作的答复来得如此的晚，我们还是极其积极地做出反应。我们通过自己的代表与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准备工作从12月末一直继续到现在。制订了关于东正教会参加救助饥饿者事业的《规章》，这一《规章》得到

全俄中央执委会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的确认；制订并确定为饥饿者募集的形式、它们的发送和财会制度等工作细则。

在讨论教会募集和捐助的同时，我们的代表和 A. H. 维诺库罗夫同志商讨了关于教会捐助的贵重物品用于饥民的需要。根据上述双方的协议，这些捐赠的物品范围必须不是祈祷用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拟订了我们致信教群众的呼吁书，这个呼吁书得到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的赞同并允许印制和委托我们散发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现在呼吁书已经和关于许多教区的宗教界参与实施的《规章》一起发送出去。与此同时，在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确认的指示的第 11 条中指出：“教会对饥民的捐助还包括教会的珍贵物品，后者要根据特别制定的规章来捐赠、清点和转交给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在恢复让我们救助饥饿者（从去年 8 月 15 日起默认允许我们为饥饿者捐助，一直持续到现在）而进行极为庄重的祈祷之后，自从在各教堂宣布我们的呼吁书和从教会的讲经台上宣读与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商讨的关于转交捐赠教会珍品的协议并以书面文件加以肯定之后，突然在报刊上对我们加强了特别凶狠的攻击并出现了今年 2 月 16 日一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消息，这个决议安排了完全另一种性质的对教会珍品的利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第 44 号）。根据维诺库罗夫同志的吩咐，上述 2 月 24 日指示的第 11 条被取消了。

目前我们的处境是左右为难的。我们不仅相信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相信文件。但是我们被欺骗了。在东正教居民面前我们成了骗子、挑拨离间者。我们将不得不告诉东正教居民情况的真相，解释我们分发的呼吁书。与此同时，从现时起，从解释和领导这一事务的宗教当局代表及信教群众的代表方面来说，要继续与经常和我们联系的中央饥荒救济委员会进行谈判已属困难。在按计划坚持教会和信教群众自愿捐献来帮助饥饿者时，这样的谈判是很顺利的。

我们被指责为“对黄金贪得无厌”。然而，我们原封不动地保存的是从远古时代留传给我们的有着珍贵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教会宝物，我们希望为未来岁月而保存它们。相反，凡不具这种意义的东西，则马上让教士们拿出来帮助饥饿者，例如那些只有物质价值的贵重物品。

报刊上批判我们，公开挑起某些居民阶层来反对我们。

我们请求您采取措施制止使东正教居民激动不安的这类反对教会及其代表的言论，并把指示和工作细则恢复到最初的原貌。

大牧首 吉洪

№01512

托洛茨基就没收教会
珍宝工作致列宁等人的信
(1922年3月11日)

副本

绝密

1922年3月11日，第161号

致政治局委员

列宁、莫洛托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同志

没收莫斯科教会珍宝的工作乱极了，这是因为除了早先建立的工作委员会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又建立了自己的由赈济饥民委员会代表、省执行委员会和省财政局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昨天在由托洛茨基、巴济列维奇、加尔金、列别捷夫、温什利赫特、萨莫伊洛娃-捷姆利亚奇卡^①、克拉西科夫^②、克拉斯诺晓科夫和萨普龙诺夫^③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会议上，我们一致得出结论说，有必要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秘密的突击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是：

-
- ① 萨莫伊洛娃-捷姆利亚奇卡，罗·萨·(1876~1947)，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属火星派多数派。1918~1921年在几个集团军任政治部主任，后从事党政领导工作。
- ② 克拉西科夫，彼·阿·(1870~1938)，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起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③ 萨普龙诺夫，季·弗·(1887~1938)，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5月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主席。

主席——萨普尤诺夫同志，委员：温什利赫特同志（副手——梅德维季^①同志）、萨莫伊洛娃-捷姆利亚奇卡和加尔金。这个工作委员会应秘密地同时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技术上进行筹备工作。实际的没收工作应在3月份就开始并在最短时期内结束。只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以及赈济饥民委员会中央承认这个工作委员会是进行这项工作的唯一的一个工作委员会，并全力协助。我再说一遍，这个工作委员会完全是秘密的。莫斯科的没收工作形式上直接由赈济饥民委员会中央进行，萨普尤诺夫同志在赈济饥民委员会中有接待时间。

请尽快批准这一决定，责令各方遵行，以便今后不再出现混乱。

托洛茨基

^① 梅德维季，菲·杰·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肃反委员会工作，1919年起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

№05065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省委书记
科罗特科夫关于舒亚城事件给俄
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密电

（1922年3月17日）

绝密

抄送列宁同志

致莫斯科、俄共中央

省委报告，3月15日在舒亚城因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在神甫、保皇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情绪激动的人群攻击民警局和一排红军战士。部分红军战士被游行群众解除了武装。在机枪和步枪射击中，部分特种任务部队和146团的红军战士们驱散了人群，结果5人被打死，15人受伤住院。其中红色骑兵饥荒救济分部的一名红军战士被打死。3月15日11时半，两家工厂因这一事件闹起来了，傍晚城里恢复秩序。16日早晨，和往常一样，工人们又都去上班了。居民和部分工人们情绪是压抑的，但并不激动。省执行委员会选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这一事件。详情在信上汇报。

省委书记 科罗特科夫

№06557

列宁关于没收教会珍宝致莫洛托夫
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员的信*

（1922年3月19日）

绝密

请绝对不要复制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员（包括加里宁同志）^①在此件上直接写上自己的意见^②。

列 宁

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

我认为，鉴于舒亚发生的事件^③（此事已提交政治局讨论）必须马上根据这方面总的斗争计划做出坚定不移的决定。由于我担心不能亲自出席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④，因此用书面写出我的想法。

舒亚发生的事件应该同不久前罗斯塔社发给各报的那条不供发表的消息联系起来看，具体说就是那条谈到彼得格勒的黑帮分子策划对抗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消息^⑤。如果把这件事同报纸报道的神职人员对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的态度以及我们所知的吉洪

* 在俄共（布）发动没收教会珍宝运动时，列宁病重正在休息之中，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写这封信作为自己在会议中的意见。此信作为前苏联国家的绝密文件一直被封存在档案馆，几次出版列宁全集均未收入其内。直到1990年，即苏联解体的前一年，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公诸于世。

大牧首[®]的秘密呼吁书加以对照，那么，黑帮神职人员在他们的首领的带领下正是在目前十分周密地在实施与我们进行决战的计划，就昭然若揭了。

显然，在黑帮神职人员中最有势力的集团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这一计划经过反复推敲已被相当坚决地接受了。舒亚事件只是这一总计划的一个反映和表现而已。

我认为，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犯了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因为他们想在他们特别无望取胜、特别不宜进行决战的时刻挑起同我们的决战。与此相反，对我们来说，正是目前这一时刻不仅对我们特别有利，而且是唯一的时刻，我们有99%的机会来完全成功地迎头痛击敌人并能夺得为我们今后几十年所必须的阵地。正是在现在，也只有现在，正当饥荒地区发生人吃人现象，倒毙路上的人数以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此也应该）用最猛烈、最无情的力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对任何对抗都坚决镇压。正是现在，也只有现在，大多数农民群众将追随我们，或至少都不会比较坚决地支持那一小撮可能并妄想实施以暴力对抗苏维埃法令的政策的黑帮神职人员和反动的小市民。

我们务必用最坚决最迅速的方式去没收教会的珍宝，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几亿卢布的基金（应该记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财富）。没有这笔基金，任何国家工作，尤其是经济建设都完全不可能进行，要在热那亚坚持我们的立场也是完全不能设想的。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的胜利必然全部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

一位研究国家问题的聪明的作家说得很对：如果为了达到某一

政治目标必须采用一系列残酷的手段，那就应该用最坚决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施，因为长时间地采用残酷手段人民群众是受不了的。这个想法尤其由于下面这一点而显得更有分量，这就是：从俄国可能处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在热那亚会议后再对反动的神职人员采取残酷手段在政治上将是或可能将是不宜的，甚至也许是十分危险的。而现在我们要战胜反动的神职人员则是完全有保证的。此外，如果我们正是在目前，正是在出现饥荒时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反动的神职人员，那么我们在侨居国外的俄国人中的主要敌人，即社会革命党人和米留可夫分子是很难进行反对我们的斗争的。

因此我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我们正是应该在现在最坚决、最无情地向黑帮神职人员开战，十分残酷地镇压他们的对抗，要让他们几十年也忘不了。我设想实施这一计划的运动如下：

采取任何措施只应由加里宁同志代表官方发布、托洛茨基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公众发表讲话。

已经用政治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暂停没收珍宝的电报不应取消^⑦。这封电报对我们有利，因为可以使敌人产生一个印象，似乎我们还在犹豫，似乎他们把我们吓唬住了（正因为这是一封秘密电报，所以敌人当然很快就会知道）。

派一名最精力充沛、精明能干、擅长指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中央政权机关的其他代表去舒亚（最好是一名，而不是几名）^⑧，通过政治局的五名委员给他下达口头指示。这一指示应该是：他去舒亚后应尽可能多地（不少于几十名）逮捕当地神职人员、当地小市民和当地资产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只要他们涉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暴力对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法令。在办完这件事后，他应立即返回莫斯科，亲自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或者向两位受权处理此事的政治局委员报告。根据这

个报告，政治局将对司法当局下达详细的指令（也是口头的），要求对反对赈济饥民的舒亚叛乱者的审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而且审讯结束时应枪决舒亚城中很大数量的最有势力最危险的黑帮分子^⑧，如有可能，则不仅要枪决该城的，而且还要枪决莫斯科^⑨和其他几个宗教中心地区的黑帮分子。

吉洪大牧首本人，我认为我们不宜去触动他，虽然他无疑是这场奴隶主叛乱的领导。关于他，应对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正是在目前，应尽可能准确和周详地监视并揭露与该活动有关的一切联系。责成捷尔任斯基和温什利赫特每周亲自就此问题向政治局报告。

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此问题举行秘密会议由全体代表或几乎全体代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司法人民委员部和革命法庭的主要工作人员参加^⑩。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代表大会的秘密决定，确认没收珍宝，特别是没收最富有的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堂的珍宝应坚决无情，一无例外，毫不手软，并在最短期间内实现。我们能根据这一理由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正是在现在应该教训这些人，使他们今后几十年中再也不敢妄想对抗。

为了监督最迅速最成功地实施这些措施，应在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立即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和加里宁同志必须参加该委员会，但关于该委员会不发布任何消息，目的是要保证实施由该委员会指挥的一切行动，并且这些行动不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而是以全苏维埃、全党的名义进行。要任命特别负责的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来在最富有的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堂里推行这项措施。

列 宁

1922年3月19日

请莫洛托夫同志设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员传阅（不要复制抄件），并请他们阅后立即退给书记，并附上简短的意见，说明每位政治局委员是否基本同意或者此信引起了哪些分歧意见。

列 宁

1922年3月19日

①加里宁，米·伊·（1875～1946），1898年入党，从1919年3月起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起任党中央委员，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②在文献上只有维·米·莫洛托夫的批语：“同意，但我建议相应集中人力和党的注意力，不在所有的省份和城市，而只在确实有大量珍宝的省份和城市开展运动。维·莫洛托夫3月19日”。

③1922年3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0号公布了1922年3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政府公报《关于舒亚城没收教会珍宝引起的事件》。公报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经过并对事件作了评价。公报特别指出，1922年3月3日，舒亚县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2年2月23日的法令《关于没收由教徒集团所掌管的教会珍宝的办法》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同一天发布的实施法令的细则（见1922年2月26日和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6号和47号）的要求建立工作委员会。这个工作委员在没收了三个小教堂的珍宝后，于1922年3月13日来到大教堂，但是在这里遇到了群情激愤的教徒，决定改在3月15日进行没收工作。3月14日工作委员会在平静的气氛把犹太教堂的珍宝造册登记。3月15日在大教堂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走近来的骑警（6名骑手）遭到了人们的威吓，人们向他们投掷石头和劈柴。钟楼上敲起了钟。接着开来了第146步兵团的半连人和两辆架着机枪的汽车。人群中有人开手枪，他们企图包围这半连人，于是红军战士根据班长的命令朝天开枪，

但这样做无济于事，第二排枪朝人群打去，人群就四下跑开。4人被打死，10人受伤（都是轻伤，有些是被人眼中的某些人用手枪击伤的）。傍晚，逮捕了在广场上就受到注意的商人、教师等。同一天晚上，教徒代表把从大教堂的珍宝中取出的3.5普特银子交县执行委员会。3月23日，县工作委员会、教徒代表在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着手没收大教堂的珍宝。将近10普特的银器交给了县财政局；宝石、珍珠法衣和其他珍宝则交国家珍品库收藏。所有没收的东西都由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专门造册登记。

④1922年3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建议，派遣由彼·格·斯米多维奇（代主席）、尼·伊·穆拉洛夫和伊·伊·库图佐夫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去舒亚城。3月21日，工作委员会抵达该城，3月23日工作委员会结束工作，得出如下结论：“（1）认为县工作委员会没收教会珍宝的行动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的。（2）认为地方当局的行动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在没收珍宝的准备工作以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不够有力，缺乏计划性。（3）建议没收珍宝工作委员会立即结束此项工作。（4）建议省和县的政权机关采取措施，仔细侦查在没收珍宝过程中出现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弄清对抗政权机关和攻击红军战士及民警的肇事人员，以惩效尤”。

3月20日，在有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莫洛托夫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没收教会珍宝的指示草案，草案经修改后被通过：

“（1）在中央和各省按莫斯科的萨普龙诺夫—温什利赫特工作委员会的形式建立没收珍宝的秘密领导工作委员会。所有这些工作委员会都必须有省委书记或鼓动宣传部部长参加。

附注：最重要的省份要确定尽快的没收期限，在不太重要的省份里可以放后一些，等彼得格勒和其他中部省份没收珍宝的消息已经在全国传开之后进行。

（2）中央工作委员会应由加里宁同志任主席，雅柯夫列夫和萨普龙诺夫（萨普龙诺夫同志外出后应由别洛博罗多夫同志代替他参加委员会的工

作，别洛博罗多夫应不迟于星期三，3月22日，熟悉全部情况）、温什利赫特同志、克拉西科夫（副手加尔金）、维诺库罗夫、巴济列维奇参加。工作委员会应设每天工作的常务小组（雅柯夫列夫、萨普龙诺夫（副手别洛博罗多夫）、温什利赫特、加尔金）。工作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托洛茨基同志参加。

(3) 在各省省委、可吸收师、旅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参加工作委员会。

(4) 除了这些秘密的准备工作委员会，还在赈济饥民委员会下设立正式的工作委员会或工作处，从事正式接收珍宝，与教徒集团谈判等工作。要严格注意构成这些正式的工作委员会的人员的民族成分，防止为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提供口实。

(5) 每一个省确定一个非正式的没收珍宝鼓动筹备周（当然这样的周不要公开宣布）。为此要挑选优秀的鼓动员，尤其是军人，鼓动要具有完全是为赈济饥民的性质，而不是任何反宗教反教会的性质。

(6) 同时要分化神职人员，在这方面要坚决主动，国家政权保护公开支持没收珍宝的神甫。

(7) 当然，我们的鼓动和守法神甫的鼓动绝对不应混为一谈，但我们在鼓动时要指出，大部分神职人员反对那些灭绝人性、贪得无厌的‘教会王公’们对待珍宝所持的罪恶的吝啬态度。

(8)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鼓动周中，必须保证充分掌握神职人员、教徒等不同集团中发生的一切情况。

(9) 一旦发现资产阶级商人、旧官吏等在策划行动，应逮捕其中的首要分子，必要时，尤其是当黑帮鼓动过分猖獗时，应组织有卫戍部队参加的武装示威游行，举的标语为“教会珍宝用于抢救饥民”等等。

(10) 在运动结束前，应尽可能不去触动著名的神甫，但是可以不公开地正式警告他们（通过省政治部要他们签字承认已接到警告），一旦出现破坏社会秩序的冲突事件，首先唯他们是问。

(11) 除鼓动工作外，还要做组织工作：为登记和没收珍宝要准备好相应的工作人员，以期此项工作能在最短期间内结束。没收工作最好从守法的神甫掌握的教堂开始。如果没有这样的教堂，那就从最重要的寺院开始，首先

要仔细地作好各种细节的准备（共产党员要把守各相邻的街道但不准聚集，可靠的人员，最好是特种任务部队应驻守在附近等等）。

（12）有可能的话，各地应让饥民代表去教堂、参加会议和进入军营，提出尽快没收珍宝的要求。

（13）在各省和中央允许守法的神职人员代表与赈济饥民委员会所进行的没收教会珍宝的登记工作，要广泛宣传，说明居民将完全有可能监督此项工作，决不让教会财富有一点一滴用于赈济饥民之外的其他用途。

（14）如有教徒集团提议赎买珍宝，可以告诉他们，这些问题将由中央赈济饥民委员会研究，与此同时决不停止没收珍宝的工作。外省的经验表明，这样的谈判毫无赎买的诚意，只会使事态捉摸不定，使人们丧失斗志。

（15）莫斯科的工作应按既定程序进行，没收珍宝的工作不得迟于3月31日开始。

（16）我认为也可以在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商量后为彼得格勒规定一个大致相仿的期限，决不让运动匆匆走过场，只要整个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有保证，就要采用武力。

（17）至于各省的工作，则省委应根据本指示，参考莫斯科规定的期限，在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监督下规定各省自己的期限，一方面，要保证准备工作做得仔细，另一方面，决不使此项工作多推迟一天，而且最重要的省份要走在前头。”

政治局决定将指示下发给各省委。

⑤罗斯塔社的消息没有找到。根据彼得格勒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条消息指的是以维尼阿明都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策划对抗没收教会珍宝的工作委员会的活动。由于他们的活动，在喀山大教堂、悲哀的圣母教堂、彼得格勒区弗拉基米尔大教堂、博罗瓦亚的波克罗夫教堂等附近都发生了反苏维埃的活动。一些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和个别试图平息群众情绪的公民被人痛打，有的还被打伤。

⑥吉洪（别拉温，B. H.）（1865~1925），1891年当修道士，1917年任莫斯科都主教。1917年11月5（18）日在第一届全俄地区主教会议上当选为

全俄大牧首。1922年受审判，被软禁在顿斯科伊修道院。1923年5月，由“革新派教徒”召开的第二届全俄地区主教会议剥夺了他的全俄大牧首教职，但是吉洪及其周围的人不承认这个决定。1923年6月16日，吉洪在给最高法院的信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请求赦免。1924年3月2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中止吉洪的案件。

⑦指根据1922年3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出的电报：“政治局在与没收教会珍宝工作有关的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没收教会珍宝的组织工作尚未准备好，至少在某些地方应暂缓进行”。

⑧见注4。

⑨在对舒亚城事件的审理过程中，查明反苏维埃活动是由司祭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斯韦托扎罗夫、拉甫罗夫和斯梅利恰科夫，教堂长老帕拉莫诺夫，商人波赫列布金和阿法纳西耶夫，原房产主科科夫尼科夫和社会革命党人亚瑟科夫等人策划和领导的。

⑩莫斯科组织反苏维埃活动的受到法庭的审判，1922年5月8日法庭判处11人（神甫、监督司祭和公民）以极刑，4人监禁5年，13人监禁3年，10人监禁1年；14人被释放。同一天列·波·加米涅夫向政治局提出撤销法庭判决的问题。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同意他的意见。被判处极刑的被告向最高法庭的终审上诉部上诉，终审上诉部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减轻对被告的判决。1922年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被告的上诉：并决定：“拒绝被告神甫赫里斯托夫·纳杰日金、华西里·索科洛夫、马卡里·捷列金、谢尔盖·季霍米罗夫和亚历山大·扎奥泽尔斯基的请示并维持革命法庭的原判。对其他6名被处以极刑的被告，将革命法庭的原判改为剥夺自由5年”。

1922年5月11日，加米涅夫再次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关于赦免被告的问题；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A）中止执行判决；（B）责成托洛茨基同志于5月12日傍晚前弄清情况并向政治局提出书面建议”。1922年5月14日，托洛茨基提交了他的结论性意见，其中没有材料表明可以减轻对前5名被告的判决。对另外6名被告减刑的根据，“完全是考虑到尽可能少地损害判决的实质（这个判决对这11个人来说都是正确的），尽

可能满足进步的神职人员的请求”。1922年5月1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结论性意见。

①1922年3月25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日程；列宁提出的问题未被列入日程。在代表大会的文献中没有发现有关这一会议的材料。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1922年3月27日到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07318

**俄共（布）中央关于暂停没收
教会贵重财物的密电**

（1922年3月19日）

鉴于因没收教会贵重财物产生的复杂情况，中央要求，在接到中央专门通知之前，暂停没收教会贵重财物。当前，应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准备性和解释性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央将于3月20日发出补充指示。

俄共（布）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05066

温什利赫特《关于宗教界由于没收教会珍品而进行活动》的报告

(1922年3月20日)

吉洪大牧首和他周围一伙高层人士，即以下列人员为代表的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哈托维茨基的大司祭格罗莫格拉索夫（最高会议非正式成员）、都主教尼堪德尔（世俗姓菲诺明诺夫）、主教谢拉菲姆、神学教授拉宾及其他人，从事与1922年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没收教会珍品的决议相对立的具有反革命性质的活动，从事毫不隐蔽的反对没收教会珍品的活动，他们的活动表现在：

1. 私下指导他们熟悉的地方上的教徒们反对没收教会珍品。
2. 向各地方寄送指示，号召阻止收集教会珍品，而且这些指示都具有伪装性质（寄送教会法规和所谓《神父格言》）。
3. 在莫斯科召开宗教界秘密会议，会上东正教最高会议一些成员建议宗教界人士发动群众来反对没收教会珍品（据情报）。
4. 在东正教最高会议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据情报）：宗教界人士不公开反对没收教会的珍品，而是让忠于他们的信教群众来做，好像是信教群众根据个人意向来反对没收教会珍品的。

国家保安局根据情报判明：某些地方高级僧侣站在反对东正教最高会议反动的一伙人的立场上，他们由于教规和其他原因无法激烈地反对自己的上层，因此他们认为，把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成员逮

捕起来就使他们有可能举行宗教会议，在会上他们可以选举更加忠于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担任大牧首的职务并进入最高会议。

国家保安局及其地方机构有足够的根据逮捕吉洪和东正教最高会议一些最反动的成员。

国家保安局认为：1. 现在逮捕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和大牧首是适时的。2. 允许召开宗教会议来选举新的东正教最高会议和大牧首现在也是可能的。3. 必须将所有强烈反对没收教会珍品的神甫和教徒送往饥饿的波沃尔日耶最饥饿的地区去，在那里将他们作为人民的敌人在当地饥饿的居民面前示众。

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 温什利赫特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密事务处处长 萨姆索诺夫

№050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5次会议
纪要的附件——根据《关于宗教界由于没收教会
珍贵物品而进行活动》中第12条做出的决定**

（1922年3月22日）

1. 逮捕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和大牧首是必须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大约再过10~15天。
2. 公布关于舒亚城的材料，将舒亚城有罪行的牧师和在家人在一个星期内送上法庭（枪毙领头人）。
3. 也是在这个星期内把偷盗、侵吞教会珍品的牧师（这样的事实不少）提起诉讼。
4. 在报道斯摩棱斯克、彼得堡和其他地方暴乱的牧师们的图谋之后，报刊在公布舒亚城事件时也应使用猛烈的言词。
5. 在这之后逮捕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
6. 着手在全国对珍贵物品不多而完全没有进行没收的教堂进行没收。

№05068

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关于 舒亚城事件给托洛茨基的报告

(1922年3月22日)

致俄罗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

我补充斯米多维奇同志关于舒亚城事件的报告：

1. 县军事指挥官丘列涅夫召集了以营长助理托伊采夫同志率领的 146 步兵团的半个营，在路上（大教堂周围）遇到 3000 人，于是在离最近的人群 40 步的地方停下来。在人群不听从散开的命令之后，部队组成散兵线并卧倒。人群中开始传来叫喊声：“跑到我们这边来吧，保卫教堂”。接着向士兵们投掷石块和木棍并且向这半个营靠近。扎伊采夫同志想吓吓人群（人群主要由妇女和孩子组成，有几个男人在人群中奔跑着，叫喊着忙个不停），下令朝天开枪，人群向士兵们快速跑去，并把石块和粗棍子掷向他们。在向士兵们靠近时，人群中响起几声枪声，人群挤压士兵们，于是县军事委员会叫来装有机枪的两辆卡车助阵。这两辆卡车射击大教堂的钟楼，因为那里不停地敲打着钟声，射击以后钟楼的钟声停止了，人群开始散开。这时机枪手发现有一个人隐藏在水管后，手里拿着枪，正瞄准卡车司机。机枪手一下子便把这个人打死，不知道被打死的人的姓氏。那枝枪是被打得不省人事的班长阿拉比耶夫同志的。

2. 3月23日白天15时，我召集了第146团第1营的混合连150人，6挺机枪的机枪手、特种任务部队、6名骑兵警察，我用

这些力量封锁整个大教堂和连接大教堂的集市广场，占领了所有通向外界的街道、制高点，预先在上述地带清场，将商贩、游手好闲者等等都赶走，并命令不经我允许谁也不准通行。我亲自向各部队讲解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尽管天气寒冷，服装很差，所有红军战士和指挥员都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命令（他们不仅渴望复仇，而且叫喊着表达了要“打死牧师和投机倒把者”的愿望）。我下达了一个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未经我允许不准射击。我带领红军战士和10名特种任务部队战士，以及从军工厂找来的带着榔头、铁器和其他工具的6名钳工，进了大教堂。我自己在检查了所有岗位以后，留在大教堂。钳工们着手从祭坛“高桌”上拆卸和敲下银子，取得白银4普特30俄磅。委员会（主要是服过苦役的科尼亚耶夫同志，他懂宝石和贵金属）着手从神像身上取下珍贵的衣饰、衣服、钻石等等。

我命令在大教堂的后备队每隔1个半小时轮换一次，目的是要让所有的士兵受到一次我们的力量胜过神父和上帝力量的直观教育，粉碎所有的迷信，如果这样的迷信在士兵中还存在的话。

在没收了所有必需的珍品并把它们装上卡车送往财政局以后（这一行动从15时持续到20时30分），我把所有部队集合到大教堂，再一次解释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还指出大概的价值和我们用这些珍宝可换多少粮食。

这以后，各部队排成纵队，在城里的街上唱着歌走回军营。

3. 在检查3月15日那天事件中军事机构人员的行动时，我发现了某些技术上的不正确性，当场向县军事委员会，还有连指挥官指出，此外还将在我们的命令中向各军区下达。

4. 预先向第146团的一个营通报了决议的内容和城里某些分子的情绪，团政委莫罗佐夫同志在3月14日举行的营全体会议上向全体士兵解释了决议的意义。还是莫罗佐夫同志，在3月15日

向负责驱散人群的半个连解释了任务。那天团长鲍戈莫洛夫同志不在（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去察看第二营了）。

5. 工人群众很少了解决议的内容，也很少了解无论如何要没收珍贵物品的必要性。关于这一问题没有举行过任何集会。

6. 逮捕进行得粗心大意：对任何被捕的人没有及时加以搜查。

7. 在被捕者中有几个突出的人物：投机倒把分子波赫列勃金、小业主亚齐科夫和神甫斯维托扎罗夫。其余一些家伙（男教师、女教师等人）不过是表示不满和没有口粮的居民。

8. 存在着明显的我们所熟悉的狂喊乱叫，妇女、农民和小市民的迷信、无知，这些都得到神甫们和地方上的社会革命党分子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支持。我们质问神甫：他们，宣扬要爱他人的人，自己却从没有在读经台和报刊上宣布没收珍宝是无可怀疑的。他们温顺地回答说：没有收到地方当局有关这一问题的命令。

在舒亚有谣传说，委员会主席维津同志力图从圣母身上取下衣饰，但是无论他怎样用劲，都取不下来，他浑身是汗，两只手变成了鞭子。圣母就是希望他这样。

3月23日的行动，以及钳工们、士兵们和其他渎神者在舒亚采取的行动，驳斥了所有这些迷信的谣言。

在地方上的所有委员会中，必须让部队长官的代表成为它们的成员。通知各地行动要有分寸，事先要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要坚决地、无情地没收最大限度数量的珍贵物品。

莫斯科军区司令 H. 穆拉洛夫

№07319

俄共（布）中央关于成立领导
没收教会贵重财物的秘密
委员会的密电

（1922年3月23日）

绝密

现将3月20日俄共中央决议通知你们，作为今年3月19日电报的补充，望你们立即无条件执行。

第一，立即在各省成立领导没收贵重财物的秘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必须包括州委书记或者宣传鼓动部部长，以及各师、旅政委或政治处主任。注意：最重要的省份须确定没收的最近期限，次要省份可稍晚一点，待彼得格勒和中部各省关于没收的消息在全俄罗斯传播之后再定。

第二，在成立这种秘密筹备委员会的同时，建立隶属于赈济饥民委员会的正式的委员会或办事机构，以便通过与教徒团体谈判正常接收贵重财物，等等。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正式的委员会的民族构成不得为沙文主义宣传提供口实。

第三，各省应非正式地组织一个没收贵重财物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准备工作周，尽可能将其与两周的赈济（饥民）活动结合起来。为此，要挑选包括军人在内的最优秀的宣传鼓动人员。宣传鼓动的性质有别于任何一次与宗教和教会的斗争，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救济饥民。与此同时，要分化神职人员，鼓励这方面的坚决倡议，并把

那些公开支持没收工作的神甫置于国家政权的保护之下……

第四，……在必要的时候，特别是在黑帮分子的宣传走得太远的情况下，要组织示威游行并应有全副武装的警备部队参加，游行队伍要高举“教会贵重财物用于拯救饥民生命”等内容的标语。尽可能不触动著名神甫，但要正式警告他们（由省政治部签字），如果发生某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首先要由他们负责。

第五，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时，要进行组织工作：筹建相应的机关登记被没收的贵重财物，并且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没收工作最好从某个由奉公守法的神甫主持的教堂开始。如果没有这样的神甫，那就从最知名的教堂开始，认真做好一切细节准备（共产党员应该到附近各街道去，不让人群聚集，可靠的部队——最好是特种任务部队——应部署在附近，等等）。没收贵重财物的工作应先从城市教堂开始，拿最富有的教堂开刀。对农民的教堂和贫穷教区的教堂应持谨慎态度，仔细摸清全部情况。在各省和中央，当赈济饥民委员会登记被没收的教堂贵重财物时，应让奉公守法的神职人员代表参加，并广泛宣传：居民完全可以监督，使教会财产全部用于帮助饥民，一丝一毫不被挪作它用。

第六，在条件具备或准备工作充分、没收贵重财物时不会出现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省和县，没收工作可自始至终由俄共（布）州党委领导并负责……

第八，中央重申，所有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绝对秘密地进行。应定时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行动日期和采取的措施。

俄共（布）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加密 奥斯特琳娜

№05069

国家政治保卫局致大牧首吉洪的 正式书面警告

(1922年3月28日)

在舒亚，一些阴暗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其所处的教会高层等级的地位，在关于从教会没收国家财产问题上，公开地与政府机关的法律措施相对抗，力图在群众中燃起宗教狂热。为了预防类似舒亚事件的重演，国家政治保卫局警告以大牧首吉洪（别拉文公民）为代表的宗教上层，如果这些宗教上层不以他们可以支配的手段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来自他们领导的宗教界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的非法对抗，制止来自教会方面的阻挠，撑腰的正是并以这一等级本身发出的呼吁书（见1922年3月15/28日大牧首的呼吁书）及其他指示撑他们的腰，那么，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政法机关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而且，流血、暴乱、对抗政府的责任首先将落在主持教会政策的那些人的身上。政府知道，在等级关系上从属于最高教会机构的卡尔洛瓦茨^①宗教会议那些在国外的主教、大司祭和僧侣集团，在自己的计划和意图里公开宣布无论如何要使俄罗斯陷入新的内战，目的在于恢复帝制和罗曼诺夫王朝。大牧首吉洪和他的同事们完全知道这些阴谋家在做什么。卡尔洛瓦茨宗教会议在安东尼主教的主持下印制和公布了会议记录和号召书。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与对工人和农民有致命后果的、与国家最不共戴天的敌

^① 塞尔维亚的城市，俄国东正教国外教会的最高机构设在这里。

人联合起来的俄罗斯教会上层的反革命政策作斗争，政府要求作为对所有宗教等级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别拉文公民明确地和公开地确定自己对反革命阴谋的态度，而领导这一阴谋的正是由他管辖的宗教等级。

№05070

大牧首吉洪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声明

(1922年4月5日)

致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迄今没有收到昨天答应给我的公文的情况下，我对今年3月31日我的说明作如下声明：

1. 作为宗教界的政治行动卡尔洛瓦茨宗教会议关于恢复罗曼诺夫王朝的决定，与我1919年9月25日致俄罗斯教会的号召书是不符合的，我谴责这一行动。

2. 在2月15日关于没收教会珍贵物品问题的信里，我根本没有号召信教群众去对抗当局，如果什么地方作这样理解的话，那是不正确的。思想健全的人不是这样来看待这封信的。例如，都主教谢尔盖在3月8/21日的呼吁书里附带写道：“因此，大牧首在自己的信里向我们指出不准将至圣的日常使用的器皿捐出以破坏教规，没有一个词是号召我们去采取某种行动，既不是抗议，更不是要用暴力去保卫我们的圣物。他的信只是告诫我们要以轻松的心情来对待没收教会的东西，也就是在我们身边还留有一些私人的珍贵物品，有东西可替换教会的东西。”

关于帮助饥饿者和关于在这一事情上使用教会的贵重物品我在昨天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M.И.加里宁的信^①中已经说了。

大牧首吉洪（瓦西里·别拉文）

^① 见本卷第№05064号文件。

№05071

大牧首吉洪致主教管辖区 高级僧侣们的呼吁书草稿

(1922年4月8日)

我们得悉，贯彻关于没收教会珍贵物品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伴随着非常不良的现象。无疑，受到关于教堂属于上帝的热情所怂恿而又不能正确理解这种热情的教民，积极地与当局的代表相对抗，而且有时这种对抗采取了直接暴力，甚至流血的形式。未必需要提醒，所有类似的行动，都是与基督教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我坚决谴责这样做的任何教唆行为。与此同时，我认为应及时警告并反对这样一些现象，即各种各样负有责任的人利用东正教群众被挑动起来的情绪，并把这种愤激情绪引向反对某一民族，例如犹太民族。顺便说一下，对于这样的反民族行动，在1919年7月份出版的我的信里已加以谴责。

现在我请主教管辖区的高级僧侣向他们所管辖的牧师们和教徒们阐述包含上述精神的大主教们的指示，千方百计警告他们反对不可容忍的行动，并促使他们力所能及地帮助饥饿者，特别要告诫那些人，他们过份的热情有时会导致完全拒绝用分出一点教会财产的办法帮助饥饿者。对在此之后不服从自己教区领导指示的那些人，应当采取大主教认为有影响力的措施。

大牧首吉洪（瓦西利·别拉文）

№05091

科斯特罗马省执委会司法局致司法
人民委员部第8局关于没收科斯特
罗马市各教堂珍贵物品的汇报

(1922年4月11日)

致司法人民委员部第8局

(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厦)

本局报告, 由以下代表, 即沃罗宁同志、省财政局谢尔盖耶夫同志、省执委会奥尔列安斯基同志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马卡罗夫同志组成的省委员会从3月3日开始没收教堂的珍贵物品。

从上述时间到今年4月8日没收的物品有:

1. 从前伊帕委耶夫斯基修道院教堂里没收的物品 (第3号联合决议):

赤金, 36 俄磅。20 左洛特尼克, 69 多利亚^①。

白银, 12 普特^② 29 俄磅 19 左洛特尼克 77 多利亚。

钻石, 135 颗。

小钻石, 276 颗。

金钢钻, 33 颗。

珍珠连同衣饰, 8 俄磅 85 左洛特尼克 25 多利亚。

① 1 俄磅相当于 409.5 克; 1 左洛特尼克相当于 4.26 克; 1 多利亚相当于 44.43 毫克。1 俄磅又相当于 96 左洛特尼克, 9216 多利亚。

② 1 普特相当于 16.38 公斤。

珍珠散粒，658 颗和 3 颗分成两半的。

紫晶，17 颗。

宝石，112 颗，宝石的硬层 8 颗。

石榴石（维尼斯），27 颗

纯绿宝石（祖母绿）184 颗和祖母绿 1 颗。

大圆珍珠，116 颗。

石榴石，26 颗。

黄玉，39 颗。

红宝石，27 颗。

绿松石，1036 颗。

贵榴石，12 颗。

水晶，4 颗。

深红色宝石，49 颗。

光玉髓，5 颗。

尖晶石，118 颗。

碧玉，2 颗。

飞轮，1 只。

卡菲姆珠宝，1 颗。

兽铗，1 只。

珍珠贝，2 颗。

蓝宝石，1 颗。

海蓝宝石，18 颗。

由珍珠、绿松石和石榴石装饰的金冠，9 只。

装饰有珍珠的祭服，重 6 俄磅 54 左洛特尼克。

两件饰有珍珠的主教法衣的披肩，重 5 俄磅 72 左洛特尼克。

饰有珍珠的长巾、菱形锦缎胸巾、腰带和锦缎套袖，总重 2 俄磅 4 左洛特尼克。

饰有珍珠的三块罩布和饰有小珊瑚的圣像及衣饰；2本镶银福音书，总重1普特28俄磅48左洛特尼克和32俄磅60左洛特尼克。

2. 从卡菲德拉大教堂没收的物品：

纯度92%和94%的黄金，38俄磅73左洛特尼克。

白银，55普特39俄磅63左洛特尼克46多利亚。

钻石，1424颗。

小钻石，1198颗。

金刚石，756颗。

小金刚石，360颗。

紫晶，95颗。

石榴石，515颗。

红宝石（石英玻璃的和尖晶石）8颗。

海蓝宝石，41颗。

光玉髓，1颗。

黄玉，7颗。

纯绿宝石，138颗。

蓝宝石，58颗。

红锆石，4颗。

珍珠，567颗。

蛋白石，2颗。

大圆珍珠，54颗。

绿松石，34颗。

石榴石，155颗。

粗宝石，3颗。

宝石，102颗。

深红色宝石，1颗。

浅蓝色宝石，2颗。

红宝石，30 颗。

深红色宝石，4 颗。

衣饰上的珍珠宝石，13 俄磅 77 左洛特尼克 36 多利亚。

银质边框上饰有标记的金冠 16 只，其中 3 只饰有珍珠和贵重宝石，6 块金币，价值 35 卢布，银币，价值 15 卢布 50 戈比。

3. 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教堂没收的物品：

白银，2 普特 16 俄磅 60 左洛特尼克。

镶银框的福音书，重 1 普特 9 俄磅 48 左洛特尼克。

镶银边框的十字架，1 俄磅 48 左洛特尼克。

珍珠衣饰，72 左洛特尼克。

4. 从阿列克谢耶夫教堂没收的物品：

白银，2 普特 19 俄磅 67 左洛特尼克。

镶银边框的福音书，19 俄磅 15 左洛特尼克。

(根据登记的清单其白银的重量为 6 俄磅 43 左洛特尼克。)

5. 从鲍戈奥卓夫教堂没收的物品：

白银，1 普特 5 俄磅 40 左洛特尼克。

黄金，贴身戴的十字架，30 多利亚。

银边框的福音书，19 俄磅 24 左洛特尼克。

3 枚银边框的十字架，5 俄磅 40 左洛特尼克。

6. 从鲍戈斯洛夫教堂没收的物品：

白银，2 普特 33 俄磅 32 左洛特尼克

饰有珍珠的金冠。

7. 从沃兹涅辛斯基教堂没收的物品：

白银，1 普特 6 俄磅 49 左洛特尼克。

珍珠，205 颗。

玻璃器皿，一只。

白水宝石，2 颗。

彩色宝石，3颗。

8. 从商场里的斯帕斯教堂没收的物品：

白银，1普特05俄磅。

石榴石（小的），71颗。

小绿松石，186颗。

宝石，23颗。

紫晶，2颗。

黄玉，3颗。

9. 从彼德罗巴甫洛夫斯基教堂没收的物品：

黄金，19左洛特尼克36多利亚。

白银，3普特10俄磅53左洛特尼克。

钻石，4颗。

蓝宝石，5颗。还有十字架上的小钻石、3颗小珍珠。

石榴石，4颗。

4月8日一共没收：黄金，1普特35俄磅18左洛特尼克19多利亚；白银，82普特37俄磅95左洛特尼克27多利亚。

附注：1. 上述黄金的重量不包括一只祭杯还有几块宝石边框上的黄金。

2. 上述物品中的宝石没有没收。

对信教者采取了预防措施，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更没有发生冲突性事件。

省司法局局长 苏霍夫
珍贵物品局局长（签名）^①
秘书（签名）^②

① 此处签名难以辨认。

② 同注①。

№0509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关于在贯彻
中央执委会没收珍贵物品决议中和
宗教界领导人加强斗争的通知**

(1922年4月25日)

致所有的省最高法院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向法庭主席个人下达如下建议：

1. 密切地注视与没收教会珍品相联系的即将发生的犯罪案件，诸如：抗拒、偷盗、隐藏、假装偷走、藏匿清单和文件及其他等。

2. 在执行全俄中央执委会关于没收珍品的决议，并对反抗采取措施时，在反革命分子唆使群众抗拒的情况下，首先要侦查当地宗教界领导层，以在宗教借口下自觉地进行反政府鼓动的罪名，把他们送上法庭，尽管没有他们积极参与的罪证。

3. 在裁决关于偷盗、不加保护、隐藏教会珍品，其后果导致国家财产受损失时，以没收作为惩罚。

4. 只要在案件中发现可能有思想上的领导者（大牧首吉洪、都主教维尼阿明等等）或纵容者的情况，在判决时就应指出，知识分子罪案中存在着来自高层教会人物（大牧首吉洪、地方主教等等）为代表的破坏秩序的行为。

5. 判决的副本送司法人民委员部第8局克拉西科夫同志。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院司法副督察长 罗贡斯基

指导监察部副部长 科尔恰金

№0507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第5次会议记录摘要

（1922年5月4日）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斯大林同志、加米涅夫同志、季诺维耶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同志、加里宁同志；中央委员伏龙芝同志。

听取：议程六，关于因没收贵重物品引起的莫斯科诉讼程序（托洛茨基同志、加米涅夫同志、别克同志）。

决议：一、给莫斯科法庭指示：

1. 立即对吉洪起诉。
2. 对一些教士处以极刑。

二、鉴于莫斯科诉讼程序在报刊上反映不够，责成托洛茨基同志以政治局名义今天就向所有莫斯科报纸的编辑们发布指示，要他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一诉讼程序，弄清教会上层所起的作用。

№05093

**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司第 6 特别处
关于没收教会珍贵物品的汇报**

(1922 年 5 月 6 日)

第 27 号

绝密

中央各省：

来自特维尔，第 748 号/电，1922 年 5 月 3 日。从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在科尔切沃没收的珍贵物品：2 普特 12 俄磅 64 左洛特尼克白银，黄金没有。从托尔若克没收 23 普特 38 俄磅 62 左洛特尼克 78 多利亚白银，黄金没有。21 枚钻石、2 个花圈、绣花天鹅绒、一些珍珠。从行动开始没收：146 普特 27 俄磅 3 左洛特尼克 70 多利亚白银，黄金 3 俄磅 1 左洛特尼克 14 多利亚。各地进行得很平静。托尔若克城已结束，正着手在县里进行。

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第 814 号电，1922 年 4 月 29 日。报告，迄今没有发现教会工作人员侵占和隐藏教会珍品情况。谢尔加契县发生宗教界企图阻挠没收的情况，这一企图被制止了，正在进行侦查，其结果另行报告。

来自坦波夫，第 3200 号电，1922 年 5 月 2。报告：今年 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来自坦波夫，第 3233 号电，1922 年 5 月 2 日。报告：已经过去的今年 5 月 2 日一昼夜内没有发现特别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来自坦波夫，第 1241 号电，1922 年 5 月 2 日在舍茨克县别洛

列契伊村没收教会珍品时发生委员会和部队与由神甫和教会委员会成员领导的一群农民及叫喊的妇女之间发生的冲突。据获得的情报，5月3日20时人群中被打死1人，伤3人。部队中有一个公社社员因枪击受轻伤。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部队离开了村子，只是在为保护自己才向狂怒的并夺取机枪的人群开了枪。我们采取了紧急措施制止暴动，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肇事者和挑唆者被抓起来，并将在一星期内交付巡回革命法庭。

来自雷宾斯克，第176号电，1922年5月3日。1922年5月2日雷宾斯克省政治处从沃洛达尔斯克的波舍洪城的修道院里没收了白银11俄磅54左洛特尼克。同时从城市的教堂里没收了白银15俄磅85左洛特尼克。没有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

北方边区：

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第560/111号电，1922年5月2日在奥涅什县一些公民在人口处拒绝把25件银器交出来；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殴打乡执行委员会主席，因为他号召没收。普里杜茨克行政区波利、密季尤什、下奥泽尔乡教堂只有通常的三分之一贵重品，由于数量不多，县委员会取消没收行动。其余各县没有报告。

来自彼得罗扎沃茨克，第124号/C电，1922年4月30日。在洛杰伊·波列城没收珍品的行动已结束。共没收4普特6俄磅23左洛特尼克贵重物品，其中黄金6左洛特尼克84多利亚。没有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关于其他一些县的情况以后陆续报告。

来自彼得罗扎沃茨克，第274/189号C电，1922年5月2日。在沃兹涅辛斯克区奥什坚村发现商人分子的组织，目的在于破坏对教会珍品的没收。在洛德波列没收教会珍品的行动已结束。总共没收贵重物品4普特21俄磅24左洛特尼克，其中黄金6左洛特尼克84多利亚。在其他县里预计5月5日结束，没有发生抢劫事件。

西部边区：

来自戈梅利，第 480/111 电，1922 年 5 月 2 日。在戈梅利犹太教堂没收珍贵物品的行动于 4 月 28 日结束。一切进行得很平静，没有导致严重后果。4 月 26 日开始在东正教教堂没收，先从戈梅利大教堂开始没收，然后在其他教堂没收。4 月 2 日在戈梅利没收行动结束；4 月 2 日从天主教教堂进行没收，没有天主教教士参加，他们躲起来了。没收的数量正在计算。所有没收来的东西保存在省财政局。没收在所有教堂进行，除两所铁路教堂外，进行得很平静。在乌斯宾斯基和尼古拉耶夫的铁路教堂里聚集了一群妇女和儿童，力图阻挠这一工作，但因采取了保卫措施，没收行动没有导致严重后果。上述群众的情绪与其说敌对，不如说好奇。在没收行动中，没有对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任何抗议。现报告：城里工作是有分寸和坚定的。自然，委员会没有伤及信教者的宗教感情。只留下了一套供桌上用的器具，因没有这套东西就无法进行祈祷仪式。其他东西，包括圣像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被没收了。在大多数教堂里，信教群众提出请求替换祭神的器皿和其他贵重东西。委员会估计信教群众中很少有人希望将它们赎买，对替换也不寄予希望。请下令将没收的东西送到莫斯科，从而打消他们把已没收的东西再归还的希望。没收的东西达 8 普特。在省属各县里，所有犹太教堂的没收工作已经结束。在城市，教堂没收工作已结束的有：塔特契里科沃、佩霍沃、克列切沃、克林齐，正在结束的是莫基列沃。没有发生争执。在地方上，信教群众和宗教界的态度消极。在罗加契沃没收正在结束，但是尽管有通过的关于没收的决议，信教群众们情绪还是反对没收，但没有发生争执。其他县 4 月 28 日开始在教堂没收。在基列夫斯基、戈梅利县，从乡里派出了委员会。在其他县，关于乡里的工作没有报告。总的来说，城里信教群众的情绪冷淡、农民

消极、宗教界除不多的人外，都隐藏着敌对情绪。数字资料将再作补充报告。没收的详细报告以后再送上。解密器交给戈赫朗的巴齐列维奇。

东南边区：

来自工人总联合会、北高加索军区，第 1170/111 号电，1922 年 5 月 2 日。4 月 25 至 27 日的综合报告。顿河地区。在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很平静。工厂的工人们通过了决议，并立即开始没收费重物品，但汽车修理厂除外，那里的工人们声称：“没有我们参加就开始没收，那你们就继续自己的事情吧，现在没有什么好问的。”估计这可能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正在进行分析。在巴塔伊斯克黑色百人团分子^①散发传单，其意思是“别去帮助犹太沙皇，挨饿的只是俄罗斯人民，而犹太人把好东西抢来归自己。在国外的人们，我们帮助他们和犹太人与共产党人作斗争。”复活节很平静，5 月 2 日委员会着手工作。在库班切尔地区拉宾村，信教群众自愿捐出银器 10 俄磅 4 左洛特尼克，在普里莫尔-阿巴季索村没收白银 21 俄磅 1 左洛特尼克 50 多利亚。居民的情绪还过得去。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情绪也完全过得去。在所有省份里工作进行得很平静，没有人鼓动反对，也没有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节日过得很平静，没收的结果我们将详告。

来自皮亚季戈尔斯克，第 255/111 号电，1922 年 5 月 3 日。在捷列克省，报纸关于没收珍品的宣传运动刚开始，没收还未进行。没收晚的原因是在于一系列当地的条件，特别是强盗、土匪的活动。

^① 黑色百人团系反革命的黑帮组织。

普里沃尔什耶：

来自切博克萨雷。第 32 号电，1922 年 5 月 2 日，过去一昼夜这一地区没收：白银 3 俄磅 93 左洛特尼克，从行动开始那天起该地区共没收：白银 35 普特 12 俄磅 70 左洛特尼克 42 多利亚。黄金 34 左洛特尼克 57 多利亚。没有来自宗教界的宣传鼓动，伊勃列辛斯基县一些神职人员向居民散发呼吁书，内容如下：“伊勃列辛斯基县可怜的百姓要饿死了，必须紧急和巨大的帮助。基督教徒们，根据基督的遗训别阻挠从自己的教堂里捐赠多余的贵重物品给饥饿者获得面包，成千上万从饥饿死亡线上拯救过来的人对此将永远感谢。”签名：季马什村神甫 C. 叶戈罗夫、霍姆布斯—巴特列瓦村神甫 A. 伊万诺夫、伊勃列西村神甫马克西莫夫。

乌拉尔：

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第 849 号/C 电，1922 年 5 月 2 日。在库尔塔梅舍城及县里，没收进行得很顺利，结果将另作补充报告。在其他县里没收也进行得很平静，例外的是米阿斯。4 月 10 日没收结束，在县里发生了摩擦，宗教界号召像在瑟罗斯坦村和特拉夫尼科夫村那样进行积极的反抗行动，瑟罗斯坦村的一个神甫被捕。第二天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来协调与信教群众的冲突。

来自乌斯秋格，第 155/111 号电，1922 年 5 月 2 日。补充没收和包装工作继续进行，没有特别的变化。

来自斯捷尔利塔马克，第 147/111 号电，1922 年 4 月 29 日。在巴舍勃帕姆戈尔举行了关于没收贵重物品正式委员会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神甫、毛拉和穆夫提^①，还有教会委员会成员和一个信

^① 毛拉和穆夫提均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称呼。

教的群众。一致决定4月25日进行没收，为此决定发表关于自愿交出珍贵物品的致信教群众的呼吁书，确定4月24日举行信教群众的会议。对这方面国家保卫局准备开展情报收集活动。

来自维亚特卡，第307/111号电，1922年5月2日。关于抢劫和隐藏教会珍贵物品的所有情况，我们已经用密码电报向你们作了报告。在没收行动的时间里，全省只提出两起诉讼，第一件是在叶隆斯克城乌斯宾斯基大教堂抢劫银圣像、镶有钻石的金属衣饰和资产登记册。坐上被告席的是助祭菲利莫诺夫、克拉耶夫、梅什金和大司祭米洛斯拉夫斯基。第二件是因在维亚特卡城特里丰诺夫修道院抢劫有金属饰片的圣像和祭神餐具。坐上被告席的是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和助祭，还有一个叫瑟丘戈夫的公民——窝藏者。关于在乌尔日姆县彼得罗夫斯克发生的对抗案件将于近日审理。在没收时省里没有发生其他明显的隐藏或对抗情况。上述诉讼案的起诉书副本和剪报将寄上，关于进一步的情况另再报告。

来自秋明，第1439号/C电，1922年5月2日。行动以下述方式进行：4月27日在三个教堂里举行教民会议，神职人员都表示拥护没收；与会者坚决拒绝选举参加委员会的代表。4月28日着手没收，在两个教堂里没收白银2普特20俄磅，没有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在伊希姆，城里没收教堂贵重物品的工作已结束，进行得很平静。没收到的贵重物品：从鲍戈亚夫林斯基大教堂、格拉多-伊希姆教堂、尼科尔斯基和波兰天主教教堂，共没收到5普特4俄磅12左洛特尼克东西。县里的没收工作尚未开始，正在进行宣传鼓动准备工作。在杜宾斯克乡发现乡党委书记擅自没收珍品的情况，肇事者已被逮捕，送交法庭。在托鲍利斯克，没收阿巴拉克斯基、伊万诺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修道院的珍贵物品进行得很平静，总共没收到20普特35俄磅76左洛特尼克白银，15俄磅82左洛特尼克黄金，379颗宝石，其中29颗是钻石。在奥勃多

尔斯克从两所教堂没收到的贵重物品是 11 普特 5 俄磅白银。在县里，随着没收工作的开始，居民方面没有发现反抗行动，个别别人有些怨言，但没起什么坏作用。在别列佐沃没收工作在城里进行得很平静，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没收了 9 普特 33 俄磅 73 左洛特尼克东西）。4 月 27 日发生一些陌生人以没收珍宝委员会的名义，用欺骗手段抢劫贵重物品——在亚鲁多罗夫县托米洛夫斯克乡罗曼诺夫村，拿走了两只碗、两只盛圣饼的圆盘、两只罩圆盘的罩子、十字架、几只授圣餐的小勺子和 5 只碟子。正在采取措施查明这件事。在秋明，没收工作正在结束，在 5 所教堂和两个祈祷室进行。大部分居民群众的态度是奉公守法的，在作总结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现公开对抗的宣传鼓动。精确的没收数量的资料还没有，下一次综合报告中再汇报全省范围内的数字。

吉尔吉斯边区：

来自阿克秋宾斯克，第 238 号 /C 电，1922 年 4 月 22 日宗教界通过了省委的有苏维埃参加的珍贵物品捐赠的宣传，在阿克秋宾斯克有两个教堂进行没收，没收到 2 俄磅 7 左洛特尼克 25 多利亚白银。各区没有消息报告。没收的东西没有发送，等待中央的命令，贵重物品转运到别的区时没有发生抢劫事件。没有反对没收的宣传鼓动。

来自乌拉尔斯克，第 165 号电。1922 年 4 月 18 日。我们报告，在乌拉尔省由于居民的宗教狂热，即将来临的复活节以及城市附近有一帮活动的匪帮，省执行委员会附属的没收委员会决定在节日过后立即着手没收教会的珍贵物品。没有发生偷盗和隐藏珍品等一类事情。公民公开表示反对没收的，只有在集会上有过一次，但事情并不大。反对没收的宣传鼓动时有发生，省分部正采取措施加以制止，这种宣传表现在散布谣言，说共产党人把收集的珍品打算

一部分用来到国外买粮食给饥民，而大部分则用来支付欠外国的债务，以使政权能保持在自己手里。所有上述情况已经在向党的政治汇报和给国家的综合报告里向你们作了报告。

来自乌拉尔斯克，第190/111号电，1922年4月25日。乌拉尔斯克没收教会珍品的工作是1922年4月24日着手进行的。这一天没有发生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情，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宗教界和教徒们的态度是反苏维埃反党的，对没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都消极地对待，没有发生公开教唆群众、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情况。有情报说宗教界隐藏珍品，一旦证实，将对罪犯予严惩。

来自乌拉尔斯克，第210/111号电，1922年5月2日。在没收珍品期间，从乌拉尔斯克城两个教堂里共没收到：银器164件，重6普特18俄磅89左洛特尼克，还有一些贵重宝石。教会自愿交出45件银器，重量为15俄磅7左洛特尼克。公民捐赠银器2件，重量为16左洛特尼克。没收期间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秩序的情况。

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第475号电，1922年4月28日。关于阿克莫林斯克省没收教会珍品的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这一工作的时候还没有到。已建立的委员会为了顺利贯彻这一工作，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吸收宗教界和部分信教群众的代表充实自己的组织，但是在为此目的而于4月26日专门举行的会议上，宗教界却坚决拒绝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委员会。部分信教群众的代表表示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委员会，代表在全市教区会议上选出。代表应进入委员会。此后将着手进行登记和没收珍贵物品。在4月26日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宗教界和部分信教群众的代表支持大牧首吉洪的立场，即关于没收教会珍品的命令只来自于国家政权，最高宗教大牧首权力机构对此没有发布过指示，尽管人们指出，大牧首就此发布了一系列宗教界关于允许没收教堂珍品的致信教群众的呼吁书。

看来，根据……^① 他说的和写的是那些有祭神意义的珍品。如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规定没收有祭神意义的珍品，那么这规定本身将触及信教群众的感情。“但是既然决定来自政权，我们和宗教界服从这一决定，因为我们说：‘任何政权都来自上帝’。”参加委员会会议的宗教界人士还是表示同意向信教群众作解释，在举行祈祷仪式时没有那些将被没收的东西，他们也能对付过去。宗教界和部分信教群众共同确认了委员会根据阿克莫林斯克省的地理条件制订的工作程序，并发布了由他们签名的对信教群众的呼吁书，呼吁书说明了为饥饿者而交出教会里的珍贵物品的必要性。由于电报中断，县里关于没收珍品工作的情况汇报暂缺。在没收中没有发现破坏社会秩序，不理解等情况；没有发现从宗教界、信教群众和不可靠分子方面发动和教唆群众的情况；没有发现转移和偷盗珍品的情况；没有发现宗教界方面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反对没收的宣传。调查了宗教界人士相互之间的谈话以及反映教会人士个人反对没收珍品的看法。没有发现居民反对没收珍品的现象。

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第 481 号电，1922 年 5 月 2 日。在过去的 4 月 30 日和 5 月 1 日没有发现来自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团体反对没收教会珍品的明显的犯罪和反革命活动，以及发表教唆和煽动群众而需提交司法部门的言论和活动；没有发现来自反苏团伙成员方面旨在反对没收珍品的隐蔽或公开的活动；没有发现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团体方面偷盗和转移珍品的情况。4 月 30 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省执委会决定召开全市会议，会上选举来自信教群众团体的委员成员。宗教界也向教民通报，在 4 月 26 日的会议上他们接受了关于进行没收教会珍品工作的指示。从信教群众中选举了两名代表。在会上，出席的 12 名妇女发出对宗教界人士不满的喊声，

^① 文件原文中以下文字脱漏。

因为有关要进行没收贵重物品的事情以前没有对她们预先说过。人们引证政教分离的决定，对政府在这方面的不正确活动表示不满。对宗教界关于以交出珍品的方式帮助饥民的必要性所作的解释，则指责他们是对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同情。明显的有罪的暴乱……^① 没有发现来自群众的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5月4日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同样在其他县，采取对教会和东正教祭祀的没收行动。由于和县里的电报联系中断情况汇报没有收到。

西伯利亚：

来自托木斯克，第484号/C电，1922年4月23日。在复活节这一星期，托木斯克的教民们以信教群众捐赠的教会帐上的150俄磅白银交换教会的90俄磅银子。暂时只有两所教堂在上述期间在复活节结束前将登记留存的圣像金属衣饰。在马里斯克，从犹太教堂没收了白银13俄磅。在塔伊加城，从所有教堂没收了36俄磅白银；由于村长不在，暂时将流动教堂的金十字架、法衣、用具箱留存。居民对没收的态度平静。

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司第6特别处处长

E. 杜契科夫

^① 文件原文中以下的文字脱漏。

№04700

彼得格勒等地“进步神职人员”团体 致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呼吁书

(1922年5月10日)

致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孩子们

在工农政府同俄国劳动人民的种种敌人进行艰苦英勇斗争的五年里，我们东正教教会对于孩子们为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未来，在战场上、在疾病和饥荒流行的困境中所遭受的苦难及做出的牺牲莫不关心，这是高层神职人员的过失。

教会最高管理者们死心塌地站在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一边，利用他们的职权和职务上的威信控制下层教区会议，要求所辖教徒不支持、不同情参加战斗的人们。

在当前饥荒遍布，几百万公民濒临死亡的艰难岁月里，俄国宗教界的国际资本主义走狗们在国外集会演说，表露他们的潜心意图：以恢复罗曼诺夫家族皇位的名义，幻想把俄国的政权还给地主和资本家；而在国内，通过吉洪大牧首的呼吁书，妄图阻挠没收教会珍品以赈济饥民的行动。他们妄图掀起民众暴乱，借连年饥荒扼杀与他们不共戴天的苏维埃政权。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大多数普通神职人员没有听从他们的煽动，他们的图谋受到人民的谴责。而在面临死亡的人群中，恰是那些想利用人民的灾难来追求政治目的的人没有躲过死亡。

我们几位签名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坚决谴责在国家当局赈济饥民及其他有益劳动人民的创举中组织反抗活动的主教和神甫。

我们认为必须立即召开僧侣代表大会，审判分裂教会的罪人，解决教会管理和建立教会与苏维埃俄国的正常关系问题。

我们号召东正教教会的所有教徒们，神职或世俗的官员们响应我们的呼声，要求国家当局尽快召开僧侣代表大会，以便修建教堂和稳定人民生活。

1922年5月10日

彼得格勒教区进步神职人员代表：

司祭弗拉基米尔·克拉斯尼茨基，大司祭亚历山大·弗维坚斯基，司祭叶夫根尼·别尔科夫（托尔舍姆斯基），虔诚的圣徒伊丽莎白教堂的诵经士斯特凡·斯塔德尼克，大司祭德·尼古拉……^①，萨拉托夫大司祭谢尔盖·列多夫斯基，莫斯科教区修士司祭……^②（塔拉索夫），莫斯科司祭谢尔盖·卡利诺夫斯基

此呼吁书曾征求安东尼主教签名。主教声明：他原则上同意呼吁书，但不同意所采用的形式（即非宗教形式），因此没有签字。
证明人：大司祭亚·弗维坚斯基，司祭弗·克拉斯尼茨基，司祭斯·卡利诺夫斯基。

——档案文件上有审阅记录和亲笔字：

约·斯大林阅 1922年5月12日；

列·加米涅夫；

米·托姆斯基；

阿·伊·李可夫；

维·莫洛托夫；

格·季诺维也夫阅。

① 原文复印件字迹不清。

② 同注①。

No 04701

**彼得格勒等地“进步神职人员”代表
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请求书**

(1922年5月10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几位签名的东正教教会神职人员提出诚恳的请求：

(1) 在经济上仰赖于统治阶级的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基本群众中，在革命的五年里，涌现出一批为数不少的教士，他们有勇气和力量投票赞成苏维埃俄国同阶级敌人的斗争是正义的。

我们几位签名者已公开出面献身于镇压敌对分子和团结一切忠实公民的事业，为俄国人民尽义务，同时热切请求赦免因莫斯科神职人员案被判处极刑的犯人。

让慈善事业成为俄国教会新时期的开端，让我们的赦免请求正当当地作为我们给予俄国人民生活以良好影响的开始。

师兄师弟同志们，倾听我们的呼声吧，给人们以生命吧！

1922年5月10日

莫斯科司祭谢尔盖·卡利诺夫斯基，大司祭尼古拉·德^①，
萨拉托夫大司祭谢尔盖·列多夫斯基，彼得格勒教区进步神职
人员代表：司祭弗拉基米尔·克拉斯尼茨基，彼得格勒教区：

① 此处原件字迹不清。

大司祭亚历山大·弗维坚斯基，司祭叶夫根尼·别尔科夫（托尔舍姆斯基），诵经士斯特凡·斯塔德尼克，莫斯科教区修士司祭^①

此呼吁书交安东尼主教看过。他同意呼吁书的内容实质，但不同意其形式（非宗教形式）。

证明人：大司祭亚历山大·弗维坚斯基，司祭弗·克拉斯尼茨基，司祭谢尔盖·卡利诺夫斯基

^① 此处原件字迹不清。

№04702

**托洛茨基关于部分“进步神职人员”的
呼吁书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委员的快邮代电**

（1922年5月14日）

快邮代电第357号

致中央委员政治局全体委员，一份副件转《真理报》编辑部，一份副件转《消息报》编辑部

关于以安东尼主教为首的部分诚实的神职人员的呼吁书在《真理报》上只有简短的报道，而《消息报》上没有任何反映。我担心报界对此文件没有给予应有重视，从而将致严重的后果。教会中民主路标派同帝制派反革命分子即将彻底决裂，现在我们全面关注的自然是支持教会的路标派，反对帝制派，坚持政教分离的国家原则不动摇，尤其是不能放弃对宗教的哲学唯物主义态度。但是，现在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保证路标派神职人员免于旧的宗教官员的恫吓。政教分离的政策我们将永远不变地执行下去，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于教会的所做所为漠不关心，因为它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教徒社团。教会上层人物利用种种手段威胁恫吓地方成员。恶毒的教会恐怖主义政策至今仍具有其全部威慑力。宗教界内持反对意见者和进步分子对于政教分离原则存在着错误的和纯形式主义的认识，又只看到国家对于教会的上层反对人物过分的忍耐，而没有考虑到国家把他们作为公民，作为教

徒的团体代表来支持他们，与此同时，宗教上层反对人物在玩弄物质惩罚的阴谋手段。

在此问题上，当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在于鼓舞忠实的神职人员的士气，使他们相信，在他们享有的无可争议的权限内，国家不会委屈他们，尽管国家绝对不插手调节纯宗教的关系和争执。

无论如何必须做到：

(1) 为安东尼等人的呼吁书开辟一个醒目的栏目，它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

(2) 在报刊上尽可能多地报道关于教会活动的信息，大力宣扬、强调和阐述路标派的呼声。

(3) 不掩饰我们对于宗教的唯物主义态度，但是在近期内，即在评价当前斗争的过程中，不要把我们的观点提到首位，目的在于不要促进双方接近，相反地，尽可能使斗争扩大开来，使之明朗化，达到以决胜负的程度。

(4) 不要根据唯物主义无神论的观点，而应根据相对的宗教民主主义观点评论路标派神职人员及追随他们的俗人：你们被公爵们吓倒了，教会帝制派的霸道使你们无法做出结论，使你们认不清官方教会对人民、对革命所犯的一切罪行。

(5) 现在就必须写出关于东正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阐述教会作为一种下层组织，其发展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在东正教教会内没有发生资产阶级变革，刚刚兴起的教会资产阶级变革与无产阶级国家革命的交织等等）。

(6) 中央政治委员会应做好全面准备，以便把教会和宗教的所有问题都公开地摆出来，采用最通俗易懂的形式（如传单、口头演讲），时机应在最近的将来，即教会内部斗争把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播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土壤松动的时刻。

1922年5月14日

列·托洛斯基

另：我再重述一遍，《真理报》和《消息报》对于教会及其周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在狠狠地施加压力后它们才写出有关此问题的文章，从而使报道走上正轨。热那亚式的废话充斥着整个篇幅，与此同时，俄国人民深刻的精神革命（或说深刻的精神革命准备）却被报界置之脑后。

列·托洛茨基

——在第一页发文处下方有手写附注“列宁同志收”。同页上方有列宁手写钢笔字附注：“见第二页：交斯切克洛夫和布哈林。退回。”在“另”栏内，列宁用铅笔在“热那亚式的废话充斥着整个篇幅”一句话下划有着重线，并在左侧空白加写符号“X”。在下方列宁重写此符号，并用铅笔写附注：“正确，绝对的正确！废话混蛋！列宁，5月15日”。在此附注的上方，布哈林用钢笔加附注：“再送抵我处。尼·布哈林”。

№04703

列宁关于托洛茨基第 357 号快邮代电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便函

（1922 年 5 月 15 日～16 日前后）

我认为这件事不必以政治保安局名义受理，因为在当时需要深入了解细节，这一点我们还做不到。我收到来电，并做了补充（情绪好：对!!），转给斯切克洛夫和布哈林二位同志。我看这就够了。

托洛茨基施加压力，我们不反对，有些部分干脆表示支持。
这就够了。

列 宁

——后来校订过的打字稿。上方有约·维·斯大林的打字复制附注：“提交政治局讨论。斯大林”。

№04704

**斯大林关于批准将托洛茨基第 357 号快邮
代电作为“中央委员会对报纸的指示”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函**

（1922 年 5 月 16 日）

政治局全体委员：

提议采纳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六项建议做为中央委员会对报纸的指示。

斯大林

——原文稿是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用其专用公文纸手写的。下方有如下批示和签名记录：“不只是六条，应将整个便函全部转递各报纸”；“转加米涅夫：已经发送给各报纸。见标题。约·斯大林”；“格·季诺维也夫同意”；“米·托姆斯基”；“阿·李可夫”。

№05073

托洛茨基关于教会改组给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委员的信

（1922年5月24日）

致政治局

教会内部的斗争具有广泛的性质。在吉洪被停职以后，由“中派”（安东尼）和“左派”（几个年轻神父）分子组成的小组正在领导教会。

活动主要是在宗教会议的旗帜下进行的，新的管理机构可能在以下三派意见中加以确定：

1. 保存大牧首制并选举一个奉公守法的大牧首；
2. 取消大牧首制，建立委员会（忠顺的东正教最高会议）；
3. 完全分权，没有任何中央管理机构（教会作为信教群众“观念”的总体）。

我认为，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在这些派别中接受任何一派的意见（即使是非正式的）。如果在这三派之间进行激烈的斗争，那就有利得多。为此目的教会会议还是延缓召开的好。假如必须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最终的选择可晚些时候进行。

在一个奉公守法和实际上软弱的大牧首主持下的集中的教会有一定的优越性。完全分权化可能伴随通过对地方条件的适应使教会更深入到群众中去。最后，甚至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组合：部分教会保留奉公守法的大牧首，而另一部分教会，即在东正教最高会议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或完全是团体自治的教会则不承认大牧首。最

终，这样的组合，看来是最有利的。

对以下两点是否有反对意见：

1. 反对延缓两个月或更长时间再召开宗教会议；
2. 反对在对待上述教会方针方面采取观望政策？

列·托洛茨基

No01525

托洛茨基就英国神父的抗议致斯大林等人的信

(1922年6月2日)

副本

邮政电报第73/P号

1922年6月2日

致中央书记处斯大林同志

李可夫同志

瞿鲁巴同志

外交人民委员部卡拉汉同志

随信附上英国神父们来电的译文。

我认为必须立即对英国神父们的抗议给予答复。

答复可以由一位副主席签署，最好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签署。对抗议的答复要用无线电播发，还要同递交我们报刊的抗议文本一起交报刊发表。附上答复的草稿。

托洛茨基

附件：

副本

邮政电报第73/P号附件

1922年6月1日

莫斯科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我们是基督教社团的代表，谨代表这些社团最郑重地声明，抗议迫害以吉洪大牧首为代表的俄国教会。舆论及全体教徒以至整个文明世界的良知不能对这一极不公正的行为保持沉默。

坎特伯雷大主教

约克郡大主教约翰·史密斯，

苏格兰教会会议主席唐纳德·弗雷泽，

苏格兰统一自由教会会议主席约翰·乔温，

浸礼联合会主席托马斯·盖茨，

公理会联合会主席赫伯特·芒福德，

英国摩拉维亚教会主席艾弗·罗伯顿，

英国长老会会议主席塞缪尔·霍顿，第一循道公会主席特雷菲里，

联合循道公会主席艾尔弗雷德·夏普，循道公会联合会主席。

副本

邮政电报第 73 / P 号附件

一些英国神父对起诉前大牧首吉洪一事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对此必须作如下说明：

(1) 与抗议所说的相反，对教会没有进行任何攻击，只是对教会的个别代表，包括对教会的前大牧首提起公诉，因为他们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为拯救包括儿童在内的千百万人的生命而采取的措施。

(2) 绝大多数僧侣在前大牧首同苏维埃政权的冲突中站在苏维

埃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劳动群众一边。前大牧首集团只是由为数不多，特权最多，因同沙皇权贵及资本勾结而腐化的教会人员组成的。俄国舆论注意到，提出抗议的英国教会的主教们不是同俄国遭受饥荒的劳动群众，甚至也不是同多数僧侣站在一起，而是同一小撮一贯同沙皇、官僚、贵族沆瀣一气，现在又公然同工农政权作斗争的主教站在一起。

(3) 俄国舆论还认定，抗议者们在英国政府参与最野蛮的封锁时期，没有呼吁反对扼杀俄国的工农及其子女。同样，俄国居民也没有听到过抗议者们对利用高利贷的绞索扼杀俄国劳动人民的图谋提出抗议。

(4) 因此，无论苏维埃政权，还是劳动人民都认为，英国各教会的王公们的上述抗议是出于狭隘的教派团结而提出的，是完全反对人民的实际利益和起码的人道要求的。

托洛茨基

№05094

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司第 6 特别处 关于没收教会珍贵物品的作战汇报

(不早于 1922 年 7 月 22 日)

第 38 号

绝密

中央各省：

来自科斯特罗马，第 1503/111 号电，1922 年 7 月 11 日。报告，省里没收珍品的事务已经结束，替换留存物品（按一整套）正在结束。在总结的这段时间里，全省共没收白银 42 普特 15 俄磅 48 左洛特尼克。由于几个数字不清楚：没收行动开始时全省没收黄金的数量是 2 普特 1 俄磅 36 左洛特尼克 61 多利亚，而白银是 576 普特 6 俄磅 37 左洛特尼克 71 多利亚，故根据交接书对全省没收黄金进行检查。

来自卡卢加，第 886/C 号电，1922 年 7 月 13 日。报告，革命法庭审理了喀山女修道院关于隐藏教会珍品的案件，做出判决：修道院撤销，判处主谋诺维科娃修女监禁 6 个月，而其余的人由于已年迈，免于惩处。

来自图拉，第 1216 号电，1922 年 7 月 7 日。报告，近日地方革命法庭将审理尤维纳利主教的案件，他被指控参与推广能显灵的圣像。

来自奥廖尔，第 0099 号电，1922 年 7 月 8 日。报告，没收教会珍品在全省及奥廖尔市结束，大部分居民对没收漠不关心，宗教

界的态度敌对。

北方边区：

来自乌斯秋格，第1216号电，1922年7月17日。报告，省里没收珍品结束。贵重物品都集中在省财政局，没收的准确报告还没有到。

西北边区：

来自诺夫哥罗德，第50/111号电，1922年7月14日。报告，在鲍罗维契和马洛维舍尔没收珍品的工作已结束，其他县的情况没有报告。没有发现由于没收珍品引起的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

来自普斯科夫省国家保安局分部，1922年7月12日。报告，从1922年7月11日行动开始，没收贵重物品有：黄金制品39俄磅27左洛特尼克83多利亚；银制品206普特27俄磅43左洛特尼克24多利亚；1010颗珍珠和其他贵重宝石，例如：祖母绿33颗、红宝石33颗、金刚钻641颗、黄玉17颗、宝石6颗、159块紫晶、蓝宝石3颗、贵榴石18颗、碧玉4颗、绿松石33颗、光玉髓4颗、石榴石9颗、月长石1块、珍珠14颗和1922年版金属货币18.5424万卢布。没收珍品结束了。省里个别区最后一批财物已送到省财政局。

东南边区：

来自国家保安局顿斯科伊省分部，1922年7月11日。报告，各地区没收教会贵重物品有：白银986普特24俄磅10左洛特尼克73多利亚；黄金25俄磅43左洛特尼克45多利亚；贵重宝石，如：镶在边框里的和零散的钻石2085颗、金刚石6313颗、贵橄榄石56颗、紫晶114颗、光玉髓15颗、红宝石4491颗、祖母绿

2620 颗、绿松石 1314 颗、珊瑚石 99 颗、蓝宝石 632 颗、黄玉 42 颗、石榴石 4 颗、小钻石 319 颗、石榴石 10 颗、蛋白石 10 颗、孔雀石 1 颗、绣品上的珍珠 2 普特 22 俄磅 94 左洛特尼克 77 多利亚、散珍珠 1 俄磅 64 左洛特尼克 59 多利亚。

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第 2013/111 号电，1922 年 7 月 11 日。报告，在全省范围内的没收已经结束，没收珍品的数量将另作报告。没收进行得很平静，波德戈尔内村除外，那里的农民敲响了警钟，委员会因受到殴打的威胁而被迫躲避起来。

普里沃尔日耶：

来自国家保安局辛比尔斯克省分部，1922 年 7 月 8 日。报告，除了几个县，没收教会贵重物品的行动已结束。各地没收工作进行得都很平静，宗教界没有积极反抗的行动。在阿拉蒂尔县赫拉米罗夫卡村，在富农鼓动的影响下，执委会主席和乡苏维埃主席被野蛮毒打。42 个人因这一案件而受审，其中 30 人被判 6 个月至 6 年的徒刑，12 人假释。另有 11 人宣告无罪。

来自喀山，第 8284 号电，1922 年 7 月 11 日。报告，在各县没收教会珍品工作已结束，在鞑靼共和国共没收白银 105 普特 22 俄磅 8 左洛特尼克 72 多利亚；银币 764 卢布 75 戈比；黄金 1 俄磅 21 左洛特尼克 73 多利亚；各种带有宝石的黄金饰品总重量 92 左洛特尼克 25 多利亚；珍珠 5 俄磅 88 左洛特尼克 59 多利亚，贵重宝石 1086 颗。

国家政治保卫局侦查司第 6 特别处处长

E. 杜契科夫

№04705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关于
全俄“新生教会”神职人员
代表大会的汇报（第1号）

（1922年8月9日）

打印6份送给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温什利赫特、亚戈达和萨姆索诺夫等同志

代表大会是从今年8月3日起以教士和俗人的区域性会议拉开序幕的。在第一次会议上阐述了代表大会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由于“新生教会”准备不足，决定选举代表大会预备委员会。其成员有：斯摩棱斯克的韦特科夫，特维尔的斯特拉霍夫，斯摩棱斯克的诺维科夫，莫斯科的索洛维约夫等大司祭。委员会核定了会议议程。议程分三个基本问题：（1）代表大会必须无条件立即审理的问题；（2）代表大会愿意解决但不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3）筹备全俄僧侣代表大会的问题。全部14个问题按同类性质归纳为三部分：（1）法律教规，（2）财政经济，（3）内部管理。

第一部分包括最重要的问题，如：（1）教会在俄罗斯联邦中的一般法律地位，其中包括财产权，（2）同反革命的斗争（帝制派的霸道，自主教团、教区的反革命），（3）婚姻法。第二部分包括：（1）社会经济保障，（2）关于统一教会金库问题。最后，属于第三类问题的有：（1）审批“新生教会”章程，（2）编制教会管理计划，（3）建立牧师骨干队伍。

代表大会于8月6日开幕。第一次会议具有声明性质，选出了以克拉斯尼茨基为首的主席团，一致通过了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信，对批准召开代表大会表示谢意。

8日举行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下述问题列入会议议程：(1) 关于僧侣的报告（报告人克德罗夫），(2) 关于僧侣专家（报告人阿达莫夫），(3) 同反革命的斗争（报告人科洛科洛夫）。第一个问题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一致通过决议关闭城区修道院，将省级修道院改为劳动公社。就第二个问题通过决议，赋予僧侣以自由辞退僧侣职务及转为白神职人员的权利，并且接收白神职人员须经教区管理局审定。

对于第三个问题发言的人较多。他们表示仇视最高层官员和俗人，因为他们现在固守在教区理事会里执行反动的宗教政策，并做出决议，要求僧侣代表大会审判吉洪并解除他的职务。此问题未能彻底解决，推迟到8月10日。大会决议几乎是一致同意通过的，99人投票赞同，3人反对，但只是针对最后一项即关于审讯吉洪的问题。

现在正在向代表大会全体参加者征求意见，其结果不迟于8月11日揭晓。大会代表们的心情是一致的，大家都赞成克拉斯尼茨基。

有四位主教以有发言权的来宾身份出席了大会，其中有安东尼和下诺夫格罗德的叶夫多基姆，他们被选为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出席大会的还有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代表修士大司祭雅科夫，一位旧礼仪派代表和托尔斯泰主义者特列古博夫。

“新生教会”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代表醉醺醺地闯入会议的会场，给大会的参加者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是卡尔波夫司祭，彼得洛夫助祭，索科洛夫等。大会参加者们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此种行为向克拉斯尼茨基提出警告。

第三次会议将于今年8月10日举行。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处长

叶·杜契科夫

1922年8月9日

№ 04706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关于
全俄“新生教会”神职人员
代表大会的汇报（第2号）

（1922年8月12日）

打印6份送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斯大林、温什利赫特，亚戈达和萨姆索诺夫等同志

在上述关于8月3~8日代表大会会议日程的第1号汇报中已经指出，大会代表们的心情是一致的，大家都赞成克拉斯尼茨基。在大会报告阶段可以看出，已经形成了三支不大的派别。一派是莫斯科代表，他们认为克拉斯尼茨基集团的行动过左，趋向温和。这一派比较接近安东尼的政治观点。另一派大多数是传教士代表，他们坚持教规不可毁的规定。第三派比克拉斯尼茨基集团更左，他们主张不受主教的管辖，要求不拘礼节。由于这三支派别是最近因讨论僧侣问题和宗教管理形式而产生的，所以暂时看不出谁是带头人，这种人物尚未显露头角。这些派别无疑地将逐渐明朗化和确定下来。

特别值得指出的，某些知名度很高的大会参加者，包括克拉斯尼茨基在内，在会场外“谈心”过程中议论说，这些决议是表面文章，是做给政府看的，而实际上他们是自行其事。有人认为克拉斯尼茨基在玩两面派，他那莫名其妙的把戏令人感到吃惊。

在大会报告期间只有一次会议讨论了（1）俗人的权利，（2）

白主教团等两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通过决议：认为享有充分权利的俗人与牧师接触时应该采用新生的圣餐祈祷方式，听从教规训导和贯彻新生教会的原则。关于第二个问题通过决议：请求最高教会管理局不要等待下次僧侣代表大会的召开，立即为白神职人员代表提供主教职位，他们可以同婚后配偶同居。

代表大会还将持续 5~6 天。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

处长 叶·杜契科夫

1922 年 8 月 12 日

№ 04707

斯克沃尔佐夫 - 斯捷潘诺夫关于巡视
布良斯克省的收获给布勃诺夫^① 的便函

(1922年8月25日)

致俄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 A. C. 布勃诺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是在旅途的车厢里写这封信的。

我在布良斯克市及省内——布良斯克、别日查（布良斯克工厂）、佳季科沃、柳季诺沃和佩索奇纳亚等地作了两次党校讲座和六次公开讲演。题目是：“论阴间生活”（2讲），论“新生教会”（6讲）。

第二个题目激起公众极大的情绪，这些听众一般都是从未参加过集会的一群人。我可以直接了当地说：成果极大，地方的同志们很受鼓舞。俄国共产党在这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全省在喧腾，直到底层。

我和我的同志们都得出共同的结论，不应该再慢条斯理的了，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展这种宣传。

下周初我去您那里，我们来商量怎么办。至今我们只限于“协助”“新生教会”，这不对。必须革命地利用这场运动。

再说一遍，不应该慢条斯理地。布良斯克省之行的收获是显著的。

^① 布勃诺夫时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

致共产主义敬礼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①

1922年8月19日(25日)

^①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时任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反宗教宣传委员会委员。

№05095

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教堂的银制圣骨匣从格尔莫根^①的木制棺材中取出的委员会记录

(1922年9月1日)

1922年9月1日，我，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菲利波夫，在由人民委员会委以特殊任务的代表维伊斯公民、国家保管局珠宝首饰匠契纳列夫、博物馆总管理局兵器馆保管员伊万诺夫、博物馆总管理局教会委员会代表希帕诺夫公民、东正教大司祭克拉斯尼茨基和克里姆林宫兵器馆工作人员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下，将银制圣骨匣及其他遗物从格尔莫根的木制棺材中取出。

委员会是白天12时20分来到圣母安息大教堂的。按照必要的教会法规，大司祭克拉斯尼茨基把木制棺材移至那个大教堂的德米特里·萨隆斯基副祭坛，教会委员会没有在棺木上盖上印章，而盖上了基督救世主教堂的印章。

在圣骨匣底部有：1枚银卢布、1只银戒指、两只挂在颈项上的银制小圣像，1只铜质圣像留在大教堂。

银制圣骨匣、银制小圣像、戒指、卢布交给国家保管局。

圣骨匣本身和13只银质灯、1只银质烛台由国家保管局管理。

司法人民委员部代表 菲利波夫

^① 格尔莫根，1606～1612年俄罗斯大主教。

契纳列夫

伊万诺夫

希帕诺夫

维伊斯

大司祭 B. 克拉斯尼茨基

№04708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的决议

（1922年10月13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62号第15项

俄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22年10月9日会议记录第32号第4项的附页

听取：15. 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的报告（布勃诺夫同志）

决议：（1）扩大宣传鼓动部现有的由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和克拉西科夫二同志组成的反宗教宣传委员会，增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明任斯基同志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为其成员。

（2）该委员会有权处理宗教政治事务（包括同宗教团体和最高宗教管理局的联系等），领导中央和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和制定有关报刊和口头宣传鼓动的指示。

（3）委员会必须同国家政治保卫局、司法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建立起经常性的密切联系。由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负责保持这种联系。

（4）从该委员会开始工作之日起，其他委员会的宗教事务工作宣告结束。

№04709

**没收珍贵物品委员会关于俄共（布）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组成和职能的
会议记录（第18号）**

（1922年10月17日）

出席者：托洛茨基、克拉斯尼科夫、斯米多维奇、加尔金、弗列罗夫斯基、杜契科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

决议：（1）弗列罗夫斯基的声明完全符合组织局的两个决议，并得到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支持。从声明中看出，在组织局的决议中漏提波波夫，他是反宗教宣传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委员会的实际成员是：斯克沃尔佐夫、克拉西科夫、波波夫、明任斯基和斯米多维奇。

委员会的任务在9月6日组织局的决议（会议记录第52号）和9月27日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会议记录第58号）中都有规定。

（2）现行的分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宗教事务的，政治局主管宗教事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召开僧侣代表会议的等）在人员组成和工作方面应当接受新委员会的考核，并根据情况，或被撤销或转为新委员会的分委会。

（提案被一致通过）

（3）会议建议新设立的委员会应尽快组建并拥有其固定的地址和电话等。

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今晚8时在加里宁同志的办公室举行。克

拉西科夫同志负责召集会议。

(4) 会议请求政治局火速批准新委员会。

本人签署：主席 列·托洛茨基
秘书 M. 格拉兹曼

№04710

**托洛茨基关于批准关于反宗教
委员会组成和职能给俄共（布）
中央书记处的快邮代电**
(1922年10月17日)

快邮代电№203 П

特急

致中央书记处

随电附送“没收教会珍贵物品委员会”会议记录一份，为避免事后耽搁工作，请尽快地于今日通过电话审批会议记录上记述的委员会人员组成及其职能（二者仅是今年9月6日，9月27日和10月13日组织局的决议汇报）

列·托洛茨基

№04711

**莫洛托夫关于审批反宗教委员会组成和
职能给托洛茨基的便函**

(1922年10月17日)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为答复第203/P号快邮代电致托洛茨基同志

您提议今天立即表决的问题，按照列宁同志10月16日的建议，送交政治局核实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因此，书记处决定不用电话进行表决，把问题列入10月19日星期四政治局的会议议程。

同时中央书记处通知您，在10月13日的书记处决议中的确出现了错误：9月6日书记处做出关于波波夫同志参加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决议，此决议没有取消。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

№04712

加米涅夫关于加里宁进入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电话电报
（1922年10月17日）

特急

10月17日12时20分

第13097/C号电话电报第5号

获悉书记处关于宗教事务委员会人员组成问题的决议，我提议该委员会必须增加人选，把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补充进去。

请尽快通知我是否采纳我的提议。

政治局委员 列·加米涅夫

№04713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 组织工作会议记录（第1号）

（1922年10月17日）

机密

会议记录（第1号）

出席者：克拉西科夫、明任斯基、波波夫、弗列罗夫斯基副主席、斯克沃尔佐夫和斯米多维奇等同志。

根据中央组织局决议，委员会由克拉西科夫、明任斯基、波波夫、弗列罗夫斯基副主席、斯克沃尔佐夫和斯米多维奇组成。委员会于1922年10月17日举行会议，并命名为“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

选举克拉西科夫同志为临时主席。

决议：（一致通过）

1. 向中央政治局请示：

（1）批准委员会作为宗教政策事务和反宗教宣传鼓动活动的唯一领导机构；

2. 推举托洛茨基同志任委员会主席。

（2）俄共中央书记处统计分配处委派加尔金同志去委员会任职，担负委员会书记职务。

（3）委员会每逢周一晚8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办公大楼（克里姆林宫）加里宁同志办公室召开会议。

№04714

**俄共（布）中央关于“反宗教
宣传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议**

（1922年10月19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2号第4项

绝密

出席者：列宁、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莫洛托夫、托姆斯基、拉狄克、索尔茨、季诺维也夫、加里宁，索柯里尼科夫也出席了。

听取：4. 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组织局10月13日会议记录第62号第15项）。

决议：4（1）批准委员会人员组成，波波夫同志进入委员会并任委员会主席。

（2）责成委员会每两周向政治局做一次汇报。

中央书记

№04715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

会议记录（第1号）

（1922年10月23日）

绝密

出席者：克拉西科夫、斯克沃尔佐夫、弗列罗夫斯基、明任斯基、杜契科夫、德里巴斯等同志。

主持人：克拉西科夫同志

秘书：德里巴斯同志

听取：1. 一般性宗教工作。

2. 关于吉洪派问题。

3. 当前事务。

决议：1. 批准关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活动、关于清除吉洪派追随者的问题、关于影响最高教会管理局促进三派（复兴联盟、新生教会和左派）积极参与斗争的指示。

2. 委托杜契科夫做报告。

3. 让委员会所有成员在下次会议前阅读某一期报纸的全部摘要及报纸的动向，在下次会议上讨论。

4. 草拟宗教问题指导性的报道提纲。委托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完成。

会议定于10月31日在加里宁办公室举行。

主席 彼·克拉西科夫

№04716

斯克沃尔佐夫起草的 反宗教宣传任务提纲

(1922年10月23~31日之间)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起草的反宗教宣传提纲

1. 我们在内外战线斗争中取得的成就，及敌人明显无望的种种武装干涉和阴谋都一再证明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政权，她堪称“全民政府”，拥有任何臆想的俄罗斯政府所不可能有的无限权力。

2. 自我保护的基本信条促使教会脱离与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国家机构的公开的直接联系。由此“政治态度发生急剧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一部分比较有远见的神职人员开始的。

3.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国外恢复君主制活跃的气氛中，宗教里同……^① 剥削阶级联系较密切的一些较保守分子流露出一种希望，妄想使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逐渐恢复旧的经济制度。所以他们尽量避开，不同旧制度直接决裂，谎称“不问政治”，暂时不作任何明确的政治态度。

4.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国际关系方面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累累新成就，宗教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放弃上述策略，重新表明态度，赞成工农政权。

^① 原文如此。

5. 在无产阶级占绝对政治优势的工农制度中，为保护教会对群众的影响，高唱社会主义的某种情调无疑是必要的。最有远见的一部分神职人员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率先迈出了一大步。

6. 但是，经验表明，这种手段不可能挽回实际上已经脱离教会的无产阶级群众，也不可能减缓越来越加速的摆脱进程。再则，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活动扩大了俄国共产党对农民的影响，在农村不给那种平庸的、混混沌沌的、无所作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以余地。因此，在宗教革新派中起初表现突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开始被遗忘，并暗然失色。

7. 整个宗教界在慢慢地摆脱旧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虚幻，并开始相信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从根本上否定一切教会的国家，否定同某一教会能进行共同活动的政府。有人仍抱有希望，幻想某一宗教派别能享有特权地位，在宗教界首先做出令人兴奋的业绩。当意识到这些想法是枉费心机的时候，一些革新教派的热情便冷却下来。整个宗教界的大多数人在内心仍在维护旧的政治制度，因为这种政治制度在利用教会和宗教信仰做自己的一个支柱，同时给予教会和宗教信仰以种种物质的优惠。

8. 必须客观地对待教会中挑起的争斗。首先必须承认任何一派都没有任何根据宣称自己在道义上超过其他派别。专制时期，各派表现都是一样的，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同等程度上关心收入及其财富的存储和增加的问题。这是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决定投靠大私有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主要且有决定意义的根据。

9. 宗教界各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深，这种深化的分歧不可能成为判断哪支派别较好的根据。从共产主义观点来看，只要不直接积极地参加反革命活动，各派都一样。因为他们都同样尽可能多地保留中世纪的观念，只是手段不同，他们都同样想要稳定祭司职位。

10. 各教派在意识形态上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它们试图来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受不同程度的社会发展影响而形成的世界观，及试图做出极小的一点让步来延缓教徒们迅速摆脱教会和宗教信仰的过程。——遵循这条路线，一些教派努力恢复自己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另一些教派尽力适合中层知识分子，第三类教派企图延缓农村青年摆脱教派的过程等等。——革新派教会的某些派别靠近教派教徒，希望他们能够回到革新后的东正教会，其结果，东正教分化，可能逐渐分裂成一些特殊的教会，每个教会都努力同自己特殊教徒的内心感受联系起来，比从前未分化的东正教联系得更深、更紧密。

11. 俄国共产党以同等的批判态度对待一切宗教派别，因此应当揭露一切宗教派别的动摇不定和无所作为的通病，把对一切宗教观点的科学解释和对于所有宗教界的历史性评论同错综复杂和变革的形势加以对照。

12. 俄国共产党利用教会内部激烈的角逐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挤这个或那个教派集团，站到某一方面去，而是为了（1）使反革命失去从教会和神职人员中获得充当炮灰的教徒的可能性；（2）使群众摆脱一切宗教信仰，取而代之以对自然界和科学的正确的理解。

№04717

杜契科夫关于吉洪派给中央 反宗教委员会的报告

(1922年10月30日)

绝密

关于吉洪派的报告

五个月前提出的“打击吉洪派反动教士”的任务是我们反宗教斗争活动的基础，当然首先打击的是最高层教职人员，比如：都主教、大主教、主教等。

为完成这项任务组织了一个团体，命名为“新生教会”，主要由白牧师组成，这使我们有可能离间牧师与主教的关系，正如离间士兵和军官的关系一样。此前在白神职人员与黑神职人员之间早已存在敌对关系，黑神职人员在教会里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他们利用教规保护自己，免得白牧师争夺最高层教职。我们考虑到这种情况，并由此着手完成预定任务。

许多痛斥吉洪本人、吉洪派政策和高级僧侣政策的文章、呼吁书和演讲词都已发表。与此同时，白牧师夺取教会上层教权之后，开始实现上述任务，已着手在教区理事会中清除吉洪派高级僧侣，换用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僧侣。首先换掉了最反动的高级僧侣。

此任务在五个月内完成过半，如到目前为止，在现有的68个教区里隐退了大约100名吉洪派高级僧侣，新任命的新生教会的

11名孀妇和独身僧侣被派往教区做掌权高级僧侣，又加派4名非掌权高级僧侣，任命和调动了吉洪在职期间任过职又忠实于苏维埃政权和宗教改革的10名前高级僧侣。大约有20名前僧侣在一些教区里留用，任掌权高级僧侣，剩余9个教区完全没有主教。还有5名狂热的吉洪派分子仍在原职没有变动。这样以来，如果说在这些“忠实的”僧侣中有半数是非吉洪派分子，那么调换的结果，一半吉洪派高级僧侣已被革新派人士和半革新人士所替代。

如果不受教规约束，加封已婚牧师做主教，并从中推选一批持不同观点的主教，那将无疑地组成反对吉洪和吉洪派政策的主教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彻底粉碎吉洪派和半吉洪派主教团，并从教会管辖机构中把它们清除出去。

按我的意见，从教区理事会中清除吉洪派分子并不是坏事，大体上要这样着手工作：利用一部分教徒对付另一部分教徒。只有组织俗人团“热心革新运动者”才可能实现此项任务。作为例证我举出10月28日克拉斯尼茨基在救世主大教堂所做的一次尝试。他在那里发表演说，提出邀请。此后有12俗人加入革新派团体，并在名单上记下详细地址。的确，这个数字不算大，但是做为一次尝试，其数目是相当说明问题的，因为在这个教堂里有人加入了革新派。

当此项任务完成之时，那目前还有重要影响的吉洪派被粉碎和威信扫地的时候，必然会得出逻辑结论：统一的教会将面临瘫痪时期，在宗教会议上教会必将分裂成几个派别，而且各派都努力实现各自的改革。

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司第六处处长

叶·杜契科夫

№04719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2年11月4日）

绝密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关于
已完成工作的报告**

在完成报告期间，即从10月19日以后，委员会召开过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研究了委员会的组成，最高教会管理局活动情况汇报和教会一般性活动等问题，还讨论了《科学与宗教》报今后是否存在的问题。

决定在下次会议前提出有关吉洪派的准确资料，并撰写出关于《科学与宗教》报的报告。

在第二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告，从报告中看出，由于最高教会管理局内部已形成派别，其活动明显减少，并失去了对地方的影响。而吉洪派黑帮分子却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聚集力量并排挤革新派。会议做出决议：坚决依靠最积极的派别“新生教会”，巩固同左派的联盟，广泛开展从中央到地方教区理事会中清洗吉洪派分子和一般黑帮分子的工作；通过最高教会管理局组织主

教管辖区委员会中个别主教和牧师以及教区理事会普遍公开地承认苏维埃政权；为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免受检察机关的干扰，建议由检察人员协同国家政治保卫局用行政手段打击吉洪派。还决定将居住在莫斯科的退职主教通过法庭遣送到边远的修道院去，这样的人在莫斯科有近20名。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撤消专门的教派委员会，并将一切工作权限转交给政教分离委员会。还听取并通过斯克沃尔佐夫同志的反宗教宣传提纲和一系列次要的其他问题。（见10月31日会议记录）。

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拟定的措施已经部分开始实施。在刚刚举行的最高教会管理局全体会议上做出决议，联合所有三个派别，坚决打击吉洪派，并在同一天有近60名各地的吉洪派分子被革职和驱逐。最高教会管理局为地方制定了打击吉洪黑帮分子的工作细则，向地方发布关于神甫和主教公开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指示等等。斯捷潘诺夫同志为《真理报》提供关于教会政策的文章。委员会的近期任务参考10月31日会议记录。

委员会主席 И. 克拉西科夫

秘书 叶·杜契科夫

№05395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关于其所做工作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1922年11月4日）

绝密

在总结期间，即10月19日，委员会举行过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研究的问题是：建立委员会，通报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对整个教会运动管理活动的信息，还讨论了《科学与宗教》报继续存在的问题。

会议决定，在下次会议前就有关吉洪派提出准确的情报，并就有关《科学与宗教》报问题提出报告。

在第二次会议上，听取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由于在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形成了派别，它的活动大大地削弱并丧失了对地方的影响。吉洪黑帮分子利用这种机会开始联合起来，欲削弱革新派教徒。会议决定把“新生教会”作为最积极的派别而寄予厚望，把它与其他左派小组结合起来，在中央和地方教区委员会中加大开展对吉洪和整个黑帮分子的清洗工作，通过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让主教委员会和个别主教、教士以及教会委员承认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以便在执行这项工作时不会受到检查院的阻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议后者应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与吉洪派做行政斗争中给予协助。会议还决定，把呆在莫斯科的已经退职的吉洪派主教们经过审判安置到边远的修道院，因为在莫斯科已经聚

集了近20人。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撤消教派专门委员会^①，它的全部工作权力交给教会与国家分离委员会，还听取和通过了斯克沃尔佐夫同志的反宗教宣传提纲以及具有次要意义的一系列问题。

委员会拟订的部分措施目前已经完成。在刚刚举行的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全会上，后者决定把全部三个派别联合起来，与吉洪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决定对各地的近50名吉洪派主教予以流放和驱逐。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为地方制定了与教区委员会的吉洪黑帮分子作斗争的指示，并把关于让教士和主教公开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发给各地。斯杰潘诺夫同志已为《真理报》提供了关于宗教政策的文章。

委员会最近的任务参见10月31日的记录。

委员会主席 彼·克拉西科夫

副秘书长 叶·杜契科夫

附录1

教会与国家分离委员会1922年10月23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克拉西科夫、斯克沃尔佐夫、福列罗夫斯基、明仁斯基、杜契科夫、德里巴斯各位同志。

秘书：德里巴斯同志

听取了：

^① 即根据本卷档案№05086文件决定成立的委员会，因有各教派代表参加，故称教派专门委员会。

1. 关于教会总体工作
2. 关于吉洪派
3. 日常事务
4. 就教会问题为报刊制定指导纲要

做出决议：

1. 批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就清除吉洪的拥护者活动的指示，在所有三个派别（复活教派，新生教会和左派教会）的积极斗争意义上对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给以协助。

2. 委托杜契科夫同志作报告。

3. 使委员会全体成员在下次会议之前熟悉所有的各期报纸及其导向，在下次会议上提出意见。

4. 委托斯克沃尔佐夫同志（撰写反宗教宣传提纲）。

会议定于 10 月 31 日在加里宁的办公室举行。

主席 克拉西科夫

附录 2

教会与国家分离委员会 1922 年 10 月 31 日会议记录

出席者：克拉西科夫、斯米多维奇、斯克沃尔佐夫、福列罗夫斯基、明仁斯基、杜契科夫、德里巴斯同志

主持人：克拉西科夫同志

记录者：德里巴斯同志

1. 听取关于委员会秘书的报告

决议：委员会再次向组织局请求任命加尔金同志或其他人为委员会秘书。

2. 关于教派委员会

决议：请求政治局把教派工作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到本委员会，从而撤消教派委员会。

3. 关于同吉洪派斗争的情况的报告和杜契科夫同志所提供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工作通报（书面报告附后）证明，当吉洪派主教还有约65名主事的时候，新生组织新教派，削弱“新生教会”是超前措施，吉洪分子会利用我们的疏忽，开始从起初的惊恐中清醒过来，并组织起来，（确实不是在吉洪的公开旗帜下）。在其他地方，其活动包括从主教管理局中驱逐革新派，不服从最高教会管理局，及许多其他不令人满意的这一工作情况。

决议：（1）可把希望寄托于“新生教会”，使它与左派团体联合起来。

（2）加强与吉洪派的斗争，无论其如何表现，即使它在中央和地方抗拒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

（3）在中央和地方广泛开展清洗吉洪派和教区理事会的一般黑帮分子的工作。

（4）以突击方式撤消吉洪派主教。

（5）通过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组织各地的主教理事会、个别主教和教士以及教区理事会公开承认苏维埃政权，建议在1月1日前完成。

（6）通过克拉西科夫同志向检察院建议，尽力协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行政手段与吉洪派进行斗争。

（7）建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真地处理中央和地方败坏牧师名誉的案件。

（8）通过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把在莫斯科已退休的主教们放逐到某个偏远的修道院。

（9）委托杜契科夫同志在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作关于吉洪案件

的目前情况、有什么资料、是否需要对他提出诉讼及在不提出诉讼的情况下如何对付他的报告。

(10) 委托克拉西科夫同志在下次会议前作关于国外教会情况的报告。

(11) 不支持国家独立教会参加教会大会。派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同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同志去乌克兰研究那里的这种问题，听取他们的通报后，就独立教会问题做出某种决议。

4. 反宗教的宣传提纲（斯克沃尔佐夫同志所撰，附后）。

决议：通过提纲，增加内容，发给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作某些修改。加入修改的内容，并把最后修改的提纲交给宣传鼓动部。

通过克拉西科夫同志建议邦奇—布鲁耶维奇同志在委员会下次会议上作一个小时的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有教派现状的报告，除此外，对所有教派的特点做出书面报告。

委托杜契科夫同志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资料作副报告。委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不断地收集各种教派政治方面的资料。

5. 关于《科学与宗教》报。福列罗夫斯基同志通报，这份报纸不再需要资助，因为这是关闭它的依据之一，现在可以审议这个问题。

决议：提请加尔金同志出版双周报纸，建议他，第一，预先与杜契科夫同志协商，充实报纸的文章和报道；第二，隔两周向委员会作关于继续出版报纸的必要性和方向的内容详细的报告。

6. 日常事务

决议：(1) 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定于11月8日19时在叶努基泽同志的办公室举行。

(2) 将谢尔盖主教置于以前的失宠地位。

(3) 根据斯米多维奇同志关于别尔茨的声明，建议斯米多维奇

与杜契科夫同志商议。

(4) 根据由福列罗夫斯基同志宣读的布勃诺夫的便条：责成克拉西科夫同志、斯米多维奇同志、斯克沃尔佐夫同志、福列罗夫斯基同志就宗教解体问题撰写一系列文章，分配给各机关报，把这些文章刊登出来。特别委托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对今天通过的提纲在《真理报》上进行发挥，福列罗夫斯基在《消息报》阐述教会分裂问题。委托宣传鼓动部再次坚决建议把宗教事务的文章交给福列罗夫斯基同志事先审核。后者可自行发出没有争议的稿件，而有争议的文章则与克拉西科夫和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讨论。

主席 克拉西科夫

秘书 德里巴斯

附录 3

关于吉洪派的报告（1922年10月30日）

五个月以前，我们提出与僧侣斗争的工作和任务是，与吉洪派的反动僧侣斗争，当然，首先是与高层的大主教们斗争，诸如：都主教、大主教、主教等等。

为了实施这个任务，组成了所谓“新生教会”，它主要由白教士^①组成，这使我们有可能让教士与主教争吵，就像士兵与将军争吵一样。因为白黑教士早就存在矛盾斗争，因为后者在教会中享

^① 白教士是俄国东正教中穿白袍的教士。白、黑袍教士之间壁垒森严，黑袍教士多从修道院出身，受过良好宗教教育，不许结婚，可升任高位。而白袍教士多为下层教士，可结婚，一般不能升任主教。

有极大的优越感，并把自己用教规与白教士隔离开来，免得后者竞争高级等级职位。我们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从此着手实施上述任务。

除了大量的文章、宣言、演讲等打上吉洪的僧侣政策和吉洪本人的烙印外，白教士把最高教会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开始实现上述任务，即摆脱吉洪的高级僧侣的教区管理理事会，用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取而代之。首先是取代了特别反动的高级僧侣。

在过去的五个月，这个任务已完成了大半，例如，在现有的68个主教管区中，已有约100名吉洪的主教被解职退休，任命了重新献身于新生教会的11名鳏寡神甫担任掌权主教。加上不掌权的4人，任命和安置了吉洪时期就任职并忠诚于苏维埃政权和教会改革的老主教10人，在主教管区掌权的约有20人，9个主教管区将完全没有主教，最后，没被更换的吉洪派狂热信徒剩下了5人。这样，如果把这些“忠诚”者中的一半算入吉洪分子，那么，吉洪派半数主教已被革新派教徒和半革新派教徒取代。

彻底摧毁吉洪和半吉洪主教团并剥夺他们对教会的管理，只有在不理睬让结婚神甫当主教的教规，并从他们中选出有各种观点的主教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主教团明显地会反对吉洪及其政策。

在我看来，把吉洪分子逐出教区理事会不是坏事，可示范性地开始这项工作，即鼓动一部分教徒去反对另一部分教徒。通过组织“革新运动的热心捍卫者”的在家人团体，是实现这个任务的。以克拉斯尼茨基10月28日在救世者基督修道院所作的试验为例，他在那里讲完话以后，邀请了12个在家人加入了革新派团体，在名单上列出了他们的详细地址。确实，这个数字是少了些，但是试验证明，甚至在这个修道院在家人也有的是革新派。

就完成这个任务来说，即要摧毁和使迄今仍具首要意义的吉洪

派威信扫地，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将开始一个混淆教会团结的时期，毫无疑问，这应该在僧侣中发生，即把教会分裂成几个团体，而他们每个团体都将力争进行和施行自己的改革。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要司6处处长 叶·杜契科夫

附录4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关于反宗教宣传的提纲（节录）

（8）必须客观地对待教会中开始的勾心斗角，首先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集团都没有理由宣称自己对其他集团有道德上的优越感，在沙皇专制时期，他们所有集团的行为是同样的，同现在一样，他们都热衷于敛财和使自己的收入保留和扩大。这是绝大多数僧侣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动机。

（9）各个僧侣集团间日益深化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能为喜欢其中某一个提供理由。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他们不是直接和积极地反对革命，所有这些集团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样竭尽可能地保留中世纪的世界观，他们同样想巩固祭司职业的存在，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12）俄共应该利用教会内部激化的斗争和勾心斗角，不仅仅为了亲近一方而疏远另一方，而且为了（1）消除在教会和僧侣的帮助下为反革命得到炮灰的可能性。（2）使群众与一切宗教脱离，用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良好的科学概念取而代之。

№04720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2年11月28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1922年11月12~27日的工作报告

委员会及其下设机关在报告期间的工作总结如下：

1. 直接反宗教宣传鼓动

决定关闭《科学与宗教》报，这家报纸阐述过教会分裂问题，接受过党的资助，但是最近态度暧昧。决定由《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刊反宗教报纸，以代替《科学与宗教》报。初期每周出一期。报纸应具有普及性质，供广大工农读者阅。报纸的任务在于：根据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阐述教会内部发生的事件，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以及用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阐述形形色色的宗教偏见（除东正教和各教派的信仰外，还包括所有的所谓异教和非正教的宗教信仰）。

任命弗列罗夫斯基为报纸责任编辑。吸收加尔金同志和扎科夫同志（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主任）作报纸的最可靠撰稿人。刊物的整个技术部分已筹备妥当。下周可出第一期。

决定出月刊杂志做为报纸的副刊。其形式应为科学宣传性质的

插图杂志。

责成弗列罗夫斯基同志负责刊物的技术组织工作。

委托克拉西科夫同志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之前为委员会制订一个出版计划，出版包含反宗教内容的书籍，并能在近期内通过《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实现此计划。

2. 打击以“吉洪派”为首的教会反革命活动。

由克拉西科夫、明任斯基和波波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审理因积极参与“吉洪派”活动被揭发的主教、神甫和俗人教徒案件。决定对其中的一部分人给予行政处分，流放2—3年。济良省（流放点距铁路1.5千俄里，绝对荒僻）和希瓦首批指定做为流放地。就地理形势和民族特征来看，认为这些地区对于反动的神职人员是特别适宜的流放地。决定将在押的另一部分主教和牧师、即吉洪安插在最高教会理事会和旧最高教会管理局里最亲密的原同事随同前大牧首一起送交法庭。责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察员阿格兰诺夫从速处理这些案件。通过中央书记处向莫斯科委员会（同委员会商议）邀请卢宁同志协助阿格兰诺夫工作，卢宁是负责重大莫斯科教徒诉讼案的检查官。此诉讼案于五月审理过并提供了法律制裁吉洪大牧首的原始材料。

为实行法律和行政惩治，采取措施向“新生教会”和最高教会管理局代表索取具体材料，证实吉洪派神职人员中的某些人物和反动俗人教徒的反革命活动。

3. 瓦解东正教教会

已采取措施成功地制止了革新派诸集团激烈的“内讧”战争，目的在于创建哪怕暂时的反对“吉洪派”的共同阵线，因为最近吉洪派势力明显地强大起来。其结果是最高教会管理局加强了惩治“吉洪派”分子的活动（几十名主教被革除职务），并通过一系列决议，以表示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其中包括规定11月7日为教

会节日（确有关于隆重庆祝这一节日的报道，比如在坦波夫，有4名主教，20名司祭和近2000名俗人为庆祝十月革命五周年参加大教堂的祈祷仪式）。最高教会管理局原则上确定在不久将来的将来采用公历制，并对所有的教会节日做相应的变动。上述举措的意义首先在于进一步加剧了教会分裂。最近可以看到最高教会管理局绝对执行主管机关的一切指示的情形，及指示对其工作的影响。

最近，最高教会管理局正在热火朝天地筹备宗教会议。撰写各种提纲。有充足的根据可以预料，组成最高教会管理局的三个教派（复兴同盟，“新生教会”和古代圣徒教会）将在宗教会议上进行程式化的热烈争论。不久前，在最高教会管理局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团体“劳动教会”，他们的口号是“资本家从教堂滚出去”。这个团体有意要求参加宗教会议。

已经看得出俗人教徒分裂的某些迹象。在莫斯科已经成立“新生教会”俗人小团体，它日内将发布呼吁书，口号是“把反动分子从教会委员会中赶出去”。（此团体包括知识分子代表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但没有工人）。对地方上相应的部门也发出类似的指示。

瓦解教会的工作需要资金，这笔费用由委员会支付。

4. 同教派分化现象作斗争。

研究宗教分化运动当前的形势可能使委员会清楚认识现在苏维埃联邦境内存在着两类教派：一类是坚定地忠于苏维埃政权者，且不构成任何危险。他们是莫罗勘派教徒，反正教仪式派教徒，史敦达派教徒等；另一类是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或无政府主义小市民，他们同国外反革命圈内保持广泛的联系。第二类还包括托尔斯泰主义者（特别是以切尔特科夫和布尔加科夫为首的右翼），浸礼派教徒、福音派教徒、基督教青年人协会等。

彻底效忠于过去沙皇军国主义的浸礼派和福音派教徒特别固

执，不愿在红军中服役。

为同在宗教分化运动掩护下的反革命活动斗争，委员会决定：第一，核查关于教派教徒服军役的法律条文，以便对于革命前从未服过兵役的教徒今后实施免除兵役办法；第二，在红军及其辅助人员精减的情况下，有必要首先清除那些不愿意庄严宣誓拿枪捍卫祖国的人。决定将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基督教青年人协会”的右翼领导人（有7名）立即驱逐出境。至于浸礼派教徒和福音派教徒问题，委托最高教会管理局收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材料。

5. 有利于党同宗教信仰和形形色色迷信作斗争的法律措施。

委员会制定了关于进口宗教书籍的规定（经政治局批准），以便将进口限制在最低数量。审查了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草案，目的在于设置一系列障碍，阻止在全俄范围内组织宗教团体（草案交由明任斯基、克拉西科夫和拉维奇组成的专门分委会做详细说明）。涉及到我们的宗教政策和与某些外国国家关系的许多问题仍在审议中。

在委员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克拉西科夫同志宣读的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撤销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局（国家与教会分离局）的通知。委员会最坚决地反对这一撤销决定，因为它给委员会带来麻烦和困难，因此决定向党、向苏维埃对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提出申诉。

1922年11月28日

委员会主席 H. H. 波波夫

No 05396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致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

（1922年11月28日）

委员会及其所建的辅助机构的工作在总结时期表现如下：

1. 在直接反宗教宣传鼓动领域

决定关闭最近由党资助的、但没有明显特征的阐述教会分裂问题的《科学与宗教》报。为代替《科学与宗教》报，决定出版附属于《红色处女地》的反宗教报纸，一开始每周一次。报纸应该具有普及性，面向广大的工农大众。报纸的任务是：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阐述教会内发生的事件，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宗派运动，以及从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阐述与各种各样和变异的宗教偏见（包括正教信仰和各宗派在内的一切所谓的异教信仰和非斯拉夫信仰）斗争。

报纸的责任编辑是福列罗夫斯基同志。决定吸收加尔金同志和扎科夫同志（文化部宣传鼓动司司长）在其中进行密切的合作。出版的所有技术工作可以认为已安排就绪。第一期将在下周出版。

决定随报纸以科普画报的形式出版每月的副刊。出版的技术性组织工作委托给福列罗夫斯基同志。

委托克拉西科夫同志在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前准备具有反宗教内容的小册子和丛书的出版计划，这将在最近通过《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实施。

2. 在与“吉洪帮派”为代表的教会反革命进行具体斗争的领

域

由克拉西科夫、明仁斯基和波波夫同志组成的专门下属委员会审议了被揭发为“吉洪帮派”的积极分子的主教、神甫和在家人的案件。其中一部分人被判处刑期为2~3年的行政流放。作为流放地点，首先指定的是济良州（有几个地方离铁路数千里之遥，绝对是荒漠和偏僻地点）和希瓦，就它们的地理和人口状况而言，被认为是流放反动僧侣的最佳地点。至于另一部分处于监控下的主教和神甫，以及吉洪在主教公会和旧的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亲密同事，决定与前大主教一起对他们进行审判。处理案件的工作紧急委托给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侦察员阿格兰诺夫同志。为帮助阿格兰诺夫同志，通过中央书记处向文化部（与它商议）要了鲁宁同志（他是5月份莫斯科教会成员大审判案的检察长，并为审判吉洪大牧首提供了原始资料）。

采取措施，从“新生教会”和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代表处得到具体资料，查明吉洪派僧侣和反动的在家人组成的某些人的反革命勾当，对他们进行审判和采取行政措施。

3. 在瓦解东正教教会领域

所采取的措施能够暂时中止革新教会集团激烈的“自相残杀”，以建立哪怕是暂时的共同战线以与“吉洪帮派”进行斗争，吉洪派势力最近显著地增强了。其结果是，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加强了对“吉洪分子”的镇压（撤消了数十个主教），通过了一系列证明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决定：其中包括承认11月7日为教会节（有隆重庆祝这一节日的资料，如在坦波夫，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教会祈祷中，有4名主教、20名神甫和6000名在家人参加）。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原则上决定在不远的将来实行新历法，教会的所有节日也作相应的变动。上述措施的意义首先在于进一步加深教会的分裂。可以指出，最近，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不折不扣

地执行了相应机关的所有指示，并加强了对其工作的影响。

最近，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对教会大会的准备工作活跃起来了，正在制定各种提纲。有一切理由期待在教会大会上将有加入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三个集团（复兴教派、新生教会和古使徒教派）的激烈的宗派争论。前不久，在最高宗教事务管理局之外产生了“劳动教会”的新集团，其口号是：“打倒寺院中的资产阶级”。这个集团打算要求承认自己在教会大会中的地位。

在在家人中也出现了分裂的某些征兆。在莫斯科已建立了“新生教会者”的在家人的紧密集团，不日将发表自己的宣言，口号是驱逐教区理事会中的一切反动分子（知识分子和耐普曼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加入了该集团；没有工人）。类似的指示已通过相应的渠道发给了各地。

瓦解教会的工作需要拨发由委员会支配的资金。

4. 在与宗派斗争领域

研究现在的宗派状况使委员会有可能确认在苏维埃联邦目前存在两个范畴的宗派：（1）明确地忠实于苏维埃政权，对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危险的教派：莫罗勘派，反正教派教徒，史敦达派教徒等等；（2）倾向于资产阶级复辟或无政府市民阶层和与国外的反革命分子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教派。属于后者的有托尔斯泰分子（特别是由切尔特科夫和布尔加科夫领导的右翼）、浸礼派教徒、福音派教徒、基督教青年联盟等等。

对于完全忠实于过去的沙皇军国主义的浸礼派教徒和福音派教徒来说，其特点是不愿在红军中服役。

为了与在宗派旗帜掩盖下的反革命作斗争，委员会决定：（1）准确规定调整宗派教徒服兵役的法律条款，以便免除兵役以后只适宜于革命前不服兵役的宗派教徒；（2）在红军及其辅助人员裁减时，认为必须首先清除不愿意庄严承诺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的分

子。决定对托尔斯泰分子和“基督教青年”的领导人员（人数为7人）立即驱逐到国外。关于浸礼派教徒和福音派教徒，委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收集确认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资料。

5. 在保证党与宗教和一切形式的神秘主义斗争的法律措施领域

委员会制定了进口宗教文献的条例（由政治局批准），力求使这种进口减小到最低限度。审议了注册宗教社团的条规草案，条规为在全俄范围内（草案的敲定转交给由明仁斯基、克拉西科夫和拉维奇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分会）组织这样的社团设置了障碍。涉及到我国的教会政策和与某些外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现在正处于审议阶段。

在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听取了克拉西科夫同志关于小人民委员会^①的决议——撤消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司（教会与国家分离司）的通报。委员会坚决反对这种撤消的作法，它使委员会的工作复杂化和变得困难。决定既通过苏维埃，又通过党向小人民委员会的决议提出申诉。

委员会主席 尼·尼·波波夫

^① 小人民委员会是苏维埃俄国人民委员会（即政府）中一个范围更小委员会，相当于人民委员会中的常务组织。

№04721

布勃诺夫给政治局的便函和政治局
关于增补人员的决定草案

(1922年11月29日)

俄共中央政治局：

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请允许我提出关于俄共莫斯科委员会代表参加反宗教宣传鼓动委员会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主任 A. 布勃诺夫

1922年11月29日

政治局关于充实反宗教委员会决议草案

委派俄共莫斯科委员会代表索林同志以全权成员身份参加委员会（经泽连斯基同意）。

1922年11月“ ”^① A. 布勃诺夫

^① 原文如此。

№04722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2年12月12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H. H. 波波夫的报告

兹将过去两周内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报告如下：

1. 反宗教宣传鼓动

指定由《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丛书和小册子的计划已经审议批准。在这些书中有拉法格的小册子，倍倍尔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打算出版德文译著和成套出版老的两卷本德国社会民主党书刊《德国文化联盟》^①。经委员会和中央宣传鼓动部同《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协商，打算在近期内派遣负责同志去柏林，采购现有的适合翻译的反宗教书籍。委员会感到日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俄国教会历史及教会与国家关系方面的书籍严重缺乏，且又完全没有创作力量能立即着手填补这些空白，所以只好求助于红色教授学院。他们打算订购一批拜占庭和俄国教会史专著。

上次报告中提到的第一期报纸由于任编辑弗列罗夫斯基同志生

^① 此处为德文 Kulturbilder。

病未能出版，尽管技术方面已经筹备妥当。

委员会决定不再出版杂志，因为不久文化部将出版通俗的反宗教杂志。

2. 同吉洪反革命的斗争

以主教为代表的旧教会“头脑”被黜免之后（见上述总结报告），教会反革命还有两个据点：一部分不情愿接受教会改革的反动的白神职人员，在地方上人数众多；在以教区理事会成员为代表的非宗教教会官僚们中间发现有大批的旧军官、大官僚和贵族地主，他们拒绝没收教会珍品，又同诉讼案有牵连。在地方上可以看到敌视改革的神职人员，他们依靠反动分子把持的教区走上完全独立的道路。在完全独立的幌子下掩饰着与最高教会管理局分离的倾向，他们期待着恢复“合法”的教会政权。

委员会坚信，从最后的巢穴里把教会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是必要的，决不能手软，在最残酷和镇压面前不能止步。因此，委员会委托最高教会管理局迅速采取措施最准确地查明窃踞教区理事会的所有反动分子及宗教界继续同反动分子接触和积极执行吉洪政策的代表人物。此外，正如前面的总结报告所述，已向地方传达了有关分化俗人教徒的指示。

最近在宗教会议宣传高潮到来之前，由于已经采取了措施，可望从教会中清除一大批反革命的积极追随者。

吉洪案的侦讯工作有进展。近日原大牧首已受到审讯。从吉洪在审讯过程中的表现来看，他在法庭上不会有顽固不化的表现。审讯工作仍将继续。

3. 瓦解教会

委员会注意到在各省区发行的多种革新派机关刊物是靠我们出资办刊的，但这些刊物表现同一种倾向：它们不同教会反革命斗争，而是从事神秘论研究和专心于宗教教义。为纠正这种倾向，打

算关闭大部分机关刊物（为此只需扣发资助金就可以），其余机关刊物（在有教会活动的大的中心省市）应受到严格的监督，依照宗教政策规范其工作方向。

至于在中央，决定支持最高教会管理局创办的供宗教会议宣传使用的杂志。最近该杂志因资金短缺未能出刊……杂志的出版工作自然要受到极严格的监督。

著名的彼得堡大司祭弗维斯基为委员会筹备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提供了一份提纲，此提纲阐述了教会计划改革的基本任务。

提纲的第二部分指出，宗教会议应该通过正确组织俄国东正教内外的教会生活来恢复基督教在现代人意识中的地位，东正教应当成为其他基督教的楷模。

提纲的作者认为教会中的反革命是当前教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会反革命是国家对教会世代（从第四世纪起）奴役的结果。国家表面上支持教会，而实际上扼杀教会，驱使她为国家效劳，而不为基督效力。这种共存关系对于许多教徒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自然的。因此必须进行顽强的工作才能改变效忠国家的传统习惯。教会对于国家必须遵守坚定不移的原则。‘该撒的物，应归该撒；神的物，就应归给神’。

教会不应混淆教会使命和国家使命，从而不参与苏维埃建设。她有权从超世俗福音的高度，从宗教道义方面衡量苏维埃当局的使命。教会认为这样做就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基督至上的真理。”

其次，提纲展开话题，谈到祈祷仪式的改革，意在简化祈祷仪式，向群众意识靠拢；谈到僧侣的民主化（授予已婚神甫以主教职位）和根据时代精神审查所有的教规。

在莫斯科，尤其在彼得格勒，最高宗教管理局和团结在它周围的改革派在其活动的每一步骤都遇到抱得紧紧的反革势力的强烈抵

抗，因为多数教区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革新派在各省，特别在边疆区（西伯利亚、东南地区）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4. 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教派作斗争

上次报告中确定的一些措施已经实施（清除了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基督教青年联盟的一些右翼领导人）。关于浸礼派和福音派的材料仍在继续收集。

5. 政权与教会之间的法规关系

关于归还教堂一事，天主教神职人员代表一贯拒绝以教徒团体名义与当局机关签约。委员会研究过这一问题，为此决定给司法人民委员部下达指示，不经签约，无论如何不能把教堂交还给天主教徒，把教堂暂时封闭。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梵蒂冈方面谈判未结束之前暂不把教堂交给任何宗教团体或挪做民用。

致同志的敬礼！

H. 波波夫

№04723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3年1月1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H. H. 波波夫报告

兹将委员会在报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汇报如下：

1. 反宗教宣传鼓动

《无神论者报》开始出刊了。此报出版的准备工作情况在前面一些报告中曾经汇报过。关于报纸的名称问题，委员会同报纸编辑弗列罗夫斯基同志产生了某些意见分歧。弗列罗夫斯基同志坚持命名《无神论者报》，而委员会表示反对。中央书记处赞同了弗列罗夫斯基的意见，解决了问题。

《无神论者报》只出刊了两期，发行量 15000 份。到 12 月 29 日前报纸还有 150 份库存。编辑工作有一些困难，因为担任编辑的弗列罗夫斯基同志生病，休假 1 个半月。

其次，指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赶在所谓共青团圣诞节之前出版《上帝是怎样诞生的》小册子的问题。这部小册子已经分发给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在最近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听取了斯捷潘诺夫斯基同志的报告，他从乌克兰讲学归来。斯捷潘诺夫斯基同志在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哈尔科夫等地做了一系列反宗教内容的演讲。每次演讲座无虚席，获得极大成功。

2. 同教会反革命活动作斗争

克拉西科夫、明任斯基和波波夫组成的特别分委会受委员会的委托，审核了神职人员和俗人教徒代表跟随吉洪派积极参与反对宗教革新派运动的案件，并对此案件做出相应的结论，或流放或关押。

再一次给最高教会管理局下达指示，要求迅速清查那些在教区理事会里积极推行吉洪派政策，又能在宗教会议上左右俗人教徒选举的人物。清查期限为二周。

在地方上，个别教区根据吉洪大牧首两年前针对苏维埃当局镇压教会头目一事发布的人人皆知的指示精神，仍继续表白说自己是不问政治的，宣扬教会独立的（即完全独立，自我管理，不承认以最高教会管理局为代表的现行教会当局）。不言而喻，不问政治和教会独立都是为吉洪派打掩护。为此，国家政治保安局向地方做了解释。最高教会管理局因为闹教会独立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解释说宣扬教会独立是新形式的教会反革命。从各机关向最高教会管理局呈上大批郑重声明书，控告神职人员和俗人教徒中那些执行“教会独立”的人的反革命活动。依据上述声明书将这些人关押起来，立案审讯。

但是有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不但不支持革新派反对“教会独立”分子，反而用他们的民主词藻（个别教区完全独立等）哄骗自己，几乎保护了教会独立活动。真奇怪，这种现象居然发生在彼得格勒，吉洪派打着独立的幌子兴风作浪，而革新派却完全无人理睬。出现这种触目惊心的不正常现象的原因在于，彼得格勒“执行”宗教政策的不是在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管理部门。

委员会秘书，国家政治保安局机要司第六处处长杜契科夫同志已前往彼得堡详细调查当地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

吉洪案的侦讯工作仍在进行，目前进展顺利。

由于即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委员会举行了由部分省委和州委书记和宣传鼓动部部长参加的专门会议。将近40人出席了会议。所有的边疆区和最重要的中部地区省份都派了代表。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两个报告：关于瓦解教会工作和宗教会议的筹备工作及党在宗教政策上的当前任务。两个报告的提纲事先经过委员会全体会议审批。第一个报告是萨姆索诺夫同志的汇报性质的报告；第二个是波波夫同志的指示性的报告。第二个报告的基本要点是：必须在最近期间彻底摧毁吉洪派教会组织，在完成此项任务之前，先把同革新派的斗争推向前进。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粉碎了主教团和利用对主教团僧侣的帮派仇恨情绪瓦解了白神职人员，但粉碎和瓦解教区理事会的主要教会组织的工作至今尚未着手进行。报告指出，现在就必须着手做吉洪诉讼案的政治准备，并加强反对教会反革命的联盟。报告特别强调，僧侣、主教团及安插在教区理事会里的那些黑帮——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们所起的作用。

3. 瓦解教会

最高教会管理局获权在最近召开的、有自己全权代表参加的宗教大会上决定过公历新年。在这次大会上审议了各个宗教团体关于当前教会改革的提纲。提出提纲的有“古代圣徒教会”和“新生教会”。“古代圣徒教会”的提纲提到恢复原始基督共产主义，取消宗教仪式和圣礼，彻底修改教规，不征收教会圣礼款。“古代圣徒教会”就其取消主义的纲领来说得不到宗教界广大阶层的支持，其成员威望也不高，我们利用此团体只是为了从左的方面批评“新生教会”的模棱两可和不彻底性。最近由于革新运动最大的活动家弗维坚斯基大司祭归并过来，“新生教会”的势力得到加强。但是在内部，弗维坚斯基不赞同克拉茨尼斯基的意见，也不满意安东尼提出的“教会复兴同盟”的过分温和纲领（也可能不满意这里的首脑位置无空缺）。这个团体的基本特点在于要求剥夺那些按苏联宪法规

定不享受选举权的人在教区理事会的选举权。

相反，“新生教会”的提纲如果不算她提出的剥夺僧侣的特权，关闭教堂和允许白神职人员代表升为主教等问题，那么关于革新部分就说得太少了。提纲主张保护中央集权的等级制教会组织及其上层的行政管辖机构——最高教会管理局。毋庸置疑，近来“新生教会”加强了自己对于白神职人员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制造一种气氛，使每位神甫都幻想在不远的将来当上主教。

安东尼的“教会复兴联盟”暂时未提出自己的提纲。据认为，这一集团不肯亮出自己的主张是因为它不知在宗教会议上究竟采取什么策略。有可能会议上的状况会把这一集团推向吉洪派的怀抱。

在最高教会管理局全权代表会议期间，局内各集团之间关系紧张起来。“新生教会”是其中势力最大的组织，它试图在主席团内保持稳定的多数，以对付其他一些集团。在此基础上纠纷激化，经国家政治保安局干涉才平息下来。

在最高教会管理局管辖之外，不久前成立的“自由劳动教会”也开展起自己的活动。在这面旗帜下结成一伙成分相当复杂的联盟：有无政府主义者——生物宇宙学家斯维雅托戈尔；有1918年试图组织基督教社会民主党的日尔金；失宠的主教普佳塔，因一贯破坏第7戒条被黜免主教教职，他是原卡卢加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盟主席，自封主教，曾获约尼基称号。

“自由劳动教会”提出口号是：“资产者从教会中滚出去”，它彻底否定宗教仪式和圣礼，认为旧的基督教已经过时，宗教的作用必定由科学来取代（尤其是因科学方法将很快在人生中永存），而教会应改做气象站。“自由劳动教会”在报上发表的演说在所有侨民报纸上引起反响。该集团的领导者们收到大批的“祝贺信”和谩骂信。12月31日“自由劳动教会”拟举行首次公开演讲会。已经下达指示，让莫斯科苏维埃管理部门为他们提供空闲教堂。

委员会讨论了在莫斯科日渐频繁的辩论会，在会上我们的同志同革新派教士一起发表演说。这种辩论会很吸引人，致使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也决定在校内举办萨拉比亚诺夫同志的报告会，在报告中把弗维坚斯基及另三位教士做为正式论战对象（在校园内）。委员会认为这些辩论会（享有充分权利的双方在场，又出海报加以说明）会引导革新派教士，使他们脱离与吉洪派作斗争的直接任务，原则上是不可取的。根据委员会的指示，通过中央宣传鼓动部取消原定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举办的辩论会，尽管受到创办人的最强烈的反对。

最近地方上越来越多地提出询问：对于伊斯兰宗教组织应该执行什么政策，在该组织内正在发起类似新生教会的运动。委员会决定专门研究此问题并在最近的某次会议上听取专家的报告。

4. 调整教会与国家关系

委员会审议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党中央转来的天主教徒的呈文，要求开放苏维埃政权命令关闭的天主教堂。委员会表示坚决反对开放天主教堂，直到天主教教徒执行宪法的规定。委员会讨论了德国政府提出的应准许为门诺派教徒进口宗教书籍的申请。委员会认为此申请完全是非法干涉俄国事务，因为门诺派教徒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说得更准确些，是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而在拉巴洛条约中没有一项条款授权德国政府为这部分或那部分俄国公民提供宗教需要。

И. 波波夫

1923年1月1日

№04724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3年1月17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H. H. 波波夫报告

关于反宗教宣传鼓动工作，首先应当指出过共青团圣诞节的问题，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积极参加了过节的筹备工作，但没有直接干预政治方面的和具体的领导工作，因为在莫斯科范围内应由莫斯科党委实行领导。根据委员会掌握的材料，我们认为莫斯科市过节活动过程大体上是顺利的，尽管还有过火之处，但不大，也无关紧要。我们还未掌握足够的材料说明在各省过节的情况。显然在那些地区过失会更多（比如许多城市做祈祷时带着反宗教情绪的游行队伍滞留在教堂门前吵吵闹闹进行示威）。暂时未得到有关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过火行为”的报道。很可能会有，而我们只有关于莫斯科和少数大城市的充分可靠的材料。我们可以举出明显的例子，革命军事委员会乌克兰政治保卫局下达命令，要求全体红军战士必须在营房里庆祝共青团圣诞节，军官也都参加。这种命令极不恰当，因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刚刚三年，宗教偏见在乌克兰比在俄罗斯更强烈，影响力更大。同时必须指出，在红军队伍里进行反宗教宣传要求做法特别慎重，讲究策略。因为来自农村的青年红军战士，宗教信仰还很强烈，这一点从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不止一次的郑重声明中可以看得到。

无论如何，今后再过共青团节日时，中央必须为中心城市制定极准确明了的指令，不容许马虎从事，绝不能放松对共青团节日的监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反宗教节日活动才能成为清除宗教偏见的有效武器……。应当看到《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在出版反宗教书籍方面，正在不断扩大出版规模。最近几周内出版的书籍有 B. 布劳恩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神是怎样诞生的》，德列夫斯的《基督神话》，杜纳耶夫斯基的《基督神话》，达斯纽克的《论鬼和神》，弗鲁姆金娜的《拉比滚蛋》，切米什的《费尔巴哈及其时代》，还翻译了一系列德文书（如《异教圣经》，《德国文化联盟》，倍倍尔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等）。一周前在《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编委会会议上做出决定，立即筹备出版关于世界和人产生的系列丛书，借以直观地驳斥宗教观点。

在同宗教反革命作斗争方面可以举出在审讯吉洪大牧首过程中所获得的许多重要事实。这些事实使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此诉讼案的起诉人是不会败诉的。吉洪和他的心腹尼坎德尔认罪说，他们因没收教会珍品一事向教徒发布呼吁书是期望人民骚动起来，迫使苏维埃当局停止没收珍品，又说用教会珍品赈济饥饿者与教规没有矛盾。审讯中我们问吉洪：根据什么说没收珍品是亵渎神圣，为什么威胁俗人教徒和司祭说，如果他们执行政府要求交出珍品便被革除教籍。吉洪对问题只能回答说，苏维埃当局同他就没收珍品问题进行过谈判，显然是当局有意经过大牧首的批准之后才采取行动。后来中断了谈判，便开始独立行动。我们再提出问题：按教规，当局是否应请示大牧首批准，吉洪当然只能做否定的回答。吉洪的供词更有意思。1919年秋，战术中心、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的代表团同他举行过正式谈判，谈到推翻苏维埃政权之后未来的教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吉洪供出参与谈判的代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里昂季耶夫和沙霍夫斯科伊。这不仅证实了大牧首的供词，

而且做了某些补充。特别是里昂季耶夫说，在谈判结束时吉洪大牧首把赠品送给代表，做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礼物。

其次，吉洪承认经他同意于1918年初在莫斯科设立教会委员会的军事组织，据说是给大牧首做警卫的。但是在社会革命党中央案件的侦讯书中有材料证明，教区委员会的这种组织同社会革命党兵团，家庭警卫组织，白匪军官团有联系，并服从立宪会议党团局成员和社会革命党莫斯科省委员会主席帕夫洛夫博士的统一指挥，他们不只是给大牧首做私人保卫，还有更广泛得多的意图。

现在侦讯工作已转入调查吉洪与国外白匪教会组织的关系，因为这些组织至今仍积极参加君主复辟运动。

在瓦解教会方面，在报告期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需要指出的。因为过圣诞节，在最高教会管理局内一切活动停止了。委员会秘书杜契科夫同志前往彼得堡调查彼得堡苏维埃上层领导在宗教事务中的政治路线。这在上述报告中已经论述过。顺便交给杜契科夫另外一项任务，就地仔细了解采普利亚科主教（罗马天主教）的案情。政治局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报告，未经反宗教委员会的同意，决定将此案提交审理。其实，按委员会现有资料（部分取自国家政治保安局，另一部分取自中央波兰局）来看，此案件的准备极不充分。克拉西科夫同志审阅过起诉书之后也有同样的感觉。

现在有一批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直属少数民族事务分部工作的伊斯兰教徒同志正在按委员会的指示，将伊斯兰教会的情况和教会内现有流派的材料进行分类和系统整理，以供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专题报告使用。

致共产主义敬礼

H. H. 波波夫

1923年1月17日

№04725

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关于俄
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成员补充的决议

（1923年1月18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89号第41项

机密

听取：

41. 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成员补充的问题（布勃诺夫同志）。

决议：请组织局推荐俄共中央委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进入反宗教宣传委员会任委员会主席。任命 H. H. 波波夫为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B. 古比雪夫

№047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
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成员补充的决议

（1923年1月25日）

严格保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同志、加里宁同志（候补委员）、托洛茨基同志、托姆斯基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候补委员）、斯大林同志、布哈林同志（候补委员）、李可夫同志；中央委员斯米尔诺夫、拉科夫斯基、索柯里尼科夫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索尔茨。

听取：9. 关于反宗教宣传委员会成员补充问题（组织局1923年1月18日决议第89号第41项）。

决议：9. 批准组织局1923年1月18日的决定，任命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为反宗教宣传委员会主席，H. H. 波波夫同志为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05074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11次会议 纪要的摘要

(1923年1月30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出席者：斯米多维奇同志、波波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克拉西科夫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斯克沃尔佐夫同志、萨姆索诺夫同志和杜契科夫同志；就吉洪案件邀请阿格拉诺夫同志和克雷连科同志。

听取：议程一，关于吉洪案件。

决议：1. 案件诉讼程序3月25日前结束。

2. 在侦查材料上指出下列方面：(1) 和政教分离的决定作斗争；(2) 打开圣尸^①的斗争；(3) 对抗没收教会的贵重物品；(4) 系统的反革命活动。

3. 建议最高法庭暂调必要的力量归国家政治保安局调配，以从事这一案件的侦查。

4. 被告和证人的人数限制到最低数。

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① 圣尸是教会保存的圣徒的干尸。

№04727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3年2月16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直属反宗教委员会于1923年1月30日至2月15日的工作报告

1. 直接进行反宗教宣传鼓动方面

(1) 《无神论者报》改为周刊后，已出过8期。杂志一期比一期办得好。人们对此杂志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发行量在扩大，虽然增长有些缓慢。原来许多省委员会还不知道有这份杂志。现已经向省委员会，州委员会和县委员会分发了《无神论者》杂志试刊，并专门做了指示，建议系统订购和广泛传阅此杂志。任命叶·雅罗斯拉夫斯基为杂志编辑。杂志上刊登的是一些科普性文章，现在正配合吉洪案和采普利亚科案的审理工作组织稿件。

(2) 曾尝试将中央委员会出版的《无神论者》和莫斯科委员会出版的同名讽刺杂志合并，归属于统一的编辑部。但莫斯科委员会认为合并不利（虽提不出任何理由），认为这将失去利用机关刊物进行反宗教活动的机会。

(3) 《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将出版系列丛书和小册子，现在正准备印刷。有些书，例如《神是怎样诞生的》发行后立即售完。还

翻译了一些德文和意大利文书。其中……^①将分册出版。正在翻译埃里捷尔曼的《原始共产主义与原始宗教》。德列夫斯的《基督神话》，达斯纽克的《论神和鬼》和弗鲁姆金娜的《拉比滚蛋》都已问世。

(4) 考虑到在各地过“共青团圣诞节”的经验，也考虑到过复活节还会有组织类似的反宗教活动的愿望，反宗教委员会决定草拟中央委员会关于共青团复活节的通令函，建议各个组织极其严肃地安排反宗教宣传活动：不举办化装联欢会，要精心地进行宣传工作，出版书籍，演出戏剧和电影，举办演讲会和报告会等等。要向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们讲明这样做的政治理由。这就是：最高教会管理局在筹备代表大会；不动声色地发动农民群众；农民们缺乏思想准备；反犹太主义者的情绪；可能有农民欠收，后者可能被当做借口说是不信神的结果等等。

2. 打击以吉洪派为代表的教会反革命的具体活动

尽快完成吉洪案的审讯工作。诉讼程序于3月25日前了结。公诉理由有四条：(1) 反对国家同教会分离；(2) 拒绝开圣尸；(3) 抗拒没收教会珍贵物品；(4) 一贯的反革命活动。被告人和见证人控制在最少人数，以便从速结案。

3. 瓦解东正教教会

(1) 准许最高教会管理局下发关于召开宗教会议的条例，但从条例中应删掉有关承认社会革命党和劳动者同盟在宗教会议上的当选人和邀请退休的高级僧侣出席宗教会议的许多条文。

(2) 彼得堡国家政治保安局提出的五名最反动的教徒和教会独立运动领导人被判处流放。

4. 同其他教会组织作斗争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

(1) 决定在莫斯科最高法院先于古洪案开庭审理采普利亚克一案，公诉材料已十分齐备，只是公诉重心应落在采普利亚克的纯反革命活动上。采普利亚克案立案的结果是，教士的全权代表求见克拉西科夫同志，并就教士可能采取的措施和让步进行了商谈，有意改变天主教组织成份，并同苏维埃政权确立比较正常的相互关系和不干预政治的原则。

(2) 委员会认为不返还博博尔的圣尸是比较正确的，有利于反宗教宣传和政治宣传。

5. 同教派宗教团体的斗争

(1) 决定出版旨在反对教派团体，特别是那些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团体（浸礼派、福音派、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小册子。

(2) 从事反军国主义宣传的素食团体的章程不予审批。

(3) 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关于教派对红军影响的报告，报告人杜契科夫。

6. 为便于党同宗教信仰及形形色色的神秘论作斗争所采取的法律措施

(1) 一般认为做祈祷时不使用未成年劳力的法令是对的，因此暂缓执行此法令直到宗教会议的召开。

(2) 在发出特别命令之前（瓦解教会组织的主要工作完成之前）暂缓撤消主教管辖区管理机构。

委员会主席 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3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04728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的便函

（1923年2月28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我请求把教会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问题列入3月1日的会议议程。报告人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副主席 H. H. 波波夫。

中央委员会委员 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

№0472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延期讨论
革新派宗教会议问题的决议**

（1923年3月1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52号第32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加里宁，中央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科夫，鲁祖塔克，斯米尔诺夫，拉狄克。

听取：32. 关于教会宗教会议。（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决议：32. 延期至下次会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30

杜契科夫给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宣传
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备忘录

（1923年3月1日）

绝密

关于宗教会议组建教会管辖机构问题的备忘录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委员会2月27日会议决定，指示宗教会议全面执行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从而撤消最高教会管理局及其一切地方机构（省、县主教管辖区的管理机构等）。这样一来，教士将有权在行政上不再受管辖机构的管辖，授权每个村社（教会）自由选择教士，即独立化。

（2）最高教会管理局的成员们都极不情愿这样做，他们期望宗教会议之后最高教会管理局仍继续存在——他们根本不想要大牧首。

（3）讨论教会管理问题时必须注意如下问题：（1）俗人教士对待革新派运动持否定态度，而革新派教士在他们中间毫无威信。对于取缔最高教会管理局，革新运动的反对者们无所畏惧，他们反而可能聚结起来，加紧活动（革新运动反动者应理解为吉洪派分子）。

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是宗教会议执行法令的最佳时刻，因为领头的教士暂时掌握在我们手里。

最高教会管理局及其地方机构撤销之后将留下革新派团体及其

在中央的管理局原机构，宗教会议闭幕后他们应继续开展自己的活动。这些团体应同现在一样在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进行同吉洪派的斗争。

1933年3月1日

叶·杜契科夫

№04731

**关于保留最高教会管理局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决议和给革新派宗教会议的指示**

（1923年3月8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54号第11项

严格保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托姆斯基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科夫同志，安德烈耶夫同志。

11. 关于教会宗教会议。（克拉西科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

（1）认为最高教会管理局有必要继续存在。

（2）建议委员会想办法让宗教会议在执行政教分离法令时采取相当灵活的形式保留最高教会管理局的权限。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32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总结报告

（1923年3月22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反宗教委员会副主席 H. H. 波波夫报告（3月1—22日）

1. 反宗教宣传鼓动

《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的出版部在出版反宗教书籍方面暂时主要进行翻译工作。在报告期间正在加速此项工作的进行。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20本书和小册子，有6本在印刷中，另外3本准备印刷。同时正着手尝试编写关于俄国教会历史的书籍。将要出版的斯特鲁米林的小册子《上帝和自由》为创作宗教史书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应当指出刚刚发行的 M. 斯捷潘诺夫同志的小册子《反宗教宣传的任务和方法》为此项工作做了总结。针对即将审理的吉洪诉讼案出版了布列霍尼切夫的小册子。为迎接共青团复活节，将出一套专辑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男女诸神是怎样诞生、生存和死亡的》一书。

委员会继续出版周报《无神论者》，（不要同莫斯科委员会出版的同名杂志相混淆），发行量在扩大（从1万份到2万份）。委员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对群众进行反宗教教育主要应当采取深入宣传的方式，必须严肃对待群众的宗教偏见，谨慎从事。委员会坚持不久前，即1922年2月22日中央委员会专门发布的通令中阐述过的观点，所以不能对像莫斯科委员会机关刊物——《无神论者》

杂志这样的刊物置之不理。此杂志最近一期的首页上就发现有这样的口号“让宗教这个坏东西滚蛋”。杂志还刊登了一些简讯，里面对无知的教徒往往使用挖苦字眼（“虔诚的老太婆”），这有可能被用来做蛊惑宣传。与此同时，杂志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如公开煽动拿圣像当柴烧。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对于共产党员和与宗教本来就已决裂的人来说，根本不必要出版这种杂志。而对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或笃信宗教的人来说，此杂志这种作法只能加剧他们的宗教情感。此外，马虎大意的宣传方式还传到省里，至使地方上的党员同志也去干过火行动，尽管他们过去反对过这样做。最近又掀起一股过火行动浪潮，具体表现为群众性地关闭教堂，非法废除协议，任意围攻神职人员。对待教派教徒也有同样的行为。委员会无耐只好通过一系列主管部门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过火行为激起广大教徒的愤怒，特别是在农村。委员会通过中央组织局做出决议，过复活节时禁止举办街头狂欢活动。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无神论者》杂志创办方向问题已提交中央组织局讨论，时间已近一个月，但由于种种原因几次都排不上日程。

近来，委员会正加紧制定反击措施，以制止浸礼派和福音派势力惊人的扩展。在宣传鼓动工作方面，已制定出版反教派书籍的计划，此计划现在正在实施。约定由克拉西科夫、布列霍尼切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邦奇布鲁耶维奇等同志编写小册子。

2. 同宗教反革命作斗争

反宗教委员会在吉洪诉讼案和采普列亚克诉讼案上花费了许多心思。政治局把这两起案件委托特别委员会处理后，反宗教委员会的任务就集中到宣传鼓动工作上。《红色处女地》出版社除出版了布列赫尼切夫的小册子（未指明书名）外，还出版了弗维坚斯基大司祭的小册子，后者以“新生基督教”观点揭露了吉洪。另外论述国内战争时期教会反革命活动的小册子也已交付印刷。根据委员会

的指示，俄共波兰局广泛地使用了采普利亚克案的起诉书，中央报刊也提供了关于吉洪案审讯资料的详细摘要（指诉讼前可以公开的部分）。针对吉洪诉讼案专门给省里出刊了两期《报纸副刊》。

委员会讨论过，根据我们现行的宗教政策对被告量刑的问题，并表示反对施用极刑。

委员会还讨论了采普利亚克案引发的争夺教皇职位的问题，并决定不改变对待天主教所执行的强硬方针。

鉴于浸礼派和福音派上层人物采取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路线（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可是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里这些教派都不做这种宣传；违背法令对儿童秘密施教；浸礼派传教士在地方上经常进行反苏演讲），又注意到两教派在农村势力扩展令人吃惊，委员会决定在中心城市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收集有关揭露浸礼派反革命活动的材料，并以此为依据，将它的带头人驱逐出境。同时决定着手有计划地感化浸礼派的下层教徒，启发他们反对教会中央，因为是中央把教派教士推向反革命政治方向。有根据认为这种内部瓦解的办法将取得良好效果。

3. 瓦解教会

继续加速筹备宗教会议。革新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在这些城市吉洪派分子和独立教会教士（隐蔽的吉洪派分子）的影响至今仍占优势。在彼得堡经过几次较量之后革新派终于把喀山大教堂和伊萨克夫斯基大教堂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莫斯科，监督司祭（几十名）全体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吉洪并表示完全承认苏维埃政权和“社会革命”。

前不久，全俄古代圣徒教会村社联盟代表大会闭幕了。有 26 个教区代表出席了大会。在有最高教会管理局代表参加的所有革新教派中，唯有古代圣徒教会村社联盟最左，它宣称无条件承认苏维埃政权，同时赞成当前的教会改革。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在关于同苏维埃政权关系的决议中说：“现在的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为争取社会正义而斗争的政权。代表大会将以自己的道德威望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伟大原则，支持为俄国和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创举。我们代表大会成员以救世主名义用此决议谴责吉洪派教会，它同救世主教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关于俗人教徒组织做出的决议认为，应立即解散和改组所有的教区理事会是必要的，因为这些教区理事会的多数成员对于基督缺乏爱心，对于现行政治制度满怀憎恨，内心企望通过教会整垮新制度。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应该成为新教区理事会的首脑。

关于教规的决议应该指出以下几点：

- (1) 准许妇女担任教会职务；
- (2) “同迷信、偏见和不学无术的穷凶极恶的神甫（主要是上层）所制造的宗教谎言作斗争”；
- (3) 禁止神甫做主教。

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和原布道士向古代圣徒教会靠拢。其中某些人按思想动向行事。古代圣徒教会的观点未必能取得广大白神职人员的同情，因为他们对于广泛的宗教改革不感兴趣，同迷信和偏见作斗争首先会伤害农村广大神甫的利益。革新派的多数人在宗教会议上表示不赞成古代圣徒教会，而选成以克拉斯尼茨基大司祭为首的“新生教会”。克拉斯尼茨基认为只“承认苏维埃政权，社会革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摘自“新生教会”行动纲领）就足够了。（但不包括要求政权过渡给从黑神职人员转到白神职人员手中的教会，因为神甫群众无疑地追随白神职人员），认为任何教会改革都是歪门邪道。

我们注意到吉洪派在地方上还有很强的势力，在宗教会议上表现还挺神气，所以委员会在宗教会议上准备采取如下策略：(1) 把教规问题删掉，不做讨论议题，教规问题必然引起教会内部纠纷和

决裂；(2) 把宗教会议变成显示庄严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政教分离法令及谴责吉洪的会议（“新生教会”和古代圣徒教会都同样愿意这么做），宗教会议之后让激烈的教会内部斗争更激化起来，因为吉洪派的威胁在减弱。

鉴于党的代表大会和吉洪诉讼案推迟到4月中，宗教会议也延期至4月30日。

4. 调整国家与教会关系

经过长时期工作之后，委员会终于制定出宗教团体登记注册制度，因为宗教团体至今仍未进行登记，这在地方上已经引起诸多误解。依据此制度，最高教会管理局（即将在宗教会议上选举产生）也可以登记，同时保留它对基层教会机关的强制性惩治权。既然教会中央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样一来，教会内部暂时还会保留等级制度，教会当局手中仍握有影响教会政治生活的强有力的工具。

Н. 波波夫

1923年3月22日

№05075

大牧首吉洪致俄联邦最高法院的信

(1923年3月29日)

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法院

我迁至靠近上帝教堂的顿斯科依修道院已经10个多月了，但是我被剥夺了去这些教堂及做礼拜的可能性。未必需要说，这样的剥夺严重地伤害了信教者的心，特别是在节日的日子里。

现在眼看着复活节前一周的礼拜和复活节的崇高的日子就要到来，恳请最高法院允许我在顿斯科依修道院进行祈祷，哪怕是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最后几天和复活节的最初几天也行^①。

大牧首吉洪（瓦西里·别拉文）

^① 大牧首的要求被拒绝了。

№05076

贯彻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18 次会议

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4 月 3 日)

出席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波波夫同志、克拉西科夫同志、斯克沃尔佐夫同志、杜契科夫同志、因吉洪案件而邀请的克雷连科同志。

听取：议程一，关于吉洪案件。

决议：1. 现在还不能预言被告的人数，委托阿格拉诺夫同志讯问弗拉基米尔都主教谢尔盖和基辅都主教米哈伊尔，他们是东正教最高会议和 1917 年宗教会议的积极活动者。此后，克雷连科同志应当决定是否该把他们作为案件被告加以起诉。

2. 委托波波夫同志通过……^① 计算吉洪诉讼程序的开支。

3. 责成克雷连科同志在诉讼程序的第一天就安排好速记记录。

4. 委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杜契科夫同志确定分配诉讼程序的入场券。

5. 认为让克拉西科夫同志作为本案的起诉人是适宜的。

6. 认为必须传唤弗维坚斯基和克拉斯尼茨基^② 作为证人出庭和接受询问。

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

② 两人均为宗教界人士，俄“东正教复兴运动”的领导人。

№05077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俄共（布）

政治局委员们的报告

（1923年4月）

紧急 绝密

致加米涅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耶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

党中央反宗教委员会讨论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代表大会时就推迟吉洪诉讼程序做出的决定。

委员会同意推迟吉洪诉讼程序的某些理由，但坚决反对推迟教会会议。

委员会要求确认以下决议：

1. 不推迟教会会议。采取措施使会议开成谴责吉洪反革命活动的会。

2. 吉洪诉讼程序约在5月中旬或下半月。余下的时间用在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国外舆论关于吉洪反革命活动的材料，以及普通教民和教会会议对他的态度。

3. 在农村中强化对有关吉洪诉讼程序的宣传鼓动是不适宜的。

4. 此外，委员会认为这类问题的决定没有委员会的人参加是极不适宜的，党中央政治局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

5. 委员会告知政治局委员，它认为案件久拖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就给敌人在这段延迟的时间里搞花招和发展狂热运动提供了机

会。

委员会还认为，像在社会革命党人的诉讼程序中所进行的那种过分的文学运动，与其说有益，不如说是有害的（党中央过去也这么认为）。

委员会在宣传运动方面做了以下事情：

1. 印制小册子和散发材料详尽的起诉书。
2. 为省报刊寄送文章。
3. 经常不断地给莫斯科及各省的报刊提供文章。
4. 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所有全权代表处分送小册子，并指示他们把小册子的内容用在国外的俄文和外文报刊上。
5. 寄送专门为外国报刊写的文章。

党中央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E. 雅罗斯拉夫斯基

№0473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增补
成员的决议

（1923年5月2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2号第1项

机密

听取：1. 关于委派俄共莫斯科委员会代表充实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的问题（布勃诺夫同志）。

决议：请政治局推举利哈乔夫同志以莫斯科委员会代表身份及其代理人扎科夫同志进入反宗教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雅·鲁祖塔克

№05078

贝科夫给大牧首吉洪案件主席加尔金的报告

(1923年5月8日)

兹报告，根据您的建议，我和杜契科夫同志及别拉文公民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来到顿斯科依修道院别拉文公民早先居住的地方。

2时40分，经允许由8人组成的地区主教会议的代表团要求会见别拉文公民。

彼得·勃利诺夫都主教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别拉文公民指出，主教会议和地区主教会议做出了一个关于剥夺他的教职、称号和僧侣身份的决议。

诺维科夫公民站着宣读了主教会议的决议；教会地区主教会议在教会会议上以6票弃权而通过的决议，并建议别拉文公民在向祂宣读的两个文件上签字。

别拉文公民对谁在表决时弃权很感兴趣，诺维科夫公民回答他说，他们是：4个在家人、一个是奔萨^①的神甫，还有一个是菲利普·雷宾斯基主教。

别拉文公民指出，在决议上签名的主教中足足有一半人他都是不认识的。

建议他在决议上签字时，别拉文公民指出，他可以签字，但不承认上述决议是正确的，因为其中内容违反了教规。对此，勃利诺夫都主教向他指出，要他签字只是表示决议已向他宣读过了。

^① 俄罗斯的一个城市。

别拉文公民问，他违反了什么教规。对此诺维科夫向他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有详细的报告，这里只是一个决议。

别拉文公民提出一个问题：在主教会议的会议上是否有人赞成叫他去参加会议？勃利诺夫都主教回答说，这个问题没有提出过，因此也就没人赞成他去参加。别拉文提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教规专家”，以此来表达他的意见。

此后别拉文公民在主教会议和教会地方主教会议的决议上签了字。

当别拉文在上述决议上签字以后，勃利诺夫都主教向别拉文公民指出，鉴于他面临被审判和教会会议做出关于撤销他的大牧首称号和僧侣教职的决议，别拉文公民必须脱下神甫法衣，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在家人了。

别拉文公民对这一建议回答说，他不接受并拒绝脱下法衣。

彼得·勃利诺夫都主教再次向他提出这一要求并指出，教会会议代表团坚持要他脱去法衣。还指出，代表团同时认为不服从教会会议决议这一事实是犯罪行为。

别拉文公民再次拒绝履行代表团的要求。

彼得·勃利诺夫都主教第三次向别拉文公民建议脱下法衣，指出，代表团认为不服从是不允许的和犯罪的。他指出了拒绝服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并坚持要他脱下法衣。

别拉文公民回答说，他不能执行代表团的要求。

彼得·勃利诺夫都主教最后问，别拉文公民是否继续不服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列昂尼德大主教向别拉文公民提出一个问题，他是穿法衣上法庭，还是穿普通世俗衣服到庭？别拉文回答说，他将穿神父法衣上法庭。

列昂尼德大主教指出，他们坚决抗议别拉文公民的这一作法，

再次要求他脱下法衣。

别拉文公民说，他以再次抗议他们做出的将撤去其教职的决定，作为回答，他决定穿神父法衣上法庭。

彼得·勃利诺夫都主教说，他穿法衣上法庭的决定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在家人，因此他们，宗教界人士，将为别拉文公民穿了不该穿的服装上法庭而感到羞耻。

乌克兰在家人代表以乌克兰在家人的名义建议别拉文公民脱下法衣，因为不服从教会会议的决议将再次发生与大牧首吉洪的名字相联系的流血冲突事件。

别拉文公民仍然拒绝脱下法衣。

代表团拟了一份关于别拉文公民拒绝脱下法衣的文书。

3时，别拉文公民在拟好的文书上签了名，所有在场的代表团成员也都签了字。

3时零5分代表团离去。代表团离去后，我和杜契科夫同志也离开了别拉文公民的住所。

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最高法庭审判委员会书记 贝科夫

№047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增补委员的决议

（1923年5月10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号第29项

机密

听取：29. 关于反宗教委员会增补莫斯科代表利哈乔夫同志和其代理人扎科夫同志的问题（组织局5月2日决议第2号第1项）。

决议：（1）派利哈乔夫同志去莫斯科委员会接受委任，解除他在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2）批准组织局关于反宗教委员会增补利哈乔夫同志和其代理人扎科夫同志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3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俄
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成员更换的决议

（1923年6月4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11号第21项

秘密

请莫斯科委员会委派科斯捷洛夫斯卡娅同志进入反宗教委员会接替扎科夫同志。

（今年6月1日组织局决议，会议记录第10号第3项）

（1）委派科斯捷洛夫斯卡娅同志进入反宗教委员会做利哈乔夫的代理人。

（2）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局审批。

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莫洛托夫

——原文下方有用铅笔写的政治局表决结果记录：“季诺维也夫同意；加米涅夫不同意，认为利哈乔夫也应该参加委员会；布哈林同意；托姆斯基同意”。

№04736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俄共（布）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增补成员的决议

（1923年6月8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12号第27项

秘密

关于委派教育人民委员部代表参加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的问题
（布勃诺夫同志）

- （1）委派雅科夫列夫同志参加反宗教委员会。
- （2）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局审批。

中央委员会秘书 雅·鲁祖塔克

——原文的下方有铅笔写的表决结果记录：“斯大林同意，
（……）^①，季诺维也夫同意，加米涅夫同意，布哈林同意，加里宁
同意，托姆斯基同意（两份摘录都同意）”，即同意摘录第12号36
项和第12号37项。

^①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

№05079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

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6 月 12 日)

出席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波波夫同志、杜契科夫同志

听取：议程一，关于吉洪。

决议：1. 对吉洪的审讯没有期限的限止。

2. 通知吉洪，对他可以改变强制措施，如果：(1) 他做出一个特殊的声明，对其反苏维埃政权和劳动工农群众的罪行表示悔过，并表示现在忠实于苏维埃政权；

(2) 他承认因这些罪行而受法律制裁是正义的；

(3) 毫不含糊地、公开地同所有反革命组织，特别是白匪保皇党组织，无论其是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断绝关系；

(4) 表示对卡尔洛瓦茨国外宗教会议及其参加者持坚决否定的态度；

(5) 声明以否定的态度对待天主教，还有坎特伯雷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缅列季亚的阴谋；

(6) 表示同意宗教领域的某些改革（例如，实行新历法）。

3. 一旦同意让他自由并转送至瓦拉阿姆宗教会馆，就不禁止他从事宗教活动。

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05080

大牧首吉洪致俄联邦最高法庭的声明

(1923年6月16日)

在押的大牧首吉洪（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拉文）声明：

在向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呈送这一声明时，我认为我是按自己牧师良心和天职来作下述声明的。

作为一个在君主社会里培养出来的人，在被捕前又受了反苏分子们的影响，我确实有与苏维埃政权敌对的情绪，而且这种敌对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消极状态转向积极的行动，例如：关于1918年因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而写的呼吁书^①；同年我咒骂当局^②；最后在1922年呼吁反对没收教会珍品的决议……所有我的反苏活动，除了稍有不确切之处外，在最高法庭的起诉书中都已叙述。在承认法庭根据在上述起诉书中所指出的刑法典中反苏活动条文而追究我责任的决定的正确性的同时，我对在这些过失中反对国家制度表示后悔，并要求最高法庭改变对我的隔离措施，也就是解除对我的监禁。

与此同时我向最高法庭声明，我从现在起不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彻底地和坚决地与国外的和国内的保皇党—白匪反革命断绝往来。

大牧首吉洪（瓦西里·别拉文）

^① 指吉洪1918年3月15日的信，信中吉洪谴责苏俄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② 指1918年1月19日的信。

№04737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向政治局转送
吉洪大牧首的声明书时附带的便函

(1923年6月19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我请求将反宗教委员会提出的如下问题列入近期会议的议事日程。

(1) 关于吉洪给最高法院的声明书，请作指示。

(2) 关于卡尔梅克省伊斯兰教会代表大会和佛教教会代表大会的报道。

(3) 反宗教委员会请求尽快审批第十二届代表大会关于反宗教宣传的决议案。

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3年6月19日

№04738

雅罗斯拉夫斯基给
最高法院的指示（草案）

（1923年6月19日）

关于吉洪的声明书给最高法院的指示草案

鉴于吉洪在声明中表示承认他所犯罪行，并表示愿同白匪军划清界线，我们认为可以解除对吉洪的监禁，但不中断审讯工作，将该决议同吉洪给最高法院的声明书一并公布于众。

№05081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25 次会议 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6 月 19 日)

出席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波波夫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洛基诺夫同志、杜契科夫同志。

听取：议程一，审议吉洪的声明。

决议：1. 将吉洪致最高法庭的声明复制多份，并紧急分送所有政治局委员阅。

2. 对致信教群众的呼吁书作某些修改。

3. 除了这两份呼吁书，吉洪应写第三份致信教群众的呼吁书，其中不触及“革新派教徒”，并作以下表示：

(1) 承认自己反对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劳动人民的罪行；

(2) 谴责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及其他人的活动；

(3) 承认缅列季是英国等国的走卒；

(4) 表示强烈反对波兰政府，以及俄罗斯和外国的白匪，因为是他们把他推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犯罪道路的；

(5) 关于在宗教界实施新的正字法。

4. 所有这一切委托杜契科夫同志加以贯彻，为期 5 天，并在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

5. 委员会认为改变对吉洪的隔离措施是可能的。

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05082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26次会议

纪要的摘要

(1923年6月26日)

出席者：波波夫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斯米多维奇同志、洛基诺夫同志、利哈切夫同志、杜契科夫同志及邀请参加吉洪案件的克雷连科同志。

听取：议程一，关于吉洪和吉洪分子。

决议：1. 6月27日取消对吉洪的监禁。

2. 委托波波夫同志和杜契科夫公布吉洪的呼吁书和反驳词。

3. 应当预先在专页上，而不是在报纸上发表号召书和呼吁书。

4. 委托国家政治保安局利用吉洪的几份呼吁书，逐渐结束与没收珍品相联系的案件，对那些公开声明悔过的吉洪分子免于惩处。

5. 对那些不理睬吉洪的呼吁书不愿意悔罪，而要继续自己活动的教徒，今后继续实行镇压的政策。

6. 将被逐出的教徒中危害较小者作为大赦对象，委托国家政治保安局在最近3个月内审议所有这些案件。

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04739

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给司法人民委员

德·伊·库尔斯基的便函

(1923年7月2日)

库尔斯基同志：

涉及辩护人协会的修正案及对于刑法典第 121 条的补充，即禁止团体性质宗教教义的传授条文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建议无论如何不能采纳这些提案。如果委员会的意见同我们有分歧，我们将此问题提交 1923 年 7 月 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加米涅夫

斯大林

№0474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换俄共（布）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3年7月3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4号第32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拉舍维奇同志、皮达可夫同志、拉狄克同志、斯米尔诺夫同志、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乌格兰诺夫同志、乌汉诺夫同志、丘巴尔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主席团成员古比雪夫同志、索尔茨同志、施瓦茨同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1923年6月28日通过电话询问中央政治局委员

听取：32. 组织局1923年6月4日关于莫斯科委员会请示委派科斯捷洛夫斯卡娅同志进入反宗教委员会替换扎科夫同志做利哈乔夫的代理人的决议。

决议：批准。

中央委员会秘书

——原文下方有打字附注：“表决结果：‘同意’——斯大林，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姆斯基”，接着是手写附注：“加米涅夫（声明：利哈乔夫必须参加委员会）”。

№047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
（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增补成员的决议

（1923年7月3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4号第33项
机密

1923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通过电话询问听取了今年6月8日中央组织局关于委派雅科夫列娃同志代表教育人民委员部进入反宗教委员会的决议。

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04742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 关于反宗教宣传的决议

（1923年7月4日）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第3号第4项

机密

出席者：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哈林同志、伏洛希洛夫同志、捷尔仁斯基同志、叶夫多基莫夫同志、扎卢茨基同志、泽连斯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加里宁同志、加米涅夫同志、科卫林同志、科马罗夫同志、科罗特科夫同志、拉舍维奇同志、米哈伊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彼得洛夫同志、皮达可夫同志、拉狄克同志、斯米尔诺夫同志、索柯里尼科夫同志、斯大林同志、苏利莫夫同志、托姆斯基同志、乌格兰诺夫同志、乌汉诺夫同志、哈里托诺夫同志、丘巴尔同志；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巴达耶夫同志、布勃诺夫同志、列普谢同志、莫洛佐夫同志、斯克雷普尼科同志、乌雷瓦耶夫同志、丘多夫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①基谢廖夫同志、古比雪夫同志、索尔茨同志、施瓦茨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克里沃夫同志、科罗斯捷列夫同志、丘茨卡耶夫同志。

听取：4. 根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审批1923年6月

^① 此后勾掉了基谢廖夫、利罗斯捷列夫和克里沃夫。

26~27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加米涅夫同志)

决议：(4. 7) 认为某些组织的反宗教宣传是不适当的(大规模地关闭教会，为过星期一进行宣传等)，为此责成政治局向各组织发布相应的通令。

中央委员会书记

№ 04743

舒莫夫关于皮察尔多歪曲俄宗教政策 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

(1923年7月9日)

秘密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

契切林同志：

皮察尔多先生强调说，为了解俄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情况，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利用“俄国侨民那些不正确地报道西欧社会见解”的资料。拥有彼得堡高级僧侣和天主教神父案的起诉书和判决词这样一些正式文件就足够了。尽管如此，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处认为必须明确指出，皮察尔多先生对于苏联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的实际情况及苏联政府的宗教政策了解得极不充分，而且其基础是建立在或被歪曲，或模糊不清、不切实际的材料的了解之上的。例如关于刑法典中涉及宗教问题的最初的第119条（刑法典第3章违反国家与教会分离法则，《法律汇编》第12—22号）。

皮察尔多先是这样阐述的：“凡是鼓动不执行或抗拒中央和地方政府命令者，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反革命意图，一律按第83条的规定予以惩处。”其实第119条的准确内容是这样的：“凡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以推翻工农政权为目的，或鼓动抗拒工农政权的法规或命令者，依据刑法典第69条的规定予以惩处。”皮察尔多先生把第69条的第3部分随意歪曲地并入第119条，他说：“号召不执行

或抗拒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命令，但未确定有反革命目的者，依据刑法典第 83 条的规定予以惩处。”这样一来，皮察尔多先生在自己的阐述中漏掉了第 119 条中最重要的和本质的部分，加进了其他条文，即第 69 条的部分内容，而且被歪曲了。然而第 119 条和第 69 条这两项条款的全部威力在于：其一针对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实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目的者，其二针对抗拒苏维埃政府的法规和命令，但未被定为反革命者。最高法庭审理过的教徒案，东正教案和天主教案都属于这类性质的案件。

还应该说明，天主教高级僧侣案的性质不符合这两项条款的含义，有人说这些条款会使公民失去一般地反对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这些胡言乱语不是证据。引证刑法典的第 63 条也同样是错误的，在起诉书中这一条和第 119 条是同时提到的。在论据充足的法院判处词中根据检察官本人提议保留了这一条款，但它实质与案件无关，还必须要依法加以修改（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届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的决议）。

其实，皮察尔多先生如果愿意相信俄联邦驻意大利政府代办处的正式文件的可靠性，那么他完全有可能避免这些不该有的错误和曲解。

在指出皮察尔多先生做为根据的这些文件在道义上的缺陷后，我们未探讨他以这些文件为依据做出的结论实质。哈哈镜照出的是鬼模样。

皮察尔多先生做出极不正确的结论说，似乎刑法典的第 119 条同第 69 条合成一条，它“剥夺公民反对任何当局发布的任何法令的一切可能性，最终等于剥夺宗教自由”。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有批评和反对中央或地方当局的法规和命令的广泛自由，其形式是申诉权，提议权和参加报刊讨论权，但是在法规和命令实施过程中苏维埃政权不容许

以不同意或不赞同为借口拒绝服从当局的现行法规和命令。皮察尔多先生指不出哪一个有秩序的欧洲国家在秩序全面混乱的威胁下容许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式制度的存在。

皮察尔多先生阐述的上述结论所依据的材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皮察尔多报道说，过复活节和圣诞节组织青年举行反宗教集会，这似乎是根据中央或地方当局的行政命令行动的。因中央或地方当局颁发了命令，才致使做礼拜和举行与宗教生活有关的仪式成为不可能的。你看，“如果相信现在的俄国报纸”，毋庸置疑，皮察尔多先生报道的原始材料是侨民报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俄国报纸，因为在国内出刊的俄国报纸谴责了青年人举行广泛的反宗教集会，如果以这些报纸为依据，皮察尔多先生就不难认清，这些集会是青年团体组织的，完全是自发的，不仅当局无人参加，党内任何成员都没有提出过要求，甚至建议青年过复活节不要组织反宗教游行示威，既或是有理由的，非宗教性质的也不准许。

至于提到皮察尔多先生愿意相信的“现在俄国报纸”所报道的关于地方和其他当局发布命令的消息，由于未指明这些报纸及其所报道的事实，很难令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和有什么意义。皮察尔多先生对于“相信不相信”这些报纸所报道的这些消息犹豫不决，为使他摆脱困境，我们建议他了解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宗教问题的法规，正式认证的伟大的立法——1918年1月23日颁布的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分离法令。1918年8月24日颁布的法令细则附有指导地方政权工作的许多说明，为此前不久司法人民委员部出版社发行了小册子，题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会与国家法令》。

在现行法规的其他一些说明中还有司法人员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23年6月19日给各省执行委员会的指导性通令第五

节，此通令阐述了五年来在举办宗教仪式方面的实践活动，如准许自由举行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须事先经过任何检查，但必须在内容上确实属于纯宗教性质的”（1921年4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

其次，刑法典第120条规定惩处旨在煽动群众迷信的欺骗行为，尽管它是正义的，皮察尔多先生担心这一条款，可能尤为担心此条款成为法庭审判的根据，此条款把天主教所敬重的一切都列进去，甚至教会会因信奉上帝和天意的存在这样简单的观点，或因种种神学观念受到惩处。采普利亚克案和在政治上有影响的莫斯科报纸的观点都使他感到恐惧，这些报纸宣扬说教会应当受到审查，因为它们是“以抵制苏维埃机关正常活动为目的的社会团体”。

但是，皮察尔多先生的种种担心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这证明他对我们的刑法典不了解。此法典是规范法庭活动的，他对于法庭审理东正教和天主教教徒案件的实际情况更不了解。同样地，也不理解我国报界为什么对于做为一个“旨在抵制苏维埃机关正常活动”的社会团体——教会有一致观点的原因，也不懂得共产党包括它的纲领和活动同苏联政府和政府的法令的关系。本来苏联法庭审理教会案件的活动不仅以刑法典第119条和第120条为准绳，而且无疑地还以同一法典的第125条为准绳，这后一条款规定惩治任何“阻挠举行宗教仪式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同时不带侵害公民权利的意图”。

此条款在刑法典中发挥了1918年1月23日颁发法令的第5节，以保障所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大概足以保证苏联公民免于因“信奉上帝、天意和信仰基督教”受到法庭的审讯和惩处。但是面对愚昧无知群众的宗教观念的残余，苏维埃政权关于容许不同宗教信仰的规定还会继续下去：此规定为公民提供了信仰自由，但是公民们的宗教生活不允许携带武装，所以请示法院取消服兵役

的规定，代之以医务和其他工作。这样的法规在欧洲文明国家的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我国报界对于敌视苏维埃制度的任何教会组织，不论是基督教、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所持的观点，不是取决于领导苏联政府的党对于宗教的观点，即对于老一辈人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所采取的共产主义观点，而是取决于一个痛苦的真理，即经过欧洲历史经验证明过的，和俄国人民五年来艰苦的革命检验过的真理，这就是教会做为一个社会组织，始终同国家机构中的统治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宣扬加强统治阶级的统治，以阻挠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摆脱其统治；我们的法院严厉惩治教徒案件也是基于这种理由。我们俄国东正教教会尤为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征。它顽强地阻挠劳动人民摆脱沙皇专制枷锁和国内外资本主义的压迫。皮察尔多先生应该特别清楚这些情况，在教徒案的许多案例中及教徒个人声明书中，以及革新派第二次宗教会议声明书和旧教派领袖吉洪大牧首个人声明书中都得到完全的证实，皮察尔多先生对于这些情况应该十分清楚地了解。

所以，我们的信念和我们所获得的痛苦经验都使我们不能同意皮察尔多先生的观点，我们认为教会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只能“履行宗教仪式，这是个人对于上帝应尽的义务，正如创世者对于创世主一样。因此，对于政府所实施的经济制度，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教会都应以完全中立的态度进行报道。有人利用宗教这面旗帜和群众的宗教观念残余，阻挠劳动群众进行努力奋斗，去争取在地球上而不是在天堂上通过全人类的团结奋斗创建一个共同劳动王国，这就要求我们十分警惕地注视教会组织，并抱歉地表示，只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打击宗教界这类破坏分子。

劳动人民为争取用自己的组织权利来实现自己的建立共产主义劳动社会的理想，“采取报刊宣传，法院法规，青年社团的教学和组织工作等形式”进行努力奋斗，这一事实却使皮察尔多先生为宗

教事务深感不安，并根据这一事实得出结论：现在和遥远的未来在苏联存在着专门为“信奉上帝和基督教者”规定的刑法，也存在着信仰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可能性，这是肤浅的也是不合逻辑的结论；同样的，共产主义纲领要求取缔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共产主义制度，为达到此目的，我们领导苏联国家的党，利用宣传教育、法律法规，组织集体经济等形式做出许多努力。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结论说，现在的苏联，已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和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这同样是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苏联新经济政策为外国私人租让资本打开了门路，此政策的结果有效地反驳了上述结论，并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两种经济制度不可能和平共存。

同样地，领导苏联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在宗教问题上清楚地认识到，不改变广大群众的生活习惯就不能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的思想外壳。因此，应采取逐渐组织和教育的方式，而不是像过去乌托邦改革者们所使用的暴力和强制手段。

因此，苏联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使旧世界观逐渐消失，保障居民在这方面的自由。

无疑地，罗马天主教会的领导者们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会广泛地协助苏联政府实现此目的。

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处

副处长（舒莫夫）

№04744

克雷连科关于皮察尔多歪曲俄宗教政策

致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

(1923年7月9日)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

契切林同志

敬爱的同志：

关于您寄给我的皮察尔多公民的一封信，以及他批评我国刑法典中某些条款，好像是为拥护天主教信仰的人们享受我国宪法庄严宣布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宣传权利自由制造困难。为此，我有责任向您表述我个人的如下意见：

首先，我认为通过我国驻意大利全权代表办事处转告皮察尔多公民是最为合适的。尔后，再请他将此信转告与此相关的其他人员。司法人民委员部认为，了解我国法律最好的方法是根据官方的法令汇编正式文本，直接阅读它的原文。因此，毋庸置疑，如果他真正关心这些法律的人，由于不懂俄语而不能了解这些法律，那末，外交人民委员部则非常愿意随时提供经外交人民委员部校订的、相应的官方正确译文。

根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意见，这种办法还可以防止产生某些误解，甚至是些奇谈怪论或无稽之谈，这正是皮察尔多公民写这封信的主要缘由。

因为皮察尔多公民从我国刑法典中摘录的所谓条文，没有一条是符合苏联法律的条文，全部都是“用自己的话”来转述或者更坏

些，干脆直接篡改我们法律的原文精神和思想。所以，我不得不专门地、适时地告知皮察尔多公民下述各项：

一、刑法典第 119 条——即皮察尔多公民所引用的第一条，按他援引的条文仿佛在第三节里规定：“凡是鼓动不执行或抗拒地方和中央政府命令者，即使证实没有反革命意图，均按第 83 条规定予以惩处。”

首先，第 119 条的内容里没有什么第三节和第二节，它只不过由一部分而不是一句话组成的，与皮察尔多公民前面所举的引文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因为那里规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

“凡利用宗教偏见旨在推翻苏联政府为目的，鼓动抗拒政府法规和命令者，均按刑法典第 69 条予以惩处。”

可见，第 119 条所处罚的绝非是指“凡是鼓动”，而是专指“利用宗教偏见”犯法的人。而且必须是发生在带有明显的反革命目的——推翻苏联政权、或者是在鼓动不服从和反抗法令的情况下。故皮察尔多公民的结论是不可信的，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正因为这个结论是他毫无根据地从 119 条中凭空捏造出来的，所以哪怕是“在复活节或圣诞节时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中央或地方当局所组织的反宗教集会的人，也要按照俄罗斯的法令，可能追究其双亲中某一人的责任。”

假如说中央或地方当局想要组织这种集会（事实上，组织反宗教集会根本不是当局干的事），假如果真如此，皮察尔多公民所列举的特殊案例中，早就应该追究其父母的责任了。因为（1），这种禁令的特殊目的是“违抗苏联政府的命令”，而不会是其他的理由；（2），为了表示反抗而“利用”孩子们的“宗教偏见”和尚未成熟的觉悟做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然而，父母二人自己也相信，虽属宗教偏见但绝对不追求政治斗争目的的情况当然不属于上述规定。苏联当局颁布的许多专门法令证明，情况只能如此，绝不可能

是别样。很遗憾皮察尔多公民不肯花力气了解这些情况。苏联当局根据这些法令，不仅没有限制或阻挡父母以某些方式去影响自己尚未成熟孩子们的觉悟，而且以某种方式保障他们的权利，从而引起许多“忍无可忍的”维护者对于同愚昧无知作斗争的较为激进的方法进行责难。

这个权利首先得到了1918年的政教分离基本法的保护。其中第39条规定“公民可以采取私办方式讲授和学习神学”。

这个权利后来又特别用一些专门说明加以肯定，并在1920年又规定：“地方当局应保护公民们的安宁和自由地用他们认为方便的虔诚形式实行宗教义务。同时，只对破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法令的人，才必须追究其责任。”（1920年第157C号的说明）

根据1922年发布的命令和全俄中央执行员会1921年的决议，特别规定：“布道，由于本身是宗教祈祷仪式中的一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要在内容上具有纯宗教性质，则无须经过预先检查，便可自由进行。”（1923年《司法周刊》第25-26号）。

刑法典中专门有一条（第125条，皮察尔多公民对这一条也避而不谈）是惩处凡“阻止举行一切宗教仪式者”，其中自然包括对地方当局进行惩处，因为宗教仪式“不破坏社会秩序，同时不侵害公民权利”。

只有一条是唯一的直接限制，即对18岁以下未成年人在“学校里禁止讲授神学课”。但是，苏联当局禁止的是“传授性质的神学释义”。

试图依法将传授性质的神学释义列入直接禁止一切“团体办的儿童教育”范围，但被刚结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否决了。而现实活动同样也说明，这是任何时候也绝对不应坚持禁止的作法。例如：1922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行政处给当局所有地方组

织下达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一项决定，建议“国民教育局注意：可准许在校外对未满 18 岁儿童进行所谓的神学教育，但绝对不能把这项活动变成为在神职人员领导下的学校的职能和制度。继而建议：“责成省国民教育局”调查（仅是调查）：“对未满 18 岁的孩子们讲授神学的一切事实、性质、讲授形式和方法进行调查并上报”（仅限于上报）“教育人民委员部”。

我们认为，上述事实 and 从中央当局的指示引证的引文，都最好地证明了皮察尔多公民得出的关于所谓我们的法律对天主教徒施加压力和其郑重声明的与宗教自由宣传相矛盾之类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看来，使皮察尔多公民误解的情节是第 69 条，第 119 条是从这一条援引来的，并且仅仅借用了文中的惩罚制裁，此条按规定受惩罚制裁的应是“鼓动人们不执行或违抗中央和地方当局的命令，但反革命目的尚未查明者”。但是，量刑的基本因素必须是存在鼓动违抗当局命令的行为。第 83 条引文也指出：这种鼓动应包含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性的武装或非武装骚动”的行为，“反革命组织集团”或“逃避公民依法应负的个人或其他义务和责任”。（刑法典第 74~82 条）

皮察尔多公民不能不承认，在此情况下，对国家来说，个别人鼓动这种行为（有或没有反革命目的）的动机，这是次要的，完全属于法院评审的因素，而此类鼓动行为本身已足够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了。

二、同样，皮察尔多公民引用刑法第 120 条的条文也是捏造的，是基于伪造的情报。据皮察尔多公民的说法：这一条是惩罚“凡企图进行欺骗而目的在于煽动群众迷信者”。在我们的法律中同样地没有这一条。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犯有欺骗行为（而不是企图欺骗），目的在于煽动群众迷信，以及用同样方法获取利益者，

判处……”。

皮察尔多公民根据自己臆造的条文继而肯定地说，下一条款更为可怕：据说，法官们“把天主教信仰所推崇的一切都视为欺骗行为进行审理，直到把一般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为拯救人类灵魂的行善行为与同任何宗教观念一样，都视为欺骗行为”。

为反驳皮察尔多公民这些明显错误的论点，首先应该提出1921年6月13日正式公布的法律，其中第3条的附注谈到，给年满18岁以上的人，可以开设专门培训神职人员的神学班，但是，限制在教学大纲中规定神学班只开设专门神学课。1919年4月26日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局发布的通令专门解释说：“不禁止对年满18岁的成年人讲授神学课，但只允许在中小学校外”。然而，上述通令原则上解决了如果没有房舍，在教堂里也可以讲授的问题。在我们阐述了一些通令和法令引文之后，您照旧认为法官们可以要求一个神甫要对出现的“任何宗教观念”负责。这只能说这是“直接歪曲我国法律条文、精神和思想”，而不能作别的其他解释。

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特别告知皮察尔多公民，我国的法律不仅不会专门解决“上帝为拯救灵魂的行善行为”能否成为现实的问题，而且要尽可能少地去触及这些问题，而且要为天主教提供充分的可能性去发挥行善行为和对年满18岁的公民行善是否正确的理论，如果有人想知道行善的结果都是可以的话。但是，法律要惩罚那些犯有欺骗行为的神职人员，他们欺骗别人的性质是很明显的，其目的在于扩大和谋取某些好处（例如坚信圣尸不朽或宣传“显灵治病”或出售“显灵的”圣像等等来进行欺骗）。

皮察尔多公民由于认为类似的欺骗行为，在天主教士活动中是没有的，所以他心情可以平静下来，也就无需烦恼了，因为天主教神甫们的宗教礼仪行动不包含有明显恶意的欺骗因素，也就不受法律惩处了。

三、至于谈到皮察尔多公民引用的新的第 63 条，应该向他说明：莫斯科诉讼案是依据刑法典第 63 条提起公诉的。法院承认有第 62 条；可是当前第 62 条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刚刚通过了它的新条文，它专门针对蓄意破坏国家工业或运输业的行为做了解释。所以，众所周知，这一条款不涉及宗教信仰。至于谈到第 62 条，那么，新的第 62 条惩办的是“鼓动居民参加群众风潮，逃税、逃役，或以各种方法公然损害工人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如果这些行为是教会教士所为，也不能免于制裁。可见，皮察尔多公民这些担心应该消除了。至于莫斯科各报的解释，似乎把教会都说成好像是反政府的组织，并且皮察尔多公民也从这些报纸上做了摘录和引文，这些即使确有其事，对于法庭来说，也没有任何强制力，因为这些引文并不具有法律说服力。

四、可以举出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德国居民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1923 年 4 月 25 日的决议做为新的证据，说明皮察尔多公民对于苏联的现实了解得多么不正确。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对待广大群众的宗教信仰多么宽宏大量。州执行委员会根据此决议允许在学校校外对 18 岁以下儿童讲授神学课，因为这是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即所谓的坚信礼。他们又担心禁止讲授神学课正如州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所说：“可能被居民理解成压制宗教信仰”。

当前的问题是审议司法人民委员部和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专门措施，并在全共和国范围内整顿此项活动。

致同志的敬礼

司法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尼·克雷连科夫

1923 年 7 月 9 日第 512 号/JI

№0474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起草
“反宗教宣传通令”的决议

（1923年7月12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6号第46项

机密

听取：46.（1）关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23年7月4日根据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所作的决议执行情况。

（2）关于反宗教宣传通令

决议：（2）责成波波夫同志与反宗教委员会配合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反宗教宣传通令。

中央委员会书记

№05083

实施政教分离委员会第 30 次 会议纪要的摘要

(1923 年 7 月 17 日)

出席者：波波夫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斯米多维奇同志、雅科夫列娃同志、杜契科夫同志

听取：议程二，关于吉洪和他的管理机构。

决议：1. 委托杜契科夫同志有分寸地感化吉洪，让吉洪通过报纸和与外国记者的谈话，说明确实是他自己亲手写的呼吁书和悔过声明。

2. 要使其他一些因吉洪案件而被监禁的人象吉洪那样悔过是适当的。

3. 除了那些革新派教徒盘据稳固的地区，现在不应让吉洪派主教管辖区管理机构活动。

4. 不反对吉洪分子为苏维埃政权祈祷。

5. 让吉洪向坎特伯雷主教写信，说明自己的悔过和呼吁书是必要的。

委员会主席 波波夫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04746

莫斯科、明斯克、哈尔科夫的代表和 教民给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

(不晚于1923年7月20日)

莫斯科犹太人教堂及明斯克、哈尔科夫市中心犹太人教堂的教长和教民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报告书

最近几个月，在莫斯科犹太人的社团里，曾收到不同市镇寄来的申请书和请愿书，以众多的签名向中央当局要求开放并归还犹太教堂给教徒们。这些教堂曾被地方当局下令改作剧院或俱乐部。

查封犹太人教堂，一般说是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公用事业处根据为数不多的青年团体的请求干的，他们随心所欲的要求，让成千上万的教徒做出无谓的牺牲。

如在莫斯科，这里仅仅有一座犹太人教堂，但也试图把它查封掉。一个只有8人的团体，来到莫斯科苏维埃，手持一纸充满诽谤和对数万名教徒造谣中伤言词的申请书……。

鉴于上述情况，查封犹太人教堂已形成大规模的行动，并且许多地方的中心教堂也被查封，我们作为首都犹太人宗教社团的代表，离中央政府管辖最近，认为有必要及时地向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介绍如下情况：

(一)

大批地查封教堂实际上使成千上万的教徒们失去举行宗教仪式

的可能性。教徒们难于忍受的就是禁止举行宗教仪式行动，它犹如公开压制宗教信仰，使教民遭受灭顶之灾……犹太人不能容忍压制他们的信仰，尤其来自地方当局的任意行动，这些行动与俄罗斯联邦宪法及法令有着明显的矛盾。俄罗斯联邦宪法保障所有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第13条）。但是，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1918年法令汇编第263条）规定，禁止地方颁布约束和限制信仰自由的决定。所以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宪法、法律最高捍卫者——向地方执行委员会解释。

查封犹太人教堂使其变成娱乐场所与宪法上已经公布的信仰和崇拜自由是背道而驰的。为使少数公民在俱乐部里娱乐而使教徒不能去教堂做祈祷和举行宗教仪式，花费这样的代价是极不应该的。因为俱乐部总是可以利用其他的房屋改建，而那些专为犹太教堂营造的建筑，往往具有历史意义和历史考古价值。显然，用这些教堂来改作俱乐部是得不偿失的。

（二）

我们可以同时举出许多例子，查封犹太人教堂所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得到了做俱乐部的房舍，不如说是少数不信教的人玷污了数万教徒的宗教情感。教堂和陈列在教堂里供祭祀用的一切物件，对于这些信徒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如，在维捷布斯克有三座犹太人教堂于1920年就被查封了，连续两年封闭着，也未做其他使用。尽管地方公民提交的请愿书签满了许许多多的人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可是，地方的省执行委员会对这些请求却不屑一顾……。

当地方工农检察院收到10家国营和私人企业的工人和服务人

员的10份请愿书之后，才开始过问此事，并且提出省执行委员会在查封教堂方面的作法是错误的。然而，工农检察院的这种干预没有任何结果。根据地方犹太人社团的申诉，官司打到司法人民委员部，这里以司法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委员克拉西科夫同志签署的电报向维捷布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建议：把犹太人教堂交还给教徒们。但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干预也遭到与工农检察院同样的结局。可以说，他们对于这种干预根本不予理睬。来自地方犹太教派的一伙青年在维捷布斯克省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自命为地方犹太人教会生活中有无限影响的人物，全然不顾来自各方的一切干预。最后，维捷布斯克的犹太教徒们告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最高当局保护其信仰免受排挤和压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调查情况之后，由主席团成员斯米多维奇于1921年4月15日签发了电报，敦促维捷布斯克执行委员会在逾越节即将到来之前开启被查封的犹太人教堂。但是，命令仍未执行，教堂也仍未启用。当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21年5月19日召开的会议上（会议记录第29号）通过决议：特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涅姆佐夫同志前往维捷布斯克就地了解全部情况，并将全部材料和结论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涅姆佐夫同志在完成交给他的使命之后，在1921年6月1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上作了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会议记录第34号），表示赞成开放犹太人教堂。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再一次做出决议……。但是，决议仍然如同前面所说的那样不予执行……。此后在1921年8月22日举行的大会上（会议记录第54号），根据工农检察院的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再度建议维捷布斯克省执行委员会紧急执行6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但是，该省执行委员会对此仍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地方犹太教派某些年轻人比当地居民中成万名信徒都更强硬，连共和国的中央当局直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都不在话下。维捷布斯克的犹太人教堂从 1921 年到 1922 年，整整关闭了两年，这期间从未起过作用……。1922 年 8 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在委员会成员克拉西科夫同志签署的电报中重新建议维捷布斯克执行委员会，如果犹太人教堂未作为他用，应还给教徒，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电报建议偿还教堂。维捷布斯克执行委员会趁电报往来之间，别申科维奇镇失火，把当地遭火灾的人急忙送进教堂，于是得手呈报司法人民委员部说，教堂均被占用。可是，地方当局仅有一次开放被查封教堂的纪录，且还是由于“文化娱乐”。这是在 1922 年 10 月 1 日晚上，当晚应是犹太人最大节日“赎罪日”^①。是晚和次日一天，犹太人教徒实行斋戒并祈祷，这一天是犹太教徒们最最敬重和景仰的一天。但是，这天晚上，最古老的、最受尊敬的犹太教堂特准开放了。在这里举行了幽默晚会，有舞蹈、有小吃部。可是，晚会是嘲弄“赎罪日”节日的，嘲弄所有的宗教信仰者……。这是唯一的一次“开放”，为了“娱乐”而利用被查封的教堂的纪录。嘲弄宗教信仰激起了维捷布斯克市全体居民包括非犹太人和非信徒们的无限愤怒之情，这种情感是人类语言的任何词句都无法表达的。这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蹂躏。可以说在犹太人遭受各种各样蹂躏的历史中，还找不到这样的例子。而这种事都在地方当局的直接参与下干了。

我们略为详细地讲述一下维捷布斯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因为维捷布斯克的犹太教堂曾是 1923 年最初几个月里用特殊力量开始查封教堂运动的首批受害者。从这时起，查封教堂成了流行的、群众性的举动。除了已谈到的维捷布斯克犹太人教堂一直没归还给教徒之外，在本年又查封了下列犹太人教堂：

^① 犹太教的“赎罪日”，定为犹太教历正月初十（相当于公历 10 月 1 日），教徒在当日要祷告、禁食、祈求上帝宽恕。

1. 明斯克市的圣咏大教堂，它曾是明斯克市最主要的、容量最大的犹太人中心教堂，在星期六和教会的节日里，教堂能容纳上千教徒。自从教堂被查封，也就不能再履行其宗教仪式了。在此之前，即1922年9月，称作卡巴科夫（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28号）的教堂被查封，至今没作他用。

2. 哈尔科夫市霍拉尔大教堂，同样是该城最大的、容纳人数最多的犹太人教堂。这个教堂和明斯克教堂一样，是用几万名教徒的自愿捐款建筑起来的。按照1922年7月12日签署的协议，曾经交还给教会团体，只过了几个月，归还的教堂又被查封了，但也未作其他用途。

3. 1923年4月5日波尔塔瓦市的圣咏大教堂被查封。

4. 1923年4月10日克列缅丘格市的犹太人教堂被查封。

5. 1923年6月15日戈梅利省列奇察洛耶夫镇唯一的犹太人教堂被查封。在这个镇子上，除了这座教堂外，仅留下两间祈祷用的小屋，使得原住在洛耶夫镇的小部分教徒都无法容纳。

6. 1923年5月初查封了敖德萨省巴尔特区比尔祖尔市的犹太人教堂。这座教堂是1914年开始建筑的，为了建造教堂，每一个犹太人每周从自己的工资中量力拿出一点捐款。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比尔祖尔的犹太人只好集中自己的一切财力，勉强完成教堂的建筑。

7. 1923年4月，在辛菲罗波尔，查封了圣咏大教堂和两间祈祷用房，余下三间不大的祈祷用房没被查封。因此，辛菲罗波尔的犹太人同样不能举行宗教仪式。教堂在被查封的三个月期间，并未做为别的使用。

8. 1923年4月15日在戈梅利市从教徒手中没收了大石头教堂、柳巴维奇斯基教堂和斯塔罗谢利斯基教堂。

大石头教堂建于150年以前，它是艺术珍品，也是教徒们特别

崇拜的对象。除查封以上这三座犹太人大教堂外，还查封了五间祈祷室。

9. 1923年4月间，戈梅利省和…的韦特卡镇上的唯一犹太人教堂被查封。

10. 1923年5月21日，新济布科夫市第二祈祷院被查封。

就我们所知道的被查封的犹太人教堂，除了按地名列出的城市，即斯摩棱斯克、基辅、科诺托普、敖德萨、塔甘罗格、博布鲁伊斯克，列奇察奥尔良、叶夫帕托里亚、阿卢什塔、刻赤、克利莫夫和谢苗诺夫卡之外，被查封的教堂数字是不胜枚举的。毋庸置疑，大批查封教堂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同时又是由某中央机关领导的反犹太教运动，因为，突然在1923年春天，提出创建工人俱乐部这样特别突出的需求，为此发动全国性的运动，这种需求到处都可以得到满足，然而，却唯独使用犹太人教堂和祈祷院却不能返还，实在令人费解。

某些地方在封闭犹太人教堂的同时，还嘲弄教堂圣物，在比尔祖尔市，圣卷（《摩西五经》）曾被抄走，而地方苏维埃为改建教堂建筑物充当俱乐部使用所需费用，勒索赎买《摩西五经》。在辛菲罗波尔，《摩西五经》圣卷竟被抛到大板车上，运到某个地方的一个地窖里，至今尚未归还给教堂。

（三）

熟悉犹太人生活习惯的人很了解，崇拜和信奉犹太教的人主要是那些称作“小人物”的广大群众，如工匠和他的帮手、工人、店员、小商人——他们是犹太教的经常性朝圣者和教民的源泉。这些犹太人群众物质生活极为贫困，穿着单薄，忍受无权无势的压迫，但却坚持其古老的信仰。教堂曾经是、今后依然是他们祈祷的场

所，同时还是能使其忘却一切艰难困苦的好地方。因此，查封教堂不仅是对犹太人上层社会的一种打击，而且也是对劳动人民大众更为沉重的打击。故此，不能不指出苏维埃政权恰恰是在这些犹太人群众中间永远备受欢迎的。这些群众比其他阶层人更多地经受过反革命袭击的危害。彼得留拉匪帮、格里戈里耶夫匪帮、秋秋尼克匪帮等高喊“打死犹太和共产党”。俄罗斯南部和中部的许多城镇犹太居民，在匪帮到来的时候，躲进教堂寻求保护。几百名犹太人拖儿带女在这些教堂里祈求上苍保佑红军队伍早日到来，然而却惨遭杀害。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

很显然，犹太籍的劳动群众绝大多数是信奉犹太教的，把苏维埃政权看作是自己唯一的保卫者，是苏维埃政权把犹太人从封建制度下彻底解救出来。这种情感，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虔诚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社会各阶层中间，在犹太教堂内部任何时候也不会出现、而且根本不可能出现亲近反革命的派别和感情。因此，那些要求查封教堂的少数公民，如果说教堂是反革命巢穴的话，那么他们显然是在当面撒谎，纯属诽谤。

对上面所述还应补充一点，即犹太教的历史作用。它在政治方面与其他宗教信仰截然不同。犹太教的神职人员从来不成立特殊的、独立的组织机构，也从没想过要与国家竞争（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企图实现世俗政权。犹太教会主要是关注宗教仪式问题和慈善救助事业，从不追求任何政治企图。因此，那些认为以犹太教堂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犹太教团体是有害的政治组织，这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犹太教在当今犹太人生活中过去和现在所起的作用。其实，苏联负责内政事务的领导未必怀疑犹太教和教士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地忠诚。排挤犹太教主要来自所谓犹太教派和地方上的共青团犹太人团体，他们人数不多，但很年青。这些青年团体和他们的父辈们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他们在小市镇的生活条件下，事

实上是由他们掌管宗教政策，所以任意玩弄半大孩子的冲动和发泄其愤怒与复仇的情感。其实，这也正是严肃的苏联报刊一再明确强调的：在宗教斗争中，要十分谨慎，委婉，讲策略。苏联政策和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在实际行动中完全遵照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和它的法令，谴责一切压制和诽谤教会的举动行为（参见1923年6月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共产国际扩大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毋庸置疑，与宗教信仰的斗争，只能采取精神感化方式，辅助地做相应的宣传。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反对精神感化的斗争手段，相反地，把反宗教宣传看作是一种必要的、真正的信仰自由的表现。犹太教徒一向认为，同时将继续认为，利用世俗国家宝剑的威力来维护一般的宗教信仰，或任一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但是，根据同样的理由，在查封教堂和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事实中，已经表现出来的使用强硬手段和民警压制手段与宗教信仰作斗争，那是违背每个人依据信仰自由法则所享有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信教权利。这种强制性干预宗教信仰的行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恰恰相反，正像犹太人千年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对他们的宗教进行血腥镇压的结果，最后必适得其反……。

因此，地方苏维埃最近几个月在与宗教斗争过程中，使用大规模地查封教堂和实际上取缔宗教仪式的办法，不仅在形式上是不合法的行为，而且用政治观点来看，无疑也是有害的，它与苏联政府宗教政策的总原则背道而驰，并损害苏维埃政权在忠于他的广大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四）

综上所述全部意见，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苏维埃政权在自己的旗帜上已经写下信仰自由几个大字，因此对我们的请求理应予以重

视和同情。占据中央地位的莫斯科犹太教社团收到各个省城送来的许多呼吁书，他们请求保护教堂而不受地方政府的任意压制。

我们是莫斯科犹太教社团的代表，与明斯克和哈尔科夫的犹太教社团一样，决定呼吁保卫犹太教信仰。我们要坦率地、忠诚地表明，上百万的教徒的良心是不安的。因为在苏维埃联邦的宗教团体中，早已消失的幽灵复活了。曾几何时，沙皇和帝王、教皇和主教都曾交互折磨过我们自古以来的信仰。

犹太人民第一个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民族解放和宽容异教时代的到来，苏维埃政权是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民族平等和宽容异教的，又是实际上实施这些创举的第一个政权。如果地方当局歪曲和践踏这些良好的创举，那么中央当局有责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以便恢复被践踏的宗教自由和保护苏维埃联邦宪法所宣布的原则。

因此，我们请求：

1. 向所有的省、县执行委员会说明，查封犹太人教堂与现行的法律相抵触，是侵犯宪法宣布的信仰自由。

2. 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呈文，要求撤消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之前查封大批犹太人教堂（其中有些上面已经提到）所作的一切决定，开放教堂并归还给教徒。

——附有 И. Б. 加米涅夫批示：“请查阅并报告何处被查封。
列·加（米涅夫）”

№04747

加米涅夫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
宣传通令（草案）致莫洛托夫的便函

（1923年7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下发的有关查封教堂、祈祷室、犹太教堂等等通令中，必须指出开放已经查封的犹太教堂是合理的。

列·加米涅夫

№04748

国家与教会分离委员会（俄共（布）中央
反宗教委员会）会议记录第31号

（1923年7月21日）

绝密
秘密保存

出席者：明任斯基、契切林、约尔丹斯基、杜契科夫等同志

议程：1. 关于天主教徒

听取：1. 关于天主教徒

决议：1. （1）必须询问加米涅夫同志：他是否认为驱逐罗马教皇救济俄国饥民团的工作是及时的，如果不是，就必须抓紧时间，再次调查他们的活动地区。

（2）宗教团体登记延期两个月。此前通过的决议由司法人民委员部加速执行。

（3）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公布的基本条例为基础，马上制定出针对天主教宗教仪式的宗教团体登记条例。

（4）基本条例第六条换成下述内容：

“教徒可以按照自己宗教信仰原则选择神职人员，而苏维埃政权对此不加干涉。苏维埃政府只有提出异议或解除下列神职人员职务的权利：因犯有刑事罪名誉败坏者或在政治上的危险人物。”

（5）为筹备十四岁以上儿童的坚信礼，认为有必要为天主教徒规定出一定的教义问答时间。

(6) 责成杜契科夫同志火速摸清在俄罗斯何处有何种天主教的教会学校。

全权委员会副主席 (明任斯基)

委员会书记 (杜契科夫)

№047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
反宗教宣传鼓动问题决议的决定

（1923年7月27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19号第35项

机密

听取：35. 审批反宗教宣传鼓动问题的决议。（1923年7月13日中央组织局决议第20号第12项）

决议：35. 1) 批准决议；

2) 报告斯大林同志备查。如果大部分教会再提出类似申请的话，允许把教堂归还给教徒。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斯大林

№04750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反宗教 活动中的偏激行为的通令函（草稿）

（不晚于 1923 年 7 月 30 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如何对待现有的宗教组织问题的通令函

无论党还是苏维埃系统，发出的指示和决定多次书面告诫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深入细致和小心谨慎地对待与宗教仪式有关的事务。尽管如此，事实表明恰恰是在这方面工作中出现了种种不协调、专横、轻率和考虑不周的事。这种不良作风所导致的政治危害却令人触目惊心。在弗拉基米尔、奥廖尔和戈梅利州这类不良作风尤为突出，还有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许多地方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1. 必须把工作做到使所有教会和教徒们感到：他们的教派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与其他教会享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国家与教会分离法令所要求的。实际上，各个地区的某些教派较之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组织，其处境确实不佳。这使他们感到不舒服，尤其是这些教派在革命前是处于受排挤和不合法的地位。有的组织占用专为祈祷修建的建筑物，而且还不付租金。与此同时，教派教徒们都失去了祈祷场所，甚至自己出资修建的专为祈祷式用的设施也未幸免或被迫缴纳与租用商业用房或工业用房同样多的高额租金。宗教团体属于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参见 1922 年 8 月 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法令），租用房舍时不应交纳高于一般居

民住房的收费标准的租金。

强制他们从他们占用的祈祷室搬出来，无论是私人的还是租用的，都应遵守同查封教堂及其他祈祷专用设施一样的规定。（参见1923年3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根据这种观点，在当地没有其他房舍可供祈祷使用时，绝不容许地方当局查封和征用教堂和祈祷室，（例如查封洛耶夫或戈梅利州韦特卡的犹太教教堂，查封奥廖尔皈一教教堂，以及其许多类似情况，尤其是干涉浸礼派教徒和其他教派的宗教生活等。）这些情形无疑都是违背国家与教会分离法令第二条规定的。

2. 按现行法令规定，举行教会仪式的房屋可以查封的理由是：（1）如果按司法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条款，没有人愿意租用这些房屋或者（2）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明确无误的决定，并在决定中详细说明理由是为国家的迫切需要。

但是，目前仍有些建筑物毫无理由地、仅仅按管理部门的决定被查封着。根本不向教会团体的成员出示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因而教会团体无法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告做出此决定的省执行委员会。后者对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质问迟迟不做回答，在此期间又拆除祈祷用的专门设施。被查封的房屋或改作俱乐部（大部分给了共青团），或用来住人。如果附近没有居民住房，就挪作他用。装修一排未住人的房子，比改装一座被查封的教堂花费的钱还要少，所以经常在苏维埃机关做出决定，查封一座教堂之后，这座建筑物就在无限期地闲置无用。这一切作法使得关心此事的信教的公民们和客观的目睹者确信，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是以查封祈祷殿堂的方式进行反宗教斗争。实际上这些行为给正确进行反宗教斗争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并加深人们的宗教偏见。这些行为还破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助长了它的敌对势力。根据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精神，查封祈祷用的房屋设施，应该是极个别的情况，

而每次行动都应该有论证，是为国家极需的，并在地方报纸上公布此决定。如已上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尚未做出决定之前，不允许查封建筑物。

无论根据什么理由，绝不能取消祈祷用的房屋设施，也不能因不缴税而被取缔。如果不缴纳税款，可以解除与该教徒团体的契约，但事先应三次登报声明，并在该建筑物的门上贴告示（1918年司法人民委员部指示第11条），说明已与另一教徒团体签了契约。从政治上考虑也不能取缔祈祷堂，因为政治犯罪只能追究教徒团体的个别人或整个团体的责任，结果是解除契约。但是，按上述规定，建筑物尚不能与另一教徒团体签订契约。

但是，例如伊尔库茨克省执行委员会从今年的6月26日起，根据政治意图，大笔一挥取缔了全省所有的浸礼派教会，查封了他们的祈祷室。

不能因为没有执行政府命令，如没有按期登记注册，就查封教堂和祈祷室。这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例如，在奥廖尔省），虽然登记日期延到当年9月27日，亦不能在会议上用投票方式取缔某个教堂和祈祷室。这是因为与会者有非信教公民、或别的什么人参加，他们有的可能是其他教派组织的人，而且可能是已签署了租房合同的人。这种投票表决方式不能作为地方政府命令查封教堂或祈祷室的依据，人数再多的非教徒或其他教派的公民也根本无权查封教堂。但这种事却在特维尔省的克柳奇玻璃工厂，以及在弗拉基米尔省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工厂（原索宾克工厂）里和县里均发生过。有些地方，在信教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中间，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如在铁路系统，甚至在莫斯科均有此类事件。

今年10月1日之前，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必须对本省各地区以前各次查封祈祷房屋和建筑物的根据理由及一切有关查封的决定，进行一次审查。到目前为止所有尚未使用的宗教殿堂、室，应

毫不迟疑地重新开放。

3. 司法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教分离法令，不止一次地阐明专门作祈祷用的房屋不征收租金，或他们所占用的土地也不征收租金。但是，地方当局都有意回避这一法令，任意给祈祷殿堂或所占用的土地规定特别高的税率（如建设税、土地税和保险税等）。

要理解并永远记住，在执行政教分离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决不能从举行宗教仪式那里获取任何专门收入。

在向城市建设和土地摊派地方税时，对教堂建筑和他们占用的土地，不能规定征收特别税率（如雅罗斯拉夫尔省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省做的那样）。在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征收建筑税和庄园占地税的一些乡里，不应征收教堂建筑税和他们占用的土地税。这种收税规定应当取消。（某些省里，一平方俄丈土地征收1卢布金币的税收。）

对国家来说，教会团体只是不图钱财和利润的个人团体，对他们占用的房屋和土地，可按对私人住房和毗邻私人庄园田地征税规定收税。无论用哪种形式从举行宗教仪式得来的专门收入中提取税收，均应停止。姆岑斯基县执行委员会（奥廖尔省）竟敢通过管理科科长向召集来的教会理事会代表粗鲁地宣布：每座教堂征收100—500卢布金币作为未登记的罚金。（期限为今年9月27日！）如果有谁要求出示有关罚款的依据文件，便马上受到威胁和拘捕。不缴纳祈祷室的税金，不应由教徒团体成员个人或他们的财产承担责任。

在那些需要特别注意、周密和慎重行事的领域里，某些地方同志的所作所为已达到厚颜无耻的程度。上述违法乱纪的政治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对犯此错误的同志（！）应该解除其工作职务。

此指示内容应通知下去并严格执行，违犯者必将受法律和党纪处罚。

№04751

斯米多维奇给斯大林的便函（草稿）

（1923年7月30日）

斯大林同志亲阅

向您报告传达指示草案情况：

1. 全部事例和事实都是最近的；
2. 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基本赞同此指示草案。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局副局长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莱温对专门性部分也表示赞同。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委员 II. 斯米多维奇

№05084

实行政教分离委员会第34次会议 纪要的摘要

(1923年8月5日)

出席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明仁斯基同志、杜契科夫同志。

听取：议程一，关于吉洪的诉讼程序。

决议：1. 释放吉洪引起了君主保皇党和白党队伍的完全混乱。

2. 由于吉洪目前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可能会有更多黑帮分子的头面人物暴露，他们已经开始与吉洪疏远。

3. 吉洪分子和革新派教徒的对抗加剧，从而引起严重的教会争吵。

4. 释放吉洪所引起的革新派教徒与吉洪分子之间的不妥协性造成教会的正式解体。

5. 吉洪分子和革新派教徒开始攀比：谁在苏维埃政权面前更加有罪，谁给苏维埃政权带来更多利益。

6. 这两派的斗争还刚刚开始发展。

7. 继续将吉洪诉诸法庭目前可能会给他戴上蒙难者的光环，而他进一步与苏维埃政权的合作，则可以完全把这光环从他身上摘下来。

8. 必须继续使吉洪感到存在受审的威胁，因此委员会认为，现在审判吉洪是不适时的。

委员会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委员会秘书 杜契科夫

№0475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俄罗斯
共产党（布）中央委员通令函的决议**
(1923年8月16日)

录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5号第12项

听取：12. 关于查封教堂的通令（斯大林同志）

决议：12. 通过。

（参见附件^①）

^① 附件即本卷文件№04753。

№04753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对待 宗教团体态度”的通令函（第30号）

（1923年8月16日）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令函第30号

机密

致各省委员会、州委员会、边区委员会、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委员会各局：

关于对待宗教团体的态度

中央委员会建议党的各级组织严肃关注某些组织在反宗教宣传方面，及在一向对待教徒和他们祈祷堂室所持的态度方面犯下的一系列严重违法行为。

党纲说：“必须关心并避免用种种方式伤害教徒的感情，否则将加剧宗教狂热”。第12届党代会决议对反宗教宣传鼓动问题重申：“在中央和地方上往往不做严肃的分析和解释工作，而是故意粗暴地嘲弄信仰和崇拜对象。这不但不能加速、反而会阻碍劳动群众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

然而，我们的某些地方党组织经常不断地破坏党纲和党代会的这些明确指示。

伊尔库茨克省执行委员会今年6月26日出于“政治需要”，大

笔一挥取缔了全省所有的浸礼教派团体，并且查封了他们祈祷室。

由于没有执行行政命令和没有登记（尽管延长了登记的期限），奥廖尔省执行委员会查封了全省所有的教堂和祈祷室。在特维尔省的克柳奇玻璃工厂和弗拉基米尔省“共产主义先锋队”工厂（原索宾克工厂）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查封教堂和祈祷室的决定。这些决定给地方政府查封教堂找到了依据。因此，最后事态发展到工人教徒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生武装冲突。姆岑斯基县执行委员会（奥廖尔省）粗暴地向教会理事会的代表宣布：每一座教堂征收100~500卢布金币作为未登记的罚金，而要求出示罚款依据者均遭威胁，然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拘捕。沿整个外高加索，尤其在格鲁吉亚，几百个教堂被查封，均是不合法的，是破坏党的指示的，这在居民中引起了骚动和不满。在明斯克（白俄罗斯）、哈尔科夫（乌克兰）、波尔塔瓦（乌克兰）、克列缅立格（乌克兰）、洛耶夫（戈梅利省列奇察县）、比尔米尔（乌克兰奥德萨省）、辛菲罗波尔（克里木）以及苏联南方和西南的其他诸多城市的地方当局，均曾查封了犹太人的祈祷室，等等不一而足。

许多类似的例子足以证明党的某些地方组织和当局的地方机关是何等轻率、欠考虑和极其不严肃地对待宗教信仰自由如此重大的问题。这些组织和当局机关似乎并不明了由于他们的粗暴和毫无顾忌地反对代表绝大多数居民的教徒的行为，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对于党在分化教会方面的政策起了破坏作用，不仅不助一臂之力，反而帮了倒忙。

综上所述，中央委员会决定：

(1) 禁止以没有执行有关登记的行政命令为名而查封教堂、祈祷室和犹太教堂。无论在何处发生查封事件，均应无条件地立即停止。

(2) 禁止在有非教徒或签署教堂用房合同的教徒团体以外的人

在场的会议上通过投票表决方式取缔祈祷室、祈祷用建筑以及其他用房。

(3) 禁止以没有完成税收为借口，取缔祈祷室、祈祷用的建筑以及其他用房。因为这种取缔措施严重违反了司法人民委员部1918年的指示第11条。

(4) 禁止属于“宗教性质”的拘捕行动。因为被捕的人与“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反革命行为无明显联系。

(5) 把房屋归还教会团体，并在裁决税率时应严格遵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3月29日下达的决议。

(6) 向党员解释清楚，我们在瓦解教会和消除宗教偏见活动上的成功，不是依靠对教徒的压制，因为压制只能更加激化教徒的偏见，而是依赖我们对教徒有分寸的态度，对教会偏见进行有耐性地、经过周密考虑的说服，同时严肃地、历史地阐明上帝、崇拜和宗教信仰等思想。

(7) 贯彻这些指示，应由省委书记、州委书记、州委各局书记、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边区委员会书记个人负责。

同时，中央委员会还警告：我们对教堂和教徒的这种态度，不应是也决不是放松我们对他们的警惕性，必须仔细地观察教会和教会团体的动态，看其是否将教会变为反革命的工具。

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1923年8月16日

№04754

**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列别德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书记处的公务便笺**

（1923年9月11日）

致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两个月前，在哈尔科夫市按犹太工人的决定关闭了霍拉尔犹太教堂。现在，犹太资产阶级提出归还问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考虑到工人的情绪，坚持先前的决定不变，并将此事通知俄共中央委员会，以防对此决定提出抗议。

德·列别德

№04755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
关于已完成工作致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全会
（1923年9月15～25日）

绝密

致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工作简报

1923年5月1日～9月15日

反宗教宣传

第十二届党代会认为有必要克制一下某些党组织在反宗教宣传方面的过激行动。第十二届党代会的指示已经传达到地方，但是，有许多地方在查封教堂改作他们的学校、俱乐部、剧院等方面，其趋势仍不见减弱。鉴于在许多地区、在文化水平低的虔诚教徒居民中间，事先不做深入的科学的反宗教宣传就查封教堂（东正教教堂、犹太教教堂和祈祷室），又鉴于查封东正教教堂、犹太教教堂和其他祈祷用房的行动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只依据当地少数非教徒居民做出的决定，为此，中央反宗教委员会给地方制定了一系列指示，要求用比较精心和比较慎重的态度对待此问题。中央委员会

曾两度发出通令指示，要求对待教会问题要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反宗教委员会在个别情况下（例如乌拉基米尔省）迫不得已派同志去地方上了解情况。目前，已经看到一些组织对待此问题的态度比较健康，某些党的委员会（如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颁布了相应的通令；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甚至颁布了有关惩罚损害教徒宗教感情的特别法令（从另一方面来看，几乎又是无节制的侮辱）。反宗教委员会认为，一些党的组织对当地查封教堂的问题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现在还在继续查封，而且极不慎重。由此，类似的事实，竟给境外白匪的宣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

反宗教委员会当前一个时期面临着解决建立非党无神论社会团体的问题。它的任务是反宗教宣传，共产党员亦可参加。同时，该团体应提出决议：无神论者出版机构接受党的领导，它的所有出版物接受检查。该团体一项任务是组建一所反宗教剧院。反宗教委员会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密切监督下，建立非党人士组成的无神论者反宗教团体是众望所归。

反宗教委员会此时应注意的，一方面是各个不同宗教集团和组织的瓦解过程，另一方是宗教改革运动。东正教教会当前有特别大的变化。4月29日，东正教教会举行了宗教会议，会议由革新派教徒筹备，参加会议的约有500人，在60位高级僧侣中，将近一半是原吉洪授职人员。宗教会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团结了革新教派的神职人员，组建了作为高层教会的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初看起来是无害的，同时又能深深地触及东正教陈腐的教义（有关圣尸、主教婚姻和公历等）。大会的特点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是人民政权；承认十月革命的乐善好施的人道基础，并做出决议撤消吉洪大牧首的教职，把他革除教门。这个决议几乎是全体一致通过。同时委派特别代表团通知当时关押在顿河修道院的吉洪。吉洪拒绝接受此决定，并宣称这个决定无论在内容和在形式

上都是错误的。

与此同时，吉洪表示有意当众声明：他懊悔自己对苏维埃政权所犯的罪行，承认自己以前的行为是有严重错误的、是有罪的，愿与所有白匪组织断绝往来。但是，他不接受宗教会议决定，同时，认为用公历和新的正字法是正确的。由于这个声明，最高法院判定可以将吉洪解除关押。释放吉洪最初在革新派教徒中间引起了慌乱。吉洪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的声望，毫无疑问要比革新派的声望高得多。吉洪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仅是吉洪一人恢复了自由，从革新派组织那里“保留了一块湿润的地方”（吉洪语）。他们没有注意到已经建立起来的革新派教会组织的意义。吉洪在获得自由之后的最初日子和最初的喜悦，正好证实了这种估计。吉洪到处受到教徒人群的欢迎，不过，这只是暂时的胜利。革新派教徒感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开始从教堂和教区被赶出来，那里常常被吉洪的追随者们真的用武力占领了。在彼得格勒的许多地方以及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区的教会里，吉洪的追随者和革新派教徒间发生了真正的血战。例如在彼得格勒，某教堂正在作礼拜时，一位革新派教士开始朗读福音书，站在前面的妇女们向他猛扑过去，撕破了福音书、拆毁了书的硬皮，把教士赶进圣堂，同时捣毁了圣堂的大门。离此约250步远的革新派教会了解到这场胡闹是吉洪派信徒打了革新派的教士，立即派出60人支援，当这些援兵到达时，便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搏斗，致使一些人被打伤致残。虽然警察及时赶到教堂，但没采取任何措施便走出了教堂，环顾四周，也没有什么争吵，街上一切平静如常，就离开了。

打架的人走出教堂时，举止平静，若无其事。按他们的话说：他们担心的是破坏社会安宁和秩序（但在教堂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吵闹是可以的）。

第二个事件是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当时那里进行东正

教的彻夜祈祷。电灯灭了，黑暗中从教堂里拖出一个高级僧侣，而高级僧侣的追随者立即扑向闹事者，故此在教堂内发生了一场武斗。

有时武斗甚至发生在圣堂里，撕毁所谓异教的革新派教会福音书，捣毁圣像及其他祈祷用品。

这就迫使革新派教徒的各种不同派别“新生教会”，“古代圣徒教会村社联盟”，“教会复兴同盟”等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革新派教会组织，定名为“统一的东正教革新派俄罗斯教会”。最高教会管理局改组为神圣“西诺德”^①。由“西诺德”组成统一战线与吉洪派做斗争。此时，革新派教徒在揭露吉洪派教会反革命实质方面做了许多工作。顺便说说，全东正教教会都动了起来，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例如大司祭弗维坚斯基著的《教会与革命》），发表号召反对吉洪派的呼吁书，举行辩论会和演讲等。当时，吉洪派被迫在抨击革新派教徒的同时，表示同右翼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有时还抨击反革命，他写的复信在许多信徒中引起了不小的慌乱，致使我们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获得成果；信奉东正教的群众正在分化、瓦解和脱离教会，其中一部分加入教派组织，一部分成为无神论者；而绝大部分则无论什么教会、什么集团都不参加，即所谓的到了十字路口。具体地考核这些派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吉洪和其追随者在与革新派的斗争中被迫地一再做出不同的让步，而步子向左，那么革新派在同吉洪教派的斗争中，为了孤立一部分吉洪教派，此时就应该做出一系列让步，表现为步子向右。神圣“西诺德”这个机构和从前的至圣的最高教会理事会很相似，这是他们在大会上竭力嘲弄过的。而吉洪本应在这次斗争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最高教会管理局，为此特地请来好几位高级僧侣及以前的

^① “西诺德”或译作最高教会理事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

吉洪派教会活动家来给自己帮忙。神圣“西诺德”组织统一战线反对吉洪教派，表明革新派已具有足够严密的组织，因而无论是吉洪本人或是吉洪派分子，均不能轻而易举地瓦解它。另一方面，各宗教集团和教徒的代表们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冲突，有时甚至是流血的搏斗，使吉洪派日渐确信：必须寻求与革新派和解的路线。吉洪本人却极少考虑这一问题，但在吉洪周围的追随者中，这种想法日臻成熟。由于吉洪教派的倡议，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由三个吉洪派主教和两个革新派人士参加，会议决定让吉洪退位并放弃其教职，然后方可走联合道路。这一决议通知了吉洪本人，但他毫不打算从大牧首的职位上退下来，并明确表示说：与其信徒们不愿和他共处，不如听凭自便，请投奔革新派那里好了。没有他们我照样活着，因为人民热爱我，支持我、保护我。

这样一来，吉洪的信徒们意识到了，吉洪如此固执行事将会促使他们不仅和革新派教徒，而且还可能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发生更为惨痛的冲突。因为他们担心“这个老头子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们竭力影响吉洪，促使吉洪自己实行一套新政策，从身边赶走那些持苏维埃政权观点，在政治上所有可疑人。他们认为这种改革尽管受到下层农民顽强地抵抗，还是很有必要的。从1923年10月1日起实行公历制，解散并改选所有教区理事会，并说明采取这项措施是由于他们是隐蔽的黑帮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对的），同时实施神职人员再婚制。这项措施是吉洪信徒故意以吉洪本人的名义推行的，并为此目的请示批准出版教会杂志。革新派不仅想在苏维埃俄罗斯，也想在国外加强自己的影响。他们尽量做到承认东正教大牧首的作用，同时又想把国外的东正教教会组织纳入自己的管辖之内。目前，正试图由美国的金参议员做工作使吉洪教派与革新教派和解。在与黑克尔特（曾任美国大牧首、神学教授）会谈中，金参议员指示：俄国东正教内讧四起的情况最令他难过，他担心这一

不同教派间的斗争会迅速波及到国外乃至海外。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调停两个敌对的阵营。为此目的，他打算召开一个有吉洪教派与革新教派参加的会议，并应允如能达成联合，将给予双方大量的物质支援。

释放吉洪使全体教徒，特别是右派分子十分惊恐。他们害怕在他悔过管事之后，为苏维埃政权而祈祷，担心这个老头子继续走下去。因此，他们散布谣言说：吉洪糊涂了。随后又开始谣传：吉洪卖身投靠布尔什维克了。刹时间，白匪的报纸公然断言，吉洪什么也没写，一切都是布尔什维克捏造出来的。但是，当吉洪的真实立场被披露后，教会和教徒中的极右分子开始离他而去，并以一位莫斯科著名的高级僧侣为首组织了（未完全办好手续）一个右翼教派。他们既不承认吉洪，也不承认“西诺德”，他们对吉洪的一切措施均持对立态度。这样一来，吉洪在改革方面做出的让步必然会促成在教会组织中出现极右分子和政治激进分子。这一伙人为数暂时不多，但是，毫无疑问，它能把所有对吉洪“左”的政策不满的教徒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因为当前吉洪可利用的影响甚微，不仅比他被监禁时候小，而且比刚刚释放时也小。吉洪此时常常从信徒那里接到匿名信，信中甚至要挟说，一旦他成为苏维埃大牧首，就置他于死地。当革新派的都主教谢拉非讲演时，一位显要的俗人发表声明：“我们爱吉洪，并尊重他，是因为他对教堂的一切毫没改动，教堂还是老样子。但是，吉洪倘若改革教会，那么我们对他的爱和尊重，将统统收回”。

最近，东正教僧侣的代表们常常要求解除自己的教职，其中的许多人表示愿去苏维埃任职，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示愿意从事反宗教宣传活动。反宗教委员会指出，神职人员脱离教会的种种事实，极少被我们党的报刊所刊用。

教派教徒

旧礼仪派：由东正教教会发起的运动，不可能影响苏联其他宗教团体。的确，反宗教委员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正教最大组织的变化过程。在8月初，旧礼仪教派全俄大主教梅列季（年长而望重的旧礼仪派高级僧侣）和他的两个助手发表呼吁书，其中明确谴责了那些抛弃苏维埃俄罗斯而跑到国外去的旧礼仪派教徒，同时，还指责了吉洪其人的行为，说他将全部的教会大牧首活动用在从事反革命事业上。他在呼吁书中写道：只有苏维埃政权才实现了基督大师传授的思想，而只有这种思想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不但如此，旧礼仪派教徒和皈一教徒（以奥地利为基地的第一批旧礼仪派教徒）比较靠近新时代教会，他们打算并正在实现在莫斯科成立自己的革新派教会中心的愿望，即成立最高皈一教会管理局。他们赞同谴责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损害苏维埃政权和迄今为止仍不悔过的教徒。他们声明：该组织在政治态度方面坚持革新教派所执行的路线，对吉洪及其活动持完全否定态度。该组织为首成员是皈一教徒中颇有声望的彼得格勒滑雪工厂前主任，大司祭贝斯特罗夫。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特地请求苏维埃当局给他在莫斯科提供一所老修道院。为此，他召集来30人左右组成小组，日内专为此事将向全体皈一教教徒发出呼吁书。

福音派教徒：必须指出，教派之中最使我们关注并且在其数量上最大、最有组织性的教派是浸礼派教派和福音派基督教派。他们的活动中心：第一个设在莫斯科，第二个设在彼得格勒。

这两个教派，特别是浸礼派，与国外主要是与英国和美国有着广泛的联系，从这些地方（通过“APA”（美国救济总署）和其他途径）得到许多粮食、书籍和其他援助。他们最近在俄罗斯取得了

极大的成就，因此，相应地扩充起来。最具诱惑力的情况是：为尊重宗教信仰，当局颁布了教徒免服兵役的法令，教派教徒利用此法令，把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异己分子吸收到自己的教派中来。直到目前，俄罗斯的教派教徒明确表示坚持反军国主义的观点，拒不服军役。后来，到了8月份，福音派基督教徒联盟以他们的领袖普罗汉诺夫为首的几位最显要成员发布了呼吁书，号召其教徒应征入伍。这个呼吁书激怒了所有的教派教徒群众。他们认为这份呼吁书满含恶意，对它持愤慨态度。为了使这一号召付诸实现，福音派教徒，特别是签署这份呼吁书的人于今年9月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代表会议，会上也提出并讨论了服军役问题。与会代表们起初以压倒多数反对服军役，反对呼吁书。某些代表甚至在大会开幕之前要求从大会成员中取消那些签署这份呼吁书的人物的代表资格。但是，因为签署这份呼吁书的人大多是些权威人士，甚至还有他们的领袖普罗汉诺夫，所以他们本想搞清楚究竟是根据什么签署这份呼书的，并欲论证此呼吁书与其信仰及福音教派本身是相抵触的。但终因此问题是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所谓的理事会全体会议老成员中的领袖们准备提出的，而且理事会在与会者中无疑享有很高的威望，故虽经较长时间和激烈的争论，却仍然一致通过这份呼吁书并做出决议：服军役是福音派基督教徒联盟全体成员的责任。尽管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要求废止这份呼吁书，并严厉指责说是撒旦钻进签署人的心灵，撒旦还会破坏福音教派教徒的活动，扰乱其安宁，并做出阴险的事来。但鉴于前述原由，代表大会以201票的多数赞成，20票反对、37票弃权通过了此项决议。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福音派的基督教徒必然出现的分裂。一些人明确宣布不服从此决定，乃至退出联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浸礼派教徒：福音派教徒通过上述决定，使浸礼派教徒在苏维埃政权面前非常尴尬。因为无论这个教派还是那个教派，他们的教

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与当局某些代表交谈中，浸礼派教徒说：可否采取某些措施为我们调解这个问题，而且抱怨福音派教徒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教义，把分裂带进他们中间。

今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全世界浸礼教派代表大会。会议持续了五个昼夜。浸礼教派组织的代表团决定从俄罗斯动身去参加这个会议，代表团成员约30人抵达斯德哥尔摩。

俄罗斯浸礼教派这次前往参加国际性的会议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当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团步入大会会场时，见到会场上挂出来的各国国旗中，竟然没有俄国红旗。代表团当即向大会主席团郑重声明：要么立刻挂出我国的国旗，要么我们退出会场。同时请俄国的全权代表就此问题予以协助。结果他们的合理要求获得圆满答复，旗子挂出来了。代表俄罗斯发言的有两位，即帕夫洛夫和普罗汉诺夫。他们在各自的发言中谈到：任何地方也没有比在苏维埃俄罗斯对浸礼教派有更好的法律了，这个国家对军事问题，原则上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因为他一再提出关于世界性裁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此次大会就服军役的问题做了如下决定：承认集体性军役，但应使每个国家完全有可能视他们成员的情绪而独立决定这一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大会之后，瑞典政府通知留下的四位浸礼教派教徒在48小时内离开瑞典，幸亏他们之中有一人病了，不能如期离开，因而他们仅多呆了一天。应该看到：尽管代表人数较多（约2000名不同民族的代表），代表大会仅仅召开五天；只讨论了两个问题：各地方的工作报告和对服军役的态度，但瑞典政府还是不允许他们讲话。当时，所有教派教徒均被福音教派代表大会关于服军役的决定所震动。在地方上到处都在讨论这一问题。而由于观点刚刚发生转变，这个决定对地方上的影响尚不清楚。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浸礼派教徒中间发生了分裂。这首先激起对于福音教派领袖

们的强烈不满情绪，因为是他们代表大会上坚持通过这个决定的。

托尔斯泰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的组织从反苏维埃和反军国主义化方面来说，是当前最有害的组织。的确，这个组织由于它的最显要的领袖被驱逐，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软弱无力，但是却吸收了极端的敌对分子。被驱逐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加科夫在那里积极地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与白匪的宣传口径毫无两样。值得注意的是，当着在大会上有一个福音教派代表为不服从军人政权的观点做辩护时，其他与会者们对他非常不满，说他浸透了托尔斯泰精神。

其余的教派在这时很少表现自己，反宗教委员会也没特别注意他们。

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神职人员诉讼案和围绕采普利亚克案件和布德克维奇案件引起的风波过后，所有的资产阶级组织和白匪组织以及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反苏维埃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收敛。应该指出：围绕采普利亚克和布德克维奇案件而激发的骚乱期间，罗马教皇本人和他的亲信们表现得很有理智。就苏维埃政权关于教会组织法律规定问题，罗马教皇与我们在意大利的全权代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过辩论，他同时准备采取某种方式表示同意关于天主教教会问题的规定。

前不久，天主教教区一时拒绝签署关于接受天主教教堂的祭祀财产的协定，如今，这些协定到处均可签订了。罗马教皇表示同意由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接替波兰天主教教士。但，迄今为止，仍未见这种认可的直接效应，并且著名的华沙主教罗普，苏维埃政权公开的仇人，继续向天主教教士下达抗拒苏维埃政权的命令。

伊斯兰教徒：分化过程也发生在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中间。今年夏天，在乌法召开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全俄罗斯代表大会（没来开会的有突厥斯坦、外高加索、克里木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会议的

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团体手里，此团体在大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革新教派性质的决议：承认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承认世俗教育对伊斯兰教是必要的等等。这次大会主要从亲苏维埃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中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并且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管理委员会委员中还有一位女的。针对寇松照会，为揭露英国帝国主义对伊斯兰教人民的压迫，和指明俄罗斯实现的宗教自由，以这次大会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告全世界伊斯兰教教徒书，这种情绪同样存在于外高加索、突厥斯坦和克里木共和国的相当一部分神职人员之中。而反宗教委员会认为：必须全力协助使这种情绪表露出来，激发所有伊斯兰教居民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问题之一是在清真寺给儿童讲授教义。伊斯兰教教徒坚持认为关于成年人的一般概念不适用于伊斯兰教的孩子们。按伊斯兰教的观念，成年人来临的很早（早婚）。因此，他们坚持允许向已长到十岁的孩子们讲授教义。为此，拟定了关于允许初级学校毕业的孩子在清真寺里听教义课的法令草案。

在莫斯科打算出版一本由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创办的名为《伊斯兰教》的杂志。同时《无神论者》（周刊，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机关刊）编辑部关于如何以最稳妥的形式把在伊斯兰教教徒中间进行反宗教宣传材料刊登在《无神论者》杂志上。

佛教徒：革新教派运动同样触及到了佛教徒。蒙古——布里亚特佛教僧侣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佛教（喇嘛教）僧侣的活动规模和影响。在这些决定中，和尚自己承认：佛教寺院目前已是道德败坏和人体毒瘤的巢穴。因此，根据决定，对喇嘛教僧侣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在这些僧侣中间发生了严重的斗争，可能是由于在设立现代医学（相当大一部分布里亚特居民患有沙眼和梅毒，僧侣治疗这些疾病采用藏医原理），和扩充开设自然科学课程的学校数目上大量用钱的缘

故。

在卡尔梅克自治州也召开了这样一次佛教僧侣的代表大会。

在犹太人中间的工作：犹太人的工作主要是由地方组织去进行的。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犹太教派的中央机关刊物《真理报》上，在这段时间里刊登了一系列冲击性的反宗教宣传文章。在犹太人群众中间的活动主要表现在查封犹太圣咏教堂，把它们改作工人俱乐部和为取消宗教节日而斗争方面。做犹太人群众工作的同志们在这些方面做出相当多的成绩。至于神职人员的工作，由于在教会组织内缺少一个联络中心，所以在全国范围进行此项斗争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寇松照会时期，正是相当一部分英国和犹太人资产阶级进行反苏维埃俄罗斯斗争的时期。犹太教神职人员顽强地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系，比其他宗教组织表现得较为明朗。

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主席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

№05085

杜契科夫关于释放吉洪后情况的报告

(1923年9月)

紧急 绝密

关于1923年7月1日到15日期间的教徒和教派。

总结这一时期时必须指出，主要是由于释放吉洪而使教会发生了混乱。

释放吉洪，特别是吉洪的悔过，以及他关于为苏维埃政权而祈祷的指示和转向新方式的打算，不仅使教徒们大为吃惊，而且使许多或多或少著名的苏联活动家对此也不完全理解。一个解释是吉洪疯了；另一种说法是吉洪投靠了布尔什维克；第三种说法是这一切都是假的，甚至有些信教群众认为吉洪本人也是假的，主要是他们害怕吉洪转向革新派教徒，这是教徒们最害怕的。

当吉洪发表第一份呼吁书时，教徒们确信吉洪是反对革新派教徒的，因此对他的态度有所好转，而他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悔过，则使教徒们与他交往时毫无顾忌。

右派分子非常不喜欢吉洪采取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对他与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联系很反感。在他获释后，他们开始了解到这一联系，于是在这些人中间就传出这样的说法，仿佛这个老头儿没有抛出什么重要的东西。

释放吉洪使革新派教徒也感到害怕，因而他们最初把这解释为是民政当局要消灭他们，并依靠吉洪。但后来他们确信自己在与当

局关系方面的地位还是巩固的，而吉洪则绝没有摆脱法庭取得自由，因此他们着手组织自己的力量，并拟定了与吉洪分子作斗争的方针。对此他们开始到处改编自己的队伍，把原有高级僧侣中较有声望的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目的在于以坚固的和不可轻视的地位与吉洪对抗，并以此为目的把最高教会管理局改称为以前的“东正教最高会议”，增聘 12 名原来吉洪的高级僧侣作为它的成员。这样，吉洪分子和革新派教徒之间的分裂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现在，这两个明显敌对的团体互相指责为“分裂分子”，他们已彻底地、不可调和地分裂了。就是吉洪的一个名叫伊拉里昂的主教也意识到教会的分裂是既成事实，他在自己的讲话中多次说到这一点。在此之前，无论是他还是吉洪，都认为革新派教徒是微不足道的一伙人。

莫斯科的神甫们看到随着吉洪的获释东正教最高会议没有丧失自己的作用，便坚持要吉洪的主教们和东正教最高会议相妥协。他们说明的理由是：他们现在处境极为艰难，因为一方面东正教最高会议向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贯彻它的措施；另一方面，相反，代表教区委员会的教民则要他们服从吉洪而不要听从东正教最高会议。因此吉洪的和革新派的主教们举行了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要吉洪完全放弃权力，自行放弃教职并到一个修道院去。

吉洪本人对此连听也不要听。尽管吉洪分子到处都是，比革新派教徒多得多，但后者不放弃自己的地位并为掌握教会而进行拼死的斗争。他们相互指责对方为反革命，秘密地和公开地相互向当局揭发对方的反苏行动。

两派的敌对情绪已发展到在教会里打架斗殴的程度（彼得堡、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奥廖尔），以致教会的威信扫地并为反宗教宣传准备了良好的基础。东正教最高会议为了巩固其威信现在打算得到东正教普世牧首的承认，为此派了自己的代表团到土耳

其。

吉洪也尽可能地自由管理教会而努力在苏维埃政权面前恢复自己的声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第6处处长

杜契科夫

№04756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关于
拟定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的请示**

（不晚于1923年11月1日）

决议草案

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听取：关于宗教团体登记

决议：认为根据至圣“西诺德”和省主教管辖区管理机构有权
管理教会教区理事会的精神制定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是必要的。

反宗教委员会副主席 H. 波波夫

№0475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反宗教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1月1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1号第15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同志、加里宁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鲁祖塔克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同志、索尔茨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5. 反宗教委员会的问题。(H. H. 波波夫同志、斯米多维奇同志)。

决议：15. 延期。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5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拟定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和关于
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决议

（1923年11月10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3号第20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鲁祖塔克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捷尔任斯基同志、瞿鲁巴同志、丘巴尔同志、A. П. 斯米尔诺夫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同志、索尔茨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20. 反宗教委员会问题。（H. H. 波波夫和斯米多维奇同志）。

决议：20. （1）建议反宗教委员会根据波波夫同志报告精神拟定教会团体登记工作细则。

（2）责成反宗教委员会向下一次政治局例会提出苏维埃决议草案，报告执行政治局今年10月3日关于在苏联某些区域设立伊斯兰教宗教学校的决议情况。（会议记录第37号第17项）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59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
副主席波波夫给斯大林的便函

（1923年11月16～22日）

致斯大林同志

请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方式批准工作细则。若再继续拖延，则会给所谓的教会革新派带来严重后果，使反宗教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局自去年秋季开始的全部工作化为乌有。

工作细则中唯一的一条原则项目，政治局已经表示同意，我已打上了重点符号。

H. 波波夫

№0476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的决议**

（1923年11月22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7号第13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同志、加里宁同志、鲁祖塔克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捷尔任斯基同志、瞿鲁巴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比雪夫同志、索尔茨同志。

听取：13.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

（政治局第43号第20项。11月10日）

（波波夫同志）

决议：13. 延期到下次政治局例会。

中央委员会秘书

№05060

沃伊采霍夫斯基关于阿格万·多尔日耶夫
在左西诺奥泽尔喇嘛寺世俗人和喇嘛
会议上讲话的报告

(1923年11月27日)

多尔日耶夫在对与会者表示欢迎的同时，说道：在这个会议上你们将在由布里亚特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登记的基础上选举信教群众教区（喇嘛）委员会。

应当选举这些人进入委员会：他们了解教会和国家、教会和学校分离的决定，他们跟着苏联的路线走并且是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困难地贯彻新的规定。

在人数很多的僧人（喇嘛）中发现有人从事投机，尽管这样的人不多，但毕竟是有的。其中，如牌迷、喝烈性酒的人、偷盗的人等等必须开除出僧人队伍，因为他们不遵循佛教《戒律》。这样的人只要出现在信教群众的面前，他们就会危害遵守佛教法规的其他僧侣，因此必须定期对僧侣进行“清洗”，重新组织教区委员会需要注意这一点。

所有僧人应当知道苏联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因此，需要在喇嘛寺（修道院）里组织公社或劳动组合，是该拿起木犁、耙、镰刀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想法。

从现在开始需要让所有僧侣了解公社和劳动组合的规章，这也有赖于教区委员会。

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 沃伊采霍夫斯基

№0476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的决议**

（1923年11月29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9号第17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托洛茨基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科夫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拉舍维奇同志、П. П. 斯米尔诺夫同志、瞿鲁巴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索尔茨同志、古谢夫同志。

听取：17 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

（政治局第47号第15项、1923年11月22日）

（波波夫同志）

决议：17 委托加米涅夫同志会同反宗教委员会一道审议工作细则草案，确定最后文本，并送至政治局各委员，以便书面表决。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62

东正教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

（不晚于1924年2月26日）

东正教宗教小组和团体登记工作细则（草案）

鉴于今年4月27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第92期上刊登了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和今年5月10日在同一刊物上刊登了宗教团体标准条例，制定出贯彻政教分离基本法的一套办法；历史上形成的特定的教会等级式的宗教仪式，上述工作细则也必须适应这些特点。

为此目的，应给上述宗教团体登记工作细则做出说明和补充，以便保证教徒根据他们的教规自由举行祭祀活动，特此宣布关于东正教宗教小组和团体登记程序的该工作细则。

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东正教公民，按照1918年8月24日司法人民委员部颁布的条例规定（《法令汇编》1918年第62号，第685页），凡组织宗教小组和团体，从前又拥有教堂和祭祀财物，以及新组织起来的组织和团体，都应按照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1923年4月27日颁布的条例规定，（见《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1923年292期）进行登记，并遵守下列各条规定。

附注：（1）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4月27日通报中颁布的工作细则，已经登记过的东正教教派小组和团体不再重新登记。

(2) 按上述规定重新登记之前, 以及领到证明书之前, 上面所指的教徒集体仍可留用他们正在使用的教堂和祭祀财物, 并保留教会团体拥有的权利。

2. 凡愿意登记或重新登记自己的教派小组或团体的公民, 应携申请书向州管理局或州执行委员会提交:

(1) 小组或团体会议记录, 其中应指出小组或团体附属于东正教;

(2) 小组或团体成员的名单, 一式三份并说明: ①姓名和父名; ②居住地地址; ③国籍; ④工种和收入, 1914年以来的社会地位和职位; ⑤财产状况; ⑥法定金额内的印花税。

附注: (1) 愿意保留教堂和祭祀财物的每一东正教教派小组或团体, 应不少于 20 人组成;

(2) 登记时不用交东正教教派小组或团体的任何章程——原先提交的章程无效。

3. 当排除有碍组织教派小组或团体的事由之后, 省或州执行委员会的管理科将他们造册。发放证明无误的成员名单副本和登记批示, 然后授于使用教堂及教会财产的合同, 再根据合同附件清单进行签署^①。

附注: 凡宗教小组或团体的成员中有退出者, 必须报告管理部门; 同样地, 有加入者也必须按第 2 条的 (2) 项要求报告管理部门。由于有退出者致使小组成员达不到规定的人数 (20) 者, 将废

^① 后来又补充 3 条:

8. 在司法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期限内未登记的东正教教派小组 (团体) 将被禁止活动, 而与其签署的使用教堂及教会财产的合同随之废除。根据 1918 年颁布的政府法令总原则, 教堂及其财产可以转让给其他小组。

9. 东正教教派团体视其拥有教会财产的一般需要而规定自愿税收, 并签定有关保护教会财产的私法性质合同。

10. 监察教派小组 (团体) 是否遵守共和国法律和地方当局行政命令,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省、州、县执行委员会管理科和主管机关的检察人员负责。

除其合同。

4. 管理部门有权从教派小组或团体的名单中删掉已被判刑的，或受审讯的成员。

5. 与教堂经费有关的一切经济范畴都属于和管理部门已签订使用教堂和教会财产合同的东正教教派小组或团体的产权范围。教派小组和团体成员负责保护接受的财产，接收后使用财产时缴纳税金，在该团体举行一切集会和祈祷仪式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6. 已登记的教派小组和团体，经全体大会以多数票选出教区理事会委员和神职人员，按本工作细则第（2）项要求编造花名册，经教区管理机构验证无误后上报省、州执行委员会管理部门注册。

7. 除了追缴法定的印花税外，小组和团体按第3项和第6项规定免费进行登记。

8. 凡从清单中勾掉已登记的小组和团体，撕毁使用教会房屋教堂和教会财产合同，均应根据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3月29日决议（《法令汇编》）进行。

9. 本细则只针对东正教教派小组和团体制定的，其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宗教仪式的举行。

东正教人士如因举行宗教仪式之外的其他目的组织宗教团体者，必须登记和审批章程^①。

——在原文上方是打字复制的H. H. 波波夫的附言：“请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声明用电话询问政治局委员方式解决问题（批准细则）H. 波波夫”。文后是打字复制的附言：“库尔斯基和赫洛普良金已签字”。维·米·莫洛托夫手写的附注：“同意。维·莫洛托夫”。还有他手写的附注：“此文件是政治局决议附件”。

^① 后来又补充1条：查禁宗教团体的程序按1922年8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第6和第11条来决定。

№0476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批准东正教宗教团体登记
工作细则的决议

（1924年2月26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73号第23项
机密

听取：23. 关于审批东正教宗教小组和团体登记工作细则。
（波波夫同志）

决议：批准。

（参阅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原文的下方打有表决结果：“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
——弃权，莫洛托夫同志、鲁祖塔克同志、加里宁同志、加米涅夫
同志——赞成”。

№04764

沃罗涅日省乌斯曼市共产党员小组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

(1924年6月25日)

沃罗涅日省乌斯曼市
共产党员小组教堂管理人员

致中央执行委员会

我们乌斯曼共产党员小组效法我们敬爱的领袖弗·依·列宁的榜样及早地汇报我们斯科林的代表们和他的帮凶们干的坏事。要求中央给予应有的处理。

对东正教教徒拳打脚踢，公开地在人民面前侮辱教徒，为时尚嫌过早。这种行为对于现在用反宗教思想培养出来的，不追求宗教信仰的新一代人来说，自然是司空见惯的。

特别是在乡村查封教区教堂，也还为时过早。公民们对政府和党义愤填膺。特别是现在，预计农业可能全面欠收，尤其是我们县饥荒将随着旱灾而来，这些足以使我们的心情沉痛的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冬季感到无能为力，这种时候反而眼看着伤害他们的宗教感情。我们政府机关的头头们，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沃罗涅日省乌斯曼县新乌格良村，吆喝着命令推倒十字架，将它踩坏。随后又命令孤儿院的儿童们也当着农民的面照着乱踩，农民们对当局敢怒而不敢言：心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吗？

还有一次戏弄娜杰日达劳动组合的事。修女们不容置辩地后退

了，把一切都交了出来。她们退到孤儿院内一侧的小屋里，陪伴着弱小的儿童。这里当然可以避开长官们，我们的长官们把她们赶到这里是要把他们隔离起来，让她们在这里生活，过一辈子。其实，这完全是公开的骗局，搬迁后没几天，就公开地袭击劳动组合。时至今日几乎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常常在深夜里，等待农民们田间劳动之后疲倦地熟睡的时候，我们的长官们便悄悄地来到娜杰日达劳动组合，喝足了烧酒，放开胆量、七嘴八舌地把住在那里的不幸的人们赶出去。没有当局的任何决定，事先也不找好住处，临时随意驱赶他们。被驱逐的人们吓得到处乱跑，有的就近睡在柴禾垛上的，有的去新乌格良村附近的农民家里投宿的。因此，他们对当局的憎恨与日俱增。殊不知，娜杰日达劳动组合的修女们也是农民，也是普通人。

我们的长官们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得既无策略，又不理智。

我们共产党小组遵照敬爱的弗·依·列宁的遗嘱，对此万分气愤。我们小组均是贫苦人，并无豪华的住宅和奢侈的陈设，我们的妻子甚至没有衣服穿，都不如洋娃娃那样能穿着华丽。我们的收入极微，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能象他们那样喝得烂醉，所以对这些不成体统的事感到非常气愤。特请求中央彻底制止此类丑陋和暴虐行为。他们的这些劣迹无异更加剧了对当局的敌视和不满，我们诚恳地向敬爱的领袖致以尊敬的缅怀，诚请中央下令彻底制止这类丑事。

再补充一点，我们的长官为了受贿，经常在过去有钱的商人中间指定某些资本家担任要职，这些商人都被安排在机关里，因为这儿的主席软弱无能，可任意听其摆布。还有这类情形：为了受贿，从这一家摊派四名公差，而对另一家则少出一个。那些资本家的太太们得意地说：这种事既要讲情面，也要有点小恩小惠。这类卑鄙无耻的勾当何时了?! 这难道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敬爱的伊里奇所

留给我们的遗嘱吗?!

风潮四起，我们的长官们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沉湎于作威作福、欺压人民之中。白天，他们稀里糊涂地干所谓的工作；夜晚，他们便把酒当歌，胡作非为。

我们不图权势和职位，而是为了崇高的理想；也不是有意造谣中伤，而是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实在令人痛心。因此，请示中央，让我们顶上去掌权。

我们共产党员小组的党员们，肩上扛着健全的头脑，是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希望以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工作，希望同中央接触。

我们强调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小心谨慎，要有理智。可是，上述行为却反而加深了宗教感情，加强了对宗教的追求。

1924年6月25日

№04765

杜契科夫关于查封教堂引发冲突的汇报

(1924年7月4日)

绝密

秘密保存

汇 报

由于查封教堂和共青团员们的行为而引发的冲突性事件。

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有：

1. 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省莫什科沃村，准许农民在建起学校之后盖一座木质结构的教堂。当农民履行合同将教堂盖好之后，为了使教堂更加神圣，特举行一个庆典仪式。可是，乡执行委员会却禁止举行庆典。致使聚会的三千余人情激愤。后来，当局费了很大的劲才算平息。

2. 查封巴赫穆特区（顿涅茨克省）谢尔宾矿场的教堂是根据矿工会议的决定干的，当从教堂里开始搬东西时，有近四百名对查封不满的人向警察和党员们扔石头，继而到共产党员的住处大吵大闹，有的人当场被石头击伤。

3. 塔甘罗格区德米特罗夫卡村根据执行委员会主席梅尼科夫斯基同志的倡议，决定查封现有两个教堂中的一个做文化场所。

愤愤不平的居民似乎被某种命令所吓住了。一直呆在圆屋顶钢筋下待命的人群，突然冲向图书馆馆员，并从他的手里夺走了教堂

的钥匙，闯入教堂，将教堂里的长橙东抛西扔，还撕毁壁画等等。6月8日某些人散布流言说，有人在某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住所焚烧圣像。人们立刻赶到那儿。赶来的民警要求离开现场，而人群没听从这种要求，民警朝天开了两枪，尔后又向人群开了枪，结果使三名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孩子、一名儿童中弹（一名死亡、三名重伤）。

4. 米阿斯县特拉尼科夫村的区苏维埃决定把教堂作为应拆毁的危房出售给消费合作社。当拆教堂时，聚集来一群人，他们以武力相威胁赶走了拆教堂的工人们。

5. 在沙赫特市查封矿上的教堂时，聚集起一大群人，他们派出代表团到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要求开放教堂。人群不但不听从解散的命令，反而冲向钟楼，拉响了大钟，冲入教堂。神甫乘机讲了一通极带挑拨性的布道词，号召奋起保卫今后的教堂。约1500余人走在街上喧嚷，要求解救其他教堂。警察骑兵后备队在机枪的掩护下赶来，竟然遭到乱石袭击。

6. 在托木斯克省佳热村，召开关于人民宫、托儿所等等的群众大会之后，乡委员会书记马利科夫赶到了，提出下列意见让大家表决：谁赞成交出教堂，谁就举手，谁若不举手，就意味着打算把教堂连同资产清册一并交出来。大部分人由于气愤便走掉了。那个马利科夫又去到其他村子，以同样的手法收罗了几个人签名。当实行查封时，有大约500人的一群人叫喊着：除非打死我们，否则不能查封教堂。结果，只得在这里签署了使用教堂的新合同。

7. 切尔尼戈夫省诺索夫克村的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在和独立教会（乌克兰沙文主义教会流派）的个别人士谈判之后，在报喜节前夕查封了吉洪诺夫大教堂。第二天，来了一些教徒，打开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当时他们把神甫扣押起来。于是，招引来一大群人，要求释放神甫。同时，把前来命令人群解散的民警毒打了一

顿。

8. 在布良斯克市，当地的共青团员们在一个节日前的夜晚，撬开一所教堂，潜入钟楼内，拿走了资产清册，拆下钟锤，然后将拿来的东西弄到林子里，凡是能烧的，一律烧光。在场围观的群众，以极其愤慨的心情，痛斥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如同强盗和流氓组织一般。

9. 在图拉省阿库洛夫村，有人将在宗教游行时试图进行反宗教宣传的共青团员打死了。

10. 在伊尔库茨克省，一个正在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俱乐部里举行反宗教晚会的村子，突然飞来一颗手榴弹，重伤四人。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要司第六处处长 叶·杜契科夫

№04766

加里宁关于查封教堂致斯大林的信

(1924年7月8日)

致俄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无论1923年8月16日俄共中央的通令也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应的指示也好，还有司法人民委员部第五局一系列的指示也好，都未能使各地稳妥地解决宗教问题。这一点，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每日收到的请示报告得以证实。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委员会对在宗教问题上违反党的指示的人过于迁就。

我想请您，斯大林同志，熟悉一下文件，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下达一个强制执行中央指示的严格指示。

顺便说说，越是想要查封更多的教堂，越是走向反面——反抗的力量越大，广大的教徒群众越会被激怒。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同时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交此汇报和共产党员发出的没有签名的异常重要的文件。

米·加里宁

№05062

阿格万·多尔日耶夫关于不宜在信仰佛教的
居民区里进行反宗教宣传致苏联
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

(1924年7月19日)

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州，某些决定和反宗教宣传在普通老百姓中引起很大不安。在崇拜宗教和佛教教义，把宗教看得高于自己生命的人民中间出现了忧愁和冲动，他们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会看到自己宗教的完全败落。

到处都在传播这方面的消息。在西藏和蒙古，对苏联政府的反佛教政策谈论得很多。

据可靠情报，西藏人民得知在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那里佛教的遭遇后，不再指望俄罗斯而转向英国方面。他们得到的印象是，苏联政府对佛教持敌对立场。

还有情报说，竭力要与哈尔哈^①联合的内蒙古（南部），在北部佛教处境困难的消息的影响下，现在也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确信，假如停止反宗教宣传的不适宜现象和取消妨碍佛教的决议，那么，所有拒绝与我们来往的人又会转向苏维埃俄罗斯。

驻西藏政府代表 阿格万·多尔日耶夫

^① 北部蒙古的旧称，今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主体部分。

№04767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任命副主席
给加米涅夫的便函**

(不晚于1924年10月9日)

加米涅夫同志：

我将于星期六早上六点钟起程去休假一个月。请委任反宗教委员会的副主席。建议由彼·格·斯米多维奇代替 H. H. 波波夫为副主席。在斯米多维奇休假回来之前（他的归期为10月20日），请委任彼·阿·克拉西科夫为副主席。

雅罗斯拉夫斯基

№04768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委任俄共
（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
副主席的决议**

（1924年10月9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7号37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布哈林同志；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同志、鲁祖塔克同志、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中央委员：克拉辛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皮达可夫同志、A. П. 斯米尔诺夫同志、丘巴尔同志、布勃诺夫同志；中同监察委员会委员：索尔茨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古比雪夫同志、古谢夫同志、扬松同志。

听取：37. 关于委任反宗教委员会副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决议：委任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副主席。决定由彼·格·斯米多维奇同志代替 H. H. 波波夫同志。在斯米多维奇休假回来之前，委任彼·阿·克拉西科夫同志为副主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04769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补充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
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0月17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37号第17项

机密

听取：17. 关于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成员（组织局决议，录自10月3日第33号记录第15-6项）。（阿博林同志）

决议：17. （1）反宗教委员会新补充的成员有下列同志：
K. A. 波波夫任副主席（代替 H. H. 波波夫同志），卡西缅科（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安采洛维奇（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任委员。

（2）建议女工处在书记处下次会议之前提出反宗教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以便审批。

（3）反宗教委员会有必要进行经常性的工作。建议每隔一个月向组织局汇报一次自己的工作。

（4）正式决议第（1）项须经政治局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П. М. 卡冈诺维奇

№ 047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补充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
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0月23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0号第45项

机密

听取：45. 关于反宗教委员会成员

（10月3日组织局决议，会议记录第33号第15-6项）。

（10月17日，组织局会议记录第37号第17项）。

决议：补充到反宗教委员会的成员有下列同志：K. A. 波波夫任副主席（代替H. H. 波波夫同志），卡西缅科（俄罗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安采洛维奇（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政治局会议记录草稿，在通过口头询问政治局委员们进行表决（划圈表决）用纸的下部分是“表决结果”栏，表决人用铅笔和钢笔字的亲笔字：

“米·加里宁：

列·加米涅夫：无异议

约·斯大林：无异议

米·托姆斯基：

列·托洛茨基：无异议

尼·布哈林：赞成

莫洛托夫：赞成

格·季诺维也夫：赞成”。

№04771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
格鲁吉亚地方政府在执行宗教
政策中的偏激行为的决议**

（1924年10月27日）

摘自全体会议记录第8号第2项

机密

根据政治局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24年10月27日）通过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摘录。

宗 教

9. 为补充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4~7日的决议第六项，作如下决议：

撤消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有三百人签名方可开放教堂的规定及其他一切行政限制措施，给予农民开放教堂的权利。

警告地方当局绝对不许压制和迫害要求开放教堂而签署声明的人。对于进行迫害而犯错误的人加重党籍和法制惩处。

迫害执行宗教事务的神职人员的人也应受到同样的惩罚。

中央委员会书记

No05063

**阿格万·多尔日耶夫关于建议重新审议
佛教条例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

(1924年11月19日)

去年由我提出的关于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佛教条例草案，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请苏联政府核准，该草案除有关藏属的条款外，都获得党和苏维埃机关高层的赞同。

如今这一条例已在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规定的政权机关登记，但是有关开设附属于寺庙的初等学校，其资金由寺庙承担并赋予班奇多喇嘛^①、寺庙的主持们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有权拥有内部交往用的、作为中央政府共同的决定和法令来作规定的特殊印章这一条从条例中去掉了。

然而，尽管如此，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当局设法使宗教事务委员会确信，他们将不采取行政措施将不满18岁的年轻僧侣从寺庙中迁出。

但是通京和巴尔古津区地方当局开始采取引起各种后果的措施，例如，强迫所有未满18岁的年轻僧侣迁出，对不执行这一命令的有罪的寺庙主持，威胁他们要坐3个月的牢，教孩子们识字和佛经的要坐1个月的牢。

群众是把当局的这类命令当作迫害宗教、当作取消十月革命庄

^① 苏联中央佛教管理处主席。

严宣布的信教和宗教信仰自由来接受的。

信教的在家人^①就这一问题致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声明中指出这样的情况：佛教和在家人甚至在对传教士和东正教迫害的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在对自己宗教信仰自由的压抑，因为旧政权没有采取如取缔相当一部分宗教这样的激烈措施。

我指出以上情况丝毫也不否定对宗教采取行政措施的合理性，但是我认为行政措施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即这些措施适应在家人和宗教界人士的先进部分的要求，而不是笼统地对宗教一概反对。

用行政措施将既不遵守宗教会议决议，又不遵守著名的佛教教义《维纳耶》中所阐述的严格的僧侣生活的基本规则、不劳而食的所有僧人隔离和清除出寺庙，这些措施将只受大多数劳动居民和服从宗教会议决议、在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个别劳动村社中组织起来的那部分宗教界人士的欢迎。

但是对待这部分宗教界人士，地方当局应当保持友善的中立，另一部分站在反对任何新事物和不承认宗教会议决议的僧侣们，应当把他们作为有害于社会的群体，作为不健全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从寺庙里隔离出来。

我在以上所述的基础上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苏联当局的高层党和苏维埃机构：

1. 向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地方政权阐述关于停止对喇嘛的本质组成不加区别，将他们迁出寺庙的指示。

2. 允许佛教寺庙继续接受未满 18 岁的人进寺，主要是根据他们家长的请求或他们自己为了学习藏文和教义，但是必须同时在由寺庙出资开设的初等学校上正常的课程，并且在地方教育机关的真

^① 即在家修行的教徒，与“出家人”相对。

接监督之下。

在这些学校毕业并满 18 岁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往后的生活道路。

这样的妥协不仅是由牢固地扎根于居民意识里的传统宗教信仰系统所促成，而且更主要的，是由现今在西藏、蒙古和北中国某些部分占统治地位的北方佛教本身基础所决定的。拒绝这样的妥协，居民无疑将视为限制宗教自由。

3. 赋予班奇多喇嘛、寺庙的主持们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有权拥有为宗教事务相互通信所必须的特殊印章和印有宗教图形标志的公文用纸。卡尔梅克宗教界现在已经享有这一权利。

阿格万·多尔日耶夫

No 04772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关于补充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
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1月28日）

摘自组织局会议记录第46号第63项

机密

听取：63. 关于推举女工处代表进入中央反宗教委员会（1924年10月17日组织局决议，会议记录第37号第17项）。

（尼古拉耶娃同志）

决议：63.（1）批准莫伊洛娃作为中央的女工处代表进入反宗教委员会。

（2）将此问题送政治局审批。

中央委员会书记 拉·卡冈诺维奇

№0477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补充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
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1924年12月4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9号第36项

机密

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1924年12月4日。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李可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托姆斯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同志、索柯里尼科夫同志、鲁祖塔克同志、伏龙芝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安季波夫同志、安德烈耶夫同志、乌格拉诺夫同志、布勃诺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哈伊洛夫同志、皮达可夫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古谢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扬松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索尔茨同志。

听取：36. 关于推举女工处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组织局1924年11月28日决议，会议记录第46号第63项。）

决议：批准莫伊洛娃作为中央女工处代表进入反宗教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书记

——在政治局委员经口头询问表决专用纸上有打字原文（表决

时画圆圈)。在专用纸的下部分“表决结果”栏内表决人用铅笔和钢笔写的亲笔字：

“列·加米涅夫：赞成

斯大林：赞成

托姆斯基：赞成

尼·布哈林：弃权

莫洛托夫：赞成

阿·伊·李可夫：赞成

格·季诺维也夫：赞成”

№04774

供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的
俄共（布）中央反宗教委员会
组成人员备查表

（不晚于1924年12月4日）

反宗教宣传委员会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政治局32号，4条，1922年10月19日

克拉西科夫同志

H. H. 波波夫同志

明任斯基同志

斯米多维奇同志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主席）

政治局45号，9条，1923年1月25日

利哈乔夫同志（代表）

政治局3号，29条，1923年5月10日

莫斯科委员会及代理人札科夫同志，后来代替札科夫的科斯捷
罗夫斯基同志

雅科夫列娃——教育人民委员部主席

政治局14号，33条，1923年7月3日

K. A. 波波夫（副主席）

政治局 30 号，45 条，1924 年 10 月 23 日

卡西缅科（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代表）

安采洛维奇（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

№04775

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契切林关于通过 苏联天主教条例给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的请示信

（1924年12月6日）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恳请政治局下次会议提出审查天主教条例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委员会已通过了这个条例的草案。剩下的只是与克拉西科夫同志商议再增添某些部分，然后把最后确定的方案分送政治局各位委员。

在1923年年中，政治局曾通过一个关于妥善解决此问题的决议并给约尔丹斯基同志下达指示。约尔丹斯基同志同天主教高级僧侣进行的谈判毫无成效，迫使我们当时将谈判终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国际局势起了变化，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委员会对某些问题又作了另外的决定。出现这种不稳定局面对我们很不利，而且，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令人忧虑的国际政局，这对我们尤其有害。当前，根据事态发展必须对天主教教派也颁布一个切实可行的、即同其他教派同样的条例。我们唯独没有天主教条例，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十分被动。在制定这个条例时，应深思熟虑，注意不惹起事端，应制定一套让大家都能接受的暂行办法。我们应该从梵蒂冈那里得到某些必要的补偿和遵守该办法的许诺。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委员会通过的一些决定分为三个部分：
（1）天主教条例应列入我国立法系列，并适当地公布出来；（2）天

主教条例提纲应在我们和梵蒂冈之间进行协商，因为涉及到天主教教会的管理原则，也包括梵蒂冈和当地的天主教教徒团体之间的关系；(3) 提纲是为我国内部需要制定的，所以应当由我国行政机关签署和使用。

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

格奥尔基·契切林

1924年12月6日

№04776

《苏联天主教条例》(草案)

(不晚于1924年12月9日)

天主教条例

(克拉西科夫同志的审定稿)

1. 天主教祈祷的房屋(天主教堂),依照政教分离法令,移交给地方天主教公民团体使用。

2. 希望为自己占用教堂房舍的天主教公民,应向省执行委员会递交申请字据:保证教堂依照罗马天主教宗教仪式为正当祈祷需要所用;对按资产清册接管过来的教堂财产负有监护责任,同时有义务:(1)用自己的收入(根据房舍及与其同时移交的物品经费)来支付一切日常开支,如修理费、保险费、取暖费、照明费、纳税、地方税等等;(2)不妨碍其他信仰天主教的当地常住公民,只要不是经法院判决有罪的、不是正在受侦查的人,按同等条件占有和使用教堂财产。

3. 最重要的管理事项,如教堂的大修,确定全权主管人,为保持教堂应有的外观进行管理维修和筹措经费等,应通过团体的全体会议来决定,但应向地方政府通知会议时间、地点和日程。

4. 天主教教徒公民们,除了可以从自己人中间推举特命全权管理人之外,尚可推举特命全权管理委员会来主持日常管理工作。如:日常维修,雇用和监督更夫,购置宗教仪式用品等等。

5. 团体的管理人名单和团体准许进教堂举行宗教仪式的神职人员名单，应在每年公历年始（1月1日）上报省或州执行委员会行政处备案。

6. 宗教团体的成员对管理人和神职人员在管理祭祀和房舍维护方面的一切非法刑事犯罪的刑事后果负责，并对上述人员中这些行为的直接犯罪人负有责任。

7. 天主教公民团体不享有法人权利，无权以某种形式向使用教堂的人强制征款，与同教人同等对待。

附注1 个别团体或他的管理人可以募集自愿捐款（集体），把这些钱只用在自己教堂的需要上，或用于神职人员的经费上，并且一切收支均需有明细帐簿并精打细算。

附注2 天主教教堂原有的教会房屋按常规属于国家财产，不得与教堂一样移交给团体，可以按一般规定租用。

附注3 天主教组织中的中央教级制定的神职人员宗教规法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权限，也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任何法律责任。

8. 天主教中央教会管理机构，或是它的最高首领训谕、谕令、使徒行传、教皇通谕，以及其他属于所谓的宗教司法管辖之内的各种文书，不经相应的苏联国家机关的签证，均不能刊发、传播和付诸实行。

9. 停止使用教堂、解散团体和废除使用教堂的合同，均应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3年4月19日的法令，由省执行委员会做出充分说明理由的决议方能生效，同时有权按一般程序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并根据司法人民委员部和外交人民委员部1924年4月23日第62号通令承担后果。当未履行合同，或有刑事追诉原因而不得不解散团体时，司祭将不能延长与该教堂的合同关系和继续在此任职。

10. 中央一级组织派来的神职人员，既可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亦可按正常程序解除教职。

№0477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反宗教委员会提出的 “关于苏联天主教基本条例草案”

（不晚于1924年12月9日）

苏联天主教基本条例

1. 大多数天主教徒，由于其宗教组织的特点，他们的中央机关设在苏联境外。事实上，在确定其教级的人选时，不采用选举原则。他们的神职人员均是由国外的中央（梵蒂冈）委派进来的。但是，每一位派来的神职人员都不例外地必须经以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代表的苏联政府的批准。

因此，必须明确地强调：梵蒂冈从国外委派的教级人选，丝毫不得以任何借口享受任何治外法权。他们必须服从苏联政府和其机关的一切法律和命令。

2. 不准许天主教教会团体及其分支机构，以及他们的成员踏入苏联领土。

3. 天主教组织以及个别僧侣活动的范围限制在居住在苏联境内享有祭祀自由的天主教居民中间。

4. 天主教宗教仪式用拉丁语进行。

5. 不准许建立教会的慈善团体、合作社等组织。

6. 训谕、谕令、教皇通谕等等，不经苏联政府批准不得发表，印刷和传播。

7. 主教和司祭的调动，需经苏联政府批准。
8. 主教和都主教在自己教区管辖内可有住所。
9. 在苏联领土上工作的神职人员，只能直接服从于住在苏联境内的自己的主教。
10. 最高教级（都主教）须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自己的中央（梵蒂冈）取得联系，不能直接服从其他国家的主教，也不能同他们有业务关系。
11. 天主教教士的委派和调动，要同苏联政府协商进行，政府有权对候选人提出异议和事先收集有关候选人的材料。
12. 天主教教会组织要服从苏联现行的学校法。
13. 关于对年满 18 岁，想从事教士职务的成年人开设讲习班的问题，以后再作妥善安排。

№04778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布）中央
反宗教委员会的信

（1924年12月9日）

政治局各位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部各位委员及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斯米多维奇同志、克拉西科夫同志、明任斯基同志：

兹送上有关天主教状况的材料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委员会提案。

首先，呈送的是克拉西科夫同志写的天主教条例草案的定稿；

第二，送上关于苏联天主教的基本条例。我们面临的重要原则问题是否应根据此基本条例作如下声明：新的天主教教士应尽可能从苏联居民中选派。一年以前，我们曾期望梵蒂冈派来意大利人或德国人的天主教教士。现在，明任斯基同志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因为意大利人可能是法西斯分子，而德国人可能是巴伐利亚人。故拟采纳他的意见，尽可能从我国居民中挑选天主教教士。

除了分送的文件之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了内部需要，受托起草关于天主教教士的调动条件、宗教游行、宗教团体集会、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与高层教级的一般交往和通信等的决定和关于禁止天主教教士吸收新教徒的决定。此条例中的某些条款在已分送的提纲中已经提到过，但是为便于实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应当详细地制

定出条例。

外交人民委员部 格奥尔基·契切林

1924年12月9日

№0477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苏联天主教条例》（草案）的决议

（1924年12月11日）

摘自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0号第2（1）项

机密

出席者：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候补委员：莫洛托夫同志、加里宁同志、鲁祖塔克同志、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伏龙芝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同志、皮达可夫同志、丘巴尔同志、奎林同志、米高扬同志、安季波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米哈伊洛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A. II. 斯米尔诺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古谢夫同志、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扬松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2.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问题：

（1）关于天主教条例草案（契切林同志、李维诺夫同志、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克拉西科夫同志）

决议：（1）①原则赞成委员会的意见；

②建议委员会制定条例的最后文稿交给李可夫同志，并由他代表政治局定稿。

中央委员会书记

№05096

都主教谢尔盖致莫斯科宗主教管
辖区东正教大司祭、神甫和
教民的信件（草稿）

（1926年6月10日）

我们已故的至圣大牧首^①经常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为我们东正教宗主教教会的登记注册而奔走，同时也就是为能在苏联的疆域内合法存在而奔走。不错，我们的教区团体完全是合法存在的（在与政府签订条约的基础上），而且这类团体有权自己认定在自己纯宗教事务方面的、他们所希望的领导人。所以，东正教高层对待教区团体的态度完全站在合乎教规的基础上，不追求任何行政或法律以外的职能，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我们的执政教会机构不进行特别的登记注册就会给高层带来许多实际的不便，给予它的活动某种隐藏的或甚至于是秘密的、地下的性质，这样就会产生许多种种的误解和猜疑。

为了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也是仿效至圣大牧首的榜样，我向内务人民委员请求让我们的教会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现在我高兴地报告你们，政府满足了我们的请求，政府认为是可以的：1）（接下去要看我的声明中什么将被允许）^②。

这样，在得到有权合法存在的同时，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和

① 指已故的大牧首吉洪。

② 原文如此。

权利一起，还有与给予我们这些权利的执政者处理好关系的义务。因此，我代表我们东正教十月革命前教会的高层和教徒们向苏维埃政权表示我们真诚地准备成为完全守法的苏联公民，忠诚地对待它的政府，并坚决地不与危害联盟的任何政党或企业发生往来。但我们将是彻底坦诚的人：我们不能对我们之间、东正教和统治联盟的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之间存在的矛盾沉默不语。他们把与上帝，与上帝在人民心中的统治地位作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我们则在信仰上帝和使之广为传播并在人民心中巩固这一信仰看成是我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和全部目的。他们承认的只是唯物史观，而我们相信天意和神的创造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绝不许诺对不能调和的事进行调和，从而给我们的信仰染上共产主义色彩。我们依旧是原先那样笃信宗教的人，依旧是十月革命前的教会教徒，或者就像对我们嘲弄地称呼的那样，是吉洪分子。我们不是在教会对“现代要求”的适应能力中，不是在泯灭它的理想中，也不是在改变它的学说和教规中，而是在当代条件下的宗教生活里看到了宗教的发展。在当代环境里能够燃起我们教徒们心中过去那种对上帝的全部热忱之火，使被驱使者懂得在物质进步顶峰中寻找自己生活的真正意义。

所以我们确信，东正教基督徒必须义无反顾地遵守自己的信仰并根据它的戒律生活。正因为如此，无论在哪个国家里，其中包括苏联，他到处都是极好的、模范的公民。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无论是在工厂、农村或城市，在军队，还是矿山……他都在活动着。国家要求放弃私有制；需要为了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需要不酗酒、为忠诚做出榜样，为勤奋地服务于社会做出榜样，然而这一切，基督徒的信仰都已教会他这么做了。无论如何，如果苏联公民不仅是由共产党人组成，而且还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么各种各样东正教基督徒可能会占这种宗教信仰公民的前几位之一，而且他们属

于居民的大多数。

但是我们，教会上层的代表，在许诺完全彻底地奉公守法（全体苏联公民都有此义务）的同时，不能再承担什么特别的义务来证明我们对这种守法的忠诚。例如，我们不能承担义务来观察同教者的政治情绪，尽管这种观察局限在我们对一些人做出担保，担保他们可靠，而对另一些人不作这样的担保。苏维埃政权有更合适的机构和更有效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尤其是我们不能承担执行官的职能，不能使用宗教惩罚手段来报复对苏维埃政权不怀善意的人。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宗教离开政治和国家的使命而自由，我们也绝不能拒绝这一成果，而且信教的人民也不要求加以拒绝。但是我们坚决许诺，这将取决于我们的威信所达到的程度，以教会的名义来制止政治的渴望。

这里要求弄清楚我们对侨居国外的俄罗斯宗教界并在那里建立了某些俄罗斯教会的分支机构的态度。境外的宗教界人士不承认自己是苏联公民，也不认为自己对苏维埃政权负有任何义务，有时候还要发表与苏联敌对的言论，而为这些言论负担的责任却落到整个俄罗斯教会的身上，因为他们还继续留在俄罗斯教会的教士中和教会的中上层中。这种责任，包括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还落到生活在苏联境内的那部分宗教界人士中，他们被列入苏联公民的范围之内。用某种宗教的惩罚来责难因对苏联不忠的境外的宗教界人士是根本不适宜的，而且也给人以多余的借口：是苏维埃政权强迫我们这样做的。但是，表明我们和这些耍政治手腕的宗教界人士完全断绝关系，从而今后不对他们的政客作风负责，这对我们来说是愿意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对此只需要做出规定，这就是任何不愿意承认自己负有苏联公民义务的教徒应当开除出莫斯科宗主教区教士的行列，参加到视地域而定的境外东正教地区教会中去。境外像主教公会或主教管辖区委员会等特殊俄罗斯当政教会机关应当受那些义

务的制约。

这样，我们和侨民们分开就能在苏联境内建立完全超脱政治的宗教生活，但是要记住我们在所给予的栖身之地，在使我们有正式、公开存在的苏联面前的公民责任。

请至圣的大司祭们把我这封信告知自己的教区，并将往后的事向我通报。

诺夫哥罗德

大牧首临时代理人 谢尔盖

下哥罗德都主教

1926年6月10日（5月28日）

№05097

谢尔盖（斯特拉戈罗茨基）都主教的声明^①

（1926年7月10日）

致内务人民委员

下面署名者自1925年12月14日起履行莫斯科大牧首临时代理者职务，也就是领导俄罗斯东正教会或莫斯科牧首管辖区，其疆域和苏联的版图相一致。

这一职务把领导有宗教社会几百万成员的最高神职委托给了我。实行这一领导必须经常在全苏联范围内往来。在我规避任何行政法律职能的情况下，我们的活动要求某种形式和一定的辅助机构，而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要实现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东正教会（所谓古洪的，也就是大牧首的教会）这一等级迄今还没有登记，这不能不带来许多实际上的不方便，同时使我们所有的活动具有某种地下性质，尽管我们没有搞任何共和国所禁止的活动。所有这些想法，以及我履行职务所面临的时间不确定地拖延的威胁，都促使我要求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一等级或所谓十月革命前的教会教徒（有别于十月革命后的革新派教徒、自我虔信者等等）进行登记注册，这样就使我们能合法和公开地履行我们宗教的条规所赋予的，对我们的教徒，也就是对自愿承认我们为自己的领导者的人，进行宗教领导的职责，其中我要求：

^① 1925年4月俄国东正教大牧首吉洪死后，根据他的遗嘱，先由彼得代理大牧首职务。彼得于1925年12月被捕后，由彼得提名谢尔盖接任大牧首代理人。彼得、谢尔盖和阿格凡盖尔三人是吉洪遗嘱指定的三名大牧首代理人的候选人。

1. 将我，谢尔盖，下哥罗德都主教（斯特拉戈罗茨基公民）以临时履行职务的莫斯科大牧首执事的身份登记注册（我已签署：“正式接任临时大牧首代理人”文件），并给为我服务的“莫斯科大牧首办公室”登记注册，该办公室由主任和秘书组成（2~4人）。还要给必要数量的缮写者登记注册，他们有权拥有公文纸和印章。我设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住地和办公室是临时的，必要时办公室可能会迁往莫斯科。办公室全体人员将根据获得总体许可的情况补充提出。

2. 授权地方行政机构对地方一级的十月革命前教会，即主教管辖区的和助理教务区的高级僧侣进行登记注册，他们可有权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如果没有别的辅助管理机构，诸如主教管辖区、助理教务区委员会或神甫委员会等等），使用公文纸和印章。

注意：根据获得登记注册的情况，我们进一步的任务将是在相应的代表大会上通过选举组织领导上面提到的教会事务的集体机构。在地方上进行组织时，我们以后可着手召开全联盟规模的我们的地方宗教会议选举大牧首，在他们监督下组织东正教最高会议和最高教会委员会以及其他公共教会事务。

3. 在召开我们的地方宗教会议之前和在大牧首的监督下组织集体管理机构之前，我要求允许我为讨论不时产生的教会—教规问题而召开一些规模不大的高级僧侣会议（5~15人），在莫斯科或其他城市（优先在产生问题的城市），由我承担责任而由别的高级僧侣主持会议。关于这类会议和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将及时通报地方行政机构。

4. 为向教民团体通报教会生活的进程，通报教会权力机构的指示以及为刊登关于教会—传教问题的文章，我要求允许我让上面提到的办公室出版定期《莫斯科大牧首通报》。

5. 我要求允许我们十月革命前的教会团体从事宗教教育，既

有高等教育（神学院形式），也有为 18 岁以上设立的中等教育（牧师学校，牧师培训班）。

如第 4、第 5 点被允许，将及时提出纲要和其他需要的资料。

我所提出的“请求”目的在于表示我和与我观点一致的十月革命前教会的东正教高级僧侣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和对成熟的教会—政治问题的态度。

谢尔盖

下哥罗德都主教

1926 年 7 月 10 日于下诺夫哥罗德
克列斯托沃兹德维任斯基修道院 18 号

№05098

下哥罗德都主教谢尔盖致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部申请书

(1927年5月18日)

恳请：

1. 请为我和由我临时照管的大牧首东正教最高会议登记注册，以便对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大牧首为首）的事务进行管理，并给予东正教最高会议设立办公室，使用公文纸和印章的权利。在我的主持下，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成员是：（1）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尔谢尼（斯塔德尼茨基）；（2）特维尔都主教谢拉菲姆（亚历山大）；（3）沃洛格达大主教西利维斯特尔（勃拉丹诺夫斯基）；（4）呼蒂大主教、临时管理诺夫哥罗德教区的阿列克塞（塞曼斯基）；（5）科斯特罗马大主教谢瓦斯季安（维斯特尼）；（6）兹韦尼哥罗德大主教，临时管理莫斯科教区的菲利普（古米列夫斯基）；（7）苏梅主教，管理哈尔科夫教区的康斯坦丁（季亚科夫），他被允许邀请参加东正教最高会议，以及非宗教的政权机构批准的其他人员。

2. 请吩咐地方政权允许按教区给由我进行宗教管辖的主教管辖区的和助理教务主教的高级僧侣（十月革命前的教会教徒）登记注册，并给由他们组成的委员会和办公室登记注册。在得到登记注册之前，我要求允许我，以及上述的东正教最高会议，着手从事我

们的活动。

1927年5月18日

莫斯科大牧首临时代理、下哥罗德都主教谢尔盖

(И.Н. 斯特拉戈罗茨基) 等

№ 05099

克洛科京致斯特拉戈罗茨基公民的复函

(1927年5月20日)

莫斯科大牧首临时代理、下哥罗德都主教谢尔盖（斯特拉戈罗茨基公民）等的申请，以及由他主持组织的所谓临时“大牧首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成员：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尔谢尼·斯塔德尼茨基；特维尔都主教谢拉菲姆·亚历山大；沃洛格达大主教西利维斯特尔·勃拉丹诺夫斯基；呼蒂大主教阿列克塞·塞曼斯基；科斯特罗马大主教谢瓦斯季安（维斯特尼）；兹韦尼哥罗德大主教菲利普·古米列夫斯基和苏梅主教康斯坦丁·季亚科夫，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档案局的行政科已收到并告知如下：在确认这一机构之前，它的活动不会遇到障碍。

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档案局行政科科长 克洛科京

№05100

谢尔盖都主教致神甫和教民的信

(1927年8月19日)

仁慈的上帝！

恭顺的下哥罗德都主教谢尔盖、宗主教副执事和东正教最高会议临时大牧首致至圣的大司祭们、热爱上帝的神甫们、忠诚的修士们和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所有忠诚的教民们。

已故的至圣的神父、我们的大牧首吉洪在他去世前所操心的一件事就是使我们俄罗斯东正教会正确地对待苏维埃政府，使教会可以完全合法地和和平地存在。至圣的大牧首在临终时说：“如果再活三年就好了”。当然，要不是突然的去世中止他至圣的劳作，他会把事情进行到底的。遗憾的是，各种不同的情况，而主要的是国外的敌人进攻苏维埃国家，其中不仅有我们教会的普通信教群众，而且还有他们的领导者，这些情况理所当然地激起政府对整个教会活动家们的不信任，妨碍了至圣的大牧首的努力，从而使他无法在生前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圆满的成功。

如今我们教会临时代理大牧首的使命又落到了我的身上，落在自认不够格的都主教谢尔盖的身上，与此同时，还有继续已故者的事业和竭尽全力去和平地建设我们教会的事业也与使命一起落到我们身上。东正教大法师们赞同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并不是没有成果的：在我监督下建立的临时宗主教东正教最高会议有望把我们所有宗教事务纳入应有的制度和秩序加以管理，增强了和平生活的可能性及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我们活动的信心。现在，当我们快要达

到我们努力的目标时，我们的境外敌人没有停止活动：谋杀、放火、抢劫、爆炸以及类似的地下斗争现象，就在我们大家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这一切妨碍了和平生活的潮流，制造了相互不信任和种种怀疑的气氛。而和平生活的潮流对我们教会更有必要；对我们大家更有必要，只要我们大家珍视它的重要性，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把它引入公开的和平相处的道路上去；这种和平生活的潮流之所以对我们更必要，因为现在表明：我们，教会的活动家们，不是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在一起，不是和他们搞阴谋的疯狂工具在一起，而是和我们的人民，和政府在一起。

证明这一立场乃是我们（我们和东正教最高会议的）这封信的首要目的。接着我要告知你们，在今年5月根据我的邀请和当局的允许，组成了在代理人监督下临时宗主教最高会议，其组成即下面的署名者（缺至圣的诺夫哥罗德都主教阿尔谢尼；科斯特罗马大主教谢瓦斯季安因病也没有来）。我们关于允许东正教最高会议开始管理全俄东正教教会活动的申请取得了成果。

如今我们在苏联的东正教教会不仅符合教规，而且根据公民的法律也完全是合法的管理中心；我们希望合法化逐步扩展到我们基层的管理部门：主教管辖区的、县的以及其他等等。未必需要解释这样做以后我们东正教会、僧侣们、所有教会活动者和机构……的境况将发生变化的意义和结果。

我们要向上帝作感恩祈祷，它是如此的厚待我们的教会。我们还要向苏维埃政府表示我们全体的感谢，它是如此关心东正教居民的宗教需求，与此同时，我们要使政府相信，政府信任我们，我们是不会以德怨报的。

我们以对上帝感恩的心情着手进行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工作。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也摆在所有教会代表们面前的任务的巨大。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表明，不仅对

东正教无动于衷的人们，不仅背叛东正教的人可以成为苏联的忠实公民，成为对苏维埃政权忠诚的人，而且东正教最忠实的信徒，也可以成为苏联的忠实公民。宗教连同它的所有信条和传统，连同它所有合乎教规的和供奉神灵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就像真理和生命那样珍贵。我们希望成为东正教徒，同时又意识到苏联是我们的非宗教祖国，它的欢乐与成就，也是我们的欢乐与成就，而它的挫折也就是我们的挫折。任何对苏联的打击，不管是战争、抵制、某种社会灾难，还是来自阴暗角落里的野蛮谋杀，我们认为也是对我们的打击。作为东正教徒，我们会记住自己作为苏联公民的使命，就象《罗马人书》教导我们的：“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我们也希望，在上帝的协助下，在我们共同促进和支持下，我们将会解决这个任务。

可能妨碍我们的只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年根据忠诚程度安排宗教生活，那样对我们是有所妨碍的。这是没有足够地意识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严肃性。许多人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一种误会、是偶然的，因此是不能长久的。

人们时常忘记，对基督徒来说是没有偶然性的，我们所发生的一切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上帝的手在活动，在坚定不移地引导每个民族去实现它预定的目标。有些不愿意理解“时代旗帜”的人可能会觉得不能和东正教断绝往来，也不能和旧制度，甚至不能和君主政体断绝往来。某些宗教界人士的这种情绪，当然不只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并引起苏维埃政权的猜疑，从而阻碍了至圣的宗主教为教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和平关系的努力。须知，《提摩太前书》不是平白无故地开导我们的，上面说，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平安无事地度日”，只不过要服从合法的政权，要不就离开社会。只有那些书呆子、空想家才会想到，像我们东正教教会这样的大社会，连同它所有的组织，可以避开政权封闭起

来，在一个国家里安稳地存在下去。如今，当我们的宗主教管辖的教区在履行已故大牧首的遗愿时，坚决地和坚定不移地站到奉公守法的道路上来，有上面指出的那种情绪的人不得不或者克制自己，把自己的政治好感留在家里，只把信仰带到教会并只为信仰而和我们一起工作；或者，如果他们不能马上克制自己，至少不要妨碍我们，暂时离职。我们相信，他们很快会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而且确信，他们只须改变对政权的态度，而信仰和东正教生活是毫不动摇的。

在这种情况下，和侨民们一起去国外的宗教界人士的问题特别尖锐。我们的某些大司祭和神甫在国外发表的明显的反苏言论严重损害了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它迫使已故的大牧首撤销国外的东正教最高会议（1922年4月23日～5月5日）。但是迄今最高会议继续存在，政治上没有改变，而最近由于追求权力甚至把国外的教会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我们要求在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做出在自己所有的社会活动中完全忠于苏维埃政府的书面保证。不作这种保证或违反这种保证将被开除出莫斯科牧首区的教士队伍。我们想，这样划清界限，我们将能防备来自国外的任何突发事件。另一方面，我们的决议也许会迫使许多人去思考，他们是不是也该重新考虑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别断绝与自己故里的教会以及祖国的关系。

我们认为，准备开会，召开我们第二次最高宗教会议，也是自己至关重要的任务。会议将为我们选举一个经常性的教会管理机构，而不是临时性的机构，还要做出关于所有分裂基督教的教会“权力窃据者”的决定。召开会议的程序与时间，地区主教会议的议题以及其他细节将在以后制订。现在我们只表达我们坚强的信念，即我们未来的最高宗教会议将决定我们内部宗教生活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以自己会议的智慧 and 声音对我们着手进行的我

们教会与苏维埃政府建立正确关系的事业给予完全的赞同。

最后我们诚恳地请求你们大家，至圣的大法师们、牧师们、兄弟们和姐妹们，你们每个人在自己担负的职务中，以你们对上帝事业的同情，以你们对至圣的教会的忠诚和顺从来帮助我们，特别是以你们为我们向上帝所作的祈祷来帮助我们。上帝让我们顺利地、合乎神意地完成我们所肩负的给上帝带来荣耀的事业，这事业有利于我们至圣的东正教教会，并拯救我们共同的灵魂。

我主基督耶稣的恩赐，爱上帝、圣父和圣灵的圣餐，让他们和我们大家在一起，阿门。

1927年7月16/29日 莫斯科

大牧首临时代理者、下戈罗德都主教谢尔盖

临时宗主教最高会议成员：特维尔都主教 谢拉菲姆

沃洛格达大主教 西利维斯特尔

呼蒂大主教、诺夫哥罗德主教管理辖区负责人 阿列克赛

萨马拉大主教 安那托利

维亚特卡大主教 巴维尔

兹韦尼哥罗德大主教、莫斯科主教管辖区负责人 菲利普

苏梅主教、哈尔科夫主教管辖区负责人 康斯坦丁

谢尔普霍夫主教、事务主管 谢尔盖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

1927年8月19日

№05104

费多托夫致都主教叶甫洛基^①的信

(1927年8月29日)

最尊敬的和亲爱的大主教！

在这困难而又非常重要的日子里我离您这么远（我和妻子在尼斯郊外），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们知道您将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弗拉基米尔大主教请我参加一个关于谢尔盖都主教信件的私人会议，我头脑中没有什么建议来竭力影响您的决定，我本人也没有一定的意见。但我希望您能得到尽可能完全的信息。我记得一个月前有一位叫别涅舍维奇的教授来到巴黎，他是著名的古典主义研究家和拜占庭学家，在1922年维尼阿明都主教的诉讼案中表现得很英勇。也许，他比这里任何人都更能报道俄罗斯教会的情绪，他也可能说谢尔盖都主教的观点是否符合教会的舆论。今夏正好从莫斯科传来反对谢尔盖都主教的含有警告意味的声音。关于这我已告诉Г. Г. 别卓勃拉佐夫和А. В. 卡尔塔舍夫。我写这一点不是因为自己应当参予。对我来说不清楚的是：彼得都主教和其他在狱中的忏悔者们如何对待谢尔盖都主教的步骤？

关于别涅舍维奇教授，我听说他在国家图书馆手稿部门工作，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不过不能损害他的名声，要知道，他是苏联的一名工作人员，是来出差的。

^① 叶甫洛基（戈奥尔吉耶夫斯基，1868～1946）都主教是俄国东正教国外侨民教会组织的最高首领。其总部设在塞尔维亚境内的卡尔洛瓦茨。

大主教，请原谅我不受欢迎的打扰。我希望，调查、打听的时间还没有过去，而教会的痛苦是我们共同的痛苦。

我的妻子也由衷地和您在一起，为您感到不安。我们俩请求为您祝福和祈祷。

深深地忠于您和爱您

您的 Г. 费多托夫^①

^① Г.П. 费多托夫 (1886~1951)，宗教史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侨居国外。

№05105

麦列日科夫斯基和基皮乌斯
致叶甫洛基都主教的信

(1927年8月29日)

大主教

恳求您别签署谢尔盖都主教寄给您的屈从苏维埃政权的义务。事情当然完全不在于“政治”，而在于重要得多的方面。

我们坚信，许多笃信基督和热爱东正教教会的人都是这样考虑和感觉的。《新闻》上的那篇关于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文章^①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极为愤怒。

再一次恳求您别签署。

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忠诚之意

И. 麦列日科夫斯基

3. 基皮乌斯

^① 指1927年8月19日谢尔盖都主教致神甫和教民的信，见本专题文件№05100。

No 05106

**《俄罗斯》署名文章：
“东正教的失败和胜利”^①**

(1927年9月3日)

谢尔盖的这一步骤既意味着胜利，也意味着失败。这不仅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也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对俄罗斯是如此，对侨居国外的人也是如此。

它保证了所有左倾的不合教规的“十月革命后革新派教徒”小集团的表面胜利。谢尔盖都主教以自己极度的忠诚对待布尔什维克政权，弄到一个东正教首领的合法封号，却失去了革新派教徒独立于东正教会的基础。分化得乱作一团的宗教界兴高采烈地奔向期盼的联合，但谢尔盖都主教最终无法使已被拆散的俄罗斯教会达成这种诱人的“联合”，因为他站在错误的道路上。

早在一年前谢尔盖都主教在给苏维埃政府的便函中就出色地证明，东正教不可能给政府以积极的帮助。很显然，他和所有的对去世大牧首的崇拜者一起在其遗嘱中看到了这一点，但现在却急剧地背弃了这一原则，转向教会侍奉国家的老原则，而这个国家又只不过是在反常状态下，积极反基督的政权。不管那些迷失方向的革新派教徒群众如何兴高采烈地追随谢尔盖都主教，但他还是无法把所

^① 此文是卡尔塔舍夫1927年9月3日发表在巴黎《俄罗斯》报刊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他坚持过去来自己故大牧首的观点，即要求教会从对卡尔洛瓦茨分子的政策中摆脱出来是正确的，现在，同样提出摆脱卡尔洛瓦茨分子教会服务于国家的原则性立场的谢尔盖都主教，又提出对他们完全不合逻辑的、谄媚迎合仅仅是另一个营垒政策的要求。

有遵循大牧首吉洪遗嘱的、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和折磨的东正教徒集合起来，这从使索洛维茨基感到十分焦虑的主教们强烈的信件中就可看出，他们坚决站在把东正教会和苏维埃国家分开的立场上。还应当考虑到，不是所有的主教都愿意轻易改变昨天的信仰，而去响应谢尔盖都主教“克制自己”的号召。大多数东正教教徒群众对忠于至圣大牧首吉洪的主教们的信任是有保障的。换句话说，这一切在吉洪教会本身已标志着新的分裂。最终就像在以前新生教会妥协活动的年代那样^①，受苦受难的、受压迫的东正教将认为把妥协作为共同意识比较好，于是东正教的旗帜在俄罗斯解放的时刻将在被压迫者的手里。这就是谢尔盖都主教奉行的策略内在失败之所在。

当然，在政治方面，谢尔盖都主教的决定，表面上是很出色的，好像是吉洪的东正教对阴险凶狠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胜利，实际上这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让步，类似于新经济政策。东正教僧侣统治是在为越系统衰弱的、正走向死亡的共产主义政权效劳，然而，这种效劳是短视的，类似于把自己和死尸结合在一起：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失败。

对在国外的俄罗斯教会来说，谢尔盖都主教的策略是残酷打击。这公正吗？在对待所有在国外的人的态度方面，莫斯科的最后通牒是荒谬的，因为对红色莫斯科来说，我们不是完全合法意义上的外国人。谢尔盖都主教的决定把我们和莫斯科宗主教管辖区公开地分开使我们感到震惊，尤其使我们震惊的是，俄罗斯教会本身的权力被自愿地、模范地仅仅限制在苏联的临时疆域内。伟大的全俄罗斯教会的所有其他部分则听其自然。被抛弃的部分，其中包括我们在国外的教会，按照教规，似乎应当得到独立、自主存在的许可，而谢尔盖都主教却违背合乎教规的逻辑，站在政治路线上，完

^① 指 1922~1923 年那段时间。

全不打算这么做。但被迫的、实际上的独立自主却将变成我们的胜利和似乎是战胜我们的人的失败。不远的将来将表明，我们完全没有和俄罗斯真正吉洪的、受苦受难的教会分开，无论是在我们受到布尔什维克迫害之时；无论是脱离政治的清白时期，还是未来在神圣的俄罗斯大地上树立起圣洁的俄国东正教会的十字旗帜之时，我们都和它团结在一起。

A. 卡尔塔舍夫^①

1927年8月18/31日

^① A. B. 卡尔塔舍夫 (1875~1960)，原临时政府宗教部长，宗教史学家。

№05107

格鲁鲍科夫斯基^① 关于谢尔盖都主教信件的谈话

(1927年9月3日)

……谢尔盖都主教的信件无疑是真的，他的签名我非常熟悉。所有对这封信的怀疑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这没有任何根据。有人说这封信是布尔什维克逼迫他写的，我也不这样认为。是已经形成的局势逼迫谢尔盖都主教写这封信的。谢尔盖都主教真的希望我们都服从苏维埃政权吗？我看，不。他所希望的一切就是从那些灾难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而我们在政治上的“任性”是他遭受灾难的原因。他想卸下因我们而承担的责任。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信中没有指出任何可能的惩罚、撤销教职或其他什么迫害。我认为这封信是出于为了俄罗斯的教会，也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目的。因此，我没有看到应悲观地看待它的理由。

当然，要求给予签字保证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因“能够接受”某些人对待苏维埃政权有违法行为就承担责任呢？可要知道在信中不正是这样说的吗？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谢尔盖都主教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卸掉对在国外的教会的责任，我没有预见到任何进一步的迫害。实际上西欧主教管辖区还是照旧：叶甫洛基都主教将管理这个教区，但已经脱离莫斯科牧首区而独立了。这将是俄罗斯的难民教会。按教规，国外的独立教会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这是没有一定疆域和居民的教会。至于别的什么教会把我们作为整体收留

^① H.H. 格鲁鲍科夫斯基 (1863~1937)，索菲亚神学院教授。

下来归于自己的管辖之下，那么在卡尔洛瓦茨分子干了那些事之后，大概，不会有哪个教会还会这么做了。当然，卡尔洛瓦茨分子的高级僧侣可以宣布为独立教会，并选举安东尼为大牧首，但是，大概不会有任何别的教会承认它。我们在保加利亚只得转而由保加利亚教会管辖。

叶甫洛基都主教当然不会写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保证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教民就会离开他，对此我有许许多多证明。在这里可能发生对教会更糟的事，这就是失去在柳·达柳的教堂，莫斯科可能向那里任命自己的代表，那样的话叶甫洛基都主教就不得不从这里，从波德沃里进行管理，但是宁可失去柳·达柳的教堂，总比失去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教民要好。

……在教会与国家，即使是与苏维埃国家之间也应当有某种关系。教会不能只是受压制的蒙难者，大概从前没有过这种情况：请回忆一下拜占庭教会在土耳其人拿下君士坦丁堡之后，人们在那里为苏丹祈祷。已经发生的事是苏维埃政权与教会相互让步的结果，至少它意味着消除任何新教会建立的可能。这不是完全的和平，但有可能，这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内的教会，同样，也是在国内的教会通向和平的道路。

发表于《俄罗斯》（巴黎）1927年9月3日

№05108

国外俄罗斯东正教第四次高级僧侣

会议记录摘要

(1927年9月5日)

……听取了1927年7月16/29日宗主教临时代理、至圣的东正教临时大牧首谢尔盖都主教的信件……

根据全面讨论……高级僧侣会议认定下述情况：

1. 宗主教临时代理、至圣的东正教临时大牧首谢尔盖都主教的信件不是自由地撰写的，而是在反宗教的苏维埃政权的强大压力下写成的。

2. 这封信追求的是一个不能达到的目的：在反宗教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与东正教教会之间建立联盟，从而把教会作为这个政权不仅在俄罗斯境内，而且在国外的工具。

3. 这封信打算建立至圣的东正教会和政权的联盟，这个政权不仅要毁灭教会，而且要毁灭任何宗教，不仅要毁灭我们的祖国，而且要毁灭如此紧密的联盟本身。信中坦白地说明，在这个联盟中，苏维埃政权的“欢乐和成就”就是“教会的欢乐和成就”，而“它的挫折就是教会的挫折”，甚至“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打击就是旨在反对教会的打击。”

4. 这封信引起了新的和沉重的不安，以及我们教会的分裂，并有理由担心将出现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清洗。

5. 根据其内容，该信件不是大法师的信，而是纯政治性质的，因此不可能有合乎教规的意义。尽管教会应当高于政治激情和党

性，但它不应当对国家生活的政治问题完全无动于衷。教会应当不仅赞许国家的宽宏大量的政策，而且要和它的反基督教的政策作斗争，尤其是要和反宗教的因素作斗争。然而信件却赞许反基督政策。

6. 在信件本身的措词中可以感觉得到教会的敌人的手……。

7. 临时宗主教最高会议做出如下决议：“解除大法师和其他神职人员的职务”，“把他们从莫斯科宗主教管辖的全体僧侣中开除出去”，如果他们拒绝在寄去的关于忠于苏维埃政府的责任书上签字。这一决议超越其权力范围，并且与教规……是相矛盾的。

……随后大家决定：

1. 鉴于无法保持和莫斯科教会权力机关的正常关系，并鉴于它屈从于反宗教的苏维埃政权，失去了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和按教规管理教会的能力，全俄教会的国外部分应当停止与莫斯科教会权力机关之间的行政关系。

2. 我们教会的国外部分应当按照至圣的教规、按照 1917～1918 年全俄最高宗教会议的决定和 1920 年 11 月 7/20 日在高级僧侣最高会议和由基辅都主教安东尼主持的主教会议协助下做出的至圣大牧首吉洪、至圣的最高会议和最高宗教委员会的决议，进行自我管理，目的在于使我们在俄罗斯的各级神职人员从因为我们教会的国外部分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而承担的责任中解放出来，直至恢复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直至把我们的教会从反宗教的苏维埃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3. 俄罗斯教会的国外部分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俄罗斯教会不可分割的、统一教会的分支。它不能让自己和自己的母亲——教会分开，也不认为自己是独立教会。它一如既往地认为大牧首临时代理

人彼得都主教^①是自己的领袖，并在礼拜中高举他的名字。

4. 如果随之而来是谢尔盖都主教和他的最高会议关于开除不愿为忠于苏维埃政府签字画押的在国外的主教和教士，把他们从莫斯科宗主教教士的队伍中开除出去，那么这样的决议是违反教规的。

5. 坚决不接受谢尔盖都主教及其最高会议关于出具保证书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这是违反教规的，对在俄罗斯的，以及在国外的至圣教会也是极其有害的。

^① 古洪大牧首逝世后，在他指定的三个代理人中，彼得都主教处于首位。彼得在代理大牧首职务几个月后，因被捕入狱，才转为由谢尔盖担任代理大牧首。在这里，国外教会仍承认被捕入狱的彼得，有不满意和贬低谢尔盖之意。

№05103

索洛韦茨基的高级僧侣 关于谢尔盖宣言的公开信^①

(1927年9月27日)

1. 我们赞同高层教会机构对政府做出的关于教会忠诚地对待苏维埃政权有关国家法律和管理的一切方面的保证性表示这一事实本身。

类似的表示以已去世的大牧首吉洪为代表的教会已说过不止一次，但并未消除政府对它的疑虑，因此重复这样的表示我们认为是适宜的。

2. 我们十分诚挚地接受信件的纯政治部份，也就是：

①我们认为，全体教士和其他教会活动家们服从所有的法律和关系到国家完善公民设施的政府法令。

②我们认为他们尤其不应当参加任何——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阴谋，以及目的在于推翻现存制度和统治方式的组织。

③我们认为绝对不能允许为了在我国搞政变，教会求助于外国政府，目的在于鼓励它们对苏联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

④完全诚挚地接受解除宗教人士政治活动的法律，我们认为，神职人员无论在自己公开的宗教—社会活动中，还是在牧师影响信徒良心的隐蔽领域里，都应当既不称赞也不指责政府的活动。

① 1927年8月，代理大牧首谢尔盖《忠诚宣言》信件发表后，关押在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20名俄国东正教高级僧侣针对谢尔盖宣言发表了这封信。

3. 但是我们在总体上不能接受和称赞信件的下述看法：

①在第7段（大意）以一种非常绝对和无条件的形式来表述教会对非宗教机关服从，这种形式很容易被理解为教会和国家完全纠缠在一起。无论国家的政体如何，教会不能在国家面前承担这样的义务，即认为“国家的一切欢乐和成就就是自己的欢乐和成就，而所有它的挫折和失败就是自己的挫折和失败”，因为任何政府都可能做出考虑不周的、不公正的或残酷的决定，教会常常不得不服从这些决定，但不能为这样的决定而高兴，也不能称赞这些决定。

在现政府的纲领中有铲除宗教的条文，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们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在这方面教会就不能把国家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

②信件“为注意到东正教居民的精神需要”而向政府致以“全民的谢意”。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人这种感谢的表示不可能是诚挚的，因此也是不利于教会尊严的，并在信教人们的心里激起理所当然的愤怒。因为迄今为止政府对东正教居民的精神需要只是表现在尽可能地压制宗教特性和它的表现：污辱它、破坏寺庙、关闭修道院、没收圣骨、禁止孩子们上宗教课、没收公共图书馆里的宗教书籍、限制教会工作人员的权利等，而且，在当前，在许诺教会机构合法化的时候，政府却很少表现出对宗教需要的注意。政府官方机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报”的一篇文章最好不过地表明对信教的人们的感情侮辱，它抢先在都主教谢尔盖的信件之前发表。

③宗主教管辖的教区的信件中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接受官方的说法，并把教会和政府之间令人难受的冲突都归罪于教会、归罪于全体教士表现在口头上和实际上的反革命情绪。尽管当前没有进行一起公开的法院诉讼程序，但许多主教和神甫仅仅经过行政手续就在监狱和流放中受折磨或者被强迫劳动，其原因只是为了纯粹的宗教活动（与十月革命后的革新教派作斗争），或者因为受害人常常

不知道的原因。现政府给自己提出的铲除宗教的任务是既使教会难堪，也使国家本身难堪的真正原因。

正是这一政府对宗教原则性的否定态度，迫使国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教会而且不以它的政治表示为转移，而教会不能接受旨在毁灭它的法律。

④信件威胁侨居国外的神职人员，因他们的政治活动而把他们从莫斯科大牧首公署的全体教士中开除出去，也就是由于政治表示而受到教会的惩处，这是与1918年8月3/16日做出的1917—1918年全俄宗教会议的决议相矛盾的。这一决议规定，根据教规不允许进行类似的惩罚并恢复过去因政治罪过而失去教职的人的名誉（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格里戈里·彼得罗夫神甫）。

4. 最后，我们发现宗主教最高会议的这封信是不完全的、吞吞吐吐的，因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律是两方面的：要使教会不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国家也应使政府保证不干预教会的内部生活和它的机构的宗教活动。然而这一法律常常遭到政治监察机构的破坏。教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保证教会忠诚地对待国家的同时，应当公开地向政府申明，教会不能同敌视宗教的国家干预纯宗教关系领域的事务相妥协。

1927年9月27日

№05101

费奥凡对宗主教及其至圣的东正教
最高会议临时总主教谢尔盖都主教
信件所作的解释

(1927年10月22日)

对以下所有问题应当接受至圣的崇高的瓦西里讲话中的第16条规则：“准确地理解所写的内容并在其中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1. 新的东正教最高会议是否是十月革命后革新教派最高会议的信号？因为在信中对革新教派什么也没有说？回答：在信中说：“我们认为，准备开会，召开我们第二次最高宗教会议，也是自己至关重要的任务。会议将……做出关于所有分裂基督教的教会‘权力窃据者’的决定。”这些话很清楚地表明，形形色色偏离东正教教会的教派都要受到谴责。此外，谈到召开第二次地区主教会议，那么，和那些偏离东正教的教派一样，已经开了三次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包括1917~1918年的会议。

2. 在什么规定的基础上由最高会议来替代宗主教的管理？回答：根据1917~1918年会议的决议建立了宗主教管理机构及附属它的由12名高级僧侣组成的东正教最高会议，由三名高级僧侣、六名教职人员和六名非出家人组成的最高教会委员会。牧首制本身不可能是一人管理，因为根据1917~1918年高级僧侣会议的决议大牧首应当是同等地位之间职位最高的。至圣的使徒行使第34条规则说：“没有大家的议论第一把手什么也做不成。”现今谢尔盖都主教是大牧首临时代理，因为大牧首吉洪在临终时任命他为临时代

理。只有合乎教规的东正教高级僧侣会议才能将大牧首管理改变为东正教最高会议管理。谢尔盖都主教认为必需组成一个临时最高会议，其成员由他邀请。由于还没有高级僧侣会议，因此临时最高会议成员不能选举产生。

3. 怎么，现在教会又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难道教会和国家分开的决定取消了吗？关于这个问题发表在哪里？回答：教会与国家分开，根据规定，并没有取消。教会应当存在于政治之外。救世主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 18.36），但与此同时他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又是尽人皆知的。在回答是否给当局，也就是异教的政府缴纳赋税时，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马太福音 22.17~22）。救世主基督在预言耶路撒冷陷落的同时，犹太人在对耶路撒冷陷落时将发生的灾难表示惋惜（马太福音，24.20，马可福音 13.17，18，路加福音 21.23）。从这些文词里可以得出结论，对灾难的惋惜，在对待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履行公民的职责并不表明是教会和国家的结合。

使徒保罗在号召相互帮助时写道：“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 6.2）

普斯科夫大主教 费奥凡

1927年10月22日

№05109

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415 号通令 74/C

(1927 年 11 月 17 日)

莫斯科市

主送：各边区、州、省行政厅

抄送：各边区、州、省执行委员会

关于所谓谢尔盖最高会议的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问题

鉴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办理了所谓谢尔盖最高会议的登记手续，来自地方只要求对所谓忠于吉洪的主教管辖区进行登记的问题，经与国家政治保卫局协调，认为有必要通知如下：在当前条件下不要再发给所谓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的执照或接受这些组织成员名单的表格。但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某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行政机构等，在这种情况下，对这样的机构不要给予登记，同时也不要阻止它们发挥作用。

俄罗斯联邦内务副人民委员 叶戈罗夫

No 05102

谢尔盖都主教对彼得 格勒教会代表团的答复

(1927年12月14日)

1. 如果我认为不接受苏联宗教政策的方针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正确的和符合教会需要的，那么从我这方面来说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犯罪的。

2. 主教的调动是我们宗教机构与当局的关系在一定程序上的所必需的临时现象。我同意，调动常常是一种冲击，但不是冲击教会，而是冲击主教和教徒本身的个人感情；但是，要理解情况的特殊性，要理解有许多人正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撕碎教会的肢体。无论是主教还是教徒应当为了教会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个人的感情。

3. 东正教最高会议作为自治机构而占有自己的地位，在大牧首在世时它也是这样的机构，尽管它也是属于被邀请之列。

4. 关于都主教谢拉菲姆，除了流言蜚语和空洞议论，我什么也不知道。阿列克赛大主教过去犯了错误，但他有勇气加以改正。

5. 建立主教管辖区管理，其中包括助理教务主教的规定，这一规定与1917~1918年宗教会议所做出的规定是相符合的。

6. 取消不为在监狱中和被俘的人祷告的规定（叶克千尼亚^①还保留着），只是一些大辅祭因符合其众所周知的心意而有时加以

^① 叶克千尼亚是东正教的一种祷告。

滥用祷词的某些地方，把念祈祷词变成示威；要知道我们的忠实信徒们的弥撒不是像古时候那样关起门来进行的，而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应当遵守公开会议的规定。

7. 为当局而祈祷只是我们作为公民对它承认的自然结果。我们没有提到当局（不过，大牧首是提到的并吩咐要提到当局）只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决定公开说，我们承认它。

1927年12月14日

№05110

克洛科京关于宗教管理机关登记问题

致远东边区行政厅函

(1928年1月6日)

C4500.43

对你们12月17日的要求通知如下：经与国家政治保卫局协调，于1927年11月17日公布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所谓谢尔盖最高会议的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的第415号/74/C通令，其中使用“登记”这个名词是由于所谓宗主教最高会议，还有所谓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在自己的申请中按规定程式提交了这些组织成员的名单，提出把它们作为正式（官方）机关予以“登记”的问题。对此，当然是根本谈不上的。从纯政治角度考虑，用某种形式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错误是完全不合适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行政监督处处长 克洛科京

№05110

克洛科京关于宗教管理机关登记问题

致远东边区行政厅函

(1928年1月6日)

C4500.43

对你们12月17日的要求通知如下：经与国家政治保卫局协调，于1927年11月17日公布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所谓谢尔盖最高会议的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的第415号/74/C通令，其中使用“登记”这个名词是由于所谓宗主教最高会议，还有所谓主教管辖区管理机关在自己的申请中按规定程式提交了这些组织成员的名单，提出把它们作为正式（官方）机关予以“登记”的问题。对此，当然是根本谈不上的。从纯政治角度考虑，用某种形式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错误是完全不合适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行政监督处处长 克洛科京